



THE
SPANISH
CIVIL
WAR

[英]
伯内特·博洛滕
Burnett Bolloten

戴大洪 译

西班牙
革命与反革命
内战 [中]

**THE
SPANISH
CIVIL
WAR**

[英] 伯内特·博洛滕

Burnett Bolloten

戴大洪 译

西班牙内战
[中]

革命与反革命

THE SPANISH CIVIL WAR: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by Burnett Bolloten.

Copyright © 1991 by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Published in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27514 USA www.uncpress.unc.edu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New Star Press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 (英) 伯内特·博洛滕 (Burnett Bolloten) 著；戴大洪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133-2320-8

I . ①西… II . ①伯… ②戴… III . ①西班牙内战 IV . ① K55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7004 号

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英) 伯内特·博洛滕 著 戴大洪 译

出版统筹：向珂

特约编辑：杨露

责任编辑：汪欣

责任印制：李珊珊

封面设计：一千遍

封面绘画：吕欣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88310888

传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60mm × 970mm 1/16

印张：92.75

字数：1202千字

版次：2017年1月第一版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33-2320-8

定价：178.00元 (全三册)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上册

序 / 1

前言 / 8

作者说明 / 11

译者说明 / 29

第一部分 内战、革命及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六年共和国的垮台

第一章 酝酿剧变 / 3

第二章 左派的分裂与僵持 / 30

第三章 军事叛乱与内战 / 50

第四章 革命与第三共和国的崛起 / 69

第五章 革命打击小资产阶级 / 92

第六章 农村的革命、自由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 100

第二部分 共产党的崛起

第七章 中产阶级的希望 / 133

第八章 人民阵线 / 144

第九章 外国干涉 / 158

第十章 将革命伪装起来 / 179

第十一章 拉尔戈·卡瓦列罗组成新政府 / 184

- 第十二章 共产党争夺控制权 / 198
第十三章 胡安·内格林博士和胡里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 / 218
第十四章 运往莫斯科的西班牙黄金 / 232
第十五章 苏联的影响、政治欺骗和阿萨尼亚总统的困境 / 254
第十六章 错综复杂的东西方外交斗争中的西班牙 / 266
第十七章 向英法伸出橄榄枝 / 286

第三部分 抑制革命

- 第十八章 无政府主义哲学与政府 / 303
第十九章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加入政府 / 311
第二十章 遏制革命委员会 / 333
第二十一章 治安力量 / 339
第二十二章 国有化对集体化 / 350
第二十三章 一个新型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 / 360
第二十四章 平衡各个阶层的力量 / 370

中 册

第四部分 从革命的民兵武装到正规军

- 第二十五章 革命的民兵武装 / 387
第二十六章 纪律与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 / 403
第二十七章 第五团 / 410
第二十八章 人民军 / 419
第二十九章 何塞·阿森西奥将军，拉尔戈·卡瓦列罗向共产党人挑战，
政府撤离马德里 / 431
第三十章 保卫马德里、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和国际纵队，米亚哈、罗霍和
克莱贝尔 / 439
第三十一章 苏联军官、记者和外交官 / 472
第三十二章 自由主义运动与正规军 / 498
第三十三章 钢铁纵队 / 514
第三十四章 拉尔戈·卡瓦列罗与莫斯科决裂 / 527

第三十五章 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压力加大 / 543

第三十六章 拉尔戈·卡瓦列罗进行反击 / 562

第五部分 共产党人获胜

第三十七章 西班牙共产党讨好社会党温和派 / 579

第三十八章 加泰罗尼亚：军事叛乱与社会革命 / 587

第三十九章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崛起、民兵委员会的解散 / 603

第四十章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托洛茨基分子 / 616

第四十一章 加泰罗尼亚走向公开交战 / 634

第四十二章 五月事变（一） / 658

第四十三章 五月事变（二） / 686

第四十四章 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 / 709

第四十五章 胡安·内格林上台 / 726

第六部分 革命陷入低潮

第四十六章 内格林政府与自由主义运动的反应 / 741

第四十七章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取代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为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主导力量 / 750

第四十八章 共产党镇压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 761

第四十九章 与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关的重要情况 / 789

第五十章 破坏集体农庄和解散阿拉贡地方委员会 / 799

下 册

第七部分 拉尔戈·卡瓦列罗和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失势

第五十一章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挑战西班牙共产党 / 815

第五十二章 共产党讨好全国劳工联合会 / 837

第五十三章 拉尔戈·卡瓦列罗退出政坛，劳动者总工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签订联合协议 / 845

第五十四章 将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赶出国防部 / 866

第八部分 共产党的影响达到巅峰

第五十五章 第二届内格林政府，共产党在军队中占据支配地位 / 887

第五十六章 共产党对安全部门的控制 / 908

第五十七章 加泰罗尼亚与八月危机 / 926

第九部分 怀疑、分歧、灾难激增，共产党的影响减弱

第五十八章 祸起萧墙 / 941

第五十九章 人民在为什么而战？ / 958

第六十章 内格林的十三点战争目标 / 967

第六十一章 英—法干预的希望破灭 / 978

第六十二章 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 / 997

第十部分 抵抗政策终止

第六十三章 内格林返回中南部地区 / 1025

第六十四章 塞希斯孟多·卡萨多、西普里亚诺·梅拉与自由主义运动 / 1050

第六十五章 寻找替罪羊 / 1063

第六十六章 内格林逃之夭夭与第三共和国的末日 / 1083

参考资料 / 1107

致谢 / 1221

索引 / 1232

第四部分

从革命的民兵武装到正规军



革命的民兵武装

读者还会记得，内战爆发时由何塞·希拉尔组成的自由共和派政府接过了一个军官团，军事叛乱和社会革命破坏了军官团的凝聚力。

为了反击军事叛乱，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解除了士兵效忠服从军官的所有誓言约束。但是，阿萨尼亚总统写道，这项法令在军方控制的城市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它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卡塔赫纳、巴伦西亚以及其他挫败了叛乱的城市驻军中得到执行：

士兵们离开军营，几乎全都回家了。大批人员加入了义勇军，在临时指挥官的率领下，以有限的武器装备去前线作战。能够留在军营里的极少数部队实际上不起什么作用。军事叛乱破坏了所有部队的纪律。职业军官受到怀疑，主要由工人组成的部队更愿意听从所属工会或者政党的指挥而不是部队指挥官的指挥。内战初期马德里的驻军有十三个团，组成四至六支步兵部队和一个工兵营防守锯齿山脊任务艰巨。

为了把守进入首都的各条道路，共和国政府将民众武装起来。几千支步枪发放出去。但是，在马德里和其他地方，民众袭击了军营并且夺走了那里的武器，尤其是在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在巴塞罗那，

民众占领了所有军事驻地。已经供不应求的战争物资不翼而飞。他们烧毁了兵役记录；烧毁了马鞍。在巴伦西亚，骑兵团的战马被卖给吉普赛人，每匹售价五个或十个比塞塔。一场可怕的战争爆发时，不明真相的民众捣毁了最后残存的军事机器，而形势的发展将迫切需要这部机器。这些行为以及另外一些同样可悲的行为应当归咎于以下原因：几乎没有人认识到叛乱的凶猛和形势的严峻。许多人认为这是可喜的事态发展值得欢迎。¹

250

由于政府缺乏与军事叛乱作战的必要兵力，在前线打仗的重担落在工会和无产阶级政党的肩上。它们组织了民兵武装，指定或选举立场坚定、受人尊敬的工人担任指挥官。人们通常把民兵队伍称为“纵队”，它们完全由建立它们的组织所控制，在政党或者工会代表警惕的目光注视下，职业军官加入了这些民兵队伍或“纵队”，国防部分配给军官的权力非常小，甚至什么权力也不给。²

“由于必不可少，[工人组织]当时不得不利用我们。”一名共和国军官抱怨说，“工人组织严格按照自己的需要，仅以最低限度使用忠于共和国政府的军官，而且还会威胁他们，因为据说他们同情法西斯分子。”³

七月底，为了制衡革命的民兵武装，也是为了组织更多的部队上前线打仗，何塞·希拉尔的自由共和派政府决定征召两年制士兵入伍。⁴这项措施得到的响应微乎其微，不仅因为许多人已经加入了民兵武装，而且因为政府缺乏实行征兵的强制手段。

此外，政府还在八月初颁布了一项建立“志愿部队”的法令，⁵两周之后，政府迈出了更重要的一步，它颁布了一系列旨在组建一支“志愿军”的法令。志愿军从随时可以参加战斗的预备役军人中选拔，配备由退役军官和非现役军士组成的干部队伍，他们的忠诚已经得到加入人民阵线的某个党派的证明。⁶

但是，由于“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更愿意加入工会和政党自行组织的民兵武装”，这些措施的效果同样微不足道，阿萨尼亚总统证实了这一点。⁷因此，正如一位职业军官所说，志愿军始终是在纸上谈兵。“至于那些已经加入民兵组织的人员，他们更愿意留在自己的队伍中与朋友和战友们在一

起，并不愿意加入新的[志愿军]队伍。”⁸此外，当政府总理何塞·希拉尔和国防部长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均为温和的阿萨尼亚的坚定支持者时，组建一支由政府控制的军队的计划不仅让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感到担忧，而且让劳动者总工会的社会党左派感到担忧，劳动者总工会书记拉尔戈·卡瓦列罗为此多次与何塞·希拉尔进行气氛紧张的会谈。⁹在上述法令颁布两天之后发表的一篇社论中，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喉舌《光明报》断言，这些措施既不能以民兵武装没有足够的兵力打仗为理由，也不能拿他们缺乏作战能力当借口；民兵的数量以及希望加入民兵队伍的人数几乎可以说是“数不胜数”；至于他们的作战能力，“不能比他们更善战了，以致我们怀疑任何别的武装力量是否可能强于他们”。另外，《光明报》还断言，“尽管他们对共和国赤胆忠心”，但是，“没有人用同样的政治热情和斗争热情激励”那些尚未自愿加入其他部队的预备役军人，“正是这种热情促使人们加入民兵队伍”，而加入内战爆发之后组建的正规部队享受优厚待遇的权利——上述法令之一的有关条款确认了这种权利——并不会激发民兵的战斗热情。在驳斥了支持组建志愿军的军事理由之后，社论继续写道：

“如果必须重新建立一支军队的话，那么，它应当以目前正在作战的士兵为基础，而不只是由那些迄今为止还没有在这场战争中打过仗的人组成。它必须是一支符合革命要求的军队……未来的国家将不得不调整自己以适应革命。用另一种类型的军队取代现在的战士将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他们的革命行动，打算这样做是以反革命的思路考虑问题。这是列宁说过的话（《国家与革命》）：‘每一次革命在破坏了国家机器之后都让我们看到统治阶级如何试图重建听命于“它”的专用武装，也让我们看到被压迫阶级如何努力创建一种能够为被剥削者而不是剥削者服务的新的同类型组织。’”¹⁰

与社会党左派不同，共产党人毫无疑问地接受这支拟议组建的军队，实际上，他们还帮助希拉尔内阁贯彻实施它的法令。¹¹尽管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支持这个政府是为了使其作为一个民主的幌子继续执政以便影响西方世界，特别是，尽管促使他们支持这些军事法令的动机是，需要建立一支比民兵更有战斗力的集中指挥的军队，不过，共产党人还有一个更加微妙

的动机，他们不仅将这些法令视为向建立一支组织完善的常备军队——他们希望通过有计划的巧妙渗透最终确立对这支军队的控制权——迈出的一步，而且他们还知道，只要各个工会和政党拥有它们自己的军队，只要这些军队不被合并成为一支由其控制关键位置的正规军，共产党就绝不可能成为反佛朗哥阵营的主宰者。

在努力缓和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对创建志愿军的疑虑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将他们支持这样做的政治动机精心地隐藏在作战能力这一简单有力的理由下面，而且，到这时为止，他们小心翼翼地避而不提将民兵并入政府所控制的军队的要求——不久之后这一要求在他们所宣布的方案中成为一项重要的内容。

他们的主要舆论工具《工人世界报》写道：

我们相信，在必须尽快创建一支具备现代战争所需要的一切技战术能力的军队这一问题上，属于人民阵线的所有政党和组织与我们的意见一致。毫无疑问，我军的基础是我们英勇的民兵。但是，渲染夸大它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并不足以解决问题。为了提高武装起来的民众的作战能力，我们必须考虑采取那些可以立竿见影的措施。……

可能由于法令没有充分说明，有些同志认为会在创建新的志愿军的过程中发现某种贬低民兵作用的情况。毋庸置疑，民兵武装应当享有给予志愿军的一切优厚待遇，而且我们毫不怀疑政府将立即说明这一点，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谁也不会想去创建一支与我们光荣的民兵武装背道而驰的军队。实际上，这项法令的目的是要补充和加强人民的军队，使它具有更强大的战斗力，从而尽快结束这场战争。¹²

但是，随后颁布的一项使民兵像志愿军成员一样拥有享受优厚待遇的权利的法令¹³并没有消除政府的计划在社会党左派人士心中引起的疑虑。任命曾在七月十九日组成短命的调解内阁、其政党共和联盟代表人民阵线联盟右翼的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领导负责组建这支军队的委员会¹⁴反而加深了他们对于政府意图的怀疑。正是这种怀疑，加上快速推进的佛朗哥

将军的军队——八月十四日占领巴达霍斯之后，叛军在二十天之内推进了二百三十多英里——对马德里造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胁，迫使筋疲力尽地领导着一个只有名义上的权力并且失去大多数工人支持的政府的何塞·希拉尔提出，扩大政府的组成范围，把人民阵线的其他党派包括进去。

我们已经看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由拉尔戈·卡瓦列罗担任总理和国防部长的新政府于九月四日组成。

鉴于拉尔戈·卡瓦列罗对整个军事化概念的反感，根本无法确定他是否将会进行共产党人所设想的那种完全彻底的军事整编。他的反感不仅在上面引述的《光明报》社论中表现出来，而且在随后接受米哈伊尔·科利佐夫的采访时表现出来。八月二十七日，卡瓦列罗入主国防部的前一周，斯大林的这位非正式代表采访了他。科利佐夫在日记中写道：

拉尔戈·卡瓦列罗一身工人打扮，佩带着一把左轮手枪。风吹日晒使他的皮肤呈棕褐色，对于一个年近七十岁的人来说，他显得身体健壮而且精力充沛。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安排了采访并担任翻译。……没有任何形式的开场白，拉尔戈·卡瓦列罗声色俱厉地谴责了政府。……工人阶级的民兵武装不相信政府，不相信国防部，因为国防部征召形迹可疑的人入伍，使用反动的前君主派将军，使用显然是叛乱分子的职业军官。……对于为什么迟迟没有把民兵改编成为正规军以及这应归咎于谁这个问题，他没有给予明确回答，然后继续抨击政府。他认为最近颁布的奠定了志愿军的基础的法令是危险的。……[他]在这项法令中看到了对工人阶级战士的轻视以及给予职业军人的特权：“军队的等级制度正在死灰复燃！”

253

我试图使他认识到预备役军人对于军队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一个像西班牙这样的国家里，不经过军事训练，几乎无法参加战斗。他预言，正规军将从人民手中夺走他们以高昂的代价取得的武器。

接着，我们就军队与民兵各自的优势进行了长时间的热烈讨论。……拉尔戈·卡瓦列罗从《国家与革命》中引用了列宁关于武装起来的人民的论述。我提醒他，正是列宁亲自创建了工农的军队，使其具有绝对超过各种民兵小队、纵队和支队的重要性。通过认真挑

选，把低级军官中的精英与先进的革命工人融为一体，可以从中打造一支强大的反法西斯的人民军队。当军队与民兵或游击队以同等的地位并存时，迟早将会出现矛盾，这种矛盾随后将会演变为冲突，最终，军队由于水平更高总是取胜。那么，为什么要延长发生这种矛盾冲突的时间呢？必须尽快将所有反法西斯的武装力量合并成为一个单一的军事组织。

他没有再次直接表示反对，但他指责共产党人想要“调理一切事情，在各地安插领导人，给所有东西起名字、贴标签、定指标”。他把这归因于共产党领导人的年轻幼稚，归因于共产党的自信，这种自信不是建立在自己的经验和成功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俄国共产党人的经验和成功的基础上。他说，共产党人正在通过帮助[希拉尔]政府产生危害，他们正在造成灾难，正在加剧民众的不满。工人阶级政党必须清除公务员和官僚，捣毁现行的整个行政体系，采用新的革命性的领导方式。……

凭借执着的信念的力量，满腔愤怒的拉尔戈·卡瓦列罗滔滔不绝地说出了这一切。难以理解这种姗姗来迟的激进主义、最高纲领主义^①如何占据了这个人的心灵，几十年来，他在工人运动内部为最温和的改良主义立场进行辩护，他与包括反动的普里莫·德·里维拉君主主义独裁政权在内的极右翼资产阶级政府达成妥协甚至结盟。不过，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许多人确信，实际上，这位“老人”内心深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九三四年]阿斯图里亚斯的斗争和随后那个时期的[经历]使他修改了自己的政治路线。……

我们又聊了一个半小时。卡瓦列罗多次提到忠于共和派的将领、阿萨尼亚的私人朋友、所有那些萨拉维亚们[提到了国防部长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的无能和不足。后来，当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我单独在一起时，我们……进了一个小酒吧。他对这次采访和谈话非常满意。他相信，现在这位“老人”完全同意有必要建立一支正规的人民军队。“他没有坦率地对你这么说；这是他的习惯，但你应当理解；

^① 最高纲领主义（maximalism）主张采取直接行动一举实现纲领中的全部目标。

他会站出来表示支持这支军队。老人对苏联友好并且赞赏俄国革命的经验。”¹⁵

但是，只有时间可以告诉新任国防部长拉尔戈·卡瓦列罗，与共产党人及其苏联顾问携手创建他们心目中那种类型的军队要走的路程有多远。

他以新的身份所面临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无疑是民兵组织的弱点；因为，尽管《光明报》宣称民兵的作战能力无以复加，这些弱点肯定是佛朗哥将军的军队逆塔古斯河谷而上向西班牙首都快速推进的主要原因之一。的确，它们不是由于缺乏斗志造成的，因为在街头或者小型战役中与局部的敌军作战时，民兵显示出巨大的勇气。相反，产生这些弱点的原因是，缺乏训练和纪律涣散；无论思想还是行动，各支民兵部队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统一；以及存在于不同党派之间的对立状态。

阿萨尼亚总统回忆说：

除了由同属一个工会的工人组成的部队之外，共和派、社会党、共产党、全国劳工联合会、劳动者总工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部队以及另外一些组织均组成了规模不等的民兵武装。没有任何计划性，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各支部队在民兵选出的指挥官的率领下，兴高采烈地奔赴前线。没有人服从军队的纪律。……[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领导下的]国防部试图整顿这种混乱局面。它正式承认了民兵部队，尽量向它们提供武器，在它们愿意接受时对其进行专业指挥，同时根据最迫切的需要分配给它们战略战术任务。这些任务是否得到执行取决于民兵战士的心情、下级军官的兴致或是政党组织的指示。国防部每天制订的兵力情况报告……暴露了这支军队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样性以及各支部队在人数和素质方面的不同构成。……至少，前线各防区的指挥官是国防部委派的职业军官。还有一些职业军官担任低级指挥官。……他们全都处境艰难。他们的权威并不总是受到尊重。他们必须说服部下服从命令，而且不得不小心翼翼，以免引起任何对其忠诚度的怀疑。如果士兵仓皇后撤，如果他们不服从命令或者执行命令不力，指挥官不能处罚他们。¹⁶

民兵不信任职业军官、没有战斗经验、重型武器不足以及总体缺乏有效的军事指挥使敌军拥有了某种优势，这种优势的作用远远超过民兵在人数上的优势。例如，在安达卢西亚前线，受国防部委派担任蒙托罗防区民兵纵队指挥官的职业军官梅嫩德斯少校十月一日打电话向马德里报告说，敌军在没有受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攻占了雷亚尔堡。他说，民兵的士气低落。那里有两支民兵部队：“一支不服从任何人的命令。他们能说的只是，他们应当枪毙他们的军官。另一支部队倒是服从命令，但是却以最微不足道的借口逃走了。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些边防警察，这些五十多岁的男人能够防止发生一场真正的灾难。至于武器，情况也非常糟糕，因为民兵纵队没有一门大炮，也没有一挺机关枪。……我必须再次告诉你们，没有办法让民兵服从命令。”¹⁷

“几乎不用说的是，这些民兵犯了他们所能犯的一切错误。”一位左翼观察家写道，“他们高呼着革命万岁发动夜间袭击；经常把大炮与步兵部队布置在一条线上。有时真会发生荒唐的事情。有一天一个民兵告诉我，午饭后，部队全体去邻近的一个农场吃葡萄；当他们回来时，阵地被敌军占领了。”¹⁸关于加泰罗尼亚民兵部队在阿拉贡地区对被包围的韦斯卡城发动的进攻，支持佛朗哥将军的曼努埃尔·阿斯纳尔写道：“最初，加泰罗尼亚军队的进攻——这些进攻几乎全都是由无政府主义民兵武装实施的——完全缺乏组织协调并且背离战术原则，以致它们的行动更像乌合之众的随心所欲而不是真正的军事行动。结果，民族主义军队司令部赢得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它调集增援部队，发现自身的弱点，集中战争物资，为从灵活防御过渡到坚守城池做准备。另外，从炮火的密度、机关枪的部署、攻击的准备、部队恶劣的组织状况、低级指挥官的优柔寡断，从进攻的软弱无力可以看出，围城的军队缺乏战争最需要的心理素质 and 战术素养。”¹⁹

同样是在阿拉贡前线，据内战初期指挥马西亚-孔帕尼斯纵队的忠于共和派的职业军官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说，不可能进行涉及不同部队的联合作战行动。

每当参谋部决定开展这种行动时，……它就不得不把[民兵]指挥官召集到指挥部里来，向他们讲解行动的基本目标以及每支部队在行动中所起的作用。随即，一场争论开始进行，民兵指挥官在争论中表示赞成或者反对，他们经常以否决的方式强行修改原来的计划。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大家总是能够就一项行动计划达成一致，不过，那是一项缩小了规模的行动，行动范围也小得多。即便如此，它也从来没有得到执行，因为，当采取行动的时刻来临时，总会有人按兵不动，打乱各部队之间的协调配合——而协调配合是行动成功的关键所在。

这种情况应当归因于以下事实：即使是在每支部队的内部，命令也没有得到过严格执行，另外，由于前线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力量，所以，袖手旁观别人的失败使它们感到某种满足。组织了大量民兵武装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一心希望它的政治对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被打败。反过来，这些党派同样讨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人。²⁰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一位著名成员写道：“宗派主义、观点分歧和传播政治信仰的热情不仅导致民兵部队彼此漠视对方的存在，忘记了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而且多次导致真正危险的情况出现在它们中间。”²¹

“党派的自豪感似乎比共同保卫共和国的责任感更强。”经常与从马德里前线归来的民兵接触的社会党人作家阿图罗·巴雷亚证实，“无政府主义民兵向共产党人炫耀他们的胜利；共产党部队的胜利让其他人暗感到失望。一支部队的失败变成了对其所属政治派别的嘲讽。这增强了各支部队的斗志，但也同时产生了互相怨恨的温床，它危害到整体的军事行动，使统一指挥无法实现。”²²

不过，共和派军官阿韦里少校对内战最初几个月普遍出现在大多数前线的情况作了最为引人注目的全面描述，当时他从巴塞罗那奉命前往阿拉贡地区，协助整顿前线的部队，他的描述被认为具有代表性：

快到萨里涅纳[民兵部队的指挥部]时，我遇见停在公路另一边的

一辆卡车，接着，在一群士兵的要求下，我停了车。他们的卡车抛锚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它出了什么故障。……

“你们要去什么地方？”我奇怪地问他们。

“去巴塞罗那，去那里过星期天。”

“可你们不是应当在前线吗？”

“当然，不过因为无事可做，我们要去巴塞罗那。”

“你们请假了吗？”

“没有，你难道看不出来我们是民兵？”

他们不理解我的问题，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在不打仗的时候离开前线天经地义。他们毫无纪律的概念，而且显然没有人就这个问题花费精力训导他们。在前线度过四十个小时的工作周之后，他们感到厌倦了，于是他们离开那里。

一到[萨里涅纳]我就去向[阿拉贡]前线指挥官[他是一位职业军官]报到，并且把我的任务告诉了他。我对他讲了我设想的计划，讲了我认为必须做的一些事情。他同情地看着我，然后答道：

257 “我们应当小心。我们应当注意。情况并不像通常那样，因此，你必须非常巧妙地与这帮家伙打交道。至少，马上我就要与[民兵]部队的头头开会，你将有机会亲自作出判断。开会之前，留下来和我一起吃饭。……”吃饭时我们进行了详谈，他对我讲了他的悲惨处境；他没有权威，无法让任何人服从他的命令。民兵纵队的那些头头半神半人，既不接受命令，也不接受意见和建议。

“你会亲眼看到的！战争不能这样进行。我没有补给；战争物资由党派和工会来分配；武器不是送往最需要的地方，而是送到[组织]决定送往的地方。……”

一些民兵部队的头头到了。……他们大多数从来没有当过兵。一些头头由职业军官陪同，后者被人称为专家，但是不幸没有权力。他们扮演着某种辅助的角色，因此，他们的意见没有意义。同样没有意义的还有我们这些军官不得不忍受的屈辱，尽管实际上我们忠于自己的誓言并且承担着一切风险。没有人信任我们：随便是个什么人就认为他有权暗中监视我们或是对我们的建议置之不理。……

阿拉贡前线指挥官建议对韦斯卡发动一场决定性攻势。一切情况均表明，这座阿拉贡地区的历史古城几乎没有任何防御，因此，通过协同作战巧妙进攻，它将落入共和派之手。……与会者听他介绍了行动方案，对其进行了详细讨论，然而不幸的是，他们最后决定，在同意采取行动之前，要与各自的工会组织商量。在讨论将要结束时，出现了非常令人遗憾的情况，因为指挥官要求一些部队应当将其多余的物资交给需要它们的另一些部队的建议立即遭到了拒绝。也就是说，前线指挥官完全没有权力决定人员和武器的部署调配。

我之所以说明这些情况，尽管只是简要地说明，那是因为它们准确地反映了民兵武装的尴尬处境，由于可悲的无纪律状况和严重缺乏装备，为了对抗正规军，他们必须创造英雄主义的奇迹。……如果拥有出色的指挥官，拥有足够的战争物资和军事纪律，他们什么事情不能做到？在视察了前线不同的部队之后，我认识到了这一点。当时没有防御工事。坚守阵地全凭勇气，只是因为没有人去想方设法鼓舞士气，所以，当敌军连续反攻时，民兵的勇气不复存在。战争物资的利用同样不合理。我曾经去过一个阵地，那里有几门十点五口径的大炮却没有炮弹。邻近的部队有炮弹，但是拒绝给他们，尽管后者自己并没有大炮。……

连成一体的战壕也是这种情况。考虑到毗邻的部队隶属于不同的政治组织，一些阵地建起了胸墙。当政治对手遭到敌军的打击时，存在着某种幸灾乐祸的情绪。……

在韦斯卡前线执行任务期间，我不得不在非常靠近敌军前沿阵地的地方过了一夜。我觉得累了，便躺下睡觉，可是，刚一盖上毛毯我就听到有人在大声唱歌。我爬起身来，看见一个哨兵正扯着嗓子高唱一首霍塔歌谣。^①

“听着，”我说，“你不知道哨兵应当保持安静吗？”

“谁他妈在乎？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不，老兄！现在应当也是一样。你难道没有意识到，他们可以

^① 霍塔(jota)是西班牙北方地区一种传统的求爱舞蹈，同时也是一种在舞蹈之前吟唱或者为舞蹈伴奏的民歌形式，还可以单独作为歌曲演唱，在阿拉贡地区特别流行。

从对面确定你的位置，然后让你吃一颗子弹？”

“禽！我们已经说好不向对方开枪了。而且，如果我不唱歌，那我就睡觉。”

听到这种理由，我缩回我的临时“床铺”——草地上的一条毛毯——准备在这个乡巴佬哨兵唱完他的歌谣之后睡觉。但是，他刚一停止唱歌我又听到他大声说话，好像是与远处的某个人进行辩论。我再次从我的栖身处起来，然后惊奇地——后来我不再感到惊奇——发现，我们的哨兵正在与法西斯军队前沿阵地那边的哨兵交谈，后者问他晚饭吃的什么东西。我们的哨兵夸张地给他列出了一份庞大固埃^①式的菜单。卢库留斯^②在他的餐桌上享用的盛宴。

“那是你们吃的东西！”对方的哨兵反唇相讥，“你们只有土豆吃，能吃上土豆你们就得谢天谢地了！”

“你是说你们都是吃土豆吧，往后，你们的情况还会变得更加糟糕。我们这里有我们想要的一切。过来，你立马就能看到。”

对方的哨兵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且邀请敌兵的某个家人——他以不太文明的语言[你的婊子老娘]²³形容了这个家人——到他这边来，然后他说道：“闭嘴吧，你这饥饿的老鼠！”

“饥饿的老鼠！”我方哨兵惊叫道，“刚才是想让你知道，我们这里的食物多得吃不了，这儿有一根给你的香肠。”

接着，他干脆把一颗手榴弹从胸墙上方扔了过去。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几秒钟之内，整个前线全面开火。手榴弹、来复枪和机关枪将它们的美妙交响乐足足演奏了一刻钟。

随即陷入了一片寂静，不过是在愚蠢地消耗了几千个弹药筒之后。²⁴

除了前面提到的所有问题之外，民兵武装体系还有一些明显的缺点。例如，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总参谋部。先后在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和拉尔戈·卡瓦列罗手下任职的国防部官员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写道：“当

① 庞大固埃（Pantagruel）是十六世纪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的讽刺小说《巨人传》的主人公，身躯高大，食量过人。

② 卢库留斯（Lucullus，前118—前57或56）为古罗马大将，曾任罗马财务官。

然，没有总参谋部，不过，接收所有电报和[电台]信息的情报局部分行使它的职能。……直到拉尔戈·卡瓦列罗担任国防部长……之后，才建立了总参谋部的大部分机构。”²⁵值得注意的是，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领导下的国防部不得不依靠工会组织为它提供大量情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写道：“在劳动者总工会的马德里办事处建立了一个常设的情报部门，它一度曾是国防部最有效的消息来源。从该机构安插了代理人的每一个省份、每一个村庄，最不易察觉的叛军行动立即被人通过电话报告了总部。”²⁶

另外，没有中央军事机构，该机构可以通过全面审视前线的局势、制订统一的行动计划、决定现有兵力、弹药、武器和机动车辆的资源配置，在最有可能获胜的战线上取得最佳战果。在独立自主、各行其是的内战初期，也不可能指望出现这种统一指挥。“我们都记得自己是如何开始打仗的。”一名共和派的支持者写道，“一帮朋友集合起来，跳上他们自己的或是没收来的卡车和汽车，有人拿着来复枪，有人拿着左轮手枪和弹药筒，开车上路寻找法西斯分子。当我们到达某个地方遇到了抵抗，我们便投入战斗，弹药打光以后，我们一般不是撤退到防御阵地……而是退回出发地。”²⁷

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国防部在运输领域难以行使任何职权，因此，它不得不依靠一个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代表所控制的道路运输全国委员会。²⁸不仅该委员会不大理会国防部的要求，²⁹就连它自己的命令通常也被那些拥有运输工具的民兵组织、革命委员会、工会分会和党派地方总部当做耳旁风，这些团体可以自行使用运输工具而不考虑全局的需要。³⁰

使问题更加严重的是，每个党派和工会都有自己的军事指挥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指挥部只关心自己手下民兵的需要，而对同一个防区或者相邻防区其他部队的需要或军事计划，不是一无所知，就是根本不予考虑，尤其是对距离较远的阵地。³¹此外，一支部队的补给经常被另一支部队偷走。³²曾经担任共产党民兵第五团指挥官的亚历杭德罗·加西亚·巴尔战后承认，该团经常盗窃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运输工具以弥补自己的车辆不足。³³

在内战最初的几个月，佛朗哥将军军队的战斗力主要依赖于具有严明

纪律、严格训练和专业骨干队伍的摩尔军团和外籍军团³⁴以及它所拥有的新式飞机，内战伊始，这些飞机就从意大利和德国到达西班牙。与此同时，共和派的民兵部队几乎毫无例外地没有可以信赖的参谋人员指挥它们投入战斗；它们通常对组织作战、连队配合一窍不通，不知道如何利用掩护和伪装，也不知道如何挖掘堑壕阵地；它们服从的不是中央军事当局的命令；它们几乎或者根本没有纪律；在十一月初敌军兵临马德里城下之前，也没有新式飞机保护它们。³⁵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具有人数上的优势，它们不仅在内战初期无法发动持续的进攻以致对许多城镇月复一月地围攻无果，³⁶而且经常在敌军的攻击下溃不成军。“这场战争的一个现象是，”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加西亚·奥利韦尔指出，“当法西斯分子占据的城镇受到进攻时，他们可以长期坚守，而[当我军受到攻击时]我们根本无力抵抗。他们包围了一座小城，两三天后小城就被攻克了；而当我们包围一个城镇时，我们要在那里度过一生。”³⁷

260

注释：

- 1 《阿萨尼亚文集》，第三卷，第487—488页。
- 2 见（国防部官员）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的《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189页；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西班牙内战，1936—1939》，第115页。
- 3 佩雷斯·萨拉斯上校，《西班牙内战》，第259页。另请参阅路易斯·罗梅罗·索拉诺《西班牙内战前夕》，第380页。
- 4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八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 5 一九三六年八月三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 6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八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 7 《阿萨尼亚文集》，第三卷，第488页。
- 8 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249页。
- 9 希拉尔向我提供的信息。他还说，拉尔戈·卡瓦列罗具有某种“暴力倾向”并且“强烈反对组建志愿军”。关于阿萨尼亚的证言，见《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862页。
- 10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日《光明报》。
- 11 据内战期间希拉尔接受我的采访时所说。
- 12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工人世界报》。
- 13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七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 14 见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政治报》。
- 15 《西班牙日记》，载一九三八年四月号《新世界》，第41—42页。

- 16 《阿萨尼亚文集》，第三卷，第488—489页。
- 17 军事历史部门档案，被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引述，见《安达卢西亚战役》，第84页。
- 18 H.E.卡明斯基，《巴塞罗那》，第244页。
- 19 曼努埃尔·阿斯纳，《西班牙内战军事史》，第601—602页。另请参阅该书第106页。关于纪律问题的描述，实例见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的《西班牙内战，1936—1939》，第145页；一九三六年九月举行的一次阿拉贡前线政治军事领导人会议的文字记录（列入参考文献）；恩里克·利斯特的演说，载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二日《工人世界报》；路易斯·罗梅罗·索拉诺（前卡塞雷斯省社会党议员）直截了当地描述了社会党民兵在托莱多前线的表现，见《西班牙内战前夕》，第308—310页。
- 20 佩雷斯·萨拉斯，《西班牙内战》，第131—132页。另请参阅塞萨尔·M.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1868—1969》，第247页。
- 21 米格尔·冈萨雷斯·伊内斯塔发表在一九三八年七至八月号《国际》上的文章。
- 22 阿图罗·巴雷亚，《制造反叛》，第536—537页。
- 23 阿韦里少校暗指的就是这种典型的西班牙式侮辱性语言。
- 24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二日《今报》。着重体是原有的。
- 25 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143页。
- 26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28页。另请参阅罗梅罗·索拉诺《西班牙内战前夕》，第308页和鲁道夫·略皮斯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巴伦西亚通讯》。
- 27 安东尼奥·比拉诺瓦，《保卫托莱多》，第122—123页。
- 28 见一九三六年八月三日《马德里官方公报》颁布的法令以及后来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和十月四日《马德里官方公报》上颁布的修正条款。
- 29 实例见马丁·布拉斯克斯的《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131—134页，内战后期担任道路运输委员会主任的亚历杭德罗·加西亚·巴尔对我充分肯定了马丁·布拉斯克斯的说法。
- 30 见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举行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会议的会议记录中何塞·卡雷尼奥关于马德里运输问题的言论（《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会议纪要》，第456页，美国国会图书馆）。国会图书馆没有会议记录的所有副本。从美国国会图书馆、马德里国家历史档案馆和马德里的军事历史部门搜集到的完整的会议记录可以在胡利奥·阿罗斯特吉·桑切斯和赫苏斯·A.马丁内斯所著《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一书中找到，见第291—454页；关于运输问题的会议记录见阿罗斯特吉·桑切斯和马丁内斯这本书的第325—326页。
- 31 实例见（共产党民兵部队指挥官）维克托·德·弗鲁图斯的《没有输掉内战的人》，第51—52页。
- 32 实例见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贝尼卡洛的晚会》，第107页。
- 33 亚历杭德罗·加西亚·巴尔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接受我的采访时说。
- 34 这得到了佛朗哥将军控制区的德国外交官的证实。见美国国务院编辑的《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所收录的汉斯·赫尔曼·弗尔克斯和威廉·福佩尔中将致德国外交部的函电，D辑，第三卷，第137—139和159—162页。“佛朗哥应当把最初几周的成功归功于他的摩洛哥军团没有受到任何势均力敌的军队的抵抗，还应归功于赤色分子一方没有卓有成效的军事指挥体系。”（福佩尔致德国外交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日，同上，第160页）值得一提的是，内战初期并不隶属于正规军的卡洛斯分子（君主主义者）和长枪党人（法西斯分子）的民兵部队深受某些困扰着左派民兵武装的问题之害（见福佩尔的报告，同上，第161页）。另请参阅拉蒙·塞拉诺·苏涅尔《昂代与直布罗陀之间：面对一个传奇》，第43页。塞拉诺·苏涅尔是长枪党人，佛朗哥政府的外交部长。

- 35 尽管苏联的轰炸机十月就到了西班牙，第一架战斗机直到十一月二日才到达。
- 36 关于反佛朗哥阵营的目击者对围攻托莱多城的描述，见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359—362和365—369页；路易斯·金塔尼利亚，《托莱多城堡的人质：见证二》；克拉拉·坎迪亚尼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电讯报》上的文章。
- 37 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举行的一次阿拉贡前线政治军事领导人会议上的发言（见会议的文字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纪律与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

在民兵武装存在的种种问题中——这些问题导致内战初期佛朗哥将军的军队在前线取得节节胜利，引起激烈争论或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莫过于缺乏纪律性。尽管这个问题困扰着所有民兵队伍，无论它们的意识形态如何，但是，只有在自由主义运动组织的民兵队伍中，解决这个问题遇到了哲学障碍，因为个人自由恰恰是无政府主义的精髓，没有什么事情像臣服于权力那样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完全背道而驰。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刊物《白色评论》在内战之前出版的一期中宣称：“纪律是对权力的顺从；无政府主义不承认权力。”¹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民兵武装反映了平等、个人自由以及不受强制性纪律约束这些构成无政府主义信条的理想。没有军官等级制度，不用敬礼，不进行兵营式管理。发表在《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上的一篇文章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会员绝不可能成为身穿镶缀着饰带的制服、有节奏地摆臂抬腿、昂首挺胸正步走过马德里大街的循规蹈矩的民兵。”²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地区代表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宣称：“当一个同志进入全国劳工联合会兵营时，他必须明白，‘兵营’一词并不意味着屈从于包括敬礼、列队以及其他各种繁文缛节在内的

可憎的军规，那些军规华而不实，是对所有革命理想的彻底否定。”³如果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民兵部队在内战初期没有纪律，那么，它们也没有军衔和肩章，食物、服装和住处均无差别，而且几乎没有职业军人——民兵武装只接受了寥寥可数的职业军人担任顾问。⁴无政府主义民兵武装的基本单位是小组，通常由十个人组成；⁵每个小组选出一名代表，他的作用有点像最低一级的军士，但是没有相应的权力。这些民兵小组组成百人队，百人队选出自己的代表；若干个百人队组成一个纵队（columna），⁶纵队上面设一个作战委员会。⁷该委员会同样由选举产生，并且根据纵队的需要分成许多部门。⁸选出小组和百人队的代表以及作战委员会的设立并不意味着任何人享有永久的特权，因为只要不能反映推选代表的那些人的意愿，代表立即就会被撤换。⁹“人们得到的第一印象是，”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一篇报道写道，“根本不存在等级制度。……没有人通过权力发号施令。”¹⁰但是，必须有人执行任务，因此，采取了诸如此类避免出现摩擦的方式。例如，在无政府主义民兵的钢铁纵队，民兵通过抽签决定谁夜间站岗，谁凌晨放哨。¹¹

屈指可数的职业军人被任命为自由派民兵部队有名无实的指挥官，缺乏纪律和逐级指挥让他们感到非常震惊。有一次，率领部队攻打马略卡岛的阿尔韦托·巴约上尉就部队缺乏纪律观念向著名无政府主义者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所领导的巴塞罗那作战委员会表示不满，他说，引进一套与指挥责任相应的等级制度至关重要。他坚持认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铁腕治军势在必行，因此，他要求委员会准许他枪毙第一个不服从命令的人。

“那么，你打算枪毙谁？”加西亚·奥利韦尔问我。

“第一个不遵守纪律的人，”我回答道，“第一个在士兵当中破坏纪律而且不服从命令的人，把自己等同于平民、窃贼、罪犯的人。”

“你应当立即放弃这些想法。”他打断我的话说，“这是一些旧社会的思想。在我们的制度下，不能枪毙不幸的同志。可以对他教育

纠正，但不能剥夺他的生命。……你应当尽快打消这些罪恶的念头，因为，如果你犯下这种罪行，你的人头将随后落地。”

“绝对有必要树立一个典型。如果指挥官没有强迫部下服从的权力，那么，谁也指挥不了他们，因为，当成千上万的人马溃不成军时，夸夸其谈的演说讲话不起作用。”……

“忘掉这些强制性的惩罚措施吧！如果一个同志犯了错误，应当怀着爱心纠正他，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绝不应剥夺他的生命。工人已经进入了一个革命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们是贵族和主人而不是奴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对待他们了，你们这些军官最好认识到这一点！”¹²

然而，这种反权威主义思想体系具有非常严重的缺陷，尤其是在战场上，因此，很快出现了遵守纪律的普遍要求。“我们曾在各种场合多次表示我们不相信修道院或者营房的清规戒律，”《工人团结报》宣称，“但是，在大批人员参与的战斗中，明确一致的看法和完美配合的行动必不可少。

“最近几天，我们目睹了一些令人伤心的事情，这使我们产生了某种悲观情绪。我们的同志自由行动，在许多情况下无视[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指挥]委员会发出的集结信号。

“革命将脱离我们的控制；如果我们不下决心赋予‘纪律’一词真正的含义，我们将因缺乏协作而遭到屠杀。”

263

遵守纪律意味着，对于受命负责具体任务的同志所做出的决定，不管是行政的还是军事的，我们应当贯彻执行，不能以自由的名义设置障碍，在许多情况下，自由蜕变成了为所欲为。”¹³

内战期间在西班牙活动的法国著名无政府主义作家加斯东·勒瓦尔断言，试图按照无政府主义观念进行战争不合时宜，因为“战争和无政府主义是人类生活势如水火的两种状态：一种是破坏与杀戮，另一种是创造与和睦；一种意味着暴力的胜利，另一种意味着仁爱的胜利”。在后方，他说，许多同志最初根本不遵守纪律，后来却心甘情愿地约束自己，但是，

“如果自我约束在某个具体的纵队产生了有效的集体纪律，并不能由此得

出危险的一般性结论，因为这不是大多数民兵部队的普遍情况，所以，为了防止灾难发生，来自外部的强制性纪律至关重要”。¹⁴

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是最受人尊敬的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在无政府主义的原则问题上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一九三六年七月，他组织了第一支民兵纵队从巴塞罗那开赴阿拉贡地区，希望攻占萨拉戈萨；当年十一月率领部队驰援受到威胁的首都之后不久，他战死在马德里前线。下面这一段关于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的轶事刊登在一份无政府工团主义流亡者的刊物上：当他还在阿拉贡地区时，一个青年民兵小组为了返回巴塞罗那惊慌地离开了前线。得知他们的意图之后，杜鲁蒂急忙赶去截住了他们。“他跳出汽车，挥舞着左轮手枪吓唬他们，然后让他们面壁而立。这时，一个当地的民兵来到现场要求他发给一双鞋，他反应敏捷地回答道，‘看看这些家伙们穿的鞋吧；如果它们合适的话，你可以拿走你喜欢的一双。没有必要让这些鞋在泥土里烂掉！’杜鲁蒂绝不打算枪毙这些年轻人，因为他总是说：‘这里没有人迫不得已。害怕留在前线的人可以返回后方去。’但他具有非比寻常的说服力，以致他们全都要求重返前线。在前线，他们以前所未有的英雄气概投入战斗。”¹⁵

264 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对于纪律的普遍要求理由充分，但是，保证人们接受某种削弱无政府主义原则基础的思想并非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因此，有时需要的不是一点点灵活性。一位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在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的机关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如果这场战争的时间正在被拖得越来越长的话，那么，这不仅是因为叛军得到了法西斯国家的物质援助，而且是因为我们的民兵缺乏协作、纪律和服从。一些同志将会提出不同意见，‘我们无政府主义者不可能接受任何人的指挥。’我们应当回答他们，我们也不可能同意宣战，但是，我们大家已经同意向法西斯主义宣战，因为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如果我们接受战争，我们同样必须接受纪律和管理，因为如果没有它们，不可能赢得任何战争。”接着，他批评了某位代表在不久前召开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声明的大意是，无政府主义者一直是而且应当继续是纪律的敌人。他说：“塔拉戈纳这位代

表的出发点建立在一个原则性的错误上。我们无政府主义者鼓励人们不遵守纪律针对的是资产阶级的制度和政权，不是针对我们自己的运动，也不是针对我们自己的事业和利益。在事关我们反法西斯运动整体利益的问题上，缺乏纪律性是诚心让我们自己失败并灭亡。”¹⁶

在一些风平浪静的前线，必须遵守纪律的观念迟迟无法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民兵部队中深入人心。但是，在形势多变的中部前线——佛朗哥将军出色的军事部署在那里惊人地显示出它的优势——传统的无政府主义原则迅速失去了作用，以致到了十月初，由马德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民兵武装所控制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已经可以实施包括下列条款的规章制度了：“所有民兵均应遵守营部以及百人队和小组代表所颁布的规章制度。

“不得擅自采取作战行动并应毫无异议地接受指派的岗位和职责，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后方。

“任何不遵守营部以及百人队和小组代表所颁布的规章制度的民兵，如过错轻微，将由所在小组给予处罚，如过错严重，将由营部给予处罚。

“所有民兵必须懂得，尽管他自愿加入了民兵队伍，但是，作为一名革命战士，现在他是民兵队伍的组成部分，因此，他的责任是服从并且执行命令。”¹⁷

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武装的著名指挥官里卡多·桑斯多年以后写道：“民兵们终于认识到，战争就是一所学校，每天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结果，在不必要把严酷的纪律强加于战士——他们都是可以不受指责地放弃阵地的志愿者——的情况下，事情发生了变化。”¹⁸

尽管许多自由主义者认同纪律是“救赎理想获胜所必须付出的巨大代价”¹⁹这一观念，但是，另一些人则认为，自由主义运动接受权力的概念对于无政府主义原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对于未来的革命进程是一种真正的威胁，因此，他们无法掩饰自己的忧虑。无政府主义青年运动的一个宣传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我们知道目前的情况迫使我们不得不暂时忘记我们最为珍视的某些原则……但这并非让我们忘记无政府主义的基本信条是反对专制，因此，如果我们与已经裹挟了一些同志的专制主义浪潮同流合污的话，无政府主义思想将荡然无存。请让我们记住，当另外几场革命运动

被所有革命运动都会滋生的专制主义弊病扭曲时，它们在如火如荼的阶段半途而废并导致灾难。……不，同志们，为了激励我们大家的那些理想，为了革命，无政府主义青年运动恳求你们不要重蹈这一覆辙。专制主义的病菌将会产生敌对情绪，而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当中的敌对情绪是革命最可怕的敌人。”²⁰

注释：

- 1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白色评论》。
- 2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 3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社会熔炉报》。
- 4 更详细的情况见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三月十二日、十三日和十五日至十七日的无政府主义报纸《我们》；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十一月十四日和十八日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报纸《社会熔炉报》以及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四日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报纸《工人团结报》；另请参阅拉萨里略·德·托梅斯（贝尼尼奥·贝哈拉诺）的《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坟墓》，第82页。
- 5 在马德里前线，民兵小组由十二个人组成（爱德华多·德·古斯曼，《马德里，红与黑》，第78页）。
- 6 在马德里前线还有由若干个百人队组成的营（同上）。
- 7 实例见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地区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为在该地区组成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民兵纵队设立一个统一机构的决议（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社会熔炉报》）。
- 8 同上。
- 9 同上。另请参阅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六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上的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的声明。
- 10 《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的报道，一九三六年一月八日（纽约）《西班牙革命》转载。
- 11 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社会熔炉报》。另请参阅西普里亚诺·梅拉《一名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战争、流亡和监狱生涯》，第108页。
- 12 阿尔韦托·巴约上尉，《我在马略卡岛登陆》，第103—104页。
- 13 一九三六年八月七日《工人团结报》。
- 14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社会熔炉报》。其他关于纪律的呼吁，见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胡安·佩罗的演说）和二十四日（克拉罗·J.森唐的文章）《社会熔炉报》，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海梅·巴柳斯的文章）、三日（编者按）、二十七日（卢卡-萨加的文章）和十二月五日（加西亚·奥利韦尔的演说）《工人团结报》；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社论）、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中部地区组织的报告）和八日（费德丽卡·蒙特塞尼的演说）《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 15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一日《自由西班牙》。杜鲁蒂在马德里前线——当马德里似乎马上就要陷落时，他率领他的纵队转战那里——的死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关于他究竟是被一颗敌人

的子弹打死还是被自己人的子弹打死，就连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内部的想法也不一致。实例见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发表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自由西班牙》上的文章。梅拉和（杜鲁蒂纵队的主要组织者之一）里卡多·桑斯都确信，他是被敌人的子弹打死的，分别见梅拉《一名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战争、流亡和监狱生涯》，第90—92页和里卡多·桑斯的《驰援马德里的部队：第二十六师杜鲁蒂纵队》，第118页。关于这个自由主义运动传奇英雄的传记，见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无政府的短暂夏天：杜鲁蒂的生与死》；雷蒙多·费雷尔，《杜鲁蒂，1896—1936》；霍安·利亚奇，《杜鲁蒂之死》；阿维尔·帕斯，《杜鲁蒂：武装起来的人民》。另请参阅发表在一九六〇年三月三十日《埃尔西利亚》，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十二月一日、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三日、二十日、二十七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希望报》和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号《历史时期》等报刊上的文章。关于杜鲁蒂在马德里前线的苏联顾问马姆苏罗夫·尤季-乌马尔可能与他的死有关的说法，见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六日《东方来信》。尽管杜鲁蒂在纪念十月革命十九周年之际向苏联工人阶级致以热烈的祝贺（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土地与自由》），但是，没有丝毫可靠的证据证明他在战死之前像苏联《消息报》的一名记者所说的那样转向投靠了共产党，这名记者在一篇从巴塞罗那发出的文章里声称：“杜鲁蒂度过了一段政治转型期，他的观点逐渐接近于共产党。最近他在奔赴[马德里]前线之前自豪地说：‘不错，我觉得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我准备把斯大林的画像挂在我的指挥部的墙上。’”（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消息报》）这种拙劣的捏造无疑是为了利用杜鲁蒂之死。仅仅在他战死的几周前，我在阿拉贡前线他的临时指挥部里采访了他。他只字未提苏联或者斯大林，只谈论了无政府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关于这一点，他对我侃侃而谈，心驰神往。他的自然、质朴和友善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我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他有休·托马斯所谓的“伟大梦想”（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七七年版，第316页）——休·托马斯太年轻（休·托马斯出生于一九三一年十月，杜鲁蒂战死时刚满五岁——译注），不可能认识杜鲁蒂。

- 16 A.G.希拉韦特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土地与自由》上的文章。
- 17 载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 18 里卡多·桑斯，《工会运动与政治：“团结”和“我们”》，第281页。
- 19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自由阵线报》。
- 20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道路》。

第五团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来说，尤其是对于向其成员灌输领导和管理原则的共产党来说，军纪问题并没有引起自我检讨。这不是说共产党的民兵队伍中不存在不守纪律的情况；¹相反，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情况不同，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共产党人没有良心上的不安需要克服，没有道德准则需要放弃。当共产党的机关报《工人世界报》声称每一个民兵都应当习惯他属于一支军队这一概念时，内战仅仅进行了几天。“纪律、等级和组织，”它要求，“每个人必须服从他的小组，每个小组必须服从其直接的上级，以此类推。我们的胜利将以这种方式得到保证。”²共产党人认为军事纪律和组织是战争的主要问题。他们立即授予其民兵部队指挥官以强制执行纪律的充分权力，他们还通过他们的民兵第五团着手训练军事骨干，组成了配备专职参谋人员和专业部门的部队。

第五团是他们卓越的军事成就，显然也是内战中最著名的部队。它异乎寻常地迅速壮大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共产党在内战爆发之前已经建立了一个叫作反法西斯工农民兵（MAOC）的准军事组织，尽管人数不多，该组织仍然成为新组建的第五团的基石。据后来成为最受公众关注的共产党军事领导人的反法西斯工农民兵全国领导人胡安·莫德斯托说，反法西

斯工农民兵是一个“群众自卫”组织，它是“那些以逐步把共和国变成一个法西斯政权为目的的反动派所挑起的斗争加剧”的结果。莫德斯托声称，反法西斯工农民兵的任务是保卫工人和他们的组织、他们的报刊、他们的地方工会、他们的集会和示威。他还说，马德里的军事暴动失败后，共产党立即命令他“将全体民兵集结在……古老的慈幼会修道院，在那里，夸特罗·卡米诺地区工人阶级反法西斯民兵已经自动建立起来”。就在这座修道院，第五团诞生了。³

像莫德斯托一样在莫斯科接受军事训练的恩里克·利斯特⁴一九三六年九月成为第五团团长，他写道：“最常被人问到的问题是，这个团为什么叫第五团而不叫第一、第四或第六团。……七月十七日[西属摩洛哥爆发军事叛乱当天]……我们开始以反法西斯工农民兵为基础组成五个志愿者营。第五营是在夸特罗·卡米诺中心区招兵组建的。……七月二十日，在参加了攻打蒙塔尼亚兵营的行动之后，第五营决定占用慈幼会修道院……并且改编为人民民兵第五团。”⁵

在西班牙化名卡洛斯·孔特雷拉斯、人称“指挥官”卡洛斯的意大利共产党员维托里奥·维达利是第五团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并且担任该团的第一政委。伦敦《工人日报》记者克劳德·科伯恩（化名弗兰克·皮特凯恩）把他描绘成一个“脖子短粗的壮汉，兼具近乎超人的充沛能量和不可泯灭的乐观精神”。⁶第五团的首任团长恩里克·卡斯特罗说他是一个借助头部和手势的“逆反型的演说家”，风格有点像墨索里尼，⁷而身为共产党员的职业军官安东尼奥·科登则说他是“革命动力的化身”。⁸他肯定体现了所有这些特点，但是，在他的乐观和情趣背后，潜藏着共产主义运动最阴险毒辣的人物之一，我可以亲自证明这一点。与维达利非常熟悉的社会党左派人士、阿尔瓦塞特省省长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作了下面这一段简洁的描述：“作为活动家和鼓动者在莫斯科[受训]之后，[他被]共产国际和国家政治保卫局派往拉丁美洲……协助[化名梅迪纳的]柯多维拉。……[他]集间谍、煽动者和匪徒于一身，对于任何被他认为妨碍了莫斯科政策的人，心狠手辣，毫不留情。……一九三四年底，他与柯多维拉一起来到西班牙。他公开的任务是协助红色救援国际。……从[内战的]第一天起，他就投身于剧烈的社会动乱中。他熟悉街道，在不受约束的狂热民

众中如鱼得水。……他组织并且训练了第一批巡逻队和行刑队，他建立了当地的兵营，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方法组织行动‘清理’那些他称之为法西斯分子的人。”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说，妓女、皮条客、普通罪犯——“卡洛斯了如指掌的马德里地下社会的所有地痞流氓”——都被他“为党的利益”加以利用。⁹

一九三七年，维达利向《莫斯科每日新闻》副主编安娜·路易莎·斯特朗讲述了第五团的组建情况：

我们必须立即创建一支军队和参谋部，因为大部分武装力量参与了叛乱。我们最初只是一些聚集起来的同志，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许多人甚至不会使用步枪。……我们只有满怀热情、立场坚定的民众，他们利用任何可以找到的武器，追随任何挺身而出的领导人，奔向任何他们听说必须从敌军手中夺取的前沿阵地。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利用任何随便懂点什么的人，让他来做军官。有时看看面相就足够了，看到聪明坚定的目光之后就对那个人说：“你当队长，由你组织和指挥这些人。”

两天后，我们占用了慈幼会修道院——我们总共六百人，其中两百名共产党员。我们决定组成队伍，国防部门说：“你们将是第五营；我们已经收到了另外四个营的申请。”

“不，”我们说，“我们应当是第五团，因为我们至少将达到一千人。”

好啦，前面那四个营仍然是在纸上谈兵，而第五营不到十天已经有了六千人。当时[希拉尔]政府给我们写信都是说“第五营的同志们”，我们则以“我们第五团”的名义回信。在我们达到六千人之后，他们承认我们是一个团。……

我们决心创建一支特殊的部队，它应当树立一个纪律的榜样。我们称之为“铁军”。……我们为这个团制定了一些特殊的口号，以建立一支铁打的部队，“决不让受伤或者阵亡的战友落到敌人手中”是其中之一。另一句口号是，“如果我的战友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前进或者后退，我有权利打死他。”

马德里觉得这非常可笑。西班牙人都是个人主义者，因此他们说，谁也不会接受这种纪律。当我们的第一支几乎全部由共产党员和金属制造工人组成的铁军列队走过这座城市时，它引起了一阵轰动。¹⁰在那以后，除了我们正规的民兵第五团正常的征兵之外，我们通过挑选战士建立了二十八个这样的铁军。¹¹

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第五团民兵的誓言是他们的道德准则”：

我，一个人民的儿子和西班牙共和国的公民，作为人民军队的一个民兵自愿接受我的任务。

我向西班牙人民和共和国政府保证……用我的生命捍卫民主自由，捍卫进步与和平的事业，为民兵的称号争光。

我保证通过严格执行指挥官的命令维护并且协助维护纪律。

我保证尽一切努力戒绝不道德的行为并且阻止战友采取这种行为，以使自己始终正确地将注意力集中在民主共和国的崇高理想上。

我保证随时响应政府的召唤帮助捍卫西班牙民主共和国。……如果我没有履行这一庄重的誓言，那就让我的战友羞辱我并且让我受到法律的无情惩罚。¹²

269

第五团成功地征召了大量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共和派人士以及无党派的工人和农民，以致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它发展到了最高峰。它宣称，当时它有六万名士兵在不同的前线作战。¹³尽管恩里克·利斯特在内战期间声称第五团由十三万人组成，¹⁴但他在内战结束多年以后出版的书中列出了更切实的数字：六万九千六百人。¹⁵另一方面，支持右派的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在他那部四卷本的人民军史著作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最全面的研究，他声称，第五团的征兵总数，包括由它征召并在阿尔瓦塞特、阿利坎特、阿尔梅里亚、瓜迪克斯和马德里的训练中心训练的部队，绝不超过三万人。他坚持认为：“为了达到共产党所宣称的六万人这个数字，必须包括第五团中的国际纵队，它们最初使用第五团指挥部的印章。”¹⁶

据恩里克·卡斯特罗说，第五团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军事

培训中心”。¹⁷它在政治和精神以及经济和家庭等各个方面对自愿参军者的生活进行指导，从这个中心走出了许多具有统一方法和组织的部队。“它们是一套部件的组成部分，”国际纵队第十五旅副政委拉尔夫·贝茨写道，“时机一到就能重新组成一支军队。它们的军官等级分明，他们的命令以志愿者参军时所接受的纪律规范为后盾。同时，政治委员监控并且培养战士们们的政治热情。”¹⁸

第五团的宝贵财富之一是职业军人的合作，不仅是那些战前已经加入共产党的职业军人——例如第五团的指挥官之一路易斯·巴尔塞洛中校，¹⁹他是民兵武装监察长，民兵部队无论需要从国防部得到武器还是资金，都得向他提出申请²⁰——的合作，而且还有其它职业军官的合作，尽管后者远未接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是，共产党的温和的宣传、²¹良好的纪律和出色的组织使他们产生了好感，同时还因为，似乎只有共产党有能力建立一支可以赢得这场战争的军队。²²

在普遍的战时气氛中，共产党的纪律性无疑是它的重要财富之一：

“共产党因为树立了遵守纪律的榜样而必然受到人们的信任。”一名并非共产党人的职业军官写道，“这样做不仅极大提高了它的威望，而且大量增加了它的人数。无数希望为国参军打仗的人加入了共产党。

“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当我偶然遇见某个即将奔赴前线的人时，我问他：

270 “‘可是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你过去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你是吗？你一直是一个共和派。’

“‘我加入共产党是因为他们纪律严明而且能够比其他人更出色地完成任任务。’被问的人回答说。”²³

共产党的纪律性、职业军官的追随以及具有军事经验的外国共产党人——他们在帮助组建国际纵队之前均时间不等地加入过第五团——的合作肯定是一种优势。²⁴最重要的是，第五团在苏联武器的分配上比其他部队受到的优待。关于九月开始陆续运到的轻型武器，拉尔戈·卡瓦列罗任国防部长期间的国防部总参谋部军事行动负责人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写道：“我注意到，这些武器并没有平等地进行分配，而是对那些组成所谓第五团的部队给予某种明显的优待。”²⁵恩里克·利斯特在将第五团解散然

后编入正规军的一九三七年一月吹嘘说，第五团有数千挺机关枪和数百门大炮。²⁶尽管根据利斯特本人三十年后所估计的少得不可同日而语的机关枪数量²⁷来判断，出于战时宣传的目的，这些数字肯定被夸大了，但是，实际情况仍然如拉尔夫·贝茨所说，第五团的部队得到了“精良的武器”。²⁸由于这种优待，由于向第五团的许多人提供的在苏联接受坦克手训练的机会，²⁹加上共产党的纪律和效率的吸引力，第五团可以从非共产党人兵源里大量招兵买马。

社会党人和共和派人士的大批涌入似乎证实了共产党人的论点，即，第五团不是一支共产党的军队，而是一支属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阵线的武装力量。“我们组建第五团不是为了拥有一支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说，“共产党不需要自己的军队。党想要的是一支强大而且非常强大的军队，一支能够赢得战争进而能够巩固胜利的独一无二的军队，一支保护工农利益、保护所有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利益的人民军队。”³⁰

不过，正如共产党的《国际新闻通讯》所表明的那样：“从一开始，第五团就被共产党召至旗下并在政治上受其影响。”³¹的确，它处在共产党严格而全面的控制之下，另外，在内战初期的六个月，它实际上是共产党武装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很快，它将成为新的国家正规军人民军的基础——热情之花本人在战后承认，人民军被“计划用来在确定西班牙未来的政治结构时发挥某种决定性的作用”。³²

热情之花坦率承认的这一点增加了恩里克·卡斯特罗的证言的可信度。在脱离共产党³³之后，卡斯特罗公布了下面的一段话，这是从他担任第五团团团长时对该团的党内同志发表的一次讲话中摘录的。“同志们，”他说，“我们已经开始进行一场战争，我相信，这将是一场极其漫长的战争。只有赢得这场战争，我们才能取得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在一个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至关重要的地区建立又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同志们，你们大家都知道，需要有一支军队来进行战争。……我们准备成为这支军队的组织者。……这支军队将是我们的军队——注意听好——我们的军队。但是，只有我们知道这一点。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支军队将是一支人民阵线的军队。我们将指挥这支军队，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让其他人

看着好像是人民阵线的战士。明白了吗？”³⁴

这篇讲话的直言不讳其实根本不足为奇，因为难以想象一名富有经验的共产党员竟会认识不到人民阵线联盟只是一种暂时的合作，其目的在于促进实现共产国际和党的目标，因此，“一支人民阵线的军队”将是影响现在与未来的革命进程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注释：

- 1 从一份共产党的军事报纸所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摘录的下列内容证明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仍然存在着某些同志缺乏责任感的现象，尽管不像以前那么常见，他们为了在城里到处转悠离开他们的岗位，我们知道，这种转悠的结果是喝得烂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历程报》）。
- 2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工人世界报》。
- 3 胡安·莫德斯托，《我是第五团》，第47、50和61—62页。
- 4 在一九七七年的一次采访中，内战之前以石匠为业（至今仍然是一名莫斯科的坚定支持者）的利斯特声称：“[我]比上校、少校和上尉具有更多的军事知识，尤其是在兵力悬殊的战斗、街头巷战和这一类事情方面，为此我在莫斯科的一所特殊学校进行了十四个月的训练。但我不能[公开]说我具有这种专业知识，处于同样位置的莫德斯托也不能说。内战期间大家都相信，这个石匠或那个木匠能够显示出某种仿佛从天而降的军事才智是直觉的奇迹。”（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胜利报》）
- 5 恩里克·利斯特，《我们的战争：对西班牙人民民族革命战争史的贡献，1936—1939》，第61—62页。
- 6 克劳德·科伯恩，《不和谐的鼓吹》，第296页。
- 7 恩里克·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434页。恩里克·卡斯特罗最初是作为土地改革协会主任介绍给读者的。由于他在内战期间担任过各种不同的职务，现将它们按照时间顺序列在这里以免引起混乱。一九三六年七月：（共产党在马德里的喉舌）《工人世界报》负责人和第五团团团长（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工人世界报》）。一九三六年九月：土地改革协会主任（一九三六年九月九日《工人世界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军事行动负责人（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光明报》）。一九三七年八月：国防部总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三七年八月九日《历程报》）。一九三六年七月至一九三九年三月：共产党马德里省委农业书记和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 8 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277页。
- 9 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337—343页。更多关于维达利-孔特雷拉斯（他在美国被称为埃内亚·索尔门蒂）的情况，见艾萨克·唐·莱文《一个刺客的心灵》，第70—71和79—80页；维托里奥·维达利，《第五团》和《西班牙的漫长战斗》，第29—94页以及《民兵：民兵第五团日报》。这份包括维达利的文章和讲话的报纸的全集一九七三年在米兰出版（维托里奥·维达利作序）。另请参阅维托里奥·维达利《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日记》以及（匹兹堡大学历史学教授）罗伯特·G科洛德尼所写的序言，该序言以下面这一段话作为结束：“卡洛斯，在你的年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已经发

- 生了变化。在你年轻时刚刚出现在地平线上那颗红星马上就将如日中天。因此，在未来，卡洛斯，当你的子孙后代像你一样对时代产生影响时，他们可以说，有人说过，有个人开辟了这条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维达利涉嫌参与暗杀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安德烈斯·宁以及暴力杀害卡洛·特雷斯卡、胡里奥·A.梅利亚和蒂娜·莫多蒂（玛丽亚·鲁伊斯），是这些行动的主谋，见胡利安·戈尔金《暗杀托洛茨基》，第235—240页和戈尔金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10 具体报道见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日《政治报》，该报是左翼共和派的喉舌。
 - 11 安娜·路易莎·斯特朗，《武装的西班牙，1937》，第41—43页。共产党的资料来源所提供的关于第五团的更多情况，见《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一卷，第298—306页；利斯特，《我们的战争》，第61—73页和对他的采访，载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胜利报》；莫德斯托，《我是第五团》，第54—56页；我对维达利的采访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迈克尔·阿尔珀特对第五团有一段超越党派影响的精彩描述，见《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51—57页。
 - 12 见《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一卷，第304页。
 - 13 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的演说，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工人世界报》；另请参阅何塞·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297页（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的演说）。
 - 14 西蒙娜·泰里，《自由的前线》，第182页。
 - 15 利斯特，《我们的战争》，第62页。这也是《西班牙内战与革命》所提供的数字，见第一卷，第304页。
 - 16 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一卷，第1147—1148页。
 - 17 引自赫苏斯·埃尔南德斯《黑与红：西班牙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332页。
 - 18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日《新共和》。
 - 19 内战爆发时，巴尔塞洛是左翼共和派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卡萨雷斯·基罗加的副官（见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121页）。尽管在公开场合他是一名左翼共和派成员（见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一日《自由报》上刊登的他的演说），但他真正效忠的是共产党，据一份西班牙共产党流亡者的报纸（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人民西班牙》）透露，从一九三五年以来，他实际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份报纸提到他时错误地称其为爱德华多而不是路易斯·巴尔塞洛，但是他的身份没有错。更多关于巴尔塞洛的情况，见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20 见民兵武装监察长发布的通知，载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和二十五日《光明报》。
 - 21 实例见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西班牙内战，1936—1939》，第146页。
 - 22 关于共产党成功地招募职业军官的情况，见《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一卷，第299—300页。
 - 23 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205页。另请参阅皮埃尔·布鲁埃和埃米尔·特米姆的《革命与西班牙内战》，第212—213页，两位作者均为共产党的反对者。
 - 24 根据维达利向我提供的情况。见我对维达利的采访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 25 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51页。
 - 26 利斯特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历程报》。
 - 27 利斯特，《我们的战争》，第75页。
 - 28 拉尔夫·贝茨一九四〇年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前德国共产党员、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治委员古斯塔夫·雷格勒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写来的一封信（现存胡佛研究所）中向我证实了共产党的部队所受到的这种优待，他在信中写道：“我确信，我们得到了大部分武器。”另请参阅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54—55和125—166页。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对其在马德里前线的部队在武器分配问题上受到歧视所表示的不满，实例见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七日《自由阵线报》。

- 29 根据维达利向我提供的情况（我对维达利的采访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 30 引自《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一卷，第305页。另请参阅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297页（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的演说）；利斯特，《我们的战争》，第62页；热情之花伊巴露丽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红色阵线报》。
- 31 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国际新闻通讯》。另请参阅“农夫”（前共产党人巴伦廷·冈萨雷斯）的《在苏联的生与死，1939—1949》，第12页。
- 32 多洛蕾丝·伊巴露丽，《唯一的道路》，第389页。
- 33 见恩里克·卡斯特罗《我对莫斯科失去信心》。
- 34 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277页。关于这本书的情况，见本书第二十四章注释16。

人民军

尽管第五团作为武装力量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对共产党来说非常重要，但是，共产党人不久后建议应当将各自独立的党派和工会民兵武装合并成为一支由政府控制的军队，却有充分的政治和军事理由。他们知道，在缺乏能够决定所有作战部队的部署和行动的统一指挥——既没有一支有组织的军队，也没有任何战略计划——的情况下，战争不可能走向胜利。他们还知道，只要各个党派和工会仍然拥有其领导人控制的民兵武装，只要这些民兵武装没有合并成为一支用纪律和权力的力量巩固加强的正规军队——一支他们打算控制其指挥权的军队，他们就不可能成为反佛朗哥阵营的支配力量，无法在民主制度的掩护下决定内政外交政策。

人们应当记得，在希拉尔内阁执政期间，共产党人没有要求将民兵武装合并成为一支由政府控制的军队，因为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怀疑希拉尔内阁的目的，然而，一旦拉尔戈·卡瓦列罗本人上台并掌管国防部，他们就可以旗帜鲜明地这样做了。¹两名共产党人政府部长和苏联军事顾问充分利用中部前线的一系列败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九月二十七日距首都仅五十一英里的托莱多的陷落——坚决地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实际上，正是他们的极力主张促使颁布了民兵军事化和创建一支军队的法令，这支军

队叫人民军，建立在征兵的基础上，最高长官是国防部长。²“拉尔戈·卡瓦列罗长期反对建立一支正规军的想法，因此，”路易斯·费希尔写道，“唯一的难题是他的苏联军事顾问需要劝说他放弃普遍存在但缺乏战斗力的党派军队这种形式。”³费希尔与苏联在西班牙的大部分重要人士的私人关系使他的说法具有特殊的权威性。

273

恩里克·卡斯特罗——人们应当记得，他是第五团的首任团长——证明：“共产党人政府部长乌里韦和埃尔南德斯、西共政治局、苏联军事和外交顾问步步紧逼拉尔戈·卡瓦列罗。‘我们必须建立人民军！’‘我们必须建立人民军！’在共产党支持这个口号的同时，第五团准备……把它的部队改编成为人民军[的旅]，在新的部队中保留它的指挥官和政委及其政治支配权。不过，对于这些在整个战争期间极其隐秘、极其微妙的活动，只有共产党人心知肚明。但也不是所有党员，只是党的骨干分子。”⁴

然而，正如事态发展所显示的那样，从拉尔戈·卡瓦列罗批准这些军事法令到把它们完全落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共产党人在营房中、在战壕里、在公开发表的长篇大论中、在内阁里，坚持不懈地敦促实施这些法令。⁵尽管其他民兵武装抵制这些法令，卡斯特罗并不担忧。“他们将不得不加入正规军。”他对第五团的人说，“但是，当他们这样做时为时已晚。第一批部队将全部被我们所控制，无论是在军事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包括许多对党的利益极其重要的岗位。”⁶

为了树立一个榜样，或者如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所说，为了显示“其真诚的目的”，⁷共产党逐步解散了第五团，⁸它下属的各个营与其他部队一起整编成为正规军初期的“混成旅”。⁹第五团当时的团长、共产党员恩里克·利斯特（与他身边的一名苏联军官一起）¹⁰被任命为第一旅旅长。¹¹据第五团第一政委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维托里奥·维达利）说，由于共产党人带头解散了自己的民兵武装，他们在首先组成的六个旅中得到了五个旅的控制权，这几个旅的大部分成员曾经在第五团接受过战火的洗礼。¹²多年以后恩里克·卡斯特罗说，除了第一旅的恩里克·利斯特之外，第三旅旅长何塞·马利亚·加兰和第六旅旅长米格尔·加略（不要与国际纵队化名加略的路易吉·隆哥弄混了）也是共产党员；¹³第二旅旅长何塞·马丁内斯·德·阿拉贡和第四旅旅长阿图罗·阿雷利亚诺都是与共产党人关系

密切的社会党人。卡斯特罗说第五旅旅长费尔南多·萨维奥是一名社会党人，但没有说明共产党对他的影响有多大程度——假如对他有影响的话。¹⁴ 利斯特列出了所有指挥官的名字，但是，除了只是说马丁内斯·德·阿拉贡是一个“共和派”之外，没有提到他们的政治身份。不过他指出，这些人都是职业军官，内战爆发之前，不是在军队服役，就是在边防警察部队服役。¹⁵

在以这种方式将第一批人民军部队的控制权揽入自己手中的同时，共产党人并没有忽略人民军的最高指挥权。实际上，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掌管国防部的头几个星期，他们已经打下了可靠的基础。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部分是因为他们与国防部长的关系还过得去（所以，两名共产党的追随者安东尼奥·科登和亚历杭德罗·加西亚·巴尔被安排在总参谋部的行动部门¹⁶）——尽管后者牢骚满腹，但主要是因为他们控制的一些人占据着国防部的关键位置，人们大概不会怀疑这些人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忠心，其中包括诸如曼努埃尔·阿雷东多中校、埃莱乌特里奥·迪亚斯·滕德罗上尉和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少校之类的职业军官。阿雷东多中校是卡瓦列罗的副官；迪亚斯·滕德罗上尉担任重要的情报监控部门负责人，¹⁷在内战爆发之前那几个月，他是共和国军人反法西斯联盟（UMRA）的主要组织者，共产党人声称，该联盟是他们一九三四年建立的反法西斯军人联盟的发展壮大；¹⁸埃斯特拉达少校是国防部总参谋长。¹⁹ 拉尔戈·卡瓦列罗不知道，他们正在或者已经被拖进了共产党人的圈子。²⁰

同样通过公开和暗中占据领导职位，共产党人在极其重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设立这个部门为的是在社会政治方面控制军队，实行这种控制的手段是委派政治委员，正式名称叫代表委员。²¹内战爆发以后，为了持续监督民兵的士气和职业军官的可靠性，各个党派和工会采取了在民兵部队中设置政治委员的习惯性做法。第四十二旅旅长埃斯特万·罗维拉中校证实：“许多民兵营的指挥官通敌，一有机会就开小差。这自然导致士兵对军官的不信任，使他们认为必须有自己的代表参与军事指挥以保证军官的忠诚。这些代表就是第一批政治委员。”²²一九三六年十月，相应于权力集中的总体趋势，一个规范这种做法的政府机构建立了。在仍然要求政治委员提防职业军官背叛的同时，²³还要求其在新组建的正规

军的军官与士兵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并且维护军官的威信和权力。²⁴除了这些职责以及执行纪律²⁵和监督部下士气²⁶的任务之外，政治委员还有另外一些责任。“政治委员是作战部队的灵魂，是它的教育者，它的鼓动者，它的宣传者。”卡洛斯·孔特雷拉斯说，“他始终是，或者应当始终是，最优秀、最聪明、最能干的。他应当事必躬亲无所不通。他应当关心人民战士的胃口、心情和思想。从战士应征入伍接受训练那一刻起，直到他们奔赴前线从前线归来，他应当始终陪伴着他们；他应当关心他们吃得如何、睡得如何，关心他们训练得怎样、仗打得怎样。他必须注意满足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需要。”²⁷当然，并非所有政治委员都像要求他们的那样行事。“有一些政治委员与广大战士并没有保持密切的关系，”孔特雷拉斯证实，“他们没有与战士们在战壕里并肩战斗，他们只想接近指挥官。”²⁸

275

由于政治委员可以对士兵施加影响，更不必说他的职务使他有可能影响军官的思想和情绪——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安东尼奥·米赫说，政治委员应当“在军官中进行政治鼓动，给他们注入令士兵振奋的同样的活力”，²⁹因此，可以想象，对于共产党来说，在总政治部拥有支配地位是设法控制正规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种支配地位之所以得到保证，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米赫把持着分设的四个部门中最重要的组织部门，³⁰不过，主要是因为拉尔戈·卡瓦列罗所任命的秘书长费利佩·普雷特尔和总政治部主任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他们享有卡瓦列罗的充分信任，暗中却为共产党谋利益。³¹不久之后，由于刚刚投靠共产党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何塞·莱恩被任命为政治委员学校负责人，³²由于主管四个分支部门之一的工联党³³领导人安赫尔·佩斯塔尼亚因为生病而被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朋友加夫列尔·加西亚·马罗托所取代，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它的影响。加西亚·马罗托是具有明显共产主义倾向的社会党左派人士，尽管对共产党的某些手段颇有微词，最终仍加入了共产党。³⁴由于拉尔戈·卡瓦列罗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并不知道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费利佩·普雷特尔背叛了自己以及共产党因此对总政治部的渗透程度，共产党及其合作者得以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通过任命数量具有绝对优势的共产党人政治委员，毫无阻碍地损害其他党派组织的利益，引起后者的强烈

不满。例如，加西亚·马罗托说，一九三七年初在中部前线，社会党的部队经常向他抱怨给他们指派了共产党人政治委员，他们认为这不能接受。他还说，担任南部前线政治督察委员的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巴列斯特罗斯曾抗议道，在派往南部前线的三十名政治委员中，安东尼奥·米赫挑选的全部都是共产党员。³⁵

由于共产党控制着总政治部，这种抱怨不可能通过政治委员传达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结果，最终只好通过一些独立的渠道来传达。³⁶

由于法律没有严格界定政治委员的明确职能和权力，因此，它具有广泛的独断专行的手段，政治委员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手段加强党对人民军的控制——政治委员被告知，他是“党在部队中的组织者，要大胆而有步骤地吸收最优秀的战士中的佼佼者，并且推荐他们担任负责的职务”。³⁷即使是在总政治部设立之前，共产党也没有对党在前线的活动掉以轻心。“为了让民兵了解党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必须建立宣传鼓动队。……共产党员应当承担吸收前线最优秀的战士入党的任务。”³⁸

多年以后，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中的共产党人部长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在其脱离共产党后发表的一次演说中透露：

276

数十成百名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组织者”遍布前线和部队，我们的军官得到明确指示，要他们最大限度地将共产党员提拔到更高的级别上，以此降低提拔其他党派成员的比例。但是，我有责任说明，在执行这种草率的政策的同时，共产党员并没有停止与敌人战斗，他们在前线的不屈不挠和严明纪律也让人们看到，他们比最优秀的战士还优秀，这一事实促进了我们发展党员的工作。……一些共产党员军官和政治委员热情过度不讲策略，以致采取了极其恶劣的极端手段，对于不愿加入共产党或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军官和士兵，他们将前者解职，将后者派往前线。

通过这种手段，党的力量由于吸收了成千上万名新党员而在前线得到了“加强”，但是，党在后方破坏团结，扩大裂痕，使具有不同政治色彩的部队之间的对立加剧。

这就是命令我们执行而我们也足够愚蠢地遵照执行的政策的实际

后果。³⁹

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声称，共产党人竟然在前线杀害了拒绝加入共产党的社会党人。⁴⁰忠实的共和派职业军官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写道：“根据他们通常的策略以及他们得到的指令，共产党人政治委员通过对各自部队中与他们看法不同的士兵反复宣传，努力发展他们的党员，而共产党人政治委员构成了政治委员的大多数。他们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手段，从封官许愿到以莫须有的罪名相威胁。其他党派不可能以赞许的目光看待这种情况，因为它们注意到，它们的党员数量持续减少，为了避免受到迫害，它们的党员被迫更换了自己的党证。由于所有这一切，代表不同政治观点的政治委员之间的斗争随之而来，结果对军队造成了伤害。”⁴¹反对共产党的国防部总参谋部军事行动负责人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证实：“根据总政治部主任的指示安排，[国防部]总政治部刚一成立就开始在军队的士兵中积极进行宣传活动。这些指示可以概括为，认真开展改变士兵政治信仰的工作，打击迫害任何不愿意入党的人（为此可以将秘密检举和诬告作为充分的证据）；肉体消灭被视为危险分子的那些人，为了完成这一项可怕的任务，可以用他们企图叛变投敌作为杀害他们的正当理由。”⁴²

277

共产党人政治委员的行为所造成的气氛肯定与拉尔戈·卡瓦列罗设立总政治部时希望营造的气氛截然相反。“在前线、营房以及部队驻扎的其他地方，”他签署的一份公告写道，“当属于不同工会组织的士兵或者民兵之间发生争执和纠纷时，代表委员应当镇定地妥善处理，通过这种兄弟般的行动将消除战士之间的所有意见分歧，并且消除个体或者团体自私的目的。”⁴³

除了共产党人政委和军官的工作以及社会党内的地下共产党员和亲共人士为加强共产党对人民军的影响而提供的帮助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产生了有利于共产党的更大后果：那就是第一批苏联军官的到达，接着是苏联武器的到达。

“一九三六年九月[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组成后不久，”这位总理多年的朋友兼政治伙伴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写道，“苏联大使向它介绍了

一位苏联现役将军[弗拉基米尔·戈列夫]，大使说他是大使馆武官，还提到他的职业经历。接着，大批新的‘助手’突然不请自来，他们自动进入参谋部门和军队，在那里随意发号施令。”⁴⁴不过，认为主要的苏联军事顾问是不请自来或者至少是在国防部长不知情的情况下来到西班牙是错误的。根据后面某一章所提到的苏联领导人与拉尔戈·卡瓦列罗之间的通信判断，这位西班牙国防部长实际上通过苏联大使马塞尔·罗森堡要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提供帮助。另一方面，苏联顾问不经国防部许可自主行事的情况似乎经常发生，他们无视国防部的意见独断专行。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证实：“他们的影响甚至达到了控制总参谋部所有作战计划的程度，经常彻底修改战术方案，用他们的方案取而代之。这些方案一般含有某种政治目的；在组织问题上，他们任命指挥官；在新闻方面，他们宣传某个政党的观点；在军事行动上，为了强行推行他们的政策，他们置不容置疑的战略战术考虑于不顾。”⁴⁵国防部长本人也证明：“西班牙政府和指挥作战的军官们，尤其是负责军事行动的国防部长和指挥部里的那些军官，根本不可能独立自主地采取行动，因为，由于担心危及苏联以出售战争物资的方式陆续给予的援助，他们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屈从于不负责任的外国干涉。有时，苏联大使和将军们以他们的命令没有像其所希望的那样准时执行为借口，随意向我发泄他们的不满。他们声称，如果认为他们的合作没有必要、不合时宜，我们应当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们，以便他们通知他们的政府安排他们离开。”⁴⁶另一方面，一九三七年五月至一九三九年二月期间担任总参谋长的比森特·罗霍——我们将在随后的一些章节里看到，整个内战期间罗霍始终得到共产党和苏联人的支持——坚称，这些指责是“无稽之谈，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他还说：“与制订行动计划和执行这些计划有关的指示和命令始终都是由共和国总参谋部的参谋长官构思和起草的。”⁴⁷

278

人们从苏联人的说法中得到的无疑不是这种印象，化名“博尔特”的苏联将军H.沃罗诺夫谈到罗霍时说：“他喜欢[与我们]面谈，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并且用他的大笔记本把我们的建议和忠告记录下来。在他晋升为总参谋长后，我们继续实质性的合作，我始终打算竭尽全力帮助这位著名的共和派军官。”⁴⁸

据罗霍说，西班牙军官与苏联军事顾问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热情友好而且相互尊重的关系：“[如果]我能就与西班牙军官（不是我的军官）并肩作战的苏联军事指挥官说点什么的话，那就是，他们是杰出的战友，他们帮助我多次克服巨大的困难，另外，每当遇到超越他们职责的问题时，他们都优雅地回避了。”⁴⁹

另一方面，曾经担任总参谋长托里维奥·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将军的苏联军事顾问的K.A.梅列茨科夫在其一九六八年发表于莫斯科的回忆录中写道：“[苏联]顾问与共和国军事领导人的关系每天都要拿来讨论，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无法用一种令人愉快的方式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⁵⁰

尽管罗霍否认受到过苏联军官的干扰，他的同僚安赫尔·拉马斯·阿罗约却证实：“我不止一次听到罗霍亲口表示不满，我从他的不满中判断，俄国人认为他们的作战计划和命令比西班牙总参谋部的要高明，不经俄国人最后批准，[总参谋部]自己什么事情也不能做。”⁵¹

如果可以根据我对塔斯社驻巴伦西亚代表米罗娃的个人认识，根据苏联大使——我们将在后面的某一章里论及他——以及最重要的苏联记者、对克里姆林宫具有影响力的米哈伊尔·科利佐夫的表现得出一般性结论的话，那么，苏联文职人员的独断专行丝毫不逊于苏联军人，更不必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员了。将近一九三六年年底时，科利佐夫在马德里的总政治部里安营扎寨，专横地将审查外国记者新闻报道的工作置于总政治部的控制之下，据当时负责此事社会党人阿图罗·巴雷亚说，科利佐夫在那里“以旺盛的精力和傲慢的态度参与了几乎所有讨论”。⁵²

279

赫伯特·马修斯是内战期间《纽约时报》驻西班牙的记者、三十多年来被广泛认为是研究西班牙问题的权威，我们已经多次提到他所写的关于西班牙的最后一本书《半个毁灭的西班牙》，在这本书中，马修斯故意忽略了前面引述的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证词，这一段证词曾经出现在我的《精心的伪装》一书中，⁵³因此，马修斯声称：“伯内特·博洛滕描写了‘苏联军官的威胁恐吓和专横行为’，甚至说文职人员也是如此，例如《真理报》记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让人觉得他动辄就给斯大林打‘热线电话’。即使情况果真如此，那也是在私下里，决不会达到对拉尔戈·卡瓦列罗和胡安·内格林总理那样的人专横跋扈的地步。”⁵⁴马修斯还

避而不谈《精心的伪装》所描述的以下事实：在某个令人难忘的时刻，被苏联大使的要求激怒的拉尔戈·卡瓦列罗将他赶出了自己的办公室。⁵⁵本书将在后面描述这一时刻。

注释：

- 1 实例见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工人世界报》。
- 2 见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十月十六日和三十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 3 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354页。
- 4 恩里克·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449页。
- 5 见那段时间发表在《工人世界报》、（巴伦西亚）《真理报》和《人民战士报》上的社论和演说。
- 6 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465页。
- 7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一卷，第305页。
- 8 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十九日和二十八日《人民战士》；另见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自由志愿军》，它记述了第五团的解散过程。
- 9 这样叫是因为它们由步兵、骑兵、炮兵和各种基础分队组成（见恩里克·利斯特《我们的战争：对西班牙人民民族革命战争史的贡献，1936—1939》，第75页；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293页；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发表在一九三九年七月号《国家评论》上的文章，据卡萨多上校在其所著《马德里最后的日子》一书中叙述，他帮助组织了这些混成旅，见第52页）。“混成”一词也适用于另一层含义，因为，除了原有的民兵志愿人员以外，这些旅还包括招募的新兵、职业军官、警察部队人员和边防警察部队人员（税务和海关人员）。军事历史学家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上校写道：“总参谋部开始着手缔造一支新的军队。它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首先推出了组成办法，确定新军队的基本单位是混成旅。所有部队，无论是民兵还是正规军或志愿军，都将合并编入这些混成旅。最初将组建二十五个旅，其中五个国际纵队旅。立即组成了八个旅，六个西班牙旅和两个国际纵队旅。……这些旅的组成完全相同：一个十三人的指挥部；四个步兵营，每个营六百三十三人；一个一百四十一人的骑兵中队以及[分别为]五百一十九人和一百四十五人的炮兵队和卫生队；一个三百四十六人的混合工兵连，一个四十二人的军需队以及一个一百三十八人的军火供应队——总共三千八百七十六名战斗人员。”（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准确翔实的内战资料》，第123—124页）另请参阅迈克尔·阿尔珀特《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82—85页；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293页；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上校，《共产党参与西班牙内战，1936—1939》，第42—43页和注释28，马丁内斯·班德上校认为混成旅是“苏联授意的产物，在西班牙没有先例。严格地说，它其实是一个师，但缩小了规模，能够完成独立的作战行动”。
- 10 路易斯·费希尔在《人与政治》中说这个军官名叫“弗里茨”——一个化名，见第383页。他的真实姓名是帕维尔·巴托夫，在帮助组织国际纵队之前加入了利斯特的第一旅（《在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帜下，1936—1939：苏联志愿参战人员回忆录》，第281—284和307页）。巴托夫不久即由基里尔·A梅列茨科夫接替，多年以后梅列茨科夫成为元帅并

且担任苏联红军参谋长。

- 11 见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人民战士报》；利斯特，《我们的战争》，第74页。
- 12 孔特雷拉斯战后向我提供的情况。
- 13 这可能不太准确，因为在一本书的护封上印着加兰说的话，他说他是一九三七年加入的共产党（何塞·马利亚·加兰，《关于卡里略主义的几个问题》）
- 14 恩里克·卡斯特罗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15 利斯特，《我们的战争》，第74—75页。
- 16 几周后，科登被任命为负责技术部门的国防部副部长，这个职位控制着人事、物资、军饷、审计、协调、工程、军需等处室以及战争实验委员会。见马丁·布拉斯克斯（协助科登的两名专业秘书之一）《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279页；另见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日《国防部官方日志》。科登的共产党员身份得到了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的证实，见第一卷，第300页。另请参阅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289—297页。关于加西亚·巴尔的情况及其共产党员身份，见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236和389—390页。
- 17 该部门在所有人参军之前审查他们的背景（见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121页；卡萨多上校，《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49—50页）。据科登说，迪亚斯·滕德罗在内战爆发之前保存了一份“不断充实更新的军队档案，掌握着关于每个人的个人、职业和政治特点的准确信息”，见《历程》，第235页。关于情报监控部门，M.特蕾莎·苏埃罗·罗卡写道（见《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150页）：“[从内战]刚开始，在马德里的兵营和各个军事中心就设立了专门审查清洗军队人员的分类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工作由迪亚斯·滕德罗所领导的情报监控部门集中负责。迪亚斯·滕德罗是这个部门的创建者和组织者，对自己的同志抱着深深的怀疑态度。他保存的军队全体军官的档案和他设法搞到的[右翼]西班牙军人联盟的记录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他。”
- 18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一卷，第66页；胡安·莫德斯托，《我是第五团》，第43—47页。另请参阅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的文章，见比森特·帕拉西奥·阿塔德等的《接近真实的西班牙内战史，1936—1939》，第104—105页；里卡多·德拉·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758页。
- 19 当拉尔戈·卡瓦列罗成为国防部长时，他被任命担任这一职务（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国防部官方日志》）。他的副官是上面提到的共产党员亚历杭德罗·加西亚·巴尔，按照适用于此类任命的程序，加西亚·巴尔应当是拉尔戈·卡瓦列罗根据总参谋长的建议指定的。
- 20 我为这些信息同时感谢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关于这些军官更详细的情况，见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553—554页；科登，《历程》，第273、288和296页；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320页。
- 21 见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日《马德里官方公报》发布的由拉尔戈·卡瓦列罗签署的公告。共产党人后来说，他们多次敦促国防部长设立这个委员会（实例见弗朗西斯科·安东发表在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二月号《我们的旗帜》上的文章）。
- 22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工人世界报》。另请参阅一九三六年八月八日（马德里）《消息报》；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光明报》。
- 23 实例见何塞·迪亚斯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发表的演说，见何塞·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255页。
- 24 见一九三六年（原书误为一九三七年——译注）十月十六日《国防部官方日志》发布的由拉尔戈·卡瓦列罗签署的公告；另请参阅国防部总政治部颁布的条例，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光明报》。
- 25 “政治委员务必使他的战士认识到自觉遵守铁的纪律的必要性。”国防部总政治部颁布的

- 条例之一规定，“他必须通过坚持不懈的工作保证战士遵守这种纪律并且服从军官的命令。”（见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光明报》）
- 26 “政治委员必须随时分析他的士兵的心理状况，以便在他们的士气低落时及时训话。”全国劳工联合会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报纸写道（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自由阵线报》）。
- 27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巴伦西亚）《真理报》。
- 28 同上。
- 29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七日《红色阵线报》。
- 30 另外三个部门分别由温和的普列托派社会党人克雷森西亚诺·毕尔巴鄂、工联党领导人安赫尔·佩斯塔尼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安赫尔·G·希尔·罗尔丹主管。
- 31 见（社会党左派领导人）卡洛斯·德·巴赖瓦尔发表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号（布宜诺斯艾利斯）《方向盘》上的文章；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553—558页；（社会党左派）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170页。关于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普雷特尔在总政治部的亲共活动的其他资料，见（社会党左派领导人）文塞斯劳·卡里略发表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号（布宜诺斯艾利斯）《方向盘》上的文章；（社会党左派领导人）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8页；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212页；拉尔戈·卡瓦列罗，《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第816页；拉尔戈·卡瓦列罗，《劳动者总工会与内战》，第10—11页；（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发表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十日《阿斯图里亚斯邮报》上的文章；卡萨多上校，《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57页。还有共产党对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总政治部的工作的赞扬，见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六日和五月十九日《红色阵线报》，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历程报》。
- 32 见《我们为团结而斗争》，第35页；另请参阅佩德罗·切卡《伟大的政党，伟大的组织》，第23页；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170—171页。
- 33 这只是一个党派，由持不同意见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组成，对事态的发展没有什么影响。
- 34 内战结束以后（一九三九年），他让我看了他的党证，不过没有说他是共产党员多长时间了。
- 35 加西亚·马罗托战后与我的谈话。
- 36 见卡洛斯·德·巴赖瓦尔发表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号（布宜诺斯艾利斯）《方向盘》上的文章。
- 37 巴勃罗·克拉维戈，《政治委员工作的一些准则》（共产党的政治委员工作手册），第24页。
- 38 摘自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安东尼奥·米赫的演说，载一九三六年九月九日（马德里）《工人世界报》。
- 39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五日《社会主义行动报》。
- 40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日《阿斯图里亚斯邮报》。另请参阅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墨西哥“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俱乐部开业》，第22页。
- 41 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西班牙内战，1936—1939》，第144页。
- 42 卡萨多上校，《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57—58页。
- 43 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 44 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24页。
- 45 一九三九年七月号《国家评论》。另请参阅卡萨多上校《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53—54页。
- 46 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引自拉尔戈·卡瓦列罗未发表的回忆录，见《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25页。

- 47 罗霍发表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三日（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自由报》上的文章，见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我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伦敦大使生涯》，第313—315页。
- 48 《在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帜下，1936—1939：苏联志愿参战人员回忆录》，第89页。这本重要的书籍一九六五年在莫斯科出版并被译成西班牙文，其中包括内战期间在西班牙活动并在斯大林的清洗中幸存下来的一些重要的苏联军官的文章。我非常感谢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希丽娅·库克为我所做的工作，她翻译了该书的部分俄文内容，她还对在西班牙活动的苏联军官和文职人员的生平简历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并且摘要翻译了许多苏联原始资料。
- 49 见本章注释47。
- 50 基里尔·A.梅列茨科夫，《在人民军队中：回忆录》，第136页。
- 51 安赫尔·拉马斯·阿罗约，《一些……与另一些……》，第193页。另请参阅雷希纳·加西亚《我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何以及为什么掩盖》，第282页。
- 52 阿图罗·巴雷亚，《制造反叛》，第585页。另请参阅巴雷亚《制造反叛》，第604页以及（认识巴雷亚的）马丁内斯·阿穆蒂奥对他的描述，《挟持民众》，第291—300页。
- 53 伯内特·博洛滕，《精心的伪装：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233页。
- 54 赫伯特·M.马修斯，《半个毁灭的西班牙：对西班牙内战的重新评价》，第162页。
- 55 博洛滕，《精心的伪装》，第272—273页。

何塞·阿森西奥将军，拉尔戈·卡瓦列罗 向共产党人挑战，政府撤离马德里

毫无疑问，苏联军官的威胁恐吓和专横行为加快了拉尔戈·卡瓦列罗与共产党人关系恶化的速度。由于共产党在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运动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中发展党员，并且由于共产党将卡瓦列罗在劳动者总工会和社会党内的许多追随者吸收入党，这种关系已经开始恶化了。尽管卡瓦列罗与共产党人的关系一度似乎并无显而易见的问题，但是，当他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任命何塞·阿森西奥将军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时，一道明显的裂痕出现在光滑的表面上。

作为在内战初期镇守马德里的西北门户瓜达拉马山的民兵部队的指挥官，当时是一名上校的阿森西奥极大地鼓舞了这位社会党领导人的信心，因此，在九月成为总理兼国防部长之后，拉尔戈·卡瓦列罗将阿森西奥晋升为将军，并且安排他负责指挥受到威胁的中部前线的军队。正在努力争取阿森西奥支持他们的共产党人为阿森西奥的晋升和履新而欢呼，对“这位民主共和国英雄”¹的战功大加赞扬，称其指挥他们的铁军在瓜达拉马山“打了一场又一场胜仗”，²还封他为第五团的名誉团长。³一位著名共产党人后来承认，所有这些示好都是为了使阿森西奥脱离拉尔戈·卡瓦列罗。⁴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阿森西奥对共产党人的示好并没有表现出迎合的意

向，甚至还显示出对他们的极大反感，于是，他们要求解除他在中部前线的指挥权。⁵

针对阿森尼奥采取的策略是他们典型的惯用伎俩。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写道：

281

我在这里不妨指出共产党人在处理他们与人民军指挥官的关系时通常所采取的策略。他们把那些共产党员指挥官当作下属来对待，直接要求后者以最有利于达到党的目的的手段执行他们的命令，常常违背军人的职责。这些军官一般都会盲目服从，他们更在意党的命令而不是军队总司令部的命令。其他指挥官经常抵制共产党人的计划，不是拒绝接受共产党人提出的那些听起来更像命令的建议，就是拒绝参与那些会使他们良心不安的行动。[共产党人]假惺惺地对这些军官表现出极大的关怀，不过，他们的关怀转瞬即逝，而且徒有其表。他们请军官吃饭，向军官倾诉钦佩之情，声称钦佩军官的勇敢和智慧。总而言之，他们试图激起这些军官内心的欲望，但是，当他们认为用这些方法无法迷惑军官时，他们开始对军官进行阴险的诽谤，迫使总司令部将其解职。许多指挥官仅仅因为恪守职责失去了生命或自由。⁶

“在共产党的报刊上，” 温和的社会党执委会机关报在内战临近结束时写道，“那些毫不犹豫地同意成为共产党员的指挥官立即具有了超过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军事素养，而那些不需要党员身份因而拒绝了他们的指挥官则遭到含沙射影或直截了当的指责。”⁷

共和派在军事上的惨败有利于共产党提出的解除阿森西奥中部前线指挥权的要求——这场惨败使佛朗哥将军的军队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兵临马德里城下。然而，尽管打了这些败仗，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同样普遍认为，阿森西奥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罕见的心理素质，⁸但是，由于民兵组织系统的缺陷以及缺乏坦克、大炮和飞机，军事上的惨败不可避免。⁹如同我们将在下面一章看到的那样，来自苏联的这些武器直到十月底时仍未运到，而将在保卫马德里的战斗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共产党领导的国际纵队，只是在十一月份的第二周才投入战斗。

就在共产党人要求解除阿森西奥中部前线指挥权的时候，亲共产党的外交部长兼总政治部主任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对路易斯·费希尔起草的一封信表示了认可，这封信在十月十二日送到拉尔戈·卡瓦列罗手里，对阿森西奥的忠诚表示怀疑。¹⁰尽管后来德尔巴约在内阁赞成解除阿森西奥的国防部副部长职务，¹¹但他坚持认为，这位将军“无疑是共和国军队中最聪明能干的军官之一”，有可能“成为最伟大的军事天才”。¹²值得注意的是，在认可费希尔写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那封信的前一天，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一张写给阿森西奥的便条上写了下面几行字：“我知道将在黎明开始非常重要的军事行动。得知你将亲临前线指挥行动让我平添了许多希望。由于最近的惨痛经验，我们只能相信你的才干。由于这个原因，我决定告诉你这些内心的话，在任何情况下，这只是我们之间的交流。”¹³

虽然拉尔戈·卡瓦列罗一度拒绝解除阿森西奥的指挥权，但他最终屈服了。不过，在用一只手安抚共产党人的同时，他用另一只手淡化了共产党人的胜利，他把阿森西奥提升到国防部副部长的职位上，¹⁴取代亲共产党的前政治伙伴罗德里戈·希尔中校。¹⁵他寻求独立路线的决心在随后几周接着进行的两次人事变动中具体表现出来。他恢复了在共产党人的坚决要求下被解职的塞希斯孟多·卡萨多的国防部军事行动负责人的职务。卡萨多将自己被解职归因于他曾警告总司令部，第五团在分配苏联武器时所受到的明显优待将在士兵当中引起猜疑和嫉妒，并将很快导致共产党取得实力地位。“据我观察，”他补充说，“该党以其特有的狡诈开始对我进行诽谤，并且努力使国防部长相信，我不是担任军事行动负责人这一职务的最合适人选，因为我有过激和悲观的缺点。”¹⁶

除了通过恢复塞希斯孟多·卡萨多的职务向共产党人挑战之外，拉尔戈·卡瓦列罗还解除了最近加入共产党的国防部总参谋长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¹⁷的职务，并且用阿森西奥的朋友托里维奥·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将军接替他。在让人头晕目眩的事态发展过程中，这些人事变动几乎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但是，它们使共产党人感到不安并使他们确信，与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合作到头了。

尽管这些人事变动加强了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国防部内部的权力，但

是，对于削弱共产党人在至关重要的中部前线的势力，它们最终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我们很快将会看到，拉尔戈·卡瓦列罗任命接替阿森西奥担任中路军司令的自由共和派人士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¹⁸没过多久就对他们言听计从了，接着，在十一月十六日傍晚，由于敌军已经推进到首都市郊，内阁仓皇地放弃了这座危在旦夕的城市。

同一天晚上，米哈伊尔·科利佐夫造访了人去楼空的政府各部。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去了国防部，[总]政治部。……那里几乎没有人。……我来到总理办公室。房间锁着门。我来到外交部。那里空无一人。……在外国新闻审查处，一名官员……告诉我，两小时前政府认为马德里的形势没有希望……因此已经撤离了。“为了防止出现恐慌”，拉尔戈·卡瓦列罗不许发表与政府撤离有关的任何消息。……我来到内政部。……屋里几乎空空荡荡。……我来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全体会议正在举行。……他们告诉我，就在当天，拉尔戈·卡瓦列罗突然决定撤离。他的决定得到内阁大多数成员的同意。……共产党人政府部长想要留下，但是他们被明确告知，这样做将使政府名誉扫地，因此，他们不得不像所有人一样离开了。……无论是各个组织最著名的领导人，还是国家的各个部门和机构，甚至没有得到政府撤离的通知。国防部长只是在最后一刻才告诉总参谋长，政府正在撤离。……内政部长加拉尔萨和他的助手、安全局长穆尼奥斯先于他人离开首都。……中路军司令波萨斯将军的参谋人员匆匆离开。……我再次来到国防部。……我从楼梯来到大厅。一个人影也没有！在楼梯间，……两个年老的勤杂工像蜡像一样坐在那里，他们身穿工作服，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等着部长摁铃召唤。无论是前任部长还是新换的部长，这件事情一成不变。一排排的办公室，所有门都敞开着！……我走进部长的办公室，……里面没有一点人气！再往前有一排办公室——总参谋部及其各个部门；参谋部及其各个部门；中部前线参谋部及其各个部门；后勤部及其各个部门；人事部及其各个部门。所有门都敞开着。天花板上灯光明亮。桌子上到处都是丢弃的地

图、文件、新闻公报、铅笔和写满了字的拍纸簿。一个人影也没有！¹⁹

几乎毫无疑问，政府仓皇诡秘的撤离严重损害了卡瓦列罗的名誉——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和几位共产党人部长都曾力劝这位总理提前组织安排并且公开宣布政府撤离，以免给人造成“一种逃跑的印象”²⁰——同时提高了共产党的声望。在第五团以及现有苏联武器和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在十一月八日到达的国际纵队第十一旅的帮助下，共产党在保卫被围困的马德里的战斗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由共产党控制的第十一旅是国际纵队投入战斗的第一个旅。

十一月七日上午，当政府机构的人员和档案还在撤往巴伦西亚的途中时，马德里的共产党报纸《工人世界报》声称：“[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工人赶来保卫这座城市，他们将未来寄托在自己的勇气上。[本地的]工会以及所有反法西斯组织和工人组织挤满了准备战斗的人。”²¹广泛流传的第五团的报纸《人民战士报》也声称：“几小时之内将决定马德里的命运。成千上万的民兵正在与前来镇压马德里人民的摩尔军团和外籍军团作战。这是英雄的时刻，这是决一死战的时刻。多少天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宣称，马德里将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坟墓，现在，将这些口号转化为现实的时候到了。……炮声正在我们的城头轰鸣。每个马德里人都应当挺身而出，不惜一切代价，准备夺取胜利。”²²

284

在马德里保卫战的头几天，为了激发工人的革命意识，《人民战士报》放弃了仅限于“反法西斯”的温和语言，让人产生了对于俄国革命的回忆。在刊登于报纸头版的一篇文章里，第五团第一政委卡洛斯·孔特雷拉斯写道：“马德里不可能陷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正在奔向战壕保卫他们的城市、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未来。……西班牙革命万岁！……今天是十月革命纪念日。我们的俄国兄弟被百万敌军所包围，他们在四面受敌、忍饥挨饿、没有飞机和坦克的情况下赢得了战斗，因为他们怀有信心，相信未来。……我们同样怀有信心……因此我们必将获胜。”²³

毫无疑问，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布鲁埃和埃米尔·特米姆恰当地强调了必定激励了许多战士的潜在的革命信念：“对于大批西班牙民兵和‘国际纵队成员’来说，保卫首都是一项革命壮举，它的反法西斯主义象

征意义只是暂时的。……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共产党人反对革命]只是暂时的策略性让步，反法西斯斗争将在世界革命中结束。”²⁴

在十一月六日晚上动身前往巴伦西亚之前，国防部副部长阿森西奥将军将经过拉尔戈·卡瓦列罗批准的密封命令交给中路军司令波萨斯将军和不久前被任命为马德里军区司令的何塞·米亚哈将军，信封上写着：“绝密。早晨六点之前不得打开。”两位将军决定，不等指定的时间到来就要看看接到的命令。他们认为，如果等待指定的时间，宝贵的十二个小时就浪费了。²⁵此外，他们打开信封以后发现，给他们的命令都下错了对象，各自收到的是给另一个人的任务。在米亚哈的参谋长比森特·罗霍少校看来，如果没有及时发现，这个错误也许会“增加战败的可能性”。²⁶

波萨斯接到的命令与其受到攻击的部队的战术行动以及建立一个新的指挥部有关，²⁷而米亚哈接到的命令是成立一个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并且“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马德里。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以他为首，由所有党派的成员组成，人数与各党派在政府中的代表成比例。如果拯救这座城市的一切努力失败，他应撤退到昆卡，“根据中路军司令[波萨斯将军]的指示在某地建立一条防线”。²⁸

“政府中没有人相信能够守住马德里，”《社会主义报》负责人、海军和空军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好友苏加萨戈伊蒂亚证实，“总理甚至比部长更不信，因为只有他最清楚军队混乱无序和不堪一击的状况。……²⁹撤离马德里的国防部长好不容易使普列托他们相信，敌军将在三到六天之内攻克马德里。”³⁰

285 前线实际上已不存在，比森特·罗霍写道：“在托莱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公路沿线牵制敌军的纵队被歼灭了。三千五百人组成的一支纵队，勉强找到三百人。”³¹

米亚哈对阿森西奥将军和拉尔戈·卡瓦列罗交给他的任务表示不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首都岌岌可危的那些日子，这似乎只能预示着某种灾难性的下场。据苏加萨戈伊蒂亚说，米亚哈立即意识到，他被选来当替罪羊。³²实际上，波萨斯将军说，当米亚哈得知自己的任务时，他气得差点哭起来，因为他认为，这是蓄意把他当作牺牲品献给佛朗哥将军。³³

在这种厄运似乎就要降临的背景下，由于马德里出人意料的顽强抵

抗，这位将近暮年、随和而平庸的将军——在命运攸关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六日，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平安退休更诱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西班牙和全世界的传奇人物。马德里的抵抗使拉尔戈·卡瓦列罗颜面扫地。米亚哈不会为自己的名声雀起向这位国防部长表示感谢，而且从那以后，他们之间变成了一种敌对关系。

注释：

- 1 一九三六年九月六日《人民战士报》。
- 2 恩里克·卡斯特罗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十日《工人世界报》上的文章；另请参阅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工人世界报》
- 3 同上；另请参阅亚历杭德罗·加西亚·巴尔以第五团的名义写给阿森西奥的信，通知后者第五团决定授予他名誉团长的称号，这封信被阿森西奥公布于《阿森西奥将军：忠于共和国》一书，见第105页。
- 4 亚历杭德罗·加西亚·巴尔在战后接受我的采访时这样说的。加西亚·巴尔是第五团的一名共产党员军官，后来成为总参谋部行动部门的官员。关于他的共产党员身份，见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289页。
- 5 见塞萨尔·法尔孔《马德里》，第177页。法尔孔在内战的最初几个月是共产党日报《工人世界报》的负责人。
- 6 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75—76页。
- 7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二日（马德里）《社会主义者报》。另请参阅布鲁诺·阿隆索《共和国舰队与西班牙内战》，第89—90页。
- 8 实例见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264、280和291页；另请参阅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282—284页，尽管共产党人科登是阿森西奥的激烈反对者，但他认为阿森西奥能力很强而且确实在建立人民军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阿马罗·德尔·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1901—1939》，第616页，非共产党人罗萨尔认为阿森西奥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126页，德尔巴约说，阿森西奥“无疑是共和国军队中最聪明能干的军官之一”。
- 9 实例见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141—143和152—153页；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263页。
- 10 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372—374页。费希尔在这封一字不差照抄原稿的长信中写道：“您应当知道我对苏联以及西班牙反法西斯事业的忠诚。因为我是您的朋友，所以，我不惮冒昧开诚布公地写信给您。”
- 11 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126页。
- 12 同上。
- 13 见阿森西奥《阿森西奥将军：忠于共和国》，第107页。
- 14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192页。对阿森西奥的任命公布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马德里官方公报》和《国防部官方日志》。关于阿森西奥的生平介绍，见M.特蕾莎·苏埃罗·罗卡《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

27—52页。

- 15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国防部官方日志》。
- 16 卡萨多上校《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51页。关于拉尔戈·卡瓦列罗恢复卡萨多职务的情况，见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63页。
- 17 根据前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恩里克·卡斯特罗一九四九年五月二日写给我的一封信（现存胡佛研究所）中的内容。另请参阅恩里克·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553—554页；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一卷，第684—685页。埃斯特拉达被任命为总参谋部情报部门负责人（同上）。拉尔戈·卡瓦列罗下台后，他成为胡安·莫德斯托指挥的第五军的参谋长（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二卷，第1208页，注释7）。
- 18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国防部官方日志》。
- 19 米哈伊尔·科利佐夫，《西班牙日记》，载一九三八年四月号《新世界》，第123—124页。
- 20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我的一生》，第324—325页；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162页；《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二卷，第141—142页。
- 21 引自《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二卷，第161页。
- 22 同上。
- 23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人民战士报》。
- 24 皮埃尔·布鲁埃和埃米尔·特米姆，《革命与西班牙内战》，第213页。
- 25 安东尼奥·洛佩斯·费尔南德斯，《保卫马德里》，第88页。
- 26 比森特·罗霍，《这就是马德里保卫战》，第48页。罗霍论述了如果没有及早发现这个错误可能发生的事情。另请参阅科登在《历程》中对这件事的有趣的描述，见第178—179页。
- 27 罗霍，《这就是马德里保卫战》，第48页。
- 28 关于命令的全文，见罗霍《这就是马德里保卫战》，第247页；另请参阅《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二卷，第148—149页。罗霍分析了命令中的某些自相矛盾之处（见《这就是马德里保卫战》，第47—48页）。
- 29 对中部前线混乱无序状况的一些看法，见罗霍《这就是马德里保卫战》，第23—24和36—37页；另请参阅比森特·罗霍《英勇的西班牙》，第47—51页。
- 30 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181页。
- 31 罗霍，《英勇的西班牙》，第47页。
- 32 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181页。另请参阅（米亚哈将军的副官）洛佩斯·费尔南德斯《保卫马德里》，第83—84页。
- 33 关于波萨斯将军对这件事情的描述，见我所整理的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采访他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保卫马德里、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和国际纵队， 米亚哈、罗霍和克莱贝尔

被政府撒手不管的何塞·米亚哈将军做了让人不难理解的事：他同意帮助共产党及其控制的第五团，¹因为这是中部战区组织最好、最守纪律的部队。据米哈伊尔·科利佐夫说，第五团迅速通知米亚哈将军，“不仅它的部队、后备队和武器弹药，而且它的所有参谋人员以及它的指挥官和政治委员”均由他来部署调遣。²

尽管马德里的保卫者总体上缺乏武器和组织，但是，与其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对手相比，民兵有一个巨大的心理优势。坚守着市郊卡拉万切尔工人居住区的五一营的共产党人营长维克托·德·弗鲁图斯回忆说：

我们的民兵战士比此前四个月的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感觉到，他们正在保卫他们自己的东西。显然，紧靠自己的家园使他们意识到，他们已经无路可退。他们仿佛……是在自己的家门后面进行抵抗……他们知道，这是他们拯救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财产以及自己所爱的人的最后机会。……同时，一个可怕的障碍摆在敌人面前：他们必须逐门逐户地攻克马德里。每一道门都是街垒，每一扇窗户都是守城者投出自制手榴弹的胸墙。不错，是简单原始的手榴弹，但是威力足以杀

伤敌军的一个巡逻兵。街道是进入马德里的必经之路。……不经过街道敌军就不可能占领首都。结果，前进，他们必须面对一支民兵大军，它的足智多谋、英勇善战使通过军事训练学到的所有战术不值一提。屋顶上设有观察哨。……这使我们可以及时采取防御措施。……许多人认为，敌军没有向马德里的中心推进是因为他们没有决定这样做。我可以明确地说，由于前面提到的那些感情因素，在我们的民兵战士中出现的某种当时不为人们所知的心理奇迹才是敌军没有攻克马德里的原因。”³

在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民兵战士中，第五团第一政委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维托里奥·维达利）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人物。亲身参加了田园之家战斗的共产党员阿尔瓦罗·梅嫩德斯称之为保卫马德里的“政治灵魂”。被人叫作“指挥官卡洛斯”的他疯狂地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跑来跑去，圆睁着因缺乏睡眠而浮肿的双眼鼓励战士们坚守阵地。“宁愿为捍卫我们的家园和‘荣誉’而战死，”他宣称，“也不要面壁而立被枪毙。”他保证，国际纵队正在赶来保卫受到威胁的首都。⁴

英国作家文森特·布罗姆对这一历史事件作了如下描述：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七日打响的马德里之战在武器匮乏、组织混乱但人数众多的马德里人与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由大约两万个摩洛哥人和军团士兵组成的军队之间展开。马德里人得到一些苏联坦克和飞机的支援，而佛朗哥的军队则得到德国和意大利人员装备的补充。……

十一月七日破晓时分，天色灰暗，视野朦胧，马德里这座古城立即听到了以前没有听到过的大炮轰击的隆隆炮声……不过，让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当炮弹爆炸、房屋倒塌、男女老幼被埋在瓦砾下面、大片薄雾般的烟尘像幽灵似的升起在城市上空时，几乎根本看不到任何惊慌失措的场面。城市里的宣传人员有效地开展了宣传工作。激情四射的演说，富有感染力的小册子，广播里让人跃跃欲试的鼓动以及一些充满振奋人心的意象的诗歌在马德里造成了一种气氛，在

那里，英雄主义在那些最让人意想不到的人们身上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各行各业的工人响应广播里的号召报名参军奔赴前线，一些人手无寸铁，但是他们痴迷地等待接过死伤人员的武器。妇女和儿童从早到晚修筑街垒，一群妇女提出要求并开始组建一个女兵战斗营。……

接着，在雾蒙蒙的十一月八日上午，一支陌生的新军沿着大街整齐地列队开赴前线——在马德里人看来，他们是一些身穿灯芯绒制服、头戴钢盔、训练有素的士兵。⁵

这是在苏联将军“埃米利奥·克莱贝尔”卓越指挥下的第十一国际旅，西班牙新闻界首先将其称为“国际纵队”。

据目击了这一场面的全国劳工联合会记者、后来（在一九三七年一月）担任无政府主义报纸《卡斯蒂利亚自由报》主编的爱德华多·德·古斯曼记述：

上午十点左右，埃德加·安德烈营^①和巴黎公社营的一千七百名德国、法国、波兰和意大利反法西斯战士列队经过太阳门和卡利亚奥广场，沿着大街开赴战场。……人们聚集起来热情地为他们鼓掌。士兵们用不同的语言高唱革命歌曲。……他们进入田园之家阵地，在那里，敌军已经占领了加拉维塔斯山和鹰山的高地。……与此同时，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民兵乘卡车穿过马德里。……革命赞歌歌声嘹亮，黑色和红色的围巾随风飘扬，他们经过圣比森特大道和重镇牧场，跨过曼萨纳雷斯河，进入田园之家阵地。他们中的一半人很快将会牺牲在那里。……“国际纵队”作战勇敢。西班牙人——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共和派人士、自由派人士同样坚定地与他们并肩作战。……战斗持续不停地打到八号和九号，而敌军的飞机则对工人居住区和阿圭列斯狂轰滥炸，威胁平民百姓的生命财产。但是，平民百姓没有屈服，他们将生命财产的安危置之度外，战士们同样没有后

288

^① 埃德加·安德烈(Edgar André, 1894—1936)，德国共产党员，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之后不久被捕，在狱中受尽折磨并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四日被处以斩首。国际纵队的第一个营遂以他的名字命名。

退一步。⁶

休·托马斯对国际纵队在历史舞台上的亮相作了激动人心的描述，他写道：

到十一月八日傍晚，国际纵队部署就绪。埃德加营和巴黎公社营被派往田园之家。东布罗夫斯基^①营开往比利亚维德与利斯特和第五团会合。克莱贝尔负责指挥大学城和田园之家的所有共和派军队。他的效率立即让西班牙的指挥官们大吃一惊。……经常有人说，国际纵队挽救了马德里。然而，这个国际纵队第十一旅可能只有大约一千九百人。⁷十一月十二日前后到达马德里前线的第十二旅大约一千五百五十人。⁸国际纵队的部队规模太小，因此不可能单凭人数扭转乾坤。此外，在国际纵队到达前的十一月七日，民兵和工人遏制了巴雷拉[敌军指挥官何塞·恩里克·巴雷拉上校]的攻势。这一胜利是马德里人民的胜利。不过，国际纵队的勇敢和经验在后来的几场战斗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国际纵队的榜样激励着民兵继续抵抗，同时让马德里人感觉到，他们不是孤军作战，……[十一月九日]，被阻挡在田园之家的巴雷拉……向卡拉万切尔区发动了一场新的进攻。但是，巷战阻遏了摩洛哥士兵，他们没有取得进展。克莱贝尔将国际纵队的所有兵力集中在田园之家。在朦胧的夜色中，他们发动了进攻。“为了革命和自由——前进！”在圣栎和桉树之间，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夜，一直打到十一月十日上午。到那时，只有田园之家的加拉维塔斯山仍被民族主义分子占据。但是，国际纵队三分之一的战士牺牲了。⁹

289 在对这一史诗的描述中，罗伯特·科洛德尼比托马斯更突出地强调了国际纵队第十一旅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写道：“当克莱贝尔将军率领的国际纵队第十一旅的三个营——埃德加·安德烈营、巴黎公社营和东布罗夫斯基营——在苏联坦克和飞机的支援下¹⁰进入田园之家的阵地阻击巴雷拉

^① 扬·亨里克·东布罗夫斯基（Jan Henryk Dąbrowski，1755—1818），波兰将军，因参加一七九四年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将军领导的反俄起义而成为波兰民族英雄。

部队的猛攻时，马德里得救了。外国志愿人员的出现加强了民兵的抵抗并且为组织、训练、装备共和派军队赢得了必要的时间。”¹¹一位西班牙历史学家同样写道：“[国际纵队第十一旅的]到来引人注目，看到这些经验丰富的军人时，民兵的心中充满了……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激情。在马德里保卫者的队伍中，乐观的情绪蔓延开来。现在有了苏联的战斗机和坦克，还有那些准备保卫曼萨纳雷斯河与田园之家的德国人、波兰人、法国人和匈牙利人！谁说一切没有希望了？”¹²

这些来自欧美各国的革命骨干主要是一些共产党人理想主义者，他们为什么去西班牙作战并死在那里？究竟是什么崇高的事业激励他们在马德里、哈拉马河、布鲁内特、埃布罗河等一系列内战最惨烈的战斗中流血牺牲？难道真像其中一些幸存者至今仍然坚称的那样，他们进行伟大的圣战只是为了捍卫一九三一年的民主共和国？按照国际纵队第十五旅政治委员桑多尔·沃罗斯的说法，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他去了西班牙，“在革命巨人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作战；作战甚至牺牲，是的，如有必要不惜牺牲，就像那些传奇式的共产主义领导人，他们不怕坐牢、折磨和毁灭，只是为了一个目的——解放被压迫的民众。……我是‘阶级斗争千锤百炼的钢刀，一个共产党人’。我是‘国际团结的具体体现，共产国际将这种团结缔造成为革命工人阶级的武装铁拳’”。¹³《兄弟！》的作者威廉·赫里克也在国际纵队第十五旅作战，他在写给我的两封信中说：“我去西班牙时绝不相信资产阶级民主；在我看来，党的民主路线只是一种策略，一种手段，我，我们，最终希望的是使共产党掌权。可能除了一两个人之外，我认识的所有美国志愿人员都像我一样认为，人民阵线，民主的口号，不过只是帮助共产党夺取政权的策略而已。……亚伯拉罕·林肯营的那些老兵为此被欺骗了五十年。……不用说，我们国际纵队也是以反法西斯的名义行动的。……我们在[靠近西班牙边境的]佩皮尼昂时，我们的政治委员……告诉我们，在西班牙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我们应当回答说，我们是反法西斯主义者，不要说我们是共产主义者。”¹⁴

与此同时在马德里，拉尔戈·卡瓦列罗十一月六日撤离之前将任命其担任米亚哈的参谋长的比森特·罗霍少校组成了一个保卫马德里参谋部，据他介绍，该参谋部由“可以找到的”国防部总参谋部的人员组成，¹⁵像

国防部长一样，总参谋长托里维奥·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将军与一些年纪较大的官员已经离开首都逃往巴伦西亚。据米亚哈的副官安东尼奥·洛佩斯·费尔南德斯上尉说，罗霍的参谋部由一些被国防部认为不值得带往巴伦西亚的人组成，不过，他们是“到当时为止在几乎无人注意的总参谋部的基层岗位上成长起来的最高级别的军官”。¹⁶罗霍少校本人就是这些被忽视的军官之一，用一位权威人士的话说，他是“军队中得到广泛承认的最优秀的军事战略家”。¹⁷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在其研究人民军的里程碑似的四卷本专著中写道，罗霍享有“极高的声誉”，被认为是西班牙军队“最能干的军官之一”，而且受到“全体战友的喜爱和尊重”。萨拉斯·拉腊萨瓦尔还说，即使他在内战期间可能失去了许多战友的喜爱，但“他仍然得到所有人的尊重”。¹⁸

具有影响、无处不在的米哈伊尔·科利佐夫比在西班牙的其他记者更为了了解军事形势，十一月十日，马德里之战的第四天，他在日记中写到：

“米亚哈很少过问军事行动的细节，甚至对它们毫不知情。他把这些问题交给他的参谋长以及各个纵队和防区的指挥官去处理。罗霍以他的谦虚赢得了人们的信任，谦虚待人使其丰富的实用知识和非凡的工作能力藏而不露。他一直俯身在马德里的地图上，今天已是第四天。各支部队的指挥官和政治委员连续不断地来见他，他用一种低沉冷静的声音，就像在一间铁路调度室里一样，耐心地向他们说明、讲解、指示，并在文件上做出注解，经常还要画出草图。”¹⁹

不过，新成立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主席是米亚哈将军，这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对于他的参谋长比森特·罗霍，新闻界只字未提。十二月二十日，科利佐夫在日记中特别提到：“由于某种原因，没有一点关于比森特·罗霍的消息出现在任何一份马德里的报纸上，也没有出现在其他西班牙报纸上。记者们开始狂热地描写刻画指挥官和政治委员、军需官和卫生员。他们发表了大量在医院工作的人们载歌载舞的照片，但是关于实际上指挥着整个马德里保卫战的这个人，他们一个字也没有写。我估计这不是因为敌视或反感，只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并不存在’。在这里，人们有时并不关心最明显的事情。很难不注意比森特·罗霍。毫不夸张地说……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可以看到他。……身为保卫马德里的总参谋长，

[他]控制着由正规部队、民兵小组、炮兵连、独立街垒、工兵小队、飞行中队组成的错综复杂的防御网的所有脉络。不休息，不睡觉，在战线被分解成的无数个区域，他密切注视着敌军在每一个区域的每一个动作。”²⁰

直到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六日，科利佐夫在日记中写道，新闻界的沉默打破了。“他们现在提到了他。在保卫马德里的领导者和英雄的名单上，他被列在第二位。我不禁庆幸自己因先于别人在报刊上提到罗霍而曾对此有所贡献。《社会主义者》的一篇社论说：‘我们感谢米哈伊尔·科利佐夫的发现，感谢他让我们知道了一个人，在其简朴冷清的办公室里，这个人为拯救马德里贡献了他的全部力量。’”²¹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写道，科利佐夫“以其新闻记者的眼光发现，米亚哈将军的参谋比森特·罗霍是一名朴实无华但能力非凡的军官。……科利佐夫使罗霍引起了马德里的新闻记者的注意，于是，他的名字开始被人提起。科利佐夫对所有事情都非常留意”。²²

291

由于米亚哈将军所扮演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主席这一引人注目的角色以及他的参谋长比森特·罗霍所起的虽不显眼但却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关记录让人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在内战爆发之前那激烈动荡的几个月，当人们的政治忠诚迅速发生变化时，他们都秘密加入了右翼的西班牙军人联盟（UME）。佛朗哥政府出版的一部以文献资料为依据的著作阐明：

为了认清这两名在[武装起义]爆发时滞留于赤色政府控制区的军官的行为之背信弃义，只要记住他们两人都曾加入西班牙军人联盟（UME）就够了。该联盟的成立……以爱国主义为目的，希望在适当的时机建起一道能使西班牙免遭共产主义浪潮吞噬的堤防。但是，当这一时机到来而马德里的民族主义起义失败时，米亚哈将军和罗霍立即效力于人民阵线而不是与他们的战友站在一边——他们看到了降临在军队中无数将军和下级军官头上的命运，许多人只是因为加入了西班牙军人联盟而被杀害。不过，由于他们的良心不安，由于他们认为通过销毁记录其该组织成员身份的存档证件就可以抹去他们以前行为的所有痕迹，米亚哈将军……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八日前往[管理政治档案的警察机关]要求把他和比森特·罗霍的证件……给他看看。证件刚

一拿到手，他就把它们装进自己的口袋里。²³

在同一本书的附录十中公布的一份有共和国警察机关官员签字的档案影印副本证明了这件事。非常可靠的共和派军官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确认了这份档案的真实性。²⁴米亚哈和罗霍的西班牙军人联盟成员身份得到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证实，后者见过搜查马德里的西班牙军人联盟总部时所发现的正式成员名单。²⁵

292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米亚哈或罗霍曾以任何方式参与了军事叛乱的密谋，但是，内战之前他们在互相残杀的动荡中和即将发生军事政变的传言中预先加入了西班牙军人联盟这一事实，可以解释深受军队长官器重的罗霍²⁶内战初期为什么只是在受到一位朋友的警告之后才效力于政府的，这位朋友警告他，如果他不这样做就有可能被枪毙；²⁷也可以解释当时的马德里军区司令米亚哈为什么加入马丁内斯·巴里奥的“和解政府”任国防部长，因为政府认为这将满足叛军将领的要求。²⁸根据左派的激烈反应判断，这其实也是他们的估计。米亚哈在战前加入西班牙军人联盟的预防措施还可以解释他在马丁内斯·巴里奥的政府垮台后为什么拒绝担任何塞·希拉尔内阁的国防部长，因为，正如他所承认的那样，他相信，叛军的胜利不可避免。²⁹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战后接受我的采访时声明，他拒绝加入希拉尔政府是因为，既没有一支军队也没有一支警察部队和它一起与叛军作战。³⁰

这只是米亚哈变幻无常的内战生涯的开始。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垮台后不久，他被派去指挥科尔多瓦前线，在那里，他率领各个民兵武装的大批民兵、前正规军士兵以及国民卫队和突击卫队队员，却没有夺取这座古老的摩尔人重镇，因而在民兵当中引起了对其忠诚的怀疑——这是一名职业军官在内战期间常有的遭遇。弗朗西斯科·莫雷诺·戈麦斯在《科尔多瓦的内战，1936—1939》中将米亚哈的失败归因于他“特有的行动乏力以及在关键时刻不敢冒险”。³¹不过，另外应当指出的是，厄运从一开始就尾随着他，当时，在他指挥的守卫古老的圣母头像神庙——共和派军队在那里一直坚守到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是内战中最英勇的战绩之一³²——的部队中，数以百计的士兵和其他人员（总共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人，其中六百名作战人员）开小差，带上他们的家人逃难去了。³³

一九三六年八月中旬，米亚哈被从科尔多瓦前线召回并被任命为巴伦西亚军区司令。³⁴然后他神秘地消失了，接着，国防部指示军事法庭一位名叫洛拉的法官调查他的案件，可是，没过几天他就重新出现了，他的案件也撤消了。³⁵最终，在十月二十二日，当敌军迅速向首都推进时，他被任命为马德里军区司令，³⁶这为下面的看法增添了依据：甚至还在被任命为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主席并且奉命“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首都之前，他已被选做替罪羊。³⁷

尽管米亚哈的过去乏善可陈，但是，命运的奇异转折和共产党精心导演的宣传活动使他成为马德里保卫战中被捧上天的人物，共产党需要一个门面作掩护，以使它能随意施展策略。正如曾任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的前德国共产党人古斯塔夫·雷格勒所指出的那样：“共和派的宣传机器需要一个英雄被人们当作偶像来崇拜。……作为一项政策，同时根据敏锐的感觉，在与外国记者交谈时，甚至在与西班牙人交谈时，我们认可这个受到热烈赞扬的形象。”³⁸

“由于赫赫战绩带来的巨大声望，”不太重要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佩德罗·马丁内斯·卡顿写道，“米亚哈将军在西班牙成为最受人爱戴的将军。”³⁹很快，米亚哈被新得到的声望所陶醉。“当我坐在车里时，”他告诉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女人们向我大声喊，‘米亚哈！’‘米亚哈！’然后她们对视尖叫，‘那是米亚哈！那是米亚哈！’……我向她们打招呼，她们也向我打招呼。她们非常高兴，我也非常高兴。”⁴⁰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也证实：“我千方百计地泼冷水给这种狂热降温，西班牙人民和新闻界让他头脑发热，尤其是围绕着他的那个小集团，使他实际上陷入了某种危险状态。他不止一次告诉我，民众的热情已经达到那么高的程度，以致女人甚至在大街上亲吻他。”⁴¹

但是，内战结束以后，由于米亚哈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加入了反对共产党和内格林政府的国防委员会从而与共产党人分道扬镳，流亡的共产党费尽心机试图打破它所蓄意制造的这个神话。“为了歪曲马德里保卫战的真实情况，”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安东尼奥·米赫写道，“曾经有人而且仍然有人热衷于把它说成叛徒米亚哈的功劳。这些人曾经宣传而且继续宣传明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同时宣传米亚哈不可能奉献的赫赫‘战

果’。关于发生在马德里的事情，他知道的绝不比别人告诉他的更多，他根本没有感受过战事最紧张时那种非常可怕的困难局面。一个头脑迟钝、对人民一无所知的将军无法想象那些日子马德里的悲惨情景。”⁴²

经常与这位将军接触的共产党第五团团团长恩里克·利斯特战后的评论同样刻薄。“我们在内战初期利用米亚哈的做法百分之百是正确的。他的共和国现役将军军衔让许多人肃然起敬。公众大都不知道他根本没有能力指挥他所率领的部队。他完全不了解我们的战争的特点，也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军队，然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的角色确实有用，因为他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尽管他对军事几乎一窍不通，我们大家仍然设法造成一种气氛，使他享有他根本不配享有的显赫声望。我们采取的做法是正确的。我们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因为这有利于我们的斗争。”⁴³

另外，据始终是共产党的忠实党员的安东尼奥·科登说，何塞·阿森西奥将军无法理解米亚哈怎么会逐渐成为“人民的所有力量、英雄行为和坚忍不拔及其政治领袖的全部智慧”的化身。我们知道，正是阿森西奥将军在十一月六日命令米亚哈成立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科登接着说：“人民把一个平庸的将军提高到他们的水平，并且把他作为自身美德和英雄事迹的化身向世界展示。米亚哈的神话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⁴⁴

多年来，经认识他的苏联共产党人之手描绘的米亚哈的形象也好不了多少。内战期间担任《消息报》记者的著名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在回忆录中说这位将军是“一个虚弱的老人，战局带来的压力使他不堪重负”，还说他是一个傀儡。⁴⁵后来成为著名的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苏联国防部长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在西班牙被称为马利诺上校，他证实，米亚哈在马德里保卫战中什么事情也没有做。⁴⁶

尽管如此，在内战期间，当共产党人需要一个驯顺听话、放纵自己的人物以便躲在他的身后为所欲为时，他们不仅在报刊上吹捧他，而且尽量迎合满足他的虚荣心。当时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恩里克·卡斯特罗是这些事情的见证人，根据他的回忆可以断定，在那些以公然献媚讨好的方式努力为党完成这项任务的人当中，包括著名共产党诗人拉斐尔·阿尔维蒂的妻子玛丽娅·特蕾莎·莱昂，她“经常与米亚哈将军出双

人对，使他头晕目眩意乱情迷，从而保证其他人做必须做的事情时这位老兵不会碍事”。⁴⁷《纽约时报》驻马德里记者赫伯特·H.马修斯提到米亚哈时也说：“从马德里被围困的第一天开始为米亚哈树立的忠诚可靠、坚定勇敢的共和国保卫者形象是个神话。他软弱、愚蠢、厚颜无耻。”⁴⁸

就米亚哈而言，他需要共产党人作为保护伞——“内战爆发时，另外一些根本不是[西班牙军人联盟成员的]人都被杀害了。”多年以后卡瓦列罗尖刻地评论说。⁴⁹很快，在共产党马德里地方党组织书记和中部前线督察委员弗朗西斯科·安东的敦促下，米亚哈加入了共产党，安东是他的主要鼓动者和领路人。⁵⁰“尽管米亚哈将军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可能与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一样，”内战期间积极支持共产党的消息灵通人士路易斯·费希尔写道，“他却持有一张共产党的党证。共产党的宣传把他吹嘘成了一个神话。”⁵¹社会党温和派人士胡安-西梅翁·比达特欣赏米亚哈的“温厚和友善”，他曾问过米亚哈是否真的是共产党员。他证实：“米亚哈以其特有的愉快神情笑了起来。他解开外衣的纽扣，掏出一个红色证件表明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⁵²

因为近来有人对米亚哈投靠共产党这件事情提出质疑，所以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人空军司令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在内战结束之后不久向我保证，米亚哈是一名共产党员。此外，米亚哈的参谋长比森特·罗霍在《人们，当心！》一书中说米亚哈是共产党员，⁵³罗霍后来成为总参谋长，在整个内战期间一直与共产党保持着极为友好的关系，在战后撰写的著作文章里也从没有批评指责过共产党；而拉尔戈·卡瓦列罗则在其未发表的回忆录中说，总参谋部的秘密情报部门告诉他，米亚哈是“两万八千六百九十五名持有党证的共产党员之一”。⁵⁴

实际上，米亚哈支持共产党的事业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秘密。在共产国际的喉舌《国际新闻通讯》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其驻马德里的记者休·斯莱特甚至公开说明米亚哈是一名共产党员。而共产党人教育部长赫苏斯·埃尔南德斯也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开宣称，米亚哈“对共产党的政策充满热情”。⁵⁵

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总统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的日记中特别提到：“米亚哈屈服于诱惑、‘改变信仰’皈依了共产主义。这种思想滑稽可笑。米

亚哈从哪里了解的共产主义？四年前，在我担任国防部长时，他对我说，他是一个坚定的共和派，但是，他不能向社会党人让步，而且应当枪毙他们！他接受共产党人的信仰很可能是为了获得某个政党的支持和庇护而预先采取的一种措施。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情更让拉尔戈不高兴了，他与共产党人势不两立，对他们以及他们的苏联祖师爷和煽动者怒不可遏。据拉尔戈说，米亚哈皈依‘共产主义’的结果是，马德里所有重要的军事职位都交给了共产党人，他们指挥的部队得到了他们要求的一切，而其他部队的供给则遭到克扣。”⁵⁶

对于共产党来说，与它控制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主席米亚哈将军同样重要的是党对委员会大部分关键职位的控制。据比森特·罗霍说，由于许多著名的政治人物逃往国外，该委员会主要由“自愿决定留下来准备积极参加城市保卫战的年轻人”组成。⁵⁷它的构成及其成员所属党派在共产党的喉舌《工人世界报》上公布如下，⁵⁸不过，如果其成员真正的政治身份与公布的身份不同的话，将在方括号里注明：

何塞·米亚哈将军	[共产党]	主席 ⁵⁹
费尔南多·弗拉德	社会党[共产党]	秘书长 ⁶⁰
安东尼奥·米赫	共产党	作战委员
圣地亚哥·卡里略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共产党]	公共秩序（警察）委员 ⁶¹
阿莫尔·努尼奥	全国劳工联合会	战争工业委员
巴勃罗·亚格	劳动者总工会[共产党]	军需委员 ⁶²
何塞·卡雷尼奥	左翼共和派	交通运输委员
恩里克·希门尼斯	共和联盟	财政委员
弗朗西斯科·卡米内罗	工团主义者	市民疏散委员
马里亚诺·加西亚	无政府主义青年联盟	情报联络委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遵照拉尔戈·卡瓦列罗十一月二十五日发布的一道旨在加强政府权力的命令，委员会改组并且更名为保卫马德里代表委员会（La Junta Delegada de Defensa de Madrid）。⁶³发布这道命令的官方公报写道：“保卫马德里代表委员会旨在执行共和国政府发布的命令，真正代表西班牙人民在今年二月举行的大选中所自由表达的意愿。”⁶⁴从此以

后，委员会的成员叫作代表而不叫委员。经过几次变化，委员会的改组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完成，直到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解散，委员会的组成如下：⁶⁵

何塞·米亚哈将军	[共产党]	主席
马克西莫·德·迪奥斯	社会党	秘书长 ⁶⁶
何塞·卡索拉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共产党]	公共秩序(警察)代表 ⁶⁷
弗朗西斯科·卡米内罗	工团主义者	前线服务代表
恩里克·希门尼斯	共和联盟	疏散代表
伊西多罗·迭格斯	共产党	民兵代表
曼努埃尔·冈萨雷斯·马林	全国劳工联合会	运输代表
洛伦索·伊尼戈	无政府主义青年联盟	战争工业代表
路易斯·涅托	劳动者总工会[共产党]	军需代表 ⁶⁸
何塞·卡雷尼奥	左翼共和派	新闻宣传代表

除了占据大部分关键职位之外，共产党人还对左翼共和派人士何塞·卡雷尼奥所主管的新闻宣传部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个部门，他们控制了官方的马德里广播电台，它的负责人是化名费利克斯·阿尔文的德国共产党人库尔特·哈格尔。⁶⁹

米亚哈将军扮演着双重角色：作为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主席，他填补了因政府撤离而留下的政治真空；同时，作为马德里军区司令，他负责部署并实施军事行动。尽管令人信服的证据——我在一九八〇年出版的《西班牙革命》一书中列举了许多此类证据——表明他在政治上效忠于共产党，但是，西班牙历史学家胡利奥·阿罗斯特吉和赫苏斯·A.马丁内斯在其出版于一九八四年的著作《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却对这些证据视而不见。他们还无视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其未发表的回忆录中所提供的关于米亚哈这种共产党员人数的关键证言，虽然他们以批评的态度研究过这部回忆录。⁷⁰这种无视不利证据的做法使他们可以令人吃惊地宣称，所谓米亚哈的共产党员身份“纯属无稽之谈”。⁷¹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人成为“他的主要政治顾问”，⁷²他“与他们很少存在意见分歧”。⁷³

两位作者否认米亚哈将军效忠于共产党显然是为了支持他们热衷的论

点：西班牙共产党以及依附于它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并不是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的支配性力量。我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情况是这样的。例如，曾经短期就职于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共产党员恩里克·卡斯特罗写道：

“共产党像一个无形的上帝一样控制着一切：城市和人民；米亚哈，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每一个人！”⁷⁴共产党人确实没有占据大部分位置，但是他们占据了大部分关键职位：主席，作战委员（后来的民兵代表），公共秩序委员和军需委员。⁷⁵另外，他们在委员会中占据的位置是其他任何意识形态团体的两倍，这明显违背了米亚哈将军接到的命令：委员会由所有党派的成员组成，人数与各党派在政府中的代表成比例。除此之外，就评估共产党人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的真正影响而言，同样重要的是有利于共产党的外部因素：他们的第五团的声望，国际纵队激动人心的到来以及令大多数左派团体无限感激的苏联顾问、飞机和坦克的存在。在这种有利的环境中，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让人们接受在其他情况下可能引起激烈争论的某些措施并非难事。

尽管《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对于西班牙内战史的编撰研究是一个宝贵的贡献，因为它第一次利用可以找到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全面论述了它在马德里保卫战中的关键作用、米亚哈将军与拉尔戈·卡瓦列罗之间的摩擦以及共产党人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之间火山爆发式的冲突，并且提供了迄今为止未被发现的大量资料，但是，随意否认米亚哈政治上效忠于共产党并且过分热衷于淡化共产党在委员会中的真正影响——甚至达到把共产党人自己对其重要作用的描述贬为“言过其实”的程度⁷⁶——损害了它的客观性。

在列举共产党人所占据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一些重要职位之前，有必要暂时离开这个话题，叙述一下著名亲共历史学家曼努埃尔·图尼翁·德拉拉（一位对立的左派作家说他是“一个进步的天主教‘历史学家’，一九三六年以来一直按照共产党人的规矩办事”）⁷⁷利用其为《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尽管这本书很重要，但是，在极其广阔的场景中，它的主题涉及的只是一个狭小的领域——所写的序言对我耗费四十年精力研究撰写的《西班牙革命》的全面攻击。“[如此]严谨地研究保卫马德里委员会这种具体事件对于打破‘博洛滕神话’是一种间接的贡献。这个神话是

来自国外尤其是来自美国的、与西班牙内战史的编撰研究有关的诸多神话之一，制造这个神话的那本书所堆积的资料和证据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却将其整个研究服务于作者企图证明的某个先入为主的观点。非常奇怪的是，作者是在开始他的工作后经历了这一‘意识形态’先验化的过程。”⁷⁸

的确，一九三六年作为合众社的英国记者开始记录报道西班牙内战和革命时，我其实像许多支持共和派的记者一样，深受共产党战时宣传的影响，结果，我用了多年时间才挣脱了妨碍我思考的谬论和谎言的羁绊。显然，假如我没有向西班牙共产党及其国内外友人所制造的大量关于内战和革命的神话提出挑战，图尼翁·德拉拉不会对我表示不满。

下面这些主要以《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一书所提供的资料为依据的例子表明，在委员会内部，由于共产党人的支配地位，由于其他党派在某种程度上的顺从或默许，他们在三个重要问题上随心所欲到了何种程度。

第一个例子是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排除在委员会之外。我们将在后面某一章里看到，该党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消灭的目标。就连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都承认，“坚决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排除在外的是共产党，⁷⁹而其他党派则没有“表示丝毫的反对”。⁸⁰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委员会中的代表冈萨雷斯·马林应当意识到这种排斥可能危及全国劳工联合会，可是，就连他也没有站出来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说话。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证实，苏联大使马塞尔·罗森堡与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排除在委员会之外有牵连，⁸¹他们引述了看上去好像是社会党执委会成员曼努埃尔·阿尔瓦尔向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地方领导人恩里克·罗德里格斯作出的以下声明而没有提出质疑：“罗森堡大使不同意你们加入委员会。这当然不公平，但是，你们应当理解，苏联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在苏联的援助与支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之间，只可能作出一种选择。”⁸²十一月二十九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喉舌《战斗报》宣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加入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阻力不仅来自西班牙共产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而且来自“更高层——来自苏联大使馆，它与苏联驻巴塞罗那领事馆一起，正在煽动人们谩骂诽谤我们。……无论如何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以向我们提供援助为条件，想方设法……干预甚至操纵西班牙的政治事务。”

一月二十九日，根据共产党代表伊西多罗·迭格斯的建议，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在没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批准没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报纸《红色战士》及其设在马德里的广播电台，用迭格斯的话说，这是因为它们“专门与政府和人民阵线作对”。⁸³随即，担任公共秩序代表的共产党人何塞·卡索拉宣布，由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非法”组织，他将没收它的所有房屋和汽车。⁸⁴再次没有反对意见，就连富有激情、能言善辩、出席了会议的冈萨雷斯·马林也没有表示反对。⁸⁵尽管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排除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之外是委员会对共产党和苏联言听计从的一个重要例证，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却认为，这件事与西班牙共产党有关，也可能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代理人有关，“但是，与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无关”。⁸⁶

299

第二个关于共产党支配地位的例子是它在马拉加于一九三七年二月陷落后对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操控。当时，如同我们将在后面某一章里看到的那样，它对所有军事指挥岗位开展了一场强有力的清洗运动，尽管这场运动针对的是受到怀疑或不称职的军官，但其主要目的是清洗拉尔戈·卡瓦列罗任命的人，后者妨碍了它控制军队的努力。并非巧合的是，二月十三日，共产党代表迭格斯以委员会的名义给拉尔戈·卡瓦列罗写了一封信，敦促其强制征兵并且统一指挥权，信中的要求还包括，清除“动摇分子和可疑分子以及所有那些以其无能或消极为敌军行动效力的人”。⁸⁷这一要求针对的是共产党人深恶痛绝的国防部副部长何塞·阿森西奥将军，三天以后这得到证明，共产党的喉舌《工人世界报》在当天的报纸上谴责阿森西奥是那个“造成失败的人”，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惩罚”。⁸⁸尽管如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担任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军事行动部门负责人的恩里克·卡斯特罗多年以后所说，对军事指挥岗位的清洗运动是共产党“向取得支配地位又迈出的一步”，⁸⁹但是，委员会中似乎没人察觉这种危险，因此，由迭格斯、马克西莫·德·迪奥斯和冈萨雷斯·马林组成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批准了向卡瓦列罗本人递交的那封信，并且允许在报刊上发表。⁹⁰就这样，委员会参与了共产党针对总理的阴谋活动。我们将在后面某一章里看到，在内阁中的反对派同时施加的难以抗拒的压力下，卡瓦列罗被迫将阿森西奥解职。显然，在对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的攻击中，共产党操控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能力是个重要的因素。因此，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所谓“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猛烈攻击与委员会无关[al margen de]”并非事实。⁹¹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关于共产党人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起主导作用的例子是公共秩序委员圣地亚哥·卡里略及其继任者何塞·卡索拉为将马德里的警察职能大权独揽而采取的直接行动。委员会刚一成立，卡里略立即安排他最信赖的五个助手担任他那个部门的高级职务，这五个人是阿尔弗雷多·卡韦略、费尔南多·克劳丁、费德里科·梅尔乔、路易斯·罗德里格斯·奎斯塔和塞贡多·塞拉诺·庞塞拉，⁹²他们或是刚刚加入共产党，或是马上就要加入共产党。⁹³据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说，治安部门“完全专业化”，各个党派和工会的独立警察小队不复存在，共产党成功地控制了新组建的治安部队，它采取强硬的手段使其追随者在治安部队中占据了“优势”。⁹⁴假如社会党和共和派委员反对的话，这种由一个政党将警察的职能大权独揽的局面就不会那么容易形成。但是，他们并未表示反对，他们没有这样做明显反映了当时存在于委员会内部的真正的权力关系以及共产党的主导作用。这是默认共产党的支配地位的一个典型事例。直到一九三七年四月，当卡索拉与冈萨雷斯·马林之间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终于因全国劳工联合会谴责共产党的屠杀行为和私设监狱而以一场激烈的正面交锋表现出来时，⁹⁵委员会中的社会党和共和派代表才第一次隐约显示出他们的忧虑，⁹⁶另外，据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说，“特别是由于‘反无政府主义恐怖’不可避免的过分行为……一个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共和派的反共阵线似乎逐渐形成”。⁹⁷如果不是因为四月二十三日在马德里成立了一个新的城市委员会导致拉尔戈·卡瓦列罗解散了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话，⁹⁸尽管不能断言这种新的力量重组将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但是几乎不必怀疑，共产党人在这个机构中的支配能力足以使他们改组马德里的治安部门并将其集中控制在自己手里。

在共产党的部队拥有最好装备的军事领域，它不仅要确保马德里军区司令米亚哈将军在政治上的效忠，而且要保证得到他的参谋长比森特·罗霍少校的积极支持。尽管没有证据表明罗霍曾加入过共产党，但是，在组织马德里保卫战的过程中，他与马德里的共产党军事领导人以及正式身份

为苏联大使馆武官的苏联顾问弗拉基米尔·戈列夫将军长期密切的合作可能使他具有某种暧昧的经历并且使他得到苏联人的欣赏。这一点不仅可以从内战期间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对他的赞扬看出来，⁹⁹而且可以从另一些苏联参战者在内战结束多年以后对他的赞扬看出来。¹⁰⁰西班牙共产党一九六六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官方内战史中为他保留的段落也证明了这一点。“由于他对军事技战术的广泛了解，”该书写道，“比森特·罗霍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作为一个笃信宗教的人，他以堪称典范的忠诚献身于人民和共和国的事业。他以冷静和胆量，以其战略家和组织者的能力，很快赢得了普遍的尊重。”¹⁰¹

一九三六年九月，罗霍作为公众人物出现在内战的舞台上，当时他向守卫被包围的托莱多城堡的何塞·莫斯卡多上校提出了投降的条件。那里是享有盛名的西班牙步兵学院，战前，作为一名军事史教授，他在学院颇受器重；叛乱爆发的头几天，大约一千八百名男女老幼逃到那里避难。根据塞西尔·伊比那部以大量口述和书面资料为基础的激动人心的围城记事，¹⁰²罗霍的态度含糊不清。在莫斯卡多拒绝了投降条件之后，有人问罗霍为什么不留下来与守军在一起。“罗霍显得忧心忡忡。‘如果我留下来的话，我在马德里的妻子和孩子今夜就将被杀害。’他说。直到后来人们始终没有注意到，罗霍回避了他是否愿意留下来这个问题。在眼睛被再次蒙上之前[被护送离开城堡之前]，罗霍把烟荷包里的东西倒在桌子上说：

‘这是我能留给你们的最好的纪念。’当一条绷带蒙上他的双眼时，就像一个军人面对共和派的行刑队时也许会做的那样，他突然高呼：‘西班牙万岁！’尽管这是一句君主主义者的口号，其含义却可以作多种解释——罗霍少校暗指的是哪一个西班牙？在考虑为了摧毁城堡挖掘地道的问题时，罗霍再次像他离开这座建筑时那样含糊不清地低声说：‘为了上帝的爱，继续寻找地道的入口。’”¹⁰³

无论比森特·罗霍政治上实际同情哪一方，真相已经与他一起被埋葬在西班牙了。他在内战结束多年以后获准返回西班牙，一九六六年六月在那里去世。¹⁰⁴作为共产党第五团的第一政委，卡洛斯·孔特雷拉斯与罗霍非常熟悉，就连他也承认，共产党对罗霍的忠诚从来没有绝对的把握。¹⁰⁵尽管热情赞扬了罗霍的军事才能，科利佐夫也对他的政治观点表示

了某种程度的怀疑。“说到比森特·罗霍，”科利佐夫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写道，“他过于含蓄，几乎不谈论政治事务，他对热点问题保持沉默，也许他对某些事情从来就不发表意见。我希望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目前的马德里保卫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成就。这比那些来自君主主义旧军队的革命新贵往往空洞无物的高谈阔论更有分量。罗霍教导士兵，他建立了从人民中选拔的军官骨干队伍。……应当写一些关于为自由而战的西班牙人民的新型军事艺术的新书。比森特·罗霍会写。还应当写一些关于他的书。”¹⁰⁶无论罗霍个人的政治信仰是什么，毋庸置疑的是，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对工作的全力投入，最重要的是，他愿意在不掌握军队控制权的情况下与西班牙共产党人合作，尤其是在战争后期，所有这些使其他考虑不是问题。很快，他从少校晋升为中校，接着是上校，最终在一九三七年十月晋升为将军。¹⁰⁷一九三七年五月，他成为总参谋长，¹⁰⁸在这个岗位上，据一位言之有据的职业军官同事证实，他尽其所能加强了共产党在军队中支配地位。¹⁰⁹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一九三九年二月加泰罗尼亚地区沦陷、左派的军队越过边境逃到法国以后为止。确信已经战败的他拒绝跟随共产党控制的内格林政府返回中部地区。这是他在两年多稳定而密切的合作期间唯一一次与共产党的政策发生重大分歧。

为了评估罗霍在内战期间的政治立场，不能忽视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所提供的证据。一九三八年四月，加尔塞斯被内格林任命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当时他为共产党效力。¹¹⁰一九七四年接受西班牙历史学家埃莱诺·萨尼亚的采访时，加尔塞斯说：“毫无疑问，罗霍按照共产党人的规矩办事。他们对他们完全认同，已经达到希望入党的程度。内格林与他交换意见，不允许他这样做。一九三八年秋天内格林对他说：‘在我们为得到援助正与英国人谈判的关键时刻，你不能成为共产党员。’”¹¹¹

导致某些历史学家忽视内战期间罗霍采取的亲共立场¹¹²的一个因素可能是他的天主教信仰，不顾对自己的致命危险，他公开承认这一点。¹¹³此外，内战之前就认识罗霍的职业军官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说，他不喜欢阿萨尼亚，“他的政治观点显然与左派相去甚远”。¹¹⁴

曾任第五团团长的前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恩里克·卡斯特罗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罗霍与众不同的情况：“罗霍绝不可能在政治上理解

共产党。他之所以接受共产党，因为他认为，它不仅是一支政治力量，而且是一支军事力量；因为他知道，只要他正确行事，党将保护他不受任何人和事物的伤害。但他不是共产党员，永远也不可能是。他盲目地相信上帝，因此，他是一个怀着某种神圣感笃信宗教的人，以致不顾身作为一名激进的天主教徒当时使他处于致命危险的现实，并不隐瞒自己的信仰。”¹¹⁵

尽管罗霍确实没有加入过共产党，但是，同样可以确定的是，一个没有身份标签的人往往能够更好地为共产党效力。内战初期，当第五团团长卡斯特罗派一个民兵前去伺候罗霍时，他吩咐说：“我们需要他。他可能对党非常有用。”“可是……他是一个天主教徒。”那个民兵表示反对。

“也许原因就在于此。”卡斯特罗回答道。¹¹⁶

在一段关于比森特·罗霍的尖锐深刻的文字中，M.特蕾莎·苏埃罗·罗卡写道：

一个问题出现在脑海里：与共产党人截然不同的罗霍为什么屈从于他们呢？有人说他是随遇而安。这个答案似乎过于草率。我们已经提到一种说法，断言他实际上是他为之而战的那一方的“囚犯”。……如果真的是共产党人建议任命他为马德里保卫战的参谋长以及后来的总参谋长，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出于对国内尤其是国外舆论的考虑，他们一直热衷于维持一个民主政府的门面。莫非他们[出于同样的理由]也对使军队里有一个不问政治、信奉天主教并且稳居最高职位的军官感兴趣？……这一切有助于他们显示一种民主的外表，同时把所有权力抓在手中。可能罗霍受到了压力，更有可能是他的家人受到了压力，这种压力迫使他屈服。正如我们所知，罗霍是西班牙军人联盟的成员。另一些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被枪毙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许感到不屈服不行，这使得共产党人有机会既利用他的军事才能又利用他的个人特征。¹¹⁷

罗霍对保卫马德里的巨大贡献不仅被对米亚哈的宣传所遮蔽，而且因富有个人魅力的埃米利奥·克莱贝尔将军率领国际纵队第十一旅戏剧性地登场而黯淡无光。

据苏联报纸《布科维纳苏维埃报》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克莱贝尔的真名是曼弗雷德·扎尔曼诺维奇·斯特恩，¹¹⁸他的化名来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将军让·巴蒂斯特·克莱贝尔。显然，这在苏联官方保持沉默的近三十年中还是第一次，其间没有任何苏联方面的消息来源曾经透露过他的全名，只有苏联叛逃者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在一九三九年准确地说出克莱贝尔姓斯特恩。¹¹⁹如同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那样，现在已经弄清的是，他并不是某些历史学家误认为的¹²⁰那个化名格里戈罗维奇将军的格列戈里·M.施特恩（或斯特恩）将军，后者从一九三七年五月开始担任苏联在西班牙的首席军事顾问。

据熟悉克莱贝尔的第五团第一政委卡洛斯·孔特雷拉斯说，¹²¹一九三六年九月这位将军从苏联来到西班牙，暂时与当时开赴阿尔瓦塞特的第五团一起行动，他在阿尔瓦塞特帮助组建了国际纵队最初的部队（第十一旅和第十二旅）并于十一月八日开进马德里。在马德里，他被派往最危急的前线阵地——大学城和田园之家。没过几天，他的声望超过了米亚哈。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的德国共产党人古斯塔夫·雷格勒证实，克莱贝尔是“马德里真正的保卫者”并且创造了国际纵队不可战胜的传奇，他“上百次冒着生命危险[并且]具有西班牙英雄所必不可少的魅力”。¹²²“马德里人认为他相貌英俊，”马德里的《社会主义者》负责人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写道，“他们毫无语言困难地记住了他的名字。他们在说出这个名字时通过自我暗示赋予他最高尚的美德和最强大的力量。他的名字使所有人都黯然失色。”¹²³在国际纵队第十二旅的台尔曼^①营担任营长的德国共产党作家路德维希·雷恩比克莱贝尔晚几天到达马德里，他发现，报纸“充满了关于第十一旅和克莱贝尔将军的报道，一周前还不为人知的克莱贝尔现在是西班牙最受欢迎的人。他击退了佛朗哥最精锐的部队摩尔军团和外籍军团”。¹²⁴外国新闻界也对克莱贝尔大加赞扬。“他是当时的风云人物，”赫伯特·马修斯回忆说，“我们都突出地宣传报道他——因为他实至名归。”¹²⁵

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写道：

① 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 1886—1944），德国共产党领导人，追随共产国际在德国推行斯大林路线。

通过采访和特写，作为激动人心的风云人物，克莱贝尔被介绍给世界，他注定要在西班牙和世界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的体型相貌给这一段传奇增添了色彩。他身材高大，浓眉大眼，浓密的灰发使他看上去不像四十一岁。介绍给世界的克莱贝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人，一个入了加拿大国籍的出生于奥地利的人，作为俄国的奥地利战俘，他参加白卫军与布尔什维克作战，最后才改信共产主义。……我认识克莱贝尔及其妻子儿女和兄弟许多年了。他实际上姓斯特恩，出生于布科维纳。……世界大战期间他是一名现役军官，被沙皇的军队俘虏，然后被送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战俘营。苏维埃革命之后，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和红军。……后来他上了伏龙芝军事学院，一九二四年从那里毕业。我们在总参谋部情报局短暂共事过一段时间。一九二七年克莱贝尔被派往共产国际的军事部门。……他曾为共产国际去中国执行过秘密任务。克莱贝尔从没有去过加拿大，也从没有参加过白卫军。这些虚构的履历是用来掩盖他是一名红军军官这一事实的。这使其国际纵队指挥官的身份更容易被人所接受。实际上，尽管分配给了他这个引人注目的角色，他在苏联的国家机器中并没有实权。¹²⁶

据孔特雷拉斯说，克莱贝尔在马德里保卫战中声名鹊起立即引起了米亚哈和卡瓦列罗的妒忌。“他在人民当中的声望害了他。”孔特雷拉斯对我说。¹²⁷不过，他并没有透露，如同证据表明的那样，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对克莱贝尔的声望不满，因此，对他的死可能同样负有责任。另外，所有发现自己的历史地位将因克莱贝尔的突然走红而黯然失色的西班牙人全都对他表示不满，导致这种不满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妒忌，民族自尊心也是一个有力的因素。“西班牙共和派的民族自尊心因成功地保卫了马德里而高涨，”弗尔·约翰斯顿在他那部国际纵队史专著中写道，“因此，米亚哈和总参谋部不愿意看到公众的目光如此集中地关注一个外国人。似乎由于这个原因，应西班牙共产党的要求，至少是经西班牙共产党同意，[一九三七年]一月初国际纵队政治部突然将克莱贝尔从马德里调

走。”¹²⁸另一方面，孔特雷拉斯说，苏联军事顾问戈列夫将军向米亚哈和罗霍建议把克莱贝尔调走。¹²⁹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因为，这个决定可能是戈列夫考虑到西班牙人的自尊心并在西班牙共产党和国际纵队政治部同意的情况下作出的。值得一提的是，据当时担任国际纵队军需官的路易斯·费希尔说，法国共产党的代表、有阿尔瓦塞特“屠夫”之称¹³⁰的国际纵队政治部主任安德烈·马蒂与克莱贝尔将军“势不两立”——阿尔瓦塞特是国际纵队的大本营。¹³¹

现在我们知道，对克莱贝尔的攻击是比森特·罗霍发起的，然而不一定是受到了指使。根据他本人谨慎的说法判断，在克莱贝尔事件中，他似乎得到戈列夫的大力支持；¹³²另外，在一九三七年一月科利佐夫使他进入公众视野之前，他一直没有受到西班牙新闻界的关注。新闻界的忽视必定极大地伤害了这个为组织马德里保卫战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并且解释了他在一九四二年出版的《英勇的西班牙》一书中完全无视克莱贝尔的存在的原因，尽管这本书列出了马德里前线各个防御阵地上的西班牙指挥官的姓名。¹³³当然，罗霍不可能忘记克莱贝尔。实际上，在克莱贝尔到达马德里仅仅十八天后的十一月二十六日写给米亚哈将军的一封信中，罗霍谴责了对克莱贝尔“言过其实”的宣传及其“人为的”声誉和“虚假的”指挥才能。他认为：“克莱贝尔的部队正在浴血奋战，但仅此而已，不是由他指挥的其他部队也在浴血奋战。”另外，他指责克莱贝尔关于军事形势的报告不真实、不服从命令而且怀有政治野心，他还警告米亚哈提防“可能使你丢掉职务的暗中操作，你的部下都能看到，你正在积极地履行职务”——三十一年过后，在一九六七年出版的《这就是马德里保卫战》一书中，他第一次公布了这封信。¹³⁴

罗霍究竟是主动出击，还是事先知情，甚至是受到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的怂恿，这可能永远无法证实，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共产党人的回忆录和历史著作几乎不提克莱贝尔对保卫马德里的重要贡献。实际上，就连最受公众关注的马德里前线共产党民兵指挥官恩里克·利斯特，还有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多洛蕾丝·伊巴露丽（热情之花），尽管他们在回忆录中用大量篇幅回忆了首都的保卫战，可是都对克莱贝尔避而不谈。¹³⁵甚至在事情过去三十一年之后，一九六七年出版的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

战史只用几行文字含糊其辞地提到克莱贝尔，却不吝篇幅地赞扬罗霍。¹³⁶所有这些证据都支持了以下怀疑：与迄今为止人们所认为的相比，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更多地参与操作了克莱贝尔的调动。因此，难以赞成弗朗茨·博克瑙一九三七年提出的说法：克莱贝尔的失势是拉尔戈·卡瓦列罗、米亚哈和无政府主义者联手造成的，他们怀疑他正在策划一场由国际纵队支持的共产党政变。¹³⁷多年以后，一些历史学家在没有充分可靠证据的情况下重复了这一说法。¹³⁸正当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写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信中劝告后者尽量“防止西班牙的敌人认为它是一个共产主义共和国”之际，以这支人数不多的部队离开前线发动一场反政府政变的主意与共产党人为在西班牙控制政府所设计的更阴险的计划完全不符。就连博克瑙似乎也怀疑自己的说法的合理性，尽管他没有说明原因。¹³⁹

调离马德里之后，克莱贝尔暂时退隐于巴伦西亚，在拒绝了拉尔戈·卡瓦列罗向他提供的一个正在迅速崩溃的马拉加前线的次要职位¹⁴⁰之后，一九三七年夏天，在没有进行以前那种宣传的情况下，他出现在阿拉贡前线指挥第四十五师，没过多久，当时的总参谋长罗霍将他在那里调走。据卡洛斯·孔特雷拉斯说：“罗霍找到一些调动克莱贝尔的理由。他不想离开，非常烦恼和悲伤。”¹⁴¹此后不久他被召回了苏联。尽管传说他被枪毙了，¹⁴²但是，直到二十八年后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在《布科维纳苏维埃报》上发表，他遭到清洗这一事实才得到了铁幕后面的消息来源的证实。

“他的命运是个悲剧。”文章写道，“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他受到不公正的指控和判决。他死在一个[劳改]营里，后来[死后]被恢复了名誉。”

注释：

- 1 胡利奥·阿罗斯特吉·桑切斯和赫苏斯·A.马丁内斯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75页。
- 2 米哈伊尔·科利佐夫，《西班牙日记》，载一九三八年五月号《新世界》，第56页。
- 3 维克托·德·弗鲁图斯，《没有输掉内战的人》，第53—55页。
- 4 一九三九年我在墨西哥对阿尔瓦罗·梅嫩德斯的采访。采访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梅嫩德斯是运气不佳的人民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席，该运动会原定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巴塞罗那举行以抗议在德国举行奥运会，但因爆发军事叛乱被取消了。他是内战初期仓促拼凑的

“机枪摩托营”营长古斯塔沃·杜兰的副官。

- 5 文森特·布罗姆，《国际纵队》，第77—78页。另请参阅安德鲁·卡斯特尔斯《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第102页。
- 6 爱德华多·德·古斯曼发表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六日《胜利报》上的文章。
- 7 英国作家伯纳德·诺克斯本人就是国际纵队第十一旅成员，他写道：“第十一旅三个营的人数被认为在一千七百至三千五百人之间；最可能的人数是一千九百人，但是，从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因为这个旅没有作战行动记录，没有正规的身份文件。唯一得到普遍认可的统计资料是死伤人员清单：到十一月二十三日，一半以上的人都伤亡了，当时佛朗哥停止了第一轮攻势。英国排的情况具有代表性：十一月八日我们有十六条壮汉，到了十二月三十一日，八个牺牲，三个重伤。”（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六日《纽约书评》）
- 8 这也是担任台尔曼营营长的德国作家路德维希·雷恩告诉我的大概人数。台尔曼营是组成国际纵队第十二旅的三个营之一，另外两个营是法国-比利时营和加里波第营，后者由兰多尔福·帕恰尔迪率领（见兰多尔福·帕恰尔迪《加里波第营》）。第十二旅由匈牙利小说家扎尔卡·马泰指挥，他在西班牙被称为卢卡契将军，一九三七年六月战死于阿拉贡前线（见米哈伊尔·季霍米罗夫《卢卡契将军的故事》，第361—365页和[第十二旅政治委员]古斯塔夫·雷格勒的《密涅瓦的鸱鸒：古斯塔夫·雷格勒自传》，第312页，雷格勒在同一场战斗中负伤）。扎尔卡的苏联顾问巴托夫将军也负了伤（《在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帜下，1936—1939：苏联志愿参战人员回忆录》，第308页）。雷恩说第十二旅的规模“在一千五百至一千六百人之间”。这些数字摘自他的日记，一九三九年我在墨西哥遇见他时，他将其中的一部分（一九三六年十月六日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念给我听。我所做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 9 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五年版），第412—413页。一名参加了马德里保卫战的前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青年运动成员作为目击者描述了这场战斗并且赞扬了国际纵队，见埃内斯托·门德斯·卢恩戈《黎明的风暴：马德里的史诗》，第167—175页。
- 10 在罗纳德·弗雷泽那部口述史《流血的西班牙》中，他引述了一个马德里人的话：“那是我们喜欢俄国人的时刻。看到那些苏联战斗机在空中击落德国飞机美妙极了。大街上到处都是欢呼鼓掌的人。俄国人参加了我们的保卫战，我们非常同情苏联。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
- 11 罗伯特·科洛德尼，《为马德里而战：西班牙内战的重要史诗，1936—1937》，第144页。国际纵队的传奇肯定不是这么一本书所能描述的。人们就这一主题写了成百上千本书和大量文章，在这些书籍和文章中，文森特·布罗姆的《国际纵队》、弗尔·B.约翰斯顿的《巴别尔军团：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和R.丹·理查森的（最新而且引证最充分的著作）《共产国际的军队：国际纵队与西班牙内战》值得推荐。由于略去了大量详细说明与描述的材料，《巴别尔军团》被编辑删改得面目全非，不过幸运的是，该书原稿的一份副本保存在胡佛研究所的博洛滕资料集中。这三部著作包含了大量关于国际纵队的有价值的信息，它们成为许多书籍的参考书目，例如罗伯特·科洛德尼《为马德里而战》和休·托马斯的《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五年版）。国际纵队第十一旅参战的准确日期仍未确定。布罗姆（《国际纵队》，第80页）、科洛德尼（《为马德里而战》，第66—67页）、理查森（《共产国际的军队》，第81页）、托马斯（《西班牙内战》，第412—413页）和维托里奥·维达利（《西班牙的漫长战斗》，第203页）认为它在十一月八日晚上第一次受到攻击，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二卷，第168页）提供的也是这个日期；但是，约翰斯顿（《巴别尔军团》，第168页，注释23）列出证据（包括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治委员路易吉·隆哥提供的证据），把第十一旅参战的日期估计为十一月九日。除了这种分歧之外，米亚哈的参谋长比森特·罗霍明确表示，第十一旅在十一月十日之前没有参战（《这就是马德里保卫战》，第222页）。不

- 过，安德鲁·卡斯特尔斯（《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第161—162页，注释7）指责罗霍“歪曲”事实。围绕着是不是国际纵队拯救了马德里这一富有争议的问题而出现的各种不同看法，实例见《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二卷，第170—171页；罗霍，《这就是马德里保卫战》，第84页，他认为不是。另请参阅弗尔·约翰斯顿《巴别尔军团》，第56页和第171页注释40；一方面，他引述了路易斯·费希尔、古斯塔夫·雷格勒和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等人的看法，他们认为国际纵队“的确拯救了马德里”；另一方面，他引述了彼得罗·南尼、多洛蕾丝·伊巴露丽和汤姆·温特林厄姆等人的看法，他们“同意国际纵队只是几个重要的因素之一”。
- 12 费德里科·布拉沃·莫拉塔，《马德里史》，第三卷，第276页。
 - 13 桑多尔·沃罗斯，《美国政委》，第283页。阿尔瓦·贝西是亚伯拉罕·林肯营的一名老兵，在西班牙战场上出生入死无数次却从未提到过隐藏在“人民阵线”和“民主”这些口号后面的极权主义目标，但是，即使像他这样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也不免谈及当初的革命幻想，为了这些幻想，许多外国共产党人在西班牙作战并死在那里。“在以前的世界历史上不曾有过这样一群人，”他在一九三九年写道，“他们来自人类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种职业，手工劳动者和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和农民，自发地组成一支国际志愿军。正是这支军队的存在保证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兄弟情谊，它在西班牙这场内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终证明这些人做的是拥有共同利益和责任的那个世界的事情。”（阿尔瓦·贝西，《战斗的人们》，第343页）
 - 14 威廉·赫里克一九八六年一月二日和二月七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赫里克在一九八六年六月六日向纽约州劳登维尔锡耶纳学院提交的一篇论文中写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我在国际纵队的战友几乎全部都是列宁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以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徒，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渗透了我们的一生，但是只有几个人（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其中的一个）承认，发生在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地区的革命——它们由受到嘲笑的无政府主义者领导并且得到受到敌视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人的支持——正是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似乎是忠于共产党和约瑟夫·斯大林而不是忠于我们的理想。”这篇论文的一份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
 - 15 米亚哈将军十一月六日致罗霍的公函的原文，将拉尔戈·卡瓦列罗对其的任命通知后者（见罗霍，《这就是马德里保卫战》，第248页）。
 - 16 安东尼奥·洛佩斯·费尔南德斯上尉，《保卫马德里》，第105页。
 - 17 塞西尔·D.伊比，《围城》，第144页。
 - 18 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一卷，第574—575页。
 - 19 科利佐夫，《西班牙日记》，载一九三八年五月号《新世界》，第86页。关于对罗霍的其他赞扬，见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429页；另外，曾任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的前德国共产党人古斯塔夫·雷格勒证实，马德里保卫战的“实际组织工作”是罗霍进行的（雷格勒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关于罗霍非凡的才能和工作能力以及他在保卫马德里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另请参阅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的《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一卷，第574—575和642页。令人非常奇怪的是，尽管他在第一卷中热情赞扬了罗霍，但是，第二卷（第1808页）提到罗霍时，在没有适当说明的情况下，萨拉斯·拉腊萨瓦尔使用了“被高估的比森特·罗霍”和“他的平庸”之类贬义的表述。
 - 20 科利佐夫，《西班牙日记》，载一九三八年六月号《新世界》，第33—34页。罗霍面对的一些主要问题，见罗霍《这就是马德里保卫战》，第59—60页。
 - 21 科利佐夫，《西班牙日记》，载一九三八年六月号《新世界》，第54—55页。
 - 22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让我去战斗》，第269页。
 - 23 《基本原因：西班牙的赤色统治》，第289—290页。

- 24 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写给我的一封信中确认。
- 25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213—214页。这也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未发表的回忆录《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中得到证实，见510—512页。另请参阅（前国防部长）何塞·马里亚·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708页。值得记录在案的是，七月十八日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劝说莫拉将军加入他的和解政府失败以后，米亚哈与在潘普洛纳其指挥部里的莫拉通电话，据与莫拉密切合作的企业家B.费利克斯·迈斯说，莫拉回答米亚哈：“我不能接受你的任何建议，因为三小时之内我将起义……保卫西班牙，反对一个正在将其引向毁灭和耻辱的政府。至少在你反复劝我加入当时你已加入的西班牙军人联盟时，你也有过同样的想法。”（B.费利克斯·迈斯，《莫拉这个人：谋反日记，1936》，第307页）
- 26 实例见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曼努埃尔·阿斯纳《西班牙内战军事史》，第200页和萨拉斯·拉腊萨瓦尔的《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一卷，第574—575页。
- 27 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维托里奥·维达利）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向我提供的证言。另一方面，科利佐夫说，罗霍“立即听从政府的调遣”（《西班牙日记》，载一九三八年六月号《新世界》，第34页）。
- 28 当时米亚哈的一名部下路易斯·费尔南德斯·卡斯塔涅达的证言，被马克西米利亚诺·加西亚·贝内罗引述，见《范胡尔将军：民族起义中的马德里》，第289—290页。
- 29 感谢希拉尔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接受我的采访时向我提供了这一情况。我整理的采访速记记录的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
- 30 我整理的采访速记记录，该记录的一份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
- 31 弗朗西斯科·莫雷诺·戈麦斯，《科尔多瓦的内战，1936—1939》，第369页。
- 32 对围攻圣母头像神庙最出色的纪实性描述，见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上校的《围攻》，第107—200页。关于这一主题的其他重要著作有安东尼奥·雷帕拉斯-特雷斯加略·德·索萨上尉的《从米亚哈的指挥部到圣母头像神庙》和何塞·罗德里格斯·德·奎托的《圣母头像神庙的史诗》。关于共和派军队一九三七年四月发动的进攻——这次进攻解除了对圣母头像神庙的围困，见指挥这次进攻的第十五旅旅长佩德罗·马丁内斯·卡顿对我作的长篇口述（口述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关于米亚哈一九三六年八月在科尔多瓦前线遇到困难的一些情况，见阿图罗·佩鲁乔（当时的战士，后来成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机关报《劳动报》的编辑）接受我的采访时所做的评述（采访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在科登的《历程》中也可以发现关于围攻圣母头像神庙的宝贵信息。
- 33 科登，《历程》，第317页。
- 34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八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 35 这个情况是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告诉我的，他非常了解这件事。我整理的采访速记记录的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将军也向我证实了这件事（对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将军的采访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另请参阅M.特蕾莎·苏埃罗·罗卡《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242—244页。
- 36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国防部官方日志》。
- 37 关于这种看法的实际例子，见胡利奥·阿罗斯特吉和赫苏斯·A.马丁内斯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71页。
- 38 雷格勒，《密涅瓦的鸱鸢》，第283页。
- 39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七日《国际新闻通讯》。
- 40 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197页。
- 41 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63—64页。另请参阅恩里克·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452—453页和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我的回忆》，第

192页。

- 42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九日《人民西班牙》。另请参阅科登的《历程》第288和278—279页，这位共产党人军官描述了米亚哈平庸的职业生涯。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写给共产国际的一封信中，陶里亚蒂说米亚哈“完全被药物和酒精麻醉了”（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73页）。
- 43 恩里克·利斯特，《我们的战争：对西班牙人民民族革命战争史的贡献，1936—1939》，第288页。多年以后，（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成员）圣地亚哥·卡里略说，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米亚哈将军扮演了某种角色，但他基本上是个装饰门面的人物”（圣地亚哥·卡里略，《西班牙的明天：与雷吉斯·德布雷和马克斯·加洛对话录》，第59页）。
- 44 科登，《历程》，第287—288页。
- 45 伊利亚·爱伦堡，《战争前夕，1933—1941》，第146和235页。
- 46 《在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帜下》，第152页。
- 47 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452页。另请参阅《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440—441页。
- 48 赫伯特·L.马修斯，《一名记者的教育》，第143—144页。值得注意的是，撰写了应当受到高度评价的精心记录人民军历史的四卷本专著的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认为，米亚哈比这些资料所显示的更聪明、政治上更独立、军事能力更强（《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一卷，第576页）。本人通过大量研究而形成的对米亚哈的认识使我不同意这种评价，尤其不同意米亚哈是个“伟大的领导人”这一观点。
- 49 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213页。
- 50 见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佩德罗·马丁内斯·卡顿发表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七日《国际新闻通讯》上的文章；另外，埃德蒙多·多明格斯也证实了安东的领路人角色（见埃德蒙多·多明格斯《战胜内格林的人们》，第203页）。多明格斯一九三六年七月是社会党左派和劳动者总工会全国建筑工人联合会书记，内战期间追随共产党的政策，最后成为中部前线督察委员。
- 51 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593页。
- 52 胡安-西梅翁·比达特，《全都是罪犯》，第755页。
- 53 比森特·罗霍将军，《人们，当心！西班牙内战最后阶段的政治-军事研究》，第245页。
- 54 拉尔戈·卡瓦列罗，《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第512页。
- 55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危机之前、期间及之后的共产党》，第24页。上面引用的大量证据应当足以说服休·托马斯，他声称，米亚哈不是共产党员（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五年版]，第460页）。也许还可以说服胡里奥（原书误为何塞——译注）·阿罗斯特吉，他坚决否认米亚哈是共产党员（见他的文章，收入曼努埃尔·图尼翁·德拉拉编辑的《西班牙内战：五十年后》，第72页以及他的著作《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75页）。
- 56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89页。
- 57 罗霍，《这就是马德里保卫战》，第33页。
- 58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工人世界报》。
- 59 尽管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成立时米亚哈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此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共产党。
- 60 尽管弗拉德在这个表上被列为社会党人，但是，根据前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何塞·布列霍斯向我提供的情况，他其实是一名共产党员（布列霍斯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四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另请参阅（社会党人）阿图罗·巴雷亚《制造反叛》，第579页；（亲共产党的历史学家）科洛德尼，《为马德里而战》，第51页和第173页注释。不过，胡里奥·阿罗斯特吉和赫苏斯·A.马丁内斯对巴雷亚的证言嗤之以鼻，他们否认弗拉

- 德是共产党员（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141页和第251—252页注释135）。
- 61 据费尔南多·克劳丁说，卡里略在他成为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委员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七日当天加入了共产党，见费尔南多·克劳丁《圣地亚哥·卡里略：一位总书记的大事记》，第48页。
- 62 尽管亚格正式代表的是社会党的工会组织劳动者总工会，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却没有争议。实例见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68页和第251页注释133。
- 63 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多情况，见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90页和第55页及其后。从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我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对委员会独立性的不满及其对米亚哈和共产党人的不满，见第191—192页。
- 64 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91—92页。
- 65 委员会的组成见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93页，但是，我有责任列出成员的所属党派。另请参阅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116—117页。
- 66 尽管我没有马克西莫·德·迪奥斯是一名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支持者的证据，但是，阿罗斯特吉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在改组后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的代表洛伦索·伊尼戈的一次谈话值得一提，在谈话中，后者告诉阿罗斯特吉，迪奥斯是一名共产党员（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140页和第255页注释106）。
- 67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人民西班牙》（流亡的西班牙共产党的刊物）所提供的卡索拉加入共产党的日期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七日。一九三七年三月，卡索拉当选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四〇年六月七日《西班牙青年》）。
- 68 路易斯·涅托是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前军需委员巴勃罗·亚格的副手，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企图杀害亚格之后，他取代了亚格。像亚格一样，涅托无疑是一名共产党员，因为无法想象身为共产党员的亚格（见本章注释62）会安排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人做自己的副手，这个人至少也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共产党的支持者。值得注意的是，已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第140页暗示涅托是共产党员的阿罗斯特吉随后又在第251页注释133中声称：“[我]知道他是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成员，但是，我们不能肯定地说，他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
- 69 见费利克斯·阿尔文《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扉页）；《社会主义国家名人录》，第206页。在科利佐夫专横地将对马德里的外国新闻记者的审查权划归总政治部直接管辖之后，共产党人还掌握了这一权力，因为正如我们所知，共产党将总政治部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见巴雷亚《制造反叛》，第585—586页。
- 70 见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245页注释4。
- 71 同上，第140页。
- 72 同上，第68页。
- 73 同上，第140页。
- 74 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447页。
- 75 关于“关键职位”这个问题，值得记录在案的是，无政府工团主义历史学家塞萨尔·M.洛伦索（人们应当记得，他是曾任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的奥拉蒂奥·M.普列托之子）写道，无政府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洛伦索·伊尼戈所任职的战争工业这个部门“完全是象征性的，因为马德里当时没有工业设施”（塞萨尔·M.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1868—1969》，第216页）。
- 76 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281页。
- 77 维克托·阿尔瓦，《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1919—1939：工农集团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史》，第二卷，第491页。

- 78 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13—14页。
- 79 同上,第125和130页。
- 80 同上,第130页。另请参阅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和十一日会议的记录(同上,第293—296页)。据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成员胡利安·戈金说,当他与另一名执委会成员胡安·安德拉德试图加入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时,“反法西斯主义政党和组织[最初]同意我们加入,”但是,“斯大林主义者迫使他们表示反对”(胡利安·戈金,《政治食人族》,第90—91页)。
- 81 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141页。另请参阅戈金《政治食人族》,第90—91页。
- 82 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141页。曼努埃尔·阿尔瓦尔的这一声明可以在皮埃尔·布鲁埃和埃米尔·特米姆的《革命与西班牙内战》中找到,见第215页,注释30。
- 83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会议的记录,见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376页。毫无疑问,使共产党人更为恼火的是《红色战士》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力倡导(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红色战士》)及其针对苏联的迫害为“我们的托洛茨基同志”所作的辩护(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红色战士》)。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写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一封信中,委员会主席米亚哈将军声明,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采取措施是因其“反复对委员会和政府进行无理的攻击……同时也是出于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后方秩序并且防止任何可能危害当局的事情发生的需要”。在第二天的回信中,拉尔戈·卡瓦列罗表示,他同意采取这些措施但提醒注意,委员会的决定由米亚哈独自负责。两封信(原件存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部)的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84 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376页。
- 85 同上,第141页。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认为冈萨雷斯·马林是一位“出色的辩论家”,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举行的委员会会议上,当他与卡索拉正面交锋时,这一点得到了证实(委员会会议记录,见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440—454页)。
- 86 同上,第285页。着重体是我加的。
- 87 同上,第121页。关于二月八日委员会会议讨论这封信的会议记录,见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396—400页。
- 88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工人世界报》。
- 89 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489页。
- 90 委员会会议记录,见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400页。
- 91 同上,第139页。着重体是我加的。
- 92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情况通报》,见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87页。
- 93 这些人都是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重要成员。例如,路易斯·罗德里格斯·奎斯塔是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国委员会成员。
- 94 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94、228和236页。
- 95 四月十五日的委员会会议记录记载了这场正面交锋的详情,见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440—454页。对卡索拉的敌意反映在马德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报刊上,它们将其痛斥为“为法西斯运动效力的奸细”(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卡斯蒂利亚自由报》)并且要求立即将他逐出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七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 96 这种忧虑在四月十五日的委员会会议记录中有所显示,见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的《保卫

- 马德里委员会》，第440—454页。
- 97 同上，第139页。
- 98 关于拉尔戈·卡瓦列罗把他解散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决定通知米亚哈将军的信，见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工人世界报》。卡瓦列罗在这封信中说明，米亚哈将军的职责因此将被严格限制在军事方面，他的行政权力也将因此被解除，新的城市委员会将负责处理市政当局必须处理的事务。关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八日生效的成立新的城市委员会的法令，见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共和国官方公报》，该委员会将由代表主要党派团体的三十二名成员组成。共产国际代表安德烈·马蒂几个月后写道，由于将行政权力与军事权力分离，拉尔戈·卡瓦列罗“极大地削弱了”城市的防御能力。他还写道，对于某些党派和政府成员来说，敌人“不再是法西斯主义而是共产主义”（安德烈·马蒂，《英勇的西班牙》，第15页）。
- 99 见科利佐夫的《西班牙日记》摘抄，text to nn.19—22及其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真理报》上的文章。
- 100 见一九六六年出版于莫斯科的《在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帜下》（沃罗诺夫元帅和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文章，第95、166—167和183页），基里尔·A.梅列茨科夫元帅，《在人民军队中：回忆录》，第144页。梅列茨科夫还说，罗霍的观点“比米亚哈的观点更倾向于左派”。
- 101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二卷，第152页。
- 102 伊比，《围城》（见“原始资料”，第235—259页）。在该书于一九六一年出版以后，有两部对这一主题作出新的阐述的著作发表：路易斯·金塔尼亚的《托莱多城堡的人质：见证二》（1967）和安赫尔·拉马斯·阿罗约的《一些……与另一些……》（1972）。
- 103 伊比，《围城》，第148页。这一段叙述部分根据莫斯卡多签字的一份材料，发表在《基本原因》一书中，见附录十。没有理由怀疑这份材料的确切性。罗霍有许多机会反驳这份材料，但是，他在关于内战的著作和文章中从来没有评论过它。根据这一证据，罗霍表示，“他的妻子和孩子在马德里，如果他不回去的话，他们将会被杀害”；另外，在与叛军军官告别时，他“明显情绪激动”并且说，“我祝你们大家好运。西班牙万岁！”（第327页）在一段关于罗霍生平的文字中，M.特蕾莎·苏埃罗·罗卡写道，在西班牙电视台一九七八年播出的一个节目中，“巴伦西亚将军证实，他听父亲[城堡中的军官之一]说过，罗霍主张[守军]继续抵抗，还告诉他们共和国几乎弄不到武器，使他们受到极大的鼓舞”（苏埃罗·罗卡，《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62页，注释5）。
- 104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西班牙信息》（西班牙报刊摘要。）
- 105 卡洛斯·孔特雷拉斯战后回答我的问题时所说。
- 106 科利佐夫，《西班牙日记》，载一九三八年六月号《新世界》，第35页。
- 107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国防部官方日志》；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国防部官方日志》。
- 108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国防部官方日志》。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日共产党的《红色阵线报》所发表的一篇赞美罗霍的文章。
- 109 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西班牙内战，1936—1939》，第147、152、169—170和185页。值得一提的是，拉尔戈·卡瓦列罗谈到过罗霍对共产党人的帮助，他甚至断言罗霍是一名共产党员，尽管没有证据支持（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195—214页）。
- 110 关于加尔塞斯的情况，见本书第五十六章（原书误为第五十五章——译注）。
- 111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标志报》。
- 112 实例见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五年版），第460页。
- 113 见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317—318和554页。
- 114 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283页。另请参阅曼努埃尔·阿斯纳《西班牙内战军事史》，第428页；弗朗西斯科·卡萨雷斯，《阿萨尼亚与他

- 们》，第256页。
- 115 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554页。
- 116 同上，第318页。
- 117 苏埃罗·罗卡，《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92—93页。
- 118 见茨韦坦·克里斯塔诺夫《为了西班牙的自由：保加利亚共产党人的回忆》，第355页。
- 119 瓦尔特·Г·克里维茨基，《在斯大林的情报部门工作》，第97页。著名苏联问题专家戴维·达林说，三十年代初期克莱贝尔是苏联派到美国的军事间谍组织负责人，化名马克·齐尔伯特（戴维·J·达林，《苏联的间谍活动》，第396—398页），但我无法提供任何佐证。
- 120 实例见皮埃尔·布鲁埃和埃米尔·特米姆的《革命与西班牙内战》，第354页，注释21；科洛德尼，《为马德里而战》，第62页和第179—180页，注释101；伊普西伦，《世界革命的典范》，第422页。
- 121 卡洛斯·孔特雷拉斯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回答我的问题时所说。
- 122 雷格勒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123 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198页。
- 124 路德维希·雷恩，《西班牙内战》，第69页。
- 125 赫伯特·L·马修斯，《两场战争以及即将爆发的战争》，第210页。
- 126 克里维茨基，《在斯大林的情报部门工作》，第97—98页。
- 127 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城与我的谈话。谈话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 128 约翰斯顿，《巴别尔军团》，第57页。克莱贝尔将军手下负责防守田园之家前线“一号阵地”的一位名叫“樊尚”的法国军官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对我发表了以下评论：“[西班牙]共产党不喜欢国际纵队。……国际纵队不想受西班牙人指挥，西班牙人也不想受国际纵队指挥。这种情况没有希望得到改善。西班牙人不愿意看到国际纵队享有盛誉。”他还说，他“感到心灰意冷”，所以准备返回巴黎（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 129 卡洛斯·孔特雷拉斯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城回答我的问题时所说。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 130 实例见加里波第旅（原书误为加里波第营——译注）旅长卡洛·彭基耶纳蒂的《国际纵队在西班牙：“契卡”共产党人的罪行》，第112—113页以及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古斯塔夫·雷格勒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131 费希尔，《人与政治》，第401页。
- 132 罗霍，《这就是马德里保卫战》，第215页。
- 133 罗霍，《英勇的西班牙》，第55页。
- 134 罗霍公布了这封信的全文，见第253—255页，他的评论见第223页。
- 135 分别见利斯特《我们的战争》和多洛蕾丝·伊巴露丽《唯一的道路》。
- 136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二卷，第169页。另一方面，担任第五团第一政委的意大利共产党人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维托里奥·维达利）在《西班牙的漫长战斗》中两次赞扬了克莱贝尔（第203和304页）；第三旅的共产党人指挥官何塞·马里亚·加兰也在苏联的历史刊物《军事史杂志》上赞扬了克莱贝尔，载（一九六一年）第七期，第85—86页，尽管他没有提到克莱贝尔对保卫马德里的杰出贡献。令人感兴趣的是，他说克莱贝尔的两个兄弟列奥·斯特恩和沃尔夫·斯特恩在马德里前线“与他[克莱贝尔]并肩作战”，但他没有说他们后来怎么样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有人提到他这两个兄弟。
- 137 弗朗茨·博克瑙，《西班牙斗鸡场》，第274—275页。
- 138 例如，戴维·T·卡特尔，《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130—131页，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五年版），第455页。

- 139 博克瑙，《西班牙斗鸡场》，第275页。对博克瑙说法的批判性分析，见科洛德尼《为马德里而战》，第215—216页。
- 140 根据卡洛斯·孔特雷拉斯，英国共产党人、记者、作家克劳德·科伯恩（化名弗兰克·皮特凯恩）和总政治部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罗托的口头证言。
- 141 卡洛斯·孔特雷拉斯战后回答我的问题时所说。罗霍本人提到克莱贝尔被解职，但是没有说将其解职的原因或负责人（《这就是马德里保卫战》，第223页）。
- 142 费希尔，《人与政治》，第405页。另请参阅《在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帜下》，第463页，注释4。

苏联军官、记者和外交官

无论是埃米利奥·克莱贝尔在马德里保卫战最困难的那些日子的短暂荣耀，还是比森特·罗霍少校在后方进行的非常宝贵的组织工作，都不应抹杀苏联军事顾问弗拉基米尔·戈列夫将军所起的作用，他指挥着中部前线的苏联炮兵、坦克和空军部队。路易斯·费希尔在西班牙可以随意接近苏联军官，¹据他说，戈列夫是马德里的真正英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他在战后写道，“我去国防部拜访掌控军事形势的戈列夫将军。……他组织了马德里保卫战。与其他人相比，他才是马德里的救星。”²这也是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的看法。³另一方面，在科利佐夫的日记中，凡是提到戈列夫的内容，无论明显还是隐晦，不是被作者去掉了，就是被苏联的书报检查人员删除了，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它在一九三八年发表时戈列夫将军已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销声匿迹，⁴同时，科利佐夫日记则给予罗霍慷慨的赞扬。⁵对比之下，斯大林死亡十年后，《消息报》记者伊利亚·爱伦堡在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对罗霍只是一笔带过，却以显著的位置记述了戈列夫的经历。他写道：“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戈列夫很少造访[国防]部的地下室；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前线。他不到四十岁，但却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他聪明、含蓄，同时充满激情——我甚至可以

说他富有诗意，因此赢得了大家的尊敬。要说人们信任他一点也不为过：他们认为他是福星。六个月后西班牙人学会了如何打仗，产生了才华出众的指挥官——莫德斯托、利斯特以及另外一些不那么出名的人。但是，在一九三六年秋天，可能除了参谋长罗霍之外，共和国军队的指挥官中几乎没有具有魄力和军事知识的人。在十一月的那几天，戈列夫发挥巨大的作用帮助西班牙人在马德里外围阻止了法西斯分子的进攻。”⁶即使是坚决否认戈列夫“或其他任何外国人”负责指挥了马德里保卫战的罗霍也承认，戈列夫将军“大部分时间”与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苏联作战物资陆续到达之后那一段为马德里而战的艰难时期”，通过“有效的配合”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⁷

这样看来，现有的证据清楚地表明，在充分肯定克莱贝尔在战场上作出的重要贡献的情况下，组织马德里保卫战的功劳属于密切配合共同努力的罗霍和戈列夫两个人。

307

内战期间被人称为格里申将军的扬·K.别尔津将军是苏联在西班牙的首席军事顾问，⁸因为苏联多年的沉默导致人们经常把戈列夫将军与他混为一谈，⁹所以有必要指出的是，他们各自的身份如今已经得到明确的确认。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一年间苏联出版的一些书籍表明，戈列夫是苏联大使馆武官兼米亚哈将军的顾问，因此也是比森特·罗霍的顾问，而别尔津则是地位最高的苏联军事顾问。¹⁰

据苏联问题专家戴维·达林说，别尔津是苏联总参谋部情报局即格鲁乌（ГРУ）的首任局长，领导这个情报部门达十五年之久。¹¹他担任这个重要职务并被派往西班牙领导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事实说明了西班牙内战当时在斯大林眼中的重要程度。据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的惠特克·钱伯斯说，被朋友们称为老头（Старик）¹²的别尔津是其“国际负责人”，在美国活动的苏联间谍网知道他的这个绰号。¹³

在马德里保卫战中，戈列夫得到一批苏联高级军官的帮助：Г.И.库利克，戈列夫的直接上司，在西班牙被称为库珀尔将军，担任中路军司令波萨斯将军的顾问；¹⁴Д.Г.帕夫洛夫，化名巴勃罗将军，指挥苏联坦克部队；¹⁵Н.沃罗诺夫，化名博尔特，负责苏联炮兵部队；¹⁶雅科夫·斯穆什克维奇，人称道格拉斯将军，¹⁷苏联空军部队指挥官并且担任伊格纳西奥·伊

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少校（后来晋升为将军）的顾问。一九三六年九月七日被海军和空军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任命为空军司令的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是一位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和普列托的私人朋友，他出身于阿拉瓦省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妻子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是著名的保守政府首相安东尼奥·毛拉的外孙女。在内战爆发初期，由于共产党人的纪律性和效率及其得到来自苏联的援助，像许多社会党人一样，伊达尔戈与妻子一起加入了共产党。¹⁸

说起一九三七年二月重要的哈拉马河战役，共产党人指挥官恩里克·利斯特谈到了帕夫洛夫：“从二月六日到十三日，他实际组织了共和派的抵抗。巴勃罗将军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他聪明、勇敢并且可以迅速作出决定；他在我们这些认识他的人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安东尼奥上尉是将军不可或缺的助手，担任他的翻译、副官和秘书以及我不知道的其他工作。我是在列宁学校认识的上尉，他在那里叫平托斯，战后他回到自己的祖国，用真实姓名克拉夫琴科夫获得了苏联英雄的最高奖励。”¹⁹关于雅克夫·斯穆什克维奇，Г.普罗科菲耶夫空军少将写道：“[他]是组织共和国空军大规模行动的灵魂。”²⁰

308

别尔津、戈列夫、帕夫洛夫、斯穆什克维奇和一九三七年五月接替斯穆什克维奇的E.C.普图欣，²¹还有同一时间接替别尔津、在西班牙化名格里戈罗维奇将军的格列戈里·M.施特恩（或斯特恩）²²均在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间斯大林的清洗中被杀害。“在此期间，”苏共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发表的谴责斯大林的著名讲话中宣称，“在西班牙和远东获得了军事经验的指挥员骨干几乎全部被清洗。”²³据竟然免遭清洗的伊利亚·爱伦堡说，许多在西班牙作战的苏联指挥官“随后几年成为滥用权力的牺牲品”。²⁴路易斯·费希尔把处决他们归因于内务人民委员部与红军之间的“长期激烈竞争”，红军不满自己“受到部队中不明人员的暗中监视，监视者搜集真假情报供内务人民委员部滥用。……这种状况早在西班牙内战之前就已存在，内战只不过加剧了这种状况而已。在西班牙的苏联军官告诉我，他们始终受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随意摆布’和‘暗中监视’。他们向斯大林发泄自己的不满，结果却被处决了”。²⁵

在西班牙的苏联记者的命运好不了多少。《消息报》的爱伦堡，塔

斯社的米罗娃和《真理报》的科利佐夫，这三个与西班牙内战有关的著名记者都是犹太人，他们当中只有爱伦堡幸免于难。米罗娃在一九三七年返回莫斯科后被逮捕，²⁶此后再也没有她的消息。至于科利佐夫，他既是杰出的记者和文人，又是斯大林在西班牙的私人代表，每天要从马德里通过电话与这位苏联独裁者讨论一两次西班牙的形势，²⁷据权威的《苏联名人录》记载，他在一九三八年被捕，一九四二年四月四日死于监禁中，死后名誉得到恢复。²⁸特别有意思的是，尽管一九三八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十三卷收入了科利佐夫的条目，然而，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亡之前准备出版的第二版第二十二卷中，他的条目被删掉了。他的文集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年间出版，当时他仍然深受斯大林的宠爱，但是，直到这位独裁者死了四年之后的一九五七年，他的文集才得以再版。在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时期，科利佐夫的弟弟Б.Е.叶菲莫夫在一九五九年莫斯科出版的《苏联作家》（《Совет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第一卷的科利佐夫条目中说，他“死于暗藏的人民敌人的罪恶之手”。²⁹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六年间在列宁格勒出版的《苏维埃俄罗斯散文作家》（《Русские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и-прозаики》）更加直言不讳：“在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时期，当科利佐夫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成为暴政和专制的受害者时，他的文学和社会活动戛然而止。”³⁰不过，受后赫鲁晓夫时代对斯大林比较温和的态度的影响，一九七三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第十二卷虽然恢复了科利佐夫的条目，但是没有提到他的死。

一九三八年返回苏联之后科利佐夫并没有立即被捕，因为他在当年五月探望了路易斯·费希尔。“他仍‘一切正常’。”费希尔在一九四一年写道，“这也是他竟敢来看我的原因。同一年[一九三八年]他遭到清洗。他的文章和书籍不再发表和出版，他的朋友大部分都认为他被枪毙了。他可能是仅次于拉狄克^①的最有影响的苏联记者。顺便说一下，科利佐夫是欧内

309

① 卡尔·伯恩加尔多维奇·拉狄克（1885—1939），出生于奥匈帝国一个犹太人家庭的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家和共产国际早期领导人。一九二七年被苏联共产党当做托洛茨基分子开除出党并被流放到乌拉尔山区。一九二九年因公开表示拥护斯大林被恢复党籍。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六年间担任《消息报》编委，撰写国际时事评论。一九三六年被捕并被判处十年徒刑，据说他在一九三九年因与另一名囚犯打斗死于劳改营。不过，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调查确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直接奉贝利亚的命令将其杀害。

斯特·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中的‘卡尔科夫’。科利佐夫对西班牙充满了感情。但是，在与陌生人交谈时，他把自己隐藏在一团烟幕中，因而产生了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的同样冷漠的文字——编辑的废话和文章的糊弄。这使他显得华而不实，玩世不恭。”³¹英国作家克劳德·科伯恩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是伦敦的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的记者，化名弗兰克·皮特凯恩，他在退出英国共产党之后所写的自传里对科利佐夫作了下面这番描述：

我与米哈伊尔·科利佐夫相处过很长一段时间，当时他是《真理报》的主笔，更重要的是，他在那一段时间还是斯大林本人的好友、喉舌和直接代理人。他是一个粗壮的小个子犹太人……有一颗硕大的脑袋和一张我曾见过的表情最为丰富的脸。他的脸上经常露出一一种极其快乐的表情——和一种强烈的期待，尽管环境令人沮丧，他仍然期待你和其他所有人尽力使事情更加有趣。他说话尖酸刻薄[他曾经是莫斯科的讽刺周刊《鳄鱼》的编辑]，³²对其认为平庸无能甚或只是华而不实的人冷酷无情。不太了解他的人——尤其是那些非俄罗斯人——认为他的谈吐、他讲的辛辣尖刻的犹太笑话以及他对所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人和事的冷嘲热讽玩世不恭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在我看来，把一个对生活怀有如此炽热感情的人说成“玩世不恭”绝不会是恰当的。实际情况可能是，因为其含有或可能含有的某种意思，人们生硬地使用了这个词，但这样使用并不正确，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³³……当西班牙内战走向可怕的结局而支持共和派的欧洲各国人士真正变得玩世不恭、心灰意冷、对任何事情都失去信心和热情时，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渴望与科利佐夫交谈。……他是一个能够看出失败的真正原因的人，他想象得到半数高喊的口号是空话，许多著名的英雄不是滥竽充数就是江湖骗子，但这不会让他烦恼，也不会减弱他的精力和热情。……科利佐夫曾经让我担任《真理报》驻伦敦记者。这个职务我只担任了很短一段时间，因为没过不久就传出了他消失的消息。作为他个人任命的人，我只能不声不响地离职。我不知道科利佐夫哪一天在莫斯科出了事或者据说出了事。他的垮台——以及据人

们推测他被处决——发生在他位高权重的时候，因此，许多人听说之后无法相信。他们散布消息说，他被作为高级特工以另一个名字派往中国。他的许多朋友多年来始终对此深信不疑，一厢情愿地安抚自己悲伤的心情。他出事的消息使另一些朋友方寸大乱，他们变得心灰意冷，彻底变成玩世不恭的人。³⁴

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间以最高顾问的身份在西班牙工作的苏联高级军官中，只有一九三七年被召回苏联的别尔津和戈列夫是内战期间遭到清洗的。其他人是后来遭到清洗的。

据《苏联名人录》记载，别尔津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当年死于监禁中。³⁵不过，《苏联军事百科全书》（《Советская воен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³⁶和《苏联大百科全书》³⁷说他死于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尽管苏联方面的消息来源多年以后才证实他遭到了清洗，例如，伊利亚·爱伦堡在一九六三年、³⁸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的《共青团真理报》³⁹和一九七〇年苏联出版的《在西班牙作战的拉脱维亚人》⁴⁰曾经分别予以证实，但是，瓦尔特·克里维茨基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已声称他消失了。⁴¹鉴于现在已经知道，内务人民委员会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而且克里维茨基对苏联的秘密警察了如指掌，所以，他揭露的事情在今天看来具有不容否认的可信度，尽管人们还记得，当年由于共产党人为把他打成江湖骗子而开展的造势宣传，他的揭露被斥为谎言。实际上，克里维茨基揭露的事情为扬·别尔津和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遭到清洗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合理的解释，后者是胡安·内格林的财政事务顾问，与别尔津一样，他们似乎都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所作所为。克里维茨基写道：

别尔津将军担任红军军事情报局的负责人达十五年之久。他是拉脱维亚人，十六岁时领导一支游击队与沙皇进行革命斗争。……别尔津加入了托洛茨基指挥的红军并且晋升到红军总司令部里的一个重要的职位。身材魁梧、已生华发、少言寡语、足智多谋的别尔津被斯大林挑选出来组织并指挥[西班牙的]共和派军队。

斯大林在西班牙的首席政治代表是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他

是波兰血统。矮小粗壮的他看上去像个商人，名义上是苏联驻巴塞罗那的贸易代表。不过，斯塔舍夫斯基也曾在红军里供职。他辞去军队的职务接受了整顿苏联皮革工业的任务。他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斯大林立即派他去控制西班牙共和派的政治和财政。……

一九三七年三月，我看到别尔津将军写给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的一份秘密报告。[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叶若夫也看到了这份报告。……别尔津报告说，我国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⁴²的特工正以擅自干涉政府事务并且刺探政府情报的方式损害苏联在西班牙的威信。他最后要求，立即把[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特工负责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从西班牙召回。“别尔津完全正确。”我看完这份报告之后斯卢茨基对我说。斯卢茨基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外部门的负责人，他接着说，我们的人在西班牙的行为好像他们是在一个殖民地，甚至对待西班牙领导人都像殖民者对待土著一样。当我问他将对奥尔洛夫采取什么措施时，斯卢茨基说，那要由叶若夫决定。

311

叶若夫是当时正在进行的大清洗的总指挥，他本人就是把西班牙当作苏联的一个省看待的。另外，别尔津在苏联各地的一些红军战友已经被捕，因此，别尔津本人的性命也不比别人更安全。由于他的许多战友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抓获，他提交的任何报告都将被视为对克里姆林宫的质疑。

四月，斯塔舍夫斯基回到莫斯科当面向斯大林汇报西班牙的形势。尽管他是一名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一名僵化正统的共产党员，斯塔舍夫斯基也觉得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共和派控制区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像别尔津将军一样，他反对苏联人在西班牙领土上采用的专横的殖民主义方式。

斯塔舍夫斯基不喜欢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或“托洛茨基分子”，因此赞成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待他们的方式，但是他认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应当尊重西班牙合法的政治党派。他小心翼翼地暗示，斯大林也许可以改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西班牙政策。“大老板”假装同意他的看法，斯塔舍夫斯基相当得意地离开了克里姆林宫。⁴³

几个月后，斯塔舍夫斯基和别尔津两人被召回莫斯科，接着便在斯大林清洗中销声匿迹。克里维茨基说他们是一九三七年七月被召回的，他还说，当时人在巴黎的斯塔舍夫斯基的妻子告诉他，她丈夫和别尔津将军“曾路过巴黎，但只是在匆忙返回莫斯科的途中停下来换车”。克里维茨基还说：“处决红军的重要指挥官对别尔津是一种不祥之兆。与斯塔舍夫斯基一样，自从大约二十年前苏维埃革命爆发以来，他与被清洗的那些政委和将军关系密切。实际上，他在西班牙的功绩及其绝对服从的耿耿忠心一点用处也没有。”⁴⁴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克里维茨基明显地把别尔津和斯塔舍夫斯基的命运与他们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做法提出批评联系起来——至少部分联系起来；尽管一九三八年叛逃的奥尔洛夫到达美国之后肯定知道克里维茨基对他的指责；尽管人们还会记得，他在一九六八年回答斯坦利·佩恩提出的问题特意诋毁了克里维茨基，但是，在《斯大林罪行秘史》一书中，他对克里维茨基的指责只字不提。⁴⁵

至于戈列夫将军，爱伦堡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回到莫斯科以后得知了他的“命运”，⁴⁶而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担任苏联大使馆海军武官和西班牙共和国舰队顾问、人称科利亚的尼古拉·Г·库兹涅佐夫⁴⁷在其一九六六年出版于莫斯科的书中说，戈列夫受到了“镇压”，但是没有说明时间。⁴⁸“人们感兴趣地注意到，”奥尔洛夫写道，“戈列夫是在刚刚获得列宁勋章两天之后被捕的，在克里姆林宫专门为表彰他在西班牙内战中的杰出贡献而举行的一个仪式上，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加里宁向他颁发了这枚勋章。这个插曲表明，就连政治局委员也不知道谁被列入了死亡名单，处决的事情仅仅由两个人来决定：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叶若夫。”除了证实戈列夫和别尔津遭到逮捕并且未经审判被处决之外，奥尔洛夫还提供了部队指挥官科列夫和瓦卢亚的名字，他说，他们“帮助西班牙政府建立了共和国军队”，是一九三七年被从西班牙召回莫斯科之后处决的“许多苏联军官”中的两名。⁴⁹

除了一九三七年遭到清洗的别尔津和戈列夫，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间在西班牙作战的其他苏联高级军官大部分在内战结束两年后的一九四一年——德国当年入侵了苏联——被害，只有少数人得以幸免：沃罗诺夫在国防部担任过一些高级职务，包括炮兵科学院院长；⁵⁰库利克直到一九五〇

年还活着，⁵¹库兹涅佐夫成为苏联海军的主要指挥官并且担任过海军部第一副部长。⁵²据《苏联名人录》记载，施特恩和斯穆什克维奇当年十月死于监禁，普图欣则在六月被处决。⁵³同样为《苏联名人录》所记载，三个人均在死后恢复了名誉。

在一九七二年出版于莫斯科的一本书中，苏联著名飞机设计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就西班牙内战期间的苏联飞机发表了下面的评论，对斯穆什克维奇被清洗的原因给予了某种解释。“尽管具有高度的灵活性，我们的战斗机仍被证明没有德国战斗机速度快，尤其是在武器的口径和射程方面相形见绌。我们的SB型轰炸机没有战斗机护航不能飞行，而我们的战斗机不如德国战斗机，无法提供有效的掩护。无论共和国飞行员的英雄气概多么伟大，最终要看的还是作战物资的质量。出现的情况令人不快，甚至可以说令人感到莫名的意外，尤其是在它成为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飞行记录之后。然而情况的确是：我们肯定落在了我们的潜在敌人希特勒德国的后面。……斯大林对我们西班牙的挫折痛心疾首。于是，他把不满和愤怒发泄在那些不久前还被视为英雄并且正在享受他们当之无愧的荣誉的人身上。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斯穆什克维奇和雷恰戈夫，两人均两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后来都蒙冤而死。”⁵⁴

尽管斯穆什克维奇最终确实是被斯大林枪毙的，但是并不能肯定发生在西班牙的事情是其部分缘由，因为他在一九三七年回到莫斯科之后被任命为空军副参谋长，并于一九四〇年被提拔到空军监察长的职位上。直到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当二战期间苏军在前线一败涂地时，他才被处决。⁵⁵

同样是在一九四一年，参加西班牙内战的苏联坦克部队指挥官帕夫洛夫将军遭到清洗，用爱伦堡的话说就是，加入了“被自己人毫无道理地消灭了”的那些人的行列。⁵⁶

至于以各种顾问和专家的身份参加了西班牙内战的低级军官，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斯大林的清洗中死去了，但是，一些人多年后在苏联担任了高级职务，甚至获得显赫的地位。例如，П.巴托夫、И.叶廖缅科、М.亚库申、С.克里沃舍因、А.诺瓦克、Г.普罗科菲耶夫和А.罗季姆采夫成为各级将领，⁵⁷而Р.马利诺夫斯基和К.А.梅列茨科夫则被授予元帅军衔，马利

诺夫斯基成为苏联国防部长，梅列茨科夫成为红军总参谋长。⁵⁸

梅列茨科夫一九三六年十月来到马德里，一九三七年六月返回莫斯科。他在第一混成旅短暂地担任过恩里克·利斯特的顾问；然后成为国防部总参谋长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将军的顾问，在那期间他被称为彼得罗维奇；最后短期担任米亚哈的顾问。⁵⁹

另一名免遭清洗的低级军官是游击战专家马姆苏罗夫·尤季-乌马尔，在西班牙叫作哈伊或克桑季，他后来成为将军。“在马德里的放荡贵族旅馆，海明威遇见我们的士兵。”伊利亚·爱伦堡回忆说，“他喜欢哈伊这个勇敢冒失的人，哈伊经常深入敌后（他是高加索山区的人，可以轻松地冒充西班牙人）。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所讲的许多游击战的事情都是哈伊告诉他的。⁶⁰（幸运的是，哈伊至少活了下来。我后来再次遇见他，真是感到非常高兴。）”⁶¹

不是所有低级军官都这么幸运。作为德国军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德国共产党人古斯塔夫·雷格勒是著名作家和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他讲述了一九三七年二月他应科利佐夫邀请所参加的一次聚会，苏联代表团的官员在那里聚集一堂：⁶²

首先迎接我的是工程师戈尔金。他为我们安装了探照灯，那是我们对付夜间空袭的唯一手段——高射炮还得去国外买。现在他被召回苏联，这是他的欢送会。他脸上一直挂着满意的微笑。他的工作受到称许，因此，在莫斯科他将得到奖励。……

第二天，科利佐夫访问了阿尔甘达。他在指挥所的阳台上找到我。他指着旁边的探照灯问：“这是什么？”

“戈尔金的遗产。”我答道。……

他尖声笑着说：“遗产？你这是一语成谶！”

“回去的路上他会出事？”我问道。

“不。”科利佐夫说。……“但是到达之后他会出事。……他将在到达敖德萨时被捕。”

一时我给惊呆了。然后我问：

“你怎么知道的？是政治原因吗？”

“是的，”科利佐夫说，接着他继续说道，仿佛是在谈论另一个世界，“你为什么这么吃惊？因为昨天的欢送会？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实际上，这是我们为他举办欢送会的原因。……把犯人带上断头台之前，法国人给他一杯朗姆酒。……这几天我们给他喝香槟。”

“我要进入阵地了。”我说，“我感到很不舒服。”

“一个欧洲人不太容易适应亚洲人的习惯。”科利佐夫说。

314 “我更喜欢美国人的习惯。”我说，“我要去迎接海明威[他刚来到西班牙，正在前线走访]。……在他身边人们可以更自由地呼吸，如果你允许我这么说的话。”

“我要和你一起去。”科利佐夫说，……“大概我也需要呼吸一下西方的民主空气！”

（我认为，导致他死在斯大林的监狱里的是他的人性。）⁶³

有必要在这里补充说一下雷格勒向海明威描述的下面这件事，两人因此成为朋友：在埃尔·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附近的一次战斗中，朦胧中看到到处都是敌军的两名志愿军士兵惊慌失措，大声叫喊要其他人快跑。

我抓住他们把他们带到指挥所。……我决定送他们去一个疗养院，我向[国际纵队政委]马蒂报告了此事。他立即回复说他知道一个合适的地方，在埃纳雷斯堡附近。他们被带到了那里，结果，两天之前我听说，他们在那个城堡被一支苏联行刑队枪毙了。“混账！”海明威说着向地上吐了一口痰。这个动作使我成为他的朋友，后来，我不失时机地表明了这一点。我告诉他我比别人先看到的行动和危机的内幕。我让他知道我们的损失，只要可能让他提前得到消息，我断定他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向他提供与共产党有关的机密材料，尽管他鄙视马蒂那一类共产党人，但他敬重共产党，因为它比其他党派更积极地投入战斗。后来他把我提供的材料用在了《丧钟为谁而鸣》里，结果，无数读者从一部虚构作品冷峻的文字中了解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不会听说的事情。他以猎人对偷猎者的憎恨描写了暗中监视症，这种苏联梅毒愚蠢地横行，无羞无耻，杀气腾腾。⁶⁴

尽管不知有多少各级苏联军官从西班牙返回之后遇害，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仍然像它的德国对手一样了解西班牙内战。实际上，红军总司令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一本关于西班牙经验的书涉及“几个从红军为行动做准备的实用角度来看非常重要的关键问题”。⁶⁵然而不应忽视的是，就在西班牙内战使得苏联可以在战场上试验新武器和新战术的同时，它也成为政治方面的新手段和新策略的试验场。反对苏联的西班牙政策的左派人士胡利安·戈尔金写道：“人们经常说，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预演；人们不清楚的是，它还是‘人民民主政体’的第一个试验场，我们已经亲眼看到，经过改善的这种政体战后在十几个国家实行。用来把这些国家变成苏联卫星国的那些人员和手段在西班牙进行了考核和测试。由于这个原因，西班牙经验曾经而且将继续具有历史意义和普遍意义。”⁶⁶

正如苏联官方的《共产国际简史》（《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Крат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所指出的那样：“西班牙的事态发展表明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新的民主政体人民阵线是将反法西斯斗争与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终极目标[即共产党人掌握政权]联系起来的纽带。对于认识了解革命在即将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之时所应采取的方式方法，西班牙经验的意义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充分理解和高度评价。”⁶⁷

尽管执行苏联的西班牙政策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是在未经拉尔戈·卡瓦列罗同意的情况下到来的，但是，主要苏联军事顾问的到来却不能说没有得到卡瓦列罗的同意。实际上，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写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那封信——本书曾经引述过其中的一段内容——强调说，派遣军事顾问去西班牙是后者通过苏联大使马塞尔·罗森堡“反复要求”的结果。而且，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的回信中，拉尔戈·卡瓦列罗提到了“我们要求”的那些同志，承认他们正在作出“巨大的努力”，“以真正的情感和非凡的勇气履行他们的职责”。⁶⁸

然而，尽管双方进行了这种貌似友好的书信往来，尽管斯大林向拉尔戈·卡瓦列罗保证，军事顾问已被“明确要求不得无视这样的事实，……作为在西班牙的外国人，苏联同志只有严格履行顾问的职责才能真正发挥

作用”，⁶⁹苏联军官必定行使的权力最终激怒了这位国防部长，并且解释了后来他谴责“不负责任的外国干涉”的原因。

由于米亚哈对苏联人事实上的依赖，他与拉尔戈·卡瓦列罗之间很快出现了意见分歧，这可以从国防部长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发给将军的一份电报以及将军的回电中看出来。国防部长提醒米亚哈，他应当服从的只是政府发布的命令；米亚哈答复说，他注意到了拉尔戈·卡瓦列罗认为有必要提醒他记住纪律和服从的最基本原则这一事实，他说，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他从未忘记过这一原则，然后，他要求让某个值得拉尔戈·卡瓦列罗信任的人接替他。⁷⁰由于已经获得的声望，米亚哈料到国防部长肯定不会接受他的要求。结果不出他所料。

苏联军事顾问的行动实际上不受国防部和空军部的约束这一点得到了西班牙空军司令、共产党员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⁷¹和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政治密友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以及国防部长本人的证实。此外，国防部总参谋部军事行动负责人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证实：“我可以明确地说，空军和坦克部队整个内战期间均不在国防部的控制下，因此也不在总参谋部的控制下。国防部长及其参谋人员甚至不知道飞机坦克的数量和种类，只知道用于实际军事行动的那些飞机坦克的情况。同样，国防部长及其参谋人员也不了解战局的发展，甚至不知道暗中存在着许多由‘友好国家的顾问’以及得到他们完全信任的某些空军负责人秘密控制的[飞机场]。”⁷²

316

比苏联顾问人员自行其是更让拉尔戈·卡瓦列罗烦恼的也许是，共产党在军队的势力发展壮大，尤其是在中部地区。苏联军官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分配来自苏联的武器补给时对共产党人的明显优待，⁷³国际纵队的勇猛无畏，国际纵队和西班牙共产党的部队胜人一筹的高效率，⁷⁴所有这些均有助于增强共产党的影响力，从而将数量可观的正规军军官吸引到它的周围。

尽管西班牙一些反对共产党的人低估了国际纵队作为西班牙军队的一个榜样所起作用的重要性，⁷⁵它仍然得到充分的承认。例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光明报》写道：“因几百年来的压迫和愚昧而死气沉沉的我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这是社会等级制度表明它们完全没有组织

能力的结果——必须做出与这些来自其他国家的同志们一样的超乎常人的努力。智力在学习中得到提高。国际纵队的民兵们有机会在青少年时期培养自己的智力。另一方面，我国的民众却没有这种机会。但是，在我们胜利以后，我们将有这种机会，我们的孩子甚至将有更多的机会。我们正在为此而战；我们可以为此而死。”⁷⁶

“如今，”伦敦《工人日报》派到西班牙的记者写道，“忠于共和国的将军大部分都要求加入共产党，更不用说年轻的共和派军官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迹象，它表明了共产党作战行动的有效性。”⁷⁷另外，社会党人历史学家、支持胡安·内格林的安东尼奥·拉莫斯·奥利维拉写道：“从不翻阅马克思主义宣传品的军官和官员成了共产党员，一些人因为私心，另一些人因为道德缺陷，还有一些人则为被该组织激起的热情所驱使。”⁷⁸

在加入共产党的高级军官中，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主席何塞·米亚哈将军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样扮演重要角色的还有随和、衰老的中路军司令部波萨斯将军，他的苏联顾问是后来成为元帅的库利克将军，在西班牙化名库珀尔。在前西共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看来，库利克“粗俗但不讨人嫌”，“高大强壮得令人生畏，让人想到北极熊”。⁷⁹在恩里克·卡斯特罗看来，他“高大粗犷。……他的光头和那张冷酷的大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过，给人印象更深的是他的大喊大叫和他的手，他的两只大手摆动起来就像拉曼查^①风车的帆一样。他的参谋人员都害怕他”。⁸⁰相比之下，衰老的波萨斯冷漠而且虚弱。他不是咄咄逼人的库利克的对手，情愿让这位苏联将军当家做主，从不去为调整和平时期的生活节奏以适应无情战争的紧急状态费心劳神。“上午要到很晚才能把他叫醒。”库利克将军的副官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马利诺夫斯基后来成为苏联元帅和国防部长，他的骨灰现在埋在克里姆林宫的围墙下面⁸¹——回忆说，“他用几个小时梳洗和早餐。饭后听取参谋长汇报。他的参谋长是一名上校，像他一样衰老。他们寒暄几句之后汇报就结束了。出于对事实的尊重，我必须说，他坚信自己绝对忠于共和派，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重要问题。不过，旧军队例行公事的传统严重束缚着他。”⁸²

317

^① 拉曼查（La Mancha）是西班牙中部裸露的高原，海拔六百一十米。这个地区几乎完全保持着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珂德》所描述的景观，许多村庄与小说中的故事有关。

一九三六年二月的大选之后，波萨斯被任命为国民卫队监察长，由于他努力使这支部队效忠于共和国，从而招致军队中右翼将领的敌视。⁸³内战爆发之际，他成为希拉尔政府的内政部长，极力主张把人民武装起来。⁸⁴一九三六年十月担任中路军司令后，他悄悄加入了共产党，⁸⁵接着，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当他指挥东部地区的军队时，他又加入了共产党控制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PSUC）。⁸⁶不过，尽管他是共产党员，但他只是一个具有宣传价值的名人，在党的核心圈子里丝毫没有影响力。

许多军官加入共产党或是受到前面列举的各种因素的影响，或是因为他们知道党员的身份可以保证他们的部队得到苏联作战物资的补给，⁸⁷而另一些军官却是因为共产党的温和宣传改变了信仰。真心支持共和派的职业军官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写道：

不可否认的是，共产党人是宣传艺术的大师，所以他们能够蒙骗大家。他们的宣传主要是声称他们的唯一目标是打败佛朗哥进而恢复共和国的法律。所有共产党领导人均明确表示忠于共和国政权和宪法，热情之花尤其高调，他们宣称，他们正在努力恢复宪法的尊严。他们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组建一支讲求效率、遵守纪律的军队，它将取代全国劳工联合会纪律涣散的民兵武装。他们适时地喊出这个口号，以致蒙骗了所有人。一些职业军人落入圈套，结果，由于共产党的宣传所引起的狂热，不少人轻率地加入了共产党。

至于除了赢得这场战争别无所求的我本人，我认为，共产党人冠冕堂皇的目标是赢得战争的必要步骤。不幸的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们通过宣传只是为了获得军队的控制权，以便利用军队谋取私利。相对于他们的私利，与佛朗哥作战是次要的。这就是促使我反对他们的原因。⁸⁸

一些军官完全是因为个人动机而被共产党所吸引，尤其是战前无党派的那些军官。

“七月十八日之前无党派的那些忠于共和国的职业军队领导人几乎没有人不屈从于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势力，”担任共和国海军第一政委的社会

党温和派人士布鲁诺·阿隆索写道，“有些人因为倾向性，另一些人因为意志薄弱，许多人则是因为担心没有政治背景将会导致出现一些针对他们的无法补救的蛮横行为。”⁸⁹

“让我提醒你一下，”共产党员安东尼奥·科登告诫国防部的一位军官同事说，“我们生活在陌生的时代，人毫无道理地遭到杀害。我郑重地建议你加入共产党。它需要你，你也需要它。”⁹⁰

尽管支持共和派的大部分记者和作家不了解共产党人控制人民军的目的，或者毋宁说他们担心为敌人的宣传提供材料，但是，约翰·多斯·帕索斯却直截了当地描述了他感觉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写道：“西班牙的工人阶级以一种将在欧洲历史令人血脉贲张的片断中占有一席之地之波澜壮阔的英雄气概保卫自己。此外，在后方，一场几乎像战争一样激烈的斗争已经在马克思主义的极权国家思想与无政府主义的个人自由思想之间进行。随着军队的日常需要成为比工人阶级反抗压迫的激烈斗争更重要的头等大事，共产党渐渐占据上风成为胜利的组织者。在这个高效无情的权力机器面前，具有个人自由和地方自治观念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步步退却。……现在无法回答的问题是，西班牙人民是否愿意为建立这支精锐的新军付出过高的代价，共产党……会不会只是变成一部更庞大的权力机器，这意味着它将是一部庞大的镇压机器。”⁹¹

一九三七年初，多斯·帕索斯访问西班牙调查他的老朋友何塞·罗夫莱斯的失踪，结果发现后者被苏联人“在内战期间除掉了”。⁹²尽管内心深受困扰，他仍然顾虑重重地告诉了认识的所有人。多年后他表现了自己的进退两难，他写道：“如何把它说出来呢？你并不想帮助敌人。……同时你想说出真相。有些事情你感到可疑但是你还不能确定。我对自己说，只描述那些发生的事情。表面发生的事情真实地向你暗示，可能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私底下起着作用。……我所看见的、我现在知道的是，气息奄奄的自由共和国正在被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的前哨阵地所取代。”⁹³

如果军队各个阶层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壮大最终使国防部长失去了耐心的话，那么，更让拉尔戈·卡瓦列罗这个神经质的人——即使对待自己的同事他也是性情固执，脾气暴躁，而且据他的副部长阿森西奥将军说，他希望亲自指挥掌控一切⁹⁴——不能容忍的是他的对手的胡搅蛮缠。他用强硬

抵挡自己经常承受的压力，这种强硬导致他与苏联将军们以及苏联大使马塞尔·罗森堡屡次发生激烈的冲突。⁹⁵

“与其说[罗森堡]是一名大使，”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密友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认为，“他表现得更像苏联派到西班牙的总督。他天天来拉尔戈·卡瓦列罗这里巡视，有时由苏联高级文武官员陪同。巡视持续几个小时，在巡视的过程中，罗森堡总是对西班牙的政府首脑指手画脚，试图教给他怎样赢得这场战争。他的建议——实际上是命令——主要是针对军官的。应当解除这个那个将军和上校的职务，同时委派另一些人接替他们。他推荐这些人不是根据他们作为军官的能力，而是根据他们所属的政治派别及其对于共产党人的顺从程度。”⁹⁶

社会党左派议员希内斯·甘加写道：“[罗森堡的]兜里总是装着一叠写有以下或者类似内容的便条：‘应当将某师师长X撤职并且用Z接替他’；‘某部雇员A没有履行职责。应当用B取代他’；‘必须把M抓起来，以叛国罪审判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⁹⁷

据阿拉基斯塔因说，罗森堡每天去拉尔戈·卡瓦列罗那里巡视时最有可能陪同他的苏联高级官员是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毫无疑问，奥尔洛夫严密监视着苏联高级外交官的态度言行，由于他的指挥部设在苏联大使馆里，这个任务很容易完成。因此，可以假定，如果罗森堡不竭尽全力推行苏联的政策或者胆敢像克里维茨基证明别尔津将军和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所做的那样批评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办事方法，那么，他的反常行为就会立即被报告给莫斯科。这也许解释了奥尔洛夫为什么在他的《斯大林罪行秘史》一书或者流亡美国三十五年间的任何书面口头证词中无论如何也避而不谈罗森堡、斯塔舍夫斯基以及一九三七年二月接替罗森堡的列昂·盖基斯被召回莫斯科的事情——他们全都神秘地消失了，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与这三个人有关的苏联方面的原始资料我只找到了爱伦堡的《战争前夕，1933—1941》。爱伦堡在这本书里说，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回到莫斯科以后得知了罗森堡的“命运”。⁹⁸至于斯塔舍夫斯基和盖基斯，阿萨尼亚总统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提到，内格林把西班牙驻莫斯科大使马塞利诺·帕斯库亚当天发来的电报读给他听，大使说，他不知道盖基斯的“情况”，也不知道“另一个与商业和财政问题

有关的重要人物[显然指的是斯塔舍夫斯基]”的情况。⁹⁹阿萨尼亚八月六日写道：“仍然不知道……回国休假的盖基斯的下落。”¹⁰⁰十九年后，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告诉维托里奥·维达利，盖基斯“仍然活着并且已经‘恢复了名誉’”。¹⁰¹除了这一段简短的内容，没有发现其他任何关于盖基斯的信息。

奥尔洛夫对这些即使不是天天接触也是经常打交道的高级官员的命运讳莫如深必然引起两点疑问。他为什么认为他们被莫斯科召回而且最终消失并不重要甚至不值一提呢？他可能对他们被召回负有直接责任因而对他们的消失负有间接责任吗？

无论罗森堡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办事方法态度如何，至少从表面上看，在良心许可的情况下，他一直竭尽全力推行苏联的政策。当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位文雅而且显然敏感的外交官¹⁰²内心深处对斯大林及其派到西班牙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负责人所实施的政策的想法，不过，尽管如此，他与拉尔戈·卡瓦列罗冲突的激烈程度只有卡瓦列罗与共产党人内阁部长的冲突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作为政府成员的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肯定被当作一个重要的见证人，据他说，两位共产党人部长与总理之间形成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紧张状态”。“非常暴力的场面出现在内阁会议上，此外，拉尔戈·卡瓦列罗还与苏联大使罗森堡先生激烈争吵。我不知道究竟是罗森堡先生的态度反映了共产党人部长的愤怒还是共产党人部长的愤怒反映了苏联大使的态度。我知道的是……苏联针对总理——或者更应当说是为反对总理——所采取的外交行动和来自共产党人部长的压力总是同时出现，而且目的相同。”¹⁰³

在与苏联人及其西班牙帮手的冲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面对自己的追随者被夺走，面对社会党内温和派固有的敌意，面对自由共和派无声的怨恨，拉尔戈·卡瓦列罗希望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支持他与顽强的对手抗衡。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谣言开始流传，说他打算组成一个“工会政府”，只包括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三月三日劳动者总工会的喉舌《光明报》所刊登的一则简短的报道为这种谣言添枝加叶，报道说，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卡瓦列罗是执委会书记）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

会正在“频繁举行会谈”，因此，“尽管政治领域的混乱无序愈演愈烈，工会方面正在为一项解决方案奠定基础，它将迅速而彻底地改变现状”。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报纸所刊登的乐观报道进一步为谣言火上浇油，两个曾为竞争对手的工会组织的领导人即将结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同盟，这将解决根本问题。¹⁰⁴虽然拉尔戈·卡瓦列罗可能有过把工会政府作为一种政治求生手段的转瞬即逝的想法，但是，这个谣传中的计划并没有产生什么结果。在三月初举行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它遭到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的激烈谴责。“[一个]工会政府……将意味着人民阵线的毁灭并且破坏了西班牙人民的团结。”迪亚斯警告说，“……[任何]企图破坏这种团结的人将被我们英勇的战士视为我们事业的敌人。”¹⁰⁵

321

尽管两个工会组织似乎并没有认真地讨论组成一个工会政府的想法，不过，拉尔戈·卡瓦列罗与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之间显然出现了暂时的修好。因此建立起来的新型关系是使这位社会党领导人倾向于对他以前的对手采取和解政策的一个有力的因素。尤其是，这阻止了他按照共产党的迫切要求对正规军彻底实行军事化。他从来没有特别喜欢过这支军队，他知道，自由主义运动对这支军队深恶痛绝。

注释：

- 1 斯坦利·温特劳布，《最后的伟大事业：知识分子与西班牙内战》，第235页；另请参阅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412和427页。
- 2 费希尔，《人与政治》，第412和427页。二十八年后，费希尔在一九六九年重申了这一看法（路易斯·费希尔，《苏联从和平走向战争之路：苏联外交关系，1917—1941》，第278页）。
- 3 与“爱抬杠的卡洛斯”进行的私人谈话。
- 4 值得注意的是，科利佐夫日记以其西班牙化名“德尔巴勃罗”多次提到戈列夫的坦克部队指挥官帕夫洛夫将军（《西班牙日记》，载一九三八年六月号《新世界》，第53、78—79和87页）——显然，直到一九四一年他还没有被清洗——却没有提到戈列夫，就连用化名也没有。斯大林死后，当科利佐夫日记作为《科利佐夫文集》的第三卷以书籍的形式于一九五七年出版时，它仍然没有关于戈列夫的内容。不过，苏联书籍直到六十年代才透露了许多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苏联军官的真实姓名。
- 5 见《西班牙日记》，载一九三八年六月号《新世界》，第33—34和37页。
- 6 伊利亚·爱伦堡，《战争前夕，1933—1941》，第146页。对戈列夫的其他描述，见阿

- 图罗·巴雷亚《制造反叛》，第628—630页；恩里克·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453—454页；费希尔，《人与政治》，第363、395和398页；奥瓦季·萨维奇（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塔斯社驻西班牙记者），《在西班牙的两年：1937—1939》，第138页。
- 7 比森特·罗霍，《这就是马德里保卫战》，第31和214—215页。据罗霍说，戈列夫是一名上校，但在离开西班牙之前晋升为将军（同上，第214页）。不过，两位苏联军官（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马德里的H.沃罗诺夫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或一九三七年一月到达的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在到达时称戈列夫为准将（《在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帜下，1936—1939：苏联志愿参战人员回忆录》，第72和146页）。
- 8 《在西班牙作战的拉脱维亚人，1936—1939：回忆与文献》，第516页；爱伦堡，《战争前夕》，第152和176页；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斯大林罪行秘史》，第235页。实在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通常无所不知的科利佐夫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底与路易斯·费希尔交谈时竟然没有准确地认出苏联首席军事顾问扬·K.别尔津将军。“一天晚上，”费希尔写道，“米哈伊尔·科利佐夫请我在豪华的马德里王宫酒店苏联人专用餐厅吃饭。那里少有人地坐满了人。苏联军事人员到达了——他们全都穿着莫斯科生产的不太合身的蓝色哔叽制服。‘猜一猜，’科利佐夫说，‘谁这里是最大的官儿？’我指了指一个满头灰发的瘦高个。‘不，’科利佐夫纠正我，‘这是伊安[扬]·别尔津将军。那一个才是领头的将军。’说着，他向一个面色红润、慈眉善目、满头银发的矮个子的方向点头示意。我后来在西班牙总参谋部的指挥所遇见了这位‘格里申’将军。”（《苏联从和平走向战争之路》，第277—278页）
- 9 例如，皮埃尔·布鲁埃和埃米尔·特米姆，《革命与西班牙内战》，第346页，注释8；罗伯特·科洛德尼，《为马德里而战：西班牙内战的重要史诗，1936—1937》，第165页；加布里埃尔·杰克逊，《西班牙共和国与内战，1931—1939》，第319页。
- 10 《在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帜下》，第145—146页（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文章，其中提到戈列夫的双重身份）；同上，第74—75页（戈列夫和别尔津的照片，说明文字是“苏联驻西班牙大使馆武官”和“首席军事顾问”）；尼古拉·Г.库兹涅佐夫（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间的苏联大使馆海军武官兼西班牙共和国舰队顾问），《在遥远的子午线》，第232页和《在西班牙作战的拉脱维亚人》，第407页。实际上，苏联叛逃者瓦尔特·克里维茨基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已揭露别尔津是苏联派到西班牙的首席军事顾问（见克里维茨基《在斯大林的情报部门工作》，第96页），但是，共产党人将其斥为江湖骗子在当时削弱了其证言的可信度。更多关于别尔津的情况，见《在西班牙作战的拉脱维亚人》，第7、407—410、422、426和516—517页；戴维·J.达林，《苏联的间谍活动》，第4、5、16和46—47页。
- 11 达林，《苏联的间谍活动》，第4—5页。《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一九七六年版）第一卷和《苏联大百科全书》（一九七九年）第三版第三卷显示，别尔津一九二一年四月开始供职于苏联军事情报部门，一九二四至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七年七月至十一月为该部门负责人。两部百科全书在这两个新的版本中才第一次显示，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他是西班牙政府的首席军事顾问。更多关于别尔津的情况，见一九七九年二月二日《自由探索广播》，第3和15页。关于苏联总参谋部情报局的情况，见约翰·巴伦《克格勃》，第343—345页；理查德·迪肯，《俄国谍报史》，第223—225页；彼得·德里亚宾，《可怕的监视者》，第215页和《麦格劳-希尔俄国和苏联百科全书》，第245—246页。
- 12 见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的П.巴托夫将军为《我无所畏惧》（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82）所写的书评。
- 13 惠特克·钱伯斯，《见证人》，第398—399页。
- 14 见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456—458页；卡斯特罗，《我对莫斯科失去信心》，第124页；卡洛·彭基耶纳蒂（国际纵队加里波第旅旅长），《国际纵队在西班牙

- 牙：“契卡”共产党人的罪行》，第34页；《在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帜下》，第146页。
- 15 《在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帜下》，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文章，第161页。
 - 16 同上，沃罗诺夫的文章，第74页。
 - 17 同上，Г.普罗科菲耶夫空军少将的文章，第537页。更多关于斯穆什克维奇及其继任者E.C.普图欣的情况，见德米特里·雅科夫列维奇·西尔曼诺维奇《伟大的人生发展道路：关于斯穆什克维奇家族两位苏联英雄的口述资料和回忆》，第174、178、262和282—283页。
 - 18 他们在战后对我讲了这些理由。同样的理由还出现在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回忆录中，见《回忆录二：共和国与西班牙内战》，第315和317页。他告诉我他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加入的共产党。关于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加入共产党的情况，见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回忆录二》，第330页和刊登在一九五〇年二月九日（巴黎）《工人世界报》上的讣告。一九三八年九月，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被胡安·内格林从上校提拔为将军（见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四日《共和国官方公报》和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五日《红色阵线报》刊登的祝贺文章）。
 - 19 恩斯特·利斯特，《我们的战争：对西班牙人民民族革命战争史的贡献，1936—1939》，第100页。
 - 20 《在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帜下》，第537页。
 - 21 西尔曼诺维奇，《伟大的人生发展道路》，第537页。
 - 22 爱伦堡，《战争前夕》，第152页；《苏联名人录》，第512页；路易斯·费希尔发表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三日《民族》上的文章。
 - 23 尼基塔·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第31页。
 - 24 爱伦堡，《战争前夕》，第152页。
 - 25 费希尔，《苏联从和平走向战争之路》，第300页。另请参阅罗伯特·康奎斯特《极端恐怖时期》，第230页。
 - 26 爱伦堡，《战争前夕》，第166、190和202页。
 - 27 帕特里夏·科伯恩，《工作的年代》，第208页。帕特里夏的丈夫克劳德是科利佐夫最好的朋友之一（同上）。
 - 28 《苏联名人录》，第290页。
 - 29 《苏联作家》，第597页。与《苏联名人录》记载的一九四二年四月四日不同，叶菲莫夫说他哥哥死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四日。
 - 30 《苏维埃俄罗斯散文作家》，第二卷，第484页。
 - 31 费希尔，《人与政治》，第494—495页。曾经受到斯大林信任的科利佐夫失宠的部分原因可能是他的傲慢自信。最终被召回莫斯科前，一九三七年，他在一次觐见斯大林之后亲口告诉他的弟弟鲍里斯·叶菲莫夫：“‘当我准备离开时，……你知道我在头头儿的目光里发现了什么？’‘什么？’‘我发现他非常紧张。’”觐见当中发生了下面这一段“奇怪的对话”：“‘你有一把左轮手枪，科利佐夫同志？’……‘是的，我有，斯大林同志。’我惊讶地回答道。‘但你不是准备用它自杀的吧？’‘当然不是，’我更加惊讶地回答道，‘我没有打算这样做。’‘噢，这很好！’他说，‘好极了！’”（H.别利亚耶夫编，《真正的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回忆》，第66页[叶菲莫夫的文章]）感谢罗伯特·康奎斯特让我注意到这本珍贵的书。
 - 32 同上，第302页。
 - 33 （克劳德的妻子）帕特里夏·科伯恩回忆说：“[克劳德]知道，科利佐夫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带有一种满不在乎的傲慢。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种不顾后果、辛辣尖刻的幽默感。他甚至从不打算克制他对讽刺的热爱。结果，正像克劳德在西班牙看到的那样，这些性格

几乎每个星期都会给他带来一批新的敌人。克劳德认为，在一九三九年莫斯科那种环境里，这些性格本身足以使一个人被枪毙。”（帕特里夏·科伯恩，《工作的年代》，第262页）

- 34 克劳德·科伯恩，《不和谐的鼓吹》，第304—305页。更多关于科利佐夫的资料，见海因茨·霍夫曼将军的《曼海姆，马德里，莫斯科》（在东德出版），第378—379页；A.鲁巴什金，《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和《年轻的列宁格勒》，第386—392页，关于鲁巴什金对科利佐夫日记的评论，他在评论中指出，科利佐夫日记经常提到的墨西哥共产党人米格尔·马丁内斯实际上是科利佐夫。
- 35 《苏联名人录》，第67页。据同一本书记载，他在死后恢复名誉。
- 36 《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第一卷（1976）。
- 37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第三卷（1970）。
- 38 爱伦堡，《战争前夕》，第176和190页。
- 39 感谢罗伯特·康奎斯特的《极端恐怖时期》让我注意到这一期《共青团真理报》，见第231页。在C.戈利亚科夫和B.波尼佐夫斯基所写的一篇文章中，作者简单地写道：“我们注意到，今天是扬·K.别尔津的七十四岁生日，二十七年前[一九三七年]，贝利亚的手下结束了他的生命。”
- 40 《在西班牙作战的拉脱维亚人》，第410页。
- 41 克里维茨基，《在斯大林的情报部门工作》，第114页。
- 42 尽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职能已于一九三四年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通常仍有一些人把内务人民委员部称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或国家政治保卫局。
- 43 克里维茨基，《在斯大林的情报部门工作》，第96—97和106—107页。
- 44 同上，第113—114页。另请参阅伊丽莎白·K.波列茨基《我们自己的人》，第211—213页。
- 45 应当把被暗杀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伊格纳斯·赖斯的妻子伊丽莎白·波列茨基的下列说法记录在案：“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负责人奥尔洛夫-尼科利斯基的任务是，保证莫斯科希望召回的人活着回到那里去。苏联船只停泊在巴塞罗那的港口待命，把需要的人带回莫斯科，把不需要的人带到海上去干掉。”（波列茨基，《我们自己的人》，第193页）
- 46 爱伦堡，《战争前夕》，第190页。
- 47 费希尔，《人与政治》，第392页。
- 48 库兹涅佐夫，《在遥远的子午线》，第32页。
- 49 奥尔洛夫，《斯大林罪行秘史》，第235—236页。在我能够找到的苏联方面的原始资料中，只有萨维奇简略地提到了这两名军官中的一位，他说，一九三七年瓦卢亚和彼得罗维奇是马德里前线的“主要军事顾问”（见萨维奇《在西班牙的两年》，第136页）。曼努埃尔·施瓦茨曼是一名罗马尼亚志愿人员，在马德里前线苏联人所指挥的防空部队中作战，一九四〇年他告诉我，瓦卢亚上校负责组织了一九三七年三月进行的瓜达拉哈拉反击战，结果击退了支援佛朗哥将军的意大利军队。
- 50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第五卷（1971）；《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第二卷（1976）；休厄林·比亚勒编，《斯大林和他的将领们：苏联二战军事回忆录》，第639页。
- 51 《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第四卷（1977）记载，库利克生于一八九〇年，死于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在一九四〇年晋升为元帅，一九四二年三月为少将军衔[可能被降级了]，一九五七年[斯大林死后四年]恢复元帅军衔。更多关于库利克的情况，见比亚勒编的《斯大林和他的将领们》，第633页。
- 52 《苏联著名人物》，第341页；《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第十三卷（1973）；比亚勒编，《斯大林和他的将领们》，第633—634页。
- 53 《苏联名人录》，第512、520和466页。《苏联大百科全书》记载的施特恩和斯穆什克维奇的死亡日期是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分别见第三版，第二十九卷，1978和第二十三

- 卷，1976）。据路易斯·费希尔说，协助指挥了一九三八年夏天胜利的埃布罗河攻势的施特恩的继任者马克西莫夫将军回到苏联后被捕（见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三日《民族》）。
- 54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毕生的目标》，第79页。
- 55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十三卷，1976）和《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第七卷，1979）均记载了斯穆什克维奇的升职和死亡日期，但是没有说他是怎么死的。
- 56 爱伦堡，《战争前夕》，第176页。爱伦堡没有提到帕夫洛夫的死亡日期，不过，《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第十九卷，1975）和《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第六卷，1978）均记载为一九四一年七月，但是没有说明他的死因。比亚勒说他被“控犯有叛国罪，然后被枪毙”，见《斯大林和他的将领们》，第635页。
- 57 《在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帜下》，第275、313、446—447、483、485和503页。另请参阅《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关于巴托夫和罗季姆采夫的内容，分别见第三卷（1970）和第二十二卷（1975）。
- 58 关于马利诺夫斯基和梅列茨科夫的情况，见《苏联名人录》，第365页；《苏联著名人物》，第403页；比亚勒编，《斯大林和他的将领们》，第634—635页；《苏联大百科全书》，第十五和十六卷（1974）；《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第五卷（1978）。
- 59 见梅列茨科夫回忆录《在人民军队中》，第130、136、141、143和166页。另请参阅П.Я.叶戈罗夫《梅列茨科夫元帅》，第45—52页。
- 60 据多年后采访马姆苏罗夫的苏联记者叶戈尔·雅科夫列夫说，马姆苏罗夫告诉这位记者，在科利佐夫的极力劝说下，他用了三天时间给海明威讲他在西班牙活动的情况，以便后者创作小说《丧钟为谁而鸣》时使用（《来自五个国家的五个故事》，见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六日《东方来信》）。同一期《东方来信》转载了这次采访专门谈到海明威的全部内容，见第10—13页。
- 61 爱伦堡，《战争前夕》，第154页。另请参阅《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二卷，第174页和注释2，该书写道：“[率领其人马从阿拉贡前线赶来增援马德里保卫战的著名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到达马德里后要求给他派一名苏联顾问。国防部同意了他的要求，派去了来自高加索的军官马姆苏罗夫·尤季-乌马尔。”（在西班牙作战的苏联军官）帕维尔·巴托夫多年后写道：“在西班牙，我们可爱的克桑季（他在那里叫这个名字）帮助共和国的保卫者建立了谍报和反谍报部门。遗憾的是，还不到公开谈论他的活动的时候。不过，时候一到，人们将会为我们当中还有克桑季这样的人物感到惊讶和高兴。”（帕维尔·巴托夫，《在战争和战斗中》，第15页）感谢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六日的《东方来信》让我注意到这本有用的书。同一期《东方来信》转载了叶戈尔·雅科夫列夫对马姆苏罗夫的采访（见本章注释60），其中谈到杜鲁蒂之死。在采访中，马姆苏罗夫“多次”强调自己的清白并且声称杜鲁蒂是被“他们”暗杀的，“他们”指的“肯定是无政府主义者”。在马德里出版多年的《东方来信》是加夫列尔·阿米亚马主编的，西班牙内战期间，当时还是个孩子的他被送到苏联，但是他在二战以后设法离开了那个国家。
- 62 雷格勒提到了苏联代表团团长马克西莫维奇的名字。这可能是一个化名，因为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材料提到马克西莫维奇一九三七年二月在西班牙。有一个马克西莫夫将军接替施特恩（格里戈罗维奇）担任苏联首席军事顾问（见费希尔《人与政治》，第543页），但要等到一九三八年。
- 63 古斯塔夫·雷格勒，《密涅瓦的鸱鸃：古斯塔夫·雷格勒自传》，第294—295页。
- 64 同上，第292—293页。正如记者菲利普·奈特利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一名战地记者，海明威在报道中只字不提他知道马蒂有监视癖而且处决共和派士兵。“最终，他在《丧钟为谁而鸣》中描写了所有这些事情，但是，读者有权要求当时就从战地记者那里知道他知道的全部消息，而不是从战争结束以后出版的一本虚构作品中了解它们。实际上，因为他对西

- 班牙人民的同情，因为他对共和派事业的奉献，作为一名作家，海明威利用这场战争获得了新生。正如贝克[海明威的传记作者卡洛斯·贝克]所说，‘由于不愿把最好的素材用于他为报纸采写的报道，他积累保留了大量经验和资料，他认为它们……非常宝贵’。对于一位小说家，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一位战地记者，这是不可原谅的。”（菲利普·奈特利，《第一受害者》，第213—214页）
- 65 苏联红军总司令部，《西班牙共和国军队中的部队指挥和总部运行》，第125页。
- 66 胡利安·戈尔金的文章，见珍妮·J.柯克帕特里克编的《骗术：共产主义全球策略的研究》，第196页。内战期间访问过西班牙的约翰·多斯·帕索斯多年以后写道：“正是在西班牙的运作产生了渗透、颠覆直至夺取政权的模式……几年后，这种模式被非常有效地用于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约翰·多斯·帕索斯，《主题是自由》，第151页）
- 67 《共产国际简史》，第444页。
- 68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刊出了这封法文书信原件的影印件，见第二卷，第102与103页之间。
- 69 斯大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写给卡瓦列罗的信。
- 70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会议纪要》，第422—423页，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胡利奥·阿罗斯特吉和赫苏斯·A.马丁内斯，《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310页。
- 71 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一九四〇年在墨西哥接受我的采访时所说。采访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 72 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54页。另请参阅该书第55—57页以及卡萨多发表在一九三九年七月号《国家评论》上的文章和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206页。
- 73 国际纵队大本营和新编混成旅的训练中心所在地阿尔瓦塞特省的社会党人省长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写道：“在给刚刚组建的部队分配作战物资时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的影响当然超出了所涉及的部队的范围，当人们确定只有共产党人指挥的部队能够得到优待时，它引起了猜疑和对立以及政治方面的冲突。……[我们]不得不对因这种明显的不公和优待而发生的冲突进行调解，有时甚至是暴力冲突。西班牙共产党开始利用这种恶劣的胁迫手段实现其势力的过度扩张从而取得控制权。”（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54—55页）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被任命为总参谋部运输部门负责人共产党员亚历杭德罗·加西亚·巴尔战后告诉我，苏联卡车运到西班牙后，他把劳动者总工会中的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支持者组织起来建立了最初三个机械化军事运输营，由六百部车辆和三千人组成。
- 74 关于非共产党人对西班牙共产党的部队的赞扬，实例见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政治报》（左翼共和派的喉舌）；另外，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没有人可以指称他是共产党员）说，“许多共产党的部队通过激烈的战斗使其有别于其他人”，见《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96页。
- 75 实例见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的《西班牙革命与内战》，第131—132页。
- 76 另请参阅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的《西班牙内战，1936—1939》，第128页；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195页和爱德华多·德·古斯曼的《马德里，红与黑》，第164和200页。爱德华多·德·古斯曼是马德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喉舌《卡斯蒂利亚自由报》的负责人，他赞扬了国际纵队的勇气、智慧、纪律和军事技能，而且完全相信他们为马德里前线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树立了榜样。“[我们的士兵]观察着他们，然后，”他写道，“以西班牙人民所具有的惊人的适应能力，立即开始效仿他们。”
- 77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工人日报》。

- 78 安东尼奥·拉莫斯·奥利维拉，《现代西班牙的政治、经济和人，1808—1946》，第599页。
- 79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80页。
- 80 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457页。
- 81 关于马利诺夫斯基，见《苏联名人录》，第365页。
- 82 《在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帜下》，第151页。
- 83 实例见华金·阿拉拉斯著（佛朗哥派）官方内战史《西班牙圣战史》，第四卷，第381和391页；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政治报》。波萨斯的女婿阿尼塞托·卡瓦哈尔上尉战后接受我的采访时说，二月大选过后几天，当时还是总参谋长的佛朗哥将军试图通过他的居间斡旋，给波萨斯在瑞士银行存一笔钱，换取其对“民族政府”的支持。
- 84 见赫罗尼莫·布赫达的演说，载一九三六年（原书误为一九三七年——译注）七月十九日《社会主义者》。
- 85 一九三七年，当时仍然支持共产党的知情人路易斯·费希尔说，波萨斯是共产党员（路易斯·费希尔，《西班牙为何而战》，第39页）。就像他在米亚哈将军的事情上无视令其难堪的证据一样，顽固地企图歪曲事实的胡里奥·阿罗斯特吉无视这个同样令其难堪的证据（见曼努埃尔·图尼翁·德拉拉编辑的《西班牙内战：五十年后》一书所收录的他的文章，第72页）。
- 86 见佩雷斯·萨拉斯《西班牙内战》，第141—142页；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406页。
- 87 据任职于总参谋部的共产党员亚历杭德罗·加西亚·巴尔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接受我的采访时说。
- 88 佩雷斯·萨拉斯，《西班牙内战》，第146—147页。
- 89 布鲁诺·阿隆索，《共和国舰队与西班牙内战》，第38页。
- 90 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241页。
- 91 《常识》。
- 92 多斯·帕索斯，《主题是自由》，第127—129页。
- 93 同上，第130页。关于西班牙内战对海明威和多斯·帕索斯两人之间的友谊的影响，见约翰·P·迪金斯《超越共产主义》，第88—90页。
- 94 见胡利安·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217页。在《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1869—1946》收录的一篇文章中，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内阁同僚费德丽卡·蒙特塞尼提到他的“专权”思想。
- 95 一名与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政治军事秘书何塞·马利亚·阿吉雷关系密切的国防部雇员告诉我，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以后，拉尔戈·卡瓦列罗与苏联军官的关系严重恶化，而苏联人特别关心军队的政治倾向。
- 96 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10页。
- 97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五日《今报》。
- 98 爱伦堡，《战争前夕》，第190页。就连《苏联大百科全书》的最新版本也不包括关于他们的任何内容。
- 99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701页。
- 100 同上，第711页。
- 101 维托里奥·维达利，《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日记》，第137页。
- 102 我个人根据一九三七年三月对罗森堡进行的一次午餐采访作出的判断。塔斯社记者米罗娃为我安排了这次采访，本书已经提到，她后来成为斯大林清洗的受害者。
- 103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墨西哥城）《西班牙共和国中枢报》发表的普列托的演说，转

载于一九四六年（原书误为一九三六年——译注）四月一日（墨西哥城）《前进报》。

104 见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九日和十八日《社会熔炉报》。

105 何塞·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377—379页。另请参阅热情之花发表的声明，载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一日《社会主义者》。

自由主义运动与正规军

“我们不需要一支国家军队。”中部前线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的报纸《自由阵线报》大声疾呼，“我们要的是人民的民兵，它体现了群众的意愿，因而是唯一能够捍卫西班牙人民的自由和自由社会秩序的武装力量。我们像内战以前一样高呼：‘不要锁链。’军队是奴役的工具，专制的象征。让军队滚到一边去。”¹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胡安·洛佩斯在加入拉尔戈·卡瓦列罗内阁之前不久宣称：“我们不想建立一支服装统一、纪律严明的民兵部队。”²

除非违反他们的反权力主义原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不可能接受一支正规军。诚然，殊死斗争的紧急状态迫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民兵部队需要采取某种限制个人主义的措施，但这完全不同于接受一种彻头彻尾的军事化，这种军事化包括：严格服从政府对这些部队的管制，恢复等级和特权制度，由国防部任命军官，采用不同的薪饷标准，引进严厉的纪律处罚手段并且必须行军礼。“听到有人说出[军事化]这个词让我们忧虑和不安——为什么不承认这个事实？由于它使人想起对尊严和人性的不断践踏，我们感到毛骨悚然。”巴伦西亚地区的无政府主义喉舌《我们》公开宣称，“直到昨天，军事化意味着——而且对于许多人来说它仍然意味

着——在军营制度下以某种摧垮士兵的人性进而消灭其个人意志的方式管理他们。”³

虽然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具有符合其信念的反对军事化和正规军的道德动机，不过，他们这样做也有充分的政治理由。在内战爆发两个月前召开的一次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的大意是，常备军队——这指的是推翻旧政权以后建立的所有常备军队——将对革命构成最大的威胁，“因为在其影响下将产生一个独裁政府，所以必须给它以致命的打击”。由一个包括一些著名的自由主义运动领导人在内的委员会起草的这项决议宣称，捍卫革命成果最可靠的保证是武装起来的人民。他接着说：“成千上万的工人具有军营的经历并且了解现代军事技术。为了使民众在革命成果得到最终的巩固之前不被杀害或者沦为劳动的工具，每个居民区都应拥有自己的武器以及[另外一些]防卫条件。我们坚决主张必须牢牢掌握飞机、坦克、装甲车、机关枪和高射炮，因为外国入侵的真正危险来自空中。如果发生外国入侵，人民将为抗击敌人迅速自发地行动起来，只要一完成保卫家园的任务，他们就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⁴

323

因此，当温和的何塞·希拉尔政府在内战初期试图建立志愿者部队并且随后打算建立一支由其控制的志愿军时，自由主义运动报以怀疑的态度不足为奇。全国劳工联合会在西班牙的主要报纸《工人团结报》论及前一项措施时说，就连军事叛乱爆发之前已被挫败的中产阶级也在想象建立政权的胜利之日。但是它断言，工人阶级不会满足于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不允许别人从他们手中把胜利夺走。⁵中部地区重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报纸《全国劳工联合会报》的负责人加西亚·普拉达斯声称，人们不应当加入志愿军，因为这支军队将会导致建立一种企图在战胜法西斯主义之后秋后算账的新的等级制度。他接着说，人民已经表明，他们不需要为了赢得这场战争而加入一支军队，所以不会让自己上当受骗。⁶

因此，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当几周之后入主国防部的拉尔戈·卡瓦列罗颁布了一些旨在对民兵实行军事化进而建立一支正规军的法令时，自由主义运动的担忧加剧了，当共产党人对各种军事机构的渗透取得明显进展时，这种担忧变成了恐慌。

为了消除自由主义运动青年组织伊比利亚自由主义青年联盟因共产党人对军队的意图而产生的担忧，共产党控制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声称：“我知道……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有些同志希望联合自由主义青年组织以便赢得这场战争，不过，他们在内心深处认为，当战争结束军队从前线归来时，我们将利用这些军队镇压、消灭、杀害我们的自由主义青年兄弟。……可是我要告诉你们这些同志，必须抛弃这些想法，因为它们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要求与自由主义青年组织联合的时候非常真诚。我们知道，我们的自由主义同志是争取胜利必不可少的一支力量，而且我们同样确信，胜利之后他们将与我們并肩携手建设一个强大、自由、民主的西班牙。这是我们的信念，因此，我们仅仅要求他们放弃他们的派别成见，不应把我们当作今天一时的朋友，到了明天便成敌人，而应把我们当作今天的朋友、明天的朋友，并且永远把我们当作朋友。”⁷

总体上讲，即便只是因为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遭到了布尔什维克的镇压，无论是无政府主义青年组织还是自由主义运动都不会对共产党人所造成的威胁的性质抱什么幻想。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已于一九三六年九月提出建议，在义务兵役制的基础上建立一支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共同控制的“战争民兵”，以期在一定程度上避开共产党人的威胁。⁸但是，这两项决议都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因此，由于共产党的威胁仍然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最终决定谋求内阁中的发言权，以此保证自由主义运动的一些措施对军事机器产生影响。当然，这不仅意味着抛弃他们的反政府信条，而且意味着抛弃他们的反军事化原则。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起开始担任巴伦西亚的全全国劳工联合会报纸《社会熔炉报》负责人的曼努埃尔·比利亚尔认为，事实证明这些信条和原则危害了自由主义运动。在他看来，由于知道许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担任指挥职务极为反感，共产党人已经抢占了他们能够占据的所有指挥岗位。⁹“我们只能死板地拘泥于教条吗？”他问道，“如果全国劳工联合会放开革命行动的制动杆，革命本身因我们的影响而受到的损害将减少。另外，由于革命是有目的的行动，而全国劳工联合会是革命最有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此，最符合革命利益的方针是，采取那些将

使我们始终处于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措施。”¹⁰

但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几位部长在内阁议事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远远达不到他们的期望，尤其是在与军事有关的问题上；因为他们发现，正如担任工业部长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胡安·佩罗所说，他们没有指挥战争的权力或职责。¹¹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建议成立一个处理军队事务的内阁决策委员会，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在委员会中拥有发言权。¹²这个建议得到了共产党人的支持，毫无疑问他们相信，新的机构将使他们可以更严密地监督控制卡瓦列罗的行动。¹³十一月九日颁布的法令落实了这个建议，设立一个战时高级委员会，授权其“协调统一与战争和指挥战争有关的一切事宜”。¹⁴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国防部长拉尔戈·卡瓦列罗，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海军和空军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共产党人农业部长比森特·乌里韦，左翼共和派人士、公共工程部长胡里奥·胡斯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司法部长加西亚·奥利韦尔，以及亲共的外交部长兼总政治部主任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¹⁵

尽管法令规定了委员会的目的，但是，由于拉尔戈·卡瓦列罗与共产党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以及这位总理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之间的对立关系，这个新的机构从一开始就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这些分歧和对立使其根本无法达成一致，而且使其得不到恰当履行职能所必不可少的相关军事情报。由于国防部长决意不把他仍掌握的权力交给对手，战时高级委员会很少开会，因此，共产党人很快就有了公开表示不满的理由，¹⁶而希望委员会有助于加强他们对军队事务的影响力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则发现，在对手强大的实力面前，他们的声音几乎不起什么作用。

325

结果，自由主义运动没能通过加入政府增强自己在军事领域的话语权，甚至没能抑制共产党人在军队中的势力扩张，最终反而使其继续保持对自己民兵队伍的控制同时还要从国防部弄到武器装备的努力受到限制。这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因为国防部决定，不再向那些不愿通过骨干队伍规范化而改编成为正规军的民兵部队提供武器。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举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地区代表大会上，阿尔科伊造纸工人的代表说：“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全国劳工联合会]在阿尔科伊组织了一支一千

多人的民兵队伍，政府以没有军官为由不向这支队伍提供武器；另一方面，因为符合政府的条件，人数较少的社会党人却能组织一支队伍并且得到所需要的武器装备。”¹⁷

为了绕过这些规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决定，他们的民兵以接受部队番号的方式假装默认改组整编。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民兵队伍大都采用了这种权宜之计，包括中部前线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用无政府主义报纸《卡斯蒂利亚自由报》负责人的话说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除了名称之外，一切保持不变”。¹⁸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地区代表大会上，阿尔科伊的代表表示，与其失去武器装备，不如采用军衔和番号满足政府的要求。“但是，”他意味深长地接着说，“对于我们来说，百人队代表就是百人队代表。”¹⁹这种策略没有帮助自由主义运动的部队弄到他们需要的武器，结果，他们不得不接受军事化的概念。

最终导致自由主义运动委曲求全接受军事化概念的不仅是对军用物资的需要：而且还有克服民兵组织自身缺陷的需要——毫无疑问，这是最重要的考虑。

从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摘录出来的下列内容充分显示了民兵组织最严重的缺陷之一，这篇文章是被派往马德里前线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民兵部队的一名正规军下士所写的：“我们发现这支部队里有一名职业军人上尉……他悄悄地就他认为应做的一切给[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领导人]里卡多·桑斯出谋划策。具有军事常识的桑斯总是接受他的意见；但是，每当必须作出决定时，他不得不召开一个民兵大会，把上尉的意见当作自己的提出来，巧妙地灌输给与会者，以使它看上去好像是讨论的结果。”²⁰

326 加泰罗尼亚民兵攻打巴利阿里群岛名义上的负责人阿尔韦托·巴约上尉记录了他与无政府主义民兵委员会成员进行的以下谈话，当时他命令他们进攻马略卡岛：

“‘先等一下，’主要负责人之一回答道，……‘我们只服从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命令，因此，没有他们的同意我们不能执行你的命令。’

“‘但是，必须在不通知他们的情况下执行我的命令，’我有力地反

驳道，‘因为他们在巴塞罗那，而登陆行动是军事秘密，我不能冒险发报或用电台联系，即使用密码电报也不行，明天早晨必须行动，不得迟疑，不得延误。’

“‘我们非常抱歉，’他们回答说，‘但是，如果明天行动，我们就不能参与。只有当我们的领导人下令时，我们才能让我们的战士去冒险。’……

“我耐着性子一遍又一遍地劝说他们，我愤怒地命令他们，我哀求他们。……最后，他们答应他们自己讨论一下，是执行明天登陆的计划，还是等到他们接到他们的中央委员会的命令。”²¹这种反军事化的民主程序的种种弊端很快就自动显露出来。“那些负责人下令行动，民兵将开会进行讨论。”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说，“几个小时在讨论中浪费了，结果，当终于开始行动时，敌军已经严阵以待。这种事情让人发笑，它们同样让人哭泣。”²²

不过，他们还做了另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使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领导人，尤其是持续承受着敌军压力的中部前线民兵部队的指挥官，放弃了他们对军事化的传统看法。“正是[在马德里外围的阿拉瓦卡和波苏埃洛失守之后]我对纪律和军事化的所有观念崩溃了。”后来成为第十四师师长和第四军军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部队指挥官西普里亚诺·梅拉几个月后承认，“我的弟兄们在战斗中的流血牺牲使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我认识到，如果我们确实不想打败仗，那就必须建立我们自己的军队，必须为保卫工人阶级组建一支像敌军一样强大的军队，一支遵守纪律并且具有作战能力的军队。从那以后，我毫不犹豫地向我所有战士极力阐述服从新的军事原则的必要性。”²³

另外，梅拉在回忆录《一名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战争、流亡和监狱生涯》中写道：“巷战或者简单的小规模战斗不再是问题，在这种战斗中，作战积极性可以弥补训练的不足。……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因此，我们需要军事化的部队，军官能够策划军事行动并且能够尽量用最少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抗击敌人。……我始终相信……在自由的人群中，没有比自我约束更强大的力量，对唯一理想的共同奉献压倒其他任何因素。我在战斗中注意到，信仰和伟大的思想可以产生高尚的姿态，也可以激励英勇的

行为，……但是不足以使我们拥有战场上所需要的凝聚力。……我们已经用许多同志的生命为我们的权宜之计和异想天开付出了代价。为了减少流血牺牲，即使不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思想，那也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行为。……当人们毕生都在捍卫某种理想时，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事实：如果我们确实希望赢得这场战争的话，我们必须建立一支具有必要的纪律的军队。……我一想到身穿军装便不寒而栗，但是看来别无选择。”²⁴

米亚哈将军那位亲共产党的参谋长比森特·罗霍证明这并非空口说白话。谈到佛朗哥将军的军队攻到马德里市郊的十一月六日至七日那个夜晚时，只用其姓名的首字母M称呼梅拉的罗霍回忆说，凌晨两点，一支“作战最勇敢伤亡最严重”的民兵部队的指挥官来到他的指挥部。

“‘我来请你授予我一个军衔，什么军衔都行。’梅拉说，‘任命我为中士吧。……我想像军官一样去指挥，以便使我的命令得到严格执行。我不想再当“负责人”M了。为了使今天的情况不再出现，我想成为M中士。’

“‘今天的情况对你来说是一个成功，对你的部队来说是一次胜利。’罗霍回答道。

“‘不错，但那是以战士的伤亡为代价。’……

“军事策略不可或缺的无情事实使这位像在战场上勇敢顽强地作战一样充满激情地坚守其工团主义政治信仰的战士豁然开朗。”

据罗霍说，十五天后，经过改编整训的梅拉的部队成为“我们的一支最精锐的攻击部队，它的指挥官像一八〇八年我国独立战争的那些游击战领导人一样，从一个新手锤炼成为早期民兵武装涌现出来的骨干人员中最杰出的指挥官之一”。²⁵

就像马德里前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民兵部队在危急情况的刺激下稍微采取了一些纪律措施一样，在同样的激励作用下，他们开始用军队的组织形式取代民兵的组织形式并且大力推进骨干队伍的建设。马德里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的喉舌《自由阵线报》声称，应当抛弃所有偏见，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把大批同志送到军事培训学校去，他们将会逐渐发现，军人这个职业就像他们干了多年的那些行业一

样体面和重要。它还说：“正在组建的人民军需要军事专家，这种需要是國家的特点，必须关注自身力量不断壮大的我们的队伍特别感到有这种需要。”²⁶马德里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不仅受到政治考虑和马德里周围的残酷战斗的影响，而且受到国际纵队这个榜样的影响，后者效率更高的军队组织形式立即显示出其对民兵组织形式的优越性。渐渐地，无政府主义的《卡斯蒂利亚自由报》负责人证实，最初纯属名义上的改变深入进行。“人们已经注意到，而且事实业已证明，在英雄气概和力量消耗相同的情况下作战，国际纵队的组织导致更高的效率。在我们的民兵部队中，干部队伍按照国防部的规定形成了。营长成为少校；百人队代表成为上尉，第一批下士和中士出现了。”²⁷

从许多自由主义运动重要人物所发表的言论明显看出，这种变化并非完全有名无实，他们告别了反权力主义的过去，成为军事化的积极推动者。例如，西普里亚诺·梅拉认为军队的纪律非常重要，以致决定“只与将领、军官、中士讨论问题”。²⁸“我们所做过的对军队危害最大的事情之一是，”他后来说，“曾经当过民兵的军官与士兵的关系过于亲密。”²⁹还有，被委以组建管理军官培训学校重任的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在担任司法部长之前被认为是一名正统的无政府主义者，如今他却要求一所军官培训学校的学员记住，应征入伍的士兵“不应是你们的同志，而应成为我们军事机器上的齿轮”。³⁰

为了防止共产党人控制军官培训学校并且防止他们阻挠毕业的军官同情支持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³¹几位无政府主义者内阁部长谋求让加西亚·奥利韦尔担任组建管理军官培训学校的负责人。战时高级委员会委派这位无政府主义领导人负责组建管理军官培训学校是因为委员会成员无法就其他人选达成一致，这应当归功于拉尔戈·卡瓦列罗与其对手之间的敌意。一九三七年五月，当时不再是委员会成员的加西亚·奥利韦尔在一次演说中证实，他得到国防部长真诚的合作，而后者对他非常信任是因为他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的党派谋利益。³²毫无疑问，卡瓦列罗支持这位无政府主义领导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不希望军官培训学校被共产党人所控制。不过，这一委任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因为，由于自由主义运动的成员

普遍反对建立一支正规军，这些学校招收的自由主义运动成员少得可怜。³³“这使我郑重地把这个问题向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提出来，”加西亚·奥利韦尔说，“结果，在就此达成一致意见并且付诸实施之后，各地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保卫委员会都对培训学校招收学员特别关心。”谈到对于军衔存在的敌意，他证实：“当我们派遣一些中尉前去协助当时仍然反对军事化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武装领导人时，为了羞辱他们，那些领导人安排他们用镐头和铁锹挖战壕。”但他补充说：“在拉尔戈·卡瓦列罗下台后，当全国劳工联合会不再是政府成员时，当军事化向前推进时，正是以前羞辱过中尉军官的那些同志对获得共和国军队的高级军衔表现出了非常浓厚的兴趣。”³⁴

329

作为组建管理军官培训学校的负责人，加西亚·奥利韦尔甚至赢得其意识形态对手的钦佩。“[安东尼奥·]科登和我与他联络，”国防部的职业军官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写道，“但是，留给我们做的只是执行他的指示而已。校区、教官、设备以及所需要的一切立即就能得到满足。奥利韦尔不知疲倦。他亲自安排并且监督每一件事情。他深入到最微小的细节，务必使它们得到妥善处理。他甚至关心学员的作息时间表和伙食安排。但他最关心的是，新的军官应当在最严格的纪律条件下接受培训。

“这个加泰罗尼亚无政府主义者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力让不相信即兴发挥的我感到惊讶。看到他全面的行动能力和自信，我意识到他是一个非凡的人，因此不得不感叹，在破坏性的活动中，这么多人才被浪费了。”³⁵

自由主义运动一些最著名的成员令人吃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在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报刊上反映出来。军人风度受到称赞，³⁶运动敦促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部队的政治委员对犯错误的士兵进行“适当甚至最严厉的惩罚”。³⁷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二日，马德里南部的哈拉马河战斗激烈进行期间，《全国劳工联合会报》的一篇社论声称，民兵应当服从指挥官的命令，违者格杀勿论。³⁸

但是，保证民兵普遍接受新的规矩并非易事，因为他们的领导人一向教导他们要把所有军队全都视为专制主义的象征。他们认为自己从来不受发号施令的军官的意志约束，他们不仅把选举的原则引入部队，而且与小组代表和百人队代表平等相处。关于上面引述的加西亚·奥利韦尔要求

军官培训学校的学员记住的那一段话——应征入伍的士兵“不应是你们的同志，而应成为我们军事机器上的齿轮”，一名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写道：“当我们的内心充满解放的概念时，当我们的内心充满自由观念和革命思想时，……我们无法理解我们那些担任政府部长的同志怎么能用这种话来表达他们自己的看法。”³⁹另外，著名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索拉诺·帕拉西奥在记述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民兵武装的军事化时坚称：“民兵最反感的是必须向他们一直将其视为战友的军官敬礼。”⁴⁰按不同的标准发放薪饷这个问题在民兵当中引起的担忧甚至反映在一份赞成军事化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报纸上：“经济差异产生了阶级，因此，在人民军中不应存在任何经济差异。在这支军队里，每一个人，从士兵到将军，他们都有同样的需要以及同样的满足这些需要的权利。不同的待遇将在发号施令者与服从执行者之间造成疏离，由此产生的不平等感对人民的利益具有副作用。当我们正在与所有特权斗争时，我们不能容忍军队中存在任何特权。”⁴¹

“如果我说不需要克服阻力的话，那我就是虚伪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成员米格尔·冈萨雷斯·伊内斯塔写道，“自由主义阵营的每一个积极分子都有顾虑要消除，有信仰要改变——为什么不承认这一点？有幻想要埋葬。这绝不仅仅是因为对某种在实践中被奉为神圣的传统观念的尊重，而且是因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旧军队部分或整体起死回生将会产生等级特权、畸形的青年，将使旧的制度复活，压制各种社会权利，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支军队最终可能成为革命的扼杀者，沦为某个政党的工具。”⁴²

正是因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担心出现后一种情况，因为它们不像共产党那样打算渗透到整个军事体系中，所以，它们决心保持其部队诚挚平等的特点。因此，尽管它们决定把这些部队改编成为统一建制的旅，并且在仍由自己的指挥官指挥的情况下并入正规军，但是，它们不同意组成由国防部任命的军官所指挥的混成旅，反对借此用其他部队消解分化自由主义民兵武装。组建混成旅的计划主要出自苏联人之手，⁴³它的一个重要政治目的无疑是消除或至少削弱无政府主义者在军队中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前面引用过的国防部的职业军官马丁·布拉斯克

斯就曾经对国防部副部长何塞·阿森西奥将军说：“一旦我们组建了我们的混成旅，[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将不复存在。”⁴⁴

尽管拉尔戈·卡瓦列罗出于政治和技术上的考虑同意在混成旅的基础上对民兵实行军事化，⁴⁵但是，因为他对共产党的厌恶不断加剧而产生的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缓和关系的愿望阻止他认真尝试强制推行这一措施。结果，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部队虽然在军事行动方面服从总参谋部的指挥，但是仍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完全控制着，并且仍由属于该组织的士兵和军官组成。

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的一份报告中，全国劳工联合会为其会员组织的国际工人协会（AIT）驻西班牙代表赫尔穆特·吕迪格说：“目前，全国劳工联合会在中部地区有一支三万三千人的军队，全副武装，组织完善，所有人都持有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会员证，由同为全国劳工联合会会员的军官指挥。此外，混编部队中还有许多我们的同志，不过，全国劳工联合会打算把他们全部集中到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部队里来。”⁴⁶不久之后他又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认识到，它应当进行自己的军事化。这是组织一支强大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军队的有效手段。这支军队不仅要从事反法西斯战争；以后还将保卫革命。”⁴⁷

331 一些自由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向我充分证实了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部队这一时期的平等特点，其中包括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马利亚诺·卡多纳·罗塞利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日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负责人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后者是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控制着中部前线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民兵武装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成员。⁴⁸加西亚·普拉达斯证明：

当对民兵实行军事化的法令颁布时，我们中部地区的部队只同意在保持一定独立性的条件下实行军事化，这个条件包括保留部队自己的指挥官。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及其继任者以及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不愿答应这个条件，但是它们不得不“容忍”它，因为我们宁可反抗也不会屈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必须允许普招的士兵加入我们的部队。从来没有强迫这些人成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会员，但是我们的

始终拒绝承认政府拥有自行任命指挥官的绝对权力。通常出现的情况是，[全国劳工联合会]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向国防部提名其认为合适的人选同时提供必要的资料，然后，国防部根据它掌握的这些资料接受推荐并且颁发委任状。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方式适用可行，其中之一是允许指挥官获得高薪。我们中部地区的指挥官在领取他们的薪水之后将其中大部分交给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委员会随后将所收到的几百万比塞塔用来资助集体农庄。有些时候，当政府在巴伦西亚或巴塞罗那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默许的情况下打算把某些指挥官强行派给我们时，长期负责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爱德华多·巴尔、曼努埃尔·萨尔加多或我本人都不会同意这样做，结果，幸亏采取了这种态度，我们才能始终把这些部队控制在手中，直到一九三九年三月我们可以用它们[在马德里]打垮共产党。

一九三七年二月，得到拉尔戈·卡瓦列罗完全信任的国防部总参谋长托里维奥·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将军批准无政府主义民兵武装的马罗托纵队作战委员会建立一个全部由这个纵队的成员组成的旅，这一事实证明，拉尔戈·卡瓦列罗同意而不只是默许抛开形式严格的军事化，虽然他与苏联人曾经就此达成一致。明摆着的情况无疑是，这样做不是没有通知马丁内斯·卡夫雷拉的苏联顾问K.A.梅列茨科夫——此人后来成为苏联元帅和红军总参谋长——就是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二日提交总政治部的一份报告中，南部前线政治督察委员、社会党左派议员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巴列斯特罗斯说，马罗托纵队作战委员会声称，它有马丁内斯·卡夫雷拉下达的由该纵队成员组成一个旅的书面命令，而且“格拉纳达防区的指挥官[欧蒂基亚诺·]阿雷利亚诺上校和萨拉萨尔中校均证明，他们见过所说的命令”。⁴⁹

正如我们将在下面一章看到的那样，无政府主义民兵武装的钢铁纵队同样获准由清一色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组成一个旅。值得注意的事实还有，钢铁纵队的非正式传声筒《我们》⁵⁰就军事化和混成旅的问题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所进行的采访发表之后，国防部并未表示异议：

《我们》：我们的民兵纵队将不复存在了吗？

巴斯克斯：是的，它们将不复存在。它们必定将不复存在。[全国委员会已经决定]像其他所有民兵一样，我们的民兵纵队将改编成旅。……虽然可能发生一些变化，但是，目前这种改编并不表示发生了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因为以前指挥这些纵队的人现在仍将指挥这些旅。这意味着，我们那些喜欢这些行动负责人的同志可以放心，他们不会由于随意任命指挥官而被迫接受他们不喜欢其意识形态因而也不喜欢与其打交道的人。此外，作为各个旅真正的负责人，政治委员——别让这个词吓着你——将由全国劳工联合会任命，他们始终对全国劳工联合会负责。……

《我们》：有人说这些旅将是混编的，也就是说它们将由马克思主义派的正规军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部队组成——这是我们的战士所担心的另一个问题。这是真的吗？

巴斯克斯：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它是与军队组建有关的计划之一。不过，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计划：在逻辑上是为我们组建的未来的部队必须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同志所组成，同时还要在这两个组织的控制下，尽管它们服从所有部队自愿接受的统一指挥部的命令。⁵¹

虽然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所接受的形式松散的军事化可以使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部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独立性，但是，它仍然遭到更极端的自由主义人士的坚决抵制，他们满怀激情地固守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信仰。除非将著名的钢铁纵队（Columna de Hierro）的传奇包括在其中，否则的话，我们无法描述在自由主义运动的原则与实践、普通成员与领导阶层之间所进行的这一场激动人心的斗争。

注释：

- 1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自由阵线报》。
- 2 胡安·洛佩斯的演说，载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社会熔炉报》。
- 3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我们》。
- 4 载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工人团结报》。
- 5 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工人团结报》。
- 6 加西亚·普拉达斯的演说，载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二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 7 卡里略一九三七年一月的演说，见圣地亚哥·卡里略《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第51页。
- 8 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委员会代表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载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 9 “我们没有尽快地将内战初期自发形成的队伍转变成为组织规范的部队。我们失去的位置被共产党人占据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在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载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新西班牙》增刊）
- 10 一九三八年六月号《国际》。
- 11 胡安·佩罗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全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社会熔炉报》。
- 12 同上。
- 13 实际上，加夫列尔·加西亚·马罗托（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接受我的采访时）给我留下这种印象，他是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朋友，这个新机构的成员之一。
- 14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15 同上。
- 16 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四日举行的一次示威中，共产党人向拉尔戈·卡瓦列罗递交了包括十项内容的请愿书，其中特别要求，必须让战时高级委员会完成“它为之设立的那些任务”，两周之后，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强烈要求它“必须有计划地定期开会并根据需要经常讨论所有战争问题进而就其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军官的任命和管理以及清洗军队中的一切敌对分子和无法胜任者”（引自一九三七年三月二日《工人世界报》）。
- 17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九日《社会熔炉报》。
- 18 爱德华多·德·古斯曼，《马德里，红与黑》，第200页。
- 19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社会熔炉报》。
- 20 《一名正规军下士未发表的文章》（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21 阿尔韦托·巴约上尉，《我在马略卡岛登陆》，第113—114页。内战结束以后，巴约入籍古巴移居墨西哥，在墨西哥成为军事飞行学校的教官。一九五六年，应当时在墨西哥组织军队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要求，巴约开始训练渗入古巴开展游击战的士兵（见菲德尔·卡斯特罗《革命斗争，1947—1958》，《卡斯特罗选集》第一卷，第78—79页和马里奥·列雷纳的《出乎意料的革命》，第206页）。
- 22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工人团结报》。
- 23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日（马德里）《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另请参阅他向马德里前线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部队发表的声明，载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七日《卡斯蒂利亚自由报》。
- 24 西普里亚诺·梅拉，《一名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战争、流亡和监狱生涯》，第107—109页。另请参阅该书第109—111、113和116页。
- 25 比森特·罗霍，《这就是马德里保卫战》，第115—117页。
- 26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四日《自由阵线报》。

- 27 古斯曼，《马德里，红与黑》，第200页。关于国际纵队树立的榜样，另请参阅无政府主义者里卡多·桑斯的《驰援马德里的部队：第二十六师杜鲁蒂纵队》，第108—109页。尽管这样称赞国际纵队，自由主义运动仍对他们怀有许多不满和敌意，而且担心他们将会加强共产党人对军队的控制。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没有如约接待加泰罗尼亚-法国边境上的一千多名志愿人员，他们不得不乘船前往中央政府控制的西班牙港口（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175页）。另请参阅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西班牙革命与内战》，第133页。在一九四〇年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国际纵队第十五旅副政委拉尔夫·贝茨说，越过边境进入加泰罗尼亚的志愿人员经常不得不乘坐火车前往目的地，经过车站时把窗帘拉下来（这封信现存胡佛研究所）。“不给我们的民兵——他们的勇敢和战斗精神无与伦比——提供武器同时却又组成许多配备全部装备、享受特殊待遇的外国作战部队，”阿瓦德·德·桑蒂连写道：“我们认为这不公平而且是一种犯罪行为。”（《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175页）
- 28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 29 载《工人世界报》，转载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社会熔炉报》。
- 30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加泰罗尼亚情况通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宣传部出版），转载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八日《自由主义报》。另请参阅马克西莫·略卡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思想报》上的文章。
- 31 见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的讲话，发表于加泰罗尼亚地区劳工联合会，《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三日在巴塞罗那举行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劳工联合会特别代表大会会议纪要》，第178—185页。
- 32 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社会熔炉报》。
- 33 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在一次讲话中强调了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学员人数太少，见《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三日在巴塞罗那举行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劳工联合会特别代表大会会议纪要》，第178—185页。
- 34 加西亚·奥利韦尔对德国无政府主义者阿古斯丁·索奇应我的要求发给他的一份问卷的回复。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回复的这份答卷在我与索奇通信的档案里（现存胡佛研究所）。
- 35 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299页。共产党人科登在他的书中同样高度赞扬了加西亚·奥利韦尔在军官培训学校的工作（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282页）。
- 36 实例见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 37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 38 见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反法西斯主义的无产阶级》，第46页。
- 39 马克西莫·略卡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思想报》上的文章。
- 40 索拉诺·帕拉西奥，《北方的悲剧》，第135页。
- 41 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 42 米格尔·冈萨雷斯·伊内斯塔，革命者西普里亚诺·梅拉》，第60页。
- 43 两位共和派军官证实了这一点：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295页；而塞希斯孟多·卡萨多则在以技术原因批评混成旅计划的同时认为：“接受‘友好的苏联顾问’的建议使[政府]犯了非常严重的低级错误。”（见其发表在一九三九年七月号《国家评论》上的文章）被委派组建第一批正规军旅的卡萨多在他的书中写道：“国防部长[拉尔戈·卡瓦列罗]命令挑选一名苏联将军和两名苏联上校帮助我完成这一任务。”（《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52页）
- 44 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297页。

- 45 马丁·布拉斯克斯对组建混成旅的军事原因作了简短的叙述，见《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293—295页。关于以技术原因对组建混成旅的一段批评，见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发表在一九三九年七月号《国家评论》上的文章。
- 46 吕迪格曾将这份报告的原件借给我，它的一份打印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
- 47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议关于西班牙形势的讨论纪要》，见《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三卷，第63页，注释1。
- 48 他们写给我的信（见胡佛研究所档案）。
- 49 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50 尽管《我们》是巴伦西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官方喉舌和巴伦西亚自由主义青年运动的非官方喉舌，不过，因为帮助这两个组织从钢铁纵队获取人力物力的支持，它也是后者的传声筒（见塞萨尔·M.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1868—1969》，第187页）。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们》的负责人阿夫拉姆·纪廉成为乌拉圭的城市游击队组织图帕马罗的理论家。
- 51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我们》。

钢铁纵队

“有些同志认为军事化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我们认为它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虽然抵制根本不会打仗的下士、中士以及毕业于军事院校的军官，但是我们有自己的组织，因此，我们不接受任何军事体制。”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召开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上，钢铁纵队的一名代表这样说。¹

没有哪支部队比钢铁纵队更全面地代表了无政府主义精神，没有哪支部队比钢铁纵队更坚决地反对自由主义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自相矛盾，没有哪支部队比钢铁纵队对政府表现出更强烈的敌意，²在内战最初的七个月，钢铁纵队驻守在特鲁埃尔前线的一个防区。“[我们]所做的一切肯定不是为了巩固这个政府，我们最终一定要消灭它，因此，帮助政府毫无意义。”上述那位代表宣称，“我们不接受任何与无政府主义思想背道而驰的东西，思想必须变成现实，因为你不能说一套做一套。”³在进行社会革命的过程中，无政府主义民兵部队并没有使中小佃户以及地主、商人和店主产生更大的恐慌。钢铁纵队主要吸收巴伦西亚地区比较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加入，它的三千名成员⁴中包括几百名圣米格尔·德洛斯雷耶斯监狱的囚犯。“必须释放[这些囚犯]，然后必须有人负责把他们带上前线。”钢铁纵

队作战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写道，“始终认为社会应当为其弊端负责的我们将他们视为兄弟。他们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并且冒着生命危险与我们并肩为自由而战。监禁使他们被社会蔑视，我们则给他们自由和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们需要他们帮助我们，同时我们希望为他们提供社会新生的可能性。”⁵可是，这些以前的囚犯很快就给钢铁纵队带来了耻辱；因为，虽然其中一些人在被监管期间受到感化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但绝大多数人是顽固不化的罪犯，他们的心肠没有改变，参加钢铁纵队是因为他们可以用无政府主义者的标签做幌子设法脱身。⁶

这些罪犯给钢铁纵队带来的丑恶名声导致纵队作战委员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地区委员会之间的严重不和。⁷不过，造成不和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地区委员会支持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全国领导人所采取的政策，而钢铁纵队则以自由主义运动加入内阁有助于恢复政府的权威从而加大了政府法令的影响力为由批评这种政策。实际上，钢铁纵队得知四位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加入政府的消息后，它的官方喉舌《火线》立即对这些出任部长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它说，政府得以存续，“而且完全是以某个自称自由主义的组织的名义”。⁸此类谴责——如果钢铁纵队在某些问题上的意见不被采纳，有时还伴以武力威胁⁹——往往使地区委员会感到屈辱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钢铁纵队几乎或者根本得不到人员和物资援助的原因。

这种抵制对于钢铁纵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内战初期那几个月，它可以自己征兵并且在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后方村镇委员会的协助下，依靠没收财物补充军用。

“我们驻扎在巴伦西亚[期间]注意到，”纵队发表的一份宣言声称，“鉴于我们购买武器的谈判因为缺乏硬通货而失败，而许多船只却装载了大量黄金以及其他贵重金属，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没收了一些珠宝商的货船上的黄金、白银和白金。”¹⁰“[一九三六年]十月前后，”一位历史学家叙述道，“钢铁纵队离开前线……开赴巴伦西亚，沿途造成一片恐慌。它的目的是‘清除后方所有危害革命利益的寄生虫’。在巴伦西亚，它扫荡了旅馆和饭店，使城市陷入恐惧中。在对珠宝店的搜查中，它没收

了能找到的全部黄金和白银。”¹¹

据一份无政府工团主义日报报道，在卡斯特利翁市区，钢铁纵队完成了“匡正不公抚慰良心的任务。它点起清理垃圾的火堆，将指控、证供、诉讼和刑事审判卷宗付之一炬，这些东西实质上是针对穷人的，地位卑微的弱者必须为其草率的行为、为其过失和不幸——实际上那是别人的罪过——付出代价，他们被施以可憎的肉刑并被羞辱性地剥夺了各种权利，而进行诈骗、抢劫和暗杀的重罪犯却逍遥法外。……在销毁这些堆积如山的文件的噼啪作响的火焰中……一部属于中世纪的官僚机器化为灰烬”。¹²

335 不过，随着政府权威的恢复，钢铁纵队对巴伦西亚地区城镇乡村的突袭很快就停止了。据一位共产党人历史学家说，“以在后方夜间‘作战’而著称”的钢铁纵队受到训练有素的政府军的“全面打击”对在巴伦西亚恢复权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¹³钢铁纵队的日报《火线》刊登的一篇报道表明，在反法西斯人民卫队（巴伦西亚的一支由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控制的警察部队）枪杀了一名放下武器的钢铁纵队成员后，一场冲突爆发了。报道声称，“这一罪行”在特鲁埃尔前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民兵部队中“引起了一致愤慨”。“[我们]商定第二天去巴伦西亚参加死难同志的葬礼并且要求追究责任。”据报道说，送葬的队伍一直“平静而沉默地”行进着，但在经过共产党的总部后遭到机关枪的扫射，造成一百四十八名民兵伤亡。“[由于]我们比他们更有责任感，……我们压抑住自己的愤怒。……我们不想采取报复行动或继续交战。……不过大家应当知道，我们的做法并不意味着害怕或者遗忘。尽管我们现在已经返回前线消灭法西斯分子，但总有一天，当我们想起这些事情以及应当对此负责的那些人时，他们将得到应得的下场。”¹⁴

由于革命热情的衰退以及内战爆发以来在自由主义运动内部遭到质疑，钢铁纵队对于志愿者的吸引力不再能够为它提供足够的新兵增援前线的战士。此外，各种革命委员会正在被正规的管理机构所取代，在这些机构中，革命的积极分子不再占有优势。更为严重的是，国防部不仅决定停止向一切拒绝按照规定的方式进行整编的民兵部队提供武器，而且以谨慎的措辞颁布法令要求所有战士的薪饷今后将由派驻各营的正规出纳人员发放——民兵以前是在没有监督而且不管薪饷结构的情况下将薪饷总额拨给

每个纵队。由于法令没有提到向不采用军队编制的部队派遣出纳，显然，如果钢铁纵队打算继续坚持民兵的组织形式，停薪断饷的日子将为期不远。

拉尔戈·卡瓦列罗将这项经过讨论的法令提交政府并在政府批准后颁布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共和国官方公报》。尽管法令的措辞谨慎，但是它的目的明确。关于这一点，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在向阿森西奥将军建议采取这一措施时对后者作了如下说明：“我建议现在颁布法令，使那些拒绝从民兵转变成军人的人领不到薪饷。如果我们向每个营派一名只给服从命令的士兵发饷的出纳，如果每个混成旅的出纳人员隶属于旅部的军需官，那么，这些混成旅，而且随后是整个军队，显然就能立即变得井然有序。同时，这将杜绝在‘钢铁纵队’出现的那种弊病，它还不到三千人，每月却收到六千人的薪饷。”¹⁵关于这些弊病，根据社会党左派议员、南部前线政治督察委员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巴列斯特罗斯提供的情况，马拉加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民兵部队在虚报薪饷方面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仅仅两周他们就比应得的薪饷多领了四十万比塞塔。¹⁶但是，我们不应由此推定，虚报薪饷仅限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民兵部队，因为夸大第五团规模的共产党人纵容同样的做法。¹⁷

336

尽管钢铁纵队先前一直反对军事化，比普通成员更了解纵队困境的作战委员会现在已经认识到，继续采取不妥协的立场并不明智。他们知道，面对政府的压力和全国劳工联合会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阶层的敌意，部队无法坚持下去，如果不实行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所主张的有限的军事化，它将失去对其生存来说必不可少的物质支持。但是，能够使部队就范吗？不安的情绪和低落的士气正在蔓延，在倾向于反抗的士兵当中已经出现了怨言和威胁，如果引进军事化，哪怕是最松散的形式，他们也将离开前线。仅仅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这一天，就有九十七名士兵离开前线，而作战委员会则指责他们是逃兵。¹⁸

在这一紧要关头，一九三七年一月底，当危险从四面八方钢铁纵队袭来时，作战委员会向其成员发表了一份重要的报告：

[起初]，政府是一个无人在意的幽灵。工人阶级组织劳动者总工

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是西班牙人民的唯一保证，……[但是]在几乎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我们自己敬爱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本身成为一个没有活力与生气的幽灵，把它的影响和声望注入了政府。它现在只是政府的又一个附庸和革命火焰的又一个灭火器。

刚一变得强大起来，政府立即开始进行整顿，现在，它已经控制了一支军队，与其他政府的军队属于一类，与过去那种专用的镇压工具也没有区别。像以前一样，警察对那些试图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的工人采取行动。人民的民兵已不复存在，简单地说，社会革命已被扼杀。

如果我们得到政府的帮助而且得到我们组织——我们指的是那些负责任的委员会——的帮助，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作战物资和人员支援我们的同志。但是情况不是这样，因此，我们不得不让我们的战士月复一月在掩体后面穿着破旧的衣服打仗。这种自我牺牲不为人知，也不能要求任何人，而且天天都有许多问题发生。……我们承认纵队内部的问题解决起来有困难，因此，在严重的事态出现之前，在士气低落和身体疲劳蔓延之前，在以前所未有的牺牲为代价赢得并坚守的胜利成果遭到猛烈打击之前，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们重申，必须找到一种让所有人满意的方案。……如果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部队全部都被军事化，而我们作为唯一一支不接受军事化的部队站出来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决定，那么，我们不仅将会失去来自政府的帮助，而且将会失去来自我们自己组织的帮助。由于这些必要的帮助，我们这个纵队才能保持符合我们特点的革命原则完好无损，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因为失去了这些帮助，我们的作战方法失灵了。

我们知道，我们的同志绝大多数都会对应当为此负责的那些人表示愤怒，不过，我们希望指出的是，他们的抗议将被政府粗暴地扼杀。不再可能组成任何违抗政府意愿的组织，因为无论什么东西妨碍了它，它都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去镇压。此外，这一段时间极其危险的情况迫使我们压住自己的怒火。我们必须再一次向基督学习。

我们知道军事化的弊端。它既不符合我们的性格，也不符合另外

一些始终具有美好的自由观念的人的性格。但是我们也知道置身于国防部管辖范围之外的不便之处。实际上令人悲哀的是，必须承认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解散钢铁纵队或者使其军事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¹⁹

在报告的结尾，作战委员会表示希望把军事化问题提交当时正在进行的一次纵队集会予以讨论。但是，尽管讨论了这个问题，却没能作出任何决定。因此，《今天》大约在这个时候发表上一章所引述的那一次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的采访并非偶然。这位书记在采访中煞费苦心表示，将民兵部队按照全国委员会同意的方式改编为混成旅不会造成任何根本性的变化。然而，就连这种保证也没有缓和激烈反对军事化的那些人的强硬态度，他们构成了纵队成员的大多数。

可是，事情在三月初突然令人震惊地发展到高潮。

肯定是与内阁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同僚磋商之后，国防部长特意为加快钢铁纵队的军事化进度发布了一道命令，拉尔戈·卡瓦列罗在这道命令中宣布，特鲁埃尔前线的民兵部队从四月一日起将隶属于国防部，并且任命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的托雷斯-贝内迪托纵队指挥官何塞·贝内迪托为总参谋部编制部门的官员，以完成必须进行的整编。²⁰与此同时，据马丁·布拉斯克斯说，钢铁纵队被告知，将强制执行十二月三十日颁布的那一项要求由隶属于总军需官的各营出纳发放薪饷的法令。²¹

无论作战委员会私下里对这些事态发展的看法是什么，它被迅速蔓延于钢铁纵队的愤怒淹没了。在一次全体会议上，民兵们拒绝接受部队整编和新的财务条例，接着，许多人决定离开前线以示抗议。

338

自称促成了这项法令的马丁·布拉斯克斯对此写道：“特鲁埃尔前线的无政府主义‘钢铁纵队’的一部分人反对强制执行我该项关于军队财务制度的法令。他们断言，政府正在变成一个反革命政府，它正在组织一支雇佣军，准备剥夺人民在军队和警察销声匿迹的一九三六年七月所取得的胜利成果。他们要求整个纵队的薪饷像以前一样按总额拨付，既不接受营的编制，也不接受新的财务安排。”²²

在返回后方途中，钢铁纵队的几个百人队在比拉内萨村卷入了一场突击卫队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武装冲突。“在小规模的暴力事件平息后，”社会党左派内政部长安赫尔·加拉尔萨在几天之后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警察莫名其妙地遭到袭击以致不得不进行增援。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负责人没有下令的情况下，某个组织的成员下令在巴伦西亚省的几个村庄进行了某种形式的总动员，试图切断通讯、阻止交通并且进入警察部队驻扎的村庄。”²³在一场双方均有一定伤亡的战斗之后，两百多名无政府主义者被抓获，据《我们》报道，其中有九十二名钢铁纵队成员。²⁴

由于担心这种对抗可能被国防部当做征召钢铁纵队成员加入正规军的借口，或是担心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的地方组织可能打算将他们并入自由主义运动的其他部队，钢铁纵队作战委员会发表了以下谨慎的通告：

“钢铁纵队既没有被解散也不打算解散或者实行军事化；根据纵队全体成员同意的决定，它已要求换防以便休息并自行整编。现在这件事情正在进行。目前只有大概三个百人队还在等待换防。在换防完成之后，将召集全纵队开一次会，到那时，我们将以一贯的严肃性和责任感对纵队的立场和要走的道路作出决定。所以，在那之前，肯定不会征召同志们加入其他改编的部队，……因为，当他们属于一支正在休整的部队时，谁也不能强迫他们那样做。”²⁵

不过，此时的钢铁纵队实际上处于一种分崩离析的状态。共产党人肯定会为拉尔戈·卡瓦列罗制订立即征召其成员加入正规军的方案。“必须结束政党和工会保留民兵和独立部队的状况，”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宣言说，“同时建立一支军队。”²⁶但是，拉尔戈·卡瓦列罗并没有采取将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视为危及其他自由主义民兵部队的先例的措施。于是，在召开决定钢铁纵队未来的大会之前那几天，作战委员会得到了片刻喘息的机会，它要在这次大会上为实行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同意的有限的军事化赢得民兵战士的支持。当事情处于这种状态时，无政府主义报纸《我们》发表的下面这篇由一名纵队成员所写的文章意义重大。²⁷

我是一名从圣米格尔·德洛斯雷耶斯监狱逃出来的囚犯。国王建立这座阴森的监狱为的是活埋那些决不向权力所制订的针对被压迫者的丑恶法律屈服的人，因为他们不是懦夫。像许多人一样，我被带到这里以消除犯罪行为；那就是，因为洗雪整个村庄曾经蒙受的耻辱；简单地说，因为杀死了一个政治恶霸。

我是年轻人而且依然年轻，因为我二十三岁就进了监狱，后来，多亏无政府主义的同志们打开了监狱的大门，我在三十四岁时获释了。十一年来，我受到非人的折磨，我只是一件东西，一个号码！

许多像我一样出生以来就忍受着所受到的恶劣待遇的囚犯与我一道获释了。其中一些曾经四处流浪的人自己走了；另一些人像我一样加入了我们解放者的队伍，解放者待我们像朋友，爱我们如兄弟。与解放者一起，我们一步步建立了钢铁纵队；与解放者一起，我们以越来越快的节奏袭击兵营，解除凶恶的[国民]卫队的武装；与解放者一起，我们毫不客气地把法西斯分子驱赶到他们现在把守的山顶。……

几乎没有人曾经关心过我们。我们离开监狱以后，大家身上仍然保留着资产阶级麻木不仁的特性；所以，人们不是关心我们，不是帮助并且支持我们，而是把我们当做不法之徒来对待，指责我们无法管束，因为对于某些具有愚蠢念头的人来说，我们希望并且仍然希望自由就是不安于生活的节奏，这些人在某个部或某委员会占据着一席之地，荒唐而傲慢的认为自己是人类的主宰；另外还因为，没收了法西斯分子的财产之后，我们在所经过的村庄改变了生活的方式，消灭了横行乡里、掠夺虐待农民的政治恶霸，将其财产交给那些知道它们如何而来的人：工人。……资产阶级——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占据着许多位置——不停地编造一系列谎言对我们进行恶毒的诽谤，这让我们感到高兴，因为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反抗以及我们心中对于自由的渴望——这种渴望像高山上的雄鹰、丛林中的狮子一样无法抑制——伤害了他们，只有他们可能被这些东西所伤害。

有一些我们的兄弟，和我们一起在田间工厂吃苦受罪、和我们一样受到资产阶级无耻的剥削，可是，就连他们也与资产阶级的极度恐慌产生了共鸣，因为那些希望被人当做领袖的人告诉他们，在钢铁纵

队战斗的人是残忍的歹徒。……

有几天晚上，在漆黑的夜色中，当全副武装、高度警觉的我试图穿透战场的朦胧看清隐秘的东西时，我会像做梦似的从掩体后面站起来，……怀着一种开火的热望抓紧步枪，不仅向隐蔽在不到一百码之外的敌人开火，而且向隐藏在我这一边、把我称为同志的另一些敌人开火。……我还会感到想笑，想哭；我想跑过田野撕破喉咙高喊，就像我用铁钳一般的手指撕破那个下流的政治恶霸的喉咙一样；我想把这个卑鄙的世界砸个粉碎，在这个世界上，很难找到一只充满关爱的手，为那些从战场上归来的劳累的战士和伤员，擦去脸上的汗水，止住伤口流出的血。……

在凄凉、阴沉的某一天，我们必须实行军事化的消息像一阵刺骨的寒风袭击了山顶。它像一把匕首插入我的身体。……

我曾经在军营里生活过，我在那里学会了恨。我曾经坐过监狱，奇怪的是，在那里的悲伤和痛苦中，我学会了爱，学会了热烈地去爱。在军营里，我几乎丧失了人格，他们非常严厉地对待我，试图把愚蠢的纪律强加于我。在监狱里，经过艰苦的斗争，我重新找到了人格，因为每一次惩罚都使我更难对付。在那里，我懂得了要完全彻底地敌视所有等级制度；我还懂得了，在最深重的苦难中，要爱我那些不幸的兄弟。……

由于这种经历……当我在远处隐隐约约听到军事化的命令时，我感到全身瘫软无力，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革命使我产生的游击队员的大无畏精神将要消亡……我将再次掉进唯命是从的深渊，陷入军营和监狱纪律所导致的浑浑噩噩的非人状态。……

从没有人给过我们任何安慰，更糟糕的是，从没有人说过一句同情的话。所有人，法西斯分子和反法西斯分子，甚至我们自己运动的成员——我们感到非常可耻！——都讨厌我们。我们从未被人所理解……[因为]我们希望在战争期间过一种基于自由主义原则的生活，而其他人则要把不幸的自己和我們绑在政府的战车上。……

记录人类善行和罪恶的历史总有一天会说话，它会说，钢铁纵队是西班牙唯一一支具有革命应有的清醒看法的部队。它还会说，在

所有部队中，我们的部队对军事化进行了最坚决的抵制，由于这种抵制，它完全改变自己命运的情况发生了。……

我们过去反对军事化是因为我们了解军官的情况。我们现在反对军事化是因为我们了解他们现在的情况。……我曾经见过……我亲切地跟他说话的一位军官气得或是厌恶得发抖，我也知道部队现在的情况，它们那些自称无产阶级的军官已经忘记了自己卑微的出身，不许民兵称他们为“你”（thou），²⁸违者将受到可怕的惩罚。

我们在战壕里经常活得很愉快，……[因为]我们当中没有谁高人一等，我们大家都是朋友，都是同志，都是革命的游击队员。小组或者百人队代表不是强加于我们的；他是我们选出来的。他不把自己当成一名中尉或者上尉，而是当成一名同志。纵队作战委员会的代表也不是上校或者将军；他们是同志。我们总是一块吃饭，一同作战，一起欢笑和发誓。……

我不知道我们接着如何生活。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习惯下士、中士和中尉的凌辱。我不知道在最完整的意义上体验了做人的感觉后，我们能不能习惯做家畜，因为这是纪律的要求和军事化的含义。……

但是时间紧迫。我们落入了……一个圈套，我们必须摆脱它；我们必须尽力摆脱它。……主张军事化的人在我们周围比比皆是——我们自己的阵营中就有一些主张军事化的狂热分子。昨天我们是主流；今天他们是主流。除了由人民组成之外，人民军与人民没什么关系，它不属于人民而属于政府，指挥它的是政府，对它发号施令的也是政府。……

当我们被主张军事化的人包围时，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是……解散钢铁纵队，第二条路是对它实行军事化。……

[但是]这个纵队，这个从巴伦西亚到特鲁埃尔使资产阶级和法西斯分子闻风丧胆的钢铁纵队决不应当被解散；它必须继续坚持到底。……

如果我们准备解散这个纵队，如果我们准备解散之后应征入伍，那么，我们将不得不与某些人为伍，他们不是我们选择的人，而是驱使我们前进的人。……

无论我们被称为纵队还是营或师，从第一天起我们就为之贡献了壮丽篇章的革命——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我们不要缴械投降，不要放弃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形成的紧密团体。

342

三月二十一日，星期天，确定召开投票决定钢铁纵队未来的大会的日子，对于纵队所有成员来说，这是意义重大的一天。在过去的几周，各方面一直敦促作战委员会接受军事化作为解散之外的唯一选择；现在，由于激情耗尽而且纵队面临着解散，显然，军事化的支持者肯定可以如愿以偿。在大会上，作战委员会用来支持将纵队改编成旅的理由是，属于原有小组的民兵随后将被政府征召；即使他们决定解散，不久之后他们也将被召入政府组织的正规部队；国防部同意，在建议改编的这个旅中，四个营全部由钢铁纵队的成员组成，只有炮兵由职业军官指挥。²⁹这些理由非常充分，足以保证大会投票赞成改编。

几天后，作战委员会向纵队成员宣布，这支部队将改编成为正规军第八十三旅。³⁰事实上，一些纵队成员加入了另外几个无政府工团主义旅。指挥第八十二旅的墨西哥著名画家、墨西哥共产党员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证实：“因为我是墨西哥军官，³¹所以派我指挥由前钢铁纵队和罗萨尔纵队的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部队，由于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信念，他们不切实际地反对所有军事纪律观念。另外一些墨西哥军官[其中有共产党员胡安·B.戈麦斯上校]也被派去指挥具有同样信念的部队，因为与敌视苏联正好相反，无政府主义者热爱墨西哥，这有利于我们的整编工作。”³²

注释：

1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社会熔炉报》。

2 胡利安·卡萨诺瓦·鲁伊斯在《阿拉贡地区农业社会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与革命，1936—1938》一书中（第106—107页）坚持认为，钢铁纵队对政府的敌意没有我在《精心的伪装》（西班牙文版，1975）中所描述的那么强烈，我在那本书里使用的措辞与这里相同。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论点以对马德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报》所发表的一篇社论的严重误解为依据，这篇社论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被钢铁纵队的喉舌《火线》转载。与卡萨诺瓦断言的相反，这篇社论并不是主张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中央政府，而是主张它加入一个作为政府的替代物被建议成立的国防委员会。读者也许还记得，一九三六年九十月间，全国

劳工联合会一直在为成立一个国防委员会大造声势，只是由于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反对彻底改变了它的立场，它才在十一月初加入了政府。我重新查阅了可以找到的各期《火线》，没有发现应当修改我对钢铁纵队的描述的内容。卡萨诺瓦为历史学家开办了一个关于《火线》这一类原始资料的“价值非凡”的免费讲座，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不仅公然曲解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火线》转载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报》这篇社论，而且避而不谈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火线》对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加入政府的猛烈抨击。

- 3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社会熔炉报》。
- 4 这是全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的一名钢铁纵队代表提供的数字，报道见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社会熔炉报》。另请参阅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296页。
- 5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我们》。
- 6 巴伦西亚的一名与钢铁纵队成员关系密切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向我承认了这一点。
- 7 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费德里卡·蒙特塞尼强调了这种矛盾并且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地区委员会要求钢铁纵队清洗自己队伍中的这些罪犯（这封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8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四日《火线》。见本章注释2。
- 9 这一情况是巴伦西亚的某个消息灵通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告诉我的。
- 10 见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七日《无产阶级文化报》。
- 11 拉斐尔·阿维利亚，《内战期间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的日常生活》，第111页。另请参阅阿道弗·布埃索《一名全国劳工联合会会员的回忆》，第二卷，第220页。
- 12 被阿维利亚引用，见《内战期间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的日常生活》，第111页。
- 13 卡洛斯·略伦斯，《巴伦西亚和特鲁埃尔前线的战争》，第50—51页。
- 14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火线》。
- 15 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296页。
- 16 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巴列斯特罗斯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向总政治部提交的报告（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17 在回答一份问卷时，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副总理鲁道夫·略皮斯向我证实了这个情况（他的答卷现存胡佛研究所）。另请参阅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劳动者总工会与内战》，第10—11页。
- 18 见钢铁纵队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我们》上的声明。
- 19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我们》。
- 20 《国防部官方日志》，载一九三七年三月七日《巴伦西亚通讯》。
- 21 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323页。
- 22 同上。
- 23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三日《人民报》。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对这一事件的描述，见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情况通报与组织动向》。尽管这些报告均未提到钢铁纵队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当时大家都知道，其成员是事件的主要参与者。
- 24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我们》。
- 25 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发表，刊登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九日《我们》。
- 26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九日《红色阵线报》。
- 27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二至十三日和十五至十七日《我们》。
- 28 在西班牙，这个单数第二人称用于昵称。
- 29 见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我们》。
- 30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我们》。

- 31 一九三七年初到达西班牙几周后接受我的采访时，西凯罗斯说：“战争结束之前我不会再画画了，因为我认为……对于现在的西班牙，我的军事经验比我的天分更有价值。……如果佛朗哥获胜的话，他的胜利将给墨西哥那些想要破坏群众在二十六年的斗争中所取得的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以极大的精神鼓舞。因此我相信，为西班牙而战就是在为墨西哥而战。墨西哥是拉美国家的领导者。……这里的胜利将极大地加强整个拉丁美洲的革命进步力量。”摘自我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 32 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我被称为上校（回忆录）》，第322—323页。

拉尔戈·卡瓦列罗与莫斯科决裂

尽管钢铁纵队这一事件很重要，但它只是为几周以来一直在政府驻地巴伦西亚进行的明争暗斗带来了一点波动。

一九三七年二月初，随着战略港口马拉加的失陷，争斗变得更加险恶。在极度的混乱中，由西班牙和意大利部队组成的具有压倒优势的敌军迫使组织松散、装备不足、被意见分歧和相互猜疑弄得四分五裂的民兵部队仓皇溃逃，沿着海岸线从马拉加后退了八十多英里。我保存了两份与马拉加失陷有关的重要文件的副本。¹希望公平分摊责任的人谁也不能忽视它们，因为它们与何塞·阿森西奥将军的《阿森西奥将军：忠于共和国》、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的《共和国人民军史》²和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的《安达卢西亚战役》³等书中所提供的宝贵资料共同构成了认真研究这一问题的基础。一份文件是负责南部前线马拉加防区的无党派职业军官何塞·比利亚尔瓦上校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二日向战时高级委员会成员所作的关于这次溃败的详细汇报；另一份是担任南部前线政治督察委员的社会党左派人士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巴列斯特罗斯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向总政治部提交的一份报告。这些文件提到，马拉加防区缺乏军纪和组织；后方混乱无序；职业军官和民兵指挥官不负责任；不同党派之

间的斗争贻误军事行动；共产党努力发展党员；马拉加防区政治部主任卡耶塔诺·博利瓦尔过多地任命共产党人政治委员；肆意忽视防务工作；两名阵地指挥官罗梅罗和科内霍变节投敌；枪炮弹药供应不足；缺乏海军和空军的援助；最后还有，国防部没有对比利亚尔瓦上校及其他指挥官多次提出的增援和补给要求作出回应。在这场溃败中，最不幸的人物之一是比利亚尔瓦本人，他是在敌军突破埃斯特波纳以东的防线后一切开始变得不可收拾时被派到马拉加防区的。

“不用担心。他将一去不复返！”据说，国防部副部长阿森西奥将军在签署比利亚尔瓦的委任状时对国防部战术参谋部门负责人安东尼奥·科登这样说。⁴的确，被国防部选作替罪羊的比利亚尔瓦后来遭到逮捕和监禁。⁵不过，在关押了一年多以后，他被证明对这场失败没有责任并且恢复了名誉。⁶

在安赫尔·戈略内特和何塞·莫拉莱斯合著的亲民族主义著作《马拉加：血与火》中可以看到一个电话话务员所作的一份速记记录，它记录的是二月八日零点刚过比利亚尔瓦与阿森西奥之间的一次激烈的通话。尽管这本在内战期间所写的书具有宣传的性质，但是，根据我在比利亚尔瓦从马拉加返回巴伦西亚之后立即对他进行的几次采访判断，摘自这份记录的下列内容看起来真实可信：

比利亚尔瓦：听着，佩佩，我已经收到国防部要求返回马拉加的命令，但是——

阿森西奥：你不应当离开马拉加。

比利亚尔瓦：法西斯分子已经进入马拉加，否认这个情况的人在说谎。……

阿森西奥：你不应当活着离开马拉加。你应当按照部长的命令坚守在那里。

比利亚尔瓦：你不知道马拉加正在发生什么。你是说，我应当返回马拉加？我觉得，你想让我向佛朗哥投降？

阿森西奥：你必须返回马拉加。你就不应当离开它。

比利亚尔瓦：显然，为了让凯波[民族主义将领贡萨洛·凯

波·德·利亚诺]能够抓住我！这就是你希望的吧！

阿森西奥：你已经收到返回马拉加的命令，因此，你必须与部队一起回去。

比利亚尔瓦：与什么部队？我已经没有部队了，他们只是一群乌合之众。我警告你，如果你不及时提供援助，不仅是马拉加，莫特里尔也将失守。但是，请注意，如果法西斯分子已在那里，我怎么可能返回马拉加？

阿森西奥：法西斯分子不在那里。……

比利亚尔瓦：你是说我应当向佛朗哥投降。在你的位置这样说很容易。你不应当活着离开纳瓦尔卡内罗[话务员注明，这个地名“有点像”纳瓦尔卡内罗]。无论如何，我会努力进入马拉加；我将返回那里，但是，请记住，这是你又一次卑鄙地欺骗了我。

阿森西奥：在军队中，没有卑鄙的欺骗，只有命令！⁷

共产党人千方百计地利用马拉加的惨败推进他们的军事政策。日复一日，周复一周，他们一直在敦促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将其当政初期所认可的军事措施付诸实施，⁸现在，马拉加的失陷为他们的主张提供了有力的说明。当然，他们大肆进行鼓吹不能说不是出于私利，因为他们认识到，严厉实施这些措施不仅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一种手段，而且可以制造一部军事机器，只要党控制了这部机器，就将确保他们在国家事务中的支配地位。因此，他们不能忍受拉尔戈·卡瓦列罗对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的迁就，尤其不能忍受他在征兵问题上的拖延，特别是在自愿参军的人员减少而部队由于伤亡需要源源不断地补充新兵时。他们也不能忍受他在其他问题上懒散拖拉的表现及其战前养成的难以改变的生活习惯。“极其重要的军事文件堆积如山，无人看管，无人批阅。”科利佐夫在日记中写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卡瓦列罗晚上九点就得睡觉，而且谁也不敢叫醒这位老人。即使马德里在半夜失陷，政府首脑第二天上午才会知道。”⁹曾经担任总参谋长托里维奥·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将军的苏联顾问的基里尔·A.梅列茨科夫写道，人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使卡瓦列罗改变其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每当他去睡觉时，他与外界的所有联系被切断，他

的所有接见被取消。”¹⁰

346

在这些苏联人的观察资料中，肯定有某些夸大的内容，因为，就连坚定的西班牙共产党人、卡瓦列罗手下由国防部副部长掌管的战术参谋部门负责人安东尼奥·科登也承认，国防部长为国防部制定了一个“合理的工作时间表”。“他严格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工作，上午八点准时开始……直到晚上八点结束，有一个非常短暂的进餐时间。他在八点钟就寝，除非事情非常严重和紧急，谁也不许打扰他。”¹¹

无论卡瓦列罗的生活习惯如何，共产党人及其苏联盟友仍然可以忍受，就像他们尽量忍受另外几位更加顺从他们意愿的西班牙人的习惯一样，例如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和胡安·内格林。但是，正如科登所说：“我很快发现，这位社会党领导人的坚定性格——它曾经受到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钦佩——建立在固执的基础上，由于过高估计了自己的素质和重要性，它往往变成一种负面特征。”¹²的确，共产党人发现这种人难以对付。此外，正如科利佐夫在日记中所说，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作风生硬”。“他不时地大声吼叫；他不允许有反对意见。作为国防部长，他亲自解决军事问题。”¹³

早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主要由于共产党的压力，政府决定征召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的适龄人员入伍，¹⁴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部分由于拉尔戈·卡瓦列罗认为志愿者的士气高昂并且具有更强的作战能力，¹⁵部分由于他知道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反对征召他们的成员加入政府的部队，而他需要他们的支持，因此，这个决定一直停留在纸面上。

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同意对政府宣布的那两年的适龄人员进行动员，不过，这附带了下列条件：所有持有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会员证的人应当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召入自己的民兵部队服役。在加泰罗尼亚，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地区委员会就此决定发表声明：“鉴于把我们的部队完全交给政府指挥非常幼稚，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被动员的两年]适龄人员中所有属于我们工会组织的人应当立即去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兵营报到，在没有这种兵营的地方，立即向工会或者[当地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保卫委员会报到，它们将对报到者的组织关系、年龄、职业、社会阶层、住址以及所有必要的情况进行登记，然后把一份报告寄到尼古拉斯·萨尔梅龙

广场十号的加泰罗尼亚地区保卫委员会。该委员会将给登记入册的同志颁发民兵证，当然，这些同志今后将受地区委员会的调遣，委员会将把他们派往指定的部队或前线。”¹⁶

一九三七年二月，马拉加失陷后不久，当共产党控制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指责政府不实行强制征兵时，拉尔戈·卡瓦列罗反驳说，政府既没有营房给征召的士兵驻扎，也没有资金和武器给他们发饷并训练他们。¹⁷此外，几天前在回答共产党提出的实行征兵的要求时，他有些虚伪地宣称，根据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九日颁布的对二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的所有身体健康、有义务服役的人员实行征兵的法令，¹⁸已经在“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实施了义务兵役制。他接着说：“政府和国防部要求各个党派和工会组织应当督促它们的成员接受这一法令规定的原则，以便在军事当局认为有必要征召服役年龄的人员入伍时，不会遇到任何障碍。本部长认为，希望共同保卫国土抗击外国入侵的人应当这样进行宣传而不是向政府提出已经采取过的法律措施的问题，例如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九日颁布的法令。”¹⁹

347

但是实际上，这是为了掩盖没有实行强制征兵而进行的含糊其辞的诡辩，结果，几天之后，在共和派与社会党温和派内阁成员的支持下，共产党人政府部长不仅迫使卡瓦列罗重申征召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的适龄人员入伍，而且把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的适龄人员包括在征召的范围内。²⁰不过，这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自由主义运动的问题。三月初，注意到政府动员令的全国劳工联合会阿拉贡地区委员会敦促当地的工人向全国劳工联合会为给自由主义运动民兵部队招兵买马而设立的征兵站报到。²¹三月十五日是被动员的适龄人员分别向各地的征召中心报到的日子，²²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和自由主义青年运动半岛委员会当天发表了一份共同宣言，禁止工人“加入正规军”，命令他们接受“指挥战争的机构”的安排，这当然指的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各地成立的保卫委员会。²³鉴于所有这一切，也就难怪几周之后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报道说，已经得到证实的是，在埃斯特雷马杜拉的一些村庄，有人力劝那些按照政府的动员令应当加入正规军的人不要这样做，然后开始把他们组成具有“某种政治或者工

会特征”的部队。²⁴

与此同时，西班牙共产党试图以另一种方式利用马拉加的惨败：它要求清洗所有指挥岗位。虽然这个要求表面上针对的是受到怀疑或不称职的军官团成员，²⁵但它很快就被证明是专门针对拉尔戈·卡瓦列罗所任命的那些反对共产党渗入军队的人的。用本书经常引用的前共产党中央委员恩里克·卡斯特罗的话说：“马拉加失陷与其说是一场军事失败，不如说是党为争夺‘控制权’而开展最困难的政治斗争——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斗争——的一个极好的借口。”²⁶

348

共产党人的第一个目标自然应当是何塞·阿森西奥将军，因为，作为国防部副部长，他在国防部占据着仅次于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重要位置。人们还会记得，为了回应共产党人所提出的解除阿森西奥中部前线指挥权的要求，国防部长以对抗的姿态将其提拔到这个位置上。拉尔戈·卡瓦列罗多年以后写道，对阿森西奥将军的攻击“难以形容”。“我已经被迫解除了他的中路军司令的职务。……现在，[共产党人]决心将他赶出国防部。

‘为什么？’我问他们。‘因为他是一个叛徒！’‘拿来证据给我看，证据！’……可是他们从未出示过任何证据。在每一次内阁会议上，那几个[共产党人]部长总是提出同一个问题：必须罢免国防部副部长；他在国防部是一个危险因素。我要他们拿出证据；他们表示可以提供，但却从来没有提供。莫须有啊！……在确信指责他是叛徒不起作用以后，他们指责他是一个酒鬼和玩弄女性的人。我回答说，我从来没见过他喝酒，另外，由于我确实知道他们吸收同性恋入党，所以我对他们因一位西班牙将军喜欢女人而谴责他感到意外。”²⁷

但是，共产党人没有因卡瓦列罗的固执而气馁。阿森西奥现在已经成为他们夺取军队控制权的计划的一个重要障碍，以致苏联大使马塞尔·罗森堡亲自出马要求将其撤职。拉尔戈·卡瓦列罗满腔愤怒地将这位苏联外交官赶出了他的办公室，以此回答了这个要求。

社会党左派议员希内斯·甘加生动地记述了得到总理的几位同僚证实并被拉尔戈·卡瓦列罗本人在其发表及未发表的回忆录中确认的这一标志性事件，²⁸他肯定地说，罗森堡威胁卡瓦列罗，如果将国防部副部长撤职的要求得不到重视，苏联将撤回它的援助。甘加写道：

苏联大使阁下的日常巡视最初给我们这些惯于出入国防部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们对此习以为常。他每天在总理兼国防部长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办公室里待几个小时。……罗森堡通常由一位翻译陪同，但可不是普通的翻译！那不是一名大使馆的秘书，而是共和国的外交部长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先生！……

一天上午，紧闭的屋门后面的巡视已经持续了两个小时，这时，突然听见“老人”卡瓦列罗在大声说话。几个秘书聚集在办公室的门外，出于尊重没有人敢推开它。卡瓦列罗的声音急剧加大。接着，门突然打开了，年老的西班牙总理站在他的办公桌前，伸出胳膊晃动着手指指向门口，我们听见他用一种激动得颤抖的声音说：“滚出去！滚出去！大使先生，你必须知道，虽然我们西班牙人非常贫穷因而急需外国援助，但是我们有强烈的自尊心，不会让一个外国大使把他的意愿强加在西班牙政府头上！至于你，德尔巴约，最好不要忘了你是一个西班牙人，而且是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因此，你不该伙同一个外国外交官向你的总理施加压力。”²⁹

在他本人关于这一暴风雨般的事件的说法中，拉尔戈·卡瓦列罗证实，他不愿忍受莫斯科的干涉，后者“对待西班牙像对待苏联的殖民地一样”。在“傲慢而放肆”的巡视过程中，苏联大使和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声称，苏联反间谍机构已经发现阿森西奥将军叛变的证据，过了两个半小时，拉尔戈·卡瓦列罗站起来，拍着他的大理石桌面对大使说，不要再提这件事。“[我]非常恼火，因此[我]必须把他赶出办公室。”³⁰

将苏联大使赶走之后，拉尔戈·卡瓦列罗与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单独留下。“我为他按共产党的要求办事训斥了他。”卡瓦列罗回忆说，“他能回答的只不过是，由于人们都在说[阿森西奥是个叛徒]，即使不公平也应当解除他的职务。一个多么好的理由啊！但这么说的是什么人？除了共产党再无他人！”³¹

内战期间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成员、曾经支持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亲共人士阿马罗·德尔·罗萨尔非常简单而且片面地解释了西班牙总理对

苏联大使的态度，他说，与罗森堡的第一次个人冲突发生时，“卡瓦列罗处于某种长期烦躁的状态”。他告诉我们，在以前的各种场合，所有事情显示正常，“符合两国良好的外交关系，尤其符合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与一位享有革命盛誉的老资格社会主义战士之间的关系”。他断言，大使一如既往，而卡瓦列罗发生了变化。“他毫无理由地讨厌大使；这是由某种新的精神状态、某种政治上的变化、更可能是某种政治伤害所导致的个人应激反应。……罗森堡是卡瓦列罗的一个好朋友，一个可靠而且忠实的顾问，唯一一个帮助西班牙共和国的国家的代表。总理怎么可能对这个国家和它的代表产生敌视、抵触的态度呢？只要卡瓦列罗忠于一九三六年的卡瓦列罗，一切都将顺利进行；但是，到他开始背离使他掌权的政治路线时，他将因自相矛盾而陷入困境。”³²

阿马罗·德尔·罗萨尔在同一本书中说，“反对阿森西奥的活动是不正当的”，它“出于自私的职业野心”，阿森西奥是个“伟大的军人，实际上妨碍了另一些军人的前程”。³³其实，这种说法令人费解，因为这显然说的是共产党人安东尼奥·科登，正如科登本人公开宣称的那样，他一直与阿森西奥不和。³⁴尽管个人的心计和野心在倒阿森西奥活动中肯定起了某种作用，尽管科登的共产党同志在除掉阿森西奥的过程中肯定利用了这位野心勃勃的年轻军官——他在一年之后成为胡安·内格林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然而，毋庸赘言的是，反对这位将军的活动首先而且主要是为共产党的政治目的而不是为科登在国防部的个人野心服务的。人们应当记得，在反对阿森西奥的活动中，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共产党代表也竭尽全力向拉尔戈·卡瓦列罗施加压力。

350 阿森西奥事件表明拉尔戈·卡瓦列罗与苏联大使的关系恶化到了什么程度。就在将苏联大使赶出办公室几周前的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在回答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写来的信中提出的“西班牙政府[对罗森堡]感到满意还是必须用另一名代表替换他”这个问题时，拉尔戈·卡瓦列罗还令人放心地说，“我们对他的表现和积极性感到满意。他工作一直过于努力，损害了自己的身体健康”。³⁵

也许因为这一友好答复，或者因为他们希望拉尔戈·卡瓦列罗对苏联大使大发雷霆只是一个偶然事件，莫斯科和西班牙共产党对控制这位社会

党领导人并没有彻底绝望。实际上，他们仍然希望能够像其曾经促进两党青年运动合并那样，利用他的影响促进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合并。社会党左派领导人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说：“苏联人在整个内战过程中热衷于两党合并的计划。”他与卡瓦列罗的密切关系使他的话具有特殊的权威性，内战爆发之前，他个人像卡瓦列罗一样支持两党合并。³⁶“新的政党将叫做统一社会党，与加泰罗尼亚那个政党的名称一样，但实际上它将是一个共产主义政党，由共产国际和苏联当局控制并指挥。党的名称将会蒙蔽西班牙的工人阶级，同时希望它不会使西方列强提高警惕。斯大林强烈希望拉尔戈·卡瓦列罗利用他的政府权力及其在社会党内的巨大影响力促使社会党被共产党兼并。”³⁷

达到这一目的，将向共产党的绝对支配地位和建立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迈出一大步，谁能对此表示怀疑？

但是，尽管卡瓦列罗所控制的有影响的西班牙社会党马德里地方组织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阿拉基斯塔因属于该组织——战前拥护两党合并，³⁸但是，他的经历已使他对合并失去了最后一点热情。一九三七年五月被人设法赶下台后，卡瓦列罗说出了他对合并问题改变态度的另一个原因。“我唯一要求的事情是，”他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说，“那些曾经希望进行这种合并的人应当坚持我们制定的共同计划，那就是，应当在一个革命纲领的基础上实现合并。我非常清楚地记得，由于得到莫斯科的同意，共产党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条件提出来，每当谈到这个问题，我们总是说，我们应当与所有资产阶级政党断绝关系。”（这一段话与内战爆发以前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给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封建议两党合并的信有关。在人民阵线形成初期所写的这封信使用的是旨在迎合以拉尔戈·卡瓦列罗为首的人数占据优势的社会党左翼激进派而不是迎合以因达莱西奥·普雷托为首的社会党温和派的语言，它特别提出了下面这些条件：“完全独立于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政体彻底决裂”；“承认必须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并且以苏维埃的形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³⁹）“[共产党人]现在还像以前一样坚决主张我们应当与所有资产阶级政党断绝关系吗？”拉尔戈·卡瓦列罗接着说，“不，恰恰相反，他们现在的口号是，我们应当回到七月十八日以前。”⁴⁰

无论这个问题在卡瓦列罗和其他社会党左派领导人决定改变他们对两党合并的态度时实际上起了什么作用，毫无疑问，与其说他们不喜欢共产党现行政策的温和腔调，不如说他们痛恨它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破坏并且担心最终它将吸引那些无视这一问题的社会党人。一九三七年一月，一些社会党左派的重要人物进行了一次谈话，政府副总理鲁道夫·略皮斯对这次所作的以下描述表明了这一点。

谈话转向了所有真正的社会党人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即，共产党人的出尔反尔。有人当即描述了我们大家再熟悉不过的情况：共产党人在前线 and 后方开展运动；他们迫使各种组织驱逐社会党人；……他们露骨地劝人改变政治信仰，在劝诱的过程中无耻地使用应当受到严厉谴责的各种手段；他们一再对我们出尔反尔。他谈到了已经投靠共产党的那些社会党青年组织领导人的行为，还谈到共产党人对两名社会党议员内尔肯和蒙铁尔的“征服”。……与此同时，他补充说，我们的党没有显示出一点生气；[社会党温和派控制的]执委会始终保持沉默。……

另一些同志发了言。卡瓦列罗同样发了言。他只说了几句话，但是这些话清晰有力。“这里说的吸收是什么意思？”他问道。“决不会有人吸收我。党有不能抛弃的传统和潜力。……党不能灭亡。只要我活着，[社会]党就会存在！”⁴¹

即使是在内战爆发之前，当拉尔戈·卡瓦列罗还在幻想可以通过两党合并兼并共产党时，他就对合并变得谨慎起来，因此，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摆在他面前的诱人条件，甚至让他成为统一社会党领袖的承诺，⁴²已经不能使他同意他们的过分要求。关于战前那一段时间，他写道：

“[共产国际]想使共产党与社会党合并，然后将其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但它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共产党没有人具备完成这项艰巨任务所需要的影响和声望。……不幸的是，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在共产党的报刊上，我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党人，一个革命者，西班牙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忠实朋友，未来唯一的希望，西班牙的列宁！我的

照片刊登在报纸上，悬挂在电影院，陈列在商店的橱窗里，在西班牙和国外到处都是，甚至在苏联也随处可见。他们想唤醒我的虚荣心和野心，这是始终存在于人类心中的邪恶本能。但是，这些情感在我的内心深处长眠不醒。他们不了解我，否则的话，他们不会想出这么愚蠢的昏招。”在西班牙化名梅迪纳的共产国际代表比托里奥·柯多维拉曾经拜访拉尔戈·卡瓦列罗，催促他实施两党合并：“我将成为新政党的领袖从而成为西班牙的主人，因为合并一旦完成，所有工人都将加入这个政党，它将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卡瓦列罗没有同意：“[我]已经获得太多的经验，不会让自己受这些迷人的条件诱惑。”一九三六年九月他成为总理之后，压力卷土重来。“[我]礼貌地予以了拒绝。”柯多维拉并没有灰心，他再次拜访了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客人告诉我，这是进行两党合并的最佳时机；所有工人都在要求合并成为统一的党；由于我担任了总理，这将会是一个成就；尽快实现合并是明智之举，因为这样就将赢得战争。总之，他暗示，我可以而且应当发动一场政变。我压住怒火回答道，所有工人要求合并不是事实，而且，即使他们要求合并，我也不会参与这一勾当。我要他不要再提这件事。如果谁想实现工人的联合，他只能加入劳动者总工会和社会党。……[我]不打算以他建议的背叛行为给我纯洁的政治历史和工会生涯染上污点。……脸像熟透的石榴一样通红的梅迪纳离开了。……我将我担任的所有职位——总理、国防部长——以及未来的平静生活置于了某种危险的境地。”尽管遭到卡瓦列罗的断然拒绝，劝说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的最终努力仍在进行。西班牙驻莫斯科大使马塞利诺·帕斯库亚带着一个紧急请求突然抵达巴伦西亚。“[他]以斯大林的名义问我会不会进行两党合并，我给他的回答是‘不会！’”⁴³

几天前刚刚把苏联大使赶出其办公室的卡瓦列罗所做出的这一桀骜不驯的明确表示终于使苏联人认识到，继续尝试使这位社会党领导人屈从于他们的意志是徒劳的，于是，它成为一个信号，标志着一场逐渐削弱其仍然掌握的权力的诋毁运动开始了。无形之中，“愚蠢”、“无能”、“老态龙钟”这些词汇口口相传，⁴⁴这预示着内战期间最激烈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最后成为内战初期左派领导人中最有影响、最受大众喜爱的那个人的政治生命的终结。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当时身为西共中央委员的恩里

克·卡斯特罗注意到，这场历史性的斗争逐渐发展成为针对共产党以前的盟友、“针对这个国家历史最悠久的工人阶级政党、针对其毫无争议的领袖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斗争，他承认，当脑子里想着下面这些事情时，他“带着满足的微笑摩拳擦掌”：

353

“我们应当赢得这场斗争。我们应当赢得与社会党和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斗争。在群众的帮助下，在其他党派组织的帮助下！在社会党自己的帮助下！哈……哈。了不起！太了不起了！那些白痴指责我们对自己的盟友出尔反尔有什么关系？党正在做的不是它必须做的事情吗？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控制，可能进行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吗？傻瓜不应当感到惊讶！我们正在做的争取群众、完成一场真正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这些事不是什么新东西。这里有列宁和斯大林的教科书！想要了解其内容的人，想要知道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战略和战术是什么的人，可以看看这些教科书。没有什么新东西，没有任何新东西！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你们——你们所有人——都这么蠢，以致没有设法弄清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但这不是我们的错。错在你们！……我们的盟友政治上的愚蠢无疑是我们最好的盟友之一。”⁴⁵

他接着说：“西班牙从来没有见证过一场隆重的政治葬礼。现在它将见证了。政治家拉尔戈·卡瓦列罗很久以前已经开始垂死挣扎。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像他没有意识到一生中的许多重要事情一样。……[但是]这使他的政治死亡更加可怕，它将在一种近乎完全孤立的政治气氛中残忍而出其不意地降临。”⁴⁶

现在，为了与无情的对手作斗争，拉尔戈·卡瓦列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完全相信其政治判断力的人给予指点和支持，然而没有这样的人。他多年来关系密切的合作伙伴和良师益友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如今置身于巴伦西亚日常的云谲波诡之外远在巴黎当大使，尽管他是一个出色的辩论家，但是作为政治战略家却能力可疑。此外，曾经忠实地支持他的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圣地亚哥·卡里略、玛加丽塔·内尔肯、费利佩·普雷特尔和阿马罗·德尔·罗萨尔等人已经改换门庭效忠于共产党。更糟糕的是，他身边可以信赖的政治追随者只有三个人，由于共产党人在外国顾问的帮助下练就了分裂敌对组织、消灭政治对手的列宁主义权术，

三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他们的对手。首先是副总理鲁道夫·略皮斯，卡瓦列罗忠实的追随者和著名的教育家（曾任社会党控制的教师联合会主席），既没有必要的活力⁴⁷也缺乏政治敏感；第二个是一个名叫“阿尔法赫梅”（欧斯塔基奥·阿帕里西奥）的政治上的小人物；最后是一个年轻的新贵，傲慢而缺乏经验的前社会党议员信使何塞·马利亚·阿吉雷，他设法博取总理的欢心，因而得到不只是政治军事秘书职位和上尉军衔的慷慨奖励。⁴⁸

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在共产党人开展针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诋毁运动期间，阿吉雷深感力不从心并且对阿拉基斯塔因不在感到遗憾。在二月二十八日致驻法大使的一封私人信件中，阿吉雷写道：“要是你能与我们在一起就好了！……我对我们的头儿很有信心。但是，他太孤独了！没有人或者说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帮助他有效地开展那些必须开展的工作。”⁴⁹

人们必然产生的疑问是，肯定知道自己的头儿处境危险的阿拉基斯塔因为什么从未表示愿意返回巴伦西亚帮助他。

针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诋毁运动正在聚集更大的力量。

“为什么开展[反对我的]这种运动？你们知道为什么吗？”离开政府几个月后，拉尔戈·卡瓦列罗在一次公众集会上问他的听众。

因为拉尔戈·卡瓦列罗不想成为某些人在我国的代理人，因为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军事、政治和社会领域捍卫国家的主权。因此，在这些人认识到——当然，他们认识到得太晚了——卡瓦列罗绝不可能成为他们的代理人之后，他们改变了方针路线并且开始进行反对我的运动。但我可以证实，就在这一运动开展之前不久，有人向我提供了可以满足一个人的野心和虚荣心的一切：我可以成为统一社会党的领袖；我可以成为西班牙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我将得到与我打交道的那些人的支持；但是都有一个条件，我要执行他们的政策。于是，我回答道，我决不会这样做。

正如刚才我所说，他们了解我了解得太晚了。他们应当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拉尔戈·卡瓦列罗既没有叛徒的性情也没有叛徒的本质。我断然拒绝[执行他们的政策]，结果，有一次……我与某个国家的官

方代表之间出现了非常激烈的场面，更加谨慎是他们的义务，但他们没有履行这种义务。于是，当着他们的一个代理人——尽管是一个担任着某部部长的代理人[指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面，我告诉他们，拉尔戈·卡瓦列罗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对于我国政治生活的干涉。⁵⁰

注释：

- 1 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其他关于马拉加溃败的重要文件可以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找到，见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集，第六十三档案盒，普通文件1，特定事件1，马拉加。这些文件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
- 2 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的，《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一卷，第803—857页。
- 3 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安达卢西亚战役》，第139—242页。
- 4 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293页。另请参阅该书第264和292—295页。
- 5 控告比利亚尔瓦的起诉书文本见马丁内斯·班德《安达卢西亚战役》，第218—224页。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好友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说，马拉加的共产党议员兼马拉加前线政治部主任卡耶塔诺·博利瓦尔应当对马拉加的失败负主要责任，在这场失败中，博利瓦尔通过“随心所欲地恣意撤换非共产党员军官和负责人干扰了军事计划”（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155页）。
- 6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先驱报》。内战爆发时，比利亚尔瓦上校是阿拉贡的巴尔瓦斯特罗要塞的指挥官。他不参加军事叛乱对半岛谋反的组织者埃米利奥·莫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这使毗邻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民兵武装有足够的时间占领阿拉贡地区的大部分地方。莫拉后来指控比利亚尔瓦索要十万比塞塔作为他的部队参与谋反的条件（莫拉一九三七年一月发表的演说，见《莫拉文集》，第1188页），但是，据我所知，尽管莫拉的秘书伊里瓦伦提到过这一点（斯坦利·G.佩恩，《现代西班牙的政治和军队》，第508页，注释59），它并没有得到其他资料来源的证实。更多关于比利亚尔瓦的情况，见科登《历程》，第292—295页；比森特·瓜内尔中校，《西班牙内战中的加泰罗尼亚，1936—1939》，第169—172页。
- 7 安赫尔·戈略内特和何塞·莫拉莱斯，《马拉加：血与火》，第258—259页。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写给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的一封信中，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说，二月八日早晨七点，内格林派了几辆卡车去马拉加运回据信存放在那里的白银，卡车开进马拉加，他们高兴地看到任何地方都没有敌军（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23/A113^a）。
- 8 见《工人世界报》、（巴伦西亚）《真理报》和《人民战士报》那一段时间所刊发的社论和演说。
- 9 米哈伊尔·科利佐夫，《西班牙日记》，载一九三八年六月号《新世界》，第71页。
- 10 基里尔·A.梅列茨科夫，《在人民军队中：回忆录》，第134页。
- 11 科登，《历程》，第258页。曾经坚定支持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玛加丽塔·内尔肯确认了科登的说法：“[他]总是在晚上八点半离开办公室，第二天上午八点半回来。在此期间不可能与他进行联系。……副部长决不会允许这样做。”（一九四〇年对内尔肯的采访，采

访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 12 同上。
- 13 科利佐夫,《西班牙日记》,载一九三八年六月号《新世界》,第71页。
- 14 一九三六年(原书误为一九三七年——译注)九月三十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 15 见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日发表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派的报纸《光明报》上的文章。
- 16 见A.普吕多莫和D.普吕多莫的《加泰罗尼亚自由主义运动,1936—1937:人民的武装。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是什么?》,第19—20页。另请参阅普埃托利亚诺的代表和马德里印刷工人工会在全国劳工联合会中部地区全体会议上发表的声明,载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 17 马克西莫·德·迪奥斯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九日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引述了卡瓦列罗的这一段话(《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会议纪要》)。另请参阅胡利奥·阿罗斯特吉·桑切斯和赫苏斯·A.马丁内斯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403—404页。
- 18 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 19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巴伦西亚通讯》。
- 20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共和国官方公报》。另请参阅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向新闻界发表的声明,载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七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 21 刊登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三日《文化与行动报》上的通知。
- 22 一九三七年三月九日《国防部官方日志》。
- 23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六日《社会熔炉报》。
- 24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红色阵线报》。
- 25 实例见马拉加陷落后共产党发表的声明,载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红色阵线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二日《红色阵线报》。
- 26 恩里克·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489页。
- 27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192—193页。
- 28 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193页和《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第599—600页;卡洛斯·德·巴赖瓦尔发表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号(布宜诺斯艾利斯)《方向盘》和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纽约)《自由西班牙报》的文章;文塞斯劳·卡里略致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公开信,载一九四三年八月号《世界》;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214—216页。
- 29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五日《今报》。
- 30 拉尔戈·卡瓦列罗,《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第599—600页。这件事情过后不久,莫斯科宣布,罗森堡将被委以新职,列昂·盖基斯将接替他(见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发自莫斯科的报道;另见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伦敦]《泰晤士报》)。他动身返回莫斯科,然后便销声匿迹了。
- 31 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193页。
- 32 阿马罗·德尔·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1901—1939》,第二卷,第636页。
- 33 同上,第616页。
- 34 科登,《历程》,第296页。另请参阅该书第284、292—293和295页。
- 35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影印了这封法文回信,见第二卷,第102与103页之间。
- 36 前卡瓦列罗派成员阿马罗·德尔·罗萨尔写道:“内战之前和内战初期卡瓦列罗和整个卡瓦列罗派高喊合并——联合——的口号,阿拉基斯塔因是卡瓦列罗派的精神导师。”(《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第二卷,第629—630页)
- 37 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27—28页。另请参阅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225—226页。

- 38 见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九日《光明报》；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自由报》。
- 39 见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光明报》。
- 40 拉尔戈·卡瓦列罗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七日在马德里发表的演说，见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劳动者总工会与内战》，第41页。
- 41 一九四九年三月号《论坛》。另请参阅鲁道夫·略皮斯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巴伦西亚通讯》。
- 42 见希内斯·甘加发表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今报》上的文章。另请参阅拉尔戈·卡瓦列罗一九三七年十月在马德里发表的演说，见拉尔戈·卡瓦列罗《劳动者总工会与内战》，第5页；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225页。
- 43 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223—226页。另请参阅拉尔戈·卡瓦列罗《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第264—265页和本书第十三章注释57。
- 44 个人记忆。我们可以根据伦敦《新闻记事报》和另外一些报刊的撰稿人菲利普·乔丹——一九三七年三月，他在前往马德里途中匆匆经过巴伦西亚——的以下评论判断这场运动在大部分人对拉尔戈·卡瓦列罗与共产党人之间的政治斗争毫无知情的外国记者当中多么有效：“两天后，我的事情办完了，于是，我前往马德里。我曾经与那个卑鄙的神话人物拉尔戈·卡瓦列罗握过手，他的虚荣心极大地消耗了西班牙共和国早期的实力。”（菲利普·乔丹，《一去不回》，第18页）
- 45 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489—490页。
- 46 同上，第490页。
- 47 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七日写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一封信中，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把略皮斯称为“我们的非常懒惰的朋友”（“nuestro gran perezoso”）。阿拉基斯塔因文集，卷宗75/12。
- 48 这种对阿吉雷的平庸乏味的描述根据的是我个人对他的了解、与他保持日常联系的巴伦西亚费乌斯通讯社负责人里卡多·德尔里奥向我提供的情况以及来自认识他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信息。
- 49 阿拉基斯塔因文集，卷宗23/A28^a。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在《关于内战和移居国外：哈维尔·图塞尔编辑并初步研究》一书中记述了这一私人文件集的搜集过程，见第14页，注释3。图塞尔的著作是对这一文件集中与内战和移居国外时期有关的内容所作的一本宝贵的摘要。这一文件集的目录（在玛丽娅·特蕾莎·德拉佩纳·马拉苏埃拉的指导下整理）已经以《国家历史档案馆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克维多先生文集》为题出版，哈维尔·图塞尔作序。
- 50 拉尔戈·卡瓦列罗一九三七年十月在马德里发表的演说，见拉尔戈·卡瓦列罗《劳动者总工会与内战》，第5—6页。

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压力加大

在苏联大使努力争取解除何塞·阿森西奥将军的国防部副部长职务的同时，共产党人从其他方面施加压力。我们应当记得，二月十三日，在共产党代表伊西多罗·迭格斯的倡议下，保卫马德里委员会要求清除军队中的“动摇分子和可疑分子”，随后《工人世界报》恶毒地斥责阿森西奥是“造成失败的人”，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在几天后举行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共产党人政府部长正式要求罢免阿森西奥。尽管本人相信阿森西奥将军“无疑是共和国军队中最聪明能干的军官之一”，¹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仍然坚决支持这一要求。他解释说，“作出决定的主要因素不是通常的个人信任，而是大部分部队对他所产生的怀疑，因此，我是最坚决地支持将其撤职的内阁部长之一。……卡瓦列罗认为这样做对他的副部长不公平，他与之进行的斗争具有某种重要意义。他对我与他采取不同的立场——这是第一次——非常不满，结果让我深感遗憾，从那一天起，我不再是他最信任的部长。”²尽管拉尔戈·卡瓦列罗勇敢地保护阿森西奥将军，但是，由于遭到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到左翼共和派政府部长的跨越政治派别的广泛反对，他没有成功。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在战后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证实了这一情况。由于她以前的一些内阁同僚不愿向我提供

有关他们各自态度的信息，她的诚恳尤其值得称道。³左翼共和派政府部长在争论过程中的立场反映在他们的全国性喉舌《政治报》以大字标题刊登于头版的一篇含沙射影诽谤阿森西奥的文章里。⁴同一天，官方公报宣布了阿森西奥辞职的消息。⁵

356

虽然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这次危机中暗中做了许多削弱拉尔戈·卡瓦列罗地位的事情，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内阁会议和他们的报刊上对阿森西奥将军所采取的敌视态度也很重要。⁶作为一个严格执行纪律的人，阿森西奥将军在指挥中部前线期间对退却的民兵采取了严厉的措施，而且据一位权威人士说，他还下令处决了几名拒绝执行他的进攻命令的民兵指挥官，⁷长期以来他得不到自由主义者的信任，内战初期，反对职业军官和任何形式的军事化是这些人的一个信条。因此，像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所做的一样，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很容易就卷入了反对阿森西奥将军的运动，同样，在不自觉的愿望驱使下，他们对共产党人反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前面提到的那封写给我的关于阿森西奥的信中，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坦率地承认，她后来认为，自由主义运动反对阿森西奥将军是错误的，不仅因为阿森西奥能力卓越，而且因为这帮助削弱了拉尔戈·卡瓦列罗与共产党人打交道时的力量。

但是，拉尔戈·卡瓦列罗不会轻易抛弃一个他对其专业能力充满信心的合作者，因此，为了让将军以某种身份在国防部发挥作用，他直接下令要阿森西奥继续留在巴伦西亚。⁸与此同时，受到围绕着阿森西奥展开的斗争的刺激，他对国防部中的共产党势力采取了有力的行动。卡瓦列罗把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战术参谋部门负责人的共产党员安东尼奥·科登中校派往科尔多瓦前线；⁹解除了自己的副官曼努埃尔·阿雷东多中校的职务，因为他同情共产党；¹⁰然后把他与埃莱乌特里奥·迪亚斯·滕德罗上尉一起派往巴斯克前线，后者是重要的情报监控部门负责人，战前是左翼军官组织共和国军人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组织者。¹¹

关于这些人和另外一些人被清理出国防部，当时在战术参谋部门担任安东尼奥·科登的助手的马丁·布拉斯克斯写道：“无论是因为我的工作被认为更加重要，还是因为我被认为不太同情共产党，反正我没有像许多

人那样被清理出国防部。……我的一些同事被派往毕尔巴鄂的北方军队，其中包括卡瓦列罗的副官阿雷东多和迪亚斯·滕德罗。我承认，我担心自己可能被人出于恶意派往那里。我对前线的形势非常悲观。我曾一再要求向毕尔巴鄂供应物资，但这些要求均遭到拒绝。‘我们不应当给北方的军队运送任何东西。’我被告知，‘让巴斯克人自己照顾自己吧！他们凭什么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考虑到这种目光短浅的政策，被派往北方的军队去显然意味着很可能以面对法西斯分子的行刑队而告终。”¹²

共产党在这次清洗中的最大损失无疑是迪亚斯·滕德罗，他掌管的情报监控部门在每个人参军之前审查他们的政治背景。¹³认识他的社会党左派议员玛加丽塔·内尔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改换门庭加入了共产党，据她说，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员的迪亚斯·滕德罗“为党做了一些了不起的事情”。¹⁴他为共产党谋取利益的能力无疑因为他在一个特设的军官分类委员会中所起的主要作用而有所增强，据斯坦利·G.佩恩证实，该委员会的任务是，根据所有可以使用的军官政治上的可靠性将他们分类。¹⁵M.特蕾莎·苏埃罗·罗卡写道：“对他特别有用的是汇集了战前所有军队指挥官的卡片索引以及他设法弄到的右翼军官组织西班牙军人联盟[UME]的部分档案。”¹⁶就这样，他拥有了相当大的自主决定权，因此，他被拉尔戈·卡瓦列罗解除职务对西班牙共产党谋求支配地位的计划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更何况，据阿森西奥说，在其他党派代表的支持下，迪亚斯·滕德罗此前已被推荐接替他的高级职务。¹⁷

除了解除迪亚斯·滕德罗等人所担任的关键职务之外，任命了六名均为可靠的社会党左派的监察人员¹⁸详细检查部队的将领、低级军官、未授军衔的军官以及总政治部的高级官员¹⁹和各级政治委员的工作。²⁰此举对共产党人控制军队的计划造成了更大的威胁。

因这种激烈反应的威慑而暂时变得小心谨慎的共产党人只是鼓足勇气对后一项措施提出了温和的批评，²¹他们克制住自己没有报纸上谴责卡瓦列罗解除他们的人所担任的国防部的关键职务，以免给后者的愤怒火上浇油。由于迪亚斯·滕德罗的足智多谋，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既谴责了解除这些人职务的行为又使卡瓦列罗不能以任何身份把阿森西奥留在国防部。作为情报监控部门的负责人，迪亚斯·滕德罗与所有党派组织都有联

系，因此，由于在国防部以外几乎没人知道他效忠于共产党，他可以利用钢铁纵队的喉舌《我们》的版面。²²政治考虑限制了那些不太偏激的自由主义报刊的言论，尽管它们攻击阿森西奥并且在战前敌视社会党领导人卡瓦列罗，但是，如今它们意识到他作为反共盟友的现实价值。然而，《我们》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反感并没有因为政治考虑而减弱。二月二十五日，由迪亚斯·滕德罗授意并且使用他所提供的材料，《我们》发表了一篇题为《军队的清洗在如何进行》的文章，文章包括一份“忠诚的共和国军官”的名单和另一份被任命接替他们的军官名单，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后面这份名单上的人“同情共和国”，他们“或者不向共和国效忠，或者只是保持中立”。第一份名单包括前面提到的被解除国防部职务的那几名共产党员和亲共军官：安东尼奥·科登、曼努埃尔·阿雷东多和迪亚斯·滕德罗；在第二份名单上，费尔南德斯上校的名字赫然在列，他接替迪亚斯·滕德罗负责情报监控部门，据《我们》说，他是阿森西奥的好朋友。然而，这份报纸断言，比所有这些事实更有趣的是，尽管已经给人造成阿森西奥将军被撤职的印象，但是实际上，他被免去了所有责任并被当作国防部长和新任副部长的技术顾问安排在幕后。“而且，他的安排已经由一道简单的部长令确定了，可是，对于将军的委派和任命，无论他们是什么身份，都应当由政府提出并经政府首脑签署的法令来确定。”

358

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拉尔戈·卡瓦列罗曾经下达过这样一道部长令，当然，阿森西奥本人后来也否认了它的存在，²³但是，就像将军本人同时承认的那样，国防部长肯定希望得到他的帮助。²⁴尽管如此，并没有做出那种正式宣布的任命，而且可以有把握地认为，这一指控为的是阻止任何恢复阿森西奥在国防部的权力的尝试。

除了迪亚斯·滕德罗所授意的这篇文章之外，《我们》还对国防部长进行了下面的抨击：

“拉尔戈·卡瓦列罗……老了，太老了，不具备解决某些问题所必需的灵敏的脑力，而我们自己的生活以及全体人民的生活和自由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当所有报纸——除了由国防部长本人操纵的报纸之外——都在指责一个人时；当人们在战壕里、军营里、委员会里、大街上以及政府本身

的部门里私下或者公开地说阿森西奥将军不是因为无能就是因为背叛……而屡战屡败时；当尽人皆知现在担任拉尔戈·卡瓦列罗顾问的这位将军在得知马拉加失陷的消息那天晚上像一个自贬人格在泥沼里打滚的人一样在一家夜总会喝得烂醉时，国防部长不应当给报纸写信并且采取可悲的姿态企图使人们对这些事情保持沉默。”（这涉及拉尔戈·卡瓦列罗所写的两封公开信，一封写给左翼共和派政府部长卡洛斯·埃斯普拉，另一封写给左翼共和派全国执行委员会，对左翼共和派的喉舌《政治报》在二月二十一日的第一版上用下面这句话含沙射影地攻击阿森西奥的继任者卡洛斯·德·巴赖瓦尔表示抗议：“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将某人撤职而胜利在望的话，那么，不要让我们因为任命某人而导致失败。”在第一封信中，拉尔戈·卡瓦列罗质问埃斯普拉，《政治报》是不是准备开展“一场新的破坏运动，使我不得不失去一位能干的合作者”，同时强烈要求埃斯普拉利用其影响力阻止这件事情继续发展。²⁵他在写给左翼共和派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公开信中宣称，他不打算容忍一个人民阵线党派的官方喉舌开展一场可能给他信赖的合作者造成“不愉快的局面”的运动。²⁶《政治报》在回应时有些委曲求全地辩称，拉尔戈·卡瓦列罗表示不满的那部分内容是在不知道阿森西奥继任者的名字时排印的，²⁷而左翼共和派全国执行委员会同样显得局促不安，它声称，它在这部分内容中看不到任何攻击卡洛斯·德·巴赖瓦尔的意思。²⁸）

“人民以充满敌意的目光发现，他们正在被愚弄。”《我们》继续对卡瓦列罗进行抨击，“阿森西奥的辞职是一个骗局，因为背着人民他受到吹捧，被提拔到部长身边的一个更受信赖的位置上。……国防部长拉尔戈·卡瓦列罗同志应当记住他老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正在变得老态龙钟，老态龙钟的人不应当管理国家，也不应当允许他们管理国家。”²⁹

被这种辱骂性的语言和关于安排阿森西奥的指控——为了避免受到无视公众舆论和内阁意愿的指责，这一指控使他不得不放弃了让将军在国防部帮助他的所有想法，即使是以非正式的方式——所激怒，拉尔戈·卡瓦列罗让社会党左派内政部长安赫尔·加拉尔萨暂时禁止《我们》出版发行。³⁰同一天，国防部长宣布，一名涉嫌授意发表几篇文章的正规军军官已经被捕，在他家里发现了大约两百份《我们》，没有提到迪亚斯·滕德罗

的名字。³¹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攻击使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全国领导人颇为尴尬。在几天后举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地区特别代表大会上，当全国委员会书记反对并且成功地否决了加泰罗尼亚地方组织提出的应当对禁止《我们》出版发行表示抗议的提案时，这种尴尬显而易见。³²几个月后，关于其他自由主义报纸发表的攻击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言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加盟的国际工人协会驻巴塞罗那代表赫尔穆特·吕迪格写道：“我们都知道卡瓦列罗的过去，但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各省报纸的编辑们并不是全都知道，几个月前，卡瓦列罗已经成为共产党势力的反对者，因此，要求他下台可能帮了共产党的忙。”³³

拉尔戈·卡瓦列罗一九三七年五月下台几个月后，当西班牙共产党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地位时，阿森西奥被控没有及时向马拉加前线供应必要的武器弹药并被监禁起来等待审判。³⁴一九三八年五月，他被释放并恢复名誉，这部分是因为一些有影响的朋友的干预，其中包括共和国副总统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和当时的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后者个人相信阿森西奥是无辜的；³⁵部分是因为他能够提出有力的事实反驳主要控告他的人；部分是因为——由于当时共产党人不希望进一步扩大他们与社会党左派之间的隔阂——在不指控其上司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情况下对阿森西奥进行审判成为问题，作为国防部副部长，他直接服从卡瓦列罗的命令。

360

《我们》事件是共产党人使拉尔戈·卡瓦列罗受到的最大侮辱和伤害。几个月来，他注意到他们对社会主义运动和武装力量的暗中渗透，这种渗透已经使他失去了大量追随者，包括许多亲密的战友。然而，肯定是因为担心失去苏联的援助，而且还担心让外界知道共产党在共和国的门面背后对政府事务的严重渗透，尤其担心让英法两国——他仍然希望可以诱使它们解除武器禁运——知道，³⁶他被禁止公开发表任何针对其不知疲倦的对手的言论。实际上，直到一九三七年十月，即他的政府下台五个月后，他才敢公开指责共产党。他声称，他之所以等了这么长时间是因为，他不希望人们说，他发表的言论对西班牙在日内瓦的地位造成了不利影响或者使前线的士兵士气低落。“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他接着说，“我一生中所做的最大牺牲之一是过去这五个月我保持着沉默。但是，我并不遗憾，

因为，尽管诽谤者凶狠地撕咬我的肉体，我的良心使我确信，我是为西班牙的利益而沉默，为赢得战争的胜利而沉默。”³⁷显然，这些因素也解释了他执政期间的克制态度。

不过，被《我们》事件激怒的他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怒。二月二十六日，他从沉默中爆发了，以公开发表声明的方式进行回击。他在声明中所谴责的“法西斯分子的代理人”显然指的是共产党人。

他说，二月十四日，星期天，代表着反法西斯主义的西班牙的浩荡队伍在巴伦西亚的街头游行，证明他们对政府和共和国宪法的支持。（这里说的是马拉加失陷后在他的支持下由社会党左派所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巴伦西亚省书记处组织的一次示威游行。在一份邀请巴伦西亚省的所有工会、政党和文化组织参加的告示中，该书记处声称，它想通过示威游行让政府看到，它拥有劳动人民的支持。共产党人接受了邀请，而且由于马拉加失陷所造成的有利气氛，他们在一次当地各组织领导人的会议上成功地使一项建议得到采纳：在示威游行的当天向拉尔戈·卡瓦列罗递交一份包括十点要求的请愿书。除了其他要求之外，请愿书要求实行义务兵役制并且清理所有负有责任的军事岗位。根据示威游行前一天拉尔戈·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在他们的报纸上所发表的一篇社论中表明的以下观点来看，他们显然对这份请愿书不满：“我们不应当要求实行义务兵役制，而应当在被征召时去军营报到。……我们不应当要求什么，而是应当付出一切。”³⁸由于共产党人的参加并且用请愿书玩弄了一个大花招，社会党左派未能按计划利用这次示威游行巩固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权力。相反，共产党人却非常成功地利用它得到了许多好处。）

拉尔戈·卡瓦列罗继续说：

当[示威者]表达他们无条件支持政府的愿望时，当西班牙共和国及其合法政府的地位因这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世人的心目中得到加强时，法西斯分子的代理人竟然变本加厉到如此程度，以致他们的目的和阴谋在传统的共和派和工人阶级组织中得到了某种响应甚至帮助。他们乔装打扮混入我们中间，骗取我们无产阶级和共和派的好心支持，在我们的队伍中制造混乱、煽动狂热、怂恿不守纪律的行

为。……当局知道，持有共和派各政党、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党员证以及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会员证的法西斯分子代理人正在共和派控制区里自由活动，他们的罪恶行径已经成功地迷惑了许多共和派军人甚至平民，这些人过去的清白历史和自我牺牲证明了他们的高尚信仰和忠诚。……一部分报纸和反法西斯的党派组织、这些组织中的一些负责人以及心地善良但缺乏思考的人民已经卷入了敌人的阴谋，配合了敌人的活动。敌人费尽心机地在我们中间组织了间谍活动，因此，我可以非常坦诚地断言，阴谋和激情像蛇一样盘绕在我们脚下。……

一个完整的组织楔在人民与政府之间，腐蚀了许多人的良心，激起最阴暗的欲望，这是一个有意无意地——我认为两种可能性都有——破坏我们事业的组织，结果，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在那些应当前进并且准备走在民主和工人队伍前列的人脚下，盘绕着背叛、不忠和阴谋的毒蛇。

我容忍这种事态不打算超过一个小时。³⁹

尽管共产党人在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发表的一次谴责性演说中公开将对他们的这种含沙射影的攻击称为“癞蛤蟆和蛇”的宣言，但是，三个月后，在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已经下台的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他们也如法炮制。⁴⁰当二月底拉尔戈·卡瓦列罗发表他的声明时，共产党人谨慎地没有公开承认自己是卡瓦列罗攻击的对象，并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声明作出得体的反应。⁴¹他们还与其他组织一起参加了总理召集的一次确保得到这些组织公开支持的会议。⁴²

不过，据埃尔南德斯在他脱离共产党多年以后所写的《我是斯大林的一个部长》一书中说，三月初，一次“意义深远的”政治局会议在巴伦西亚举行，由斯特凡诺夫、柯多维拉、杰罗和陶里亚蒂组成的莫斯科代表团以及国际纵队的组织者马蒂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负责人奥尔洛夫和苏联代办盖基斯。埃尔南德斯提醒注意，后两个人是第一次出席西班牙共产党的政治局会议。“总之，”他讽刺地说，“外国人比西班牙人多。”他说，在会议上，推翻卡瓦列罗被陶

里亚蒂作为首要的短期目标提出来。在身为政治局委员的热情之花的赞助下编撰的共产党官方内战史无视埃尔南德斯对这次会议的记述，⁴³而它遭到奥尔洛夫的激烈批评并且至少包含一处严重的错误。⁴⁴本书将呈现这一记述，因为它是我们拥有的唯一证据，证明在幕后围绕着推翻卡瓦列罗的建议存在着与莫斯科代表团的不同意见。当时已是共产党员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费尔南多·克劳丁证实，确实存在这样的不同意见。⁴⁵不过，无论是他还是他的亲密战友圣地亚哥·卡里略（政治局候补委员），都没有出席这次历史性的会议。

埃尔南德斯说，党的书记何塞·迪亚斯在会议开始时说明了他认为共产党人不应当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理由：他们将招致大多数社会党人的仇视，将被指责企图谋求政治军事上的支配地位，并将受到其他反法西斯力量的孤立。“我发现同志们被种种疑问所困扰，心中充满了犹豫和担忧，”埃尔南德斯评论道，“……不得不——第一次！——与莫斯科的代表进行一场政治斗争的想法让他们感到惊慌失措。”埃尔南德斯说，他表示支持何塞·迪亚斯，坚持认为卡瓦列罗对共产党人以诚相待，帮助他们在军队中取得支配地位而且没有阻止给他们分配最好的武器；多亏了他，他们才能组成人民阵线并将社会党与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合二为一；他对苏联顾问“言听计从”；在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的问题上，他是共产党的主要支持者。他补充说，与卡瓦列罗决裂将是他们能够让弗朗哥将军取得的最大胜利。

“乌里韦、切卡、热情之花和米赫等人[另一名政治局委员佩德罗·马丁内斯·卡顿在前线]呆若木鸡。在听到莫斯科的声音之前他们不敢发表意见。”接着，斯特凡诺夫发言了。他说，迪亚斯和埃尔南德斯正在捍卫一项有害的事业。谴责卡瓦列罗的不是莫斯科而是“历史”。马蒂对卡瓦列罗向国际纵队定量供应汽油而且没有给他的指挥部提供足够的汽车表示不满。“‘你的问题在于你有一部过于庞大的官僚机器。’迪亚斯反驳道。‘我不是官僚！’马蒂用拳头捶打着胸膛怒吼道，‘我是革命者，是的，先生，我是一个革命者！’‘我们都是革命者，’迪亚斯回答道。‘这还需要看看再说。’马蒂反唇相讥。‘你是一个不懂礼貌的人，’埃尔南德斯插话说，‘你的年龄和资历都不允许你对我们不尊重。’‘你就是一推

大粪。’马蒂反击道。迪亚斯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你是这次会议的一个客人。如果你不满意的话，门在那边！’”

会议随后乱成一片。“有些人一时说不出话来……另一些人则大发雷霆。不动声色的奥尔洛夫坐在椅子上抽着烟。冷漠得让人琢磨不透的陶里亚蒂以做作的平静注视着会场。柯多维拉……试图让马蒂安静下来。格雷[杰罗]若无其事地梳着头发。紧张得无法自控的热情之花大声尖叫‘同志们！同志们！’就像一张破唱片。”

盖基斯发言说：“‘卡瓦列罗正在摆脱苏联的影响。几天前他竟然把罗森堡赶出了他的办公室。’”接着轮到还没有发表意见的那些政治局委员。“‘这不会起什么作用。’”埃尔南德斯想，“‘他们将坐在阳光下面最暖和的地方。’……他们一个接一个站起来……谴责拉尔戈·卡瓦列罗，并且表示他们同意苏联代表团的意见。‘我可以看到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代表团提出的办法，’迪亚斯讽刺地说，‘由于纪律我只能接受这种办法，请把我的不同意见记录在案。’”接着，被埃尔南德斯称为代表团“重炮”的陶里亚蒂发言。“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他的话不是为了辩解或说服。它们是命令，不必圆滑或委婉。……‘我建议，立即开展削弱拉尔戈·卡瓦列罗地位的运动。我们应当在巴伦西亚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埃尔南德斯同志将是这次会议的演讲者。’”埃尔南德斯说，最初他拒绝了，但是经过迪亚斯的提醒，他服从了党的纪律。会议结束时陶里亚蒂说：“‘至于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继任者……我认为我们应当通过排除法来进行选择。普列托？德尔巴约？内格林？这三个人中内格林可能最合适。他不像普列托那样反对共产党，也不像德尔巴约那样愚蠢。’”⁴⁶

在埃尔南德斯对这次政治局会议的记述中有一个令人费解的错误不能忽视。他声称，奥尔洛夫出席了会议。这几乎根本不可能，不是因为奥尔洛夫否认自己出席了会议，⁴⁷而是因为埃尔南德斯对他的描述完全错了，埃尔南德斯说他是一个“身高将近两米、优雅而且有教养”的人。⁴⁸奥尔洛夫叛逃美国多年以后亲眼见过他的著名苏联问题专家伯特伦·D.沃尔夫写道：“这种通过精确的描述造成逼真效果的热情使虚构露出了马脚。两米应当是六英尺六又四分之三英寸。但是，我曾经数次采访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比那矮了一英尺多，比埃尔南德斯还矮，肩膀宽阔，有点肥胖。他

看上去既不优雅也不高贵。”⁴⁹

在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西班牙革命》一书中，我试图通过我的一次个人经历对这一错误描述作出解释，这次经历使我相信，埃尔南德斯谈到的不是奥尔洛夫，而是某个名叫别拉耶夫的人。一九三七年春天，当我担任合众社驻巴伦西亚记者时，我遇见了奥尔洛夫和另一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级特工，我在《西班牙革命》中认为后者是别拉耶夫。我不记得向我介绍他们时使用的名字，但是我在多年以后发现了奥尔洛夫的身份。一九七三年奥尔洛夫去世后，美国联邦印刷局出版了《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遗产》，其中包括他向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所作证词的文字记录，附有他的一张摄于一九三三年的照片。多亏这张照片并且因为我清楚地记得这个人，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奥尔洛夫绝不是一个“身高将近两米、优雅而且有教养”的人，他是一个矮个子壮汉，貌不惊人，在几乎任何人群当中可能都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我认为是别拉耶夫的那个人的体形外表与埃尔南德斯认为是奥尔洛夫的这个人的体形外表非常吻合，以致我相信别拉耶夫就是埃尔南德斯所描述的这个人。现在看来，这种假定是错误的，因为，在莫斯科见过别拉耶夫的恩里克·卡斯特罗对他的描述是，“笨重、强壮、中等身高”。⁵⁰

因此，我们也许不得不作出推论，埃尔南德斯根本不认识奥尔洛夫，至少，一直被他当作奥尔洛夫——以其书中他本人与这个所谓奥尔洛夫的长篇对话为证，在对话中，他用这个名字称呼后者不下十几次⁵¹——的那个高大优雅的叫这个名字的人，既不是奥尔洛夫也不是别拉耶夫，而是另外一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另一方面，我们也许不得不作出推论，他对奥尔洛夫的描述纯属捏造。

无论如何，根据埃尔南德斯所捏造的叙述判断，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奥尔洛夫没有出席研究推翻卡瓦列罗问题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会议。我们已经知道，奥尔洛夫本人否认自己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也否认共产国际的代表陶里亚蒂在场：“埃尔南德斯其实还犯了另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彻底毁掉了他的故事。按照他的叙述，这次会议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举行]。……可是，根据[意大利共产党作家]马尔切拉和毛里齐奥·费拉拉所写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的传记，⁵²我们知道，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一九三七年六月[根据这部传记，实际上是七月]到达西班牙担任共产国际的代表，即，拉尔戈·卡瓦列罗已经从政府辞职后。因此，陶里亚蒂不可能出席埃尔南德斯所说的这次会议并且主张卡瓦列罗必须下台。由于陶里亚蒂不在场，这次虚构的会议连同埃尔南德斯所有异想天开的添枝加叶土崩瓦解。”⁵³

不过，奥尔洛夫的这一部分反驳并没有建立在十分牢固的基础上，因为，据西班牙共产党作家阿道弗·桑切斯·巴斯克斯说，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陶里亚蒂“实际上”整个内战期间都在西班牙，“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⁵⁴埃尔南德斯对早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和十一月举行的两次重要会议作了详细的描述，陶里亚蒂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就在一九三七年五月拉尔戈·卡瓦列罗下台之前，他还参加了在马德里举行的另一次会议，那次会议研究的问题是大举进攻埃斯特雷马杜拉。⁵⁵此外，国际纵队大本营所在的阿尔瓦塞特省省长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证实，陶里亚蒂从一九三六年九月起就在西班牙，他还记录了当年十二月与陶里亚蒂进行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陶里亚蒂试图在“清洗”国际纵队中的“间谍分子和不良分子”方面得到他的合作。⁵⁶更为重要的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胡利安·戈尔金的证言，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比其他人更全面：“关于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到达西班牙的日期及其亲自对共产党领导机构的直接干预，一场争论开始了，主要是在意大利进行，至今仍然没有结束。……他的授权传记作者马尔切拉和毛里齐奥·费拉拉……宣称，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他才来到西班牙。……根据我所保存的仅限于由与他合作的前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和莫斯科的代理人所提供的大量证据，我可以证明以下几点：1) 作为共产国际拉丁地区负责人，陶里亚蒂早在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前就已干预西班牙事务。……2) 陶里亚蒂属于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布拉格任命的指挥西班牙行动的委员会。……3) [正是陶里亚蒂和共产国际法国代表]杜克洛（一九三六年九月）在马德里强行推出了西班牙共产党必须遵循的路线。4) 在西班牙或者在频繁前往巴黎和莫斯科期间，陶里亚蒂是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因此，他直接参与了所有重大的决定。”⁵⁷

戈尔金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我在罗马的一次会议上谴责了帕

尔米罗·陶里亚蒂在西班牙扮演的角色并让重要的《信使报》发表了赫苏斯·埃尔南德斯那本书的长篇摘录之后，他指使他的朋友费拉拉夫妇写了那部传记。”京特·诺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世界革命》一书中论述了陶里亚蒂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六日回答《新话题》杂志的问题时企图掩盖他在西班牙所起的作用，只要我们记住从诺劳的书中摘录的下面这段话，陶里亚蒂的传记作者竭力否认他在一九三七年五月拉尔戈·卡瓦列罗下台之前来到西班牙的目的就清楚了：“陶里亚蒂以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身份出现在西班牙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有助于揭穿他最近散布的谎言：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九年间各国[共产]党组织——所作出的政治决定及其采取的实际措施——例如在西班牙——完全是它们独立自主的产物。”⁵⁸

关于陶里亚蒂到达西班牙的日期，有一点应当予以澄清。他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写给共产国际的一封信中说，他在西班牙已经“一个多月了”。⁵⁹这无疑指的是七月底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他被派到西班牙的时间，并不表明他此前多次出现在西班牙的说法站不住脚。总之，关于西班牙共产党的所谓独立性，没有争议的事实是，另外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斯特凡诺夫和柯多维拉都把这个党当作下级来对待，他们也出席了这次历史性的政治局会议，它决定了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命运。

尽管埃尔南德斯没有提供这次会议的准确日期，但是他说它是在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的几天之前举行的。⁶⁰这次中央全会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五日至八日在巴伦西亚召开。⁶¹埃尔南德斯似乎暗示，他发表演说的那次会议不是一次特别会议，⁶²而是三月七日在蒂里斯电影院举行的一次中央全会的公开会议——作为合众社的代表，我参加了这次会议。⁶³

正是面对会议的听众，他声称，何塞·迪亚斯对他说：“鼓起你的勇气来。推翻卡瓦列罗的决定已经作出。如果你不执行的话，那就可能意味着你在政治上完蛋了。因此，无论如何不应出现这种情况。”⁶⁴

“无论是在政府内外，”埃尔南德斯写道，“我充当了反对拉尔戈·卡瓦列罗以及国防部副部长阿森西奥将军的急先锋，后者是他在军事方面信赖的人。我的名字引起憎恨。没有人看得出我个人的表演、隐忍和伪装。当然，人们根据我的行为判断我。这不是我第一次为了服从莫斯科而压抑自己的感受，同样不是最后一次。……我的良心与公开的行为之间

的冲突是一种无声、痛苦、秘密的斗争。党对我表示满意，我的追随者把我奉为雄辩有力的演说家，称赞我是党的领导阶层中的‘铁腕人物’。我的声望越增长，我觉得自己在我们奉命遵循……并且的确遵循了的政策的泥潭中无法自拔地陷得越深。实际上我充分意识到，我的所作所为把我的表里不一变成了一种精神折磨。”⁶⁵

虽然推翻卡瓦列罗现在成为莫斯科首要的短期目标，但是直到两个月后，才出现了一个把他赶下总理宝座的合适机会。在此期间，共产党人继续抓紧时间争取将所有妨碍他们取得支配地位的军官从军队上层清除出去。佛朗哥将军的意大利盟友三月八日对马德里前线的瓜达拉哈拉防区发动的一次进攻在这方面帮助他们。

在敌军推进的第五天，当时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胜利前进，在大多数内阁成员的支持下，两位共产党人政府部长埃尔南德斯和乌里韦要求不久前刚被拉尔戈·卡瓦列罗任命接替共产党人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的总参谋长托里维奥·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将军辞职，并且要求立即召集战时高级委员会开会决定其继任者。⁶⁶

尽管共产党的喉舌《工人世界报》因为对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和另外一些军官不放心而在几天之前强烈要求战时高级委员会应定期开会讨论所有与战争有关的问题，例如“对军官的任命和控制以及清除军队中的所有敌对分子和不称职者”，⁶⁷卡瓦列罗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是，现在他已无法拒绝共产党人政府部长开会的要求。委员会由卡瓦列罗主持召开会议，根据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比森特·乌里韦的支持下提出的建议，委员会投票决定，应由何塞·米亚哈的参谋长比森特·罗霍中校接替马丁内斯·卡夫雷拉。⁶⁸尽管罗霍在米亚哈将军的支持下拒绝接受这一职务——将军在写给国防部的一封信中说，由于意大利军队的进攻，他没有罗霍不行，而且在作出决定之前也应当征求一下他的意见，⁶⁹尽管一场激动人心的反击战很快就使意大利军队由向前推进变成仓皇逃命，但是，并没有让马丁内斯·卡夫雷拉继续任职。⁷⁰

拉尔戈·卡瓦列罗在他发表的回忆录中声称，共产党人提议罗霍担任总参谋长以及后者在米亚哈将军的支持下拒绝接受这一职务是罢免马丁内斯·卡夫雷拉的一个花招。⁷¹这就解释了罗霍本人的说法：他在拒绝这一

职务之后受到国防部长的敌视。⁷²共产党人当时不承认他们与罢免马丁内斯·卡夫雷拉有关，但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倒台以后，埃尔南德斯公开声称共产党在罢免这位将军的过程中起了作用。⁷³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失去了国防部里可以帮助我的那些人？”拉尔戈·卡瓦列罗问道。他认为原因有三个：（1）他们拒绝像米亚哈那样对共产党人亦步亦趋并且加入共产党；（2）共产党人想用自己的支持者填补空缺“以便详细了解国防部正在发生的一切”；（3）共产党人想让他“感到厌烦进而放弃国防部长的职务”。⁷⁴

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另一场胜利紧随着罢免马丁内斯·卡夫雷拉接踵而至；因为，这位将军刚被解职，共产党人政府部长及其在内阁中的盟友就使共产党人农业部长比森特·乌里韦和亲苏联的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成为政府派驻总参谋部的代表。

“经验已经向我们证明，”《工人世界报》三月十八日写道，“最高军事机构隶属于国防部长并不合理。政府在总参谋部的一切决策过程中直接发表意见要合理得多。这样一来，总参谋部的军官就能随时向政府本身提供帮助和建议。……另一方面，国防部长的艰巨任务需要两位部长直接帮助来完成。我们为这一重要共识的达成向政府致以真诚的祝贺。”

注释：

- 1 胡里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126页。
- 2 同上。
- 3 费德丽卡·蒙特塞尼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二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内战结束以后，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内阁中的四名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之一）在回答我通过阿古斯丁·索奇提出的问题声称，四位无政府主义者内阁部长对阿森西奥投了支持票。这当然与蒙特塞尼完全相反的诚恳承认背道而驰，而且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所有报刊对阿森西奥的敌视态度相矛盾。
- 4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政治报》。
- 5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6 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报纸对阿森西奥将军的攻击，见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九日《卡斯蒂利亚自由报》；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七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社会熔炉报》；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自由阵线

- 报》；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工人团结报》。
- 7 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217页。另请参阅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我们注定要失败！》，第196页。
 - 8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9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10 前总参谋长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少校的副官、本人是一名共产党员的亚历杭德罗·加西亚·巴尔向我证实，阿雷东多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城对加西亚·巴尔的采访）。
 - 11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12 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320页。科登断言，他们被解职“肯定是在那位将军[阿森西奥将军]的建议下”拉尔戈·卡瓦列罗对共产党采取的一种“报复形式”，见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296页。
 - 13 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121页；塞希斯孟多·卡萨多，《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49—50页。
 - 14 一九三九年我在墨西哥对内尔肯的采访。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证实了迪亚斯·滕德罗在内战后期的亲共活动，见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的《西班牙内战，1936—1939》，第147页。然而，科登强调说，他实际上不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见科登《历程》，第288页，这无疑意味着他是一名共产党员。
 - 15 斯坦利·G.佩恩，《西班牙革命》，第321页。
 - 16 M.特蕾莎·苏埃罗·罗卡，《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150页。
 - 17 何塞·阿森西奥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18 根据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的《共和国官方公报》，这些人是何塞·迪亚斯·阿洛尔、路易斯·巴雷罗·埃尔南多、马里亚诺·穆尼奥斯·桑切斯、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曼努埃尔·阿里亚斯·费尔南德斯和胡利奥·德·莫拉·马丁内斯。
 - 19 特别提到总政治部主任（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秘书长（费利佩·普雷特尔）和分支部门的负责人，前两人均为共产党的秘密支持者，组织部门负责人安东尼奥·米赫则为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
 - 20 见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共和国官方公报》发布的通令。
 - 21 见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红色阵线报》。
 - 22 与迪亚斯·滕德罗非常熟悉的第五团第一政委“爱抬杠的卡洛斯”（维托里奥·维达利）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向我提供了这一信息。四十四年后，这一信息的准确性从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政治军事秘书何塞·马利亚·阿吉雷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写给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的一封信中得到了证实（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23/A28⁴）。直到一九八一年，这些档案才向研究者开放。关于迪亚斯·滕德罗的生平介绍，见苏埃罗·罗卡《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143—160页。苏埃罗·罗卡说，迪亚斯·滕德罗在流亡期间加入了西班牙共产党。
 - 23 何塞·阿森西奥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24 同上。
 - 25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前进报》。
 - 26 同上。
 - 27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政治报》。
 - 28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日《巴伦西亚通讯》。
 - 29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我们》。
 - 30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光明报》。见本章注释22所提到的阿吉雷写给阿拉基斯塔因的那封信。

- 31 可以在《光明报》上和上述阿吉雷写给阿拉基斯塔因的信中看到这一消息。
- 32 见加泰罗尼亚地区劳工联合会《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三日在巴塞罗那举行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劳工联合会特别代表大会会议纪要》。
- 33 赫尔穆特·吕迪格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提交国际工人协会的报告。
- 34 指控的内容见何塞·阿森西奥《阿森西奥将军：忠于共和国》，第29—62页。这本为自己辩护的书是他在监狱里撰写的。
- 35 比森特·罗霍写给阿森西奥的信，见阿森西奥《阿森西奥将军》，第110—111页。一九三九年一月，阿森西奥被派往华盛顿担任驻美国大使馆武官（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六日《国防部官方日志》）。一九三八年五月从监狱获释之后，当时的国防部长胡安·内格林没有授予他任何军事指挥权。
- 36 拉尔戈·卡瓦列罗一九三七年十月的演说可以作为他因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影响而担心外国舆论的一个例子，见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劳动者总工会与内战》，第16页。
- 37 同上，第5页。
- 38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三日《前进报》。
- 39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光明报》。
- 40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危机之前、期间及之后的共产党》，第11页。
- 41 实例见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工人世界报》。
- 42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每日图片报》。
- 43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一、二、三卷。
- 44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对斯坦利·G.佩恩教授问卷的答复》，第15—16页。
- 45 费尔南多·克劳丁，《圣地亚哥·卡里略：一位总书记的大事记》，第57页。
- 46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66—71页。
- 47 奥尔洛夫，《对斯坦利·G.佩恩教授问卷的答复》，第15—16页。奥尔洛夫写道：“熟悉斯大林对外国共产党的控制政策（始终通过共产国际这个机构）的人立即就会看出埃尔南德斯关于两名苏联外交官——盖基斯和我——出席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会议这种说法的荒谬。”我们应当记得，埃尔南德斯特别提醒人们注意，他们是“第一次“出席这种会议。
- 48 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90页。
- 49 一九六九年六月号《斯拉夫评论》（致编辑的信）。一九三七年被苏联特工暗杀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伊格纳斯·赖斯的妻子伊丽莎白·波列茨基声称，在西班牙有两个身份不同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叛逃到美国的奥尔洛夫供职于巴伦西亚的苏联商业机构，她说一九三二年她在莫斯科附近见过他。至于另一个奥尔洛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负责人，她断言，她和克里维茨基均确信，他“奉命从西班牙返回莫斯科并在那里与另一些人一起被枪毙”（伊丽莎白·K.波列茨基，《我们自己的人》，第258—259页和注释1）。她的说法含混不清而且完全没有事实根据，不过仍被一些作家信以为真（实例见伊格纳西奥·伊格莱西亚斯发表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号《历史与生活》上的文章《奥尔洛夫存在之谜》，他接受了波列茨基的说法并发挥了它），但是，在认真研究了奥尔洛夫向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所作的证词和他发表的著作文章之后，我确信，他十分了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活动，因此不可能只是在巴伦西亚的苏联大使馆担任一个无关紧要的职务。曾经长时间深入采访奥尔洛夫的伯特伦·D.沃尔夫也确信，他是他自称的高级官员（根据同样熟悉奥尔洛夫的沃尔夫的遗孀埃拉·沃尔夫一九八〇年与我的谈话）。
- 50 恩里克·卡斯特罗，《我对莫斯科失去了信心》，第40页。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三十年后我才认识到早在一九五〇年就已出现的这一描述的重要意义。这使得这个“高大、优雅而且有教养”的人的身份悬而未决。根据可以得到的证据判断，奥尔洛夫和别拉耶夫在工作中密切合作，他们的名字先后三次被联系在一起，尽管别拉耶夫名字的拼写不同。

路易斯·费希尔说，一九三六年九月，苏联驻马德里大使把他介绍给“两名大使馆秘书奥尔洛夫和别拉耶夫”，他推测他们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361页）；一九三七年六月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命令被捕的（反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胡利安·戈尔金所提供的地位仅次于奥尔洛夫的苏联特工的名字是“别洛夫”（胡利安·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173页），他的消息来源是前共产党人恩里克·卡斯特罗和巴伦廷·冈萨雷斯（戈尔金一九七七年四月九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最后，埃尔南德斯提到一个名叫“维耶拉耶夫”的人，从上下文来看，这个人与奥尔洛夫关系密切（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59和90页）。由于别洛夫和维耶拉耶夫的发音与别拉耶夫非常接近，特别是，如果我们考虑到B和V在西班牙语中的发音相似（按照西班牙语，维耶拉耶夫与别拉耶夫的发音几乎完全一样——译注），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指的是同一个人。前秘鲁共产党人欧多西奥·拉维内斯曾在巴伦西亚的共产党日报《红色阵线报》编辑部工作，他在自己的书中经常提到他认识的一个叫做“别洛夫上校”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但却从未提到过奥尔洛夫（欧多西奥·拉维内斯，《大骗局》，第338、340、346、349、358和374—378页）。关于此人，曾任巴伦西亚的共产党晚报《真理报》主编的意大利共产党人埃托雷·万尼写道，“维耶拉耶夫同志不仅监视着[苏联]大使馆的全体工作人员，而且通过他信任的人监视着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埃托雷·万尼，《我，苏联共产党员》，第14页）；而巴伦廷·冈萨雷斯则说，“别洛夫”是“共产国际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器上的主要部件”之一（“农夫”巴伦廷·冈萨雷斯，《我选择了屈从》，第230页）。

- 51 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90—94页。该书还在第66、89、95—98和109—113页提到奥尔洛夫这个名字。
- 52 马尔切拉·费拉拉和毛里齐奥·费拉拉的《与陶里亚蒂对话》，第261页。
- 53 奥尔洛夫，《对斯坦利·G.佩恩教授问卷的答复》，第16页。
- 54 阿道弗·桑切斯·巴斯克斯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的《政论集》所写的序言，见第11页。
- 55 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33—36、49和79—84页。
- 56 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245页。
- 57 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79—80页，注释7。
- 58 京特·诺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世界革命》，第191页。
- 59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46页。
- 60 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66页。
- 61 何塞·迪亚斯在《斗争的三年》一书中提供了这个日期，见第341页。
- 62 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73页。
- 63 应当指出的是，与埃尔南德斯在政府倒台之后的五月二十八日对卡瓦列罗的激烈攻击相比，他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七日发表的演说调子温和。因此，并非完全不可能的是，他在多年以后写书时记住的是更加激烈的那次演说。这次演说的全文可以在埃尔南德斯所著《人民阵线内部的一切》（1937）中看到。
- 64 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73页。
- 65 同上，第85页。
- 66 感谢费乌斯通讯社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向我提供了这一情况，他们和某些与政府及战时高级委员会成员关系密切的人保持着日常联系。
- 67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日《工人世界报》。
- 68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第600—601页。另请参阅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195页。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与西班牙共产党的意见一致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与普列托认为马丁内

斯·卡夫雷拉是“高等军事学院”的“头号人才”形成对照，他在写给阿拉基斯塔因的一封信中说这位将军是一个“真正的傻瓜”（“verdadero atún”）（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23/A113）。

- 69 拉尔戈·卡瓦列罗把罗霍和米亚哈的答复收入他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第600—601页）。关于对罗霍任命的取消，见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六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70 关于国防部向马丁内斯·卡夫雷拉致敬的公告，见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六日《巴伦西亚商报》。虽然拉尔戈·卡瓦列罗说他没有找人填补空出来的这个职位（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195页），但有证据证明，马丁内斯·卡夫雷拉至少暂时被共和派军官阿尔瓦雷斯·科克上校所取代（见比森特·瓜内尔发表在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八日《新西班牙》上的文章；另请参阅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一卷，第1075—1076页）。一九三七年五月拉尔戈·卡瓦列罗下台后，罗霍被任命为总参谋长（见《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三卷，第88页）。
- 71 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195页。
- 72 比森特·罗霍，《这就是马德里保卫战》，第216页。
- 73 埃尔南德斯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发表的演说，见埃尔南德斯《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危机之前、期间及之后的共产党》，第24页。
- 74 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195页。

拉尔戈·卡瓦列罗进行反击

西班牙共产党在内阁和战时高级委员会中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苏联在西班牙的代理人一直在努力削弱卡瓦列罗的影响力，由于赢得接替阿森西奥将军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卡洛斯·德·巴赖瓦尔的无条件支持，这种影响力在进一步加强。巴赖瓦尔是与卡瓦列罗关系密切的社会党左派圈子中的一员，由于严重的疾病，他起初并不了解最近发生的那些使卡瓦列罗对社会党与共产党结盟失去热情的事情。据他本人讲述，他得到的信息全都来自亲共产党的人，因为拉尔戈·卡瓦列罗与他交谈仅限于了解其健康状况，尽量不让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打扰他。¹结果，巴赖瓦尔承认，他就任新职之后有意为两党合并发挥作用。“考虑到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都不能例外，我坦率地承认，”他写道，“有一段时间我和所有社会党左派深受共产党人的影响，因此我认为，重新开始工作的我应当有些出色的表现，通过持续不断的积极努力推动两党迅速合并，以便把我们自己从正在陷入的灾难中解救出来，同时显示共产党的办法的优越性。”²他在另一篇文章里承认，“与许多社会党人的严重惰性相比”，共产党人的“能动性很适合”他。³

尽管巴赖瓦尔在即将复出之时从他的社会党同志嘴里听到了一些指

责：“就在前线，甚至在战地医院里，社会党人，仅仅因为他们是社会党人，正在受到可耻的对待，而共产党人则在各个方面受到欢迎，甚至将荣誉据为己有”；人们可以看到，社会党或无政府主义连队的战士“打着赤脚、衣衫褴褛，相比之下，同一个旅但是属于共产党的另一个连队的装备仿佛是要参加阅兵式”，但他倾向于认为这些指责夸大其词。

“我得到的印象令人非常震惊，”他写道，“以致我真的以为我听到的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被夸大了。此外，在与社会党人的各种谈话中，例如在与我们后来知道早已效忠于共产党的德尔巴约的谈话中，他们十分巧妙的回答听起来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热情，深受两党联合这一伟大理想的鼓舞并且热切希望通过一项影响深远的政策消除那些指责中可能确实存在的现象，使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致力于赢得这场战争，结果，尽管我已不再处于脱离动荡的政治现实的天真状态，我仍然认为在我看来令人发指的邪恶不可能表现得那么优雅。由于这个原因，我愿意与那些不会行此不义——这种不义是某种精心策划的产物——的人一道，继续为这项全面联合的政策出力。”⁴

然而，一旦坐在国防部副部长的位置上，巴赖瓦尔的看法就发生了改变。“在这个气象台里……我得到的印象是，我过的是一种最让人讨厌的生活，这粉碎了我在生病期间精心呵护的我最珍视的那种幻想。我渐渐发现自己轻信到了何种程度，以致面临受玫瑰色眼镜诱惑误入歧途的危险，这种玫瑰色眼镜像它们歪曲的世界一样丑恶。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我必须在短时间内改变部队的卫生管理和运输服务，并且为调整军需官队伍做准备。”⁵巴赖瓦尔在另一篇文章里证实，由于军需官队伍控制在共产党人手中，“这个营私舞弊、招降纳叛的可怕武器被肆无忌惮地滥加使用，从为某个朋友弄一张特别证券的小型骗局，到根据部队或其指挥官的政治色彩决定给不给整个一支部队发放食品和服装的大型丑闻”。⁶

“我听说，”拉尔戈·卡瓦列罗写道，“在一些前线，共产党的部队受到某种令人气愤的优待；给他们发放鞋、服装、烟草和食品。其他部队的待遇像前妻生的孩子一样——说得更准确一些，是没有在背后挨黑枪的时候。我还听说，在一些医院，就像过去神父和修女对待不信教的人那样，没人照顾不是共产党的伤病员。他们既得不到适当的治疗也得不到适

当的食物；所有关照都给了共产党员和将要皈依共产党的人。”⁷马德里的社会党左派议员卡洛斯·鲁维埃拉说：“令人悲哀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为了得到一双系带凉鞋，士兵必须是共产党员。在[军队的]医院里，与修女时代相同的事情继续发生，那时候，为了得到一碗炖菜或者炖鸡，或者无论什么吃的，你必须恭敬地披着教徒的肩布或者佩戴十字架。现在你需要佩戴锤子镰刀的标志。”⁸就连因反对共同的敌人而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的社会党温和派也谴责共产党人在前线享有的特权地位。⁹

370 “我无意冒犯那些占据着责任最重大的岗位的人，”巴赖瓦尔表示，“但是我必须说，除了不值一提的极少数例外，他们依赖的所有手段都掌握在斯大林分子手中。这些斯大林分子以最无耻的方式控制着军队的各个部门，利用军队的资金和职务特权谋取私利，他们只关心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只关心加强巩固共产党的权力，在有些情况下他们只关心个人利益。在国防部副部长管辖的部门发生的事情同样发生在总参谋部的各个部门。通过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阴谋诡计，而且置许多在责任最重大的技术岗位上任职的非党派专业人员的诚信于不顾，……共产党人控制了所有指挥岗位，然后在其保护下，开展了一场来势汹汹、厚颜无耻的拉人入党运动。”¹⁰

拉尔戈·卡瓦列罗下台几周后，《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宣称：“共产党指示受其控制的军官利用军纪命令士兵改变信仰加入共产党，结果我们发现下述情况成千上万次地出现：军队指挥官使用权力和军规不是为了与法西斯主义作战，而是为了消灭革命组织并且削弱其他反法西斯团体的力量。”¹¹

从巴赖瓦尔担任国防部副部长那一刻起，大都会酒店的苏联人就开始讨好取悦他，该酒店是苏联人在巴伦西亚的指挥部。他还在国防部定期接受苏联人的拜访，在拜访的过程中，苏联人竭力诱使他背叛拉尔戈·卡瓦列罗。¹²尽管巴赖瓦尔不愿详细讲述这些拜访，但他仍然透露：“我受到各种各样的恭维奉承，他们称赞我是唯一一位能够意识到迫切需要……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社会党人——当然，除了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之外。总之，为了使我背叛拉尔戈·卡拉罗，他们一直在谨慎地与我培养感情。”¹³但是，巴赖瓦尔拒绝抛弃这位社会党领导人，结果，从他使苏联大使认识

到他不会扮演苏联人及其西班牙帮手希望他扮演的角色那一天起，他不再是他们诱骗的对象。¹⁴他的断然拒绝完全出乎人们的意外，因为不久前他还支持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的主意，尤其是这个主意当时在他的许多同志眼中已经开始失去魅力，这一情况使共产党人相信，他将在国防部为他们谋取利益。让他们大失所望的巴赖瓦尔成为卡瓦列罗政策的后盾，在随后几周，他协助国防部长对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地位进行了最严厉的打击。到三月底，这一打击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以致引起共产党政治局的公开谴责：“赢得战争所必需的所有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正在受到一系列行为的破坏，例如从指挥岗位上撤换那些已经多次证明其能力和才干的军官和政委——仅仅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的行为，尤其是在最近几周。”¹⁵

使拉尔戈·卡瓦列罗怒火中烧的无疑是共产党人在国防部的所作所为以及正在引起他注意的共产党人政治委员的做法。这些做法从禁止前线的士兵阅读非共产党的报纸，¹⁶到强迫士兵加入共产党。¹⁷他最近还听说了国防部总政治部的宗派主义行为，我们应当记得，为了规范政治委员的委派，一九三六年十月设立了这个部门，但是，由于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费利佩·普雷特尔的背叛，它已经被共产党人所控制。国防部长选择这两个人负责总政治部是因为他们享有他的高度信任，他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发布命令规定，所有政治委员将由他根据总政治部主任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提名任命，而后者的提名将通过总政治部秘书长费利佩·普雷特尔提交。¹⁸虽然这一命令并未授权总政治部主任在国防部长的正式任命下达之前批准候选人就任拟议中的职务，但是，由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费利佩·普雷特尔以及负责总政治部组织部门的共产党人米赫——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经常把自己的权力授予他——推荐的这些候选人被允许“临时”行使他们的职权，这种做法使共产党受益匪浅。¹⁹

“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是最应当对此负责的那些人之一，”拉尔戈·卡瓦列罗写道，“……直到那时他还说他是我最可信赖的朋友。他自称是个社会党人，但是却在无条件地为共产党效劳并且为他们的各种阴谋诡计推波助澜。……我[把他]召来严厉训斥了他的行为，因为他在我不知情也没有签字的情况下，任命了二百多个共产党人。听着我的训斥他的脸色变得苍白，然后没有一点表情地回答说，任命的都是连指导员，他任命这

些人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力。我把手边的法规给他看，根本没有任何例外。”²⁰

内战结束后不久，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作出了下面的解释：“在西班牙设立[总政治部]以后，共产党……对它的发展扩充比其他党派更感兴趣。在其他党派看来，它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因此最初把它当做舶来品和多余的东西冷眼旁观，满足于提出并非特别用心拟定的候选人名单。另一方面，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派出了他们最能干的人。这种差异在保卫马德里的关键时期加大了。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马德里前线的形势使得必须增加政治委员的人数。临时任命了几百人，这些人只能使已经存在的不平衡状况更加严重。”²¹

372

三十多年以后，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承认，在对他的攻击中，最让他感到痛苦的是那些说他“背叛”了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内容。“不像对我的其他上司，我热爱弗朗西斯科先生。”他申辩说，“毫无疑问，我在内战爆发时是他最信任的社会党人之一。我已经是他的外交部长，但在准备设立总政治部时，他坚持让我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拉尔戈·卡瓦列罗让我充满无限的敬意。他是一个堪称典范的社会主义者，完全与他出身于其中的工人阶级打成一片。……拉尔戈·卡瓦列罗有一副高贵的面孔和一双年轻人似的蓝色眼睛，很容易赢得群众的喜爱。内战初期，他在群众中比其他任何领导人更受欢迎和爱戴。我全心全意地忠于他。……我任命[政治委员]不关心他们的政治身份。……他们属于哪个政党或者持什么政治立场对我没有产生影响。结果最终政治委员中的共产党员比其他党派成员的人数更多。拉尔戈·卡瓦列罗身边的社会党人（以及一些多亏我才得到了职位的人）立即告诉他，我把总政治部拱手献给了共产党。”²²

感到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骗取了自己对他的信任并且意识到这位总政治部主任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拉尔戈·卡瓦列罗决定把情况通知曼努埃尔·阿萨尼亚，但是说来奇怪，尽管共和国总统批准解除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所担任的内阁职务，卡瓦列罗却让他继续留任。

“一九三七年的一天，”内战期间与阿萨尼亚保持着密切联系的社会党温和派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证实，“总理——拉尔戈·卡瓦列

罗——从巴伦西亚给巴塞罗那打电话，请求紧急会见阿萨尼亚总统。会见在两地之间的贝尼卡洛进行。拉尔戈·卡瓦列罗抓紧时间开门见山：‘我请求这次会见是因为我必须告诉你，而且不能在电话里说，我的一个部长正在出卖我。’阿萨尼亚大吃一惊。拉尔戈·卡瓦列罗继续说：‘这个部长属于我自己的政党；他是一名社会党人，是外交部长。’接着，总理把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背叛行为告诉了共和国总统。……阿萨尼亚批准拉尔戈·卡瓦列罗罢免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但是，总理没有使用授予他的这一权力，就像几周之前一样，他没有利用我为他提供的机会不再充当共产党的傀儡。当时，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我对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说，他的行为更像一名苏联官员而不像一个担任政府部长的西班牙人。被我的话激怒的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提出辞职，²³……但是，拉尔戈·卡瓦列罗拒不接受他的辞呈，而是让他继续留任。某些人徒有坚定的虚名，身上带着不少可笑的弱点。”²⁴

导致卡瓦列罗的行为自相矛盾的因素十有八九是，部分因为他不愿意中断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工作及其与国际联盟的外交联系，部分因为他担心苏联这个唯一的武器供应国可能对罢免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作出反应。不过，他的行为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因为，他知道自己地位并不稳固，把外交部长解职将会引发一场内阁危机。因为，万一政府进行改组，虽然卡瓦列罗及其追随者肯定可以依靠全国劳工联合会，尽管他们在原则和做法上有分歧，但是同样可以肯定，共产党人及其社会党温和派与共和派盟友将在反对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的问题上团结一心，无论他们有什么分歧。于是，不愿冒险将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逐出政府或者总政治部的拉尔戈·卡瓦列罗四月十四日签署了一项轰动一时的行政命令，限制这个有影响的机构的权力。他不仅亲自控制总政治部的方针政策，而且今后所有任免提拔全部直接由他决定，同时，任命和级别在五月十五日之前没有得到确认的政治委员可以认为自己已被逐出了政治委员的队伍。²⁵

这项行政命令引起共产党的激烈反对。“很明显，”《红色阵线报》写道，“政治委员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情和感谢。……企图限制甚至打算扼杀政治委员作用的都是一些什么人，这有可能做到吗？他们是仍然存在于我们中间的思想落伍者，是用旧学校的陈规陋习反对我们人民的创造性工

作的人。这些人是政治委员的敌人。……绝不能限制政治委员的工作并且给他们一个片面的定位，我们的军队需要的是，扩大他们的活动范围，赋予他们充分的手段，并且为使他们完成任务给他们以必要的激励。”²⁶这份报纸第二天问道：“谁会对这支英雄的队伍产生敌意？谁会对人民军队的缔造者表示反感？只有声称自己与人民为敌的人；只有那些与反法西斯军队势不两立的人；只有被某种最邪恶的犯罪狂热所驱使的盲目无情的人。我们的政治委员是我军的骄傲！我们必须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保护他们！”²⁷

热情之花声称：“有人企图通过将政治委员纳入官僚体系扼杀其主观能动性，这种体系往往会使政治委员出色的工作不起作用，从而将其变成没有不思进取的人，害怕采取任何可能引起指挥官不满的大胆行动。

“但是，我们肯定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政治委员无论如何不能失去其与众不同的特点，将他们置于无法发挥政治作用的从属地位不可能不对人民军的组织和纪律造成严重危害。

“这将使为创建人民军这支真正属于人民的军队所进行的一切建设性工作和改革的成果丧失殆尽。

“这将意味着我们的战士任凭军官所摆布，后者随时可以通过恢复旧时代的军营纪律从而改变我军的性质。

“政治委员，坚守住你们的岗位！”²⁸

“国防部长刚刚发布的关于总政治部的命令绝没有限制政治委员的作用。”卡瓦列罗的舆论工具《前进报》反驳道，“恰恰相反，它激发了他们的活力并以总政治部的目标规范他们的行为。总政治部的目标不是实行政治上的宗派主义……而是创造道德氛围并且树立责任感，这将使我们的军队在那个人——在这一历史时刻，他承担着引导西班牙命运的光荣而且艰巨的任务——至高无上的指挥下走向胜利。”²⁹

374

《红色阵线报》在反驳中声称：“国防部长可以随意给总政治部下达命令，但控制权必须掌握在总政治部自己手中。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设立它？为了使国防部增加一个部门吗？那样的话，总政治部将是多余的。”³⁰

《前进报》反驳道：

谁也没有……打算降低[总政治部的]威信，至少国防部长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已经提醒人们注意[国防部长命令的]目的，当然，是它希望达到的目的，那就是，总政治部不应被属于人民阵线政府的任何政党为了宣传加以利用。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都应老老实实地做事并以诚相待。我们以社会党的名义揭露，某些属于共产党的政治委员为了迫使士兵改变政治信仰滥用了他们的职权。……我们确信，一些作为社会党人、共和派人士和无政府主义者加入政治委员队伍的个人意识形态不够坚定、政治态度动摇多变，他们在违背自己内心信念的情况下，屈服于来自某些属于共产党的更高级别的政治委员的压力，要求加入共产党。另外，由于在压力和胁迫达不到预期效果时，接踵而至的诽谤和威胁将愈演愈烈，[总理兼国防部长]决定……制止必将导致一场灾难、导致在属于不同政党和工会组织的士兵之间产生一条无法逾越的猜忌和宗派的鸿沟的事态发生。³¹

四月二十二日，似乎并不在意自己对这场危机负有责任的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把新闻界这场火星四溅的论战告诉了巴黎的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论战已经持续了三天而且没有停止的迹象。这确实令人感到遗憾。我在其他场合曾经设法制止共产党人，但在这种情况下非常困难，因为他们确信卡瓦列罗的命令为的是撤换共产党人政治委员——其中绝大多数表现得令人敬佩，他们不愿逆来顺受。昨天晚上我与忧心忡忡的[新任苏联大使]盖基斯进行了交谈。他预言政治形势将迅速恶化。……正如你能看到的那样，我们并没有继续沿着联合的道路前进，而是正在走向冲突。”³²

当然，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命令不仅得到社会党左派的无条件支持，而且得到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无条件支持，长期以来共产党人政治委员的活动已经让后者感到不安。马德里前线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武装的喉舌《自由阵线报》早在去年十二月就声称，该报的编辑们收到无数来信抱怨说，在许多由不同党派成员组成的部队中，一些没有军衔的军官和政治委员正热衷于使人改变政治信仰，并且利用胁迫手段达到这一目的。³³马德里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喉舌《全国劳工联合会报》立即表示：“国防部长采

取了我们大家赞赏的坚定正确的立场，他制止了共产党施展的那些花招。后者打算利用这些花招夺取整个人民军的政治控制权，其中包括任命大量政治委员，人数与共产党在前线的部队规模完全不成比例。我们大家全都赞成……总政治部的使命，但是，谁也不能允许这个为了保证军队的革命性质而设立的机构不仅把共产党在后方进行的同样疯狂的党派之争带到战火纷飞的前线，而且把它那令人无法容忍的谋求支配地位的计划带到前线。”³⁴

因存在于军事领域的其他尖锐斗争而引起的相互攻击，共产党与社会党左派之间围绕着总政治部在报纸上进行的这场激烈论战越来越充满火药味。这些斗争的焦点包括：后备部队的建立，共产党人认为后备部队组建得太慢；³⁵清除军队中的所谓叛徒；（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拉尔戈·卡瓦列罗发布的一项法令，把民兵部队指挥官可以晋升的最高军衔限制为少校，³⁶共产党人认为这干扰了他们用第五团训练出来的干部控制正规军的计划；³⁷拉尔戈·卡瓦列罗随后颁布的一项法令，不许任何人不经全国劳工联合会或劳动者总工会推荐进入军官培训学校，共产党人认为这是企图对军队实行“非政治化”，从而使其被“两个工会所垄断”；³⁸最后还有，在拉尔戈·卡瓦列罗反对的情况下，战时高级委员会委派共产党人教育部长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和农业部长比森特·乌里韦前往马德里和巴斯克地区执行重要的军事任务。与最后这个问题有关的情况是，三月中旬，战时高级委员会任命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和左翼共和派公共工程部长胡利奥·胡斯特为政府在马德里的代表。他们的目的是与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建立密切的联系并且了解中部前线的需要。当两人的任命提请政府批准时，因为担心一位共产党人部长出现在马德里可能增强共产党的影响力，拉尔戈·卡瓦列罗反对将两位部长的使命长期固定化的建议。由于意见不一，内阁既没有明确规定两位部长的职责，也没有决定他们在首都待多长时间，因此，当他们临时返回巴伦西亚时，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喉舌《前进报》宣称，他们的任务结束了。³⁹四月一日，佛朗哥将军的部队及其德国和意大利盟友在北部发动大规模进攻，当战时高级委员会委派委员会中的共产党代表乌里韦前去调查了解北部前线的情况时，围绕着这一问题又出现了不同意见。像对待埃尔南德斯的任命一样，国防部长反对这次委派，特别是因为乌里韦将与苏联将军戈列夫同行。

尽管这些问题本身都很重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只是两派之间根本分歧的征兆。

《前进报》写道：

一段时间以来，尽管共产党的报纸和煽动者对……社会党成员，尤其是那个最著名的社会党人的工作不停地进行阴险的影射和恶意的指责，我们一直保持着克制。……

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喜欢以恶毒的谩骂开展批评。它到处看到的都是问题、不足和缺乏远见。是让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论销声匿迹的时候了，我们要问看到别人那么多瑕疵的煽动者，他们自己是否不犯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政府中共产党代表的行为有什么可以说一说？共产党人农业部长的行为肯定不是在各个方面完全符合国家的要求。就政府交给他的工作、一般情况下的要求而言，教育部长的行为也不是。在整个共和派控制区，农业生产和分配的问题仍然没有一个能够保证后方安宁的解决方案。成千上万的少年儿童没有受到教育部长的适当关怀。

后备部队？……军营里的成千上万西班牙青年被纳入了战争机器。可是，基本的后备部队建立在调整农业生产和分配的基础上。这是农业部长权限范围之内的事情。

后备部队？西班牙人民最重要的后备部队是少年儿童，年轻的一代。他们正在得到什么样的照顾？我们正在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关心？

应当提醒每一位政府部长注意的是，他的作用严格限制在与其部门有关的问题上。例如，对于教育和艺术部长或者农业部长来说，试图解决战争问题是愚蠢的。部长应当仅限于从事自己特定的工作，不应干预本部门以外的事情——除了在内阁会议上。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有足够的东西要去做。……我们不准备容忍任何以消极的批评和虚伪的主张继续扰乱后方的企图，这些批评和主张的目的在于有计划地诋毁那些正以完成伟大事业所需要的沉默朴实的英雄主义面对战争的严酷的人。

蠢话已经够多了！不要再喊无法兑现的口号，而要呼吁着眼于个

人利益并且通过精神保留来实现的热情、团结和友爱！……我们社会党人举起高于一切的西班牙革命的旗帜，由于我们的烈士和英雄的牺牲以及我们的西班牙口号和领导人，这场革命已经以一种西班牙的方式实现了。⁴⁰

《红色阵线报》针锋相对：

377 《前进报》的同志们真的以为政府部长仅仅是只关心各自工会“事务”的工会秘书吗？像社会党人、共和派和无政府主义者部长一样，共产党人部长在政府中代表他们自己的党派，同时，他们也像而且应当像其他部长一样关心战争造成的问题和形势。《前进报》或许认为只有国防部长正在打仗因而胜败问题仅仅影响他自己？战争和国家的管理由人民阵线来进行，由组成人民阵线的所有政党和组织来进行，因此，这些政党和组织在政府中的代表拥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关心影响整个国家以及全体西班牙人生活和未来的各种问题。《前进报》的专制观念是哪儿来的？

我们的部长在非常危急的时刻介入了北部前线和马德里的战事……他们的工作成果也赢得了信任。我们不说他们独自解决了问题；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问题的解决，而且，他们的努力、他们所完成的一切都得到我们党真心诚意的充分支持。……

《前进报》要求埃尔南德斯组织少儿后备军。的确，少年儿童必须为生活以及我们的胜利将造成的那种社会做准备，但是，为了赢得这样的胜利，我们首先必须为我们的军队配备必要的后备部队。……

《前进报》的同志们应当让我们知道，他们想要的是人民阵线的政策还是某种基于个人独裁的政策。

最后，考虑到几个月来所有人——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共和派人士——都在要求清洗军队的指挥官这一事实，这种清洗竟然从政治委员开始不让人感到奇怪吗？我们应当想知道，有多少政治委员叛变投敌？有多少军官开小差而且仍在开小差？对于关心我军命运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具体的问题。……

我们不太明白《前进报》的文章里反复强调“西班牙这西班牙那”是什么意思。这是在暗示什么呢？没有人比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更具有西班牙色彩——深厚而强烈的西班牙色彩，而且正是我们党把现在这场战争定性为一场为维护国家独立和西班牙主权而进行的战争。⁴¹

《前进报》宣称：

共产党说它始终支持人民阵线的政策，但却不失时机地利用一切机会推行它自己的政策并且进行大肆宣传，这不可避免地激怒了非共产党人士。因此，它只在某些事情上取得成功，与它天天吹嘘的情况大相径庭。换句话说，它引起了工人的怀疑并且挑起了工人之间的宗派斗争，使社会党、尤其是拉尔戈·卡瓦列罗长期为之奋斗的无产阶级的有机联合难以实现。现在，四五个心胸狭窄、满腹怨恨的领导人把怒气全都撒向了卡瓦列罗，……这些领导人无法理解，当许多人在后方到处高喊只能制造混乱的荒唐口号时，一个人可以全凭着自我牺牲精神和决心兢兢业业地工作七个月之久。那些诋毁这位西班牙工人阶级领导人的家伙的智商跑到哪里去了？他们以为用一场暴风雨般的政治运动破坏他的威信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吗？他们没有认识到，拉尔戈·卡瓦列罗不是《红色阵线报》昨天晚上暗示的那样一个政治寡头，也不是一个独裁统治的仿效者，更不是一个潜在的独裁者。他是整个革命运动的化身。他是西班牙工人阶级的历史和西班牙马克思主义运动史的象征。他是我们工会四十年革命斗争中的模范行为的体现。⁴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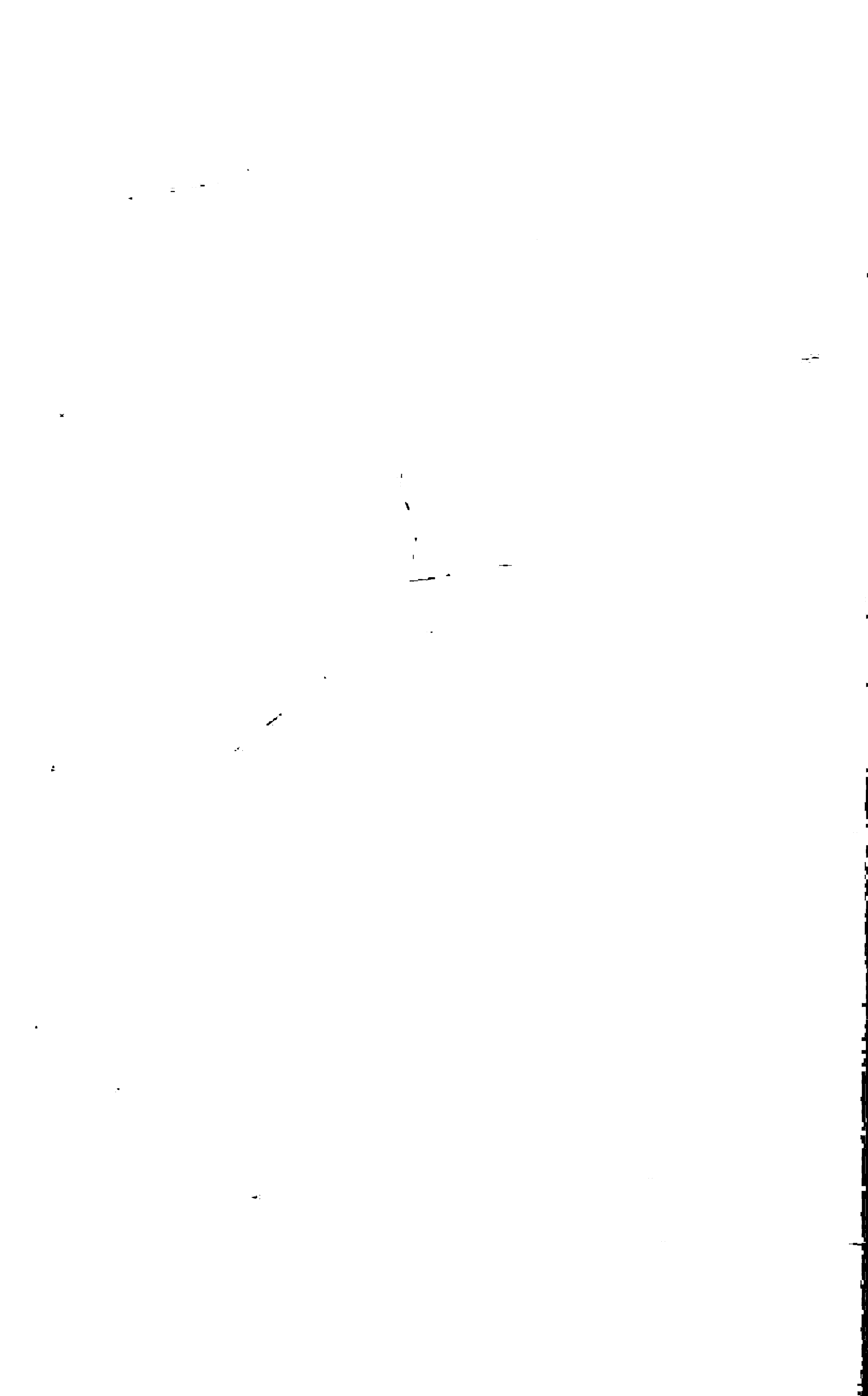
378

注释：

- 1 卡洛斯·德·巴赖瓦尔发表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号（布宜诺斯艾利斯）《方向盘》杂志上的文章。
- 2 同上。
- 3 见一九三九年八月五日《自由之路》。
- 4 巴赖瓦尔发表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号（布宜诺斯艾利斯）《方向盘》杂志上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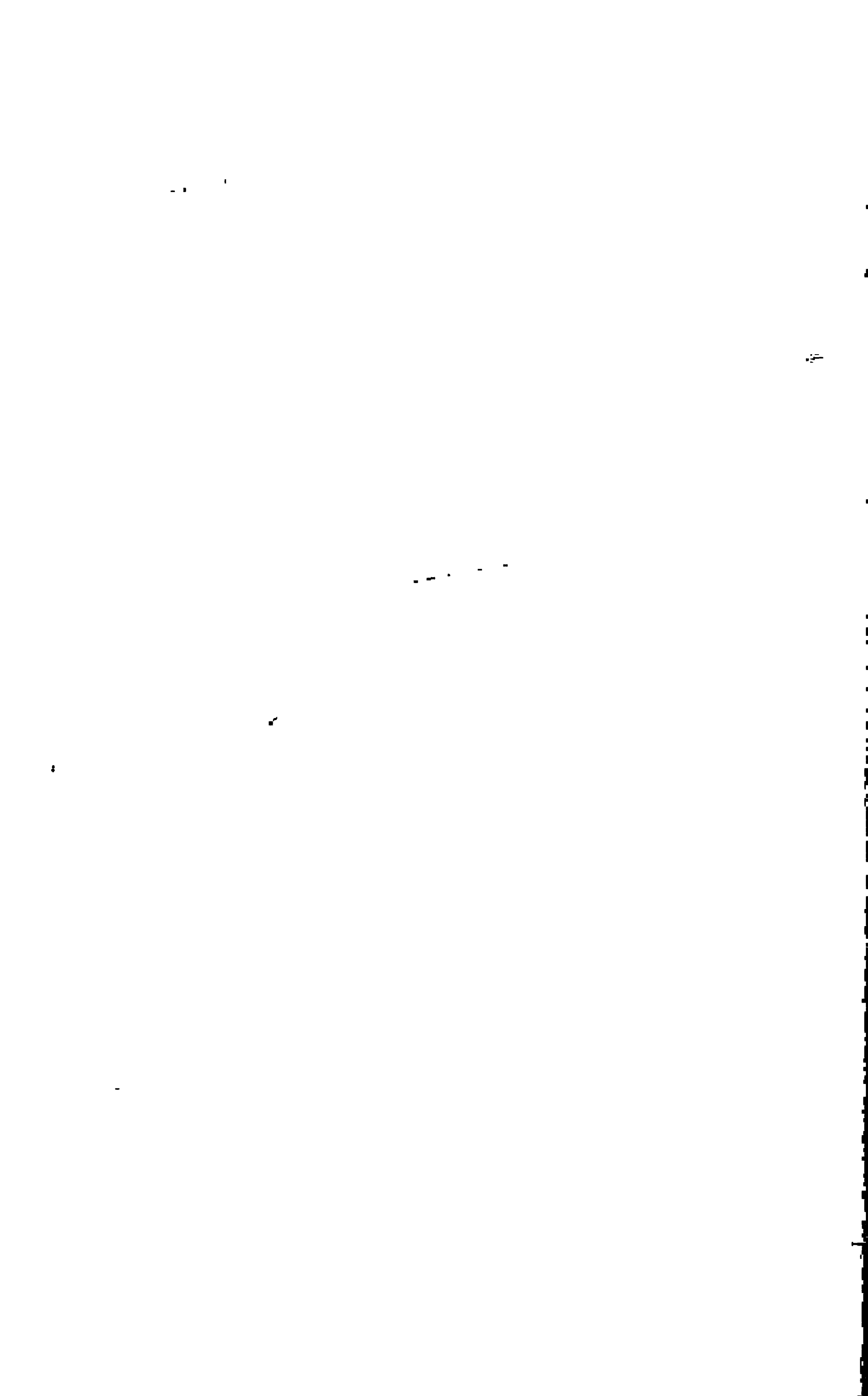
- 5 同上。
- 6 见一九三九年八月五日《自由之路》。
- 7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209页。
- 8 卡洛斯·鲁维埃拉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社会熔炉报》。
- 9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社会主义者》。
- 10 巴赖瓦尔发表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号（布宜诺斯艾利斯）《方向盘》杂志上的文章。
- 11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 12 感谢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政治军事秘书何塞·马利亚·阿吉雷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员向我提供了这一情况。
- 13 巴赖瓦尔发表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号（布宜诺斯艾利斯）《方向盘》杂志上的文章。
- 14 同上。
- 15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红色阵线报》。
- 16 见当时仍为社会党拉尔戈·卡瓦列罗派喉舌的《光明报》写给共产党马德里地方党组织书记、中部前线督察委员弗朗西斯科·安东的信，信中指责安东控制的总政治部在马德里的分支部门一直禁止在前线分发《光明报》（这封信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的《光明报》上）。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自由阵线报》，该报抱怨说，由于有人蓄意破坏，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报纸通常无法送到前线。
- 17 见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第797页。三月初，支持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劳动者总工会副书记帕斯库亚尔·托马斯呼吁，一刻也不应当允许“经常使用有悖于所有正派观念的手段”迫使士兵改变信仰的政治委员留在他们的位置上（一九三七年三月三日《巴伦西亚通讯》）。另请参阅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报》和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光明报》上的对托马斯的采访及其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六日《光明报》上的文章。就连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门负责人的共产党员安东尼奥·米赫也在一九三七年四月承认，政治委员有些“越权”（见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红色阵线报》）。
- 18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19 感谢总政治部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加夫列尔·加西亚·马罗托向我提供了这一情况。
- 20 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212页；另请参阅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劳动者总工会与内战》，第10—11页。在《我的回忆》之前借助资料所写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中，拉尔戈·卡瓦列罗提供的未经他签字而任命的政治委员人数是“一百多”。他问道：“怎么才能解释[我]给予信任的两个人（德尔巴约和普雷特尔）竟然可以这样做事？唯一的解释是，他们完全投靠了共产党，因此，他们不仅背叛了任命他们的人，而且背叛了社会党和西班牙。”
- 21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127页。
- 22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让我去战斗》，第179—182页。
- 23 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本人对这件事情的记述，见《自由之战》，第219—220页；普利托的记述见《西班牙的动乱》，第二卷，第141页。
- 24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日《阿斯图里亚斯邮报》。
- 25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七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26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六日《红色阵线报》。
- 27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七日《红色阵线报》。
- 28 同上。关于马德里的共产党喉舌《工人世界报》对这项命令的抨击，见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九日等各期《工人世界报》。
- 29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日《前进报》。
- 30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日《红色阵线报》（《红色阵线报》是晚报）。

- 31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前进报》。关于《前进报》对共产党马德里地方党组织书记，中部前线督察委员弗朗西斯科·安东用共产党人政治委员取代社会党人政治委员的指责，见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各期《前进报》。关于《红色阵线报》的反驳，见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红色阵线报》。
- 32 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23/A124^a。
- 33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自由阵线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 34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关于其他赞成国防部长命令的文章，见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各期《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社会熔炉报》。
- 35 实例见何塞·迪亚斯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该报告收入何塞·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363—364页；弗朗西斯科·安东发表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八日《工人世界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载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九日《红色阵线报》；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和三十一日、四月八日和十三日以及五月十八日《红色阵线报》的社论。
- 36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七日《共和国官方公报》。科登说，拉尔戈·卡瓦列罗“想尽办法阻止民兵指挥官迅速晋升”，见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259页。
- 37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在为庆祝第五团正式解散而举行的一次公众集会上，何塞·迪亚斯宣称，对打仗心不在焉的那些军官将领的职务“应当由第五团所发现的新的人才来担任”（见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297页）。二月十六日法令颁布后，尽管共产党人经常提到晋升问题并且含蓄地批评拉尔戈·卡瓦列罗这项政策（实例见何塞·迪亚斯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收入《斗争的三年》，第367页；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载一九三七年四月七日《工人世界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红色阵线报》），但是，直到一九三八年一月限制民兵指挥官晋升的条款被废除（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共和国官方公报》）以后，它才公开批评这项法令本身（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红色阵线报》）。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对这项法令的尖锐批评，见《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三卷，第62—63页。
- 38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三卷，第63页。
- 39 引自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卡斯蒂利亚自由报》。关于《红色阵线报》对《前进报》攻击乌里韦的言论的反击，见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红色阵线报》。感谢费乌斯通讯社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向我提供了上述报纸没有包含的关于埃尔南德斯和乌里韦的详细情况。
- 40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前进报》。
- 41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红色阵线报》。
- 42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前进报》。



第五部分

共产党人获胜



西班牙共产党讨好社会党温和派

由于拉尔戈·卡瓦列罗反对他们控制军队的计划并且拒绝通过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使他们获得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共产党人遇到了挫折。现在，他们决定公开与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温和派也就是所谓中间派结盟，以便利用社会党的内部斗争推翻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

内战爆发之前，控制着党的执委会的社会党中间派强烈敌视共产党人。它谴责他们的两党合并运动是“联合的骗局”，¹并且痛斥因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支持而完成的两党青年运动的合并是“社会党青年被共产党兼并”。²的确，社会党执委会极不信任而且十分讨厌共产党人，以致拒绝对他们提出的在两党之间设立一个联络委员会的建议作出答复。“共产党向社会党建议根据一个旨在促进民主革命发展进而使其取得最后成果的方案组成一个联络委员会。”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一九三六年四月写道，“这个建议没有得到现在的改良主义中间派领导人的答复。另一方面，它受到社会党左派的欢迎。社会党的广大党员拒绝承认现在这个改良主义的执委会，他们支持拉尔戈·卡瓦列罗奉行的路线，这条路线几乎与革命路线完全一致，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路线完全一致。”³

在公开赞扬社会党左派领导人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同时，共产党人

严厉指责社会党中间派领导人因达莱西奥·普利托。普利托是一个专横的人，在温和派圈子里享有巨大的威望，他与自由甚至保守的共和派而不是社会党左派具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因此，当他在一九三六年春天向巴黎的《不妥协者》宣称西班牙人的个性无法适应“莫斯科的方法”，所以他支持社会党与共和派政府合作时，共产党的喉舌《工人世界报》建议，鉴于普利托通过鼓吹“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和国合作的陈词滥调”不仅与“夺取政权的暴力斗争”一刀两断，而且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划清了界线，他应当“自动退出社会党然后加入某个共和派组织”。⁴尽管这样奚落了普利托，不过，一九三六年春天共产党人在内心深处更加赞成普利托的温和立场而不是拉尔戈·卡瓦列罗激进的革命立场，他们间接或者私下谴责了后者的立场，但是，他们知道，只要与拉尔戈·卡瓦列罗继续保持友好关系，他们就能从与强大的社会党左派的公开合作中获得许多好处。

尽管内战爆发之前西班牙共产党与西班牙社会党中间派不可能合作，但是现在似乎可以合作了，这不仅因为他们都对拉尔戈·卡瓦列罗怀有敌意所以决心将其赶下总理和国防部长的宝座，而且因为一些中间派领导人反对两党最终合并的态度有所缓和。此外，普利托派所控制的社会党的一些地方组织对两党合并的支持迅速升温，以致到一九三六年年底时，据社会党书记拉蒙·拉莫内达（在几个月后对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说，“如果社会党不加以控制的话”，执委会面临着“合并在地、省和地区的各级组织进行”的可能性。但是，从基层开始的组织合并对社会党全国领导人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所以，自一九二一年以来其政治信仰就在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摇摆不定、此时暗中支持共产党的拉莫内达⁵小心谨慎地避免因鼓励地方组织赞成立即合并的积极性而引起更加谨慎的党的领导人的担忧。“在我们看来，”他接着说，“最明智的态度……是欢迎这种[支持合并的]意见并且通过与共产党进行磋商传递它。”这样一来，执委会就能“[对地方组织]行使权力从而阻止它们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为进行部分合并采取主动的行动”。⁶

于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社会党执委会向共产党政治局建议，组成一个全国委员会协调两党的行动。⁷据共产党官方内战史记载：“卡瓦列罗派领导人对执委会采取的新路线警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

建议，社会党执委会应当邀请两名劳动者总工会[其执委会由拉尔戈·卡瓦列罗控制]的代表参加磋商。……尽管卡瓦列罗派领导人同意这个建议……但是，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加快工人阶级联合的迫切愿望。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的代表通过各种拖延手段和完全站不住脚的借口破坏两党的磋商。”⁸

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拉尔戈·卡瓦列罗直截了当地答复斯大林，断然拒绝两党合并。但是，尽管他拒不合作，共产党人仍然由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对苏联大使马塞尔·罗森堡⁹和化名道格拉斯的斯穆什克维奇将军意料之外的友好态度而受到鼓励，后者是苏联在西班牙的空军部队指挥官，普列托以海军和空军部长的身份向他提供一切便利。“普列托最初对苏联人非常友好。”普列托曾经的好友、¹⁰内战初期加入共产党的西班牙空军司令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证实，“他说，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鼓励他们帮助我们。他敦促苏联人给我们运送战争物资。他对苏联飞行员发表过两三次讲话，一次是在阿尔瓦塞特，感谢他们来到西班牙并且指明他们的国家是唯一一个帮助共和国的国家。他说话像一个共产党人。他对道格拉斯和罗森堡非常友好。”¹¹

普列托以同样罕见的与共产党人合作的态度向共产国际代表柯多维拉（“梅迪纳”）保证，他准备努力促成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合并，¹²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三日进行的一次谈话中，他也向后来成为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的国际纵队政委彼得罗·南尼表达了这一意向。¹³

尽管普列托的友好表示与他过去的行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是，从他在一九三七年五月担任国防部长之后不久就开始坚决抵制共产党人的行为来判断，他的内心肯定有所保留。普列托讲述的下面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他接替拉尔戈·卡瓦列罗入主国防部以后，值得我们记录在案：“一天晚上，在并非常规的时刻，盖斯基[一九三七年三月中旬接替马塞尔·罗森堡担任苏联大使的列昂·盖基斯]给我带来了一些好消息：一批重要的战争物资——我认为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将要从苏联港口装运启程。看我露出了满意的神情，大使显得非常高兴。两天后他又来见我，要求我支持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在我拒绝之后他几乎是以威胁的语气重申了他的要求。他固执地不肯罢休，向我暗示他是在执行莫斯科的命令，

而且将视我的态度奖励或者惩罚我。他的威胁对我没有起什么作用。第三次来见我时，[盖基斯]只字不提我们先前进行的谈话，但是他通知我，曾经提到的那一批急需的战争物资将不再发运。这就是我所受到的惩罚。”¹⁴

不过，在一九三七年春天，当共产党人需要普列托的时候，他更需要他们以达到推翻卡瓦列罗的目的。普列托没有原谅他这位对手一九三六年五月阻止他担任总理的行为。实际上，普列托与卡瓦列罗的关系甚至在那之前已经因为相互竞争和对抗而非常紧张，以致他们彼此几乎不说话。拉尔戈·卡瓦列罗证实：“在我被阿萨尼亚先生召见并与他和另外一些部长谈话时，有一次，普列托参加了。他与每一个人握手打招呼……但是只有我除外。我意识到我的存在让人讨厌，于是我就离开了。”¹⁵据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将军说，尽管普列托与拉尔戈·卡瓦列罗加入了同一个内阁，但是，他们尽量避免互相接触，并且通过中间人商讨与他们各自的部门同时有关的事务。¹⁶

384

像共产党人一样，普列托被敌视社会党左派的情绪所激励，¹⁷同时受到这一希望的鼓舞：一九三六年七月席卷西班牙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的回落将使英法两国放弃它们的中立政策。一九三六年十月四日，表达普列托观点的《社会主义者》写道：“我们必须考虑周边国家的态度。……我们仍然希望某些民主国家对西班牙形势的看法有所改变，与通过促进革命可能导致的后果妥协将是令人遗憾的，将会酿成一场悲剧，目前，革命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后果。”¹⁸但是，普列托与指导西班牙共产党政策的共产国际在目的方面存在着某种严重分歧；因为，共产国际首先并且最为关心的是苏联的战略地位由于解除武器禁运而得到的改善，普列托则像阿萨尼亚总统以及另外一些将这位社会党温和派政治家视为领袖的自由共和派人士一样，关心的只是西班牙的形势。在他看来，英法两国的援助将抵消苏联不断增加的影响，他将这种影响主要归咎于英法两国的中立政策。“对共产主义运动提心吊胆的西方民主国家没有想到，”他在内战结束以后断言，“由于它们不进行援助，这一运动在西班牙发展起来。这些国家拒绝给予我们帮助，以致当人们听说苏联正在向我们提供保卫国家的物资时，公众的同情慷慨地给予了苏联。”¹⁹

不过，由于目前他还需要共产党人以便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同

时由于他几乎没有认识到，像那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一样，他最终也将成为共产党人的牺牲品，因此，普列托顾不上担心共产党的发展及其诱使人们入党的手段了。²⁰共产党人不择手段地拉人人党一直使他对共产党与社会党执委会建立密切关系的尝试有抵触情绪，通过社会党主席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以及另外一些坚定的支持者，例如曼努埃尔·阿尔瓦尔、曼努埃尔·科尔德罗、安纳斯塔西奥·德·格拉西亚和弗朗西斯科·克鲁斯·萨利多，他对执委会仍然具有直接的影响力。共产党人也顾不上他们过去对普列托的不信任了，这种不信任一直妨碍他们向这位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以及他的社会党中间派示好。共产党人似乎一度认可普列托作为拉尔戈·卡瓦列罗继任者的候选人，正如共产国际代表鲍里斯·斯特凡诺夫在谈到他的这个身份时对秘鲁共产党人欧多西奥·拉维内斯所说：“就像你很清楚的那样，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朋友或者敌人；只有为我们办事或者不为我们办事的人。”²¹

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底发表的一份反映共产党与社会党中间派的友好关系以及与拉尔戈·卡瓦列罗关系破裂的声明中，共产党政治局宣称：

“考虑到由于正确理解了人民阵线的政策，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的关系正在变得日益紧密这一事实以及对共产党的敌意实际上并非来自社会党本身，而是来自一些不理解群众正常感情的孤立的个人，政治局认为，必须加强它与社会党的联系。因此，它邀请社会党执委会召开一次联合会议，旨在审视当前的形势，然后通过组成地方和全国性的协调委员会，在某种永久性的基础上建立比以往更加密切的关系。协调委员会将有利于磋商进而采取某些措施，以便实现两党统一行动并且尽快将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成为西班牙工人阶级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伟大政党。”

385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治局已经委派一个代表团立即与社会党的领导阶层建立联系。”²²

作为四月份进行的一系列谈判的结果，一个全国协调委员会组成了，拉蒙·拉莫内达在委员会中代表社会党，何塞·迪亚斯代表共产党。它的第一个行动是向两党的各级组织发出指示，要求它们在各自的地区建立类似的联络委员会。²³在随后几个月，普列托派社会党人以几乎不亚于共产党人的热情从理论上大肆吹嘘两党合并的概念，²⁴但是，由于社会党执委

会大多数成员的疑虑，它绝不可能成为现实。不过，它也并非一无所获。

“在得知一些社会党人尚未为这种联合做好准备时，”一九六九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简史》（《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Крат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透露，“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得出结论，共产党人‘不应强行推动共产党与社会党合并。……’它们建议，应使那些已经打算加入共产党的社会党人相信，继续留在社会党内工作更有利于加强协调一致的行动，也更有利于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合并作准备。”²⁵

但是，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动荡不定的政治形势下，共产党人与社会党的普列托派立即建立密切的关系比组织合并具有更加迫切的重要性，而且注定要对即将到来的那一段决定性时期的事态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正如情况所显示的那样，在表面上同意为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而努力的背后，隐藏着将拉尔戈·卡瓦列罗赶下总理和国防部长宝座的某种默契。

注释：

- 1 一九三六年七月三日《社会主义者》。
- 2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社会主义者》。
- 3 何塞·迪亚斯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七日《国际通讯》（西班牙文版）上的文章，收入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133—139页。
- 4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工人世界报》，第三版和第六版。
- 5 一九二一年，作为西班牙社会党年轻而杰出的成员，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欢呼的拉莫内达成功地劝说执委会投票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此后不久他离开了西班牙社会党，随后几年在刚刚成立的西班牙共产党担任内务秘书的职务（见杰拉尔德·H.米克《西班牙的革命左派，1914—1923》，第144、365—366和448页）。在其思想政治历程中，他于一九三一年共和国成立之前再次加入社会党并在内战爆发之前当选议会议员，由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策略，他成为坚决反对共产党的社会党执委会书记。尽管在内战的第一年他名义上是个普列托派成员，但他小心翼翼地与共产党人携手共事，最后支持反对普列托的胡安·内格林总理。他的力量基础是印刷工人的工会组织西班牙印刷业联合会，他是该联合会的主席。感谢前西班牙社会党执委会书记和议会议员安德烈斯·萨沃里特向我证实了拉蒙·拉莫内达的亲共立场（萨沃里特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萨沃里特在社会党内有保存党派和工会领导人政治兴衰详细记录的名声。关于拉莫内达的政治沉浮，见路易斯·罗梅罗·索拉诺（共和国期间的社会党议员）的《西班牙内战前夕》，第176—177页；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66—69页；加夫列尔·莫隆，《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110—111页；阿马罗·德尔·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1901—1939》，第二卷，第623—624页。正如我们所知，后三部著作的作者都是著名的社

会党人，虽然罗萨尔在内战初期就转投了共产党。

- 6 引自《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三卷，第51—53页。在刊登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光明报》上的一次演说中，拉莫内达更加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们知道，必须由唯一一个政党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定性。由于这个原因，社会党人对与共产党合并没有异议。”（引自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第二卷，第634页）
- 7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三卷，第51—53页。
- 8 同上。
- 9 见莫隆《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106—107页。
- 10 见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妻子）的《辉煌不再》，第179—180和195页。
- 11 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一九四〇年在墨西哥接受我的采访时对我的陈述（采访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 12 这在共产党人当中尽人皆知，内战期间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何塞·杜克一九四四年在墨西哥接受我的采访时证实了这一点。
- 13 彼得罗·南尼，《西班牙内战》，第67页，注释2。有更多的证据证明普列托这种特别反常的政治举动：在一九三七年夏天举行的一次社会党执委会会议上，据说普列托以政府有望得到的唯一援助来自苏联为由，直截了当地表示支持两党合并（见亲共人士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67页和《最后一个乐观主义者》，第288页，注释2；温和派人士莫隆，《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107页；胡安-西梅翁·比达特，《全是罪犯》，第620—621页。比达特说，普列托“认为，在为时已晚之前考虑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的必要性的时候到了，我们应当发现我们已经失去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
- 14 普列托发表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九日（巴黎）《社会主义者》上的文章。据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沃诺斯说，（普列托接管国防部时成为外交部长的）何塞·希拉尔告诉他，苏联的战争物资运到西班牙共和国的港口后，“在政府预先同意给共产党人安排重要的警察和军队职位之前不能卸货”（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沃诺斯，《政治轶事》，第233页）。我没有发现支持这一指控的其他证据。
- 15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153页。另请参阅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657页。
- 16 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一九四〇年在墨西哥接受我的采访时对我的陈述（采访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 17 他的态度在其舆论工具（马德里）《消息报》和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执委会机关报（马德里）《社会主义者》的一些社论中反映出来。实例见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消息报》和一九三七年三月二日、十日和十一日《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的负责人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是普列托信任的人。
- 18 另请参阅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三卷，第163—164页。
- 19 普列托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一日在墨西哥城发表的演说，见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墨西哥“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俱乐部开业》，第13页。
- 20 这些手段是社会党执委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尖锐批评甚至猛烈抨击的目标。实例见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四日、二月二十日和二十五日、三月六日、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和二十五日、五月十五日《社会主义者》上的文章；另见社会党执委会的通报，载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社会主义者》。
- 21 欧多西奥·拉维内斯，《大骗局》，第311页。拉维内斯在巴伦西亚的共产党报纸《红色阵线》编辑部工作（同上，第309页）。
- 22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红色阵线报》。

- 23 见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红色阵线报》上的通告。
- 24 见拉蒙·拉莫内达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社会主义者》，一九三七年八月三日《前进报》。
- 25 《共产国际简史》，第443页。在该书的英文版中（*Outlin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第420页），俄文版中的“更有利于”几个字被“更有助于他们”所代替。这两句话的不同含义值得深思。另请参阅（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三卷，第218页。

加泰罗尼亚：军事叛乱与社会革命

因为与社会党温和派就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达成协议——一些左翼共和派领导人也参与达成这个协议——而实力大增的共产党人只需要一个合适的机会，以便使他们的矛盾发展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当一场武装冲突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首府、伊比利亚半岛最大的工业中心巴塞罗那爆发时，这个机会出现了。

自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至二十日军事叛乱在巴塞罗那失败以来，随着由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导的工会组织全国劳工联合会及其意识形态指导者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它们显然是加泰罗尼亚地区最强大的工人阶级组织——成为该地区实际上的控制者和革命的推动力量，巴塞罗那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声称挫败巴塞罗那军事叛乱的大部分功劳是他们的。作为这一戏剧性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断言，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民兵部队“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在两天令人难忘的战斗中挫败了军事叛乱，四百多人在战斗中丧生，其中包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积极分子弗朗西斯科·阿斯卡索，他在攻打阿塔兰萨

纳斯兵营时战死。¹另一方面，军事叛乱时担任加泰罗尼亚治安总署署长（comisario general de orden público）、主张地区自治的温和共和派人士费德里科·埃斯科费特少校则声称，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如果没有“治安部队的英勇奋战”，这些组织并不足以阻止巴塞罗那驻军占领这座城市。²他所说的治安部队就是突击卫队和国民卫队，后者由何塞·阿朗古伦将军和安东尼奥·埃斯科瓦尔上校指挥，两人均为忠诚的共和派人士。³

387 无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挫败军事叛乱的过程中各自作出了什么贡献，它们的参战⁴——尽管费德里科·埃斯科费特拒绝向它们提供武器⁵——对于负责指挥叛军的曼努埃尔·戈代德将军投降⁶以后巴塞罗那和整个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政治局面立即发生的彻底改变具有决定性意义。

关于埃斯科费特拒绝向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提供武器这件事，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证实，七月十九日约凌晨三点，巴塞罗那爆发军事叛乱一小时前，加西亚·奥利韦尔去治安总署要求得到武器。据阿瓦德·德·桑蒂连说，埃斯科费特少校答复道，他对自己的人马有信心，同时也不能将任何武器分发出去。几小时前，突击卫队奉命重新配备一些步枪，结果，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停泊于港口的船只上发现了这些步枪并将其夺走运到全国劳工联合会所属的运输工会。“要不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从中斡旋……一场屠杀可能在运输工会发生，他说服工会会员交出了一些明显有所磨损的武器。于是，在叛乱的兵营已经进入战备状态的紧要关头，一场冲突得以避免。”⁷

加泰罗尼亚温和共和派人士、军事叛乱期间在埃斯科费特身边担任警察局长的比森特·瓜内尔描述了挫败军事叛乱后革命者的兴高采烈：

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拿着他们抢来的武器涌上街头，其中大部分人没有参加过战斗。……不可能恢复秩序。我们也无法使自己的队伍保持纪律，包括国民卫队。热情高涨的国民卫队队员被街头的气氛所感染，他们身穿衬衣开着卡车，车上插着许多旗帜，旗帜上写着各种

组织的名称，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组织占大多数。像加泰罗尼亚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群众开始焚烧教堂和修道院，焚烧著名右翼人士的住宅以及其他私人建筑。……我们下令警察分局以及突击卫队和治安部队收缴枪支，……但是，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不可能收回群众抢走的步枪、手枪和各种武器，由于担心再也找不到这些武器，迄今为止一直否认它们被抢走了。驻军部队的新老士兵被马德里政府颁布的一项奇怪的法令免除了[效忠服从其军官的誓言的]义务⁸……他们加入了民众的队伍或者试图通过各种可以利用的交通方式返回故乡。我们无法解决的这种绝对混乱状态是军事叛乱所造成的许多灾难之一。警察部门和政府当局似乎逐渐恢复正常运转，但实际上是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治上的领导权，他们占有了大量战争物资并且表现出某些方面的组织才能。⁹

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左翼共和派人士、巴塞罗那市市长卡洛斯·皮·苏涅尔写道：“在[战斗的]结局还没有确定时，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就不顾一切地忙着抢夺败军丢弃在街道上和兵营里的武器。这在随后那个可怕的时期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市长的责任……有赖于军队，[军队没有预见到]，军人被打败可能意味着他们为保证秩序领取的武器将成为制造恐怖和混乱的工具。”¹⁰

388

挫败军事叛乱之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工人占领了邮政局和电话局并在巴塞罗那以及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其他城镇和乡村组成了治安巡逻队和民兵小分队，同时通过他们的工厂、运输工具和食品委员会对该地区的大部分经济生活确立了他们的支配地位。¹¹在巴塞罗那，飘扬在已经更名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之家的前雇主协会全国就业促进会总部上方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红黑旗帜见证了他们的权力和革命的胜利。

曾经就读于剑桥大学的英国诗人和共产党员约翰·康福德在西班牙的所见所闻鼓舞了他，后来他在战斗中死去。“在巴塞罗那，”康福德写道，“人们可以切身了解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什么。……实际控制权掌握在民兵委员会手里。……大街上到处都是武装的工人和民兵，他们还坐在

过去属于资产阶级的咖啡馆里。雄伟的科隆酒店俯瞰着城市的主要广场，它被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所占据。再往前走，位于西班牙银行对面的一座大楼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总部。……武装的工人控制着街道，仿佛身在伦敦一样。……这才是真正的多数人专政，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¹²“在我们这个地方，”中产阶级党派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著名成员海梅·米拉维特列斯断言，“资本主义已不复存在。管理大型冶金厂和纺织厂以及公用事业公司的是工会。”¹³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还控制着法-西边境的大部分地区，这本来是中央政府所保留的诸多权力之一。一九三二年九月颁布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法令的第九条，授权马德里政府在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负责维持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秩序，但是，由于其本身已经成为革命的牺牲品，它既没有行使权力的意愿，也没有行使权力的力量。

就像一九三一年的共和国宪法由于革命已经成为一纸空文一样，加泰罗尼亚自治法令也已成为一纸空文。自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①以来，加泰罗尼亚就没有如此彻底地摆脱过马德里的控制；然而，这种自由并不能使鼓吹加泰罗尼亚自治的主力军中产阶级感到满意，因为，革命在摧毁马德里的强权的同时，也破坏了自由企业制度和私有财产安全赖以存在的政治结构。自治法令使加泰罗尼亚拥有了一个自治政府，它由议会和行政委员会所组成，以中下层中产阶级为主的加泰罗尼亚最强大的党派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在其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在革命的疾风暴雨中，这两个机构的实际作用几乎已经荡然无存。

389

七月二十日，刚刚挫败军事叛乱，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路易斯·孔帕尼斯就向包括加西亚·奥利韦尔在内的一群得意洋洋的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发表了下面一番安抚性声明：“今天，你们是这座城市和加泰罗尼亚的主人……因此，如果我提醒你们你们并不缺乏我党的忠诚党员——无论他们人数多少——的帮助也不缺乏国民卫队、突击卫队和青年卫队（Mozos de Escuadra，自治政府的特别警卫部队）的帮助的话，希望你们不要见怪。”¹⁴……你们取得了胜利，一切由你们来决定。如果你们不需要我或者不想让我担任加泰罗尼亚的主席，现

^① 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末代国王查理二世（1665—1700在位）死后无嗣，欧洲王室因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而引发战争，史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

在就请告诉我，我将立即成为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又一名士兵。另一方面，如果你们认为在这个位置上……我和我的党员……能够对这场斗争有所帮助，……你们可以信赖我和我的忠诚，无论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政治家，我相信，今天，可耻的过去已经结束，因此，我真诚地希望加泰罗尼亚将会走在社会发展最先进的国家的前列。”¹⁵尽管孔帕尼斯主席这番声明的真实性曾经受到埃斯科费特少校——正如我们所知，当时他是加泰罗尼亚治安总署署长——的质疑，¹⁶但是，在其所写的为孔帕尼斯歌功颂德的传记中，共和派法官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对这番声明毋庸置疑地予以确认；它还得到共产党作家曼努埃尔·贝纳维德斯和巴塞罗那市长、孔帕尼斯主席亲密的政治伙伴卡洛斯·皮·苏涅尔的确认为。¹⁷

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应孔帕尼斯主席的邀请前往自治政府宫。“步枪、机关枪、左轮手枪，这些武器把我们武装到了牙齿。”加西亚·奥利韦尔回忆说，“孔帕尼斯站着接待我们，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很快不再拘泥于礼节。我们坐了下来，步枪放在两腿之间。”¹⁸“在会见的过程中，”同样在座的阿瓦德·德·桑蒂连说，“自治政府的一些成员脸色苍白，不停地发抖。”¹⁹

这并不是孔帕尼斯第一次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打交道。在君主制时期，他曾作为他们的辩护律师赢得声誉。他与他们几乎毫无共同之处，因为他与他们在所有基本特征上有天壤之别，就像他放弃法律专业组织中下层中产阶级政党所表明的那样。作为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和农夫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他代表了该地区的小工厂主、手艺工匠、商人以及佃户和佃农。这使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不喜欢他，无政府工团主义喉舌《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三年的一段评论概括了他们对他的看法：他“与其他政客是一路货色”。²⁰一九三四年孔帕尼斯当选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以后，这种关系并没有改善，结果，在社会动荡的关键时期，自治政府查封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总部并将它们的报纸停刊。“尽管《工人团结报》实际上是当地发行量居第二位的报纸，”阿瓦德·德·桑蒂连写道，“但在一九三四年，它长达几个月不能印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会积极分子在完全秘密的情况下继续出版。整个一九三四年，我们的

地方组织、我们的俱乐部和我们的文化中心不能公开活动，自治政府唯一关心的事情是，搞垮全国劳工联合会，消灭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²¹

但是现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控制了局面。

“在[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和加西亚·奥利韦尔与自治政府主席的交谈过程中，”巴塞罗那市长回忆说，“当孔帕尼斯表示，由于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他打算辞去自己的职务时，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场面出现了。……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他担心，如果他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关系破裂，他们将完全控制这座城市，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最可怕的混乱局面，造成并肩战斗的各派之间统一战线的崩溃，最终导致一场军队和长枪党的残酷镇压。只要不发生这种情况，局面就可能逐渐改善，政府就可能重新确立其当权的地位。”²²简单地说，正如警察局长比森特·瓜内尔所指出的那样：“除了维持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政府门面’并且一点一点地努力恢复政府的控制之外别无选择。”²³

用加西亚·奥利韦尔的话说，孔帕尼斯在其安抚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的声明中表现出“灵活”和“务实”的姿态。“作为一个意识到国家的重大时刻已经来临的加泰罗尼亚人，作为一个并不害怕剧烈社会变革的进步开明人士……[他]使用环境要求的语言并以自尊和宽容的独特姿态从容应对非常困难的局面。”²⁴

毫无疑问，孔帕尼斯过去给予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法律援助现在有助于使他们对他产生好感。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他后来的声明加强了他们有所恢复的对他的信任。他在十月的一次公开集会上宣称：“工人积极分子当然是那些最关心革命工作的人。我们这些肯定受到尊重和倾听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应当为工人阶级排忧解难。我们必须与他们同行或支持他们，但是，归根结底，发号施令的必须是他们。企图通过策略或力量防止工人阶级赢得未来将毫无意义。”²⁵

作为一名以煽情著称但是仍对弱者怀有些许真正同情心的随遇而安的政客，他很快适应了当时的气氛。“在共和派人士中，很少有人如此准确地理解了七月十九日以后出现的局面，”阿瓦德·德·桑蒂连写道，“同

时，也很少有人如此明确而有力地对工人管理之下的新的社会制度表示支持。”²⁶显然，当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达到胜利的高潮时，作为一名曾经反对它们的政客，孔帕尼斯过于精明。他知道，反抗将是危险的，面对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浪，在恢复自己的影响力之前，他的党派必须在沉没与独自忍受之间做出选择。但是，对其追随者的忠诚以及某种保护他人——甚至保护那些被怀疑同情佛朗哥将军的人——的人性冲动使他无法默默忍受革命引发的暴力行为。实际上，他的大部分公开声明均含有呼吁制止暴力行为并且谴责暴力行为的内容，²⁷而且，他的亲自干预还使许多生命受到威胁的人离开了这个国家。“一九三六年七月以后，当[路易斯·孔帕尼斯]被革命弄得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位加泰罗尼亚科学家告诉安赫尔·奥索里奥，“当我们大家不得不向自治政府请求保护我们的朋友和机构时，我看到他竭尽全力挽救他所能挽救的一切，尽管有时没有成功。我听说，多亏[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文化专员本图拉·]加索尔和[内务专员何塞·马利亚·]埃斯帕尼亚的干预，许多右翼政界人士，例如阿瓦达尔、本托萨-卡尔维尔、普伊格-卡达法尔奇、蒙特塞尼伯爵，以及大量教会上层人物还有无数神父和工厂主得以逃走保住了他们的性命，两位专员是应孔帕尼斯的要求并且完全按照他的指示采取的行动。”²⁸

孔帕尼斯还谨慎地谴责了以革命名义的过激行为和目无法纪，但他克制住自己没有评论革命所造成的变化。这也是内战初期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其他领导人²⁹及其舆论工具《人道报》的态度，³⁰因此，即使敢于对革命提出批评，他们也是旁敲侧击而不是直接表明不同意见。

“不到二十四小时，一度看似顽固不化的头脑发生了惊人的改变。”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写道，“在精神上与我们相去甚远的人们表现出一种明显的适应能力，他们不加反抗地接受了事物的新秩序。”³¹

“我们能够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实行某种绝对的专政表明自治政府已经过时，在它的地盘上建立了人民的真正权力。”西班牙自由主义运动的主要理论家和积极分子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写道，有些人认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当别人对我们实行专政时我们不承认专政，我们也不想以别人为代价实行我们的专政。[我们决定]以孔帕尼斯主席为首的自治政府应当继续留在它的岗位上。”³²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写道：“有人

说，选择实行我们的专政将更可取，这话说得太轻巧。不错，它可能对那些想当独裁者的人更可取，但是对劳动人民不可取。……且不论实际上我们将会走向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主张的反面，对于西班牙来说，无政府主义专政就像法西斯或共产党的独裁一样邪恶。”³³几个月后将违背其反政府、反国家的原则成为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司法部长的加西亚·奥利韦尔也断言：“加泰罗尼亚在自由共产主义与民主之间的选择正在决定西班牙的命运，前者相当于无政府主义专政，后者意味着各种力量的合作。……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决定支持合作和民主，放弃必将导致革命被无政府主义专政所扼杀的革命的极权主义。”³⁴

392

在挫败军事叛乱之后召开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地区特别会议上，无政府主义者作出了放弃极权主义解决方案的决定。³⁵曾经被认为是个“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克”的加西亚·奥利韦尔说，他建议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攻占那些重要的政府建筑”，但是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回答说，在占领萨拉戈萨之前不应发动政变，那里是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个据点和毗邻的阿拉贡地区的首府。他说，占领萨拉戈萨“用不了十天”。加西亚·奥利韦尔对此回答道，革命不应当“停留在街上等待占领这座或者那座城市”。³⁶不过，根据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正式报告，这次会议一致同意放弃“极权主义解决方案”，因为无政府主义专政将会导致七月十九至二十日合力战胜叛军的人全被消灭，因为它将由于外国的干涉被“镇压”。³⁷

尽管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往往用反对专政的意见和外国入侵的威胁作为理由解释他们为什么决定不在巴塞罗那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³⁸但是，他们经常在农村地区借助于民兵小组和革命法庭建立某种形式的社区专政。不过，虽然他们在某些乡村不惜以武力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和自由共产主义，但是他们并没有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有计划地将政府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内战爆发前一年，老资格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费德丽卡·蒙特塞尼的父亲费德里科·乌拉莱斯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写道：“[尽管]我们不谋求权力或独裁，但是我们并没有解决在社会革命发生与基于所有人经济平等、权利相同的自由政治制度建立之间需要运用什么力量的问题。”³⁹

身为温和共和派人士的治安总署署长埃斯科费特少校阐释了革命之

日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两难处境。他回忆说，七月二十日，当全国劳工联合会发现自己在巴塞罗那“实际上控制了街道、武器和运输工具，也就是说实际掌握了权力时，它的领导人迷失了方向，尽管他们都是积极勇敢、经验丰富的战士。他们没有计划，没有明确的信条，没有关于他们应当做什么或者他们应当允许别人做什么的想法。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自由共产主义观念不切实际，就其在革命时期应当遵循的路线而言，不能倡导这种观念”。⁴⁰

全国劳工联合会为其成员的国际工人协会（AIT）驻巴塞罗那代表赫尔穆特·吕迪格承认全国劳工联合会陷入了两难境地。他在回应国外无政府主义者的批评时写道：“那些声称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在一九三六年建立自己的专政的人，不知道他们在要求什么。……全国劳工联合会将需要一个政府方案，一个行使权力的方案；[它将需要]行使权力的训练、中央指导的经济计划和操纵国家机器的经验。……全国劳工联合会没有这些东西。那些认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建立自己的专政的人也没有这样一个方案，无论是关于他们本国的还是关于西班牙的。让我们不要欺骗自己了！另外，假如全国劳工联合会在七月十九日以前就有这样一个方案，它就不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它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而且，假如它把这种方法运用于革命，那将给予无政府主义以致命的打击。”⁴¹

393

由于自己没有夺取政权的计划，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尽管他们是反国家主义者并且反对一切政府）决定允许自治政府继续运转。但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战争与革命不可能由一个对工人阶级队伍中人数最多、思想最激进的派别缺乏影响力的政府来指挥。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也不可能用他们自己的影响力使这个政府恢复权威而不违背其反国家、反政府的原则。于是，一个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成立了，在这个委员会里，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把持了关键的作战、治安和运输部门。⁴²据加西亚·奥利韦尔说，委员会是根据孔帕尼斯主席的建议成立的。⁴³这很有可能，因为没有人比孔帕尼斯更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打算赢得战争胜利的话，如果想从革命风暴中挽救一些共和制度的价值观念和部门机构并使革命的恐怖活动受到哪怕一点点控制的话，某种形式的中心管理机构是必要的——这个机构即使名义上不

叫政府，本质上也是一个政府，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可以在不失面子的情况下参与其中，它可以在有名无实的政府重新掌握重要的实权之前进行战争。如果他对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的安抚声明只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的话，那么，这决不是向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屈服，正如共和派法官和孔帕尼斯主席的传记作者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所指出的那样，这是旨在使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对孔帕尼斯主席作出让步的“无比明智”的一着。“我们不应想当然地认为他要欺骗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奥利奥索补充说，“实际上，没有什么比诚实更明智。主席想说的肯定是：‘现实地说，我只有名义上的权力。真正的权力在你们手里。……但是，你们不认为你们的努力需要一个指挥机构吗？如果没有指挥机构，你们就容易陷入混乱状态，劳而无功。那么，利用我的管理和领导能力吧。’”⁴⁴

尽管孔帕尼斯主席设想的可能是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作为自治政府的辅助机构发挥作用，但是，该委员会立即成为加泰罗尼亚地区实际的行政当局。它的权力并不依靠遭到破坏的国家机器，而是依靠革命的民兵武装和治安巡逻队，依靠革命初期在该地区大量涌现的各种各样的委员会。身为民兵委员会成员的阿瓦德·德·桑蒂连证实，委员会的工作包括在后方建立革命秩序，为前线组建民兵部队，组织安排经济、立法和司法活动。总之：“民兵委员会就是一切；它照管一切。”⁴⁵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写道：“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成为唯一真正的权力，绝对的、革命的权力。”⁴⁶

394

孔帕尼斯主席委派精明而且极其能干的政治家何塞·塔拉德利亚斯作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在民兵委员会中的代表，据塔拉德利亚斯的传记作者说，他的“双重目标”是“与所有反法西斯力量合作组织战争行动”以及“实现权力从无政府主义者向自治政府的全面转移”。即使对于像塔拉德利亚斯这样精明能干的人，结束权力的分裂状态也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但是，正如其传记作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他能理解他们高尚的乌托邦目标”，他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友好关系成为“他开展政治活动的决定性因素”。⁴⁷

尽管塔拉德利亚斯确认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受到“孔帕尼斯主席

高大形象的有力影响”，⁴⁸但是，他还说，自治政府“与其说是实质性的，不如说是象征性的”。⁴⁹这并不是说自治政府一点权力也没有，因为它可以依靠残余的正规警察部队即突击卫队和国民卫队，也可以依靠一些政治派别组织的民兵，即使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武装力量的实际人数远远超过这些部队。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财政委员会与劳动者总工会的银行雇员工会共同控制了该地区的银行系统⁵⁰——部分由于主要代表该地区的蓝领工人，部分由于总是鼓吹废除货币，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忽视了这一权力资源，但是，财政委员会基本上是一枚为革命服务的橡皮图章，因为它的首要功能是满足民兵委员会的资金需要。当然，自治政府似乎也像一个最高权力机构那样颁布法令或行政命令，但是，在其官方刊物《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公报》⁵¹上发布的大部分法令只不过是一些事先经过民兵委员会批准的措施，或者是对既成事实的法律确认。的确，随着孔帕尼斯逐渐恢复了自信，他抵制了委员会某些更极端的建议——例如废除革命者认为是个过时机构的加泰罗尼亚议会的建议——并以如果他们采取行动他就辞职相威胁。据曾经是共产党所控制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党员的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说，孔帕尼斯对委员会的成员们说：“只要你们愿意，你们可以不需要我，你们可以不需要自治政府，你们可以逮捕我，但是，全世界明天将知道，合法权力被篡夺了！”⁵²

孔帕尼斯喜欢夸张的举止。“他会大发脾气，”与他很熟的塞拉·帕米埃斯证实，“拽自己的头发，乱扔东西，脱掉外衣，扯掉领带，解开衬衫。这种行为很典型。”⁵³不过，在革命初期，孔帕尼斯表现得比较克制和谨慎，因此，作为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的橡皮图章，他的政府主要扮演被动的角色。正如委员会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之一阿瓦德·德·桑蒂连所说，“所有事情必须由委员会决定或批准”。⁵⁴事实正是这样。证据如，将属于反对人民阵线的党派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专员暂时停职的法令；⁵⁵规定每周工作四十个小时并将工资提高百分之十五的法令；⁵⁶暂时停止针对民兵的驱逐诉讼的法令；⁵⁷没收教会财产和没收涉嫌参与叛乱者个人财产的法令；⁵⁸必须重新雇用由于政治原因被解雇的工人的行政命令⁵⁹以及劳工专员所发布的一系列关于由各行业工会制

定新的工作条件的行政命令。⁶⁰“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行业刊物《照明与电力》报道说，“巴塞罗那自来水总公司和略夫雷加特河地下水特许经营公司的工人将两个公司收归公有并且接管了管理和技术控制权。……第二天，自治政府承认没收行为合法，随后，一名政府的审计员（interventor）加入了管理委员会。”⁶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一份关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没收城市横向地铁公司的报告写道：“自治政府任命了一名审计员，工人们原则上接受了他，但是，他的作用完全是被动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企业的革命委员会手里。”⁶²

显然，城市中下层中产阶级对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在分裂的权力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并不满意，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可以随意实行集体化的状况也不满意，⁶³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的佃户和佃农同样如此，他们代表了该地区农业人口的大多数。在占有土地之后，他们认为革命已经完成了任务。这不是激进的态度。在那些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人占优势的村庄，或是在那些因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民兵的进驻而使局面对他们有利的村庄，个人耕种遭到禁止，经常不惜牺牲地里的收成。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主要报纸《工人团结报》承认：“一些问题出现了，我们认为结果适得其反。我们听说，某些不负责任的人把小地主们吓坏了，以致他们逐渐对日常劳作失去了兴趣。”⁶⁴它在另一天的报纸上写道：“小资产阶级陷入深深忧虑的消息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我们认为，最初的焦虑已经消失，但是，店主、商人、小工厂主、手工业者和小地主的不安仍将持续。他们对无产阶级的领导缺乏信心。”⁶⁵另外，关于巴塞罗那边上的一个三万居民的小镇奥斯皮塔莱特，一位批评集体化运动狂热分子的左翼人士写道：“所有做小生意的地方都被接管，像食品店、肉类市场、粮店、小电子工厂等等。结果现在人们说，由于革命信誉扫地、民众越来越感到不满，奥斯皮塔莱特是加泰罗尼亚地区法西斯分子较多的地方。”⁶⁶

眼看着自己的世界沉沦下去，也就难怪城市和农村的中产阶级为了抵抗汹涌澎湃的集体化运动而不顾一切地寻求帮助。

注释：

- 1 对我提出的问题的答复，该复函现存胡佛研究所。另请参阅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脚步的回声》，第170—171页。
- 2 费德里科·埃斯科费特，《为加泰罗尼亚和共和国效力：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的胜利》，第286—287页；另请参阅该书第425—426页。关于埃斯科费特的生平介绍，见M.特蕾莎·苏埃罗·罗卡《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95—120页。军事叛乱时担任巴塞罗那警察局长的比森特·瓜内尔战后告诉霍尔迪·阿克尔，七月十九日国民卫队在这座城市驻有两千人，还有突击卫队和治安部队总共一千九百二十人（见阿克尔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3 由于没有参与军事叛乱，两位将领战后均被佛朗哥将军处死。关于埃斯科瓦尔的生平介绍，见苏埃罗·罗卡《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267—286页。
- 4 就连一些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人也承认它们所起的重要作用：“我决不会忘记它们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路易斯·孔帕尼斯对让·里夏尔·布洛克说，见让·里夏尔·布洛克《武装起来的西班牙》，第34页）；“叛乱刚一爆发，无政府主义者就在巴塞罗那勇敢地向佛朗哥的军队发起了猛攻从而迅速镇压了叛乱”（路易斯·费希尔，《西班牙为何而战》，第41页）；“全国劳工联合会率先投入了战斗”（[《曼彻斯特卫报》驻巴塞罗那记者]弗兰克·杰利内克，《西班牙内战》，第325页）。
- 5 见埃斯科费特《为加泰罗尼亚和共和国效力》。另请参阅哈维尔·费夫雷斯（埃斯科费特的传记作者）《费德里科·埃斯科费特：最后的流亡》，第178页。
- 6 读者也许记得，作为一项预防措施，阿萨尼亚政府战前曾将时任国防部监察长的戈代德将军调到巴利阿里群岛担任并不重要的要塞司令，认为他在那里无法危害共和国。不过，他于七月十九日飞到巴塞罗那指挥当地的驻军。投降之后他很快就受到审判并被枪毙。
- 7 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西班牙劳工运动的历史贡献》，第323—324页。另请参阅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阿方索十三世，第二共和国，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第319页。
- 8 希拉尔政府所颁布的这项法令旨在解除士兵服从反叛军官命令的义务，但是，据重要的加泰罗尼亚政界人士何塞·塔拉德利亚斯说，它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塔拉德利亚斯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塔拉德利亚斯补充说，马德里政府认为这项法令将对反叛军官指挥下的士兵产生影响，但出现的情况正好相反。“也就是说，只有站在共和派一边的士兵注意到这项令人费解的措施，他们丢掉武器返回故乡，给我们一方造成了混乱。”另请参阅埃斯科费特《为加泰罗尼亚和共和国效力》，第402—403页。
- 9 比森特·瓜内尔，《西班牙内战中的加泰罗尼亚，1936—1939》，第139—141页。关于瓜内尔的生平介绍，见苏埃罗·罗卡《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121—142页。
- 10 卡洛斯·皮·苏涅尔，《共和国与内战：一个加泰罗尼亚政治家的回忆》，第386—387页。
- 11 关于加泰罗尼亚地区经济革命的具体情况，见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
- 12 乔纳森·加拉西编，《理解武器，理解伤害：约翰·康福德文选》，第174页。国际纵队的报纸《自由志愿军》一九三八年一月三日报道：“青年诗人和优秀的大学生约翰·康福德在他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死去。他是英国学生运动最杰出的领导人，他的努力比其他任何个人的努力都更有助于促进左翼学生组织的团结。……康福德同志是一九三六年夏末到达西班牙的第一批国际志愿者的一员。他参加了马德里保卫战，[后来又]在科尔多瓦前线参

加战斗并且牺牲在那里。”

- 13 海梅·米拉维特列斯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看见》上的文章。
- 14 据青年卫队指挥官佩雷斯·法拉斯说，一九三四年十月青年卫队有四百人（见一九四二年十月号《完全加泰罗尼亚》）。从那以后它的规模没有扩大。
- 15 被加西亚·奥利韦尔在其发表于《从七月到七月：斗争的一年》一书中的文章《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里引用，见第194—195页。
- 16 埃斯科费特，《为加泰罗尼亚和共和国效力》，第406—407页。
- 17 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孔帕尼斯的人生与献身》，第170—171页；曼努埃尔·贝纳维德斯，《加泰罗尼亚的内战与革命》，第185—186页；皮·苏涅尔，《共和国与内战》，第391—392页。
- 18 加西亚·奥利韦尔发表在《从七月到七月》一书中的文章，见第193—194页。
- 19 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53页。
- 20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工人团结报》。
- 21 一九三五年二月号《大陆工人》。
- 22 皮·苏涅尔，《共和国与内战》，第391—392页。
- 23 瓜内尔，《西班牙内战中的加泰罗尼亚》，第143页。
- 24 加西亚·奥利韦尔发表在《从七月到七月》一书中的文章，见第195页。
- 25 载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广告报》。另请参阅刊登在《自由报》上的他的声明，转载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最后关头》。
- 26 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西班牙革命与内战》，第148页。另请参阅前《工人团结报》负责人塞瓦斯蒂安·克拉拉的声明，载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巴塞罗那《消息报》。
- 27 实例见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广告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人道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劳动报》。
- 28 奥索里奥-加利亚多，《孔帕尼斯的人生与献身》，第189页。另请参阅胡安·路易·巴列斯卡《路易斯·孔帕尼斯·哈维尔，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第58页；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西班牙共和报》。没有人用这种人道主义行为帮助孔帕尼斯，一九四〇年德军占领法国之后，他被交给佛朗哥将军并遭到处决（具体情况见多梅内克·德·贝尔蒙特《路易斯·孔帕尼斯》，第136—149页；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向路易斯·孔帕尼斯致敬》，载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自由西班牙报》）。在巴塞罗那，另一些共和派人士也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实例见皮·苏涅尔《共和国与内战》，第402—403页和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的《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一卷，第1023—1024页，关于加泰罗尼亚治安总署署长埃斯科费特的内容。
- 29 实例见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首席专员（总理）胡安·卡萨诺瓦斯的演说，载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人道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和九月十五日《每日图片报》；文化专员本图拉·加索尔的演说，载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日《人道报》；巴塞罗那市长卡洛斯·皮·苏涅尔的演说，载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最后关头》。
- 30 实例见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日、八月十一日和十三日《人道报》；另请参阅被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战斗报》转载的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人道报》的报道和被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四日《环球新闻报》转载的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人道报》的报道。
- 31 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日《白色评论》。
- 32 阿瓦德·德·桑蒂连，《西班牙革命与内战》，第43页。
- 33 阿瓦德·德·桑蒂连发表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号《方向盘》上的文章。另请参阅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九日《工人团结报》（费德丽卡·蒙特塞尼访谈）；一九七七年六月号《历史时期》（何塞·佩拉特斯访谈）；伊西德罗·瓜迪亚·阿维利亚，《关于工人运动的谈话：

- 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积极分子的采访》，第39—40页；哈辛托·托里奥发表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新道路》上的文章。
- 34 加西亚·奥利韦尔发表在《从七月到七月》一书中的文章，见第195—196页。
- 35 一九六七年六月至七月号《黑与红》，被塞萨尔·M.洛伦索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1868—1969》一书中引述，见第104页，注释3。
- 36 加西亚·奥利韦尔，《脚步的回声》，第190—191页。阿古斯丁·索奇是国际工人协会驻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之家（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巴塞罗那的总部）的代表，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主要领导人来往密切，他在战后告诉我，在这次会议上，加西亚·奥利韦尔建议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全面夺权”，但阿瓦德·德·桑蒂连反对这个主意，理由是，停泊在巴塞罗那的英国军舰将会炮轰这座城市，“我们将立即被杀光”。索奇说：“温和派占了上风。”一九五〇年我在美国加州圣迭戈对索奇的采访。我的采访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 37 一九六七年六月至七月号《黑与红》，被洛伦索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一书中引述，见第104—105页，注释3。
- 38 见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无政府主义与西班牙革命：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八年文集》，第350页；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第105页，注释4（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报告）；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六日和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九日《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七年四月二日《土地与自由》；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上的文章和发表在一九七七年六月号《历史时期》上的访谈录。
- 39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白色评论》。
- 40 埃斯科费特，《为加泰罗尼亚和共和国效力》，第45页。
- 41 一九三八年七月至八月号《国际》。吕迪格还是在巴塞罗那出版的德语报纸《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国际工人协会信息》和《社会革命报》的负责人。
- 42 关于委员会成员的任命及其所代表的组织，见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工人团结报》。
- 43 加西亚·奥利韦尔发表在《从七月到七月》一书中的文章，见第195—196页。
- 44 奥索里奥—加利亚多，《孔帕尼斯的人生与献身》，第171页。
- 45 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69页。
- 46 见一九三七年五月至六月号《新时代》。
- 47 欧内斯特·乌迪纳，《何塞·塔拉德利亚斯：忠诚的冒险》，第128—129页。关于对塔拉德利亚斯精明的政治头脑的称赞，见米克尔·卡米纳尔《胡安·科莫雷拉》，第二卷，第28—32页。
- 48 何塞·塔拉德利亚斯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49 巴尔塔萨·波尔塞尔，《与尊敬的塔拉德利亚斯谈话》，第52页。
- 50 七月二十三日财政委员会颁布了一项法令，允许它参与私人银行的业务（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公报》）。一个月后，通过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七日颁布的一项法令（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最后关头》）的有关条款，它掌握了对西班牙银行分支机构的控制权。
- 51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公报》更名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日志》。
- 52 摘自一九四四年我在墨西哥采访塞拉·帕米埃斯时所作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 53 同上。
- 54 阿瓦德·德·桑蒂连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55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公报》。
- 56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公报》。

- 57 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公报》。
- 58 一九三六年八月四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公报》。
- 59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一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公报》。
- 60 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八月六日、七日、十二日、十六日、十八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公报》和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日志》。
- 61 关于自治政府对审计员的任命，见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二日、十三日、十六日、十七日、二十五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公报》和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三十日、三十一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日志》。
- 62 《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转载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一日《消息报》。
- 63 关于对小型企业实行集体化的情况，见本书第五章。
- 64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日《工人团结报》。另请参阅胡安·佩罗《后方的危险》，第102—103页。
- 65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工人团结报》。
- 66 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战斗报》。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崛起、民兵委员会的解散

无论在城镇还是乡村，加泰罗尼亚的中产阶级都不可能转而支持迄今为止一直忠实保护他们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因为，就像加泰罗尼亚行动党和加泰罗尼亚国家党之类其他中产阶级党派一样，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大部分领导人已经胆小怯懦到了主动避让的程度。相反，控制着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加泰罗尼亚共产党人则与西班牙共产党的政策步调一致，勇敢地保护中下层中产阶级的利益，后者正被拖进集体化运动的漩涡，或者由于生意受到干扰、缺乏资金来源、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没收征用等等原因而面临灭顶之灾。“忽视我们本地的众多小商品生产者和小商人将是不可原谅的。”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机关报《劳动报》写道，“……他们认为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命运。他们可能成为倾向于支持反动势力的群体，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比本地区正在实行的经济制度更坏的东西。……他们当中许多人的悲惨处境显而易见。他们不能经营自己的作坊和生意，因为他们没有储备金；他们几乎到了吃不饱饭的地步，尤其是那些小工厂主，因为他们必须向所雇用的寥寥可数的工人支付工资，这使他们无法顾及自己的日常生活需要。”¹

于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一份宣言声称：“我们需要一种摆脱了天真幼稚的实验和异想天开的计划的经济，今天，在加泰罗尼亚流血的身体上，某些人正以疯子般的鲁莽不负责任地在一个充满了狂热的实验室里制订这种计划。我们需要一种摆脱了多如牛毛的委员会的影响和压力的经济，这些委员会到处涌现……[从而]使加泰罗尼亚大伤元气。”²

397 保护农夫利益的正是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革命者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而不是中产阶级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它还大胆地将一万八千名商人、手工业者和小工厂主组织起来成立了加泰罗尼亚小型工商业者同业公会联合会（Gremis i Entitats de Petits Comerciants i Industrials，简称GEPCI）。由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让许多成员为雇工者的小型工商业者同业公会联合会加入了它所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方组织，³它受到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胡安·J.多梅内奇的指责。多梅内奇指责说，为了扩大规模，劳动者总工会的加泰罗尼亚地方组织不反对招收投机商、店主、商人入会，也不反对他们剥削工人。⁴

在加泰罗尼亚的集体化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阿尔韦特·佩雷斯-巴罗写道，起初，小型工商业者同业公会联合会“小心翼翼地”开始活动，“然后变得大胆起来”。“至于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这个政党曾被认为最适合保护小资产阶级，由于当时的形势所迫，它将政治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它不可能心甘情愿地看着自己的追随者被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夺走，于是，它组织了手工业者联合会[Unió de Menestrals]。手工业者联合会有时与小型工商业者同业公会联合会一起活动，有时与它相对抗。”⁵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在内战爆发初期是一个规模很小的政党，它由成员总数约为两千五百人的四个微不足道的组织合并而成：强烈呼吁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情绪的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USC），这是其最大的组成部分；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党。根据战前担任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书记并在随后成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委会成员的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向我提供的信息⁶以及其他来源提供的资料，我得出了以下分类数据：

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人；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六百至七百人；加泰罗尼亚共产党，不到四百人；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党，大约八十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米格尔·巴尔德斯说，合并之初的党员人数在三千左右。⁷另一方面，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路易斯·卡博·希奥尔拉提供的数字是五千人。⁸

上面的数字与苏联历史学家Л.В.波纳马廖娃的数字有出入，她提供的一九三六年七月合并时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的成员为两千人，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一千五百人，加泰罗尼亚共产党两千人，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党五百人，这使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最初的成员总数达到六千人。⁹无论实际人数是多少，显然，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在内战初期只是一个规模很小的组织。

据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书记塞拉·帕米埃斯说，内战之前四个组织合并的谈判一直没有达成最终协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共产党人坚持要求合并后的党组织必须通过西班牙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而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则要求加入工人党与社会党国际。塞拉·帕米埃斯证实，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主席胡安·科莫雷拉的态度也没有增加打破僵局的可能性，他最初反对与任何国际发生关系，尤其是与共产国际。¹⁰据说科莫雷拉曾经告诫社会主义联盟执委会成员，务必防止共产党人控制新的党组织。¹¹但是，在革命的冲击下，这些意见分歧不复存在。四个组织的领导人明白，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控制局面的情况出现使他们几乎没有生存的希望，除非他们把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胡安·科莫雷拉和拉斐尔·比迭利亚（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主席，曾经是卡瓦列罗的忠实支持者）¹²放弃了他们反对依附共产国际的意见，¹³随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于七月二十三日成立。

胡安·科莫雷拉成为新的党组织的总书记。在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开始的漫长的谈判过程中，他的立场似乎含糊不清而且一直困扰着历史学家，因为他在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机关报《社会正义》上的一篇访谈中说，他支持加入共产国际。他还在一九三六年六月签署了由代表四个组织的联合委员会起草的一份文件，这

份文件声明，新的党组织将承认“共产国际是唯一阐释世界无产阶级愿望的国际组织”。¹⁴“对这种含糊不清的立场的一种貌似合理的解释是，在科莫雷拉公开支持共产国际的背后隐藏着他想成为联合政党首脑的野心，而且他也不愿断绝共产国际这条后路。实际上，加泰罗尼亚左派政治研究的权威维克托·阿尔瓦也许说得对，他认为，科莫雷拉支持加入共产国际“无疑是他为担任总书记一职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他]是温和的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中最温和的成员之一，……因此，他在意识形态方面没有理由希望新的党组织加入第三国际而不是加入第二国际”。¹⁵他肯定不会忘记加泰罗尼亚共产党人在人民阵线形成之前所使用的极端革命的语言。在一九三四年加泰罗尼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比森特·乌里韦声称，“在西班牙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帮助和领导下”，加泰罗尼亚共产党“[必定]为共产主义、为苏维埃政权、为工农政府争取到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和农村地区进步群众的大多数，从而使加泰罗尼亚地区成为西班牙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坚不可摧的堡垒”。¹⁶

有证据显示，除了曾经反对加入共产国际之外，科莫雷拉甚至反对四个组织合并。他的反对意见被华金·阿尔门德罗斯记录下来，后者是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巴塞罗那支部的书记，四个组织合并后成为党的执委会成员。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无论是米克尔·卡米纳尔那部旁征博引的三卷本科莫雷拉传记，还是何塞·路易斯·马丁-拉莫斯那部关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起源的著作，均未提到阿尔门德罗斯的这一重要证据。据阿尔门德罗斯说，“反对合并最坚决的”正是科莫雷拉。他肯定地说，科莫雷拉是一个“真正的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者”，认为自己的组织不应当与全国性的政党有牵连，因此，“他的天然盟友”是加泰罗尼亚的党派组织：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与其联合参加选举）、加泰罗尼亚行动党、加泰罗尼亚国家党和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但是，阿尔门德罗斯继续说，挫败军事叛乱之后，形势成为关键因素。“除了改变自己的观点之外，科莫雷拉无路可走”，因为他知道，面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毁灭性力量”，四个组织只能合并。¹⁷

据苏联历史学家波纳马廖娃说，在内战的压力下，在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想让革命“沿着所谓‘自由共产主义’道路”进行的危险逼迫下，

四个组织决定合并成为“一个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政党”，并且“通过西班牙共产党”追随“共产国际”。¹⁸

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立仅仅九个月后，它就拥有了五万名追随者。“在加泰罗尼亚，五万名积极分子是个奇迹。”科莫雷拉说，“加泰罗尼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完全对立的势力曾经而且依然活跃，那就是，大多数农民，工人阶级中那一部分传统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另一部分也是传统上与小资产阶级共和派有联系并且慢慢变成小资产阶级的人。……在一个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环境中，面对那些尽其所能阻碍我们的强大对手，建立一个拥有五万名积极分子的政党是一项伟大的成就。”¹⁹五万人这个数字似乎没有被严重夸大，据波纳马廖娃说，一九三七年七月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追随者增加到六万人，内战结束前增加到九万。²⁰成群结队入党的新党员来自各个方面：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方组织的体力劳动者和白领工人、政府官员、警察、教师、商人、手工业者、小工厂主以及中小农场主、佃户和佃农，其中许多人以前支持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著名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积极分子塞韦里诺·坎波斯说：“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努力改变那些丝毫没有受过马克思主义启迪，尤其是没有受过革命思想鼓动的人的信仰。”²¹不过，在成立一年后的一九三七年七月，当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竭力淡化其中产阶级成分的重要性时，科莫雷拉宣称，它的成员百分之六十是产业工人，百分之二十是农业劳动者。“如果把这两个百分比加上那些官员、职员、教师以及其他所有挣工资的工人的话，”他补充道，“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党百分之九十七的党员是工薪阶层。”其余的是“一些从事自由职业的同志，小资产阶级党员的人数微不足道，无关紧要”。²²尽管没有提到农夫，但是我们应当认为，这些佃户和佃农被稍微宽泛地归入了农业劳动者的行列，据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负责农民运动的书记维克托·科洛梅尔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入了党。²³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从合并时起就通过西班牙共产党依附于共产国际。之后不久，加泰罗尼亚共产党领导人成为党的领导核心。除了控制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组织工作、舆论工具和工会活动之外，他们还负责党内监视。所有档案都掌握在党的监察委员会负责

人华金·奥拉索手里，他对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进行经常性的监视并且监听他们的电话。这项任务很容易完成，因为实际上中央委员会和巴塞罗那地方委员会的成员大部分都与他们的家人一起住在内战爆发时党所占据的一幢名叫采石场的公寓大楼里。²⁴

真实姓名杰罗·埃尔诺的共产国际代表“佩德罗”——二战之后他在苏联控制的匈牙利政府中担任过多个高级职务²⁵——被安排在胡安·科莫雷拉的身边，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也定期派人带着指示去巴塞罗那。不到几个月，在成为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之后，曾经都是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的科莫雷拉和拉斐尔·比迭利亚加强了他们与共产党的关系。²⁶

佩德罗以非凡的能力、技巧和效率在幕后指挥着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他在一九一八年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积极支持者，一九三四年在共产国际担任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库恩·贝拉的私人秘书。²⁷另外，据说他在大清洗期间与苏联秘密警察关系密切，协助清除了当时生活在苏联的大部分“匈牙利共产党的老党员”。²⁸西班牙内战期间，他负责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日报《劳动报》，偶尔为报纸撰写社论。他还凭借三十年代初期担任共产国际驻加泰罗尼亚代表时对加泰罗尼亚形成的认识，设法消除了因某些党的领导人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以及他们不愿接受西班牙共产党的中心目标而在党的核心集团中所产生的意见分歧。佩德罗的主要成就之一是，他成功地使科莫雷拉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倾向服从于西班牙共产党的需要。阿尔门德罗斯写道，苏联代表佩德罗和一些西班牙共产党人的策略通过满足科莫雷拉的野心表现出来。“他们设法使他相信，他可能担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何塞·迪亚斯当时担任着这一职务，他的地位有所动摇。由于这一前景，科莫雷拉逐渐忘记了加泰罗尼亚的特殊性，随后也就忘记了这个新的加泰罗尼亚政党的特殊性。他完全听从西班牙共产党和苏联代表的指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变成了瞎子和[政治局]恭顺的仆人。结果，在党的每周例会上，科莫雷拉表现得好像他受莫斯科发布的命令和口号指挥一般。”²⁹

在内战进行过程中，因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某些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西班牙共产党的权力集中倾向而造成的摩擦有几次险些爆发公开冲突，不过，佩德罗的老辣圆滑和个人威信成功地使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

乖乖就范。³⁰内战结束之后，对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内部冲突，流亡中的西班牙共产党提供了下面的说法：“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立之时起，来自四个组织的那些明智忠实的成员就与为首的胡安·科莫雷拉同志一起向西班牙共产党寻求支持和帮助。但是，也是从最初那一刻起，同样来自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一些人就开始对共产国际的路线不宣而战。……这些坏分子……从合并的第一天起就反对党的共产主义方向，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里始终坚持他们的立场。”³¹

除了使不听话的人就范之外，佩德罗还控制了党的执委会会议并亲自检查最基层的党组织的工作，简单地说，就是始终严密地监督几乎所有细节。³²由于受到莫斯科的高度信任，他甚至监视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弗拉基米尔·A.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的活动。³³

七月二十日挫败军事叛乱之后不到两周，在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之际，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与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一起采取了一项暗中破坏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支配地位的策略。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记述，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试图通过接受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邀请其加入政府的建议来“抵消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影响”。七月三十一日，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胡安·卡萨诺瓦斯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三位代表组成了一个新政府，³⁴但是，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反应强烈”，并且派了一位代表去找孔帕尼斯主席要求“立即解散”这个政府。据塞拉·帕米埃斯说，这位代表以占领政府所在的自治政府官相威胁，除非孔帕尼斯作出让步。

“由于担心与无政府主义者公开发生冲突，”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继续写道，“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代表决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政府成员应当退出。……卡萨诺瓦斯甚至向当时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书记马利亚诺·巴斯克斯出示了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排除在外的新政府的候选人名单，希望可以使无政府主义者满意。只是在巴斯克斯认可了这份名单之后，卡萨诺瓦斯才敢公布。”³⁵无政府工团主义历史学家塞萨尔·M.洛伦索记录了一件事，说明自由主义者当时在加泰罗尼亚可以“制定规则”到何种程度：比迭利亚是加入政府的三名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代表之一，他还是民兵委员会的成员，由于没有把他的打算告诉

民兵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委员会“随便”就把他开除了。³⁶

但是，挫折并没有削弱孔帕尼斯主席将权力的杠杆掌握在自治政府手中的决心。几周之后，他召集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代表开会。“我承认，你们是控制局面的人。”他对他们说，“只要有必要，我准备与你们同舟共济。所有事情都在不断变化中，因此，我认识到，重新塑造社会的肯定是人民。如果你们希望，我就会退出，但是，我认为我可能对你们有用处。民主国家了解我，尤其是法国。由于这个原因，我相信，我们能够获得它们不会向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提供的战胜法西斯分子的武器。我们必须维持门面。因此，我建议，我们组成一个代表我的党派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自治政府，在这个政府中，我将担任总理。在你们把我榨干之后，你们可以把我像废物一样扔到一边。我唯一的愿望是为革命出力。”³⁷

402

在孔帕尼斯为给被民兵委员会所取代的自治政府注入新的活力而努力的过程中，来自中央政府的压力帮助了他。中央政府不支持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向世界表明它的权力在加泰罗尼亚地区不起作用的革命机构。“我们一次又一次被告知，”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证实，“只要我们继续保留[民兵委员会]……就不会把武器运到加泰罗尼亚，我们也不会得到用来在国外购买武器或者为我们的工业购买原材料的外汇。”因此，他断言，如果他们不想输掉这场战争，除了解散民兵委员会并且加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之外别无出路。“在现代劳工运动的历史上，不是因为我们忘记了自己的信条或者政府的性质……我们无政府主义者第一次加入了一个政府。我们控制不了的环境使我们面临令人反感却无法回避的形势，导致我们采取了我們深恶痛绝但又不得不采取的办法。”³⁸

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对这一历史性的决定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她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四日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宣称，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试图在某些建立了自由共产主义制度的地区——例如乌克兰——实现他们的理想，但是，因为不参与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发现自己偏离了运

动的方向并且受到“血与火”的困扰。^①由于这个原因，她接着说，在加泰罗尼亚“我们参与一切事务并在各个领域站稳脚跟。……就这样，我们甚至进行了一场政治革命。没有违背原则，只是认识到历史教给我们的东西。”³⁹

是谁作出了加入自治政府这一历史性的决定？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那些主要代言人没有澄清这个问题，尽管有一些证据表明，这一决定是在九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召开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地区委员会全国会议期间作出的。⁴⁰

在何塞·塔拉德利亚斯——他被某个支持者称为“具有政治远见和非凡能力的人”⁴¹——九月二十八日组成的新政府中，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只担任了十二个专员中的三个。我们应当记得，孔帕尼斯曾在七月委派塔拉德利亚斯（在四十一年后的一九七七年，塔拉德利亚斯成为弗朗哥将军死后的首任自治政府主席）作为政府的代表加入民兵委员会，现在，根据加泰罗尼亚自治法令授予他的权力，他通过任命代表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塔拉德利亚斯为自治政府首席专员（总理），委托其行使自己的行政职能。自治政府的十二个席位在各党派组织中分配如下：

何塞·塔拉德利亚斯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首席专员(总理)兼财政专员
阿特米奥·艾瓜德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内务治安专员
本图拉·加索尔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文化专员
胡安·P.法夫雷加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	经济专员
安东尼奥·加西亚·比尔兰	全国劳工联合会	卫生与公共救助专员
胡安·J.多梅内奇	全国劳工联合会	物资供应专员
胡安·科莫雷拉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公用事业专员
米格尔·巴尔德斯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劳工与公共工程专员
安德烈斯·宁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司法专员
费利佩·迪亚斯·桑迪诺中校	无党派（自由共和派）	防务专员
何塞·卡尔韦特	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	农业专员
拉斐尔·克洛萨斯	加泰罗尼亚共和行动党	无任所专员

403

① 蒙特塞尼这里谈到的是俄国内战期间（1918—1921）出现在乌克兰地区的马赫诺运动。马赫诺运动是内战期间除红军和白军之外活跃在乌克兰南部的第三种势力，因其无政府主义者领导人涅斯托尔·伊万诺维奇·马赫诺（1888—1934）而得名。马赫诺运动为农民的利益而战，目标是以他们占据的一些乡村为中心实践无政府主义的理念，尝试通过发动社会革命建立自由共产主义制度。

尽管民兵委员会的解散加强了自治政府的权力，但是，这并没有结束该地区的权力分裂状态；因为革命者将他们的治安巡逻队（Patrullas de Control或Patrols）和民兵武装继续分别置于全国劳工联合会所把持的治安委员会和防务秘书处的控制之下，他们还保留了一个巨大的覆盖加泰罗尼亚各个地方的防务、运输和食品委员会网络。另一方面，自治政府则可以通过内务治安专员阿特米奥·艾瓜德及其手下的治安总署署长即警察署长马蒂·罗雷特，依靠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还可以依靠温和党派的民兵武装。⁴²

在即将来临的几个月中，结束权力的分裂状态成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政府专员的首要目标。在这个方向上所迈出的第一步是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颁布的一项法令，该法令要求解散随着军事叛乱而出现的那些革命委员会并由合法的市政委员会取而代之，各党派组织按其在政府中的代表比例获得市政委员会的职位。⁴³由于这些委员会大部分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所控制，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专员同意颁布这项法令肯定让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感到意外，尽管自由主义运动比较激进的成员进行了抵制，它仍然在加泰罗尼亚的城镇和乡村尽力夺回了一些失去的权力。

在随后几个月进行的结束治安和军事力量二元化的激烈斗争中，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政策之间将出现分歧。一方面，孔帕尼斯和塔拉德利亚斯希望通过巧妙地控制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并且利用它们政治上的单纯和缺乏经验来结束权力的分裂状态，从而避免中央政府和西班牙共产党侵犯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⁴⁴另一方面，尽管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许多领导人具有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情绪，但它仍然不顾地区自治权受到侵犯的危险，希望得到中央政府和西班牙共产党的帮助，我们将在后面的几章里看到这一点。

注释：

- 1 一九三六年八月八日《劳动报》。
- 2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日《劳动报》。
- 3 见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劳动者总工会与内战》，第32页；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四月八日《前进报》，该报为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巴伦西亚的舆论工具。据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新闻通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报道，加泰罗尼亚小型工商业者同业公会联合会没有派代表出席劳动者总工会代表大会的权利。
- 4 一九三七年四月八日《工人团结报》。关于其他指责，见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和六日《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无政府主义报》以及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战斗报》。
- 5 阿尔韦特·佩雷斯-巴罗，《加泰罗尼亚地区三十个月的集体化运动，1936—1939》，第150页。
- 6 一九四四年我在墨西哥对塞拉·帕米埃斯的采访。
- 7 见拉尔夫·贝茨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工人日报》上的文章。
- 8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劳动报》。
- 9 Л.В.波纳马廖娃，《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形成》，第100页。
- 10 一九四四年我在墨西哥对塞拉·帕米埃斯的采访。着重体是我加的。鉴于两部论及合并过程的权威性著作实际上均未提到科莫雷拉反对加入共产国际，由一位在合并谈判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士提供的这份直接证言特别重要。这里所说的两部著作是：米克尔·卡米纳尔，《胡安·科莫雷拉》，第一卷，《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1913—1936》，第229—238页和何塞·路易斯·马丁-拉莫斯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起源，1930—1935》，第226—235页。卡米纳尔说，塞拉·帕米埃斯是“内战期间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阶层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见卡米纳尔《胡安·科莫雷拉》，第二卷，《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170—171页。
- 11 见胡安·希拉韦特（他在墨西哥与前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维克托·科洛梅尔和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有接触）发表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加泰罗尼亚社会党公报》上的文章。
- 12 感谢赖纳·托斯托夫（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使我注意到比迭利亚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已不再是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忠实支持者。据桑托斯·胡利亚说（《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左派，1935—1936》，第84和165页），当时他是拉尔戈·卡瓦列罗及其追随者因反对普列托的策略辞职之后留在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中的唯一一位社会党左派人士。
- 13 一九四四年我在墨西哥对塞拉·帕米埃斯的采访。这次采访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尽管帕米埃斯强调指出比迭利亚最初反对追随共产国际，但是，桑托斯·胡利亚举出证据证明（《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左派》，第166页），一九三六年春天，比迭利亚支持加入共产国际。重要的是将以下情况记录在案：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中的普列托派拒绝加入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见卡米纳尔《胡安·科莫雷拉》，第一卷，第238页）；合并是在未经拉尔戈·卡瓦列罗事先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一九三六年八月，当拉斐尔·比迭利亚和华金·阿尔门德罗斯（两人均为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成员）前去拜访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并将合并一事通知他时，一场“令人极其不快的谈话”随后进行，在谈话中，卡瓦列罗将合并称为“一次政变”（华金·阿尔门德罗斯，《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西班牙的形势：内战中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第160页)。

- 14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七日《社会正义》，见卡米纳尔《胡安·科莫雷拉》，第一卷，第264页，注释373。《共产国际》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号上报道说（第199页）：“早在一九三六年六月，科莫雷拉同志就在西班牙共产党的马德里会议上宣称：‘四个组织……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一个月之内这四个组织将在第三国际章程的基础上合并成为一个政党。……我们希望，不仅在西班牙，而且在全世界的其他地方，人们将学习我们的榜样。’”
- 15 维克托·阿尔瓦，《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1919—1939：工农集团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史》，第一卷，第294页，注释4。
- 16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国际新闻通讯》。着重体是我加的。
- 17 阿尔门德罗斯，《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西班牙的形势》，第110—111页。
- 18 波纳马廖娃，《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形成》，第99页。关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组成，见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劳动报》。在罗歇·阿尔诺的《加泰罗尼亚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与加泰罗尼亚民族问题，1930—1936》一书的第二卷中可以看到一些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重要人物的生平简介，见第315—324页。
- 19 胡安·科莫雷拉，《坚持斗争的加泰罗尼亚，在西班牙共产党地方委员会扩大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第15页。
- 20 波纳马廖娃，《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形成》，第101页。
- 21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思想报》。
- 22 胡安·科莫雷拉，《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会议的总书记报告》，第30页。
- 23 维克托·科洛梅尔，《向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会议所作的报告》，第30页。
- 24 塞拉·帕米埃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委会成员）一九四四年在墨西哥接受我的采访时证实（采访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 25 布兰科·拉季奇和米洛拉德·M.德拉奇科维奇，《共产国际人物传记辞典》，第117—118页；《匈牙利新词典》，第55页。
- 26 见佩德罗·切卡（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的《伟大的政党，伟大的组织》，第23页。
- 27 拉季奇和德拉奇科维奇，《共产国际人物传记辞典》，第117页；鲁道夫·L.托克斯，《库恩·贝拉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第257页。
- 28 托克斯，《库恩·贝拉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第257页。
- 29 阿尔门德罗斯，《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西班牙的形势》，第111—112页。
- 30 塞拉·帕米埃斯（一九四四年在墨西哥接受采访时）向我提供的情况。另请参阅卡米纳尔《胡安·科莫雷拉》，第二卷，第172—175页。
- 31 费利佩·马塔斯发表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们的旗帜》上的文章。几年后，科莫雷拉本人失势。据维克托·阿尔瓦说，“在他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同志罢免了他的领导职务之后”，他返回了西班牙。“尽管他发现自己的一些‘朋友’向西班牙警察告密并且看到他女儿所写的一封指责他是叛徒的公开信，他仍然希望与党的地下工作者取得联系”（阿尔瓦，《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第二卷，第496—497页）。关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比尔希略·利亚诺斯所写的一篇将科莫雷拉斥为叛徒和敌人的特务的文章，见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六日《战斗报》（流亡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机关报）。除了其他事情之外，他指责科莫雷拉“利用各种机会对我说内格林的坏话，认为内格林与西班牙共产党是一伙儿的”。苏联历史学家波纳马廖娃写道（《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形成》，第99—100页，注释186）：“科莫雷拉在担任总书记期间犯了许多民族主义性质的严重错误并于一九四九年被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开除出党（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日《工人世界报》）。后来，他秘密返回西班牙但在一九五四年六月被佛朗哥当局逮捕并被巴塞罗那的一个军事法庭判处三十年监禁。他死在监狱里。一九五七年，在他受审期间，

- 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委会发表声明，抗议佛朗哥当局对科莫雷拉和其他反法西斯人士所采取的专横行为（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一日《真理报》）。”关于内战结束之后科莫雷拉在拉丁美洲为莫斯科效力的情况以及他与负责在墨西哥和中美洲散发苏联宣传资料的墨西哥大西洋出版社的关系，见卡尔·里恩费尔《美洲的西班牙共产党人》，第104—112页。
- 32 塞拉·帕米埃斯（一九四四年在墨西哥接受我的采访时）证实。
- 33 见胡利安·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81—83页和《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51页，在这两本书里，戈尔金看来令人信服地描述了佩德罗对苏联总领事的权威。比森特·瓜内尔上校说，根据情报部门的报告，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负责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授权杰罗在巴塞罗那建立苏联模式的秘密警察组织，结果，杰罗“通过把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送回莫斯科受死除掉了他”（瓜内尔，《加泰罗尼亚的军事叛乱和内战，1936—1939》，第213页）。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指挥攻打沙皇的冬宫从而推翻了临时政府。一九三七年被召回苏联之后，他在大清洗中销声匿迹。《苏联名人录》第24页介绍，他在一九三八年死于监狱并在死去多年之后被恢复名誉。一九七〇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在第二卷中注明他的死亡时间是一九三九年，但是没有说他曾经被监禁。另一方面，伊利亚·爱伦堡声称，当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回到莫斯科时，他听说了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的“命运”（爱伦堡，《战争前夕，1933—1941》，第190页）。
- 34 关于政府的组成，见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劳动报》。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所提供的八月二日这个日期（见《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二卷，第19页）是错误的。
- 35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二卷，第19页。关于当地报纸所报道的危机解决和没有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参加的新政府成立的消息，见一九三六年（原书误为一九三七年——译注）八月七日《人道报》、《广告报》、《工人团结报》和《劳动报》。
- 36 塞萨尔·M.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1868—1969》，第117页，注释25。
- 37 马科斯·阿尔孔发表在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无产阶级文化报》上的文章，他参加了这次会议。
- 38 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116页。
- 39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土地与自由》。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土地与自由》；阿古斯丁·索奇发表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号《新时代》上的文章和赫尔穆特·吕迪格的《西班牙革命评论文集》，第24和27页。
- 40 弗农·理查兹，《西班牙革命的教训，1936—1939》，第63页。
- 41 马里亚诺·安索，《我是内格林的内阁部长》，第182页。另请参阅卡米纳尔《胡安·科莫雷拉》，第二卷，第28—32页。
- 42 尽管阿特米奥·艾瓜德主管着治安委员会，但是，委员会真正的负责人是担任秘书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奥雷略·费尔南德斯。更多关于警察职能二元化的情况，见何塞·科利和何塞·帕内的《何塞·罗维拉：为社会主义加泰罗尼亚效力的人生》，第155—156页。
- 43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一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公报》。
- 44 塔拉德利亚斯的传记作者欧内斯特·乌迪纳写道：“[塔拉德利亚斯的]政策是敦促无政府主义者采取温和的行动同时尽量提防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与西班牙共产党的策略有牵连，以便维护自治政府的支配地位和政治权力。”（《何塞·塔拉德利亚斯：忠诚的冒险》，第187页）另请参阅塔拉德利亚斯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其中（第1和6页）谈到他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采取的政策。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托洛茨基分子

加泰罗尼亚的政治舞台由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简称POUM）的存在而错综复杂。该党于一九三五年九月由安德烈斯·宁的共产党左派（Izquierda Comunista）与华金·毛林的工农集团（Bloque Obrero y Campesino）合并而成。¹据安德烈斯·宁说，一九三六年七月，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成员有六千人，到了当年十二月，党员增加到三万人。²尽管按照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党员人数微不足道而且在加泰罗尼亚地区之外几乎没有基层组织，不过，它在该地区仍然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由于极力鼓吹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无情地批评人民阵线和斯大林的审判和清洗，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共产党人斥为“托派”。尽管包括安德烈斯·宁和胡安·安德拉德在内的党的一些领导人曾经是列昂·托洛茨基的信徒，而且还在内战爆发以后赞成加泰罗尼亚向托洛茨基提供政治避难权，³但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并不是一个托派政党，它在许多文章和演说中也拼命地试图证明这一点。⁴不过，与斯大林在莫斯科审判中所采用的将所有反对派混为一谈贴上一个单一标签的策略一样，共产党人指责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佛朗哥、希特勒和墨索

里尼的托派代理人。⁵

内战爆发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书记华金·毛林身陷叛军控制区并在试图回到共和派控制区时以化名被捕。一九三七年九月从哈卡监狱获释，几天后，他在真实身份被发现时再次被捕，直到一九四六年十月才被释放。⁶“虽然毛林没有亲身参加内战，”研究西班牙内战的学者乔治·埃森魏因写道，“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主要理论奠基人和组织者，他的遗产给党的政策留下了不可否认的印记。尽管人们无法准确地判断他不在场所产生的影响，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给内战期间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造成了严重的问题。这一点由以下事实所表明，当安德烈斯·宁接任党的领导职务时，他缺乏毛林所拥有的优势；因为，正如宁的好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伊格纳西奥·伊格莱西亚斯后来写信对维克托·阿尔瓦[曾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的历史学家]所说：

406

‘[对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来说]毛林在某种意义上是无人可比的“最伟大的”领导人（*dirigente máximo*）：他是纯粹完美的领导人，绝无仅有的领导人。’”⁷毛林的优势还因这一事实得到增强：在合并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时，其追随者的人数至少是宁的追随者的二十三倍。⁸在内战爆发之后举行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人们对毛林的强烈感情显而易见，据阿尔瓦说，宁被任命为政治书记而不是总书记——后者是“为毛林保留的职务和称呼”。⁹

尽管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共产党人斥为托派，然而事实却是，从该党成立之日起，托洛茨基与它就有严重的意见分歧，¹⁰而且，内战爆发没几个月，号称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少数正统托洛茨基追随者就成立了其第四国际的西班牙支部，这是一个成员寥寥无几的组织。¹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绝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即，绝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党。”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德语喉舌《我们的话》断言，“面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指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竭尽全力为自己辩护，而且不惜采用最卑鄙的手段。他们不仅将托洛茨基主义者开除出党，更有甚者，他们还以最具挑衅性的方式发表这些开除的消息。”¹²

当时通过革命社会党国际协调局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联系的美国共产党（反对派）领导人伯特伦·D.沃尔夫写道：

简明的事实是：

1.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不是托派。它的成员和领导人绝大多数来自共产党。在一九二九年的极左浪潮中，由于拒绝工会分裂、拥护统一阵线政策、反对除了工人阶级之外都是“社会法西斯分子”的愚蠢理论、反对将脱离西班牙现实的策略机械照搬到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地方组织被整体开除出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杰出领导人是华金·毛林，托洛茨基一再激烈地攻击他是“中间路线派”、“机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将西班牙无产阶级引入歧途的主要领路人”、“孟什维克叛徒”以及一些精心选择的类似表述。……在情绪比较平和时，托洛茨基宣称“毛林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偏见、愚昧、外省哲学和低级政治的大杂烩”，他因此断定，“在西班牙建立革命政党的第一步肯定是谴责政治上庸俗的毛林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必手下留情。……”

2.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两位领导人安德烈斯·宁和胡安·安德拉德以前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大约五年前，在拒绝执行托洛茨基关于加入第二国际的指示之后，他们与他断绝了关系。……从那时起，托洛茨基有时说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左派’的跟屁虫”，有时把他们称为“叛徒宁和安德拉德”，……他还宣称，“在西班牙，人们肯定会看到，真正的革命者将无情地揭露毛林、宁、安德拉德及其一伙的背叛行径并为第四国际西班牙支部奠定基础。”

3. 托洛茨基分子不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成员。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一个开除一切托洛茨基分子的长期规定。[党的机关报]《战斗报》曾经刊登过一些与托洛茨基主义论辩的文章，这些文章不是以只有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那样的俄国人才会使用的“无情”、傲慢、辱骂的语气——只要在苏联党内出现不符合他们的宗派意志的声音，即使在他们所写的最好的政论文章里也是如此——而是以早就被托洛茨基分子和斯大林分子抛弃或者忘记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写成。¹³

托洛茨基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加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安德烈斯·宁在自治政府中担任司法专员——进行了猛烈抨击。他们宣称：“建立在与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者达成的某种共同纲领基础上的任何形式的联合政府都是对革命纲领的公然背叛。首要任务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政权并由一个工人政府，即委员会或苏维埃取而代之。”¹⁴另外，巴塞罗那的外国托派志愿者M.卡萨诺瓦写道：“我们的国际组织驻巴塞罗那代表[让·鲁]一九三六年八月预见并阐释了……[因]解散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而结束权力的二元状态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西班牙革命带来的悲剧性后果。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不听我们的话。他们更喜欢与自治政府合作的‘实用主义’路线而不是第四国际的‘宗派主义’意见。”¹⁵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回应时坚称，它加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是向实现工人阶级掌权过渡的一步，它的口号始终是，而且还将继续是“一个名叫工农兵委员会的工人政府和一个立宪会议”。¹⁶托洛茨基分子反驳说，这一口号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加入政府的行为自相矛盾，这个政府刚一组成就颁布法令解散了工人委员会并用代表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地方议会取而代之。“内战期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一次也没有提出用委员会夺取政权。”G.穆尼斯（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写道，他曾经是宁的共产党左派的积极分子和宗派骨干，现在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小组的领导人。¹⁷托洛茨基分子还谴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将其工会组织统一工会工人联合会（Federación Obrera de Unidad Sindical，简称FOUS）¹⁸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分会合并而不是与革命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合并，指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目的是避免与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发生摩擦。¹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表示，采取这一行动是希望给劳动者总工会注入一些“革命血液”，从而使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合并更加具有可行性。²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安德烈斯·宁宣称，在他看来，如果统一工会工人联合会加入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话，它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派，而在劳动者总工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相比，这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支无足轻重的力量），²¹它有望使自己的意见占据上风。²²这些希望很快就化成了泡影，因为，劳动者总工会的领导阶层以不召开会员大会并且解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所担

任的重要职务的方式杜绝了任何自由发表意见的可能。²³据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机关报《战斗报》说，这些撤职“通常是劳动者总工会中的小资产阶级会员要求的，内战之前，他们在商会和雇主协会时就与革命工人发生过冲突”。²⁴

共产党人无视托洛茨基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因为他们对苏联的批评同样苛刻。他们都谴责苏联政府当初支持不干涉公约，而且他们都认为，苏联后来向西班牙运送武器是由于其自身利益的需要。《战斗报》断言：“对于错误的这一纠正不是出于什么促进西班牙革命事业的愿望——任何时候列宁都不会宣布中立——而是为了保护自己。……斯大林真正关心的不是西班牙或者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他只对保护苏联政府感兴趣。”²⁵

“有人厚颜无耻地宣称，”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书记胡安·科莫雷拉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说，“苏联只对保护它自己的利益感兴趣，因此，它站在我们一边只是因为我们的失败将意味着它的失败。”这不是事实，他肯定地说，因为苏联强大得足以击退任何对其本国领土的入侵。“事实是，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工人国家的原则不是自私而是团结。……我们的苏联同志知道，我们的失败将把我们的德国同志、奥地利同志、匈牙利同志和葡萄牙同志的苦难延长多年，并且将使整个东欧、可能还有整个西欧工人的自由岌岌可危。……苏联实际上是强大的，但是，同志们，只靠苏联无产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苏联地处远方，与我们之间隔着万水千山。……为了打败国际法西斯主义，当务之急是使欧洲民主国家站在我们一边。”²⁶

八月二十七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发表声明抗议斯大林处决格里戈里·E.季诺维也夫、列夫·B.加米涅夫以及另外一些老布尔什维克。²⁷“全国劳工联合会、社会党人和共和派人士并不理解发生在莫斯科的事情所蕴含的意义。”维克托·阿尔瓦写道，“他们几乎没有报道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理应将这些审判视为一种警告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似乎仅仅把它们视为一场家庭纠纷。”²⁸托洛茨基分子指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竭力轻描淡写或者隐瞒与斯大林的审判和暗杀有关的消息”。²⁹这不完全是事实，因为，尽管担心谴责莫斯科审判可能激怒共产党人的看法在马克思主义统一

工人党内部相当流行，但是，这种担心并不占上风。³⁰

一九三七年一月新的叛国审判在莫斯科开庭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共产党之间激烈的舆论交锋火上浇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当即宣称被告都是无辜的。共产党的舆论工具《红色阵线报》回应说：“反革命集团的喉舌和指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煽动者《战斗报》终于暴露了自己。它撕下面具是因为在莫斯科对第二批托洛茨基恐怖分子、间谍和刺客以及盖世太保的帮凶进行了审判，像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一样，这些人由托洛茨基亲自指挥。”³¹《战斗报》对此反击道：“斯大林非常清楚，除了一两个人之外，其他被告都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们也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我们不是。……莫斯科的被告还受到了另一些指控：指控他们是盖世太保的特务，指控他们为法西斯主义和外国间谍效力。我们也受到同样的指控。……幸亏西班牙不是苏联，不过，有人正试图把西班牙置于苏联人的监管控制之下。当然，我们将竭尽全力阻止他们这样做。而这就是斯大林和他那些国内外官僚不放过我们的原因。他们因为我们高举被他们抛弃和背叛的马克思列宁的旗帜而不放过我们。他们因为我们公布了其国内外政治生活的真实情况而不放过我们。他们因为我们在西班牙为社会主义革命奋战而不放过我们。他们企图把我们束缚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框架内。”³²

在随后的几个月，论战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恶毒。四月二十五日，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机关报《劳动报》宣称：“托洛茨基分子……知道，他们肯定在群众当中名誉扫地；他们知道，群众现在认为他们是工人阶级最明显的敌人；他们知道，大家已经认识到，他们不仅是暗杀者——这已被基洛夫案件所证明[基洛夫是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苏联官方将其被暗杀归因于托洛茨基分子的阴谋]——而且还是蓄意破坏者和战争贩子。他们发现，工人抵制他们，向他们脸上吐口水，把他们斥为最令人憎恶的敌人。当然，他们不敢暴露自己的真面目，而是把自己伪装打扮起来。托洛茨基分子戈尔金[胡利安·戈尔金，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国际书记，执委会成员，《战斗报》负责人及其社论的主要作者]³³采用同样的方法。不过，他的辩解至少证明了一件事：加泰罗尼亚的群众对托洛茨基主义像瘟疫一样避之唯恐不及，因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急于否认他们的真

实身份。”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从一开始就严厉指责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支持“民主共和国”：《战斗报》写道，国际资产阶级充分意识到“西班牙的问题是革命或者反革命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的问题。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竭尽全力进行欺骗，在国内，他们欺骗了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国外，他们欺骗的只不过是工人阶级”。³⁴

410 对于这种指责，共产党控制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反驳道：“有人说……当我们宣称我们正在保卫民主共和国时……我们是在进行欺骗。……这不是为了欺骗西班牙民主舆论而采取的策略，也不是为了欺骗外国民主舆论而采取的策略，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犯了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战的错误……那么，在我国的领土上，我们看到的就不仅仅是法西斯入侵者，而且还有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各国资产阶级民主政府。……[那些]托洛茨基分子非常清楚，如果我们把号召进行社会革命作为当前目标的话，我们就将落入佛朗哥和莫拉设下的圈套，[他们]想把西班牙合法政府说成一个赤色政府，说成一个共产党政府。”³⁵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战斗报》断言，共产国际不希望西班牙发生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一场并不是在第三国际特许之下取得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新胜利将意味着国际工人运动的重心从莫斯科转移到了革命正在进行的地方。由于这个原因……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领导人肯定要消灭那些不盲目地服从他们的纪律的党派组织。这适用于我们，也适用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他们认为在理论方面打败我们更加困难，因此打算首先消灭我们。至于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认为以后能够将其消灭。”

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一份向自治政府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专员出示的文件中，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建议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即司法专员安德烈斯·宁）逐出内阁，然后组成一个“拥有充分的权力”的新政府。³⁶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拒绝支持这些建议。十二月八日，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问题上没有公开表明立场的孔帕尼斯主席宣称，“一个拥有充分的权力并且能够将其权力强加于所有人的强大的政府”必不可少。³⁷全国劳工联

合会对此回应说，“一个‘强大的政府’只能是个独裁政府。”³⁸此前一直非常谨慎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喉舌《人道报》³⁹大胆地反唇相讥道，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反应“莫名其妙”。“值此战争与革命的关头，我们看不出一个‘虚弱的政府’能够显示什么优势，因为战争与革命的进行和取胜完全建立在铁的纪律的基础上，建立在团结和行动的基础上，……只有一个毫不留情地将其权力强加于人的……强大的政府才可以奠定这些基础。强加于所有人，必须是所有人。”⁴⁰

由于消除对立双方的意见分歧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十二月十二日，塔拉德利亚斯总理正式宣布内阁处于危机状态。当天上午，曾为列昂·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并被某些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最激进的执委会成员胡安·安德拉德⁴¹在其发表于《战斗报》的《每日政治笔记》中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处境：是决心支持现行的合作政策——这实际上是一种反革命同谋，还是支持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结盟。摆在工人阶级面前的问题是建立一个革命工人阵线，它……将阻止反革命前进并且提出无产阶级通过工农兵委员会掌握政权的问题。”⁴²同一天，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即将卸任的内阁成员胡安·科莫雷拉公开要求驱逐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指责它不忠于政府，因为其领导人曾经抨击政府的法令，同时指责它在苏联“站在我国人民一边并向我们提供大量援助”之际进行反苏宣传活动。另外，他要求撤销全国劳工联合会所把持的控制着革命民兵武装和巡逻队的防务秘书处和治安委员会，以便赋予政府专员“充分的权力”并“在政府机构内部”建立“一种铁的纪律”。⁴³几天之后他又说：“有些委员会比政府本身管的还多。”⁴⁴另一方面，拥有自己的巡逻队和民兵武装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坚持认为，治安委员会和防务秘书处——它在两个机构中均有代表——是“体现革命性质的机构”，以防止政府“由于最近掌握了权力”而变成“一个针对无产阶级的警察政府”。⁴⁵它问道：“革命的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能够允许从它手中夺走这些[控制]手段吗？如果允许这样做，那就将在革命的道路上朝相反的方向迈出非常危险的一步。”⁴⁶

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最初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政府，但是，由于没有意识到对于他们自身的威胁，或者由于他们因为马克思主

义统一工人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因为其战前渗入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企图、⁴⁷因为其经常指责集体化的热情已经引起城乡大部分中产阶级的不满⁴⁸而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没有什么好感，他们最终默许了十二月中旬将其逐出政府的决定。作为交换，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放弃了其撤销治安委员会和防务秘书处的要求，并且同意把防务专员的职位交给全国劳工联合会以换取由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占据的司法专员职位。从解决危机的这种方式来看，显然，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首先关心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政府。不过，苏联总领事弗拉基米尔·A.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的作用当时不是特别明显。据前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和胡安·科莫雷拉的好友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说，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十二月份去找孔帕尼斯主席，“坚决要求不许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继续留在政府中”。多年后塞拉·帕米埃斯亲口告诉我：“他提出了种种理由。苏联武器，国外形势，[西班牙工业的]原材料以及食品的运送。”⁴⁹

不能肯定地说全国劳工联合会是否也从孔帕尼斯或者直接从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那里受到过这一警告，然而重要的是，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关系密切的著名德国无政府主义者鲁道夫·罗克一九三八年写道，“苏联大使”[原文如此]曾经以拒绝继续提供军事援助相威胁，除非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政府。⁵⁰无论如何，全国劳工联合会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政府的声音在十二月十三日明显地开始减弱，当天的《工人团结报》只是简单地把政府危机说成是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竞争的结果。胡安·安德拉德对此反驳说，这不仅仅是两个组织之间的斗争。他警告说，危在旦夕的是“未来的整个革命进程”。⁵¹

412 被逐出内阁让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感到失望，但它决定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姿态。“没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不可能进行治理，更不必说与它作对了。”十二月十七日的《战斗报》刊出通栏大字标题。它声称，经历了这场危机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显然更加坚强了。“它已经成为加泰罗尼亚地区唯一真正的反对派。它的革命政治立场比过去更加坚定，由于它的革命立场，它将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

尽管表现出乐观的姿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仍然显得忧心忡忡。

“现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已经达到直接的目的，谁会相信它将放弃自己的图谋？……由于把我们逐出了政府，它已经赢得初步的胜利。暂时它会感到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继续前进的程度。”⁵²

为了使全国劳工联合会觉得牺牲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道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同意正式退出内阁。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因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代表科莫雷拉、巴尔德斯和比迭利亚不过是以劳动者总工会代表的身份出现在新政府中而已，尽管众所周知他们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委会成员，而且还在几周之内成为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⁵³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组成的新政府的成员如下：

何塞·塔拉德利亚斯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首席专员(总理)兼财政专员
安东尼奥·马利亚·斯韦尔特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文化专员
阿特米奥·艾瓜德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内务治安专员
何塞·卡尔韦特	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	农业专员
胡安·科莫雷拉	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物资供应专员
米格尔·巴尔德斯	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劳工与公共工程专员
拉斐尔·比迭利亚	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司法专员
弗朗西斯科·伊斯格莱亚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	防务专员
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	全国劳工联合会	经济专员 ⁵⁴
胡安·何塞·多梅内奇	全国劳工联合会	公用事业专员
佩德罗·埃雷拉	全国劳工联合会	卫生与公共救助专员

《工人团结报》为新政府出现工会代表占多数的特征而欢呼，认为这是其工团主义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以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为代表的政治党派的失败。“随着这次危机的化解，”它继续写道，“我们觉得谁也没有理由表示不满或者进行任何指责。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这两个对手——他们的冲突导致了我们的处境——均被排除在自治政府的行政委员会之外。两党在劳动者总工会里都有代表；……两党出自同一个思想体系，尽管见解和策略的细微差别使它们分裂。在我们看来，它们都没有大声抗议的权利。”⁵⁵马克

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对如此简单地解释政府危机感到愤怒。胡安·安德拉德说：“我们被逐出政府不是因为狡辩所称我们在劳动者总工会里有代表，而是因为我们保持着不妥协的革命立场。……无政府工团主义总是犯注重形式不注重实质的错误。……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选择了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它宁愿屈服于要求把我们逐出政府的反革命倾向……也不愿意坚持人民群众决不妥协的革命路线。”⁵⁶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没有隐瞒自己的看法，它认为，它是由于苏联的压力而被逐出政府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民兵部队第一政委霍尔迪·阿克尔说：“我们不是顷刻间被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打败的，而是被隐藏在这些组织背后的某种力量打败的，在我们这些抗拒其意志的人面前，这种力量能够巧妙地让我们产生被人抛弃的恐惧心理，而且产生面对佛朗哥的叛军时没有武器弹药的恐惧心理。”⁵⁷《战斗报》还断言，有一个从国外输入的消灭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周密计划。它说，这一计划包括三个步骤：（1）营造政治和心理气氛；（2）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自治政府以使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3）采取措施实际将其消灭掉。“我们并不害怕战斗。”它威胁道，“我们不向任何人挑衅，但是，我们愿意不失尊严地回击一切挑衅。”⁵⁸

最终，党的领导人安德烈斯·宁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宣称：“有人希望通过某些野蛮的方法遏制革命并将全国劳工联合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推到一边。谁也不要抱有幻想。我们的党不可能被消灭，因为它是工人阶级的亲骨肉。……我们无产阶级不会让人束缚。它不想接受任何人的监护。它正毫不犹豫、不屈不挠地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向前发展，无论多么巨大的障碍都不可能阻止它。”⁵⁹

注释：

- 1 关于毛林和宁的情况，见维克托·阿尔瓦和斯蒂芬·施瓦茨的《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史》。这部著作包括相当丰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运动中的起源的材料。另外，德国历史学家赖纳·托斯托夫即

将在西德发表他的论文《西班牙内战期间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6—1939》。这篇论文的一份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托斯托夫的这篇大学论文对内战期间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进行了全面研究和非常详细的论述。这两部著作肯定被认为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历史的基础性权威著作，因而将被有兴趣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以及与本书无关的西班牙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人当作参考。另请参阅维克托·阿尔瓦《两位革命者：华金·毛林，安德烈斯·宁》；弗兰塞斯·博纳穆萨，《安德烈斯·宁与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1930—1937》；乔治·埃森魏因为罗伯特·A.戈尔曼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人物传略辞典》撰写的毛林和宁的条目；安东尼·蒙雷亚尔，《华金·毛林的政治思想》；安德烈斯·宁，《民族解放运动》、《西班牙革命的问题》和《西班牙革命，1930—1937》；佩莱·帕赫斯，《安德烈斯·宁的政治演变，1911—1937》和《西班牙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0—1935：西班牙的共产党左派和第二国际期间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

- 2 安德烈斯·宁向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见宁《西班牙革命》，第232页。
- 3 “在挪威迫于苏联的压力驱逐了托洛茨基之后，”乔治·埃森魏因写道，“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决定为其寻求庇护很可能是念及他与宁和安德拉德过去的关系。正如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者维克托·谢尔盖在其回忆录中所说，宁、安德拉德以及另外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与托洛茨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但是仍然用同志般的钦佩目光看待他’（《一个革命者的回忆》，第335页）。另一方面，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成员胡利安·戈尔金写道，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对托洛茨基发出的邀请只是向他表示团结一致的一种姿态，因为，由于苏联施加的外交压力，托洛茨基渐渐发现，在欧洲安全地避难越来越困难（戈尔金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写给伯内特·博洛滕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想让托洛茨基到加泰罗尼亚来的计划没有实现。早在一九三六年八月，托洛茨基亲自写信告诉正代表他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进行谈判的第四国际书记处代表让·鲁斯，他‘非常乐意’得到去巴塞罗那的签证（一九七一年一月至二月号《战斗报》[巴黎]发表了这封信）。不过，由于被当时在巴塞罗那活动的意大利监控镇压反法西斯分子机构（墨索里尼的秘密警察）的特工截获，鲁斯没有收到这封信。（直到许多年以后，当意大利历史学家保罗·斯普里亚诺对意大利秘密警察的档案进行研究时，他发现了这封信，同上。）但是，即使这封命途多舛的信到达它的收信人手中，托洛茨基几乎也不可能获准待在加泰罗尼亚。因为，尽管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的《战斗报》（巴黎）上——并于当月二十日在他们的马德里日报《红色战士》上——宣布了他们对托洛茨基的邀请，他们的建议却被自治政府主席路易斯·孔帕尼斯拒绝了（戈尔金一九八一年三月九日和五月二十四日写给伯内特·博洛滕的信）。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孔帕尼斯当时不可能同意向托洛茨基发放签证，这主要是因为对该地区拥有控制权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不会容忍托洛茨基的存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不仅毫不宽容地一概反对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们特别敌视托洛茨基，因为他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曾经无情地迫害无政府主义者。胡利安·戈尔金在他（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写给伯内特·博洛滕的信中指出，孔帕尼斯的否定性答复很可能是基于另外一些考虑。例如，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对托洛茨基的敌视一点不亚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因此，它会迫使孔帕尼斯不许托洛茨基进入西班牙。另外，据戈尔金说，孔帕尼斯本人肯定知道，托洛茨基出现在西班牙将严重破坏共和派为获得西方民主国家的援助所作的努力。”感谢埃森魏因应我的要求对这封信进行了研究。
- 4 实例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战斗报》；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七日《战斗报》（戈尔金的文章）。关于一九三四年宁与托洛茨基断绝关系，见胡利安·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38页。

- 5 实例见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七日《劳动报》上的文章《托派，希特勒-墨索里尼-弗朗哥的最佳代理人》和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九日（巴塞罗那）《消息报》上的文章《为敌人工作的那些托派在行动》。《真理报》驻西班牙特派记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参加了共产党人开展的这一场宣传活动，实例见他发表在（巴黎）《人道报》上的文章，转载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战斗报》。
- 6 关于毛林的经历和他的妻子让娜为使其获释所作的努力，见让娜·毛林《如何解救华金·毛林：记忆与证据》。
- 7 詹姆斯·W.科尔塔达编，《西班牙内战历史词典，1936—1939》，第328页。关于伊格莱西亚斯写给阿尔瓦的那封信，见维克托·阿尔瓦《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1919—1939：工农集团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史》，第一卷，第291—292页。一九七三年毛林在美国去世后，胡佛研究所得到了他的文件。
- 8 据阿尔瓦说，在合并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时，与毛林的七千名工农集团成员相比，宁的共产党左派只有二百五十至三百人，也就是说，双方人数的比例是二十八比一，充其量也不过是二十三比一（阿尔瓦，《两位革命者》，第389页）。
- 9 同上，第390—391页。
- 10 实例见列昂·托洛茨基《西班牙革命，1930—1940》，第273—307页；列昂·托洛茨基，《西班牙文集》，第123—132页；托洛茨基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我们的话》上的文章以及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新斗士》上的英文译文；还有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旬《我们的话》上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伊格纳西奥·伊格莱西亚斯所著《列昂·托洛茨基与西班牙，1930—1939》是一本有价值的书。佩莱·帕赫斯在其研究西班牙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专著中写道，“托洛茨基针对新的党组织、特别是针对宁和安德拉德开展的宣传活动对西班牙革命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同时还在那些来自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当中造成了新的意见分歧，这使他们作为新的党组织的领导人更加难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帕赫斯，《西班牙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第289页）
- 11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从未公开透露过内战期间其成员的人数，不过，据一九三八年九月三日在洛桑举行的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的会议纪要记载，西班牙支部的人数在十到三十人之间（《第四国际文件：形成时期，1930—1940》，第289页）。感谢曾在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二年间担任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G.穆尼斯）的英语代理人的斯蒂芬·施瓦茨让我注意到了这些数字并在阅读了本章的内容之后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在一九八六年一月四日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当今研究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世界头号权威人士皮埃尔·布鲁埃提供了关于内战第一年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前方和后方的人数的有用信息（该信现存胡佛研究所）。托洛茨基本人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四日承认：“西班牙的托洛茨基支持者——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人数不多。我对此感到遗憾，但我必须承认，他们人数不多。那里有一个强大的政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这个党的年轻党员赞成我的思想。不过，这个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因此，我公开批评它的政策。”（托洛茨基，《列昂·托洛茨基的状况》，第294页）
- 12 一九三七年八月中旬《我们的话》。（被人称为G.穆尼斯的）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在一九四八年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告诉我，他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创建了第四国际西班牙支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将那些赞成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想法的党员开除出党。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一日写给托洛茨基的一封信中，当时是一名托洛茨基分子并且正在阿拉贡前线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并肩作战的哈里·米尔顿说，“我们小组的负责同志”莫林（汉斯·弗罗因德）当年年初被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开除出党（哈里·米尔顿，与列昂·托洛茨基和乔治·科普通信的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感谢哈里·米尔顿所提供的这些副本。不过，据斯蒂芬·施瓦茨说，“没有证据表明莫林曾经是马克思主

义统一工人党党员”（与施瓦茨的谈话，他的说法以皮埃尔·布鲁埃和埃米尔·特米姆所著《革命与西班牙内战》为依据）。曾经担任瑞士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书记并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并肩作战的另一名托洛茨基分子保罗·塔尔曼在一九七六年发表的一次访谈中声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有一个强大的右派，他们迅速清除了托洛茨基分子，他们还枪毙了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人们同样应该知道这个情况。”（克拉拉·塔尔曼和保罗·塔尔曼，《争取自由的革命》，第380页）但是，在一九八四年回答我的问题时，克拉拉·塔尔曼断然声明，她不知道丈夫保罗所说的枪决。

根据皮埃尔·布鲁埃向斯蒂芬·施瓦茨提供的信息（见本章注释11），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喉舌《战斗报》发表过开除一个名叫卡尔·埃维尔特·伦斯（“坎彭斯基”）的人的消息。我没有发现开除其他托洛茨基分子的消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日，在答复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提出的作为一个拥有支部权利的团体加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要求时，安德烈斯·宁以执委会的名义告诉他们，他们可以作为个人而不是一个团体加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而且，因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成员“不能同时是其他任何政党组织的成员”，所以他们必须退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组织。他还声明，加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人必须“公开与那些自称第四国际的报刊针对我党所进行的诽谤中伤活动划清界限并表示反对”（一九三七年七月第四国际国际局《信息公报》）。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不可能接受这些条件。于是，一九三七年四月，在一封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的公开信中，他们再次要求作为一个拥有支部权利的团体加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同时严厉地批评了党的领导阶层：“缺少一个对人民阵线支持的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坚定的阶级立场的政党——它不仅是一个革命政党，而且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党——预示着走上反动道路的严重危险。当我们写第一封信时，这种危险在远远的地方隐隐可见。……今天，我们只有短暂的时间，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夺回我们失去的东西。你们不能坚持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因为就连党的执委会成员也不认为是这样。你们为工农政府和工人革命阵线提出的口号掩盖了这一真实情况；工农政府与工人革命阵线势不两立，但是，你们可以同时建立，因为你们以某种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相同的官僚主义眼光看待工人革命阵线，而全国劳工联合会将会通过在与你们之间分配自治政府的专员职位来达到建立工农政府的目的。面对这种机会主义的混乱状态，我们赞成这个口号：建立以工农兵委员会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恳求你们反省，执委会的同志们。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已经犯了而且仍然在犯妨碍革命的根本性错误。为了给无产阶级指明它所需要的理论方向，对原则进行充分的讨论十分必要。……只有机会主义的领导人才会害怕基层组织。在目前的阶级斗争形势下，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内部条件下，革命领导人的首要职责是开展思想斗争即派别斗争。”（同上）没有档案表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为了允许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作为党的内的一个派别参加政治活动甚或考虑过第二个要求。

- 13 伯特伦·D.沃尔夫，《西班牙内战》，第68—70页。另请参阅吉姆·科克（哈里·戈德堡）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工人时代》上的文章《托洛茨基分子对西班牙的看法是什么》。关于内战期间以及战后安德拉德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托洛茨基的意见分歧，见一九七〇年一月十日在巴黎展示的安德拉德文件（胡安·安德拉德，《一九七〇一月十日在巴黎西班牙工人运动研究中心举行的发布会》；文件的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14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上旬《我们的话》。
- 15 卡萨诺瓦发表在一九三九年五月《第四国际》上的文章《献给西班牙》，这篇文章以书籍的形式出版时标题为《西班牙内战：人民阵线向佛朗哥敞开了大门》。感谢乔治·埃森魏因为我撰写了下面这条注释：“撰写这本小册子时，卡萨诺瓦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部存在的对加入政府是否明智的不同意见。（关于这些不同意见，见阿尔瓦《马克思

主义在西班牙》，第一卷，第320—324页。）他还忽视了党的执委会成员胡安·安德拉德反对解散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继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所作出的与自治政府合作的决定这一事实。阿尔瓦没有提到安德拉德的名字，但是他说，在执委会内部，有两人投票反对加入政府，在范围更大的中央委员会，也有几位委员反对。他还证实，执委会和中央委员会均‘原则上’同意加入政府的建议，尽管政治书记宁是否在没有将政府方案提交执委会‘进一步认可’的情况下毅然承担责任作出了最后决定仍然存在一些疑问。据内战结束几年后采访过安德拉德的罗纳德·弗雷泽说，安德拉德迫于压力接受了决定，因为，尽管他个人反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合作，但他‘知道，如果投了反对票，他将会被开除出党’（罗纳德·弗雷泽，《流血的西班牙》，第341页）。安德拉德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决定加入政府的原因：‘一方面，党的绝大多数地方组织不会同意与其他工人阶级组织断绝关系，因为这将意味着我们的孤立，造成的实际后果是，我们再也不能为我们的民兵获得物资和经济援助，我们的地方组织也将失去在地方上担任的一切职务。总之，党将变得一无所有，而且还会成为一个非法组织。另一方面，几乎一半的战斗是斯大林分子打赢的，他们将因宣布我们非法而得益。需要认真考虑许多因素。由于这个原因，党的执委会决定将最终决定提交中央委员会，两天后，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一九七〇年一月十日在巴黎西班牙工人运动研究中心展示而没有公开的文件）感谢安德拉德的遗孀玛丽娅·特蕾莎·加西亚·巴努斯向我提供了文件的副本。”安德拉德文件的一份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胡安·安德拉德，《一九七〇一月十日在巴黎西班牙工人运动研究中心举行的发布会》）。

- 16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战斗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部对加入政府是否明智的不同意见，见阿尔瓦《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第一卷，第320—324页。实际上，据同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托洛茨基分子拉塞尔·布莱克韦尔（罗萨里奥·内格雷特）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受到八种“思潮”的冲击。见布莱克韦尔写给布兰代斯大学雨果·奥勒的信，雨果·奥勒文集。
- 17 G.穆尼斯，《失败的里程碑：胜利的预兆》，第288页。关于穆尼斯在共产党左派时期的活动情况，见博纳穆萨《安德烈斯·宁与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第185页。
- 18 统一工会工人联合会成立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它由（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开除的）莱里达、塔拉戈纳和赫罗纳地方工会联合会以及一些自治工会组成（见其第一副书记佩德罗·博内特发表在一九七二年二月至三月和一九七六年三月[巴黎]《战斗报》上的文章）。
- 19 瓦尔特·黑尔德，《西班牙革命》，第15页。另请参阅列昂·托洛茨基《西班牙教训》，第67—68页及其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写给达尼埃尔·介朗的信，载一九三九年五月《新国际》，这封信指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为了不影响与[全国劳工联合会]上层的关系而没有加入这个组织”。关于内战期间托洛茨基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所有政策最有争议的攻击之一，见费利克斯·莫罗《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第40—102页。作为对托洛茨基攻击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及其领导人的回应，胡安·安德拉德一九七〇年一月十日展示而没有公开的文件是一份有价值的资料。安德拉德曾经是托洛茨基分子，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成员（见本章注释15）。
- 20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战斗报》。
- 21 内战爆发之前，劳动者总工会的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是社会党工会的最小分支。据合并组成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四个组织之一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见本书第三十九章）领导人拉斐尔·比迭利亚说，七月十九日之前，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劳动者总工会会员只有两万五千人（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消息报》）。但是，就连这个数字似乎也是被夸大的。例如，（前劳动者总工会观察家）弗兰克·杰利内克在《西班牙内战》一书中提供的数字是一万两千人，见第335页。另一方面，据国际工人

协会书记赫尔穆特·吕迪格说，战前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会员在十五万至十七万五千人之间（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吕迪格向国际工人协会提交的报告）。内战期间，由于大多数人感到带着一张工会会员证更安全，两个工会迅速发展。这使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就它们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会员人数发表了夸大而且无法核实的说法。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的地方组织宣称，它的会员人数增加到了三十六万零九百七十七人（《工人团结报》）。十天后，劳动者总工会声称它有四十三万六千二百九十九名会员，因此提醒人们注意，它要求在政府和市政委员会中拥有同等的代表数量是完全正当的（拉蒙·富斯特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劳动报》上的文章）。几个月后，劳动者总工会宣称它有四十七万五千名会员，《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七年三月二日）对此回应说，全国劳工联合会有一百万会员。

- 22 H.E.卡明斯基，《巴塞罗那》，第167页，对宁的采访。另请参阅宁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战斗报》上的文章《统一工会工人联合会为什么加入劳动者总工会？》
- 23 见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十八日、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二月二日、十三日、十九日和二十二日，一九三七年一月三日、十六日、二十二日和三十日、二月五日、四月十七日和五月十二日《战斗报》。
- 24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战斗报》。另请参阅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四日《战斗报》上的文章《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为什么没有权威？》
- 25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战斗报》。
- 26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劳动报》。
- 27 见《战斗报》，被阿尔瓦在《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一书中引述，见第一卷，第316页。
- 28 阿尔瓦，《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第一卷，第317页。
- 29 穆尼斯，《失败的里程碑》，第286页。
- 30 见维克托·阿尔瓦《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史》，第255页；阿尔瓦，《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第一卷，第317页。
- 31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红色阵线报》。
- 32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战斗报》。
- 33 一九二一年，戈尔金创建了巴伦西亚共产党，他担任党的总书记。一九二九年，他与共产党断绝了组织关系，因而被斥为托洛茨基分子。他在多年以后写道：“这个罪名一直是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的借口。……不过，我在托洛茨基与斯大林进行权力斗争期间确实完全支持前者。我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年间将这位红军组织者的几本著作译为西班牙文也是事实。……但是，我从未加入过任何托派组织。我必须补充的是，直到托洛茨基去世，我与他始终是论辩对手的关系。”（戈尔金，《我的斯大林主义经历》，载一九五九年十月《评论》，该刊物由布鲁塞尔的伊姆雷·纳吉研究所出版）佩莱·帕赫斯在他的著作《西班牙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出示了与戈尔金的说法相抵触的证据，见第40—41页和注释23—24。
- 34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战斗报》。
- 35 圣地亚哥·卡里略，《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第11页。
- 36 根据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书记胡安·科莫雷拉的一次演说，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劳动报》。
- 37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工人团结报》报道。
- 38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日《工人团结报》。
- 39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之前，人们在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报纸《人道报》和《最后关头》上寻找任何哪怕是有点接近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挑衅性言论的内容都是白费工夫。
- 40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人道报》。
- 41 安德拉德的激进态度偶尔会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阶层内部引起争论。为《战斗

报》撰写了大部分社论的胡利安·戈尔金告诉我，安德拉德有时临时代替他。戈尔金说：“有一次，这引起了冲突，因为，我从巴黎回来以后发现，当斯大林分子已经开始大肆针对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玩弄花招时，他写了一篇社论痛斥这个政府是反革命政府。党的执委会和中央委员会均谴责了这篇文章的托派思路，但我不希望此事成为一个公共问题。”（戈尔金一九七七年六月二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另请参阅乔治·埃森魏因为罗伯特·A.戈尔曼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人物传略辞典》所写的关于安德拉德的条目。内战期间以及战后安德拉德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托洛茨基分子的意见分歧见一九七〇年一月十日在巴黎展示的安德拉德文件（胡安·安德拉德，《一九七〇一月十日在巴黎西班牙工人运动研究中心举行的发布会》。文件的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42 见胡安·安德拉德《关于西班牙革命的一些“政治笔记”，1936—1937》，第7页。
- 43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劳动报》。
- 44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劳动报》。
- 45 N.莫林斯-法夫雷加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战斗报》上的文章。
- 46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战斗报》。十二月十四日，在路易斯·孔帕尼斯的主持下，自治政府召开了一次全体专员会议。孔帕尼斯在会议上表示，他将于第二天开始进行组建新政府的协商并将尽力“协调现有的意见分歧”（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自治政府专员会议纪要，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日至十二月二十三日》。博洛滕资料集中有一份该纪要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关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见分歧的性质，这份会议纪要几乎没有提供什么线索。这一事实证明了共和派报刊作为一种主要信息来源的至关重要性。离开对发表在各个党派组织每天出版的报刊上的数以千计的社论、演说、文章和宣言的认真研究，历史学家想要了解内战期间盛行的派别斗争困难重重。
- 47 关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工会组织统一工会工人联合会的情况见本章注释18，它几乎完全是由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开除的工会组成的。
- 48 实例见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九日、十月三日、十五日和十七日、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二月八日和十二日《战斗报》。另请参阅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二十五日和十二月十日（巴塞罗那）《西班牙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主办的一份英文报纸；圣地亚哥·帕拉辛，《革命与农村》，第21页。在外国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指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或“托洛茨基分子”）赞成立即对小型工商企业和农村土地实行集体化之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指责消失了。外国共产党人的指责见威妮弗雷德·贝茨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伦敦）《工人日报》上的文章；J.R.坎贝尔，《苏联的政策及其批评者》，第357页；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378页；路易斯·费希尔，《西班牙为何而战》，第44—45页；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六日《真理报》上的文章和乔治·索里亚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原文如此，似应为一九三六年——译注）十二月十一日《国际新闻通讯》上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农村政策，见维克托·阿尔瓦编的《西班牙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文集》，第256—268页。关于保护城市小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指出了自己的政策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区别：“将中产阶级吸引到革命中来是一回事，组成一个联盟使他们作为支配性力量发挥决定性作用是另一回事，……但是，我们在革命的框架之内……承认他们的经济权利。”（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战斗报》）
- 49 一九四四年我在墨西哥对塞拉·帕米埃斯的采访。采访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直到一九八六年，当我再次翻阅这些纪录时，我才发现这一段重要的陈述。
- 50 鲁道夫·罗克，《在西班牙的外国人》，第91页。另一名外国无政府主义者也这么说过（见一九三七年六月《先驱》），但是，我发现，西班牙无政府主义领导人没有证实受到过任何直接的威胁。戴维·T.卡特尔说：“苏联援助在加泰罗尼亚以几种方式用于歧视打

击革命者。有非常详细的证据证明，苏联为援助加泰罗尼亚设置了这些条件：决不允许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共产党人再次加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必须服从中央政府制定的总体方案。”（戴维·T.卡特尔，《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109页）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此时坚信，它是由于苏联的压力而被逐出政府的。

51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战斗报》。

52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战斗报》。

53 一九三七年三月初选出的西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见佩德罗·切卡《伟大的政党，伟大的组织》，第23页。

54 阿瓦德·德·桑蒂连加入政府的原因见本书第三十九章。

55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工人团结报》。

56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战斗报》。

57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战斗报》。

58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战斗报》。

59 安德烈斯·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发表的演说，见安德烈斯·宁《西班牙革命，1930—1937》，第24页。

加泰罗尼亚走向公开交战

十二月危机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在政府中的地位被削弱了。由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顺从地同意将其逐出政府并且没有意识到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这一胜利对他们自身意味着一种明显的威胁，全国劳工联合会唯一可能的盟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感到忧虑。作为日益临近的危险的证据，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喉舌《战斗报》并不令人意外地转载了从越洋通讯社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发自莫斯科的一则消息中摘录出来的以下内容，这则消息刊登在墨西哥的《环球图片报》上：“苏联报纸表示，希望以与苏联同样的力度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收拾干净。”¹尽管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斥责这则报道纯属捏造——《消息报》或《真理报》确实没有刊登过这种消息²，但是，它无疑使全国劳工联合会深切地感到自身的危险日益临近。

除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在政府中的地位下降之外，十二月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加泰罗尼亚地区最大的中产阶级共和派政党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的自信心和好斗性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的恢复惹得《战斗报》在一月二十八日轻蔑地宣称：“五个月来，共和派一直委曲顺从。他们举起握紧的拳头严肃地听取‘国际’的指示。有时他们表现得比真正

的革命者还要革命。……[但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现在开始再次感觉强大起来。”

虽然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有意避免对驱逐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公开表示幸灾乐祸，但是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认为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政府是整个革命运动的重大挫折。这一点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举行的一次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公众集会上得到了证明。他们的演说极其好斗，充满了对未来的革命隐晦甚至公开的威胁，³以致路易斯·孔帕尼斯主席觉得有必要插话发出警告，他仍然认为，只要将自由主义运动“驯化”并逐渐剥夺其武装力量，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政府中的合作必不可少。尽管指责“各种各样的委员会盘根错节混乱不堪”，强烈要求将所有行政管理权集中在自治政府手里并且警告说，“如果没有一个训练有素、充满活力而且负责任的政府的话，革命注定要失败”，孔帕尼斯仍然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进行了下面这一番安抚：“一些共和派人士相信甚至梦想，今后将会建立一种与七月十九日以前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不过显示了他们的盲目和缺乏忠诚，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它既不正确也不合法。我曾经说过，我还要再说，工人阶级掌握政治权力的时候到了。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应当对监督政府的廉洁、效率和工作才智最感兴趣。”⁴这番话似乎使自由主义领导人感到欣慰，他们坚信孔帕尼斯当初对于革命的承诺。《工人团结报》写道：“路易斯·孔帕尼斯现在与无产阶级组织意见一致……尤其是与全国劳工联合会意见一致，他显示出一种比他的某些同志更敏锐、更真诚、更忠实的政治目光。”⁵

但是，无论孔帕尼斯主席或安抚政策的主要设计师何塞·塔拉德利亚斯总理的治国之术多么精明，对待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方式多么巧妙，都不能安抚更加焦急的中下层中产阶级追随者，他们已经或者即将面临经济破产。他们渴望立即剥夺无政府主义者的权力，同时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有力的领导和大胆的政策中看到了从革命的灾难中挽救自己的部分财产的一线希望。怪不得他们继续成群结队地加入这个人数不断增加的竞争党派。另一方面，正如一位仰慕者对其想法的概括那样，塔拉德利亚斯确信，“当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因政治上的天真

幼稚而自取灭亡时，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机会就将来临”，因此，至少在最初的时候，采取一种与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和平共处的政策比迫使他们站在不妥协的立场上要明智得多。⁶

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坚决要求将所有行政管理权集中在自治政府手里并强制实施政府的法令，塔拉德利亚斯仍然经常保护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免遭共产党人的攻击。例如，有一次，当格拉诺列尔斯市出现了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时，他竭力阻止政府派部队增援。⁷另一次，当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指责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战争工业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塔拉德利亚斯主持——时，他站在全国劳工联合会一边。⁸还有一次，针对共产党人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自治政府防务专员弗朗西斯科·伊斯格莱亚斯及其副手胡安·曼努埃尔·莫利纳拖延执行政府法令的指责，他们进行了有力的辩护。⁹由于经常保护自由主义者，塔拉德利亚斯受到他们的热情赞扬。¹⁰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他很快发现自己与党内那些更加好斗的领导人产生了矛盾，例如内务治安专员阿特米奥·艾瓜德，后者喜欢大胆地冒险并且支持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不妥协政策。“[我]知道，”塔拉德利亚斯多年以后坚称，“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某些重要人物为了解决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共产党人串通一气，有人相信这个问题可以在一个下午得到解决而且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我从来都不这么认为。这不诚实，一点也不诚实。”¹¹

他的谨慎策略最初得到孔帕尼斯的支持，还得到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另一些领导人以及加泰罗尼亚的一个小型中产阶级政党共和行动党的支持。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讨厌这种策略，但是直到战后才公开批评了塔拉德利亚斯总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一份文件写道：“资产阶级领导人与无政府主义的反革命政策相勾结，暗中希望加快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的崩溃瓦解，然后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中。”¹²

由于许多人对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感到失望，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利用塔拉德利亚斯的谨慎策略不仅可以将比较焦虑的那一部分城市中产阶级吸引到自己一边，而且可以将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的大量佃户和佃农以及工商业雇员自治中心（办公室职员和零售业营业员的工会组

组织，简称CADCI)的大量追随者吸引到自己一边，内战爆发之前这两个组织均属于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不可侵犯的势力范围。¹³如今，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书记胡安·科莫雷拉的传记已经告诉我们，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主席、历届战时自治政府的农业专员何塞·卡尔韦特不仅“与科莫雷拉密切合作”，而且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一名积极分子。¹⁴因此，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在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各个部门的真正影响力比他们的正式官员数量所显示的要大得多。

在十二月改组政府的过程中达到目的之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立即将注意力转向那些在革命初期夺取了食品批发业控制权的委员会。为了削弱全国劳工联合会在这个生死攸关的领域里的权力并且重建自由贸易，在新政府中担任物资供应专员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书记胡安·科莫雷拉颁布了解散这些委员会的法令。他在颁布法令之前不久声称，这些委员会取代经纪人“不利于社会”，它们对食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负有责任。¹⁵尽管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坚称这些委员会防止了富人从事损害工人利益的投机买卖，但是，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报纸上可以明显看出，这些委员会“在‘自由与革命’的名义下”也犯了“不少错误”，¹⁶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延续了老板们的恶习并像他们一样做投机生意”。¹⁷然而，双方争论的实质问题与其说是这些腐败行为，不如说是委员会掌握的经济权力。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书记安德烈斯·宁断言，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政策的目的在于“重新建立自由贸易并且破坏前[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物资供应专员多梅内奇同志针对投机商人所开展的整个革命工作”。¹⁸

但是，只要革命者的武装力量完好无损，科莫雷拉的法令从颁布到实施就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为了逐渐削弱革命者的地位，十二月危机之

417

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采取措施不断施加压力以结束该地区治安力量的二元状态。正如我们所知，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治安力量被一分为二，一方面是全国劳工联合会所控制的治安委员会手下的巡逻队，另一方面是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政府内务治安专员阿特米奥·艾瓜德控制下的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十二月危机的一个重要的附带后果是前共产党员艾瓜德¹⁹任命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欧塞比奥·罗德里格斯·萨拉斯为

治安总署署长即警察署长，取代了不太好斗而且惧怕无政府主义者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马蒂·罗雷特。继科莫雷拉之后，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很快成为自由主义者主要谴责的对象。作为一名前无政府主义者，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在内战之前早就放弃了自己的自由主义信仰，加入了毛林的工农集团，最终成为人数不多的加泰罗尼亚共产党党员，将其具有无政府主义积极分子特征的大胆鲁莽带到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²⁰

十二月危机过后不久，在自治政府中代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²¹建议，解散所有治安力量——巡逻队以及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并将它们合并组成一支统一的内务治安部队。²²全国劳工联合会拒绝了这个建议。“巡逻队不仅应当继续保留，而且应当扩大规模。”《工人团结报》写道，“对它们的一切攻击实质上都是对我们的革命事业的攻击。”²³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也宣称：

“我们肯定不同意这个建议。同意它就等于把自己五花大绑交给资产阶级，就等于帮助建立用来镇压我们的军队。社会治安必须继续由工人阶级来控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治安部队必须建立在巡逻队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革命的秩序。”²⁴然而，由于得到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政府专员的支持，政府通过了一系列要求解散各种治安力量的法令，包括解散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然后将它们重新建组成一支统一的内务治安部队。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支部队中，指挥岗位将由被解散的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的军官所占据。²⁵

由于自由主义运动——它在政府中的代表不是同意了法令中的某些条款，就是在另一些条款的表决中被多数击败，²⁶但是他们仍然恪守政府团结的原则——没有谴责这些法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宣称：“如果其他党派组织没有看出事态发展的趋势因而没有做出形势需要的反应的话，那么，它们将承担历史的责任。……革命的前途处在危急之中。那些天天向革命表示忠心的党派组织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它们所奉行的那种无论对革命多么有害也要保持团结的政策只有利于改良主义。……关于这些法令我党只有一个任务：不停地公开谴责它们，坚持不懈地为废除它们而努力，从而保证工人阶级利用自己的治安力量强行维护革命秩序。”²⁷

《工人团结报》对这一指责给予了回应：“我们以明确的语言而不是

旁敲侧击地公开表示，我们对关于社会治安的法令并不满意。我们在自治政府行政委员会的代表竭尽所能，试图通过消除那些革命的特征完善它。他们只达到了一部分目的。尽管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组织我们尊重这项法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用一项更加切实地反映了本地区真正的革命政治形势的新法令取代它的努力。……我们认为，建立一支与劳动人民的斗争和愿望格格不入的统一的治安部队是错误的。”²⁸

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围绕着这些法令展开的公开和私下的争论达到非常激烈的程度，以致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为了减轻普通会员的忧虑于三月十六日宣布，政府已经同意推迟讨论这些法令。²⁹这让塔拉德利亚斯措手不及。“在所谈论的这些无疑受到公众舆论广泛欢迎的法令被政府批准并由三月四日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日志》颁布之后，”他说，发生了“一些误会”。实际情况是，他解释说，政府同意推迟任命新的治安部队中的关键职务。³⁰事实的确如此。实际上，由于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这些主要局限于对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成员的任命不了了之，相关的法令也成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日志》的纸上谈兵，加泰罗尼亚地区治安力量的二元状态没有变化。

与此同时，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也在为采取其他措施煽风点火。党的中央委员会宣称：“我们曾经反复说过，没有正规的军队，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纪律和革命秩序，就不可能取得胜利。”³¹虽然加泰罗尼亚已于一九三六年十月批准动员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的应征者入伍，³²这项措施并没有落实，因为全国劳工联合会认为，“将我们的部队完全交给政府控制非常幼稚”，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会员只能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征召加入自由主义运动的部队。³³即使在当年十二月全国劳工联合会接管了防务委员会之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继续反对征兵并且努力保持由其革命领导人所控制的他们自己的武装力量的完整性和纯洁性。因此，当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迫切要求把民兵部队合并成为“效力于共和派政府”的正规军时，³⁴全国劳工联合会强烈要求把民兵武装组织成为一支“效力于革命”的军队，³⁵并且极力主张国防部以下的所有指挥岗位应当由“革命的工会组织牢牢控制”。³⁶总之，对立双方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这场争论中，拥有自己的民兵武装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立场鲜

419

明：“就革命的前途而言，工人阶级所能得到的唯一保证是自己的军队。工人阶级的军队只能是……一支征召民兵组成的军队。……它必须绝对保持在革命组织的控制下。……总之，我党坚定不移地表示支持正规军，不过，我们支持的是一支活生生地体现了革命精神的正规军。”³⁷

为了加强建立一支由政府控制的正规军的鼓动宣传，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立了一个包括除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之外的所有党派组织在内的支持人民军委员会。二月二十七日，委员会提出一系列建议：立即将民兵部队改编成为正规军，征召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的应征者入伍，公布征兵中心的地址，解散一切没有政府官方身份的军事委员会，向人民军的所有部队委派“拥有足够权力”的政治委员。³⁸

二月二十八日，支持人民军委员会在巴塞罗那街头举行了一场示威游行和军事检阅。在全国劳工联合会看来，这场力量的显示是一次严重的挑战。由于委员会侵犯了他的权力，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防务专员弗朗西斯科·伊斯格莱亚斯威胁说要辞职。为了避免出现政府危机，在主张安抚的塔拉德利亚斯的敦促下，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强烈要求支持人民军委员会暂停一切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可能对“完全属于自治政府行政委员会的职能和权力”构成某种“侵犯”，尽管它们的“愿望良好”。³⁹各方达成一个妥协：支持人民军委员会被正式指定为防务委员会的附属机构，由伊斯格莱亚斯担任副主席，孔帕尼斯担任主席。⁴⁰不过，这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一次胜利。由于委员会被承认为一个官方机构，它可以加强党的鼓动宣传工作，甚至可以对防务委员施加更大的压力。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主要舆论工具《土地与自由》断言，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为建立正规军而开展的宣传活动背后，隐藏着“一种敌视无政府主义的政策”。⁴¹这反映了自由主义运动的恐慌。

与此同时，伊斯格莱亚斯处在中央政府不断加大的压力下，后者早就反对加泰罗尼亚民兵在邻近的阿拉贡前线独立行动并且阻挠加泰罗尼亚地区因革命获得军事上的独立。但是，直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初，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才因为渴望得到武器和资金而同意接受中央政府在巴伦西亚颁布的军事法令，并且答应促使加泰罗尼亚的民兵武装服从国防部的指挥。⁴²结

果，三月十八日，与塔拉德利亚斯一起代表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参加了达成财政和军事协议的谈判的伊斯格莱亚斯被迫确定了征兵日期，不仅征召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的应征者入伍，而且征召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的应征者入伍。⁴³

三月二十三日，《战斗报》发表恩里克·阿德罗埃尔撰写的文章，阿德罗埃尔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负责宣传工作的书记，而且是该党在以伊斯格莱亚斯为首的、由全国劳工联合会所控制的防务委员会中的代表。阿德罗埃尔的文章谴责了巴伦西亚当局对加泰罗尼亚的军事政策：

为了迫使我们在军事上服从，巴伦西亚当局明确拒绝向加泰罗尼亚提供经济援助。巴伦西亚当局拒绝为阿拉贡前线提供武器弹药以防止我们无产阶级的军队取得胜利，⁴⁴同时避免激励西班牙工人的革命意志。……当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被迫恳求中央政府提供资金以向民兵支付拖欠了一两个月的十比塞塔薪水时，巴伦西亚当局收买了军官，正式提拔他们并且立即给他们发薪水。……从现在起，加泰罗尼亚军队的所有开支将由巴伦西亚当局负担，包括军事指挥部门、人民战争学校和军事行动的开支。加泰罗尼亚失去了军事上的独立性。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失去了它的军队。……自称民族主义者甚至分离主义者[这是提到主张自治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人士和主张独立的小型政党加泰罗尼亚国家党人时使用的称呼]的那些人如何面对加泰罗尼亚人民？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专员如何面对正在阿拉贡战场上战斗的他们的同志？他们如何为这么可耻地向中央政府投降进行辩护？……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人士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改良主义者的态度可以理解，符合逻辑。他们当然更愿意看到军队由巴伦西亚当局控制而不是掌握在革命的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手中，看到前一种情况他们要高兴一千倍。但是，全国劳工联合会那些政府专员的投降让人感到无法理解。不可思议的是，宁可被杀也不许别人抢走他们的左轮手枪的无政府主义的同志们竟然心平气和地同意把军队交出去，归根到底，军队是工人阶级真正的武器。我们已经把我们解放社会的军队交给了巴伦西亚当局，交给了民主共和国的支持者，交给了坚决要扼杀

420

革命的人。⁴⁵

不是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像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这篇文章所说的那样“心平气和地”屈服于巴伦西亚当局的要求；因为，在三月初，像本书已经讨论过的钢铁纵队的情况一样，驻扎在阿拉贡前线赫尔萨的将近一千名民兵为了抗议政府的军事化法令离开前线，他们担心这些措施将把民兵武装变成政府严密控制下的国家机器。在巴塞罗那，他们成立了以去年十一月死在马德里前线的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的名字命名的“杜鲁蒂之友会”（Los Amigos de Durruti），旨在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层的“反革命”政策作斗争。该组织正式成立于一九三七年三月，由费利克斯·马丁内斯和海梅·巴柳斯（后者当时担任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报纸巴塞罗那《晚报》的社长或主编）分别担任干事和副干事，⁴⁶据巴柳斯说，到五月初时，其成员增加到四五千人。⁴⁷巴柳斯肯定地说，杜鲁蒂之友会的成员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尽管许多人的说法正好相反——例如，《曼彻斯特卫报》驻西班牙记者弗兰克·杰利内克声称，正如共产党人所说，这个组织被托洛茨基分子“渗透并控制”。⁴⁸不过，成员寥寥无几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小组领导人G.穆尼斯（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承认两个组织具有一种同志式的关系：“不仅我们与杜鲁蒂之友会的工人友好协作，他们也帮助我们出售分发我们的报纸。”⁴⁹

无法确定这么一大批民兵撤离前线对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是否产生了什么影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批应征者应当遵照军事法令出现在征兵中心之后仅一天，以弗朗西斯科·伊斯格莱亚斯为首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专员退出自治政府，引发了一场政府危机。⁵⁰

现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在所有关键问题上都陷入了僵持状态。自由主义运动曾经试图通过敷衍应付或假装接受政府的法令保持其武装力量的独立性；但是，虚与委蛇无法继续，政府的公开分裂不可避免。作为解决危机的一个条件，自由主义者要求，由于关于社会治安的法令“经历了如此根本的变化以致徒有其名”，因此，应当授权防务委员会“以其拥有的一切手段”制止“军事游行和示威以及任何不利于

或者损害革命士气和战斗意志的行为”。⁵¹另一方面，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宣称，它没有引起政府危机而且竭尽全力防止出现这种危机。“必须组成一个不会允许任何部门或团体经常阻碍[其]开展支持战争的工作的政府。必须组成一个将会履行其职责并将贯彻执行那些已获一致通过却仍未付诸实施的法令的政府。”⁵²此外，它还坚决要求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签署一份保证书，对“不作修改地”执行前任政府通过的军事和社会治安法令并且落实新政府的所有措施做出承诺。⁵³但是，全国劳工联合会不打算签署可能在今后会被用来反对它的任何文件，因为在它看来，这“不仅与激励我们工会组织的思想原则背道而驰，而且与革命的本质和七月十九日以来劳动大众所取得的胜利成果水火不容”。⁵⁴

危机很快进入了第二周，仍然看不到解决的可能。四月三日，作为最后一着，孔帕尼斯主席拼凑了一个由六名专员组成的临时政府：

何塞·塔拉德利亚斯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首席专员(总理)兼财政与教育专员
阿特米奥·艾瓜德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内务治安专员
胡安·科莫雷拉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公共工程、劳工与司法专员
何塞·卡尔韦特	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	农业与物资供应专员
弗朗西斯科·伊斯格莱亚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	防务专员
胡安·何塞·多梅内奇	全国劳工联合会	经济、公共救助与卫生专员

422

没有人把这个新政府当成回事，认为它只是权宜之计，尤其是孔帕尼斯。危机出现时对全国劳工联合会显得越来越不耐烦的孔帕尼斯需要一个“能够政行令通的政府，而且还能将它的意志强加于那些阻碍其开展工作的人”。⁵⁵

现在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塔拉德利亚斯的谨慎策略逐渐失去了孔帕尼斯的支持，而塔拉德利亚斯则希望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因其思想上的自相矛盾和政治上的天真幼稚自取灭亡之前保持与它和平共处的政策。正如科莫雷拉的仰慕者和加泰罗尼亚政治戏剧的热心阐述者米克尔·卡米纳尔所注意到的那样，诸如孔帕尼斯和艾瓜德之类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重要人物“在立场上更接近于科莫雷拉而不是塔拉德利亚斯”。当塔拉德利亚

斯确认，由于认为政府团结的公开破裂可能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他准备向全国劳工联合会做出正式但非实质性的让步时，另一方的科莫雷拉则认为，有名无实的合作只不过削弱了政府的权力并且可能产生“甚至更加惊人的后果”。科莫雷拉还说，意见分歧集中在“要团结还是要权力”的问题上。⁵⁶显然，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答案是“要权力”。

四月七日，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推出了一个加泰罗尼亚“胜利计划”。计划的前言写道：“现在，整个问题以权力问题为转移，关键在于政府的权限。没有权力不可能有军队。没有权力不可能有战争工业。……没有权力不可能取得胜利。”它的要点是：（1）尽快建立一支作为共和国军队组成部分的正规的加泰罗尼亚人民军；（2）立即以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的应征者为基础组建五个师；（3）将基础的战争工业国有化并对运输业实行军事化；（4）尽快遵照前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通过的法令组建一支统一的治安部队；（5）将所有武器集中起来由政府控制。⁵⁷

整个计划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革命目标发生了冲突。“我们已经作出了太多的[让步]，”《工人团结报》警告说，“因此，我们相信，关闭水龙头的时候到了。”⁵⁸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安德烈斯·宁对这一立场表示欢迎：“七月十九日工人阶级掌握了权力。……它让机会溜走了。……无产阶级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岗位。……如果今天我们不因势利导和平地夺取政权的话，那么，明天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暴力斗争的方式消灭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者。……我们以极其忧虑的心情注视着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犹豫不定。已经对反革命作出了太多的让步。……由于这个原因，我们高兴地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现在的立场表示欢迎。……全国劳工联合会宣称：‘我们只能到此为止！一步也不能后退了！’”⁵⁹

四月十日，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喉舌《土地与自由》反映了更加激进的思想情绪，它号召：“同志们，镇压反革命！这是你们的任务。我们的责任是使之成为现实。”不顾这一任务，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继续在自治政府宫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进行谈判，寻求某种可以避免对立阵营之间发生公开冲突的妥协方案。但

是，由于不时发生的冲突激增，外面的大街上看来已经充满了火药味，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内战的危险迫在眉睫。“没有人可以确定自己的人身是安全的，”米克尔·卡米纳尔在科莫雷拉的传记中写道，“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那些引人注目的保镖，他们总是与一些政治领导人形影不离。由于科莫雷拉的政治活动遭遇不测的可能性很大，因此，他的公车始终跟随着一些武装到牙齿的人。”⁶⁰

四月十六日，孔帕尼斯主席为渡过危机组成了另一个临时政府。他在几周之后写道：

长期以来，[内务]治安专员艾瓜德一直要求[中央政府]增派兵力；自治政府的治安力量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只有两千名武装的突击卫队队员和另外六百名非武装的突击卫队人员以及少量共和国国家卫队队员。灵活变通的联合政策必须与加强政府权力的努力相结合，在涉及所谓不听指挥的组织[即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以及有人以强硬的手段违抗政府法令的特定情况下，必须采取行动。我始终坚决要求这样做，这不仅是因为公众舆论的压力，而且是因为马德里的内政部和其他权力机构的要求以及外国报刊对边境地区形势的评论，等等，等等。形势的错综复杂性使得增援成为必要，因为可以预料的是，即使在最大限度地灵活变通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发生冲突。自治政府一直在竭尽全力缓解形势，舆论也在施加压力。政府的权力正在得到不断加强，但是，大多数加泰罗尼亚人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激怒，以致存在着政府失去公众的信任、效力于自治政府的治安部队丧失斗志的危险。⁶¹

尽管发生了微小的变化，孔帕尼斯四月十六日组成的新政府与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组成的政府具有相同的政治成分：

何塞·塔拉德利亚斯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首席专员(总理)兼财政专员
安东尼奥·马利亚·斯韦尔特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文化专员
阿特米奥·艾瓜德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内务治安专员

424

何塞·卡尔韦特	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	农业专员
何塞·米雷特	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物资供应专员
拉斐尔·比迭利亚	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劳工与公共工程专员
胡安·科莫雷拉	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司法专员
弗朗西斯科·伊斯格莱亚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	防务专员
安德烈斯·卡普德维拉	全国劳工联合会	经济专员
胡安·多梅内奇	全国劳工联合会	公用事业专员
奥雷略·费尔南德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	卫生与公共救助专员

像四月三日组成的临时内阁一样，新政府流产了。它的成员无法就一个共同纲领达成一致，而且日益恶化的军队和警察的指挥控制问题仍然错综复杂令人焦头烂额。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把解决危机的过程形容为一场闹剧，“一场让大家更加难以忍受的闹剧，因为三个星期过去了——整整三个星期，之后情况依然如故”。它再次批评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同志们[在内战爆发时]并不知道对权力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态度。……他们更愿意认为这只是一个合作问题[而不是]坚决主张工人阶级全面夺取政权。……我们肯定，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人群众将像我们一样以冷淡的目光看待当前危机的解决办法。[这种]办法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它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比许多人认为的都要快，过不了多久革命的问题将被再次提出来。……改良主义者不会放弃他们的目标。如果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同志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他们来说非常可怕，对我们大家也非常可怕。因为，危在旦夕的不是这个或者那个组织的前途，而是革命事业的前途。”⁶²

第二天，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巴塞罗那委员会宣称：“刚刚组成的这个政府是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中建立停战状态的一种尝试，无论停战多么短暂。小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者将利用他们得到的这一次喘息机会获得并巩固新的职位。工人阶级负有通过建立一个工农政府……为最终解决[政府危机]做好准备的历史责任。”⁶³

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同意掩盖这场危机，但是，自由主义运动

的真实情绪反映在它的报纸上。四月十七日的《工人团结报》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以停止执行前任行政委员会所遵循的路线为条件接受了冲突的解决方案，它还相信，这一路线将被尊重并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合理政策所取代。”同一期《工人团结报》上的另一篇文章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已多次表现出最大限度的灵活和宽容。但要小心！不要让人们误解了它的意图或是认为，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将允许他们那些所谓的同志将自己践踏在脚下而不受惩罚！”

同一天，伊比利亚自由主义青年联盟的喉舌《道路》宣称：“[反革命势力]企图夺取国家机器。昨天，它要求建立一支庞大、统一的治安部队。……今天，它提议建立一支没有革命成分的正规军。这些花招的卑鄙目的是什么？……依靠这些肯定将会为其效力的军队，明天它就可以把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成果淹没在血泊之中。怎么才能挫败这一阴谋？……通过缔造革命的军事组织。我们向[后方的青年]发出一个强烈的呼吁：建立革命青年骨干营！”

同一期《道路》上的另一篇文章威胁道：“击退反革命的时间到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自由主义青年联盟……已经声明……它们必须为消灭那些对反法西斯事业和革命事业不忠诚的人而战，更要为消灭那些根本不支持反法西斯事业和革命事业的人而战。……防止牺牲我们的同志进而导致革命失败的方法是……建立一支确保取得战争和革命胜利的军队并将科莫雷拉、艾瓜德和罗德里格斯·萨拉斯等人从加泰罗尼亚的社会生活中清除出去。”最后，同一天的《土地与自由》以通栏大字标题宣称：“对于某些政党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消灭法西斯主义。让它们惶恐不安的是无政府主义运动。耗费它们最大精力的是其诋毁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宣传运动。……如果它们想在西班牙重复它们在其他国家所做的事，它们将发现，我们已经严阵以待。”

与此同时，为了将阿拉贡前线的民兵纵队合并编入人民军，为了建立一支由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控制的统一的内务治安部队，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加强了它的宣传活动，但是没有什么成效。事实是，受与巴伦西亚当局达成的军事协议推动，的确发生了某些结构性变化：胡维尔特纵队、杜鲁蒂纵队和阿斯卡索纵队这三支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分别改编成为

第二十五师、第二十六师和第二十八师；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巴里奥-特鲁埃瓦纵队改编成为第二十七师；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民兵纵队改编成为第二十九师；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马西亚-孔帕尼斯纵队改编成为第三十师；但是，它们仍然被各自的党派组织所控制。至于那些关于社会治安的法令，实际上都被扔进了废纸篓。⁶⁴

在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过程中，四月二十四日，发生了一次对共产党人警察署长罗德里格斯·萨拉斯的未遂暗杀。⁶⁵紧接着在第二天，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自治政府劳工与公共工程专员拉斐尔·比迭利亚的秘书罗尔丹·科尔塔达被暗杀。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惧笼罩着整个加泰罗尼亚地区。暗杀为冲突添加了新的催化剂使其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将暗杀归咎于“不法分子”⁶⁶——这个术语现在被普遍用来形容所有那些反对与政府合作并努力使自由主义运动坚持其无政府主义原则的桀骜不驯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自由主义青年联盟（FIJL）成员。“不再宽恕！”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喉舌《人道报》高呼，“社会秩序必须在一个人的统一指挥下尽快恢复，这个人必须迅速而无情地消灭频繁出现的犯罪行为。我们再也不能允许被人称为不法分子的团伙通过武力把它们自己的意志和法律强加给大多数公民。”⁶⁷“现在还有不法分子和奸细不是一种耻辱吗？”由激进的中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组成的小型分离主义政党加泰罗尼亚国家党的喉舌《巴塞罗那日报》质问，“……另外，前些时候自治政府通过了关于社会治安的法令，它们为什么没有执行？当局要达到什么目的？”⁶⁸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还发表了一份共同宣言要求：“停止暗杀工人积极分子！停止针对反法西斯主义和无产阶级团结的挑拨离间！我们反对受雇于国内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奸细！人民要求正义并且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强行实现正义。”⁶⁹

为科尔塔达举行葬礼的四月二十七日当天，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组织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这]不只是一场葬礼；这是一次公民投票。”党的喉舌《劳动报》写道，“成千上万名工人和反法西斯人士一队接着一队走过巴塞罗那的街道……悲痛使他们像兄弟一般团结起来，还有抗议。……葬礼的壮观场面表明，加泰罗尼亚人民决心惩罚凶手并且捣毁那些妄想阻

挠我们战胜法西斯主义的歹徒的巢穴。公民投票已经举行。投票的结果告诉我们，对于迄今为止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一天也不能容忍了；反法西斯的群众必须团结起来……反对内部的敌人，反对我们称为不法分子的那些人。”⁷⁰

全国劳工联合会抗议说，“利用一位反法西斯战友牺牲的痛苦事件在政治上大做文章令人厌恶”，⁷¹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宣称，葬礼是“反革命示威”的一个借口。“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大批工人被工会调动了起来，……对一名工人积极分子死难的同情[使]他们陷入后方的斗争。……像不久前一样，这场示威最重要的政治目的是在极端保守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最落后的阶层中制造一种集体迫害的气氛，迫害的对象是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为采取更大的行动而营造的某种心理气氛正在形成。”⁷²

紧接着暗杀罗尔丹·科尔塔达发生的是杀害安东尼奥·马丁事件。马丁是边境城市普奇塞达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委员会主席，他在邻近的贝利韦尔村与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Guardia Nacional Republicana，前身为国民卫队）遭遇时被杀。⁷³此后不久，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从巴伦西亚派来的大批边防警察部队——由海关官员和税务人员及其警卫组成的部队——开始夺取迄今为止由革命委员会控制的法国—西班牙国境沿线的边防哨所。⁷⁴在两周前的四月十六日，内格林发布了一道命令，派遣一些重新组建的边防警察部队前往边境地区执行任务。⁷⁵这道命令提前警示了巴伦西亚当局打算夺回被革命者夺走的这一权力，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控制外贸和外汇以及武器的流动必不可少。⁷⁶

马丁被杀，边防警察部队夺取边防哨所，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准备收缴武器，以及共产党人警察署长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对奥斯皮塔莱特的无政府主义者总部发动袭击，⁷⁷这些消息使聚集在巴塞罗那上空的战云明显变得更加浓密而阴沉。

四月二十九日，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地方委员会调动武装人员小组占领了加泰罗尼亚首府的街道。所有人都手持来复枪，一些人腰间挂着手榴弹。下午六点，政府召开会议，但是，在短暂的

会议之后它宣布，由于不可能在“企图通过武力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并危及战争和革命”的武装人员的压力下继续工作。“因此，政府将中止会议并且希望所有未经其直接许可的人立即离开街道，以便使它有可能处理混乱的局面。同时它还警告说，加泰罗尼亚目前正在经历迅速的毁灭。不过，自治政府行政委员会已经为保证其法令的严格执行而采取了必要的措施。”⁷⁸

五一劳动节马上就到。劳动者总工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为举行一次联合示威游行而进行的谈判已被放弃。⁷⁹对立两派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使人们找不到任何宽泛的口号足以涵盖他们的分歧哪怕一天。“[透过]城市的表面，”目击者乔治·奥威尔写道，“在奢华和日益严重的贫困下面，在大街上因宣传海报和蜂拥的人群而呈现出来的欢庆表象下面，存在着某种明显和可怕的政治敌对气氛。无论持什么观点的人都预言：‘马上就要出事了。’危险的起因非常简单而且不难理解。那就是希望推动革命前进的派别与希望控制或制止革命的派别之间的对抗——归根结底，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对抗。”⁸⁰

428 在这种爆炸性的气氛中，新成立的极其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杜鲁蒂之友会显得异常活跃。四月份的最后一天，会员们在巴塞罗那大量张贴了他们的口号。“我们同意他们的纲领并且准备接受他们向我们提出的任何建议。”⁸¹胡安·安德拉德——他被普遍认为是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成员——写道，“这些口号中有两点也是我们的基本观点：一切权力归工人阶级以及工农兵民主政府是无产阶级政权的象征。”⁸²

五月一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宣称：

两天来，工人正在受到监控。[他们]……日夜关注着革命的前途。他们既不是不法分子，也不是奸细。他们是七月十九日在大街上战斗的同一批工人。……

他们一直携带着武器保持警惕，因为他们忍无可忍。他们厌倦了多如牛毛的政治协议，他们厌倦了建立在脆弱的妥协基础上的纸糊的政府。……

我们不信任政府成员。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守望在大街上。……

我们再也不能容忍真正的不法分子了。我们需要统治，但我们需要绝对的统治。在前线和后方。由工人阶级来统治。……

但是，我们的行动一定不要退化成为一场孤立的运动，一定不要退化成为一场自杀式的“暴动”，那将危害工人阶级的胜利前进。不，不仅工人小组要采取行动，[而且]全体工人也要根据一个具体的方案以及对此时刻各种需要和可能的清醒认识采取行动。

因此，[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和组织组成一个革命工人阵线承担起赢得战争并领导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成果的责任。

因此，[必须]由工人、农民和士兵民主选举产生一个代表这些工作和战斗着的人们的政府，一个工农政府。⁸³

与此同时，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逐渐加强行动解除大街上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武装。五月二日，《工人团结报》警告说：“革命的保证是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企图解除人民的武装就是使自己站在街垒错误的一边。任何专员或警察署长，无论是谁都不能下令解除工人的武装。工人们正在与法西斯战斗，与后方那些尽人皆知其平庸无能的政客相比，他们具有更加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你们决不能允许任何人解除你们的武装！”

注释：

- 1 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战斗报》。
- 2 乔治·埃森魏因在应我的要求起草的一条注释中写道：“这则报道惹得苏联总领事公开声明，‘一月五日《战斗报》以《警告！》为题发表的消息依据的是虚假的材料。’此外，总领事宣称，苏联没有所谓越洋通讯社，而且‘在苏联的报纸上没有也不可能刊登攻击全国劳工联合会所组织的兄弟般的工人运动的内容’（引自一九三七年一月九日《战斗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努力证明最初刊登在《环球图片报》上的这则消息是真实的（同上），尽管它从未出示过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的《真理报》或《消息报》上摘录的包含这一段有争议的引文的报道。实际上，苏联总领事说的不错，苏联报纸没有进行过这种攻击，因为《真理报》所刊登的唯一一篇关于西班牙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文章是《加泰罗尼亚托洛茨基分子的诽谤策略》，它只是转载了发表在《工人世界报》上的这篇文章。虽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对这篇文章吹毛求疵，但是，它并不包含《战

斗报》引自《环球图片报》的内容。无论如何，难以想象克里姆林宫当时竟会公开表明其消灭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意图，因为苏联总领事弗拉基米尔·A.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正在试图讨好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具体情况见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阿方索十三世，第二共和国，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第360—361页，另请参阅第426—427页）。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这一段不足为信的引文后来被认为出自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真理报》，并且被无数作家和历史学家当做非常重要的材料使用，其中包括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杰拉尔德·布雷南、胡利安·戈尔金和休·托马斯（尽管后者在一九七七年修订版的《西班牙内战》中将其删去）。感谢胡佛研究所的希丽娅·库克仔细查阅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十六日和十七日的《真理报》和《消息报》。写完这条注释以后，我在查阅弗兰克·明茨所著《西班牙革命的工人自治》一书时发现，第227—228页上有一段类似的关于《真理报》所刊登的文章的不足为信的叙述。”

- 3 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最后关头》；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道报》。
- 4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道报》。
- 5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工人团结报》。另请参阅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工人团结报》。
- 6 感谢费利佩·乌瓦奇向我提供了这一信息，他是塔拉德利亚斯总理办公室的一名助手，一九四五年在墨西哥接受了我的采访。另请参阅塔拉德利亚斯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写给我的信，第3和6页，这封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7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
- 8 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工人团结报》。关于塔拉德利亚斯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支持，见米克尔·卡米纳尔《胡安·科莫雷拉》，第二卷，第96—97页。
- 9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八日《劳动报》。
- 10 一九三七年二月号《新时代》。
- 11 巴尔塔萨·波尔塞尔，《与尊敬的塔拉德利亚斯谈话》，第55页。
- 12 一九四〇年五月三十日《人民西班牙》。
- 13 关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认为其对工商业雇员自治中心的影响，见维克托·科洛梅尔《向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会议所作的报告》，第15页。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九日，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机关报《劳动报》报道，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有五万名成员。
- 14 卡米纳尔，《胡安·科莫雷拉》，第二卷，第150页。
- 15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劳动报》。
- 16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工人团结报》。
- 17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战斗报》。
- 18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战斗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战斗报》。
- 19 关于内战结束之后西班牙共产党对艾瓜德的热情赞扬，见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七日《人民西班牙》。
- 20 更多关于罗德里格斯·萨拉斯、艾瓜德和马丁·罗雷特的情况，见何塞·科利和何塞·帕内的《何塞·罗维拉：为社会主义加泰罗尼亚效力的人生》，第151—160页。罗德里格斯·萨拉斯是十二月十七日被任命为警察署长的（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每日图片报》）。科利是治安总署秘书长，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另请参阅现存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罗德里格斯·萨拉斯档案，见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第005系列，第305文件柜，B类，第90号档案。这些档案的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21 见本书第四十章。

- 22 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劳动报》。
- 23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工人团结报》。
- 24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战斗报》。
- 25 见一九三七年三月四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日志》。
- 26 据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喉舌《劳动报》报道，在宣布这些法令——五次政府会议对它们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通过时，塔拉德利亚斯总理声称，它们经过“认真的研究并且得到了全体专员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党派组织的批准”（一九三七年三月二日《劳动报》）。另一方面，据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喉舌《战斗报》（一九三七年三月三日）报道，塔拉德利亚斯说，“这些法令的多数条款”取得了全体政府成员的一致同意，这也就是说，在某些条款上存在着意见分歧。
- 27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日《战斗报》。
- 28 一九三七年三月四日《工人团结报》。
- 29 塔拉德利亚斯发表的声明，载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七日《劳动报》。
- 30 同上。
- 31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劳动报》。
- 32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每日图片报》；另请参阅防务委员会发表的声明，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日《每日图片报》。
- 33 引自A.普吕多莫和D.普吕多莫的《加泰罗尼亚自由主义运动，1936—1937：人民的武装》，第19—20页。
- 34 何塞·德尔·巴里奥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三日《劳动报》上的文章。
- 35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三日《工人团结报》。
- 36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九日《工人团结报》。
- 37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战斗报》。关于托洛茨基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军事领域所采取的“犹豫不决的”政策的批评，见G.穆尼斯《失败的里程碑：胜利的预兆》，第369页。
- 38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劳动报》。
- 39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日《每日图片报》。
- 40 一九三七年三月五日《劳动报》。
- 41 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土地与自由》。
- 42 几乎没有公布过这些协议的信息，当时只有笼统的报道。具体见一九三七年三月四日《每日图片报》；一九三七年三月五日《战斗报》；一九三七年三月五日《最后关头》。不过，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的《共和国人民军史》提供了一些与这个问题有关的线索，见该书第一卷，第1042—1045页。但是，尽管进行了勤奋的研究，他并没有发现任何将加泰罗尼亚民兵并入人民军的官方命令。
- 43 见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劳动报》。征兵日期确定如下：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的应征者为三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 and 三十日；，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的应征者为四月五日。
- 44 杜鲁蒂死后负责指挥杜鲁蒂纵队的里卡多·桑斯战后写道，拉尔戈·卡瓦列罗不给自由主义民兵部队发放武器和弹药，“因为他害怕我不知所以”（里卡多·桑斯，《驰援马德里的部队：第二十六师杜鲁蒂纵队》，第151页）。巴塞罗那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喉舌《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指责政府蓄意不向阿拉贡前线提供武器以使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在加泰罗尼亚失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思想报》；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七日《自由青年报》；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八日《道路》；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和四月二十九日《战斗报》）。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敌意无疑是内战第一年阿拉贡前线缺乏武器和作战不力的

部分原因。瓦尔特·克里维茨基下面这一段评论值得记录在案：“斯大林决定以武器和人力援助的只是西班牙那些准备毫无保留地接受他的领导的团体组织。他决意不让加泰罗尼亚人得到我们的飞机，因为他们有可能利用我们的飞机赢得军事上的胜利，这将提高他们的威望从而加强他们在共和派队伍中的政治影响。”（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在斯大林的情报部门工作》，第91—92页）但是，阿拉贡前线作战不力还有另外一些重要原因：各支部队之间的政治对立，纪律涣散，缺乏统一指挥（见本书第二十五章）以及巴塞罗那和加泰罗尼亚其他城市的紧张局势——那些地方拥有的武器比前线还多。“我们不可能闭口不谈以下事实，”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积极分子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写道，“我们在阿拉贡前线只有三万支步枪，可是在后方，各种各样的党派组织拥有大约六万支步枪，弹药也比前线充足。我们不是一次而是数十次建议自由主义运动成员交出他们的武器。……他们坚持认为，我们不能在其他党派组织准备从背后攻击我们时解除自己人的武装。”（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68页）尽管政治斗争的确是阿拉贡前线缺乏轻型武器的部分原因，但这不是缺乏重型武器的原因，巴伦西亚当局不是故意不给就是更愿意把重型武器送往受到威胁的马德里前线。下面是加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民兵部队参加战斗的乔治·奥威尔对阿拉贡前线窘困状况的生动描述：“我时常环顾四周遥望战场，同时渴望——噢，这种渴望多么急切！——有一组群炮。那样的话，一个人就能像用锤子砸开核桃一样轻而易举地逐个摧毁敌军的阵地。可是我们这边连一门炮也没有。……机关枪的配备大约是五十个人一挺；都是一些老式机枪，但在三四百码的距离内命中率还相当高。除此之外我们只有来复枪，而且大部分来复枪已成废铁。……弹药极其紧张匮乏，以致每个参加战斗的士兵只能发给五十发子弹，而且大部分子弹的质量非常低劣。……我们没有钢盔，没有刺刀，几乎没有左轮或者其他手枪，五到十个人才有一颗手榴弹。”（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41—42页）

- 45 这篇文章以恩里克·阿德罗埃尔的笔名“希罗内利亚”署名发表。
- 46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九日《每日图片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三月四日《每日图片报》。
- 47 关于这个组织的详细情况，见巴柳斯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和二十四日以及七月十五日写给我的信（“杜鲁蒂之友会”档案，现存胡佛研究所）。
- 48 弗兰克·杰利内克，《西班牙内战》，第541页。
- 49 一九三九年三月三日《工人斗争报》。与杜鲁蒂之友会的创立和活动有关的资料，见“杜鲁蒂之友会”档案，其中包括巴柳斯战后写给我的信和霍尔迪·阿克尔主要根据对巴柳斯以及其他成员的采访整理的关于该组织的打印资料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另请参阅弗兰克·明茨和米格尔·佩西尼亚《杜鲁蒂之友会，托洛茨基分子和五月事变》；保罗·夏基，《杜鲁蒂之友会年表》和海梅·巴柳斯的《迈向新的革命》。乔治·埃森魏因写道：“杜鲁蒂之友会代表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内部的一批极端激进分子，他们在阿拉贡前线 and 巴塞罗那得到了明显的支持。通过坚定有力地反对民兵军事化并且反对解散防务委员会和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巡逻队，这些人希望遏制逐渐高涨的反革命浪潮。从某种理论的角度看，杜鲁蒂之友会向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阶层越来越倾向于采取的改良主义立场提出了挑战。据该组织的主要发言人巴勃罗·鲁伊斯说：‘新组织的首要目标是要维护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宗旨像七月十九日时那样完好无损，以保证工会组织在没有政治党派参与的情况下承担社会经济事务的领导责任。’（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晚报》，被弗兰克·明茨和米格尔·佩西尼亚在《杜鲁蒂之友会，托洛茨基分子和五月事变》一书中引述，见第11—12页）难以估计杜鲁蒂之友会在战争的这一紧要关头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产生了多大程度的影响。直到五月这个组织才出版了自己的报纸《人民之友》，尽管查不到其发行量的统计数字，但巴柳斯声称，第二期发送了大约一万五千份。据巴柳斯说，

该组织设法将这份报纸一直出版到一九三八年底，同一年，他撰写的小册子《迈向新的革命》[作者没有署名，但是后来翻译成英文出版时在标题下面有他的名字]秘密散发，估计散发了三万到五万册（‘杜鲁蒂之友会’档案，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除了副干事巴柳斯和干事费利克斯·马丁内斯之外，杜鲁蒂之友会的其他重要成员包括巴勃罗·鲁伊斯、弗朗西斯科·卡雷尼奥和埃莱乌特里奥·罗伊格。由于早年造成的瘫痪，巴柳斯放弃了医学训练成为一名政治活动积极分子。最初，他加入分离主义的加泰罗尼亚国家党直到一九三一年，接着他短暂地成为华金·毛林的工农集团的成员（霍尔迪·阿克爾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写给博洛滕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不过，阿尔瓦和施瓦茨在他们即将出版的著作中对巴柳斯的工农集团成员身份提出严重质疑）。一九三二年，他加入全国劳工联合会，最终成为《工人团结报》的一名编辑并在内战期间担任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晚报巴塞罗那《晚报》的主编（见巴勃罗·鲁伊斯发表在一九八一年一月七日《工会斗争》上的文章《海梅·巴柳斯的挽歌》，这篇文章还用英文发表在一九八二年二月至三月号旧金山的《警钟》杂志上）。毫无疑问，杜鲁蒂之友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巴柳斯的领导能力。瑞士托洛茨基分子克拉拉和保罗·塔尔曼夫妇以下面的方式描述了巴柳斯的领导能力：‘甚至在第一次与巴柳斯和他的朋友见面时我们就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具有对付人的非凡才能。他对形势的估计很简单：由于加入了人民阵线政府，无政府主义领导人抛弃了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政策的坚实基础并且成为共产党的战略的附庸。’（克拉拉·塔尔曼和保罗·塔尔曼，《争取自由的革命》，第189页）”感谢埃森魏因应我的要求撰写了这条注释。

- 50 尽管伊斯格莱亚斯三月二十三日就辞职了，官方在三月二十六日以前并没有对外宣布政府处于危机状态。
- 51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宣言，载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土地与自由》。
- 52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劳动报》。
- 53 科莫雷拉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四月九日《劳动报》；另请参阅塔拉德利亚斯对新闻界发表的声明，载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劳动报》；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书记塞赛对《环球新闻报》发表的声明，转载于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广告报》。
- 54 一九三七年四月四日《工人团结报》。
- 55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劳动报》。
- 56 卡米纳尔，《胡安·科莫雷拉》，第二卷，第93和107—108页。
- 57 一九三七年四月八日《劳动报》。
- 58 一九三七年四月八日《工人团结报》。
- 59 安德烈斯·宁一九三七年四月九日发表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一日《战斗报》。
- 60 卡米纳尔，《胡安·科莫雷拉》，第二卷，第117页。
- 61 路易斯·孔帕尼斯，《关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至七日发生在巴塞罗那的战斗的笔记和文件》。内战期间巴伦西亚费乌斯通讯社负责人里卡多·德里奥将这份珍贵资料的副本送给我（现存胡佛研究所）。塔拉德利亚斯总理的助手费利佩·乌瓦奇向我确认了这份资料的真实性，他说，他在塔拉德利亚斯的文件中见过这份资料的副本而且阅读了它。此外，根据共和派法官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在其撰写的孔帕尼斯传记中所引用的简要摘录判断，他显然也有这份资料的副本，见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孔帕尼斯的人生与献身》，第177—178页。里卡多·德里奥是从著名的自由主义记者和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者弗朗西斯科·阿吉雷那里得到的这份文件。关于阿吉雷的讣告，见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四日《西班牙共和报》。
- 62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七日《战斗报》。
- 63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八日《战斗报》。

- 64 关于民兵部队的改编，见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一卷，第1043页和桑斯的《驰援马德里的部队》，第126—127页。阿拉贡前线部队的真正兵力是多少？宣传的估计兵力高达十五万人，但是，这个数字被严重地夸大了。迈克尔·阿尔佩特在他的学术专著《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里说，根据可以利用的有限资料，“阿拉贡前线的兵力总数在任何时候似乎都不可能超过两万五千人”，见第45—47页。这得到了赫尔穆特·吕迪格和莫林（汉斯·弗罗因德）的支持。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吕迪格在向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国际工人协会提交的报告中说，四月中旬，与属于其他党派组织的九千名民兵相比，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民兵为一万六千人。莫林是巴塞罗那主要的托洛茨基分子之一，他提供的数字是两万三千人，由下列部分组成：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一万三千人；劳动者总工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五千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五千人（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伦敦《战斗报》）。他没有把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民兵计算在内。
- 65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每日图片报》，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劳动报》。
- 66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劳动报》。另一方面，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担任加泰罗尼亚自由主义青年运动总书记的拉蒙·利亚尔特断言：“共产党人自己暗杀了罗尔丹·科尔塔达，然后嫁祸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不法分子’。”他声称，共产党人必须找到一个点燃“反法西斯主义火药桶”——影射巴塞罗那五月的战斗——的“‘道德上的’正当理由”（拉蒙·利亚尔特，《革命与内战之间》，第239页）。
- 67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人道报》。
- 68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巴塞罗那日报》。
- 69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劳动报》。
- 70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劳动报》。
- 71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工人团结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工人团结报》。
- 72 胡安·安德拉德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战斗报》上的文章。
- 73 对这一事件的最佳描述是（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伊萨克·普恩特在南希·麦克唐纳的《向西班牙流亡者致敬》一书中所作的描述，见第171—188页。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工人团结报》（该报社论和自治政府内务治安委员的秘书发表的声明），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每日图片报》，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四日《道路》，阿道弗·布埃索，《一名全国劳工联合会会员的回忆》，第二卷，第227页；共产党作家曼努埃尔·D.贝纳维德斯，《加泰罗尼亚的内战与革命》，第401—413页和（加泰罗尼亚自由主义青年运动总书记）拉蒙·利亚尔特，《革命与内战之间》，第236—238页。
- 74 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每日图片报》。根据共产党官方的内战史，边防警察部队实际上是四月十七日开始抵达边境地区的，而且他们“在随后几天的时间里动手解除了‘不法分子’团伙的武装并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夺取了边境的控制权”（《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三卷，第72页）。五月四日，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用电传电报通知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四月三十日内格林离开巴伦西亚前往边境地区（阿萨尼亚—普列托电传电报，第11页。关于这些电传电报的情况，见本书第四十二章）。不过，根据贝纳维德斯所引述的科莫雷拉与内格林五月二日晚上通过电传进行的一次谈话来看，财政部长当时仍在巴伦西亚，见《加泰罗尼亚的内战与革命》，第423页。内格林问科莫雷拉，经巴塞罗那去边境地区他是否应当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科莫雷拉对此答道：“我已经告诉过你，加泰罗尼亚和[巴塞罗那]可能发生严重的情况。你必须推迟这一行程。”“我带一把袖珍折刀防身，”内格林回答说，“不要把我的目的地告诉任何人。”科莫雷拉对此答道：“如果我们有机会买到大批‘袖珍折刀’，事情就彻底结束了，而且早就结束了。”

- 75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六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76 关于内战初期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与中央政府之间就外贸的控制权以及从法-西边境向西班牙其他地区的武器流动而发生的冲突，见拉尔戈·卡瓦列罗一九三七年四月七日写给西班牙驻巴黎大使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的信。卡瓦列罗在信中说，他收到了谴责“不法分子”在边境地区抢夺战争物资的报告（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32/L40）。另请参阅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103、112和130页；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427页和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的声明，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日《每日图片报》。前引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那封信还提到了与巴塞罗那港口的国际纵队代表发生冲突的问题，后者拒绝将运到的货物移交给国防部，他声称，这是国际纵队的财产。
- 77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先驱报》；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人道报》；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巴塞罗那日报》。
- 78 一九三七年四月三十日《广告报》。
- 79 阿古斯丁·索奇，《共和派控制区后方事变的真相》，第11页；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160页。
- 80 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157页。
- 81 安德拉德多年以后将杜鲁蒂之友会斥为“混乱思想的一个标志”，其“极端革命的辞藻”没有政治效果（见安德拉德文件《一九七〇一月十日在巴黎西班牙工人运动研究中心举行的发布会》，该文件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82 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战斗报》。同一天，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小组针对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以及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改良主义者”发表了一份冗长的宣言。它的部分内容如下：“七月十九日，工人阶级缺乏对于夺取政权来说最重要的革命领导地位。……无政府工团主义完全否认政权的必要性。……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另一方面，改良主义运动暴露了其作为自由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中坚力量的本来面目。……
- “列宁说过，‘除非发生世界革命，我们的失败在所难免。’这句话更适用于西班牙。为了引导世界工人阶级走向反抗，我们必须通过树立一个榜样作出示范。……
- “为了使受法西斯主义压迫的人民群众站起来，有必要向他们展示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与我国的资产阶级结盟。
- “战争与革命密不可分。更确切地说，没有革命就不可能赢得战争，甚至更准确地说，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赢得战争。
-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绝大多数人对少数剥削者的统治。……
- “谁将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人民群众的统治机关工农兵委员会，它们的议会——地方、地区和全国代表大会——以及革命执行委员会。工会必须管理经济，而整个工人阶级必须把社会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 “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任务。
- “打倒资产阶级共和国！
-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 感谢斯蒂芬·施瓦茨送给我一份该宣言的副本，这份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
- 83 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战斗报》。

五月事变（一）

现在，巴塞罗那政治斗争的动力正不可阻挡地导致双方公开交战，导致西班牙革命的流血插曲和决定性的转折点，史称五月事变。

没有对哪个历史事件的报道或解释像对五月事变一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民族主义者的报纸几乎一致将事变说成是无政府主义者对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一次反叛，¹尽管《布尔戈斯日报》还肯定地说，无政府主义者曾走上街头杀死苏联人。“西班牙人不是苏联人，”他补充说，“因此，虽然有时忘乎所以，赤色分子并没有忘记他们是西班牙人。”²《纳瓦拉思想报》宣称，发生的是“一场真正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是“自由主义民主运动的最后一步”。³至于外国新闻界，希特勒的《民族观察家》⁴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人民》⁵也像其他立场见解千差万别的外国著名报纸一样，把这说成一场无政府主义暴动。⁶

但是，在共和派阵营的外国支持者当中，在共和派阵营内部，对五月事变看法却截然不同。苏联《真理报》将这场冲突定义为“佛朗哥和意大利-德国干涉者所策划的“一场托洛茨基分子和法西斯分子的暴动”，目的在于分散西班牙共和派对于前线的注意力”并“用‘无政府’幽灵吓唬英法资产阶级”。⁷法国共产党的喉舌《人道报》把事变描绘成一场“希

特勒分子的暴动”，在它看来，暴动的头目利用了无政府主义的口号并且“确信可以得到不负责任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的帮助”；⁸与此同时，美国共和党的喉舌《工人日报》报道说：“除了支持佛朗哥的法西斯分子、无政府主义‘不法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之外，君主主义者也参加了这场未遂暴动。”⁹另一方面，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将事变定性为“在英法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主义的压力下，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的资产阶级政府镇压革命无产阶级的一次尝试”。¹⁰

西班牙驻巴黎大使馆发表的一份声明使事变更加扑朔迷离，声明断言，这场“暴乱”并不像“某些企图造成世界舆论混乱的宣传机器所说”的那样只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当暴乱的头目认为已经控制了局势时”，传统的君主主义旗帜在巴塞罗那的一些阳台上飘扬。¹¹

在西班牙共和派内部，共产党的主要日报《红色阵线报》把这场骚乱描绘成一场由“托洛茨基反革命特务”策划的暴动。¹²这种观点遭到革命左派的反对。根据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说法，这场冲突是共产党人所激起的“大多数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的自动爆发”。¹³这也是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说法，尽管它还指责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者打算在墨索里尼同意的情况下使加泰罗尼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¹⁴

这些描述几乎毫无共同之处，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过了五十年后五月事变仍然被团团迷雾所笼罩，尽管许多人试图澄清其真相。不过，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到一九三七年五月时，巴塞罗那的政治气温已经达到了引爆点。

与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政府内务治安专员阿特米奥·艾瓜德共同商定并且遵照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委会事先做出的一项决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人警察署长欧塞比奥·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先发制人，他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五月三日，星期一，下午三点，他率领三卡车突击卫队士兵袭击了电话局。¹⁵去年七月挫败军事叛乱后，全国劳工联合会占据了坐落在加泰罗尼亚广场的这一幢地理位置优越的大楼，把它当做一个“关键的革命阵地”。¹⁶迅速进入这幢十层的大楼之后，突击卫队士兵占领了底层，但是，他们在试图进入上面的楼层时受到了阻击。¹⁷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发出援助的请求之后，警察的援军陆续赶到，他们“占领了相

邻建筑的楼顶并在附近的大街小巷布置了非常显眼的兵力”。¹⁸很快，一位目击者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自由主义青年联盟的武装人员乘坐卡车到达了。“他们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革命成果。”¹⁹

根据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颁布的关于实行集体化和工人管理的法令——该法令使工会没收或者管理其在革命初期所占领的大型工商企业合法化，²⁰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下属西班牙国家电话公司所拥有的电话局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共同组成的一个委员会管理。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是这个机构中的支配力量，去年七月以来就在大楼的塔楼上飘扬着的他们的红黑旗帜证明了他们的主导地位。

431 虽然根据上述法令该委员会由一名政府代表所主持，但是，他的存在只是造成了一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官方控制的假象。“那里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政府不得不结束这种局面。”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书记胡安·科莫雷拉声称，“电话局的内部管理全都是为一个组织而不是为整个社会服务的，另外，无论是阿萨尼亚总统还是孔帕尼斯主席或者任何其他人，谁的通话都不可能不被某个行为不检点的接线员偷听。”²¹这并非夸大其词。孔帕尼斯主席在他关于五月事变的笔记中亲笔证实：“自治政府各个部门的所有电话、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和共和国总统的所有电话均被窃听。”²²在全国劳工联合会看来，这种窃听尽管不是法律赋予的权力，但它却是革命赋予的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由于能够行使否决权，能够如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所说截取窃听“有损名誉的电报和谈话”并且能够偶尔发现一些“阴谋削弱人民权利”的人，²³全国劳工联合会占有了实际权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打算成为这个地区的主宰者，它们就不可能允许这种情况长期存在。

因此，当罗德里格斯·萨拉斯根据艾瓜德签发的命令袭击电话局²⁴时，他得到了除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之外的大部分政府专员的默许并非没有可能。²⁵不过，另一个例外是精明而且极其谨慎的塔拉德利亚斯总理。据阿萨尼亚总统——我们应当记得，他于一九三六年十月离开马德里去了巴塞罗那——说，塔拉德利亚斯在开战的第一天晚上告诉他，他只是在命令发出

以后才知道了袭击行动，他认为这个决定“非常危险”，因为政府缺乏制服其可能遇到的抵抗的手段。²⁶“他发表了许多批评意见，”阿萨尼亚进一步证实，“批评艾瓜德没有准备好就开战了，批评孔帕尼斯张口闭口都是开战，他还为此警告过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所有问题最终都要通过谈判来解决。”²⁷

得知袭击的消息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专员要求将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和艾瓜德两人撤职，但没有奏效。²⁸“其他党派毫不妥协的态度，”无政府工团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写道，“尤其是坚决反对这种惩罚措施的自治政府主席的机会主义态度在战事爆发之后引起了一场总罢工。”²⁹

曼努埃尔·克鲁埃利斯当时是加泰罗尼亚国家党——该党代表少数中产阶级分离主义者的思想倾向——的喉舌《巴塞罗那日报》的记者，他在追述五月事变时说：“如果孔帕尼斯像他按理应当做的那样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将内务治安专员和治安总署署长撤职的话，巴塞罗那就不会有五月那个可悲的一周。……孔帕尼斯主席在当时那种特定环境下的态度多少有点令人费解。……不是他不了解情况而且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使他拒绝将两人撤职，就是他完全知情并且默许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局面。……孔帕尼斯主席为什么不坚持提出辞职呢？难道他被已经开始出现在街头的反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歇斯底里迷了心窍？难道像在其他情况下那样，他想对党内的某些朋友表示忠诚？解释孔帕尼斯主席态度的真正原因并非易事，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他的态度对引发冲突、散布仇恨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巴塞罗那不得不因此而遭殃。”³⁰

当人们得知袭击电话局大楼的消息时，愤怒在那些主要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工人阶级街区蔓延开来。“成百上千的同志们占领了街道。”一名无政府主义目击者写道，“他们要去市中心彻底清除那些打算像七月十九日的法西斯分子一样再次进行挑衅的人。阻止他们很困难。这些同志……知道挑衅者企图干什么。……他们企图扼杀革命，破坏革命工人的胜利成果，然后只是重新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激怒无政府主义者使他们加入冲突，宣布他们是‘人民阵线’政府的敌人，破坏他们的组织，为资本主义民主列强进行干预打开绿灯，然

432

后将在革命道路上前进的西班牙工人阶级淹没在血泊之中。所谓‘工人的祖国’在这一场扼杀革命的行动中是刽子手的帮凶，为了在抵抗法西斯分子对其存在的威胁时得到资本主义民主列强提供的援助，它正在牺牲西班牙人民未来的自由。”³¹

数百个街垒迅速筑起。“这些街垒看上去古怪而神奇。”乔治·奥威尔目睹了主要街道之一兰布拉大道上发生的事情，他写道，“当西班牙人明确决定动手干什么事情时，他们总是显示出那种富有激情的力量，男人、女人和很小的孩子排成长长的队伍撬起地上的鹅卵石，把它们装进从附近找来的手推车里运到前面，人们背着沉重的沙袋，摇摇晃晃地来来往往。”³²

夜幕降临之前，巴塞罗那是一座兵营。“成千上万的工人手持武器回到了街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宣称，“工厂、车间和仓库已停止工作。在城市的各个地方，自由的街垒重新筑起。七月精神再次征服了巴塞罗那。”³³不知那些对袭击电话局负有责任的人是否预料到了如此广泛的公众反应。

在围绕着巴塞罗那的一个很大的范围内，从工人阶级居住的郊区到城市商业公务区的边缘，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控制着局面。不过，在哥特区那一小块商业政治地盘内，对立双方势均力敌。例如，在位于中心的加泰罗尼亚广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占据着电话局，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则牢牢控制着它的总部哥伦布酒店，一九三六年七月它没收了这个酒店，从酒店的窗口用机关枪几乎可以对整个广场进行扫射。

在工人阶级居住的郊区萨里亚、奥斯塔弗兰克斯和桑斯以及巴塞罗那的沿海地区，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毫无战斗力。³⁴一些士兵没有抵抗就投降了，另一些士兵则待在他们的营房里，坐视危机自行发展。

“顷刻间，几乎整个巴塞罗那都被我们的武装人员小组控制了。”阿瓦德·德·桑蒂连证实，“他们没有从他们的阵地向前推进，尽管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前进，打败那些进行抵抗的小股敌军。”³⁵他强调说，如果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想要夺取政权的话，它们将取得彻底的胜利，“但是，我们对此不感兴趣，因为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违背了我们的团结原则和民主原则”。³⁶

在离巴塞罗那港不远的加泰罗尼亚议会大厦——阿萨尼亚总统不久前把他的官邸设在那里——附近，枪声断断续续响个不停。晚上八点，阿萨尼亚总统指示当时人在巴伦西亚的总统府秘书长坎迪多·博利瓦尔去找拉尔戈·卡瓦列罗总理，要求派兵增援他的总统卫队。卡瓦列罗已经就寝，于是，晚上八点半博利瓦尔把生气的总理从床上叫了起来。在催促卡瓦列罗刻不容缓地派遣援兵之后，博利瓦尔离开了，他几乎不会想到他的要求将被置若罔闻。³⁷没过多久，内政部长加拉尔萨通知卡瓦列罗，艾瓜德请求“紧急派遣镇压动乱必不可少的一千五百名突击卫队士兵”。³⁸

夜里十一点，塔拉德利亚斯首席专员代表孔帕尼斯主席前去看望阿萨尼亚总统，为混乱的事态向他表示歉意。从自治政府宫到议会大厦通常只需几分钟的路程走了一个半小时。“经过每一座兵营时他都必须从车上下来长时间协商，饱受羞辱。”阿萨尼亚在日记中写道，“他在开口[为混乱]道歉时实际上所强调的是，作为一个加泰罗尼亚人他感到羞耻，我打断了他并且重复了我让博利瓦尔转告政府总理的话。‘不必道歉！镇压叛乱！就我而言，保证我的安全和行动自由就行了。’”然后，塔拉德利亚斯向总统告别。在战事余下的时间里，总统没有从加泰罗尼亚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消息。“自治政府没有人问到我，没有人打算让我做什么，也没有人关心我的立场。”阿萨尼亚总统愤愤不平地说，“这不只是一种可耻的失礼；这表现出一种无声的敌视。”³⁹政府总理拉尔戈·卡瓦列罗也不关心总统的境况。“他既没有给我打电话，也没有给我发电报。”⁴⁰

“[五月三日至四日的]整整一夜，叛乱分子控制着城市。”阿萨尼亚继续写道，“他们筑起了街垒，在没有任何人干涉的情况下占领了建筑物和重要的地方。……我并不担忧，但是他们使我陷入的处境让我心烦意乱。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冲突与我没有直接关系；我甚至还认为，如果事态继续恶化，可能有助于[在西班牙]实现和平。让我讨厌和烦恼的是叛乱将在国外引起的流言蜚语，另外那些叛乱者将会从中得到的好处以及它对战争的影响。”⁴¹

同一天晚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自由主义青年联盟的地区委员会一起开会。执委会成员胡利安·戈尔金回忆说：“我们用下面这些精确的措辞阐述了问

题：‘我们都没有要求巴塞罗那的群众采取这次行动。这是对斯大林分子的挑衅的一种自发的反应。这是革命的决定性时刻。为了消灭内部的敌人，我们都要走在革命运动的前列，否则的话，革命运动就将瓦解，敌人将把我们消灭。我们必须做出选择；革命或反革命。’[无政府主义者的几个地区委员会]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他们最大的要求是把那个向革命运动挑衅的[警察]署长撤职。要消灭的似乎不是他背后的各种势力！总是形式取代了实质！……我党站在革命运动一边，尽管我们知道它注定要失败。”⁴²

第二天，五月四日，星期二。上午，艾瓜德再次请求派遣一千五百名突击卫队士兵，但是，遵照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指示办事的内政部长安赫尔·加拉尔萨只给了一个敷衍的答复。“我已经命令卡斯特利翁、穆尔西亚、阿利坎特和巴伦西亚的[警察]部队集结待命，”他答复说，“因此，在必要的情况下，那应该是发生在巴塞罗那的冲突加剧时，……你需要的部队将归你调遣。不过，总理和我一致认为，尽管应当做好一切准备，但是，在无须动用已在当地的所有部队而且不能证明兵力不足的情况下，驻扎在巴塞罗那以外的部队进行干预并不可取。”⁴³拉尔戈·卡瓦列罗希望以敷衍的方式使战事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平息。在与共产党人进行生死攸关的政治斗争时，他不愿因为向加泰罗尼亚派遣援兵而引起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敌意或者加强他的对手对该地区的控制。

与此同时，巴塞罗那的形势正在恶化。机关枪射击的嗒嗒声、手榴弹和炸药的爆炸声以及迫击炮的轰鸣响成一片。这种“可恶的噪声在成千上万幢石头建筑物之间回荡，回荡，像一场热带的暴风雨”。乔治·奥威尔写道：“砰-砰、嗒-嗒、轰隆-轰隆——有时逐渐变弱只听到零星的射击，有时突然枪炮声大作震耳欲聋，但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天亮之后仍然继续。”⁴⁴虽然有个别攻占敌人据点的尝试，但公开进行的都是规模较小的战斗。大多数作战人员仍然待在建筑物里或街垒后面，不停地向对面的敌人射击。⁴⁵

“我们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每个人的房子都被战火所殃及，”几天之后阿瓦德·德·桑蒂连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唯一希望的是，扑灭战火，结束血腥的屠杀。”⁴⁶然而，几个月后他又有了另一种想法：“也许……我们被一种忠诚和宽容的意识所支配，以致没有敏锐地察

觉到针对我们策划的阴谋。”⁴⁷

下午两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通过广播电台呼吁停火：“工人同志们！……我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责任。我们没有攻击任何人。我们只是保护自己。……放下你们的武器！我们是兄弟！……如果我们自相残杀，我们就注定要失败。”⁴⁸

但是，打算给冲突火上浇油的大有人在。不仅罗德里格斯·萨拉斯的人马发起了新的攻击行动，而且势单力薄的托派组织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持不同政见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杜鲁蒂之友会也异常活跃，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一些比较激进的成员加入了后者的队伍。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态度悲观。“我们觉得我们在精神和物质上并没有强大得足以带头组织群众进行抵抗。”党的执委会的一名成员承认。⁴⁹同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乔治·奥威尔参加了战斗，他证实：“当时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有直接接触的那些人告诉我，整个事件实际上让他们感到惊慌，但又觉得自己必须参与其中。”⁵⁰

435

“[由于]工人已经走上街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在战斗结束后的五月十二日发表声明，“党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是是什么立场呢？与革命运动断绝关系，谴责它，还是与它联合起来？……我们选择了第三种立场，……尽管我们事先知道，革命运动不可能胜利。以任何其他方式行事都是不可饶恕的背叛。……当然有可能夺取政权，但是，作为工人运动内部的少数派，我们无力承担喊出这一口号的责任，尤其是当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的态度在战斗者中引起混乱和动摇时，他们通过巴塞罗那的广播电台紧急要求工人阶级放弃斗争。号召工人夺取政权就意味着领导他们举行起义，这可能会给工人阶级带来严重的后果。由于这个原因，只能提出有限的口号：要求将挑衅的直接发起者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和艾瓜德撤职，废除关于社会治安的反动法令，成立保卫革命委员会。”⁵¹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机构并没有公开流露悲观情绪，因此，它表面上显得斗志旺盛，尽管它在五月三日晚上向自由主义运动的地区委员会建议采取积极的联合行动没有成功。第二天上午，《战斗报》敦促工人

保持“一种长期动员的状态”并“继续加强已经发动的攻势，因为没有比进攻更好的防御手段。必须要求治安总署署长辞职并达到目的。……必须要求废除反动势力和改良主义分子所通过的社会治安法令并达到目的。为了实现这一切从而继续进行革命，即持续扩大革命的范围并使革命取得最终的结果，保持动员状态和攻势的工人阶级必须组成革命工人阵线并且立即着手建立保卫革命委员会”。⁵²

几天后，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宣称：“五月四日，佛朗哥的托派代理人……利用其喉舌《战斗报》呼吁他们的追随者……保持‘一种长期动员的状态’。……臭名昭著的塞维利亚刽子手凯波·德·利亚诺通过广播向加泰罗尼亚的叛乱分子说了下面这段话：‘我们支持并将帮助你们。坚持下去！’屠杀西班牙人民的刽子手与巴塞罗那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左派无政府主义者’发出的呼吁看来是这些人民的敌人之间存在着思想和组织联系的最新证据。西班牙的托洛茨基主义公开充当着国际法西斯主义的代理人。”⁵³

436

与此同时，在（政府所在地）巴伦西亚，五月四日星期二上午，担心共产党人可能利用这场冲突推翻其政府的拉尔戈·卡瓦列罗总理召见了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几位政府部长。他告诉他们，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自治政府内务治安专员艾瓜德已经请求内政部长派遣一千五百名突击卫队士兵增援。⁵⁴“政府不能这样做，”卡瓦列罗表示，“因为这意味着派兵帮助那个可能与挑起这场冲突有关的人。在答应派兵之前，他将根据宪法接管治安管理部门。”⁵⁵因此他建议，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和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的代表应当立即前往巴塞罗那，努力争取结束敌对行动。⁵⁶随后，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召开会议，会议决定，“为了避免中央政府接管治安管理部门”，派代表去巴塞罗那。⁵⁷全国委员会委派全国劳工联合会书记马利亚诺·巴斯克斯和担任司法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加西亚·奥利韦尔去巴塞罗那，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同时委派的是卡洛斯·埃爾南德斯·桑卡霍和马利亚诺·穆尼奥斯·桑切斯，两人都是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支持者。⁵⁸

上午十一点，中央政府开会。在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和左翼共和派政府部长的支持下，共产党人逼迫总理立即采取行动，不仅要求派兵增援加

泰罗尼亚，而且要求政府接管该地区的社会治安和军事事务。屈服于制造内阁危机的威胁，卡瓦列罗勉强同意采取这些措施，但只是在到了傍晚局势仍未改善的情况下。

下午一点十分，孔帕尼斯主席——肯定是他指示艾瓜德请求从巴伦西亚派遣一千五百名突击卫队士兵增援——告诉拉尔戈·卡瓦列罗，局势已经“非常严重”，警察部队“不能胜任快速行动而且已经筋疲力尽”。⁵⁹卡瓦列罗答复说：“我认为我有责任通知你，……全体[部长]已经决定，如果到今天傍晚局势仍然没有改善，政府将根据[加泰罗尼亚自治]法令接管该地区的社会治安。如果有什么异议的话，请你直接告诉我。”⁶⁰对于地区自治的主要监护人孔帕尼斯主席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他当然希望派遣援兵而不牺牲加泰罗尼亚的自治。于是，他回答道：“我认为，[中央政府]应在加强内务治安专员可动用的兵力方面予以配合。”不过，由于担心如果不交出治安管理权对方将拒绝派遣急需的援兵，因此他又以顺从的语气补充道：“鉴于[社会治安状况]可能继续恶化的危险，共和国政府可以采取它认为必须采取的措施。”⁶¹

关于这次对话，普列托在下午三点用电传电报与阿萨尼亚进行的交谈中给出了一种稍微不同的说法。他说，内阁决定让卡瓦列罗向自治政府主席建议，后者应当根据加泰罗尼亚自治法令要求中央政府接管该地区的社会治安。内阁认为这一程序比自治法令所规定的另一种选择“更可取”，即准许中央政府“在其认为国家的整体利益或安全处于危险状态时自动参与维持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秩序”。⁶²卡瓦列罗在与孔帕尼斯交换意见之后向内阁报告说，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没有给他明确的答复，但他得到的印象是，自治政府承认它无力制止动乱”。⁶³不过，普列托非常乐观地告诉阿萨尼亚，他相信，在下午四点半内阁开会时，它将同意“在接到或者没有接到自治政府要求的情况下接管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治安”。⁶⁴

两种说法并不矛盾。无论如何，没有证据显示孔帕尼斯对中央政府接管社会治安表示了任何抵制。

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九日当着几名加泰罗尼亚流亡者的面签署的一份书面声明中，阿特米奥·艾瓜德的侄子海梅·安东·艾瓜德说，他的叔叔告诉他，孔帕尼斯主席既没有与他也并没有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商量就把

社会治安管理权交给了巴伦西亚当局。他进一步宣称，据他叔叔说，孔帕尼斯请求增援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胡安·科莫雷拉驱使的，科莫雷拉“在那几天片刻不离孔帕尼斯左右为他出谋划策，同时利用主席的沮丧心情提出符合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利益的解决方案”。这份文件断言，建议孔帕尼斯“接受巴伦西亚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的就是科莫雷拉。⁶⁵

情况也许是这样的，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孔帕尼斯同意将社会治安管理权交给巴伦西亚当局时，他得到了包括艾瓜德本人在内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他们的支持虽然勉强但心照不宣，因此，上面提到的这份文件是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在战后出现内部纠纷时企图将加泰罗尼亚失去自治权的责任完全推到孔帕尼斯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身上的一次明显尝试。

尽管孔帕尼斯已经许可，拉尔戈·卡瓦列罗总理仍然不愿意采取行动。他还在希望派往巴塞罗那的使者通过斡旋结束流血。但是，他的社会党内竞争对手、海军和空军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想要立即采取行动。作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一个决不妥协的对手，据普列托本人说，他从革命一开始就认为，共和国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对于权力的控制。⁶⁶星期二中午十二点，他用电传电报通知阿萨尼亚，他已经命令两艘驱逐舰立即驶往巴塞罗那，舰队指挥官收到了“直接听从阁下调遣”的命令，另外，驻扎在莱里达的空军已经奉命“在巴塞罗那上空低空飞行以显示武力”。⁶⁷

438

说到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使者在巴塞罗那斡旋成功的可能性，普列托并不乐观。他在下午三点告诉阿萨尼亚，政府首脑倾向于在作出决定之前等待他们的谈判结果。“就我而言，我表示我对谈判结果几乎没有任何信心……因此，如果我们任凭时间流逝并且允许城市被叛乱分子所控制，那么，接管社会治安的任务将会变得更加艰巨。”⁶⁸

晚上九点半，普列托再次用电传电报与阿萨尼亚联系。他告诉总统，（将去转移总统的）“勒班陀”号和“桑切斯·巴尔凯特吉”号驱逐舰已于下午两点离开卡塔赫纳，五个中队的空军士兵将在开赴巴塞罗那途中于

凌晨三点到达巴伦西亚。“士兵和水手斗志高昂。”他向阿萨尼亚保证。总统对此回复说：“在这里，在我的住处[加泰罗尼亚议会大厦]，我们仍然没有足够的防御手段。……告诉我，明天由谁负责指挥镇压巴塞罗那的叛乱？”“海军将按照‘勒班陀’号驱逐舰舰长的命令行动，”普列托回答道，“空军将由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中校指挥。……我已经把我的意见告诉你，这件事必须在几小时内予以解决。……显然，我的意见需要服从总理的意见。[空军]与地面部队之间的联系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于地面部队来说，要做的只是为空军指出具体的目标。由于没有防空部队妨碍低空飞行，飞机将轻而易举地击中目标。至于军舰，它们的任务只是安全顺利地进入港口。”⁶⁹

从议会大厦顺利到达港口是阿萨尼亚主要担心的一件事，虽然正常情况下几分钟之内即可到达那里。自从战事爆发以来，如同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妻子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所说，阿萨尼亚“歇斯底里似地坚决要求”采取措施保护他的人身安全，⁷⁰但是，只有普列托倾听了他的要求。

“我已经说过，”阿萨尼亚在日记中写道，“总理并不打算直接或者间接与我联系。他也没有把我的情况告诉政府的部长们。星期二上午，普列托用电传电报与我进行了联系。他知道巴塞罗那的骚乱，但是，……由于没有亲眼看到，他不可能充分了解我的处境。他告诉我，他派了两艘驱逐舰开赴巴塞罗那港……供我调遣；二十架飞机将飞往雷乌斯和普拉特；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即将派出两支部队，一千名空军士兵正在飞往雷乌斯。他非常警觉并且准备镇压叛乱。”⁷¹

星期二全天巴伦西亚政府一直在开会。傍晚时，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对手提醒他注意他在当天早些时候做出的承诺：如果到今天傍晚局势仍然没有改善，政府将接管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治安和军事事务。整个白天，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巴塞罗那不停地呼吁停火。下午三点，它们通过广播规劝人们：“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人们，劳动者总工会的工人们！不要被阴谋诡计所欺骗。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我们只听从一个口号：大家回去为打败法西斯而工作！”⁷²尽管它们这样呼吁，国际工人协会驻无政府工团主义者

总部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之家的代表阿古斯丁·索奇写道，仍然不能遏制战事。“各方的敌意有增无减。”⁷³

当内阁在巴伦西亚继续争论不休时，共产党的晚报《红色阵线报》宣称：“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发生的一切归咎于无法控制的有组织的歹徒，他们被委婉地称为‘不法分子’。现在我们发现，他们完全被控制着；只不过被敌人控制着。再也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存在。……宽容已经足够了。忍耐是有限度的。当西班牙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存在危在旦夕时，当西班牙人民的自由以及广大群众的幸福和未来受到威胁时，我们不允许自己被人暗算。……不能再讨论这些问题了。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而且是形势需要的严厉行动。……所有那些企图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扰乱[治安]破坏[纪律]来达到这样或者那样目的的人，将会立即领教公共权力的无情力量，他们将受到政府的镇压和人民群众的惩罚。”⁷⁴

在内阁中，争论呈现出狂热偏激的特点。“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同志带头与支持接管社会治安和防务的共产党人和共和派对抗了四个多小时。”全国劳工联合会方面说，“这是一场激烈的争论，我们在表决以后失败了。”⁷⁵不过，会议决定，会议的决议要到最后关头才能生效，⁷⁶这是蒙特塞尼和卡瓦列罗迫使其对手接受的一个条件，他们相信，正在前往巴塞罗那途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代表可以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晚上九点半，普列托告诉阿萨尼亚，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部长“在投票时弃权，因为他们相信，在知道谈判结果之前将推迟接管社会治安”。⁷⁷

来自巴伦西亚的使者抵达巴塞罗那之后与加泰罗尼亚的领导人一起在自治政府官呼吁停火。全国劳工联合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强烈要求他那些严阵以待的追随者不要忘记近在咫尺的阿拉贡前线，在那里，“法西斯分子随时可能发动进攻”。⁷⁸

从前的革命罢工、起义暴动和抢劫银行的组织者，如今的司法部长加西亚·奥利韦尔呼吁：“想想那种痛苦吧，想想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皮鞭统治下的那一部分西班牙领土上的反法西斯的工人兄弟听说……我们在[加泰罗尼亚]自相残杀时……所承受的精神痛苦吧。……你们都可以保持你们各自的立场……但是，即使你们受到那些对找到这场冲突的解决方案不

感兴趣的人的挑衅，你们也应当停火。……[我]宣布，今天死去的突击卫队士兵是我的兄弟。我在他们面前下跪并亲吻他们。……今天死去的[所有]人都是我的兄弟。”⁷⁹

无政府主义的消息来源证实，一些自由主义者被他们的领导人的停火呼吁激怒了。“当前往自治政府[宫]协商解决方案的我们的代表下令‘停火’时，一些同志义愤填膺，他们感到这是某种形式的背叛，让那些暗杀者[指的是在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之家附近开枪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和突击卫队士兵]逃脱了正义的惩罚。”⁸⁰

无政府主义领导人中也存在着不同意见。五月事变期间在巴塞罗那活动的国际工人协会副书记赫尔穆特·吕迪格证实：

七月十九日无政府主义的斗士们决定支持合作之后，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究竟应当把权力的缰绳“完全”抓在自己手里还是应当继续合作这个问题又被多次提出来。七月十九日的决定尽管获得一致同意，但那却是出自本能。谁也没有意识到它意味着什么。但是，在五月事变期间，尤其是在巴塞罗那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之家举行的那些争论激烈的会议上，当各方都能听到来复枪和机关枪震耳欲聋的枪声时，人们不止一次地提出来的问题是：“我们应不应当夺取政权？”在那些流血的日子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们用这一句话概括了问题。但是，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所谓的“政权”指的是什么？

让我们首先确定他们指的肯定不是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决不会把国家政权也就是作为管理机构和镇压机器的政府当做实现他们所希望的社会变革的工具。他们也不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应当是建立一个新的法西斯-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超级大国。他们坚信，社会革命既不需要资产阶级政权也不需要新的极权主义超级大国，因此，社会改革应当像捍卫革命一样由工人阶级的组织——无论是工会还是自发成立的新的机构，例如自下而上地反映了工人自己意愿的自主委员会等等——集中控制，应当建立新型的社会，从而抛弃一切自上而下行使“权力”的常规模式。

但是，由于代表加泰罗尼亚大部分产业工人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在五月三日实际上与包括社会其他阶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泰罗尼亚农村的广大群众即农夫[Rabassaires]，白领工人，技术人员等等）在内的所有组织处于公开敌对状态……“权力”的问题意味着，全国劳工联合会是不是应当立即把它们全部打败，将公共事务的管理权集中掌握在自己手里，同时建立自己必备的镇压机器以防止“失败者”在公共生活中卷土重来。回答是“不”，但是，那一段悲惨的日子作出的决定后来在西班牙和国际自由主义运动内部引起了一连串激烈的争论、诘难和斗争。⁸¹

441

星期二晚上九点半左右，停火的呼吁从自治政府宫发出后不久，来自巴伦西亚的使者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成员在孔帕尼斯的主持下开会。

“我们提出了由四方代表[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全国劳工联合会、劳动者总工会和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组成一个临时委员会[政府]的方案，曾为历届政府成员的人不得加入该委员会。”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报告说，“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解除艾瓜德和罗德里格斯·萨拉斯的职务，因为我们规定，新的内务治安专员应独立[即个人]承担管理社会治安的责任。”这个建议被接受了。但是，当全国劳工联合会建议应立即组成新政府“以使……公众舆论知道冲突已经得到解决”时，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坚决要求“首先必须停止巷战”。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努力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们认为必须争取时间以避免[中央]政府接管社会治安，然而不可能达成共识。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和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虽然没有参加辩论，但他们支持共产党人的观点。最终，在[五月五日星期三]凌晨两点，会议作出一项决定后结束。通过广播宣布的这项决定说……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应当全面停火以使局势恢复正常。……会议结束以后，我们通知[中央]政府，事情进展顺利。”⁸²

受到这一消息的鼓励，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天亮前宣布，政府已经通过了“迅速解决巴塞罗那问题的必要法令，但政府相信不必立即使它们生效，并且相信巴塞罗那将在今天恢复秩序”。⁸³徒劳的希望！“在当晚剩余的时间里，”孔帕尼斯主席在他的私人笔记中写道，“激烈的战斗继续在

街头进行，因此，内务治安[委员会]、[孔帕尼斯的]主席办公室以及[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比迭利亚要求迅速派遣援兵。”⁸⁴

星期三凌晨，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再次努力劝说其追随者平静下来。“我们利用自己的所有影响谋求平衡，不停地派代表去正在发生冲突的地方。”⁸⁵但是，他们的努力总是不太受人欢迎。“一些同志打电话给[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委员会时，”阿瓦德·德·桑蒂连回忆说，“我听到他们在电话那头愤怒地叫喊，委员会让他们不要开枪，即使他们正在受到机关枪扫射。”⁸⁶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杜鲁蒂之友会努力保持高昂的斗志并发出一些战斗命令。⁸⁷“革命进攻万岁！决不妥协！”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街垒散发的一份传单宣称，“现在是决定性的时刻。下一次就太晚了。……只有无产阶级政权能够保证军事胜利。全面武装工人阶级。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联合行动万岁。”⁸⁸“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杜鲁蒂之友会印刷的传单则要求，“枪毙罪魁祸首。解除所有军队的武装。……决不放弃街头阵地。革命先于一切。我们向在街头与我们亲如兄弟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同志们致敬。社会革命万岁！打倒反革命！”⁸⁹

第二天，《战斗报》在头版刊登了杜鲁蒂之友会的这份传单并评论说，它“确实特别重要”，“我们非常高兴地转载了它”。⁹⁰但是，除了这一谨慎的评论之外，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与杜鲁蒂之友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与杜鲁蒂之友会合作的只是那些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而不是党的执委会。“在战斗的第三天，”乔治·埃森魏因写道，“据当时人在巴塞罗那的美国托洛茨基分子雨果·奥勒说，杜鲁蒂之友会派一名代表去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部，邀请执委会共同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但是没有达成协议。”⁹¹毋庸置疑，杜鲁蒂之友会与马克思主义党派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合作。然而，据和另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例如‘莫林’（汉斯·弗罗因德）——一起与这个无政府主义团体短期密切合作过的克拉拉和保罗·塔尔曼夫妇说，这种合作充其量不过是互相为对方散发一些政治传单。绝不能认为杜鲁蒂之友会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关系是一种正式的联盟。”⁹²

虽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没有与其他组织一起通过广播呼吁停火，⁹³但它并未公开表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的和平努力与自己无关。的确，《战斗报》曾在五月四日敦促工人保持“一种长期动员的状态”并“继续加强已经发动的攻势”，但是，随后几天的报纸不再重申这一要求，因为，面对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满怀热情反复发出的停火呼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感到无能为力。

“四天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英语新闻快报《西班牙革命》写道，“工人们做好准备，枕戈待旦，只等全国劳工联合会发出发动进攻的命令。命令始终没有发出。……被工人视为革命群众组织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工人夺取政权这个问题面前退缩了。受到政府控制的它企图通过使敌对各方‘一团和气’而脚踩两只船。这就是五月三日至七日革命工人的战斗基本上是防御而不是进攻的原因。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态度并不是没有引起反对和抗议。杜鲁蒂之友会表达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广大会员的共同愿望，但它没能成为榜样。”⁹⁴

443 美国托洛茨基分子费利克斯·莫罗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据他说，这种激进的语言只是为了“对外宣传的目的”。“通常，”他说，“《西班牙革命》面对的是看不懂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西班牙语报纸的英语读者，它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行为的描述并不真实；它是一副‘左的面孔’。”“[本应身先士卒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没有公开倡议全国劳工联合会共同率领群众采取行动，而是在幕后与其地区委员会商议，⁹⁵从而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无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提出什么建议，它们均遭到拒绝，你不同意？那我们对此就没有什么好说了。第二天上午……关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向全国劳工联合会提出的建议，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怯懦行为，关于他们拒绝组织防御，等等，等等，《战斗报》只字不提。”⁹⁶

出于客观性的考虑，有必要在此引用为五月事变期间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所采取的政策进行辩护的“老者”的言论。为了反驳费利克斯·莫罗在他的《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对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指责，“老者”写道：

第四国际的革命浪漫主义者经常说，只要西班牙工人勇敢地开创一条决不妥协的革命路线，他们就不需要苏联的援助了；国际无产阶级将会自发地作出直接的反应，产生不可抗拒的效果，致使政府不敢禁止武器装备流入革命的西班牙。

费利克斯·莫罗在其分析一九三七年巴塞罗那五月事变的著作中提出了这个观点。……据我们这位作者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接受斯大林分子和资产阶级势力的挑战，从而使随后的斗争不仅在西班牙本国引发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而且成为一场世界革命的熊熊烈火的导火索，这场革命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欧洲的主要国家。也就是说，承担着坚守反法西斯第一道防线这一巨大历史责任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人们应当不畏风险，大胆地做出某种冠冕堂皇的历史姿态，鲁莽地投入可能导致反法西斯阵线瓦解的冒险行动，从而为法西斯分子长驱直入敞开大门——而这只是为了立即引发世界革命。……

让我们大家深感震惊的是，由于有人向我们保证欧洲革命在五月事变期间迫在眉睫一触即发，因此，阻止它按照费利克斯·莫罗以及另外一些革命战略家所设想的“不可避免的”发展阶段进行只不过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改良分子的堕落。

审视一下这些战略家为了描绘一场势不可挡的欧洲革命指日可待——由于五月事变所提供的历史机遇，这场革命即将爆发，但是，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令人失望地贻误了战机——的幻象所使用的夸夸其谈的逻辑推演步骤非常有趣。

莫罗先生想让我们相信，如果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工人们在五月事变期间坚持抵抗斯大林分子的进攻的话，一场势不可挡的社会革命将席卷整个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

“资产阶级—斯大林分子集团聚集一支无产阶级队伍的尝试只会加快工人政权向整个共和派控制区扩张的速度。”但是，读者会问，共产党人装备精良的警察和军队是什么，主要被斯大林分子控制的空军是什么，突击卫队、边防警察部队、国民卫队、社会党人控制的大批军队是什么，资产阶级的防区是什么，被社会党右派普列托控制的

海军是什么？他们会不战而降吗？最初与革命工人发生冲突的那些部队——其中许多专门为对付革命工人进行过训练——会瓦解吗？另外，绝大多数成员被斯大林分子严格控制的国际纵队会怎么样？

在这场新的内战中，得到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部队支持的工人很可能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但这充其量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因为，一场发生在后方的内战显然将使前线的部队士气低落，同时，部队因参加这场新的内战而撤离前线也将为法西斯分子长驱直入敞开大门。……

对形势稍微有一点了解的人都不会说……法国和英国的人民群众准备为西班牙而打仗。也不会有人像费利克斯·莫罗那样轻易地同意加泰罗尼亚的革命力量废黜资产阶级政党并且驱逐社会党人和斯大林分子，“法国资产阶级将开放它与西班牙的边境，不是为了进行干涉，而是为了进行贸易以使新政权能够保证物资供应——否则的话，将立即面临国内的革命”。为了充分地正确评价这句话的含义，人们必须记住，法国近半数的无产阶级组织在斯大林分子的控制下，其余的则被社会党人所控制。……面对法西斯军队可能突破防线的极度危险，怎么可能进行一场反对西班牙社会党人和斯大林分子的内战，怎么可能向具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法国工人开枪？为了要求[他们]本国资产阶级向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工人提供武器，法国工人甚至到了要下最后通牒的程度。当然，向资产阶级下最后通牒必定遭到（社会党和共产党）工会领导人的疯狂反对，两党工会领导人将会利用他们掌握的一切有效手段诽谤、中伤、歪曲西班牙的革命力量正在进行的这场斗争的性质。⁹⁷

在这场随着五月事变而发生的左派派系之间的争论中，不能把列昂·托洛茨基本人的看法排除在外。“如果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一九三七年五月夺取了政权，”他写道，“它将获得整个西班牙的支持。资产阶级—斯大林分子反动势力将再也不能利用存在两个政权的状况镇压加泰罗尼亚工人了。在佛朗哥占领的那些地区，不仅是工人，而且还有农民都将与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站在一边；他们将孤立法西斯军队并且开始在其内部进

行不可抗拒的分化瓦解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政府是否还会冒险向西班牙燃烧的土地上派遣军队值得怀疑。军事干涉将会变得不大可能，至少变得非常危险。”⁹⁸

关于五月事变的争论再多也不会解决对立派别之间的分歧。战斗结束一周后，设在巴黎的第四国际书记处的一份决议宣称：“由于缺乏严肃认真的革命领导，工人被出卖了。”⁹⁹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执委会六月发表声明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导机构甚至没有独立的政策：它怯懦地追随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策并且盲目地重复其失败主义口号。”¹⁰⁰另外，一名外国托洛茨基分子在内战结束之后写道：“为了捍卫七月十九日的胜利成果，被他们的组织出卖、抛弃并被交到斯大林分子恶棍手里的巴塞罗那工人在一九三七年五月进行了最后一次英勇的尝试。……某个革命政党再次拥有了一个共同发动革命运动、促使并且领导它走向胜利的极好机会。然而，当无政府主义领导人从一开始就站在街垒的另一边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参加革命活动只是为了阻止它前进。就这样，它把胜利拱手奉送给斯大林分子刽子手。”¹⁰¹

另一方面，在一场同时进行的宣传活动中，共产党人及其国内外支持者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行为的描述不尽相同。战斗刚一结束，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立即宣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托洛茨基分子”煽动了“加泰罗尼亚犯罪分子的暴动”。¹⁰²苏联《真理报》驻巴伦西亚记者的调子听起来相同，他说无政府主义工人“被托洛茨基-法西斯分子奸细欺骗了”；¹⁰³而为自由主义的伦敦《新闻记事报》撰稿的共产党人约翰·兰登-戴维斯则写道：“这不是一场无政府主义暴动。这是一场由‘托洛茨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通过其所控制的‘杜鲁蒂之友会’和自由主义青年联盟发动的未遂暴动。”¹⁰⁴宣传活动持续数月仍未减弱。一九三七年十月，为《工人日报》撰稿的美国共产党员罗伯特·迈纳把这场战斗描述成“由宁和戈尔金领导的法西斯暴动”；¹⁰⁵而法国共产党《人道报》的乔治·索里亚则在共产国际的喉舌《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文章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迫切希望尽量保持混乱状态，因为这是[它]从佛朗哥将军那里接到的命令。”他声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企图削弱人民抵抗的力量，以使加泰罗尼亚不能支援当时受到佛朗哥的德国和意

大利盟友进攻的巴斯克地区。“它进一步希望可以在国外组织反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广泛宣传。那几天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国外的反动报纸和法西斯报纸报道了加泰罗尼亚的‘一片混乱’和‘人民对苏维埃独裁的反抗’。与此同时，萨拉曼卡和萨拉戈萨的叛军广播电台日夜不停地用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一样的措辞发出命令：‘手握来复枪准备好，不惜任何代价决不放弃战斗，与兄弟们在前线并肩作战，把苏联独裁者赶出你们的国家。’”¹⁰⁶

446

共产党人对五月事变的解释被大肆宣传，以致天真的美国驻西班牙大使克劳德·鲍尔斯——内战期间他住在法国与佛朗哥占领区交界的昂代——多年以后发表了以下看法：“五月初，共和派政府[对无政府主义者]大动干戈。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由托洛茨基派共产党人组成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引起了一场危机。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佛朗哥的间谍。在工厂，他们极力主张没收私人财产，而且进行罢工以降低战争中的生产速度。”¹⁰⁷

德国驻西班牙民族主义政权大使威廉·冯·福佩尔将军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写给阿道夫·希特勒的一份备忘录（内战结束几年之后才公布）¹⁰⁸被共产党人用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分子”与佛朗哥将军有关系的证据。¹⁰⁹据福佩尔说，佛朗哥告诉他，自己的一个间谍（他显然企图声称冲突是他挑起的）已经成功地“使三四个人上街开枪”。因为引起战斗的是加泰罗尼亚共产党人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对电话局的袭击，所以，福佩尔的备忘录是一份没有什么价值的证据。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精心的伪装》一书的法文版中对它忽略不提。¹¹⁰在写给《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一封信中，¹¹¹支持西班牙共产党和胡安·内格林内战期间所奉行路线的赫伯特·R.索思沃思质问道，为什么我避而不谈“这份电报的存在”。英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罗伯特·康奎斯特对此回答道：“[索思沃思]如此明显地露出了马脚，以致当他试图重复[斯大林分子散布的]一九三七年五月的巴塞罗那叛乱是佛朗哥分子所煽动的陈腐谎言时，几乎没有人会上当受骗——即使在当时，也只有那些同样认为托洛茨基是德国

间谍的人才才会相信这一指控；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诽谤中伤实际上是为反对托洛茨基而编造的那一套谎言的重要组成部分。”¹¹²

注释：

- 1 一九三七年五月七日塞维利亚《阿贝赛报》；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萨拉曼卡《阿贝赛报》；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布尔戈斯日报》；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萨拉戈萨《阿拉贡信使报》；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格拉纳达《理想报》；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巴利亚多利德《卡斯蒂利亚北方报》；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萨拉戈萨《新闻报》；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潘普洛纳《纳瓦拉思想报》。
- 2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日《布尔戈斯日报》
- 3 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纳瓦拉思想报》。
- 4 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民族观察家》。
- 5 一九三七年五月号《意大利人民》。
- 6 实例见一九三七年五月七日《曼彻斯特卫报》；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纽约时报》；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罗马观察家报》；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巴黎《时报》；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伦敦《泰晤士报》。
- 7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苏联《真理报》。
- 8 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法国《人道报》。
- 9 一九三七年五月七日纽约《工人日报》。
- 10 一九三七年六月《第四国际》（墨西哥城）。
- 11 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巴黎《时报》。由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大使起草的这份声明的西班牙语全文，见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73—19；另外，阿拉基斯塔因对无政府工团主义报纸《工人团结报》所发表的一篇题为《西班牙驻巴黎大使攻击我们》的报道的答复，见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73/20A。
- 12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红色阵线报》。
- 13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共产主义者》。
- 14 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报告，见哈辛托·托里奥《西班牙的独立》，第308—317页；另请参阅《控制加泰罗尼亚分裂分子》，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情况通报》（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载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情况通报》。
- 15 在战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成员霍尔迪·阿克尔的采访时，阿特米奥·艾瓜德表示愿意承担袭击电话局的全部责任。他说，他亲自给罗德里格斯·萨拉斯下令而且没有通知政府，因为他是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采取行动。（这次会见的打印记录收入我的“阿克尔关于五月事变的文件”档案，现存胡佛研究所。）根据罗纳德·弗雷泽的记述，科莫雷拉的好友佩雷·里瓦“回忆说，他知道[袭击电话局的]决定，因为几天前党的执委会举行了一次会议”（罗纳德·弗雷泽，《流血的西班牙》，第377页）。考虑到艾瓜德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之间广为人知的合作关系，这两段陈述并不矛盾。
- 16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工人团结报》。
- 17 一九三七年五月四日《工人团结报》。
- 18 一九三七年五月四日《加泰罗尼亚报》。
- 19 纽约《无产阶级文化报》驻巴塞罗那记者的通讯，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二日《无产阶级文化报》。

- 20 阿尔维特·佩雷斯-巴罗在《加泰罗尼亚三十个月的集体化运动，1936—1939》一书中援引了法令的全文，见第228—236页。
- 21 科莫雷拉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六月二日《劳动报》。
- 22 路易斯·孔帕尼斯，《关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至七日发生在巴塞罗那的战斗的笔记和文件》（参阅本书第四十一章注释61）。
- 23 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133页。
- 24 见注释15；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五月四日《工人团结报》；曼努埃尔·克鲁埃利斯，《血腥的五月：巴塞罗那，1937》，第48页。一九三七年五月克鲁埃利斯是《巴塞罗那日报》的一名记者。
- 25 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声称，艾瓜德在自治政府的会议上得到了占领电话局的授权，“尽管无政府主义者表示反对”（《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三卷，第72页）。米克尔·卡米纳尔说，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拉斐尔·比迭利亚一九七九年告诉他，是孔帕尼斯主席在包括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胡安·多梅内奇在内的几名政府专员在场的情况下命令阿特米奥·艾瓜德占领电话局的，但多梅内奇警告他们注意后果（米克尔·卡米纳尔，《胡安·科莫雷拉》，第二卷，第120页和注释193）。另一方面，全国劳工联合会声称，所有政府成员事后一致认为“艾瓜德越权行事”（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关于五月事变的报告，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无产阶级文化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情况通报》（巴伦西亚）；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二日《工人团结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伊比利亚自由主义青年联盟地区委员会的报告）。此外，显然是根据塔拉德利亚斯的证言，阿萨尼亚总统说，艾瓜德没有把他的决定通知其他政府专员（《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76页）。这一点得到了治安总署秘书长何塞·科利的证实，科利还说，孔帕尼斯事先不知道袭击行动（何塞·科利和何塞·帕内，《何塞·罗维拉：为社会主义加泰罗尼亚效力的人生》，第158页）。
- 26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76页。
- 27 同上，第577页。
- 28 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报告，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无产阶级文化报》。
- 29 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二卷，第192页。塔拉德利亚斯总理的助手费利佩·乌瓦奇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告诉我，塔拉德利亚斯总理反对袭击电话局，但是，出于对孔帕尼斯主席的忠诚，他在内阁辩论时站在后者这一边。
- 30 克鲁埃利斯，《血腥的五月》，第55—56页。另请参阅他发表在一九七七年四月号《历史16》上的关于五月事变的文章。
- 31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二日《无产阶级文化报》。
- 32 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169页。
- 33 一九三七年五月四日《战斗报》。
- 34 在敌对行动停止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桑斯防务委员会释放了四百名共和国国家卫队士兵，他们是在战斗初期被俘的（见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工人团结报》）。
- 35 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西班牙革命与内战》，第144页。据阿萨尼亚总统记述：“工人阶级居住的郊区都被叛乱分子控制着。自治政府、内务部门和财政部门以及其他各个部门被包围。”（《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79页）
- 36 对阿瓦德·德·桑蒂连的采访，载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社会熔炉报》。亲身经历了五月事变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告诉我，“事变期间全国劳工联合会控制的兵营没有介入战斗”（何塞·佩拉特斯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二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37 根据坎迪多·博利瓦尔一九四〇年在墨西哥接受我的采访时所提供的证言。

- 38 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报告，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无产阶级文化报》。
- 39 巴塞罗那市长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卡洛斯·皮·苏涅尔不认为会有这种指责：“战事刚开始，孔帕尼斯就建议阿萨尼亚及其夫人搬到自治政府来。也许是担心穿过一个骚乱中的城市的街道有危险，阿萨尼亚宁愿留在议会大厦。”（卡洛斯·皮·苏涅尔，《共和国与内战：一个加泰罗尼亚政治家的回忆》，第444页）
- 40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77—578页。陪同塔拉德利亚斯冒着危险穿过巴塞罗那前往议会大厦看望阿萨尼亚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海梅·米拉维特列斯写道：“与阿萨尼亚谈话令人痛苦。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肉体和精神上垮掉的人。”（海梅·米拉维特列斯，《西班牙内战的插曲》，第148页）
- 41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78页。
- 42 胡利安·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69—70页。戈尔金对于发生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的那些事情所作的更加详细的描述，见其《“一九三七年五月会议”的记录》打印稿，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另请参阅未公布的胡安·安德拉德文件，《一九七〇一月十日在巴黎西班牙工人运动研究中心举行的发布会》和出席那次会议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成员纳西斯·莫林斯-法夫雷加所作的会议记录《巴塞罗那五月会议》打印稿（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巴塞罗那的托洛茨基分子领导人G.穆尼斯（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写道：“[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声称，他们在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地区委员会会谈时提出了非常积极的革命建议。我们相信他们无法进一步证明什么。然而，一个革命的领导机构是否出类拔萃不仅要看它所提出的革命建议，更需要看它在这些建议遭到其他革命领导人反对时为实施它们所做的努力。由于害怕与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关系破裂，当他们拒绝与群众一道前进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始终与其亦步亦趋。”（G.穆尼斯，《失败的里程碑：胜利的预兆》，第304页）
- 43 孔帕尼斯，《关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至七日发生在巴塞罗那的战斗的笔记和文件》。孔帕尼斯把通话的日期五月四日星期二记错为五月七日星期二。
- 44 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174—175页。
- 45 本章不打算对巷战作详细的描述。读者可以在下面这些报刊著作中找到第一手资料：《战斗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加泰罗尼亚报》、《每日图片报》、《消息报》、《环球新闻报》、《广告报》、《工人团结报》、《劳动报》、《最后关头》和《先驱报》（事变期间这些报纸几乎天天出报）；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克鲁埃利斯，《血腥的五月》；马塞尔·奥利维耶，《巴塞罗那血腥的日子》；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阿古斯丁·索奇，《共和派控制区后方事变的真相》。
- 46 对阿瓦德·德·桑蒂连的采访，载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社会熔炉报》。在战后根据各种资料来源编辑的一份关于五月事变的文献中，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成员霍尔迪·阿克尔说，阿瓦德·德·桑蒂连于五月四日在乘车前往自治政府宫的途中被捕，然后被带到警察署长罗德里格斯·萨拉斯的办公室，在那里，两人相互拥抱。据这份文献说，阿瓦德·德·桑蒂连有点害怕，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他对罗德里格斯·萨拉斯说，必须停止战斗，他正是为了这个建议而去自治政府宫的。然后他被允许离开前往自治政府宫，而且警察接到命令，不许向他的汽车开枪（《五月事变记录》，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值得一提的是，阿瓦德·德·桑蒂连说，他在战斗停止以后断定，“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呼吁停火是个错误。他与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和加西亚·奥利韦尔商议，认为“还有时间恢复失去的地位”。他说，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他们回答说，我们已经采取了正确的行动……因此只能等待事态的发展并且尽量适应形势。”（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138页）

- 47 阿瓦德·德·桑蒂连，《西班牙革命与内战》，第147页。
- 48 见鲁道夫·罗克《在西班牙的外国人》，第130页；另请参阅索奇《共和派控制区后方事变的真相》，第19页。
- 49 向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英语新闻快报《西班牙革命》编辑查尔斯·奥尔发表的声明（被费利克斯·莫罗在《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引述，见第100页）。
- 50 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208页。
- 51 声明的全文可以在下列书籍中看到：维克托·阿尔瓦编，《西班牙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文件集》，第155—162页；安德烈斯·宁，《西班牙革命，1930—1937》，第281—290页。
- 52 一九三七年五月四日《战斗报》。
- 53 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的E.塔马林的文章。
- 54 这一增援请求得到了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证实，他在下午三点通过电传电报进行的交谈中告诉阿萨尼亚，内政部长安赫尔·加拉尔萨收到了内务治安专员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说，形势变得更加严重，因此再次敦促他派遣大批援兵来”。这些交谈的原始磁带保存在马德里的军事历史部门。感谢何塞·克拉维里亚·普雷纳费塔向我提供了八十九页缩微胶片的拷贝。上面引述的这一段话可以在第12页上看到。这些磁带今后归档为“阿萨尼亚—普列托电传电报”。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上校在《进攻阿拉贡与登陆马略卡岛》一书中公布了其中一部分内容，见282—292页。我的缩微胶片拷贝现存胡佛研究所。
- 55 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报告，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无产阶级文化报》。加泰罗尼亚自治法令第九条对中央政府在社会治安方面的权力规定如下：“根据共和国政府的权力及其宪法职能，它可以在下列情况下……参与维持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秩序：1.应自治政府的要求。2.在其认为国家的整体利益或安全处于危险状态时自动参与。”（C.马索-埃斯科费特和R.加伊·德·蒙特利亚，《加泰罗尼亚自治法》，第66页）
- 56 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报告，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无产阶级文化报》。
- 57 同上。
- 58 人们可能还记得，一九三七年二月，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和马里亚诺·穆尼奥斯·桑切斯均被拉尔戈·卡瓦列罗任命为详细检查各支部队军官和政委工作的监察人员。
- 59 孔帕尼斯，《关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至七日发生在巴塞罗那的战斗的笔记和文件》。
- 60 同上。根据自治法令的规定，马德里政府在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负责维持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秩序。见本章注释55。
- 61 孔帕尼斯，《关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至七日发生在巴塞罗那的战斗的笔记和文件》。
- 62 见本章注释55。
- 63 阿萨尼亚—普列托电传电报，第12页。
- 64 同上。
- 65 霍尔迪·阿克爾借给我一份这份文件的副本，感谢他所作的极其严谨认真的研究。这份副本的打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当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七日西班牙共产党人在其流亡期间所办的报纸《人民西班牙》上对艾瓜德发表了一通热情洋溢的赞扬时，他们显然不知道这份文件的存在。在接受霍尔迪·阿克爾的采访时，阿特米奥·艾瓜德证实了战事进行的四天当中科莫雷拉不离孔帕尼斯左右并且可能影响了后者的决定等情况（见本章注释15）。国际工人协会驻巴塞罗那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总部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之家的代表阿古斯丁·索奇在五月事变期间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有接触，一九五〇年在圣迭戈接受我的采访时，他证实了科莫雷拉在战事进行期间对孔帕尼斯的影响。这次采访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 66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风中话语》，第203页。

- 67 阿萨尼亚—普列托电传电报，第3页。
- 68 同上，第11页。
- 69 同上，第20—29页。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在一九四〇年告诉我，普列托命令他动身前往位于雷乌斯的加泰罗尼亚空军基地，随同前往的有一个负责保卫基地的地面部队分遣队，还有两个轰炸机中队和两个战斗机中队，“因为镇压该地区叛乱分子的行动无论如何必须成功”（我对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采访，采访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 70 一九四〇年在墨西哥，莫拉告诉我这个情况。她在海军和空军部看到了那些电报。我无从判断她提到的是四十年后引起我注意的阿萨尼亚—普列托电传电报，还是阿萨尼亚发来的其他电传电报。阿萨尼亚—普列托电传电报所记录的第一次求助呼吁发生在五月四日星期二上午九点。在发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国防部副部长的一封信中，阿萨尼亚说：“我希望政府直接从我这里了解形势，我认为，无论是对于社会秩序还是对于我的处境来说，形势均岌岌可危，除了几十名只有来复枪的士兵之外，对我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我希望有人把政府对这些情况的看法告诉我。”（阿萨尼亚—普列托电传电报，第1—2页）
- 71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80页。
- 72 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先驱报》。
- 73 索奇，《共和派控制区后方事变的真相》，第19页。
- 74 一九三七年五月四日《红色阵线报》。
- 75 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报告，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无产阶级文化报》。
- 76 同上。
- 77 阿萨尼亚—普列托电传电报，第20页。
- 78 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工人团结报》。
- 79 同上。
- 80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二日《无产阶级文化报》。
- 81 赫尔穆特·吕迪格，《西班牙革命评论文集》，第23—24页。
- 82 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报告，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无产阶级文化报》。
- 83 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巴伦西亚呼声报》。
- 84 孔帕尼斯，《关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至七日发生在巴塞罗那的战斗的笔记和文件》。
- 85 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声明，载一九三七年五月七日《社会熔炉报》。
- 86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社会熔炉报》。
- 87 托洛茨基分子克拉拉和保罗·塔尔曼夫妇描述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小组最活跃的成员之一莫林在“一整夜的讨论中”努力劝说杜鲁蒂之友会副干事海梅·巴柳斯放弃其“固有的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并与托洛茨基分子合作的情况，见克拉拉·塔尔曼和保罗·塔尔曼的《争取自由的革命》，第189—190页。
- 88 见一九三七年七月第四国际国际局的《信息公报》。另请参阅弗兰克·明茨和米格尔·佩西尼亚的《杜鲁蒂之友会，托洛茨基分子和五月事变》，第41—42页。
- 89 转载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战斗报》。另请参阅芬纳·布罗克韦《巴塞罗那的真相》，第10页；莫罗，《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第82页；明茨和佩西尼亚，《杜鲁蒂之友会，托洛茨基分子和五月事变》，第49页；穆尼斯，《失败的里程碑》，第305页；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207页；保罗·夏基，《杜鲁蒂之友会年表》，第13页。
- 90 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战斗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劳动报》刊登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对《战斗报》的指责。
- 91 见雨果·奥勒《巴塞罗那的街垒》，第10页。奥勒是美国革命工人联盟的全国书记。
- 92 感谢埃森魏因允许我使用这一段从他的个人研究中摘录的内容。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三日《工人斗争报》发表的一篇访谈录中，（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领导人）穆尼斯谈到杜鲁

蒂之友会：“这个革命青年工人的团体代表了无政府主义向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的初始阶段。他们已经开始用工人民主选举产生的‘革命委员会’（苏维埃）作为具体的无产阶级政权取代自由共产主义理论。”不过，穆尼斯在接受采访时也批评杜鲁蒂之友会“缺乏鲜明的政治立场”。

- 93 当时的报纸没有任何关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通过广播呼吁停火的报道。
- 94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九日《西班牙革命》。
- 95 这应该指的是五月三日晚上举行的会谈。
- 96 莫罗，《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第94页及脚注。一九三七年六月十日的托派报纸《工人斗争报》发表了长篇文章指责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在五月事变期间没有试图夺取政权。在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中可以看到这篇文章的副本以及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成员霍尔迪·阿克爾对其逐字逐句的反驳（“《工人斗争报》与霍尔迪·阿克爾”档案）。阿克爾的反驳是他一九五〇年写给我的一封信的部分内容。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六月第四国际国际局的《信息公报》所发表的洛伊丝·奥尔的文章。
- 97 一九三九年二月号《先驱》。
- 98 列昂·托洛茨基，《西班牙革命，1930—1940》，第425页。另请参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领导人）穆尼斯《失败的里程碑》，第301页。关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批评，见胡安·安德拉德文件《一九七〇一月十日在巴黎西班牙工人运动研究中心举行的发布会》（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99 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第四国际》。
- 100 一九三七年六月《第四国际信息新闻局》。另请参阅穆尼斯在《失败的里程碑》中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五月事变期间的所作所为的尖锐批评，见第303—304页。
- 101 一九三九年三月中旬《我们的话》。
- 102 何塞·迪亚斯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发表的演说，见何塞·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432页。本书在第四十四章的开头部分将更多地引述这篇演说。
- 103 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苏联《真理报》。
- 104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日《新闻记事报》。另请参阅兰登-戴维斯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号《劳动月刊》上的文章。当时是一名共产党员的阿瑟·凯斯特勒证实，兰登-戴维斯还是共产党的前方组织西班牙救援委员会的成员和书记，该委员会“像通常一样由不受怀疑的著名人士组成——菲利普·诺埃尔-贝克，法林登勋爵，埃莉诺·拉思伯恩，特伦特教授等”（阿瑟·凯斯特勒，《看不见的文字》，第394页）。人们感兴趣地注意到，《新闻记事报》在西班牙进行采访的工作人员中有三名共产党员：阿瑟·凯斯特勒，兰登-戴维斯和威廉·福里斯特，后者以前曾在西班牙代表比弗布鲁克勋爵的《每日快报》（一九八二年一月二日至八日《星期日泰晤士报》）。关于福里斯特的政治身份，见凯斯特勒，《看不见的文字》，第409页。
- 105 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工人日报》。
- 106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国际新闻通讯》。四十年后，闭口不谈自己在散布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是佛朗哥的间谍这一罪名的过程中所起重要作用（见其一九三八年出版的小册子《为佛朗哥效劳的托洛茨基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背叛行为的记述》）的索里亚说，这一罪名是“捏造的”，是“构成后来所说的‘斯大林主义’最肮脏的阴暗面的那种整人手段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展运用。……另一方面，尽管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既不是佛朗哥的间谍，也不是盖世太保的间谍，但是，无论其主观愿望如何，他们与人民阵线的不懈斗争确实帮了首领[佛朗哥将军]的忙”（乔治·索里亚，《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三卷，第79页）。这部使用了大量插图的五卷本著作充满了对事实的歪曲，除了把某些令人不快的事件归因于“斯大林主义”之外，它严格遵循内战期间西

班牙共产党奉行的路线。不过，索里亚声称，这部著作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他在接受《历史时期》（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号）的采访时说：“二十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我非常要好的朋友皮埃尔·维拉尔从头到尾读了我的书之后向我致以崇高的敬意并且同意他的名字出现在书中。……就像我与皮埃尔·维拉尔在一起时感到非常高兴一样，我与特别勇敢的人在一起时同样感到非常高兴，例如[赫伯特·R.]索思沃思和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在一篇同时提到索里亚的书和拙著《精心的伪装》法文增订版的书评中，索思沃思写道：“[索里亚所著]第一部共产党人全面记述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著作在法国出版多年了，它肯定值得一读而不只是随便翻翻。它比几年前在苏联出版的那部由以伊巴露丽女士为首的党组织编撰的著作[《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写得好。索里亚对社会革命和五月事变的处理比莫斯科的团队更精巧，但是，不出所料，他得出了与博洛滕相反的结论。”（一九七八年六月九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九日，苏联塔斯社报道说，时任巴黎文学艺术交流机构负责人的索里亚被苏联政府授予国家友谊勋章（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真理报》）。

- 107 克劳德·鲍尔斯，《我赴西班牙的使命》，第356页。
- 108 《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二卷，第284—286页。
- 109 实例见多洛蕾丝·伊巴露丽《唯一的道路》，第366—367页；另请参阅《西班牙共产党史》，第162—163页。
- 110 《西班牙革命》（伊比利亚斗牛场出版社，巴黎）。
- 111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三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 112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五月事变（二）

五月五日，星期三，继续进行的激烈战斗使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早早地来到自治政府宫。“射击在继续。”巴伦西亚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喉舌《社会熔炉报》写道，“巴塞罗那的街头在流血。我们的后方土崩瓦解的危险一小时一小时地增加着。”¹

“随着上午时间的推移，”《工人团结报》报道说，“战斗在城市的各个地区继续进行，而且在加泰罗尼亚广场[电话局位于该广场]、克拉丽丝大街、莱埃塔那大街[已更名为杜鲁蒂大街，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之家与治安总署在这条大街上令人不舒服地紧挨着]全面打响，在自治政府宫和四月十四日林荫大道附近，受伤的人越来越多。……在一些地方，……被认为是奸细的人成群结队，……他们开枪射击并逮捕平民，抢走平民的工会会员证。……这些奸细最恶劣的行为之一……[是从屋顶上狙击路人]以使恐慌在那些基本上平静的地区蔓延。”²

来到自治政府宫后，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坚决主张应当抓紧时间组成新政府。他们意识到，卡瓦列罗与对手的抗衡坚持不了太长时间，因此，如果不能通过调停解决问题，他将被迫采取前一天他同意采取的措施。“上午十一点半会议休会时，我们的努力还没有效果。”全国劳工联

合会全国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报告说，“……我们再次开会以后，在三小时的时间里，共产党人……坚持认为不应组成[新政府]。得知中央政府已经决定接管社会治安和防务时，³我们[还]在进行商议。……我们明显发现，所有人都以隐而不露的满意心情欢迎中央政府的决定。”⁴

有必要在这里插入一段具有纠偏作用的议论。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指责“所有人都欢迎中央政府”接管加泰罗尼亚地区社会治安的“决定”，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与只是派遣增援部队——就像艾瓜德在战斗开始时所要求的那样——相比，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或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更喜欢这种直接导致加泰罗尼亚失去自治权的极端措施。当然，事实应该是，迫于中央政府的压力和对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恐惧，孔帕尼斯主席宁愿牺牲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自治也不愿冒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控制该地区的风险，但是，这并不表明他欢迎中央政府的决定。同为事实的还有，根据前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委会成员、胡安·科莫雷拉的好友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战后提供的可靠证言，科莫雷拉对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据塞拉·帕米埃斯说，这些领导人“心慌意乱”，“不知所措”并且“认为大势已去”——说，他们应当坚持战斗，直到巴伦西亚的增援部队前来镇压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为止，⁵但是并不确定这位强硬的政客实际上宁愿牺牲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自治。相反，本质上拥护中央集权的西班牙共产党人并不考虑加泰罗尼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竭力敦促中央政府接管加泰罗尼亚的社会治安。

448

当组成一个新政府的谈判仍在自治政府宫进行时，普列托与阿萨尼亚用电传电报进行了下面的交谈：

普列托：十一点召开内阁会议听取加西亚·奥利韦尔[他已返回巴伦西亚]的汇报。无论他可能报告什么情况——我估计他会淡化局势的严重性——我都将捍卫关于社会治安的法令并坚决要求使其生效。……我不认为阁下应当留在那里。……政府迫切希望您转移到巴伦西亚。

阿萨尼亚：我非常怀疑“勒班陀”号舰长[他受权指挥普列托派

去转移总统的两艘驱逐舰]能够到达我这里，因为所有进入港口的通道都被封锁了。飞机仍然没有出现，局势也没有什么变化。枪声彻夜响个不停。已经证实叛乱分子在帕拉莱洛一个被共和国国家卫队占领的电影院前面部署了大炮。……昨天晚上，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人通过广播告诉他们前线的同志，做好准备在他们需要援助时向巴塞罗那进军。……我转移到巴伦西亚的主意不错，但是肯定无法实现。这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可能走出我的住处的围栏。到处都有人用机关枪和来复枪射击，手榴弹也在不停地爆炸。自从星期一下午以来，我一直是这种处境。就此我必须告诉你，这个问题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这是一次无政府主义叛乱，尽管我不必向你指出它的严重后果和恶劣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使国家元首不能自由行动从而无法履行他的职责。第一个问题本身就很严重，因此要求尽快作出有力的决定。第二个问题增加了第一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可能产生无法预测的后果。从星期一下午开始，……我一直在等待我有理由期待的情况出现，即，政府集中充分的强制性力量控制局面并将共和国总统从他的困境中解放出来。……所有这些因素促使我通知你，我不能容忍政府在采取决定性措施解决这些问题方面继续拖延。由于共和国总统无法凭借保护他的六十个装备低劣的士兵亲自镇压叛乱，他将不得不亲自解决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你具有的政治智慧和敏感足以意识到，无论是我个人的颜面还是我的职位的尊严，或是这种形势正在全世界引起的流言蜚语，都不能允许国家元首在目前的困境中再待一天。……等会儿我将争取与议会议长[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如果阿萨尼亚辞职他将继任总统]取得联系，由于他担任的重要职务，我认为我应当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向他作一个正式而且准确的描述。⁶

普列托：[我]对失去的时间感到遗憾。我认为，政府的基本职责是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国家元首的绝对行动自由。至于反叛的部队从前线回来加入叛乱分子的队伍，我保证，除非他们夜间行动，否则他们不可能得逞。……我不认为没有办法使共和国总统获得自由。这只是一个决心问题。我们拥有足够的手段。我劝阁下冷静几个小时。我马上去参加内阁会议，我将让您知道发生的事情。

阿萨尼亚辞职的威胁对普列托并非没有产生作用，毫无疑问，他立即把它告诉了内阁。显然，它对拉尔戈·卡瓦列罗同样产生了作用，因为普列托回来以后说：“内阁会议开了不到六分钟。……总理说，因为兹事责任重大，不能继续拖延了。他建议，在《[共和国]官方公报》的特刊上颁布昨天通过的法令，然后，国防部长、内政部长和海军部长采取必要的措施恢复秩序。”

总统似乎对这种安抚性的保证并不满意，因此，他再次向普列托发出了辞职的威胁：“局势正在继续恶化。正如我[对你]说过的那样，‘勒班陀’号的舰长仍然到不了我的住处。……实际上，自从星期一下午以来，共和国总统失去了履行职责需要的自由。由于我已向海军部长[普列托]说明了原因，我只须提醒他们注意，以防事态迫使我做出无法改变的決定。政府只有立即采取不可抗拒的行动，才能避免这种情况。”⁷

在内战期间阿萨尼亚所发出的几次辞职威胁中，主要由于普列托的努力而化解的只有这一次，尽管他鄙视总统的胆小怯懦，但仍看重其在宪法层面掩饰革命的作用。这不是普列托第一次见证阿萨尼亚的胆小怯懦。一九三六年十月，当时由于首都受到愈益严重的威胁，总统一直强烈要求政府撤离马德里，他问普列托：“难道政府想让法西斯分子在这儿抓住我？”被阿萨尼亚急于离开的慌乱以及对自身安全的担忧所激怒，普列托对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说：“那个胆怯的小白脸表现得像个歇斯底里的妓女。”⁸作为共和国公认的最雄辩的演说家之一，普列托还有喜欢在私下谈话里使用污言秽语的名声。

“普列托非常警觉，严重关切[巴塞罗那发生的事情]。”阿萨尼亚在日记中写道，“他尽一切力量帮助我，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不大了解形势。证据是，就在今天上午他还告诉我，在政府看来，我动身前往巴伦西亚是明智的做法。……‘问题不是我不愿意去巴伦西亚，’我说，‘而是我到不了大街上。’马丁内斯·巴里奥去电报室收看电视电报。他得到了某种印象，以致不等谈话结束便匆忙去见卡瓦列罗。很快他就回来说，政府正在做这做那，而我应当保持镇静。我作了相应的回答，然后不再继续讨论。”⁹

根据普列托与阿萨尼亚晚上八点的电传电报提供的信息，此时拉尔戈·卡瓦列罗显然决定，他不能再承担拖延的后果了：“总理通知我，他会见了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他们前来要求他既不要派遣援兵也不要动用军队。”卡瓦列罗明确拒绝接受这些要求并且告诉他的客人，他们应当让他们的同志明白，“认为他们能够战胜政府是愚蠢的，因为他们将遭到镇压”。¹⁰

时间已经到了中午，普列托发给阿萨尼亚的电传电报中提到的那次短暂的内阁会议一结束，政府立即向新闻界发表声明，颁布前一天通过的接管加泰罗尼亚社会治安和军事事务的法令，¹¹但是仍然没有使其立即生效。共和国国家卫队的安东尼奥·埃斯科瓦尔上校被任命为社会治安代表，同时任命我们知道已经投靠了共产党的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担任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军事指挥官，正式职务是第四军区司令，并且指挥在邻近的阿拉贡前线——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那里占据优势——作战的所谓东路军。这些任命剥夺了加泰罗尼亚防务委员会和内务治安委员会的权力，并与这些权力一道，剥夺了该地区宝贵的自治权。

451 尽管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指责巴伦西亚当局没有立即响应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增援的要求并将它的拖延斥为逼迫加泰罗尼亚放弃自治权的“花招”，¹²但是，当时没有任何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提出抗议。实际上，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公告的语气表明，孔帕尼斯主席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其他领导人如释重负地接受了巴伦西亚当局的决定，他们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担忧一时超过了他们对地区自治的忠诚。“共和国政府主动接管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治安。”公告声称，“由于拥有自治政府无法企及的资源优势，共和国政府能够对付目前出现的危急局面。没有时间对此予以置评。如果我们希望为反法西斯战争出力的话，我们可以奉献而且将会奉献的只有与共和国政府合作的忠诚和决心。共和国万岁！……我们强烈要求大家，放下手中的武器，结束街头的混乱。”¹³

当然，像塔拉德利亚斯一样，孔帕尼斯更愿意逐步削弱无政府主义者的权力而不影响加泰罗尼亚自治，可是，一旦战斗爆发并且求援遭到拒绝，他只能毫无异议地同意巴伦西亚当局接管社会治安的决定。尽管他在

关于五月事变的笔记中承认迅速着手平息边境地区的战事是中央政府的“任务”，但是仍然对其接管社会治安表示了温和的反对。¹⁴孔帕尼斯担心自己将在历史面前承担放弃加泰罗尼亚自治权的责任，被随后几个月变成一种梦魇的这一担忧所困扰，¹⁵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力量瓦解后，他多次试图收回社会治安管理权，但是一直没有成功。¹⁶

在五月事变之前，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对孔帕尼斯的信任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他的所有言论和行动中，”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写道，“只有一种态度，一种与我们差不多完全相同的道德精神目的。几乎没有什么共和派人士如此正确地认识到七月十九日造成的形势，几乎没有人如此清晰有力地表示支持工人控制的新的社会制度。……五月事变突然使他以一种不同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从那时起，我们开始对主席过去行为的诚意产生怀疑。他是否参与挑起了流血事件？……当我们采取一切手段努力结束兄弟相残的流血时，自从七月的日子以来，我们第一次失去了孔帕尼斯的支持。……假如孔帕尼斯在五月的挑衅以及随后对自治区的入侵中扮演了同谋或者傀儡的角色，他应当向在非常困难的时期支持他的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作出解释。”¹⁷

根据全国劳工联合会星期二晚上提出的建议，一个临时政府终于在星期三组成了，它包括四名成员：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卡洛斯·马蒂·费塞德，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委员会书记巴莱里奥·马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总书记安东尼奥·塞赛和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的华金·波乌。虽然中央政府接管社会治安自动解决了解除阿特米奥·艾瓜德内务治安专员职务的问题，但是，罗德里格斯·萨拉斯继续负责治安总署，直到巴伦西亚当局任命的社会治安代表安东尼奥·埃斯科瓦尔到达为止。

新的呼吁立即通过广播从自治政府宫发出了。全国劳工联合会书记马利亚诺·巴斯克斯再次恳求工人离开街头。“我们告诉你们，这种局面必须结束。……我们又希望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背这个黑锅。……面对横陈街头的尸体，现在不是讨论谁对谁错的时候。最最重要的是，你们带上武器从街头消失。……我们不要等着别人这样做。我们自己必须这样做。然

后我们可以讨论。当我们再次开会讨论我们的行为时，如果你们认定我们应当被枪毙，那么，你们可以向我们开枪，但是，现在你们必须响应我们的号召。”¹⁸然而，巴斯克斯洪亮的声音说服不了被激怒的普通工人，战斗继续在巴塞罗那以及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些城镇和乡村激烈进行，例如塔拉戈纳、托尔托萨和新莫拉，在这些地方，作为对首都传来的消息的反应，潜在的敌意公开化。¹⁹

与此同时，阿拉贡前线的民兵中间出现了恐慌，一些民兵准备立即开赴巴塞罗那。传来的消息零零星星，而且有时相互矛盾。据一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消息提供者说，第二十九师的军官和政治委员分成了两派，一些人赞成带领部队去巴塞罗那，另一些人赞成向党请示。接着收到消息说，在位于通往巴塞罗那的交通要道上的莱里达，部队已经包围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地方总部。带着一个突击营的部分士兵，师长何塞·罗维拉前往（距莱里达二十六英里的）比内法尔。在那里，他发现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第一百二十七混成旅旅长马克西莫·弗朗哥正要率领一百名士兵出发前往巴塞罗那。两人决定一起去莱里达与地方和军队的领导人谈判。谈判达成一个妥协方案：民兵返回前线，围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总部外面的部队撤退。²⁰在一段多少有些不同的描述中，胡利安·戈尔金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派使者从巴塞罗那带去了要求民兵返回前线的命令，民兵“以绝对的纪律性”服从了这些命令。²¹在全国劳工联合会方面，阿瓦德·德·桑蒂连证实，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自治政府防务副专员胡安·曼努埃尔·莫利纳“竭尽全力”设法阻止“一大批乘坐汽车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去巴塞罗那。“我们通知[莫利纳]把军区司令的职务和我们的民兵的指挥权交给[刚刚被任命为第四军区司令的]波萨斯将军。”²²我们不能指望我们组织的领导人采取任何对抗巴伦西亚当局法令的决定性行动。”²³（自由主义运动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所作的这种多少有点含糊不清的表态目的显然是把决定向巴伦西亚当局交出控制权的责任推给其他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因为没有客观公正的证据表明，他本人当时反对他们这样做。）至于共产党人对部队离开前线的描述，热情之花说，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两个营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一个营在前

往巴塞罗那途中受到担任阿拉贡前线空军部队指挥官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阿方索·雷耶斯的阻止，他威胁说要轰炸“逃兵”，除非他们返回前线。“这几个营的士兵返回了他们的部队，”伊巴露丽证实，“只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人到达巴塞罗那。”²⁴

在巴伦西亚，星期三下午早些时候，政府颁布接管加泰罗尼亚军事事务和社会治安的法令几小时后，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发表了下面这篇社论：

在加泰罗尼亚煽动骚乱的那些人不是我们的兄弟。……他们既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社会党人、共产党人或共和派人士，他们不是任何一类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是我们的凶恶敌人。他们是没有理想、没有良心、为侵略者卖命的人。……对于那些被法西斯分子所驱使的人，我们能有什么怜悯？他们企图在后方制造混乱局面，这种局面可能破坏我军的抵抗并帮助外国干涉者。对于杀害我们的工人和士兵、杀害那些以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保护人民的人的刽子手，我们能有什么怜悯？没有，什么怜悯也没有。……

453

不应当有片刻的犹豫。政府已经接管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治安。……那些挑起[冲突]的人应当承担造成的后果。但是，法令不可能只是一纸空文。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 and 无情的力量立即采取行动。在彻底清理加泰罗尼亚的环境之前，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无论跳出来与人民作对的是谁，无论血腥残忍地与敌人勾结的是谁，都应当让他感受一下民意的力量。在加泰罗尼亚完全恢复秩序之前，在所有正直诚实的反法西斯人士为赢得战争并推动人民革命向前发展而重新开始工作和战斗之前，为了不再浪费一天时间，必须采取一切行动，是的，一切行动。²⁵

与此同时，在巴塞罗那，战斗继续进行。三起严重的事件促使政治气氛进一步恶化：刚刚代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劳动者总工会出任临时政府成员的安东尼奥·塞赛在前往自治政府宫时遭到枪击遇害。²⁶尽管出现各种各样的指控，谁应当对此负责却始终不得而知。“据说有人从[全国

劳工联合会]公共娱乐业工会向他开枪，”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宣称，“[但]随后证明，夺去他性命的子弹不是从公共娱乐业工会的楼房里射出的。”²⁷共产党人指责说，他是被“为法西斯卖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挑衅者”暗杀的，²⁸而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代言人阿古斯丁·索奇则声称，子弹是“从塞赛自己党内的同志所占据的街垒射出的”。²⁹同一天，刚被任命为社会治安代表的埃斯科瓦尔上校在到达巴塞罗那履新时遭到枪击身负重伤。³⁰结果，巴伦西亚当局任命阿尔韦托·阿兰多中校为新的社会治安代表。³¹接着，在星期三夜间至星期四凌晨的某个时候，著名的意大利知识分子、活跃的无政府主义者卡米洛·贝尔内里与他的同胞和同事弗朗切斯科·巴尔别里被几个无名刺客谋杀了。³²

454

到这时为止，从巴伦西亚抵达巴塞罗那的唯一一支武装力量是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派遣的乘坐“勒班陀”号和“桑切斯·巴尔凯特吉”号驱逐舰前来转移总统的海军部队，但是，他们无法到达加泰罗尼亚议会大厦。³³根据阿萨尼亚的日记判断，总统因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漠不关心”和“傲慢无礼”而狂躁不安，大发雷霆，并且害怕“不公平地惨死在巴塞罗那”。³⁴尽管他在《贝尼卡洛的晚会》中声称，在四天的战事期间，他通过口授最后一部分文稿转移自己的注意力，³⁵但是几乎可以肯定，他生活在被杀死的恐惧中。他知道，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不会忘记一九三三年一月卡萨斯·别哈斯村暴动期间对无政府主义农民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因此，尽管指控他作为国防部长曾经给突击卫队和国民卫队下达过不要伤员和俘虏，“向他们的腹部开枪”的命令³⁶缺乏证据，他仍然由于这一未经证实的指控受到憎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也不会忘记，一九三二年他们在略夫雷加特河上游的矿区起义时，据阿萨尼亚本人向议会作证说，他命令指挥第四军区的将军，“从他的部队到达现场开始，十五分钟之内平息[暴乱]”。³⁷因此，阿萨尼亚有充分的理由感到焦虑。

五月六日星期四上午，当战斗暂时停止时，“勒班陀”号舰长带着五六名海军士兵出现在议会大厦。³⁸阿萨尼亚认为，任何离开的尝试都是蛮干。“普列托不停地催促我利用十分钟的平静去港口。”³⁹可是，他的建议似乎对总统不起作用。“普列托脸上露出了一丝怀疑的微笑。”普列托的好友、后来担任内政部长的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写道，“他确信，稍

微有点勇气就能成功地实现他的建议，撤退到海上是最佳选择。加泰罗尼亚议会大厦距离港口非常近，乘车四分钟就到了。但是，曼努埃尔先生宁可担惊受怕地度过四天，也不愿意下定决心四分钟。”⁴⁰最终，据阿萨尼亚说，与普列托再次交流之后，“时间更加紧迫了，交谈中他流露出我犹豫不前也许是害怕冒险的想法，我决定离开”。不过，就在他正要离开议会大厦时，阿萨尼亚说，战斗重新开始了，而且“比之前打得更激烈”，迫使他不得不到第二天才动身前往巴伦西亚。⁴¹

与此同时，从星期三进行的激烈战斗来看，停火建议显然没有得到普通会员的一致同意。“战斗已经进行了三天，”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总部国外信息部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索奇写道，“仍然没有和平的迹象。……下午五点左右，全国劳工联合会地区委员会提出以下建议：‘停止敌对行动。所有党派原地不动。要求警察和与其并肩作战的平民同意休战！’”⁴²但是，没有人理睬这些建议。

杜鲁蒂之友会印刷了一份新的传单，其中包括下列要求：“成立革命委员会”、“枪毙那些攻击工人阶级的罪犯”、“解除武装[警察]部队的武装”。从五月事变之后发表在杜鲁蒂之友会的喉舌《人民之友》上的一篇文章看，传单似乎准确地表达了该团体的主要要求。这篇文章批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出版的一本题为《巴塞罗那事件》的小册子“不严肃”，同时指责它关于杜鲁蒂之友会的传单宣称一个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而且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应邀加入其中的说法“缺乏资料证据”。⁴³不管怎样，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地区委员会将杜鲁蒂之友会斥为奸细，并且宣称它这份传单“令人完全无法容忍而且有悖于自由主义运动的政策。……大家必须响应地区委员会的号召。现在，自治政府行政委员会已经组成，因为每个人在委员会中都有代表，所以大家必须服从它的决定。必须从街头将所有武器撤走”。⁴⁴

杜鲁蒂之友会立即通过在街垒传递散发一份宣言对这一指责作出回应：“我们早就知道，这些委员会只能妨碍无产阶级向前进。……我们杜鲁蒂之友会有充分的道德理由与那些以无能和怯懦背叛了工人和革命的人断绝关系。……他们的背叛行为极其严重。无产阶级两个最重要的保障——内务治安和防务的控制权——已被轻而易举地交给了敌人。……不

是打算迅速勇敢地发动进攻，而是一点一点地把时间和弹药浪费掉。始终缺乏智慧，没有方向。……同志们！保持战斗的状态！不要软弱！社会革命万岁！”⁴⁵

“对困难重重的工人更加可怕的打击是，”前面引述过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托洛茨基分子费利克斯·莫罗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地区委员会向整个新闻界……谴责杜鲁蒂之友会是奸细。……面对这种恶毒的诽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报纸并没有为无政府主义左派进行辩护。”⁴⁶实际上，杜鲁蒂之友会散发的那份热情赞扬了“在街头与我们亲如兄弟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同志们”的传单肯定让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感到局促不安，更何况，把事件的全部责任推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身上的谣言到处流传。“我隐隐约约地预感到，”乔治·奥威尔写道，“战斗结束以后全部责任将被栽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头上，它是最弱小的政党，所以是最合适的替罪羊。”⁴⁷

星期三晚上八点半左右，临时政府呼吁加泰罗尼亚全体工人和人民放下武器，“忘记积怨和仇恨”。⁴⁸它还发出了另一些呼吁。“不要听信挑衅者，不要听信想让战斗继续进行下去的托洛茨基分子。”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宣称，“让我们团结在自治政府的周围。”⁴⁹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米格尔·巴尔德斯敦促道：“巴塞罗那的工人们，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同志们，我们一刻也不能再浪费我们的精力了。我们必须消灭托洛茨基犯罪分子，他们还在报纸上继续煽动加泰罗尼亚的反法西斯力量自相残杀。”⁵⁰

456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工人团结报》负责人哈辛托·托里奥也发出了呼吁。关于“集体疯狂的浪潮”——它正在毁灭革命前十个月的所有成果——以及“国际无产阶级的希望”，他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同志们，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同志们，突击卫队和国家卫队的同志们，这种行为令人难以置信；它是卑鄙的行为，我们大家因为它而感到耻辱。……在巴塞罗那，工人正在自相残杀。……正在使最理智的人变成疯子的这种疯狂状态必须结束。……只要想一想前线近在咫尺。只要想一想万一听说了这场大屠杀，前线可能士气低落。……警察部队的同志们，回到你们的营房吧！全国劳

工联合会的同志们，回到你们的工会吧！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同志们，回到你们的中心吧！让和平回来吧！”⁵¹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敦促工人回去工作的联合呼吁彻夜广播。“必须恢复正常状态。当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反法西斯战争时，让目前这种工业停产状态继续下去等于与我们共同的敌人相勾结。”⁵²

作为这些呼吁的结果，战斗在五月六日星期四早晨停止了。因其领导人的态度而陷入迷茫，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热情开始低落，许多人放弃了街垒。但是，随着上午时间的推移，战斗再次爆发。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说：

运输工会安排人们回去工作。但是，由于线路遭到破坏，在有轨电车可以开出车站之前先派出了修理车。上午，修理车不得不返回，因为有人向它们射击。……地铁被迫停止运行，因为在一些进站口，共产党的警察和加泰罗尼亚国家党成员拦住了乘客。……在一些地方，大量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会员证被撕毁。在另一些地方，我们的同志受到攻击。我们的地方工会被包围。……下午，情况比之前更严重。同志们准备不顾后果自己动手解决问题。[但是]尽管多次受到挑衅……我们不能盲目地进行最后的决战。[显然]我们已经帮助了敌人。他们希望我们走上街头；他们希望[中央]政府接管社会治安。……我们非常了解那些同志的悲剧，他们受到挑衅，走投无路；他们眼看着自己的同志和朋友倒下。不过，最重要的是，必须防止七月十九日以来西班牙无产阶级所进行的全部奋斗突然化为乌有。⁵³

感到继续抵抗不起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指示其追随者离开街垒并且尽可能乐观地描述了形势。“考虑到反革命阴谋实际上已经被挫败，”五月六日星期四上午，党的执委会在《战斗报》上发表的一份声明宣称，“工人应当撤出战斗并在今天回去工作，没有失败，没有惩罚，继续为尽快打败法西斯积极地劳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命令它的武装民兵撤离街垒，撤出街头，恢复工作，但要保持警惕性。”《战斗报》同时宣称，无产阶级已经“取得了重要的局部胜利。……它粉碎了反革命的挑

衅。它使那些对挑衅负有直接责任的人被撤职。它给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如果在加泰罗尼亚占据支配地位的工人阶级组织的领导人像工人一样善于对付困难的局面，它能达到更多的目的，非常多。根据他们的领导人反复发出的命令，群众已经开始撤出战斗，从而显示出服从纪律的伟大精神。不过，无产阶级应当保持警惕性。它应当加强警戒，荷枪实弹。它应当监视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者的活动，准备挫败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在战斗结束之后的五月十三日，《战斗报》又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的一项长篇决议，摘要如下：“由于在街头战斗的工人没有具体的目标和可以信赖的领导人，为了避免一场可能蜕变为‘暴动’的铤而走险并且防止无产阶级最先进的部分成员全体陷入灭顶之灾，……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除了组织并且指挥一次战略退却之外别无选择。‘五月的日子’的经验清楚地表明，当前问题唯一先进的解决办法在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因此，必须通过联合一切准备为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而战的组织组成一个革命工人阵线协调工人群众的革命行动。只有通过前线的军事胜利和后方的革命胜利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中央委员会认为党在事变期间采取的对策十分正确，因此，中央委员会完全赞同执委会的路线，相信它维护了革命和广大工人群众的利益。”⁵⁴

五月六日星期四晚上，一千五百名突击卫队士兵已经到达巴塞罗那以南一百九十公里处的托尔托萨郊外的消息传到了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之家。前一天到达协助结束战事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卫生部长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和全国劳工联合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两人急忙赶到自治政府宫与巴伦西亚联系。他们不无理由地担心，开赴巴塞罗那途中的突击卫队可能在其所经过的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社区引起反抗。恳求巴斯克斯和蒙特塞尼为突击卫队顺利通过加泰罗尼亚打通道路并在援兵到达之前使充满火药味的巴塞罗那恢复和平的任务落在了此时回到巴伦西亚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司法部长加西亚·奥利韦尔和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内政部长安赫尔·加拉尔萨身上。通过电传电报为结束战事而进行的这次秘密磋商成为孔帕尼斯关于五月事变的笔记和文件的一部分，⁵⁵下面复录了其中的主要内容：

[加西亚·奥利韦尔]: 这里是巴伦西亚, 内政部长。卫生部长在吗?

[蒙特塞尼]: 我在。……听着, 加西亚, 马里亚诺要跟你说话, 然后我们应当与加拉尔萨谈一谈。……

[巴斯克斯]: 今天上午形势看来似乎很快就会好转。……中午, 由于警察准备进攻工会所在的建筑, 形势开始恶化了。……实际上, 阿兰多[新的社会治安代表, 代替受伤的埃斯科瓦尔]留用警察署长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对形势产生了某种决定性的影响。后者仍然指挥警察, 因此肯定命令他们采取他们一直采取的立场。在许多地方, 撕毁全国劳工联合会会员证是有计划地进行的。……担任埃罗莱斯[治安总署工作人员中的无政府主义负责人迪奥尼西奥·埃罗莱斯]警卫员的五名同志被人从家里带走之后遇害了。由于发生的这些事情以及一些类似的事情, 同志们采取了保护自己的措施。当一千五百名突击卫队士兵到达托尔托萨的消息传来时, 气氛变得更加紧张。现在不可能预见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如果]警察及其上司不改变立场, 那就无法避免在他们必须经过的村庄和迄今为止还没有出事的地方爆发冲突。

[加西亚·奥利韦尔]: 我是加西亚·奥利韦尔。……内政部长已经下令立即将罗德里格斯·萨拉斯撤职。他准备以尽可能公正的方式消除加泰罗尼亚的紧张局势。当务之急是, 正在赶赴巴塞罗那的突击卫队到达他们的目的地以接替被冲突弄得非常疲劳、紧张和冲动的警察。……你们必须理解这一点并且向委员会和同志们解释清楚。当务之急还有, 你们要让同志们和部队经过的村庄明白, 这些安定局势的中立部队——绝对中立——必须通过。政府知道, 除非严守这种中立, 否则的话, 非但不能解决问题, 冲突还将愈演愈烈, 并将蔓延到整个加泰罗尼亚地区以及西班牙的其他地方, 最终将导致政府在政治和军事上彻底失败。……内政部长[正在考虑]用其他方式而不通过道路调遣这些部队的可行办法, 前往巴塞罗那的路途太远而且充满了各种[潜在的]障碍, 以致途中可能遍布想让巴塞罗那的紧张局势延续下去从而造成政府垮台的挑衅者。由于现在政府已经接管了社会治安,

我重申，明智的做法是，你们立即指示各个村庄的同志们不要在这些安定局势的部队所经过的道路上设置任何障碍。相反，他们应当为部队提供各种帮助并且对其表示欢迎，因为否则的话，存在着的危险是……如果在途中受到攻击，他们将会被激怒，结果，我们只是成功地将加泰罗尼亚的问题变成了一场全国性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我们都将不可避免地迅速毁灭。最重要的是，立即关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分离主义者[指的是加泰罗尼亚国家党]拥有众多支持者的塔拉戈纳省，目的是防止他们与[我们的]同志搅在一起，煽动后者武装抵抗治安部队。……

[巴斯克斯]: [虽然我们不知道]突击卫队接替巴塞罗那警察有不可否认的好处，但是我们应当承认，此间的问题并不需要警察介入。情况非常简单，只要他们接到返回营房的命令，几小时就能完全恢复正常状态。当务之急是，警察不要发动进攻，在三四个小时内不要采取任何行动。这期间足以恢复双方的信任，然后，街垒将被拆除，警察将撤离他们占领的建筑物和地方。……

[加拉尔萨]: 我是内政部长。我在下午七点半得知，警察署长罗德里格斯·萨拉斯仍在指挥，我[对阿兰多]作出以下声明，我面前是根据录音记录的声明副本：“兹应立即任命一名治安部门的负责人担任警察署长，此人应为正规警察部队的成员，一个你更加信任的人；同时，工会和党派的代表应当停止干预社会治安。”[阿兰多]回复如下：“我完全同意并将立即执行您的命令。”……[关于]你们需要的[恢复信任的]时间，我不反对作如下安排：晚上十点，警察将接到一枪不发和不得进攻任何建筑物的命令。只有必要的警戒部队留在街上，但在三小时内不搜缴武器也不抓人。你们将负责监督你们的人在此期间从街上和[他们所在的]地方撤回家，而且也要一枪不发。我将发出这些命令，显然，你们清楚，如果双方不能忠实地执行这些命令，什么目的也不会达到。总理正在叫我。等我一会儿。……[这里]是加西亚·奥利韦尔。……

[蒙特塞尼]: 加西亚，我们可以接受加拉尔萨所说的方案，条件是，休战定于明天上午六点至九点，以便使我们有时间组织一场巴塞

罗那全市人民参加的群众和平示威游行，各个组织的代表举着他们连在一起的横幅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我们应当向劳动者总工会提出这个建议，他们一定会接受。……

[加拉尔萨]：关于那三个小时……我不反对把它们定在上午六点至九点之间。至于举行和平示威，假如没有挑衅者的话，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不过，我担心这些挑衅分子可能利用普遍存在的紧张状态，示威可能开头不错结果糟糕。也许在星期天而不是明天[星期五]举行示威更好，两个工会组织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宣布它。我会命令警察夜间警戒务必小心谨慎。我保证，明天上午九点以后，一支由一个我绝对信任的人[这指的是埃米利奥·托雷斯·伊格莱西亚斯中校，他被任命为巴塞罗那警察部队指挥官]⁵⁶所指挥的温和宽容的新的部队将在那里。

[蒙特塞尼]：那好吧，加拉尔萨。……休战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救赎，但要记住，如果仍由同样的人负责社会治安的话，我不知道你的命令会被执行到什么程度。……

[加拉尔萨]：明天，其他官员将在那里。⁵⁷……但是你们绝对不要把这告诉别人，以免有人想重演埃斯科瓦尔事件。告诉你们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应当在午夜之后尽快回家，如果像我希望的那样没什么妨碍他们的话，其他人也都应当这样做，这样一来，明天就不必为此浪费三个小时了。这样试试非常容易。不过，这意味着我将承担重大的责任，因此，我不仅希望能够依仗你们的帮助，而且希望你们明白，这是我可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的最后尝试。不要对外宣布这些协议，只能以书面形式把它们告诉你们信任的人，并且签上你们的名字。你们觉得这样行吗？

[蒙特塞尼]：尽管我们因为夜间行动以及确定[我们的]人员的具体方位有困难而不能作出任何保证，但是，我们会在晚上尽量试一试。……马里亚诺让我告诉你，我们应当商定上午六点至九点，因为这将给我们工作的时间以使事情更容易进行。

根据他们与加拉尔萨达成的协议，巴斯克斯和蒙特塞尼兴奋地为安排休战彻夜工作。“我们把达成的协议通知了加泰罗尼亚地方组织，”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报告说，“并且指示同志们准备在早晨六点撤退。”⁵⁸同时，向位于通往巴塞罗那主要道路上的村镇发出了不设障碍允许突击卫队通过的指示。在星期二突然爆发战斗的托尔托萨，⁵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地方组织接到了对突击卫队不作任何抵抗的指示。“我们的同志依照执行，”《工人团结报》写道，“从而显示了他们的纪律性以及对组织的指示的尊重。”⁶⁰

在巴塞罗那，五月七日星期五天亮之前几个小时，有迹象表明，革命者的热情终于耗尽。继续与其领导人的意志抗争将徒劳无益的感觉压倒了他们，普遍存在幻灭感。许多人撤离街垒消失在黑暗中。黎明时分，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地方委员会联合发出呼吁：“同志们，大家回去工作吧！”⁶¹

当天傍晚，来自巴伦西亚的突击卫队在一支由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派出的边防警察部队伴随下进入这座城市，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下午七点刚过，第一辆载有突击卫队和治安警察部队士兵的汽车驶进市区，”《工人团结报》报道说，“接着，一刻钟之后，大批部队到达，沿着对角线大道进入巴塞罗那。在开往内务治安委员会途中，他们经过了格拉西亚大道，加泰罗尼亚广场，环形大道，杜鲁蒂大街和哥伦布大道。当他们列队通过大街时，加泰罗尼亚人以极大的热情和表示支持的示威活动欢迎他们，士兵们举起拳头对此示意。”⁶²装备着最新式武器的增援部队从陆地和海上陆续抵达，几天之内，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援兵数量估计有一万两千人。⁶³

461 现在，在加泰罗尼亚这个西班牙自由主义运动的堡垒，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优势被打破了。几个月前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全盛时期似乎不可想象的情况如今已经成为现实，共产党人取得了革命爆发以来最重大的胜利。⁶⁴

注释：

- 1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四日《社会熔炉报》回顾事件的社论。
- 2 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工人团结报》。
- 3 据孔帕尼斯说，中午十二点半得到了中央政府决定接管社会治安的消息（路易斯·孔帕尼斯，《关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至七日发生在巴塞罗那的战斗的笔记和文件》）
- 4 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无产阶级文化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声称：“孔帕尼斯和塔拉德利亚斯以及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代表千方百计延缓推迟所有谈判，以使战斗继续进行。每当兄弟相残的战斗变得激烈时，可以看到他们满意的神情；另一方面，每当提到进行调解时，他们看上去显得失望。”（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见阿古斯丁·索奇《共和派控制区后方事变的真相》，第59页）
- 5 一九四四年我在墨西哥对塞拉·帕米埃斯的采访。采访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 6 阿萨尼亚在日记里写道，在用电传电报与普列托交谈的过程中，他威胁说，如果政府不挽救局面的话，他将做出一个“后果无法预料”的决定。他还说，他要求普列托把这个意思告诉马丁内斯·巴里奥（《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81页）。
- 7 阿萨尼亚—普列托电传电报，第29—37页。关于这些电报的情况，见本书第四十二章注释54。
- 8 根据西斯内罗斯一九四〇年在墨西哥接受我的采访时所提供的信息（采访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 9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81页。
- 10 阿萨尼亚—普列托电传电报，第59页。
- 11 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巴伦西亚通讯》（晚报）。
- 12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五日《每日图片报》。
- 13 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先驱报》。
- 14 孔帕尼斯，《关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至七日发生在巴塞罗那的战斗的笔记和文件》。
- 15 根据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五月事变后担任自治政府专员的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提供的信息（一九四五年对他个人的采访）。
- 16 战斗结束没几天，加泰罗尼亚地区尚在一万两千名突击卫队士兵的占领之下，孔帕尼斯就在接受（巴黎）《今晚报》的采访时表示，希望将社会治安管理权归还加泰罗尼亚（见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周一官方简报》）。
- 17 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西班牙革命与内战》，第148—150页。
- 18 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工人团结报》（巴塞罗那）。
- 19 可以在下列报纸上看到对这些地方的战事的报道：一九三七年七月（原文如此。似应为五月——译注）十二日《无政府报》；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二日、十五日和十六日《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四日《劳动报》。另请参阅孔帕尼斯《关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至七日发生在巴塞罗那的战斗的笔记和文件》；曼努埃尔·克鲁埃利斯，《血腥的五月：巴塞罗那，1937》，第89页；索奇，《共和派控制区后方事变的真相》，第49—50页。
- 20 何塞·科利和何塞·帕内，《何塞·罗维拉：为社会主义加泰罗尼亚效力的人生》，第171—173页。
- 21 胡利安·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60页。另请参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文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关于前线部队不得返回巴塞罗那的命令》（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22 全国劳工联合会积极分子伊西德罗·瓜迪亚·阿维利亚写道：“根据孔帕尼斯主席的命令以及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地区委员会的书面同意，[莫利纳]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了身边全是共产党人参谋人员的波萨斯将军。”（伊西德罗·瓜迪亚·阿维利亚，《关于工人运动的谈话：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积极分子的采访》，第109页）
- 23 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阿方索十三世，第二共和国，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第424—425页。另请参阅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136—137页；阿瓦德·德·桑蒂连，《西班牙革命与内战》，第147页；索奇，《共和派控制区后方事变的真相》，第32页。
- 24 多洛蕾丝·伊巴露丽，《唯一的道路》，第371—372页。阿拉贡前线军法部门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应此时已是共产党员的波萨斯将军的要求起草的一份报告称，五月五日，一千五百至两千名属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部队的士兵“携带各种武器放弃阵地向巴塞罗那方向进发”，但在莱里达外围被阿方索·雷耶斯中校指挥的空军地面部队阻止（《阿拉贡前线军法处根据东路军总司令的电报命令发布的报告》，马德里军事历史部门，第62档案柜，卷宗768，第1文件夹）。一份该报告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25 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红色阵线报》。
- 26 接替他的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劳动者总工会领导人拉斐尔·比迭利亚。
- 27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无产阶级文化报》。
- 28 一九三八年（原文如此。似应为一九三七年——译注）五月六日《红色阵线报》。另请参阅拉斐尔·比迭利亚的演说，载一九三八年（原文如此。似应为一九三七年——译注）六月四日《红色阵线报》。
- 29 索奇，《共和派控制区后方事变的真相》，第30—31页。据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一九四四年在墨西哥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塞赛可能确实是被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成员杀害的。他说，塞赛曾经是个“布列霍斯分子”（前西班牙共产党书记何塞·布列霍斯的追随者。布列霍斯被共产党开除，后来加入社会党左派）。他补充说：“共产党人在劳动者总工会给塞赛制造困难。他们只让他在那里。早在内战之前，他就是工农集团的成员了。”（摘自我所作的采访速记记录，该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 30 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环球新闻报》。
- 31 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每日图片报》。
- 32 乔治·埃森魏因写道：“贝尔内里和巴尔别里被暗杀的消息直到五月八日才正式公布（《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肯定是因为五月六日的停火呼吁，《工人团结报》直到战斗停止几天后的五月十一日才报道了暗杀的细节。谁应当对贝尔内里和巴尔别里的死亡负责始终没有明确的结论。关于暗杀事件的发生，存在三种貌似合理的说法。大部分同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消息来源当时都把暗杀归咎于共产党人。众所周知，由于贝尔内里对共产党人在西班牙所奉行的政策的批评，那一段时间他屡遭共产党人的怨恨。贝尔内里在《阶级斗争》——贝尔内里与另外一些居住在巴塞罗那“马拉泰斯塔之家”的意大利自由主义者从一九三六年十月开始出版的一份意大利语无政府工团主义期刊——上发表文章断言，苏联向西班牙运送武器和弹药是为了‘控制反法西斯斗争并且限制社会革命在反法西斯武装斗争中的发展’（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阶级斗争》，转载于一九七八年第四期《无政府主义评论》，第54页）。据鲁道夫·罗克说，这篇文章‘引起苏联驻巴塞罗那外交使节[可能是苏联总领事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的抗议，从那时起，莫斯科的特工开始采取置其于死地的行动’（鲁道夫·罗克，《在西班牙的外国人》，第132页）。鉴于五月事变之前贝尔内里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与共产党人长期存在的冲突，同时考虑到共产党人清除其政治对手的手段，把谋杀贝尔

内里的责任归咎于他们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据阿古斯丁·索奇说，贝尔内里和巴尔别里被害的经过如下：‘五月五日星期三，下午五点左右，十二个人去了[他们的房间]，其中一半是青年卫队[自治政府的警卫部队]士兵，另一半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看上去像劳动者总工会会员，戴着红色臂章。后面这伙人中为首的那个人在被问到姓名时出示了他的第1109号身份证。两伙人待在房间里并且再次进行搜查。……当天晚上[贝尔内里和巴尔别里]被机关枪子弹打死，尸检显示了这一点。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冷血谋杀。……证据不可辩驳。因为贝尔内里和巴尔别里是无政府主义者，所以他们被暗杀了，被青年卫队士兵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暗杀了，也就是说，被听命于莫斯科的共产党人暗杀了。’（索奇，《共和派控制区后方事变的真相》，第24—25页）。美国无政府主义报纸《无产阶级文化报》的自由撰稿人‘布兰德’（恩里科·阿里戈尼）作了类似的描述，像索奇一样，当时他在巴塞罗那。此外他说，当贝尔内里和巴尔别里的妻子辨认她们的丈夫被打成千疮百孔的尸体时，他与她们在一起（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二日《无产阶级文化报》和恩里科·阿里戈尼，《自由：我的梦想》，第323—324页）。五月事变几周之后，在法国出版的意大利共产党的喉舌《人民的呐喊》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使贝尔内里被共产党人所谋杀的看法具有了可信性。这篇文章最重要的一点是企图把杀害贝尔内里的责任归咎于五月骚乱。它错误地把贝尔内里本人当作所谓不法分子的一员，断言是这些不法分子发动了‘反对加泰罗尼亚人民阵线政府的流血叛乱’。文章继续断言道，作为一名奸细，贝尔内里‘在叛乱中得到了应得的惩罚’。尽管这篇文章并没有暗示共产党人参与杀害了贝尔内里，但它的确表明了他们对他的强烈蔑视。它还明确反映了当时流行的共产党人的观点：镇压甚至屠杀反人民阵线分子无可非议。自从内战以来，一些作家接受了共产党人应当对谋杀贝尔内里负责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女婿弗农·理查兹（《西班牙革命的教训，1936—1939》[一九八三年版]，第250页），阿瓦德·德·桑蒂连（《阿方索十三世，第二共和国，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第425页）以及皮耶尔·卡洛·马西尼和阿尔贝托·索尔蒂（收入卡米洛·贝尔内里的《彼得格勒，1917/巴塞罗那，1937》一书中的文章，见239—254页）。

“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对谋杀贝尔内里作出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官方描述。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发表的一份宣言中，全国委员会把五月悲剧的责任归咎于加泰罗尼亚的分离主义政党加泰罗尼亚国家党，并将这一责任扩展至贝尔内里和巴尔别里的死亡（见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四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根据这份宣言，贝尔内里被杀害是因为他私下里知道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在西班牙和地中海地区其他地方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宣言明显暗示，抓走贝尔内里和巴尔别里的人不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而是伪装成警察的加泰罗尼亚国家党的前法西斯分子，指控他们正在与意大利的监控镇压反法西斯分子机构（墨索里尼的秘密警察）勾结起来联合行动。

“历史学家卡洛斯·拉马精心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在一些出版物中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实例见在他的《当代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书。）最近他对关于谋杀贝尔内里的法西斯分子阴谋论提出了一种修正意见。简单地说，拉马认为，贝尔内里很可能是佛朗哥的第五纵队奉意大利监控镇压反法西斯分子机构之命暗杀的。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拉马提出，意大利历史学家皮耶尔·卡洛·马西尼在意大利内政部政治档案中心发现的文件证明，当贝尔内里在巴塞罗那时，他始终处于意大利政治特工的监视之下。拉马接着说，这些特工可以渗透到在巴塞罗那活动的外国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的队伍中。拉马解释说，意大利监控镇压反法西斯分子机构对贝尔内里的活动特别感兴趣是可以理解的；他不仅以其反法西斯作品（例如《墨索里尼征服巴利阿里群岛》）而闻名，一般认为他还与一个暗杀墨索里尼的密谋有牵连。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特别提到的是，有具体的证据证明，内战期间意大利监控镇压反法西斯分子机构的特工确实在巴塞罗那活动。例

如，我们现在知道列昂·托洛茨基寄给让·鲁斯的信被意大利监控镇压反法西斯分子机构的特工所截获，因为多年以后在意大利的警察档案中发现了这封信（见本书第四十章注释3）。

“拉马的观点显然对仍在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当中流行的贝尔内里被共产党人所杀害的看法表示了异议。不过，有些自由主义者同意一种与拉马的观点类似的观点，例如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在他的自传《脚步的回声》（1978）中，加西亚·奥利韦尔评论说，由于对共产党人的强烈憎恶，无政府主义者本能地指控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杀害了贝尔内里。另一方面，他推测，考虑到五月事变期间巴塞罗那的混乱局面，意大利监控镇压反法西斯分子机构的特工有可能执行这种暗杀行动。他还发现了值得注意的情况，处死贝尔内里的方式与处死其同胞卡洛和内洛·罗塞利的方式惊人地相似，五月事变之后不久，罗塞利兄弟在法国被蒙面党徒奉意大利监控镇压反法西斯分子机构之命杀害（见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纽约时报》，《纽约时报》报道说，罗塞利兄弟被加莱亚佐·齐亚诺伯爵下令谋杀）。

“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在（一九七九年七月）写给伯内特·博洛滕的一封信中说，暗杀贝尔内里事件‘仍然而且将永远是一个谜’。在与拉马讨论了这个问题之后，她得出了以下结论：‘据拉马说，就像很可能是共产党人一样，暗杀的策划者也很可能是法西斯分子。由于我们这位不幸的同志在流亡法国期间所从事的反法西斯活动……墨索里尼决不会放过贝尔内里。一个月后——一九三七年六月——法西斯分子雇用的杀手在巴黎以人们非常熟悉的可怕方式暗杀了卡洛和内洛·罗塞利兄弟，他们犯下的罪行引起了一些疑问。实际上，贝尔内里主要是以抨击法西斯主义而不是以反对共产党人闻名于世。由于与拉马进行的这次谈话，他在我心里埋下了怀疑的种子，这使我不得不从良心的角度考虑正反两方面的意见。’

“更多关于贝尔内里的情况，见维克托·阿尔瓦《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1919—1939：工农集团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史》，第二卷，第429和448—449页；卡米洛·贝尔内里，《墨索里尼征服巴利阿里群岛》，第3—6页；焦万娜·贝尔内里，《反法西斯主义教程》，第190页及其后，被休·托马斯在《西班牙内战》（一九七七年版）中引述，见第658页，注释5；胡利安·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96页；弗朗西斯科·马德里·桑托斯，《卡米洛·贝尔内里，一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1897—1937：欧洲的革命与反革命，1917—1937》，马塞尔·奥利维耶，《巴塞罗那血腥的日子》，第27页；兰多尔福·帕恰迪尼，《加里波第营》，第223页；马克斯·萨廷，《贝尔内里在西班牙》，保罗·夏基，《杜鲁蒂之友会年表》，卡洛斯·森普鲁伦-毛拉，《加泰罗尼亚的革命与反革命》，第240—242页；保罗·斯普里亚诺，《意大利共产党史》，第三卷，第154和209页；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耐火集》；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和十三日《战斗报》；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BEIPI》（巴黎）；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四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报告）；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二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巴黎）；一九四一年五月三日、十日和十七日《无产阶级文化报》；一九三八年六月十日《新西班牙》；一九三七年六月号《人！》；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九日《觉醒》（日内瓦）；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三日《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七年六月四日至十八日《西班牙革命》（纽约）；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土地与自由》；一九三七年六月号和八月号《先驱》。（伯内特·博洛滕和我感谢戴维·W.派克向我们提供了以上部分传记资料。）”感谢乔治·埃森魏因进行了这一宝贵的研究。

33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80—581页。

34 同上，第585和587页。

35 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贝尼卡洛的晚会》，第7页。

- 36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西班牙议会记事》，被杰罗姆·R.明茨的《卡萨斯·别哈斯村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书援引，见第247页。在所有关于这一主题的著作中，明茨根据三年的实地调查而写成的这本书显然是最好的。
- 37 曼努埃尔·阿萨尼亚，《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的政策》，第230—231页。
- 38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84页。
- 39 同上，第585页。
- 40 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255—256页。
- 41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85—588页。在与普列托交流的电传电报中，阿萨尼亚的恐惧和犹豫显而易见，普列托竭尽全力劝说总统离开议会大厦去港口（阿萨尼亚—普列托电传电报，第70—89页）。
- 42 索奇，《共和派控制区后方事变的真相》，第24页。
- 43 一九三七年九月三十一日[原文如此]《人民之友》。关于传单的错误说法见克鲁埃利斯《血腥的五月：巴塞罗那》，第70页，我也在《西班牙革命》中引述过，见第587页，它显然源于《巴塞罗那事件》。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是阿古斯丁·索奇，虽然西班牙文版没有署名，但在其英译本《五月悲剧性的一周》上可以看到他的名字。《五月悲剧性的一周》由索奇负责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国外信息部出版。
- 44 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工人团结报》。乔治·埃森魏因写道：“五月事变之后，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与杜鲁蒂之友会之间继续唇枪舌剑。六月初，杜鲁蒂之友会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一些自由主义青年运动成员联合散发了一份《共产主义联盟宣言》，严厉批评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尤其是抨击他们命令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撤离街头回去工作（见胡安·戈麦斯·卡萨斯，《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史》，第246—248页）。这使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喉舌《社会熔炉报》给[杜鲁蒂之友会最著名的领导人]海梅·巴柳斯贴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尽管巴柳斯在《人民之友》（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上坚决拒绝这个标签，他并没有成功地为杜鲁蒂之友会彻底消除马克思主义的污名。值得注意的是，围绕着杜鲁蒂之友会的论战在内战结束以后继续长期进行。（因撰写《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而）被许多人视为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官方历史学家的何塞·佩拉特斯在通俗地描写内战期间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时，并不掩饰他对杜鲁蒂之友会的敌意（《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229页）。更严厉批评杜鲁蒂之友会的是国际工人协会驻巴塞罗那代表赫尔穆特·吕迪格，他说杜鲁蒂之友会的一些政策是‘布尔什维克法西斯主义’（赫尔穆特·吕迪格，《西班牙革命评论文集》，第28页）。另一方面，试图使杜鲁蒂之友会免遭这些批评伤害的书籍之一是弗兰克·明茨和米格尔·佩西尼亚简洁有趣的专著《杜鲁蒂之友会，托洛茨基分子和五月事变》。”感谢乔治·埃森魏因为我撰写了这条注释。
- 45 这份宣言的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46 费利克斯·莫罗，《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第95页。
- 47 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183—184页。
- 48 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环球新闻报》。
- 49 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每日图片报》。
- 50 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环球新闻报》。
- 51 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工人团结报》。
- 52 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环球新闻报》。
- 53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无产阶级文化报》。
- 54 这项决议的全文可以在维克托·阿尔瓦编辑的《西班牙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文件集》一书中看到，见155—162页；还可以在安德烈斯·宁的《西班牙革命，1930—

- 1937》一书中看到，见281—290页。
- 55 见本书第四十一章注释61。这次磋商的日子被错误地写成了五月七日，星期四，但是，根据得到的内部证据，这次磋商的日子显然应当是五月六日，星期四。
- 56 见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二日《国防部官方日志》。托雷斯被认为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态度友好（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136页；阿尔瓦，《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第二卷，第448页；R.卢宗，《西班牙的反革命》，第123页，注释6；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一卷，第1039—1040页）。无论如何，几周之后当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垮台时，他被共产党员、前马德里警察部队指挥官里卡多·布里略中校所取代（一九三七年六月八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57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共和国官方公报》公布的加拉尔萨任命的官员如下：社会治安代表何塞·埃切瓦里亚·诺瓦，巴塞罗那警察部队指挥官埃米利奥·托雷斯·伊格莱西亚斯，治安总署署长何塞·马利亚·迪亚斯·德·塞瓦略斯。
- 58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无产阶级文化报》。
- 59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六日《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四日《劳动报》；另请参阅孔帕尼斯《关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至七日发生在巴塞罗那的战斗的笔记和文件》和克鲁埃利斯，《血腥的五月：巴塞罗那》，第89页。
- 60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六日《工人团结报》。
- 61 一九三七年五月七日《工人团结报》。
- 62 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工人团结报》。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写道：“巴塞罗那给予突击卫队非常热情的欢迎。我在街头和咖啡馆里注意到这一点。许多我与之交谈过的政治信仰不同的人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我根据我亲眼看到的情况断言，巴塞罗那在得知国家承担了维持秩序的任务之后感到如释重负，主张自治的人士[即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自由共和派人士]会原谅我。”（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261页）
- 63 《泰晤士报》驻巴塞罗那记者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二日报道。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工人团结报》报道，五月七日晚上有五千名突击卫队士兵到达。
- 64 五月事变期间的伤亡人数有各种不同的估计数字。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和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阿瓦德·德·桑蒂连提供的数字最大。前者说，九百人被杀，两千五百人受伤（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伦敦]《工人日报》）；后者说，一千人被杀，数千人受伤（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138页）。另一方面，据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工人团结报》报道，死亡人数为四百人。只有J.M.索莱和J.比利亚罗亚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五月事变的受害者》，载一九八二年第十二期《探索》）。以巴塞罗那市民死亡登记簿（Registre Civil de Defunciones de Barcelona）和城市司法陈尸所登记簿（Registre del Dipòsit Judicial）为其主要资料来源，他们得出巴塞罗那死亡二百一十八人这个数字。他们没有提供受伤者的估计人数。

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

在加泰罗尼亚直接达到目的之后，共产党人立即使他们与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斗争激烈起来。利用五月事变，他们要求政府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他们认为后者应当对流血负责，长期以来他们将其领导人斥为托洛茨基分子，是一伙为国际法西斯主义效劳的间谍和奸细。

此时应当问一下，共产党人本身是否相信自己的宣传，或者他们只是顺从地遵照莫斯科的指示行事。一九七四年，当时担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的圣地亚哥·卡里略接受了雷吉斯·德布雷和马克斯·加洛的采访，在这次采访中，卡里略从某种意义上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一九三五年]去苏联之前，我从来没有把托洛茨基分子当作我们可能的敌人。……尽管实际上我并不认为西班牙的托洛茨基分子是法西斯分子的代理人，但我接受了以前我不承认的事情。后来发生了有那么多供述、交代了那么多罪行的……莫斯科审判。我必须说，当时我相信那些供述都是真的。我不可能想到它们是逼供出来的。我始终认为革命者在面对警察时应坚贞不屈。我无法想象决定这些供述的意识形态因素：非常荒谬地认为一个人可以通过承认自己是党和革命的敌人——即使这不是真的——为党和革命做出贡献。因此，我相信那些人是反革命分子，敌人的间谍。”¹

五月的战斗刚一结束，西班牙共产党就动用一切宣传手段疯狂地开始进行鼓动，以迫使别人接受它的意志。

何塞·迪亚斯在五月九日的一次公众集会上宣称：

463

我们的首要敌人是法西斯分子。不过，法西斯分子有为其效力的代理人。当然，如果这些代理人说“我们是法西斯分子，我们想在你们中间活动以便给你们制造困难”，他们立即就会被我们消灭。因此，他们必须改头换面。……有些代理人自称托洛茨基分子，许多乔装打扮的法西斯分子使用这个名字，他们为了造成混乱而谈论革命。因此我要问，如果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如果政府也知道这一点，那它为什么没有像对待法西斯分子那样对待他们，无情地将他们消灭呢？

每个工人必须知道，苏联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审判。……亲自指挥这个犯罪集团制造苏联的火车出轨，在大型工厂搞破坏，千方百计刺探军事秘密以便泄露给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正是托洛茨基本人。另外，鉴于这一切在审判期间被揭露出来而且托洛茨基分子声称他们是在托洛茨基的指挥下与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合谋干的这些事情的事实，我必须质问的是：托洛茨基分子并不像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人、共和派那样是一个具有明确倾向的政治或者社会组织，而是一伙为国际法西斯主义效劳的间谍和奸细，难道这不是很清楚吗？必须清除这些托洛茨基分子奸细！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最近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说，不仅应当在西班牙取缔这个组织并且查封它的报纸，而且应当在所有文明国家把托洛茨基主义消灭干净，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想摆脱这个害虫的话。……

在西班牙国内，煽动加泰罗尼亚罪恶暴动的不正是托洛茨基分子吗？五月一日的《战斗报》充满了厚颜无耻地煽动叛乱的言论。……嘿，这份报纸仍在加泰罗尼亚继续出版。……为什么？因为政府无法像所有反法西斯人士要求的那样下定决心查封它。

在内战爆发十个月后，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政策使后方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前线需要的话，我将不得不断定，而且我确信，每一个反法

西斯人士也将不得不断定，如果本届政府不强行维持后方的秩序，那么，另一个人民阵线政府就必须这样做。²

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喉舌《前进报》迅速回击，毫不含糊。它断言，共产国际西班牙支部所鼓吹的强制措施显示出一种对于工人阶级团结的威胁。“这些措施将使那些正在劝说受无政府主义宣传影响的工人参与政府工作的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产生最可怕的幻灭感。人民阵线政府采取强制行动——希尔·罗夫莱斯或勒鲁支持采取这种行动——将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它最终可能使那些坚决放弃过去那种不问政治的生活方式的人退回到他们的老路上去。如果不幸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将会输掉战争，革命也将遭到失败，因为，在工人阶级中有一半人反对我们的情况下，既不可能赢得战争，也不可能取得革命的成功。”³

为了制订“一条共同行动路线”，西班牙共产党——我们应当记得，最近它与社会党领导层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暗中与社会党执委会秘密协商。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证实：“两党一致认为政治形势严峻，因此，必须为一触即发的危机找到一种解决办法。”⁴毫无疑问，共和派参与了这些秘密协商。在普列托的帮助下于五月七日乘飞机撤离巴塞罗那的阿萨尼亚总统⁵说，同一天在巴伦西亚，前总理、左翼共和派领导人何塞·希拉尔代表共和派来看望他：“他告诉我，共和派与社会党和共产党人决定在下次内阁会议上与拉尔戈·卡瓦列罗作斗争。……希拉尔还说，共和派与社会党和共产党人组成了一个推进一项解决方案的集团。……尽管[他]没有作任何进一步的解释，我知道，三个党派之间的会谈进展顺利。他告诉我，在下次内阁会议上，共产党人将通过要求改变政策首先发难，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将从政府辞职。社会党人和共和派将会支持他们的要求。”⁶

当天早些时候，拉尔戈·卡瓦列罗前来看望总统。尽管阿萨尼亚仍然因总理对他在巴塞罗那的困境“漠不关心”而愤怒，⁷但他决定不提此事。

“[卡瓦列罗]来到时面带微笑，和蔼可亲，带着一个公事包。”阿萨尼亚叙述说，“他对巴塞罗那只字不提。……他开始谈话，仿佛我们天天见面，也仿佛我刚刚愉快地旅行归来。……我非常认真地考虑过第一次与他会见

时我应当怎么做。我当然很想让他解释一下他的行为。但经再三考虑之后，我忍住不去这样做而是[决定]，只要他不说这件事，我也什么都不说。我确信，如果我提出这个问题的话，事情将变得非常复杂，使得他作为总理脱不了干系。因此我决定……不以一个片面的结论导致他被解除职务，特别是因为这可能被认为是在宣泄私愤，尽管我的愤怒有正当的理由。我保持了沉默。”⁸

于是，当五月七日和八日前来看望他的共和派、社会党和共产党领导人表达他们联合反对政府的立场时，阿萨尼亚——正如雷蒙德·卡尔正确指出的那样，“自从一九三六年七月以来”，他的宪法地位让他“第一次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并得到一个报复的机会”⁹——谨慎地没有公开站在争执双方的任何一边。“我听了他们所有人的意见，”他写道，“但是尽量不向他们透露我对政府行为的看法。另一方面，我当然不能表示同意他们的意见。首先，我对他们说，我认为他们来看我具有通报情况的性质，但是，我绝不允许他们作出我同意他们向政府发动攻势的推断。”他提醒他们，一九三六年九月希拉尔内阁不顾他的劝告提出辞职为卡瓦列罗政府让路“被誉为政府的胜利”，“十一月份涉及全国劳工联合会和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共和派认为这不可避免，有利无害——的内阁改组不仅违背我的建议，而且是在我最愤怒地表示抗议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几个月后，”他接着说，“正是这些把拉尔戈抬举起来并且允许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加入政府]的人对他们忍无可忍了。”因此开始回过头来找他解决问题。他没有制造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神话”。如果现在认为政策必须有所改变，那是因为这些党派改变了看法，“不是因为共和国总统改变了看法，他的看法没有改变”。¹⁰

465

几天后，五月十三日，所有任命和级别没有得到拉尔戈·卡瓦列罗确认的政治委员可以认为自己已被逐出政治委员队伍的最后期限到期的前两天，在一次狂风暴雨般的内阁会议上，两名共产党人政府部长赫苏斯·埃爾南德斯和比森特·乌里韦要求立即改变总理在军事和社会治安方面的政策。他们还以没有妥协余地的言辞要求取缔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从希拉尔和普列托那里得知会议情况的阿萨尼亚证实，这次会议的特点是“罕见的激烈和野蛮。……拉尔戈·卡瓦列罗大呼共产党人是‘骗子和诽谤

者’，六个小时就这样被耗掉了。社会党[温和派]通过内格林支持共产党人的意见，共和派也发了言”。¹¹

在与共产党人唇枪舌剑的过程中，拉尔戈·卡瓦列罗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一个法西斯组织的看法，并且宣称他不会取缔这个政党。他还说，他加入政府不是为了服务于在政府中拥有代表的任何派别的政治利益，而某个具体的组织是否应当被取缔将由法院来决定。¹²在其未发表的回忆录《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中，拉尔戈·卡瓦列罗写道，他“竭尽全力”反对取缔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并且“宣称，只要由他领导政府，任何政党或者工会组织都不会被取缔；如果发生了犯罪行为，法院将会进行审理；他不打算在政治上帮任何人的忙”。¹³由于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两名共产党人内阁部长起身离开了会议室。¹⁴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写道：“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叛乱使我们有了……一个制造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危机的借口。”¹⁵

“当内阁发生分裂时，”内战结束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证实，“拉尔戈·卡瓦列罗打算继续处理例行事务。我坐在他的旁边……说：‘喂，卡瓦列罗，事情有些严重了。由于政府中的一个政党退出了政府，内阁的联盟已经破裂。因此，我认为你的责任是，不要继续开会了，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共和国总统并与他一起解决这个问题。’”¹⁶

“普列托的意见让拉尔戈·卡瓦列罗感到意外，他认为无论如何内阁可以继续讨论，”本身是一名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并在继任政府中担任内政部长的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写道，“……普列托发表的完全符合宪法的意见[后来]受到谴责，被认为是共产党人发起的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阴谋活动的一部分。”¹⁷

直到内战结束几年后，与卡瓦列罗重归于好的普列托才公开否认了说他与共产党人秘密达成协议的指责。“迄今为止，”他声称，“我不屑于反驳我与共产党人进行交易以便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错误判断。除了自一九二一年我党不幸第一次分裂以来支配我对他们的行为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使我与他们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之外，由于我的道德倾向，我只能对一个同志和朋友以诚相待，作为总理，这个同志和朋友当时承担着那么微妙复杂的工作。”¹⁸另一方面，使政府突然陷入危机的两名

466

共产党人内阁部长之一的比森特·乌里韦在流亡期间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宣称：“普列托参与了罢免卡瓦列罗政府首脑职务的计划，尽管他本人没有公开透露。……[他]想报复拉尔戈·卡瓦列罗，除了其他事情之外，他不能原谅一九三六年五月卡瓦列罗使他想当政府首脑的抱负落了空。”¹⁹此外，普列托以前的支持者、治安总署署长加夫列尔·莫隆也说，普列托同意共产党人“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²⁰不过，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党实际上的首脑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提供的。他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日提交莫斯科的一份报告中说：“温和派与普列托一起在策划和解决危机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²¹不管怎样，普列托所发表的共产党人政府部长的退出已使内阁联盟破裂的看法是推动事态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卡瓦列罗决定中止内阁会议并向总统递交了辞呈。²²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据阿萨尼亚说，卡瓦列罗也许并不打算辞职，他“只是”希望总统“授权他撤换两名共产党人政府部长”。²³阿萨尼亚回忆说：“卡瓦列罗向我强调，由于出于国家利益考虑，危机出现的不是时候，因此，应当让政府继续行使职能，以便实施非常重要的计划……停止实施这些计划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²⁴第一项计划是卡瓦列罗的国防部副部长卡洛斯·德·巴赖瓦尔设想出来的，他打算在西属摩洛哥煽动一场反佛朗哥将军的叛乱，阿萨尼亚认为这项计划是一种“轻率的冒险”而拒绝考虑。²⁵第二项计划是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势，这项计划最初是由巴赖瓦尔的前任何塞·阿森西奥将军和前国防部总参谋长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将军制订的，我们应当记得，这两位将军都是迫于共产党人的压力去职的。²⁶“拉尔戈告诉我，”阿萨尼亚写道，“为了防止军官中的敌对分子坏事，他正在考虑去埃斯特雷马杜拉亲自指挥这一行动。我认为，其实他什么也不会指挥，实际上他只是签署总参谋部提交的命令。毫无疑问，他对这项计划信心十足，他肯定希望通过这一计划取得他的谋士所阐述的军事优势以及作为获胜的军事行动的指挥者在公众心目中所产生的政治优势和个人优势。”²⁷

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支持者声称，如果不是共产党人及其苏联顾问反对的话，这一行动可能成为内战的转折点。“它的目的是要切断叛军与南方的交通线，”社会党左派领导人、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好友路易斯·阿拉

基斯塔因写道，“利用这条交通线，叛军得到意大利和摩洛哥军队的稳定增援。通过把敌军分割成为互不关联的两部分并使其失去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港口进入的外国军队和战争物资的支援，这一行动的成功可以彻底改变战争的进程。北部地区[即佛朗哥将军正在全力进攻的巴斯克各省]将得到解救；整个安达卢西亚地区将被收复。战争可能就打赢了。……无论如何佛朗哥不会赢得这么迅速、这么利落，至少会有充分的时间和有利的条件进行外交和平谈判。”²⁸

据民族主义军事历史学家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说，计划采取的这一行动由恩里克·胡拉多中校任总指挥，总共投入十万兵力，是迄今为止调动兵力最多的一次军事行动。²⁹另一方面，他说，民族主义者可以投入战斗的兵力共有：六个营，三个摩洛哥士兵塔博尔营，^①十八个长枪党百人队，十个骑兵中队，五个炮兵连和七个机枪连。仅有的后备部队是一个意大利-西班牙蓝箭混成旅。^②鉴于兵力如此悬殊，他评论说，至少在开始阶段，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将会取得巨大的成功。不过，人们对共和派能否赢得一场影响深远的胜利半信半疑，因为众所周知人民军缺乏进攻能力。

“尽管如此，这肯定是尝试一下的好机会。民族主义者的空军部队……几乎全都在北方，距离选定进攻的地区几百公里。后备部队不是根本不存在，就是也在巴斯克各省。……因此，[共和派军队]最初的压倒性优势能够保持好几天——足以使[他们]到达巴达霍斯和西葡边境。无论[民族主义者]调动后备部队需要多长时间，政府军将确保拥有大炮、坦克和人员的绝对优势以及适度的制空权。”他最后说，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可能达到的明确目标：切断敌军大批地面部队与其安达卢西亚和非洲基地的联系，从而将凯波·德·利亚诺将军的部队置于一种“无以立足的境地”。至少可以保证使民族主义军队在北方的攻势陷于“瘫痪”。³⁰

定于五月初发动的攻势被米亚哈将军以各种借口一拖再拖。支持他的拖延战术的是西班牙共产党人及其苏联盟友，他们担心，一次可能成功的

468

① 西班牙军队中的塔博尔营（*tabor*）沿用十九世纪的编制，由摩洛哥士兵组成，一般包括两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连。

② 意大利-西班牙蓝箭混成旅（*the mixed Italo-Spanish brigade of Flechas Azules*）是西班牙内战期间为佛朗哥方面作战的部队，其军官和技术人员由来自志愿军团的意大利人担任，士兵为西班牙人。一九三七年四月，第一支蓝箭混成旅开始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参加战斗。

军事行动也许会推迟实现目前进展顺利的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计划。³¹

米亚哈从一开始就反对发动计划采取的攻势，当接到从马德里派一些部队去埃斯特雷马杜拉防区的命令时，最初他拒绝执行。³²“在共产党人的怂恿下，他拒绝服从命令，”阿拉基斯塔因证实，“当时他们才是米亚哈的真正上司。……最终，面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强硬态度，他不得不放弃抵制，派出了要求调动的部队。”³³

然而，这不意味着共产党人不再反对发动这场攻势。国防部总参谋部军事行动负责人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证实：“[米亚哈]知道，接到命令后他必须立即着手将他指挥的部队调往指定的位置。但是，同一天下午，一位将军、一位‘友好的苏联顾问’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空军无法参加进攻[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的]梅里达的行动，因为其他战线需要它。在过去的几天我意识到，共产党人可能正在试图阻止这一行动，因此，听了这位‘友好顾问’的话之后，我确信，它不可能实施了。”³⁴

备受尊重的军事历史学家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写道：“为什么这一行动没有实施，人们列举了许多原因。奇怪的是，各种说法一般来讲与事实相符。实际上，计划对梅里达发动的攻势首先受到米亚哈将军的阻挠，然后受到苏联空军指挥部的阻挠。我查阅的文献资料充分证实了这一点。”³⁵

据拉尔戈·卡瓦列罗说，苏联人最初同意这个计划：“[他们]提出了率领参加这次行动的部队的各旅旅长名单，全部都是共产党员。但是，总参谋部和我已经任命了担任这些职务的人。……我下了命令，大意是要求实际上的空军司令[化名‘道格拉斯’的苏联将军雅科夫·斯穆什克维奇]提供一份可以派出的飞机数量的备忘录。他回答说，我们能够指望他派出十架飞机。为一场投入四万兵力的攻势派十架飞机！我认为这是对没有任命共产党员担任指挥官的报复。总是看到共产党员被安排在可以得到一切荣誉的位置上，而其他的人却被安排在只能吃到敌人子弹的位置上，我们简直烦透了。”³⁶

接到莫斯科发来的反对“阿森西奥计划”的指示后，苏联军事顾问Γ·库利克将军在他的指挥部里召开会议。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说，在这次会议上，他个人坚决主张同意发动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因而受到共产

国际代表陶里亚蒂的训斥。尽管他也证实，当苏联人于五月初通知拉尔戈·卡瓦列罗他们不会向其提供所需要的飞机时，卡瓦列罗“最终丧失”了发动攻势的决心，³⁷但是，从两周之后卡瓦列罗与阿萨尼亚进行的递交辞呈的那次会见来看，他显然仍旧希望实施这一计划。部分由于阿萨尼亚觉得给人留下急于接受拉尔戈·卡瓦列罗辞职的印象不够明智，部分由于总理认为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是一个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阿萨尼亚对总理说，自己将用晚上的时间考虑他辞职的事，明天（五月十四日）上午会把决定告诉他。³⁸

第二天，共和联盟领导人马丁内斯·巴里奥看望了总统。“[他]告诉我，”阿萨尼亚叙述说，“他认为，如果卡瓦列罗被赶下台，由于工会可能采取的态度，这场危机很危险。……总之，他赞成缓和危机，因为它可能突然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除了某些工会和无政府主义者扰乱社会秩序的危险之外，我完全没有这些担忧。人们认为拉尔戈在劳动者总工会中的影响力比他实际具有的大得多。而且人们一般已经厌倦了滥用权力和昏庸无能。不管怎样，我决定不让拉尔戈及其支持者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印象：我个人认为他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或者说，他不可避免的垮台和被取代不是因为总统的愤怒就是因为总统对无产阶级的偏见。这一点令人感兴趣，因为卡瓦列罗曾在三四月份对我说，他预见，‘工人将像一九三三年那样再次被剥夺权力’。最重要的是，为了公众利益，作为众所周知遭到另一些人[共产党人]反对的结果，对于那些可能感到自己将被‘剥夺’权力的人，应当剥夺他们的权力，因为贴着同样的标签，另一些人也可以自称代表工人。”在“仔细权衡了利弊”并且断定“果实尚未熟透”之后，阿萨尼亚告诉卡瓦列罗，他认为，危机应当推迟几天再解决，因为总理“提出了事关国家利益的理由”，他不想妨碍他发动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如果[卡瓦列罗]愿意向共产党人解释一下推迟解决危机的理由，”阿萨尼亚接着说，“说服他们重新加入政府不会很难。万一埃斯特雷马杜拉取得成功……局面将会明显好转，他将掌握一个用以驳斥其批评者的决定性论点。他立即表示同意。”³⁹

拉尔戈·卡瓦列罗提供了一种稍微有点不同的说法：“[总统]建议，我应当收回辞呈，着手部署所计划的行动。如果这一行动的结果不错，政治

局面将会改善。然后我们将再次讨论这个问题。我不同意总统的建议，因为我确信，针对政府施展的阴谋诡计甚嚣尘上，任何拖延都不起作用。他固执己见，跟我谈到牺牲和其他事情，结果，我勉强同意收回辞呈。”⁴⁰

让阿萨尼亚感到意外的是，卡瓦列罗并没有设法使共产党人返回政府或者把推迟解决危机的决定通知他们。“[拉尔戈·卡瓦列罗]肯定认为他的疏忽……非常高明。”阿萨尼亚写道，“但是，恰恰因为这一疏忽，他在社会党内的对手走上前台逼迫他采取行动，不许他用推迟解决作为逃避的手段。”⁴¹阿萨尼亚没有说明他们怎么知道了他与卡瓦列罗达成的协议，不过，阿拉基斯塔因认为，“可能是通过阿萨尼亚本人，他习惯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保持经常的联系”。⁴²

470

“那天下午，当拉莫内达[社会党执委会书记]、内格林和德·格拉西亚[三位社会党温和派政府部长中的两位]出现在我的国防部长办公室里时，我们正准备动身[前往埃斯特雷马杜拉]。”卡瓦列罗回忆说，“普列托没有去；他躲在幕后。他们通知我，鉴于共产党人政府部长已经辞职，由党的执委会提名的三名社会党人政府部长决定辞职。我回应说，他们与共产党人保持一致让人感到难以理解。……内格林回答道，这是执委会的决定，他们不得不表示尊重。”⁴³

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召开的一次社会党全国委员会的会议上，普列托派社会党人赫罗尼莫·布赫达证实，社会党执委会认为，在共产党人收回了他们的合作后，社会党人不可能继续留在政府。⁴⁴

“阴谋诡计昭然若揭。”阿拉基斯塔因写道，“为了推翻卡瓦列罗，[普列托]派核心的三名政府部长与共产党人串通一气。必须阻止卡瓦列罗发动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以免事实证明它成功了。普列托派的社会党议员胡安-西梅翁·比达特用下面这种坦白然而无耻的语言表达了这一观点：‘万一卡瓦列罗在这次攻势中取得成功，那就没有人能把他逐出政府了’”⁴⁵内战结束多年以后，比达特在回忆录中没有反驳这一指责，但他确实说了下面这段关于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的话：“我与普列托谈到阿森西奥计划。他对我说，整个事情子虚乌有，只是阿森西奥和卡瓦列罗所抱有的一种幻想。米亚哈明确表示，提供八到十个师将使马德里陷入严重危险的境地。作为空军部长，普列托顶多只能提供八到十架飞机。这一行

动……不现实。”⁴⁶

正是因为社会党温和派政府部长的辞职，对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暗中与共产党人政府部长串通一气的怀疑才变得不容置疑了。考虑到普列托对社会党执委会主席冈萨雷斯·培尼亚以及其他坚定支持者仍然具有的影响力，如果他愿意的话，就可以避免社会党温和派政府部长提出辞职。此外，人们不会忘记，在内战爆发之前，按照普列托的吩咐，拉莫内达曾经采用巧妙的策略将卡瓦列罗从社会党执委会中驱逐出去。⁴⁷

得知社会党温和派政府部长辞职之后，拉尔戈·卡瓦列罗拜访了阿萨尼亚总统：“我把拉莫内达、内格林和德·格拉西亚所说的话告诉了他，他的回答是，他不理解这些社会党人的态度。由于我坚决要求辞职，他决定开始磋商以征求意见。”⁴⁸阿萨尼亚继续掩饰自己的敌意：“我对他说了几句礼节性的话并且表达了个人问候……可以说，在发生了所有这些事情之后，这些话不应出自我之口。”⁴⁹他所描述的这种“礼貌的友好态度”⁵⁰在即将进行的棘手谈判中起了作用，因为拉尔戈·卡瓦列罗只是偶尔怀疑总统对自己的真实态度。⁵¹

在阿萨尼亚为了组成新的内阁于五月十五日进行的一系列磋商中，社会党执委会和共产党的协调一致表面上丝毫不亚于危机爆发时。“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猛烈抨击拉尔戈的无能，痛斥他的心腹小集团，”阿萨尼亚证实，“指责他与政府和战时高级委员会缺乏沟通，指责他不信任苏联人，等等，等等。共产党人对我说……他们可以同意他保留总理职位……但绝不同意他继续担任国防部长。……显然，争论的要点是国防部长的任命及其与总理职位的分离。……我召见了拉尔戈·卡瓦列罗，邀请他组成政府。他似乎非常乐意。”⁵²

五月十七日，卡瓦列罗向总统提交了他的内阁名单。“在他提交的名单中，”阿萨尼亚写道，“总理，也就是说他本人，不仅继续担任国防部长，而且占据了海军和空军部长的职位！”考虑到危机是因不想让拉尔戈·卡瓦列罗担任国防部长而产生的，阿萨尼亚评论说，这种“独揽”国防职位的做法可以被理解为，他试图提出一种不可能被接受的解决方案并退出政府。“但是……拉尔戈决不希望退出政府。”这是向“兼并政府职能”迈进的一步，同时也是“利用这次危机将普列托从一个重要部门赶走

的一种手段”。“‘你打算将普列托排除在外？’阿萨尼亚问卡瓦列罗，‘不顾他做出的贡献和享有的声望？’不，他不打算将普列托排除在外，他想任命普列托为农业、工业和商业部长！……不用再对名单作进一步的分析，显然，拉尔戈将无法组成一个内阁。”⁵³

甚至还在向阿萨尼亚总统提交他的组阁计划之前，拉尔戈·卡瓦列罗已经意识到，它将遭到共产党人和普列托派社会党人的坚决反对，因为，尽管没有公开反对他担任总理，但是，他们并不掩饰将他赶出国防部的决心。就共产党人而言，他们已经公开要求新政府的总理应当全力以赴处理总理办公室的事务。同等重要的另一个条件是，鉴于将在五月十五日生效的法令，即所有任命和级别到时没有得到确认的政治委员可以认为自己已被逐出了政治委员的队伍，在所有与政治委员的任命和政治方针有关的问题上，总政治部应当享有自主权。⁵⁴

472 至于社会党执委会，它要求，应当由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掌管新设立的国防部，⁵⁵这是将其在即将卸任的政府中所掌管的海军和空军部与原国防部合并而成的一个部门。^①这些要求肯定是根据共产党人与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事先达成的协议提出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比森特·乌里韦在内战结束以后写道：“根据共同协议，以纠正卡瓦列罗的错误、加强人民的团结、密切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之间的合作为条件，普列托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我在普列托成为国防部长之前曾经多次亲口向他提出这些问题，他总是对我说他乐意这样做，而且不会做损害社会党与共产党团结的事情。”⁵⁶

显然，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提出的要求相当于不仅拒绝让拉尔戈·卡瓦列罗担任国防部长，而且拒绝让他担任总理，因为普列托派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非常了解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的心理特征；他们知道，他不会自愿放弃一点权力，而且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难以动摇的自负，因此，他将拒绝成为一个由多年竞争对手普列托控制其中最重要部门的内阁的傀儡。实际上，甚至还在他们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之前，社会党左派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已经宣布，它不会支持任何不是由拉尔戈·卡瓦列罗

① 新设立的国防部为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原国防部为 The Ministry of War。

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的政府。⁵⁷

这一声明肯定是由卡瓦列罗亲自授意发表的，因为这与他本人在整个危机中的立场一致。“拉尔戈以不懈的精力多次表示，”阿萨尼亚回忆说，“除非由他本人担任国防部长，否则的话，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返回政府，因为他认为，他担任这一职务符合国家利益。”⁵⁸“你应当记得，”内战结束以后卡瓦列罗写信对一位社会党同志说，“共产党人要把我赶出国防部，同时把我留在总理位置上做一个傀儡。……我当时表示，作为一名社会党人和一个西班牙人，留在国防部是我的责任，否则的话，我不会接受总理职务；但是，我不是说这是因为我认为自己不可替代，也不是任何类似的原因，而是因为我具有与共产党及其一切帮凶斗争到底的坚定信念；只有在国防部我才能做到这一点。”⁵⁹他还在另一个场合写道：

“真正愚蠢的是与共产党联手将我赶出国防部的另外那些党派。它们没有看到那个党排除异己的行为对战争本身的危害吗？……此外，它们如此盲目，竟然察觉不到共产党人掌管西班牙政策的强烈欲望吗？”⁶⁰

在他努力保留国防部长和总理职务的过程中，拉尔戈·卡瓦列罗得到了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充分支持。在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报纸纷纷发表社论宣称工人阶级希望他留任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保证，⁶¹认为他是“最有能力领导政府，从而必定带领我们走向胜利的最高尚的人”，⁶²由他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为无产阶级正在与国际反动势力进行的斗争的性质不被任何人或事情所歪曲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⁶³的同时，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断然宣布，它不会与任何不是由他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的政府合作。⁶⁴然而，尽管得到这种支持，卡瓦列罗在制订其组成新政府的计划时甚至没有考虑征询一下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意见，实际上，相比于前任内阁中的四个职位，他只为他们提供了两个职位。⁶⁵这种待遇让全国劳工联合会感到非常屈辱，于是，作为回应，它宣称，尽管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它在政府中的代表人数，但它不能接受少于以前的政府职位，也不同意以任何借口给它的待遇与共产党相同——卡瓦列罗同样向后者提供了两个职位。它还断言，共产党挑起了这场危机，因此，它在政府中不会以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同样的忠诚度进行合作。⁶⁶

473

如果卡瓦列罗在制订组成新政府的计划时没有考虑全国劳工联合会的

意见，那么，他更不会考虑共产党人的意见了。他非但对他们提出的总理应当全力以赴处理自己办公室事务的要求置之不理，并且反其道而行之，宣称自己不仅要指挥地面部队，而且要指挥海军和空军，还要控制武器生产。⁶⁷人们也许想知道，他是否真的希望共产党人及其盟友将会同意这个计划。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希望很快就落空了；因为，何塞·迪亚斯回应说，组阁计划显示出它无意考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愿望，这是全体西班牙人民的愿望，因此，共产党人不能按照它提出的条件加入政府，⁶⁸与此同时，拉蒙·拉莫内达以社会党执委会的名义宣布，他的党不能同意加入政府，因为组阁计划没有考虑社会党执委会的要求，而且因为共产党已经作出拒绝的答复。⁶⁹

同样与共产党人在反对卡瓦列罗组阁计划的问题上通力合作的是左翼共和派，他们随声附和了共产党人提出的新政府的总理应当全力以赴处理自己办公室的事务的要求。⁷⁰

为了面子，阿萨尼亚总统试图消除卡瓦列罗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甚至因为何塞·迪亚斯不肯让步而劝告他。⁷¹但是，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共产党毫不动摇，普列托派社会党人和左翼共和派站在共产党一边。结果，卡瓦列罗被迫放弃了组阁的打算。⁷²

注释：

- 1 圣地亚哥·卡里略，《西班牙的明天：与雷吉斯·德布雷和马克斯·加洛对话录》，第53—53页。
- 2 见何塞·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431—433页。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五月十日、十一日和十三日《红色阵线报》；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劳动报》。
- 3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前进报》。
- 4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三卷，第79页。
- 5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87—588页。
- 6 同上，第591—592页。
- 7 同上，第585页。
- 8 同上，588—589页。
- 9 雷蒙德·卡尔，《西班牙悲剧：透视内战》，第175页。
- 10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92—593页。

- 11 同上，第595—596页。
- 12 拉尔戈·卡瓦列罗一九三七年十月发表的演说，他在《劳动者总工会与内战》中描述了这次会议的情况，见第8页；另请参阅胡安·佩罗（当时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工业部长）《问题与争论》，第201—202页。
- 13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第1184页。关于这部回忆录的情况，见本书第四十五章注释19。
- 14 拉尔戈·卡瓦列罗，《劳动者总工会与内战》，第8页。
- 15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85页。
- 16 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墨西哥城）《前进报》。
- 17 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274页。
- 18 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墨西哥城）《前进报》。另请参阅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二卷，第94页。
- 19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巴黎）《工人世界报》。
- 20 加夫列尔·莫隆，《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85页。
- 21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36页。
- 22 拉尔戈·卡瓦列罗，《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第1184页。
- 23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95页。
- 24 同上。
- 25 同上，第596页。另请参阅《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613—614和616—617页。关于共产党人对这个计划的看法，见《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三卷，第80页和注释3；同上，第一卷，第225页。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当时正在巴黎访问的卡洛斯·德·巴赖瓦尔在写给西班牙大使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到，拉尔戈·卡瓦列罗“交给我的任务是把面值一千、总共三百三十万法郎的钞票带回[巴伦西亚]，作为立即在北非开展一项鼓动宣传计划所需要的资金”（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B.30）。
- 26 阿森西奥和马丁内斯·卡夫雷拉计划发动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这一情况得到了民族主义军事历史学家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的证实（《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一卷，第1076页），他说，取代马丁内斯·卡夫雷拉临时担任总参谋长的阿尔瓦雷斯·科克“得到了”两位将军制订的关于这一行动的计划。
- 27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89页。
- 28 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13页。
- 29 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一卷，第1077—1078页。据阿萨尼亚说，拉尔戈·卡瓦列罗告诉他，七万五千人参加这一军事行动（《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90页）。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上校在《进攻塞哥维亚和布鲁内特战役》一书中公布了埃斯特雷马杜拉行动计划，见第237—240页。
- 30 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一卷，第1083页。
- 31 根据文献资料对计划投入这一行动的准确兵力和推迟其实施的拖延行为所作的认真记述，见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一卷，第1075—1083页。美国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杰克逊说，关于埃斯特雷马杜拉进攻计划，卡瓦列罗政府的公共工程部长胡利奥·胡斯特告诉他，“他准备了几十座便携式桥梁并向雷阿尔城派出了许多补给列车”；可是，另一方面，普列托告诉他，“当他于五月二十七日就任国防部长时，根本没有发现任何准备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发动一场攻势的实质性部署”（加布里埃尔·杰克逊，《西班牙共和国与内战，1931—1939》，第372页，注释13）。
- 32 见米亚哈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写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信（现存国会图书馆）；《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90—591页；塞希斯孟多·卡萨多，《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71—72页；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215

- 页；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一卷，第1078—1080页。米亚哈拒不服从命令也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未发表的回忆录《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中得到证实，卡瓦列罗在这部回忆录中说，米亚哈将军“抵制要求进行的部队调动”，见第1158页。
- 33 阿拉基斯塔因，《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13页。另请参阅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215页。
- 34 卡萨多，《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72—73页。
- 35 马丁内斯·班德说明了他的资料来源：解放战争档案馆（A.G.L.）——赤色分子档案（D.R.）——中央军——L.673-C.3和L.691-C.1（《进攻塞哥维亚和布鲁内特战役》，第56页，注释60）。
- 36 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214—215页。
- 37 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79—85页。
- 38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95页。
- 39 同上，第596—597页。
- 40 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219页。
- 41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97页。
- 42 阿拉基斯塔因，《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14页。
- 43 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219页。
- 44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巴伦西亚商报》。
- 45 阿拉基斯塔因，《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14页。
- 46 胡安·西梅翁·比达特，《全都是罪犯》，第656页。
- 47 莫隆，《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60—63页。
- 48 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220页。
- 49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98页。
- 50 同上。
- 51 例如，阿萨尼亚引述的马丁内斯·巴里奥的话，见《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98页；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219—222页。
- 52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98页。
- 53 同上，第600—601页。
- 54 见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的文件，载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六日《巴伦西亚商报》。
- 55 见社会党执委会所发表的声明的第六条，载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八日《社会主义者》。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其未发表的回忆录中证实了社会党执委会支持普列托出任国防部长，见《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第1187页。
- 56 比森特·乌里韦发表在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人民西班牙》上的文章。
- 57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光明报》。
- 58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602页。
- 59 拉尔戈·卡瓦列罗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写给何塞·布列霍斯的信，见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能做什么？》，第20—24页。
- 60 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222—223页。
- 61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自由阵线报》。
- 62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六日《社会熔炉报》。
- 63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六日《工人团结报》。
- 64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六日《社会熔炉报》。
- 65 见刊登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巴伦西亚通讯》上的他的组阁计划。
- 66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八日《社会熔炉报》。

- 67 见刊登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的晚报《巴伦西亚通讯》上的他的组阁计划。
- 68 见西班牙共产党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的晚报《红色阵线报》上的公开信。
- 69 见拉莫内达写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信，载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八日《社会主义者》。
- 70 左翼共和派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答复，载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的晚报《红色阵线报》。
- 71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602页。
- 72 见费乌斯通讯社发自巴伦西亚的报道《在总统办公室举行的会议》，载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工人世界报》。

胡安·内格林上台

由于拉尔戈·卡瓦列罗现在已被抛到一边，阿萨尼亚总统委托一个新人承担组阁的任务。这个人是前任政府的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内格林是加那利群岛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一九二九年加入社会党，现在是代表社会党普列托派核心集团的国会议员，同时还是马德里医学院的一名生理学教授。“我决定委托内格林组成政府。”阿萨尼亚写道，

“公众认为我会提名普列托。但是，由普列托领导那个合并了军事力量的部门更好，因为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担任总理，他突然改变风格——他的‘脾气’——可能不太容易。我觉得，利用内格林淡定的性情……更可取。”¹普列托认为阿萨尼亚不考虑他而是支持内格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阿萨尼亚向我解释说，因为我过于反共以致无法领导一个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所以他没有任命我为政府首脑。这种解释让我感到非常庆幸，没有担任[一个]我无法尽职尽责而且也不愿意担任的[职务]甚至让我更庆幸。”²阿萨尼亚对内格林的偏爱得到了总统的好友和忠实追随者何塞·希拉尔的证实，总统在几天后告诉普列托，他决定任命内格林是因为内格林与共产党人打交道时更“灵活”。他补充说，缺乏灵活性可能在政府内部引起冲突。³

就在阿萨尼亚委托内格林组成新内阁之前，社会党执委会告诉普列托，它决定请求阿萨尼亚把总理的职务交给他。据执委会成员胡安-西梅翁·比达特说，普列托回答道：“只是我与共产党人不好相处而且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关系也不友好。……[共产党人]已经在把内格林的名字当作卡瓦列罗的继任者到处散布。我认为，目前他得到了比我更多的支持。他还具有一种更加冷静、更加随和的性格。我肯定不想在不能指望卡瓦列罗的慷慨支持——[一九三六年五月]当我可能担任总理从而可能避免这场灾难时，我就没有得到他的支持——的情况下接受总理职位。我向你推荐内格林的名字。”⁴

尽管普列托推辞了总理职位，有人仍然认为他希望通过他的好友和追随者内格林控制政府，一九三六年九月，他推荐内格林担任了财政部长。但是，那些认为普列托将成为“实际上的政府首脑”的人“想错了”，阿萨尼亚写道，“不仅因为普列托非常明智不会超越自己的职权，而且因为内格林的性格适合当时那种形势”。⁵无论如何，普列托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不可能知道内格林对西班牙共产党人言听计从到了什么程度，因为，就连普列托这个内战之前激烈反共的人都觉得，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保持友好关系合平时宜。

普列托一九三一年与内格林首次相遇于议会，内格林在那里代表加那利群岛。在描述他所熟悉的内格林时，普列托回忆说：

我们变得非常友好，但是后来我们成为政治对手。造成我们敌对的分歧是因为，在成为政府首脑的同时，他开始对共产党人唯命是从，尽管他矢口否认这一点，但事实充分证明了他的奴颜婢膝。……

胡安·内格林是一个体力和智力超常的人，而且具有迷人的热诚和魅力。像他捣乱的能力一样，他有巨大的工作能力。他完全有可能像在办公桌前一连工作二十四小时那样，离开办公桌一个星期不见踪迹。……

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一九三七年他去那里出席会议，在那个人们肯定认为共和国政府是由暴徒组成的地方，他迷人的风度、他的教养和熟练的外语光彩照人。但是，在通常的议会制度下，他绝不可能

成为总理，甚至不可能担任部长，因为他缺乏演说的天赋。他朗读或者背诵为他写的讲稿的方法在我们的议会不合时宜，通常在那里，即兴演说至关重要。

他有四个人那么大的饭量和酒量，但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到这种饕餮相，他在不同的地方分两三次进餐。许多夜晚，他在家里吃第一顿饭，接着在饭馆里吃第二顿，然后，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某个夜总会里吃第三顿。因为在德国接受教育，他养成了一些让人想起尼禄时期罗马的习惯，例如，排空吃饱的肚子，漱一漱口，然后继续狼吞虎咽又吃又喝。

一九三六年底，财政部审计小额账目的官员详细询问主管人，因为花在阿司匹林上的钱令人难以置信。主管人的解释是，这与事实完全相符。新任部长经常需要阿司匹林，打开药瓶，放进嘴里，一下子把所有药片吞进去。⁶

476 为人随和讲究吃喝，比严厉固执的卡瓦列罗顺从得多，而且可能因其温和派政治背景比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更容易被西方民主国家所接受，内格林早就被苏联贸易代表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选定为卡瓦列罗总理职位的接替者。“[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我在巴塞罗那与斯塔舍夫斯基谈话时，”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写道，“斯大林在西班牙的下一步行动已经开始安排进行。斯塔舍夫斯基没有对我隐瞒胡安·内格林将成为下一任马德里政府首脑的计划。当时，卡瓦列罗被普遍认为支持克里姆林宫，但是，斯塔舍夫斯基已经选择内格林作为他的接班人。”⁷我们已经看到，克里维茨基所揭露的苏联在西班牙的活动后来均被证明准确无误。

由于克里维茨基在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揭露他所知道的内幕后被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斥为江湖骗子，而且由于他的信誉仍然继续受到诋毁，因此，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内格林与斯塔舍夫斯基的密切交往得到了四位著名的共产主义信徒的证实：路易斯·费希尔，他说，在许多经济问题上斯塔舍夫斯基是内格林友好的顾问；⁸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他断言，斯塔舍夫斯基与内格林建立了一种“真正的友谊”；⁹马里亚诺·安索，将在内格林政府中担任部长的他注意到，内格林的“才干和不可抗拒的”

魅力给一些“与他交往”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包括斯塔舍夫斯基；¹⁰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内格林在一九三八年四月组成他的第二届政府后安排这位前普列托派社会党人负责军事调查局（SIM）。尽管含糊其辞地声称内格林“并不在乎”共产党，加尔塞斯仍然承认“他与苏联人相处得很好，特别是与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他每天与其共进午餐”。¹¹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在战后接受我的采访时说，一九三七年二月，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三个月前，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共产国际驻加泰罗尼亚代表“佩德罗”告诉他和另一些党的领导人，支持内格林作为拉尔戈的继任者。¹²甚至像哈佛大学教授胡安·马里查尔那样激赏内格林——他声称，“在最近一百五十年的欧洲历史上，几乎没有人显示出这种才华与性格、完美道德与高度智力的结合”¹³——的人也承认，内格林是“苏联和西班牙共产党人的候选人”。¹⁴

克里维茨基声称，胡安·内格林具有官僚政客的一切素质。“虽然身为教授，他却是一个具有商人眼光的善于处理事务的人。他正好是符合斯大林需要的那种类型。……他将给外界造成西班牙共和国的事业‘合理’、‘正当’的印象；他不会用革命言论吓唬人。……当然，内格林博士认为拯救他的国家的唯一办法是与苏联密切合作。已经显而易见的是，积极的援助只能来自这一个源头。他准备与斯大林全面合作，为保证得到这一援助放弃所有其他考虑。”¹⁵

尽管毫无疑问的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内格林刚一就任总理兼国防部长便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自己的原则，但是，并不能够完全确定他是否早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就已打算抛开所有道德和政治上的顾虑以确保得到苏联的援助。当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坚持认为不能确定“内格林在最初这个阶段是否知道他将接受共产党人的指导，即使知道也不能确定他是否默认了”的时候，他可能说得对。“通过更周密的研究仍然可能发现，”他补充说，“在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先生的过程中，只有苏联和西班牙的共产党人是知道整个剧情的演员，而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先生和内格林博士，除了一些提示的台词和他们正在除掉社会党内的对手这一残酷的事实

之外，几乎什么都不知道。显然，在内格林博士的头脑里，新内阁意味着向右、向权力、向秩序、向集中的一次转变。”¹⁶

在莫斯科看来特别重要的是，内格林实际上与共产党没有正式关系。下面是一段未经证实的私人对话，据说发生在赫苏斯·埃尔南德斯代表共产党政治局拜访内格林向他表示共产党的支持时，这段对话表明，内格林本人肯定同样意识到，他与共产党人表面上的互无关联对于他的共产党后台至关重要，而且最终他将被迫在他对普列托的忠诚与苏联对他的要求之间做出选择：

“博士，”我说，谈话转入见面的目的，“政治局希望向共和国总统推荐你作为总理候选人。”

我观察着内格林。他对我们突然宣布的这个意图没有露出一丝意外或者激动的表情。毫无疑问，关于我要说的事情，他知道的比我更多。……

“你们知道，我几乎不出名，尤其不为公众所知。”

“不要让这困扰你。……名声是制造出来的！如果我们共产党人有什么组织出色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宣传鼓动部门。”我笑着说。

“但我不是共产党员。”

“这是一个有利因素。如果你是共产党员，我们不可能推荐你来当总理。我们希望一个共产党人的朋友当总理——不多不少，只是朋友。”我心照不宣地说。……

“共产党的许多政策在我看来恰当而且明智。”内格林说。

“如果你取代了卡瓦列罗，你在贵党内部不会得到多少支持。……”

“很少，几乎得不到什么支持。”

“但是，你可以依靠共产党人的力量。”我肯定地说。

“只有这样我才能管理。”内格林评论说。

“那你应当能管理。”

“我不希望你们把我的认可理解为我同意做你们的‘稻草人’。不要指望我那样做。此外，我不会对你们党、对我自己的党或者其他

任何人有什么帮助。”内格林若有所思地说。

“我理解你的顾虑并有同感，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的支持将是坚定而且恭敬的，同样，它也将是谨慎的。但是无法防止一件事情发生——你将被贴上‘疑似共产党人’的标签。”我解释说。

“那是不可避免的。……你们打算支持谁当国防部长？”他问道。

“我们不会反对普列托。”

“普列托不是你们的朋友。”内格林说。

“的确，但是，与他的反共倾向可能造成的危害相比，他的个人声望更有价值。”

在表示对普列托的这种看法时，我想到了对于未来的国防部长我们决定遵循的策略。当政治局讨论是否同意普列托担任国防部长时，我们考虑了他在国内外温和派政界人士当中的巨大声望。在这方面，普列托对我们具有利用价值。我们也考虑了他性格中消极的一面。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对胜利没有信心。把进行战争所应负的最重要的责任委托给他不合常规。……各位政治局委员对支持他作为国防部长的候选人犹豫不决。[共产国际代表]陶里亚蒂给了我们以下指点：

“通过支持普列托作为候选人，我们可以把他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只要他不同意为我们效力，我们就应在对我们有利的时候利用他那臭名昭著而且自己承认的悲观主义把他除掉。……[我们]可以设法让他陷入声名狼藉的重重迷雾，以使身为著名社会党领导人的他变得毫无用处。于是，我们的敌人少了一个。”

“我个人非常尊重[普列托]；但你们与他会有问题。”内格林强调说。

“我们应当争取使他‘保持中立’。”我笑着回答道。

“怎么做到这一点？”

“副部长的职位像部长的职位一样重要，而且，由于它的专业因素，有时甚至更加重要。在普列托成为部长后，我们应当要求得到国防部和空军部的副部长职位。……总政治部实际上已经由我们掌握。还有我们与你的友谊。……”

“还有苏联人。”内格林笑着补充道。

“同意吗，博士？”

“同意。”¹⁷

479

由于胡安·内格林升任总理，拉尔戈·卡瓦列罗被打败了，而共产党人则取得了迄今为止他们最辉煌的胜利。内战爆发时，卡瓦列罗比共和派阵营中的任何政治家都具有更实在的影响和声望，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短十个月时间里，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已经在政坛失势，几乎变得无足轻重。他不仅对劳动者总工会和西班牙社会党的加泰罗尼亚地方组织失去了控制，不仅被剥夺了在强大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JSU）中的权力，而且对他在马德里的喉舌《光明报》的共产党人失去了控制，¹⁸同时，他的许多亲密战友以及无数占据着劳动者总工会和社会党地方支部领导岗位的支持者背叛或者抛弃了他。如今，在最后的痛苦挣扎中，他被从总理和国防部长的位置上赶下去，而且很快将被共产党人当作工人阶级的头号敌人猛烈攻击。“从我离开政府的那一刻起，”多年以后他在所发表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回忆道，“拉尔戈·卡瓦列罗不再是那同一个人。他被改变成另一个人。他不再是一名社会主义者，更不必说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了。他是工人阶级的头号敌人。他们叫我自大狂，野心家，顽固派，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愚蠢的称号。[我的]照片从所有地方消失了。他们以捣毁他们自己制造的偶像为乐。”¹⁹另外，在其未发表的回忆录《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中，²⁰他写道：

长期以来在苏联，[卡瓦列罗]是一个风云人物。在所有城市中、剧院里、报纸上、国际标语口号中，他的名字与所有标志着工人阶级解放行动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共产党人]想要利用他因五十年来做出的牺牲而在西班牙工人阶级当中获得的影响来为莫斯科谋利益。他们以各种方式向他献媚：写文章，拍照片，提出政治建议，邀请访问苏联，等等。他是西班牙和无产阶级的救世主。他们以为他的品德像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一样，因此，他将屈服于他们的政策，按照他们的规则行事。但是，当他在政府中逐渐认识到共产党人的欺骗行为并且开始采取措施阻止他们控制军队、总政治部、总参谋部和军需官的

队伍时，当他告诉他们他不会背叛社会党或劳动者总工会并将像一个真正的西班牙人和真正的社会党人那样实施国内外政策时，他就不再是[计划]合并的政党的领导人，也不再是他们以前宣称由他领导的那一切的领导人。

另一方面，依靠利用苏联武器得到的声誉，凭借他们的自我约束能力、凝聚力和无情的力量，通过对几乎整个国家机器的巧妙渗透，同样在短短十个月的时间里，共产党人已经从一种相对无关紧要的地位上升到实际控制反佛朗哥派阵营命运的地位。

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党派的积极支持、默许纵容、毫无戒备的信任和反应迟钝，他们自己绝不可能得到这种权力。正如后来退出西班牙共产党的前共产党人“农夫”巴伦廷·冈萨雷斯在多年以后所质问的那样：

除了极其个别的例外，尤其是在内战初期，有多少西班牙政客和军人没有张开双臂欢迎共产党的代理人并拒绝按照他们的规则行事？至少，我是一个信仰明确的共产党人，因此，我的态度具有某种逻辑性；但是，其他人的态度中有什么逻辑可言呢？如果不是认识糊涂并且串通一气——这几乎是普遍现象——的话，那么，在几个月时间里，一个像共产党这样力量薄弱的政党有可能渗透并且几乎控制整个政府机构吗？……

480

我不是企图为我的错误寻找借口，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应当承认自己的过失。如果我们西班牙共产党人伤害了别人犯了罪，同时完全建立了自己的规则或者试图这样做，那是因为别人没有挺身而出，只有极其个别的例外。……当其他政党和工会组织软弱无能、优柔寡断并且按照规矩行事时，[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相应显得强大了。这是西班牙的教训，如今也是欧洲和世界的教训。只要它们接受了这个教训，它们就能拯救自己，但是，如果它们不接受教训，它们接着还要失败。²¹

注释：

- 1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602页。
- 2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二卷，第94页。
- 3 何塞·希拉尔发表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墨西哥城）《前进报》上的文章。
- 4 胡安-西梅翁·比达特，《全都是罪犯》，第663页。
- 5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603页。另请参阅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274页。“在大多数人看来，”内格林的好友马里亚诺·安索写道，“内格林差不多是普列托的一个稻草人，是由普列托操纵的名义上的政府首脑。这种看法非常普遍，以致在[新政府上台的]第一个月，它被称为普列托-内格林政府，在总理的名字前面加上了这位部长的名字。内格林对此心知肚明并一笑置之。他并没有感到羞辱。在他看来很自然，由于强大的人格魅力，普列托的名字被放在了他这个人们仍然感到陌生的名字前面。毫无疑问，共产党人在他身上看到了他们需要的那个顺从的人。”（马里亚诺·安索，《我是内格林的内阁部长》，第190页）
- 6 《一个奇特的男人》，见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三卷，第219—221页。普列托所说的内格林的饮食习惯在熟悉内格林的圈子里广为人知，一些可靠的消息来源也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关于人们发表的另一一些证言，见塞希斯孟多·卡萨多《马德里的陷落》，第134—135页；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390页；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我们注定要失败！》，第209页；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368页；卡洛斯·皮·苏涅尔，《共和国与内战：一个加泰罗尼亚政治家的回忆》，第474页；弗兰克·塞德威克，《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悲剧与西班牙共和国的命运》，第183页（塞德威克把内格林描写成一个“不得体、不雅观、喜欢捣乱而且不讲道德的人，就连他的朋友都承认，他在私生活中是一个沉湎于食欲和性欲的拉斯普京[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拉斯普京（1869—1916）是一个西伯利亚农民，早年以具有治病的非凡本领而闻名，后来因此成为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宫廷中有权势的宠臣，食量巨大，生活淫荡——译注]式的人物”）；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31页；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336页。
- 7 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在斯大林的情报部门工作》，第100—101页。
- 8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三日（纽约）《民族》。
- 9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最后一个乐观主义者》，第291页。
- 10 安索，《我是内格林的内阁部长》，第188页。
- 11 加尔塞斯·阿罗约发表在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标志报》上的文章。
- 12 一九四四年我在墨西哥对塞拉·帕米埃斯的采访。我们应当记得，据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说，陶里亚蒂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也支持内格林作为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继任者。
- 13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二日《胜利报》。胡安·马里查尔对内格林这种夸张的描述以及他和另外几位著名历史学家——例如曼努埃尔·图尼翁·德拉拉、安赫尔·比尼亚斯、何塞·阿罗斯特吉和赫伯特·R.索思沃思——一起为美化内格林这个人物所做的不懈努力几乎可以被认为是一场通过消除内格林的所有亲共污点“重新奠定”其历史地位的“圣战”。比尼亚斯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四日写给我的一封信中断言，在他看来没有人对“重新奠定[reubicar]内格林的历史地位”感兴趣，可是，他在一九七九年五月号《历史时期》上却把内格林描绘成“共和国伟大的政治家”，接着他还说，“他没有留下回忆录（或是即使留下，至少也没有发表过），以致根据如丛生的荆棘一般相互矛盾的资料和观点重新奠定其历史地位的任务因此变得更加激动人心”。在一篇关于拙著《精心的伪装》法

文版的书评（载一九七八年六月九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中，坚定不移地赞赏内格林的赫伯特·R.索思沃思写道：“我想我可以察觉到已经初露端倪的明显迹象，历史开始重新审视胡安·内格林了。……安赫尔·比尼亚斯关于运往莫斯科的西班牙黄金的那本书为内格林的行为进行了辩护，长期以来，博洛滕派的作家们以一种带有偏见（没有含金量）的眼光看待他的行为。……热烈希望胡安·马里查尔很快将会找到需要的时间和资料继续他对内格林人生的生动阐释。”索思沃思从未解释过他本人不懈支持内格林的原因。乔治·埃森魏因写道：“为了了解索思沃思对内格林的耿耿忠心以及因此产生的对内格林的盲目支持，人们必须记住，他曾经作为一名重要的宣传人员为内格林政府效力。他在一九三八年二月至一九三九年二月之间负责编辑《西班牙新闻》（见《当代作家》，第八十五至八十八卷，第557页），那是在纽约出版的一份新闻小报，即使没有得到西班牙共和派政府的资助或者其他形式的官方支持，它也显然是其政策的喉舌。下面这些反复出现的主题使人确定了它的性质。1. 关于西班牙事态发展的新闻集中在内格林政府的成就上。于是，开放教堂被当作政府保证实施宗教宽容政策的事例列举出来。2. 关于其他事件的报道，无论多么有争议，它总是以某种方式从正面反映内格林政府的情况。在这份小报对一九三八年十月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报道中可以发现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利用从赫伯特·马修斯那样的记者或者其他不是同情就是亲近内格林的消息来源那里得到的消息，这份小报试图把审判描绘成‘共和国司法’一个范例。对案件‘事实’的所有报道都是按照这个角度，因此严重不利于那些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告。例如，尽管这份小报没有公然宣称受审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是叛国者，但它明显暗示被告犯有叛国罪并且从事间谍活动。于是，负责策划这场审判的共产党人所散布的谣言被毫无保留地一再重复，例如，安德烈斯·宁与先后担任过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政治书记和第二十九师师长何塞·罗维拉已经逃到‘叛军控制区’躲了起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日《西班牙新闻》）。3. 最后一点，（在生平特写等形式的报道中）最受关注的共和派人物是支持内格林的亲共分子，例如比森特·罗霍、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何塞·贝尔加明。后者是一位天主教作家，本人代表内格林政府参加过国外的友好活动，他还在为共产党人广泛散发的一本由无名作家‘马克斯·里格尔’撰写的题为《西班牙的间谍活动》的书所作的序言中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描绘成一个间谍组织和国际法西斯组织在西班牙的一个分支。同为内格林的支持者并且经常出现在这份小报专栏里的外国人是赫伯特·马修斯、路易斯·费希尔、古斯塔夫·雷格勒和弗兰克·杰利内克。人们感兴趣地注意到，索思沃思没有谈论过他作为《西班牙新闻》的编辑所起的作用。在就内战问题接受《历史时期》的采访时（一九七八年十月），他没有提到他是内格林政府的宣传人员这一事实，但他确实把这位总理描述成‘内战期间共和派阵营中最杰出的人物’，他还坚持认为，重新评价其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成就的时候已经到了。”感谢乔治·埃森魏因在一九八四年应我的要求进行了一部分重要的研究。

一九七五年佛朗哥将军去世后，索思沃思作为研究西班牙内战的重要权威人士引人注目地出现在西班牙的电视节目中，他把自己对西班牙内战的特定看法告诉观众。由于年龄的原因以及佛朗哥统治时期多年实行的书报检查制度，大部分观众对于内战的复杂性几乎一点也了解。“重塑”内格林形象的最新尝试是在加那利群岛举行的一次纪念这位前总理的学术讨论会（见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加那利群岛报》），图尼翁·德拉拉、胡安·马里查尔、何塞·普拉特斯和胡安·罗德里格斯·多雷斯特（后两人一度担任内格林的助手）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面对众多内格林的辩护士，著名历史学家哈维尔·图塞尔发现自己形单影只。据图塞尔说，最“具倾向性的”发言者不是图尼翁·德拉拉而是胡安·马里查尔（哈塞尔写给我的信）。正是因为有人长期坚持为内格林文过饰非，其主要辩护士刻意防止出现任何与他们永恒不变的立场冲突的证据，我向在马德里举行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历史研究学会第十六届年会提交了一篇关于“胡安·内格林博士的悬案”

的论文。这篇论文与八十九份原始参考资料一起发表在一九八六年一月号《历史16》上。

鉴于围绕着内格林的论战仍在进行，应当从内格林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所写的一份文件中摘录出来下面的内容，以免其逃过人们的注意。这份文件是一九四四年阿拉基斯塔因在伦敦与内格林叙谈五小时后对内格林进行的描述，篇幅长达四十页，从来没有发表过。在断言内格林对物质享受和权力的过度欲望“在很大程度上是病态的”之后，阿拉基斯塔因继续说：“他总认为自己是一个潜在的独裁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偶像是克列孟梭。后来是墨索里尼，现在我怀疑他私下里崇拜希特勒和斯大林。……我一直喜欢这个桀骜不驯、无法预测（背离常规）的人，就像喜欢一个兄弟，或者更确切地说，就像喜欢一个儿子，而且，尽管他满口谎话不讲信义，我仍然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的所有毛病都是一种软弱、幼稚的天性的反映，这种天性只有通过说谎和欺骗才能排解和承受。究其根源，我判断，通过这种冷酷无情他感到的是怜悯和宽恕，因为我认为他没有责任感。不过，我在这次叙谈之后还认为，他的不幸无法挽救，他是一个悲剧人物，对他本人来说这很可悲，最重要的是，对所有其他人来说同样可悲，因此，应该把他当作一个病人来对待。”（阿拉基斯塔因文件，卷宗52/N10^a）这份原始资料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档案，‘内格林卷’”。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的一份没有发表的报告对内格林作了描述，见《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报告，一九三八年九月》，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第92档案柜，第305档案盒B，第7—8页。这份报告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报告，一九三八年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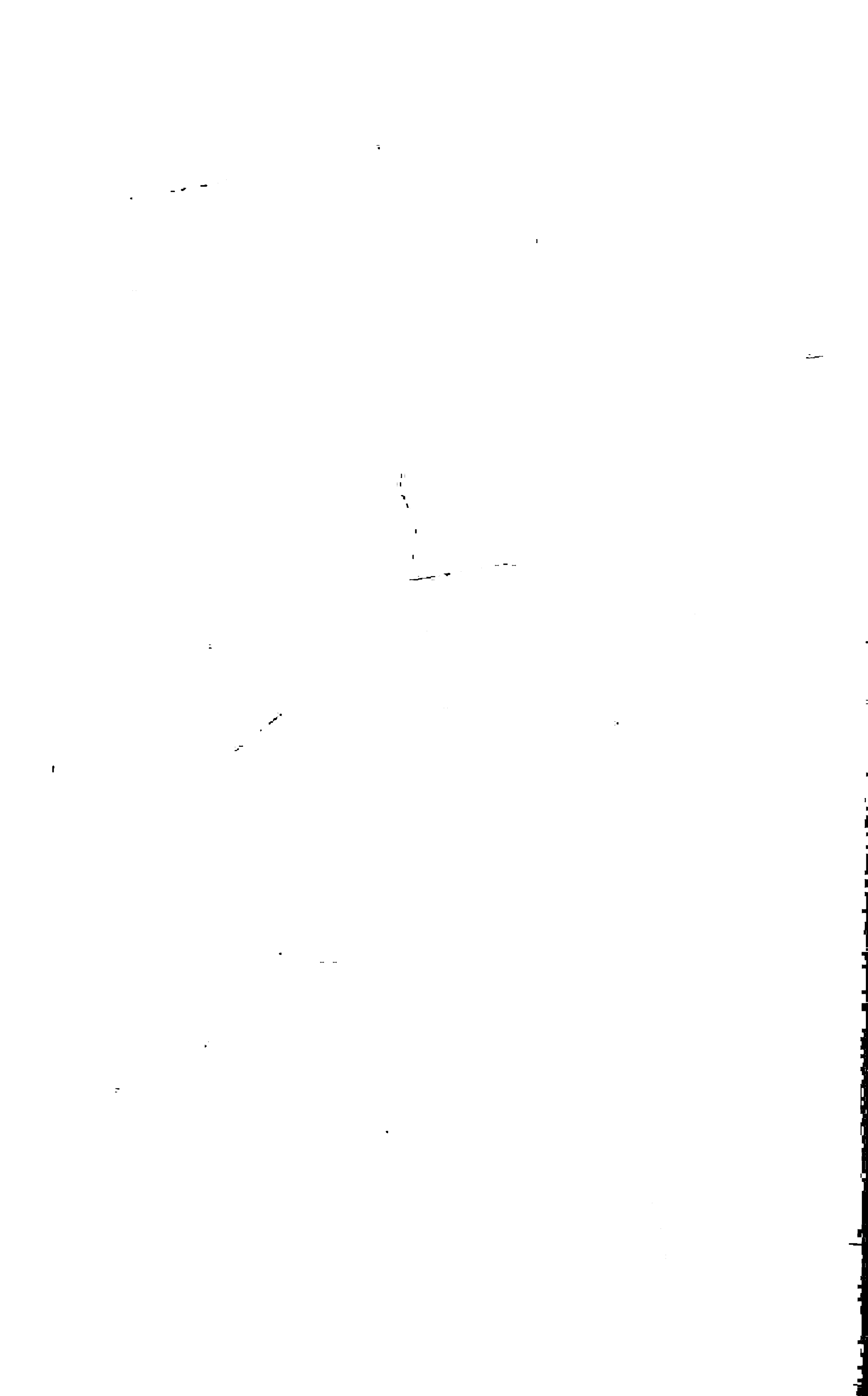
- 14 胡安·马里查尔，《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使命》，第265页。
- 15 克里维茨基，《在斯大林的情报部门工作》，第100—101页。另请参阅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西班牙》，第515页。
- 16 马达里亚加，《西班牙》，第521页。
- 17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86—88页。
- 18 在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三个著名支持者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卡洛斯·德·巴赖瓦尔和阿马罗·德尔·罗萨尔的控制下，创刊时为一份周报的《光明报》于一九三六年四月改为日报。它被劳动者总工会的银行雇员工会组织全国银行联合会——该联合会的主席是年轻而有影响的罗萨尔——以二十五万比塞塔的租金租赁下来。在这份日报的负责人阿拉基斯塔因于一九三六年九月担任驻巴黎大使、报社社长巴赖瓦尔于一九三七年二月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之后，报纸落到了产权转换时被全国银行联合会任命为委托顾问的罗萨尔手中。与阿拉基斯塔因和巴赖瓦尔两人不同，罗萨尔已经偷偷改换门庭转而支持共产党，《光明报》也成为他那两位以前的同事后来所说的“经过怯懦而愚蠢的乔装打扮的共产党的喉舌”（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巴伦西亚通讯》）。更多关于《光明报》的情况，见“巴伦西亚和巴塞罗那的费乌斯通讯社负责人里卡多·德里奥”档案和“《光明报》”档案（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另请参阅玛尔塔·比斯卡尔龙多《阿拉基斯塔因与第二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危机，利维坦，1934—1936》，第419—420页；阿马罗·德尔·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1901—1939》，第二卷，第648页；玛蒂尔德·巴斯克斯和哈维尔·巴莱罗，《马德里的内战》，第374和456—457页。
- 19 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226页。考虑到一九五四年在墨西哥出版的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回忆录《我的回忆》的政治意义而且本书经常引用，澄清所有关于它的真实性的疑问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史学意义。胡安·内格林的坚定支持者安赫尔·比尼亚斯曾经认为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回忆录有问题。当这部回忆录附带一篇卡瓦列罗的好友、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前书记恩里克·德·弗朗西斯科所写的二十一页序言首次面世时，没有人敢于质疑它的真实性，甚至没有人敢于使用比亚尼斯后来所使

用的措辞，暗示它经过“适当的润色”（安赫尔·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314页）。

关于这一点，人们感兴趣地注意到，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头号敌人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见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三卷，第221页）和普列托派社会党人布鲁诺·阿隆索（在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日写给恩里克·德·弗朗西斯科的一封信中，这封信现存马德里的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基金会）都对《我的回忆》的发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并未质疑其真实性。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二日，（流亡中的西班牙社会党书记）鲁道夫·略皮斯写信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儿子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尔沃，鉴于党的敌人利用这部回忆录“在我们的队伍中挑拨离间”的危险，极力劝说后者重新考虑发表它是否明智，略皮斯在这封信中也没有说回忆录的可信性有问题（阿拉基斯塔因文集，卷宗42/140）。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官方的《西班牙共产党史》从《我的回忆》中引用了几行文字，并没有怀疑其真实性，见第160页。但是，最近几年，在某些人竭力为内格林这个人物文过饰非并且消除其身上的亲共污点的尝试中，指责内格林将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出卖给共产党的《我的回忆》（第230页）受到攻击。不幸的是，由于要为内格林辩护，对内战史研究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比亚尼斯在这场攻击中亲自出马，充当了最引人注目的角色。“有必要提到的是，”他在一九七九年写道（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138页，注释12），“这部回忆录实际上可能不是这位社会党领导人所写的。盛传它是出于政治目的伪造的。不过，我们没有发现佐证的文件。……今年，真正的[‘las auténticas’]回忆录将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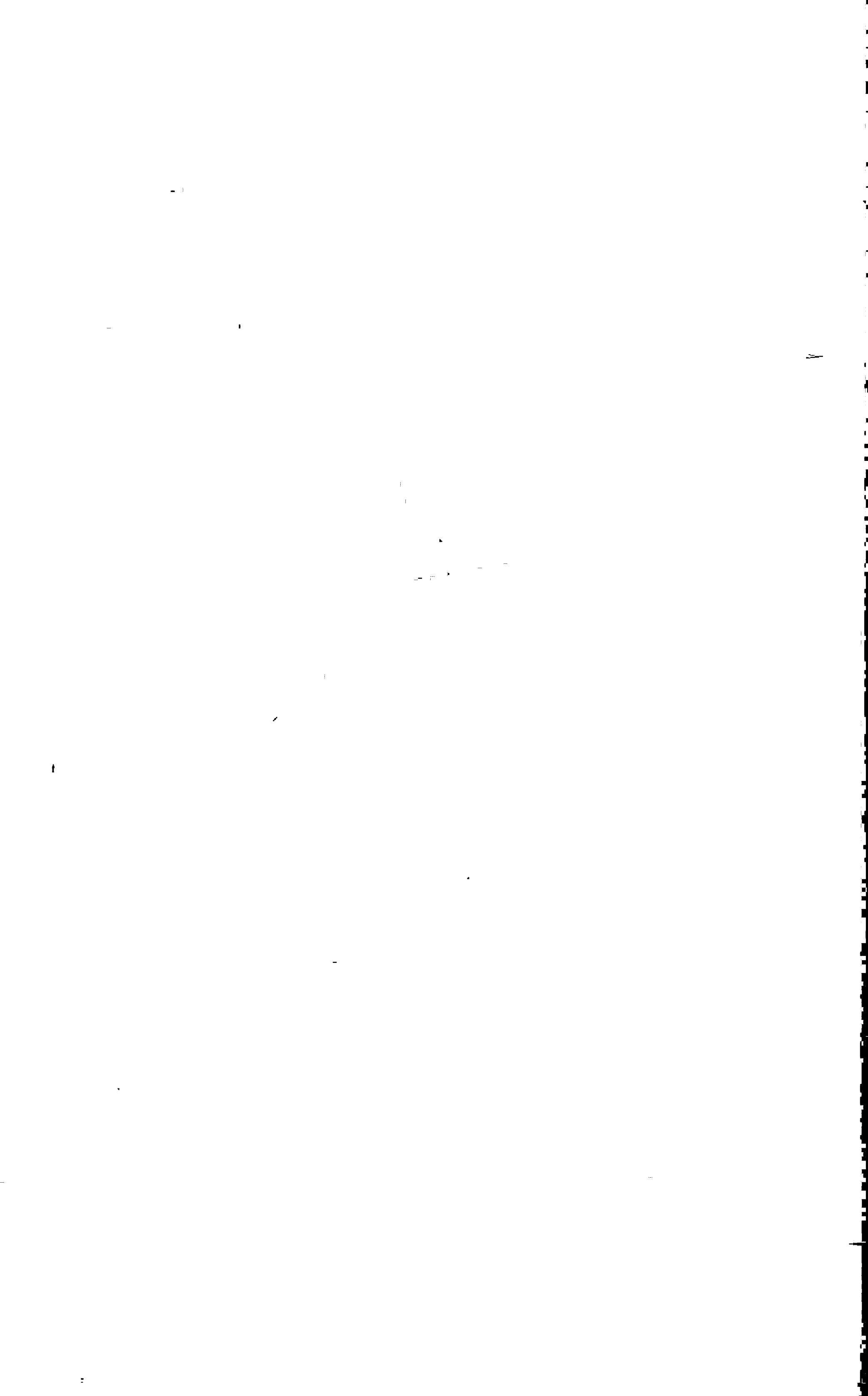
莱昂诺尔·梅嫩德斯·德·贝尔特兰和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在写给我的信中有力地谴责了根据这一说法作出的《我的回忆》不足为信的结论。他们是拉尔戈·卡瓦列罗亲密的政治伙伴，而且对（拉尔戈·卡瓦列罗一九四五年从德国集中营获释之后根据回忆所写的）《我的回忆》和题为《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的“真正的”回忆录都很熟悉，后者由一千五百四十一页打印稿组成，每一页上都有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签字（这部回忆录撰写于一九三七至一九四〇年间，当时他有文献资料的帮助）。这部打印稿的一份影印件存放在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基金会。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基金会无法控制的原因，它年复一年迟迟没有出版。因为确定《我的回忆》真实性的重要意义，我求助于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基金会的奥雷略·马丁·纳赫拉，他友好地委托他的同事、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历史研究的权威安东尼奥·冈萨雷斯·金塔纳将《我的回忆》与《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进行对比。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冈萨雷斯·金塔纳在交给我的一份二十七页的报告中作出了以下明确的陈述：“在对比了《我的回忆》和《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的文本之后，我认为我可以有把握地证明，两个文本在重要和基本的问题上准确而且内容相似。”冈萨雷斯·金塔纳的报告以及我与马丁·纳赫拉、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莱昂诺尔·梅嫩德斯·德·贝尔特兰和安赫尔·比尼亚斯的通信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和《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档案）。写完这条注释后，《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的第一卷出版了（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共和国时期的文稿：桑托斯·胡利亚编辑、作序并注释》，1985），它涉及一九一七至一九三六年这一时期。涉及内战和战后时期的后面两卷没有设定确切的出版日期。

- 20 拉尔戈·卡瓦列罗，《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第1179页。关于拉尔戈·卡瓦列罗发表和未发表的回忆录的重要信息，见本章注释19。
- 21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一日（巴黎）《工人团结报》。关于有人声称“农夫”的文章和几本书皆为胡利安·戈尔金所代笔，见本书第十七章。



第六部分

革命陷入低潮



内格林政府与自由主义运动的反应

包括内格林一九三七年五月上台到内战结束的这个时期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西班牙共产党和内格林政府努力收紧权力的缰绳以及革命持续处于低潮为特征；第二个阶段的特征是拉尔戈·卡瓦列罗从政坛消失、新任国防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试图结束共产党控制军队的局面以致他在一九三八年四月被逐出政府；第三个阶段以内阁重组、内格林集总理和国防部长于一身以及共产党人的权力达到巅峰为标志；第四个阶段的特征是派别斗争和幻灭感不断加剧、政府争取英-法支持的枉费心机以及不可阻挡的军事溃败；第五个阶段的标志是共产党的权力和影响力崩溃以及一九三九年三月内格林及其共产党盟友被一个左派和温和派联合政府推翻，这个政府试图与佛朗哥将军通过谈判达成一个不进行报复的停战协议，但白忙一场。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组成的内格林政府的成员如下：¹

胡安·内格林	社会党	总理兼财政部长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	社会党	国防部长
胡安·苏加萨戈伊蒂亚	社会党	内政部长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	共产党	教育和卫生部长
比森特·乌里韦	共产党	农业部长
何塞·希拉尔	左翼共和派	外交部长
贝尔纳多·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	共和联盟	公共工程部长
曼努埃尔·德·伊鲁霍	巴斯克民族独立党	司法部长
海梅·艾瓜德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劳工和社会福利部长

484

与由十八个人组成的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相比，新政府只有九名成员，它排除了社会党左派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相对加强了共产党的力量。“与拉尔戈·卡瓦列罗不同，”苏联驻英国大使伊万·迈斯基回忆说，“新总理知道与共产党合作的极端必要，而且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拒绝加入他的内阁并不感到特别忧伤。他大胆地将部长的数量从十八人减少到九人。这使政府更加精干和有效，而且最重要的是，共产党人在政府中的比例大幅度提高。”²

政府在组成的当天宣称，它是所有党派的真正代表，它对争取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加入内阁的努力失败表示遗憾，它不会允许任何组织采取暴力行为，无论其意识形态是什么。³

自由主义人士的反应充满了火药味。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报纸纷纷斥责政府是“反革命”。⁴五月二十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把西班牙共产党描绘成“反革命政党”，称其“与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党以及社会党右派狼狈为奸”实现了以“巴塞罗那挑衅”和组成新政府为高潮的“政治阴谋”。它还指责共产党人是“一个国家和国际阴谋的代理人”，并且宣称，最重要的是，人民应当考虑对共产党的罪行“进行清算的那一天”。不过，他接着说，“无论出现了什么人，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革命将会继续进行。“工人群众在这里准备重申他们的革命意志和反对新的红色耶稣会士以巧妙的手法玩弄的花招的坚定决心。”⁵

五月二十九日，全国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发表了一份关于刚刚结束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报告。这次全体会议特别作出决议，不与政府“直接或者间接”合作；在军队中广泛进行反对

“反革命政府”的宣传；与劳动者总工会达成协议，以便开展一场联合抵制运动。⁶

但是，这些大胆的决议被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对手看作虚张声势；因为，仅仅两天之后，以马里亚诺·巴斯克斯为首的全国委员会代表就登门拜访内格林，“讨论使合作成为可能的条件”。⁷这种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的原因显而易见。由社会党温和派和共产党人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全国委员会刚刚发表声明放弃了社会党左派控制的执委会在内阁危机期间采取的立场。⁸人们应当记得，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宣称，它只支持由拉尔戈·卡瓦列罗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的政府，这一立场得到了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大力声援。由于担心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全国劳工联合会决定转变立场，谋求加入政府。在六月八日发表的一份“最低限度方案”中，全国委员会提出，在所有关于国防、经济和社会治安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共和派与自由主义者权力平等。它还建议在另外一些领域设立“咨询委员会”，由数量相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代表组成。⁹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过分的要求”¹⁰——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这样形容它们——根本不切实际，因此，不出人们意料，它们化为泡影。

485

曾被视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意识形态堡垒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也愿意背离它战前作出的不问政治的承诺，结果，内格林政府的组成所产生的直接作用反映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召开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全体会议所通过的一项决议上。在四天的会议期间，与会者一致认为，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应当创建一种“新的组织结构”，联盟的核心——小型的亲同性小组（grupos de afinidad）——将解散，被包括大量成员的地方、区域和地区组织（agrupaciones）所取代。这样一来，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将变成一个“扩展至西班牙的公众生活”，并且“从形成政权机关普遍基础的所有地方推动革命”的群众组织。¹¹正如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团体联合会书记亚历杭德罗·希拉韦特所解释的那样：“关于新的组织结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发现自己在那样的条件下既可以确定革命的方向，也可以指导革命的进程。在革命爆发之前，当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秘密存在于法律与违法的边缘时，当它有时不得不在与资产阶级和国家

的斗争中有组织地使用暴力时，建立在亲合体基础上的旧的组织结构非常有效。如今，面对为我们提供了光明前景的新形势，对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来说，维持在当前现实中的边缘地位是荒谬的。”¹²

希拉韦特没有提到，以其新的组织形式，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实质上将变成一个政党，因此，这项建议无论如何必须提请半岛代表大会批准。¹³建议联盟进行改组遭到那些反对自由主义运动政治化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严厉批评。例如，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著名成员费利佩·阿莱斯将这个不问政治的中坚力量称为“新的参政党”。在他看来，这决定性的一步相当于抛弃了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一切：“通过把自己组成一个新的政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是在宣称，人民没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正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在战壕里和街垒后面做了政府做不到的事情的那些人。……[他们]同样也是耕种这片土地的人，也是运输货物、改良土壤、在陆海空战斗中牺牲的人，可是现在，他们只是一群土包子。”¹⁴

486

无法准确地估计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内部对改组的抵制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从亚历杭德罗·希拉韦特的言论判断，阻力很大，以致“意见分歧达到了以分裂相威胁的程度”。¹⁵面对这个“严重的问题”，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以“寻找一个使对立的意见统一起来的解决方案”。委员会决定，“大量反对者”将被允许继续作为亲和性小组的成员，“但是，他们提出的关于组织性质的建议只能按照他们的小组所代表人数的相应比例加以考虑”。¹⁶不过，这一妥协方案必须提请半岛代表大会批准，由于没有记录显示曾经召开过代表大会，因此，这一变通从未获得正式批准。¹⁷

与此同时，五月三十一日，阿萨尼亚总统——一年后他在日记中悲哀地记载，内格林总是不与他商量便采取行动，所以告诉他的都是既成事实¹⁸——做出了下面的乐观评论：“新政府普遍让人感到满意。人们松了一口气。他们期待活力，决断，管理的意志，恢复处理国事的正常方法，遏制无秩序的状态。由于相信政府很快就会结束后方的混乱，公众的忧虑……有所缓解。这是最棘手的问题。新总理对他的计划、他的权力充满信心。他断言，战争将会长期继续进行下去（再打一年！），他正在为此做好准备。极少为人所知而且仍然年轻的内格林聪明、有教养，他认识到问题并了解

它们。……人们也许同意或者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现在我对政府首脑说话时，不再觉得自己是在对死人说话。经过这样几个月后，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新鲜的快乐。”¹⁹

尽管内阁具有温和的表面特征，共产党人实际上也只占据着与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中数量相同的两个位置，不过，它的组成是骗人的。

首先，虽然普列托派社会党人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被任命为内政部长，但是，共产党人不仅保留了他们以前在警察部门占据的所有关键岗位，而且共产党员安东尼奥·奥尔特加中校²⁰被任命为安全总局局长，取代了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支持者文塞斯劳·卡里略。在内格林的要求下，普列托派社会党人、社会党执委会成员胡安-西梅翁·比达特接任内政部副部长。在劝说其接受这一职务时，据比达特说，内格林讲了下面这段话：

“喂，比达特，我让苏加[苏加萨戈伊蒂亚]担任内政部长，因为普列托要求我这样做。实际上，这就好像普列托同时担任两个部长。我对苏加不甚了了；他不是我的朋友。他是普列托的人。另一方面，共产党人要求我让奥尔特加中校担任安全总局局长，他无条件地支持他们。……我在这个部门还有谁？我不是向你提供一个职位，我是在请求你支持我。”²¹苏加萨戈伊蒂亚在他的书中谈到奥尔特加“从温和的共和派人士迅速转变成为狂热的共产党人”，说他是自己“理论上的下属”；苏加萨戈伊蒂亚还声明，他没有任命奥尔特加担任安全总局局长。²²这一点得到了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曾任阿尔瓦塞特省省长和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书记的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的证实。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说，当苏加萨戈伊蒂亚接管内政部时，内格林已经“按照共产党人的吩咐”将奥尔特加中校安排在安全总局局长的位置上，而且还任命了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的安全部门负责人。整个警察部队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剧烈动荡”，他补充说，“结果，它完全被共产党人控制了”。²³关于共产党人在警察部门处于支配地位的更加令人信服的证据是内格林的朋友比达特提供的，他援引上司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的话说，内政部和安全总局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和亲信的老窝”。²⁴

当然，共产党人并没有公开承认他们对警察机构的渗透，但是，在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中，他们对警察机构的控制不言自明。内战史写道，政

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以加强社会治安，把所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²⁵

内阁表面的温和特征还在另一个方面让人受骗。虽然由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担任国防部长，亲共的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仍然留在总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正如普列托六月二十九日向阿萨尼亚抱怨的那样，这个部门“几乎全都是共产党人”，而“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充当的是稻草人”。²⁶另外，拉尔戈·卡瓦列罗颁布的遣散所有到五月十五日其任命和级别没有得到确认的政治委员的行政命令被搁置，使共产党人牢牢地控制了这个至关重要的机构。人们还会记得，共产党加入新政府的条件之一是，在所有与政治委员的任命和政治方针有关的问题上，总政治部应当享有自主权。据比达特说，当记者问内格林，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私人朋友是否将加入他的政府，内格林回答道：“当然不，除了总政治部主任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之外。”比达特评论说：“大家知道……拉尔戈·卡瓦列罗当时最讨厌的就是他曾在内阁无情训斥过的这位前外交部长。但是，内格林把科学家的严肃与人间的幽默结合了起来。”²⁷

此外，被拉尔戈·卡瓦列罗免去国防部战术参谋部门负责人职务的共产党员安东尼奥·科登中校被再次委任这一职务；²⁸同为共产党员、被拉尔戈·卡瓦列罗从国防部总参谋部调走的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少校重新出现在国防部；被从高度敏感的情报监控部门免职的亲共军官埃莱乌特里奥·迪亚斯·滕德罗上尉官复原职；米亚哈那位才华出众、政治态度暧昧却左右逢源的参谋长比森特·罗霍少上校被任命为总参谋长。²⁹毫无疑问，作为普列托担任国防部长的条件之一，所有这些安排都是根据他与共产党人之间事先达成的协议作出的。

488

与此同时，将缺乏战斗力和纪律性的民兵武装改编成为人民军部队的工作也在普列托的领导下加快进行，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党的努力，它认为，新军队的凝聚力、战斗力和纪律性不仅是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而且是控制政府的基本前提。六月二十三日，取缔最后一些民兵指挥部的法令颁布了。³⁰“这样一来，”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写道，“所有武装力量都在各个前线参谋部的控制之下，因此也在总参谋部的控制之下。由于内格林博士的政府所采取的这些措施以及另外一些措施，各个前线的民兵部队

均被整编成为正规军，于是，在整个共和派控制区，确立了纪律和统一指挥。”³¹

最后，尽管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外交部被阿萨尼亚的好友、前总理何塞·希拉尔所取代，然而，他离开后在外交部及其所属机构——包括负责对外宣传的西班牙通讯社和对外新闻司——留下了一批共产党人工作人员。另外，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加入共产党的费德里科·梅尔乔被任命为宣传总监。³²

共产党人有充分的理由为事态发展欢欣鼓舞。实际上，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日提交莫斯科的一份报告中说，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无疑冲昏了某些同志的头脑”。他写道，他们认为他们的成功完全应当归功于党，忘记了温和派与普列托一起“在策划和解决危机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接着说：“这种错误的判断使他们认为，党已处于可以提出控制权问题并为夺取政府和国家的控制权公开进行斗争的地位了。”³³

西班牙共产党此时应当摆脱一切束缚公开夺权的想法不符合斯大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给拉尔戈·卡瓦列罗出的主意：“为了防止西班牙的敌人说它是一个共产主义共和国”，应当尽可能争取得到阿萨尼亚及其中产阶级共和派的支持。这一政策没有改变，因此，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保证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遵循克里姆林宫的路线是陶里亚蒂的任务。“只要与我们的同志交谈并且听一听他们的讨论就能发现，”他在提交莫斯科的报告中继续写道，“时至今日（一九三七年八月）他们仍然没有完全弄清这个问题。我们的任务之一是向他们解释这个问题并帮助他们理解它。”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糊涂认识”非常严重，以致有些同志提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为消灭一切资本主义因素而斗争”并且“防止它们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他们还得出结论，“只有一个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政府”才能实现这一方针。“显然，”陶里亚蒂评论说，“这些具有如此糊涂认识的同志不可能懂得，在卡瓦列罗下台之后，他们的任务是向政府施加压力敦促其执行人民阵线的政策[即，共产党可以用来掩盖其控制目的的政策]，同时通过开展适当的政治工作分化瓦解无政府主义者和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的队伍来扩大政府的基础。”³⁴

我们将在后面的一些章节里看到，在共产国际神秘的政治王国中，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注释：

- 1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八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2 伊万·迈斯基，《西班牙笔记本》，第136页。
- 3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八日（马德里）《社会主义者》。
- 4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八日《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土地与自由》。关于其他对政府的严厉指责，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文化与行动报》；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思想报》和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工人团结报》。
- 5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
- 6 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
- 7 见巴斯克斯发表的声明，载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六月二日《社会熔炉报》；一九三七年六月二日和三日《工人团结报》。
- 8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巴伦西亚商报》。
- 9 一九三七年六月八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
- 10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三卷，第100页。
- 11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 12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土地与自由》。
- 13 见弗农·理查兹《西班牙革命的教训，1936—1939》（一九八三年版），第149页。
- 14 一九三七年（第一期）《努力》。对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的描述，见理查兹《西班牙革命的教训》（一九八三年版），第144—149页。
- 15 希拉韦特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工人团结报》上的文章。
- 16 希拉韦特援引了委员会的这一决定，见其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工人团结报》上的文章。
- 17 我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报纸或档案中没有发现召开半岛代表大会的报道或记录。这些报纸或档案现在以缩微胶片的形式存放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
- 18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877页；另请参阅第880—883页。
- 19 同上，第四卷，第603页。
- 20 关于奥尔特加的共产党员身份，例证见《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638页所援引的普列托的话；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89和98页，（接替奥尔特加担任安全总局局长的）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加夫列尔·莫隆，《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95页所援引的苏加萨戈伊蒂亚的话。
- 21 胡安-西梅翁·比达特，《全都是罪犯》，第670页。
- 22 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279—280页。着重体是我加的。

- 23 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218页。另请参阅莫隆《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100—102页，他讲述了自己作为安全总局局长为使安全总局和警察部队摆脱共产党人的影响而进行的徒劳的努力。
- 24 比达特，《全都是罪犯》，第751页。
- 25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三卷，第89页。
- 26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638页。
- 27 比达特，《全都是罪犯》，第672页。
- 28 第一百二十七期《国防部官方日志》，见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二卷，第1206页，注释1。科登后来被任命为阿拉贡前线东路军参谋长。
- 29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国防部官方日志》。对罗霍的热情赞扬见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日《红色阵线报》。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他被普列托晋升为将军（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国防部官方日志》）。
- 30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31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三卷，第88页。
- 32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共和国官方公报》。另请参阅刊登在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六日《国家报》上的讣告。
- 33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36页。
- 34 同上，第136—137页。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取代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为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主导力量

在五月事变导致巴伦西亚当局接管了其社会治安和防务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内格林政府的组成巩固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所取得的政治胜利。五月五日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地区军事指挥官并且兼任在邻近的阿拉贡前线作战的东路军司令的自由共和派人士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内战爆发时他是国民卫队的长官，一九三六年十月担任中路军司令时暗中加入了共产党——公开加入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¹在未来几个月时间里，他将给予共产党人充分的自由。波萨斯得到两名共产党员的协助：他的第一政委、前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比尔希略·利亚诺斯和刚刚被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任命为东路军参谋长的安东尼奥·科登。²此外，战事进行期间为使突击卫队顺利通过加泰罗尼亚地区而被内政部长安赫尔·加拉尔萨任命为巴塞罗那警察部队指挥官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同情者埃米利奥·托雷斯中校六月八日被前马德里警察部队指挥官、共产党员里卡多·布里略中校所取代。³

五月战事结束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政治势力的扩张通过它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越来越凶猛的攻击显示出来。六月一日，党的书记胡安·科莫雷拉发表了一次激烈程度超过以往的演

说，他在演说中谴责了“通过凶恶的胁迫、暴力以及必要时暗杀等手段在城镇和乡村强制实行的集体化”，他还怒斥了“控制着工人群众的强大工会的专横意志，工人在巴塞罗那街头遭到随意追捕”，然后被“指控和处决”。他宣称，这些强大的工会攻击“下层中产阶级，破坏经济结构，破坏工业、商业和银行储备——正是后者构成了我们重建经济的基础”。最后他说，存在着“有计划有组织的走私贵重金属和商品以及囤积货币的活动”。⁴

（当然，这些指责有一部分是事实。例如，为了购买武器和补给，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确实出口贵重金属，但是，必须完全公平地说，与运往苏联的大批黄金相比，出口的数量微不足道，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运往苏联的黄金构成了国家的财政储备。⁵其实，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人对其更为不满的是它对主要港口和法国-西班牙边境的控制，这种控制使它可以通过自己的出口实体把值钱的农产品运往国外换取大量外汇。⁶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认为这种控制是一个不容剥夺的革命成果，而中央政府则把它看成是对不可废除的国家权力的一种冲击。最终，事实证明，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只能用武力来解决，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胡安·内格林把他的边防警察部队派往法国-西班牙边境，夺取了革命者手中的控制权。问题的核心是，无论其政治构成如何，只要希望自己作为一个政权有效地运转，没有任何政府能够承受失去这些重要的权力组成部分所产生的后果。因此，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作为革命左派的死对头，从一九三六年九月进入财政部的那一刻起，内格林就发现自己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势不两立。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内格林政府中担任内政部长的社会党温和派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说，总理兼财政部长“并不希望无政府主义者加入政府”，因为他想“解散全国劳工联合会成立的所有出口组织”，从而“一劳永逸地杜绝”因把杏仁、柑橘和藏红花运往国外所造成的外汇损失。⁷）

尽管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对手遵循其“造成消极后果”的路线，科莫雷拉继续说道：“我们始终坚持自己的路线，因此，今天力量对比的天平与内战初期不同了。……今天，凭借经验，广大群众已经可以通过日常事态发展的事实辨明，我们的路线正确而且真诚。今天，力量对比发生

了变化。天平已经开始倾斜，这种变化意义深远。”

另外，关于自由主义运动最敏感的问题之一，科莫雷拉谴责全国劳工联合会对公共事业和服务的控制。他强烈要求用一个新政府取代五月事变期间所组成的临时政府，新政府应当“把全部设施交给市政委员会，以使所有公共服务立即归城市管理，尤其是交通运输、煤气和自来水工程、公共娱乐、住房、屠宰场和集市”。他接着说：“例如，有人说，谈论公共交通是反革命，因为这意味着夺走工人拥有的东西。……我们想形成一个特权阶层吗？我们想形成一个新的贵族、新的资产阶级吗？成千上万名工人难道是为了让我们最终可以用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电车有限公司取代巴塞罗那电车有限公司而战死在前线的吗？”⁸

492 另一方面，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坚称，他们并不反对将公共服务归城市管理。“我们已经声明而且将在必要时反复重申，”《工人团结报》说，“将公共服务归城市管理与我们的原则一致。但是，必须保证市政委员会摆脱官僚主义的惯性并且清除旧时代政治生活中固有的道德败坏。”⁹这等于变相说，只要他们没有控制市政委员会，就不会同意将公共服务归城市管理。尽管自身势力有所增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并不能够自行其是，因为，在巴塞罗那市政委员会讨论城市管理的问题时，由于担心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得到过多的权力，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站在了一边，它声称：“在它看来，除非得到工人阶级同志的有力合作和充分理解，否则的话，无法实行[城市管理]。”¹⁰不过，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继续施加压力要求将公共服务归城市管理，¹¹就像它们为削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经济实力而要求将基础工业国有化时所做的那样。¹²

此外，革命初期建立的革命执勤小分队治安巡逻队——试图将其解散然后并入统一的内务治安部队是三四月份在加泰罗尼亚引起争议而造成政治僵局的主要问题之一——再次成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攻击的对象。¹³六月四日，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自治政府内务专员卡洛斯·马蒂·费塞德发布行政命令解散治安巡逻队，¹⁴他根据的是三月份通过的解散巡逻队、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并将它们合并成为一支统一的内务治安部队的法令，《工人团结报》曾痛斥这项法令“与劳动人民的斗争和愿

望格格不入”。¹⁵人们应当记得，马蒂·费塞德是五月四日在巴塞罗那战斗进行期间所组成的临时政府的四名成员之一。但是，作为自治政府社会治安力量的首脑，他实际行使权力的时间非常短暂，因为，在五月五日中央政府接管社会治安后，他成了巴伦西亚当局任命的社会治安代表的一名微不足道的助手。注意到社会治安代表曾经告诉他不再需要巡逻队执勤，因此，他发布的行政命令规定，根据三月份通过的法令，巡逻队员个人可以申请加入统一的内务治安部队。由于实际上根本没有组建统一的内务治安部队，而且对解散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只字不提，¹⁶显然，援引三月份通过的法令只是为了给解散巡逻队提供法律支持。几天后，社会治安代表何塞·埃切瓦里亚·诺瓦宣布，他已经发布命令以保证巡逻队员“在四十八小时之内”交出他们拥有的全部装备和营房。¹⁷尽管镇压巡逻队的抵抗所用的时间超过了四十八小时，¹⁸但是，到六月底时，作为一支有组织的革命武装，它永久性地消失了。

值得注意的是，已被任命为巴塞罗那突击卫队指挥官并且将在一九三八年四月成为内格林手下的安全总局局长的共产党员爱德华多·奎瓦斯·德拉·培尼亚上校¹⁹把发布行政命令以及随后解散巡逻队自诩为他的功劳。他声称，加泰罗尼亚当局（显然是指那位胆怯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自治政府内务专员）最初坚决反对采取这一措施，因为它会带来危险：“一些[民兵]部队可能离开前线向巴塞罗那进军。他们没有说服我。我的决定不可动摇。……第二天，命令发布了，然后，我们在没有发生严重暴力事件的情况下占领了营房。巴塞罗那再一次可以自由地呼吸了。”²⁰

在此前的几周时间里，全国劳工联合会坚称巡逻队在五月战事中保持了中立，希望挫败任何解散巡逻队的企图。²¹这种辩解不起作用，因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公开宣布，巡逻队死伤五十七人，其中死亡十七人。²²同样不起作用的是巡逻队本身做出的姿态，它们表示愿意为托雷斯中校和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效力，这种姿态虽然得到托雷斯的支持，但却遭到孔帕尼斯主席的拒绝。²³他的断然拒绝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现在中央政府接管了社会治安，他不再把政治生存的希望寄托在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和解上，而是寄托在它们的武装力量迅速瓦解的期待上，无政府主义武装力量的瓦解将导致巴伦西亚当局把社会治安的

控制权归还给自治政府，挽回其作为公认的加泰罗尼亚自治的捍卫者的声誉。因此，尽管孔帕尼斯表达了中央政府不应接管社会治安而应向自治政府派遣援兵的观点，²⁴但他仍然主张迅速在后方收缴武器并且夺取军火库，同时敦促巴伦西亚当局对边防哨所进行“清理并收缴武器”。²⁵人们应当记得，在五月事变之前，随着内格林派遣的边防警察部队的到达，收回法国-西班牙边境地区控制权的工作已开始进行，接着，在六月二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边防民兵”被正式解散。²⁶但是，结果让孔帕尼斯感到失望，因为，中央政府不仅利用边防警察部队夺取边防哨所的机会迅速恢复了对加泰罗尼亚边境地区外贸生意的控制，²⁷而且还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转移到了巴塞罗那，粉碎了他对社会治安控制权回归地区政府所抱的希望。

如果解散巡逻队、收缴后方的武器以及夺取边防哨所是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一种沉重打击的话，那么，同样沉重的打击是，他们失去了在这一地区的无数城镇和乡村所拥有的权力。五月十五日，迄今为止一直抵制自治政府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所颁布的法令——该法令规定，由地方行政委员会取代革命委员会，各党派组织按照其在自治政府中的代表比例占有地方行政委员会中的职位²⁸——的各种革命委员会被加泰罗尼亚政府宣布为非法。²⁹实际上，早在五月中旬被宣布为非法之前，许多革命委员会就被最近开到的突击卫队和边防警察部队推翻了。而且，已经根据十月九日法令成立的一些城镇行政委员会将全国劳工联合会排除在外，³⁰另外，七月五日召开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塔拉戈纳省代表大会投票决定，将那些积极参与五月事变以及没有谴责事变的团体排除在各个市政委员会之外。³¹

无政府工团主义革命力量的衰退加深了那些比较激进的团体对温和领导阶层的敌意。成立不久的激进团体杜鲁蒂之友会的喉舌《人民之友》在五月下半月出版的第一期上指责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地区委员会已经因为它们“无能和胆怯”“背叛了工人和革命”。³²地区委员会立即开除了这个激进团体并且发表了一份声明，将杜鲁蒂之友会的指责斥为“非常严重的恶意诽谤”，同时指示把所有“不公开表示反对该团体所采取的立场”的杜鲁蒂之友会成员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开除出去。³³作为无政府主义运动内部意见分歧日益加剧的征兆，自由主义青年运动巴塞罗那地方联合会、伊比利亚自由青年联盟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和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团体联合会拒绝签署这份声明。³⁴

六月中旬，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不可避免地又进行了一次重大改组。五月事变期间组成的临时政府不起作用。在六月一日发表的谴责性演说中，胡安·科莫雷拉要求结束“这种过渡时期的政治局面”，组成一个能够“承担战争赋予的责任并且能够应对经济重建问题”的“稳定的政府”。³⁵六月十九日，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喉舌《土地与自由》全文发表了一份“秘密政治报告”，它声称这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发给地方支部的，概述了它的改革计划。报告说，新政府将是一个“强大的人民阵线政府”。它的任务是“安抚情绪并使那些对反革命活动负责的人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将向全国劳工联合会提供政府职位，“不过是以一种让它感到不得不拒绝参与的方式”。尽管无法证明这份报告的真实性，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很快发现自己中了别人设下的圈套，以这份报告暗示的方式失去了它在政府中的职位。

在六月底开始的组建新内阁的谈判过程中，最初有关方面一致同意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各有三个政府职位，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一个，而孔帕尼斯主席将亲自担任政府总理。³⁶但是，在最后一刻，孔帕尼斯否决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反对意见，向著名人类学家、加泰罗尼亚共和行动党成员佩德罗·博什·希姆佩拉提供了一个政府职位，加泰罗尼亚共和行动党是一个小型中产阶级政党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盟友，从而相对加强了左翼共和派的力量。全国劳工联合会谴责这一行为是个“圈套”，是一种“欺骗”，并且通知孔帕尼斯，它“绝不同意这一任命”。³⁷由于没有察觉到这可能确实是一个圈套，全国劳工联合会明确宣称，如果孔帕尼斯不撤销这一任命的话，它将不会加入政府。³⁸

显然，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没有意识到政治天平已经向不利于他们的方向倾斜到了什么程度，因此可能抱有幻想，以为孔帕尼斯不会企图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执政。然而，孔帕尼斯必须像革命全盛时期那样考虑他

们的意愿的日子现在已经过去了。他放弃自己所扮演的圆滑的安抚者的角色，采取坚定的立场把全国劳工联合会抛在一边不予理睬。“我是议会任命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他在广播演说中宣称，“并且得到所有工会和党派组织多次明确的认可。”但是，他说，有人正在试图否定他组成自己政府的权利。“加泰罗尼亚人民！够了！新的自治政府是一个人民阵线政府，这里是组成政府的成员。”接着，孔帕尼斯宣读了下列人名和职务：

路易斯·孔帕尼斯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主席
安东尼奥·马利亚·斯韦尔特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内务专员
何塞·塔拉德利亚斯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总理兼财政专员
卡洛斯·皮·苏涅尔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文化专员
胡安·科莫雷拉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经济专员
拉斐尔·比迭利亚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劳工专员
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物资供应专员
何塞·卡尔韦特	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	农业专员
佩德罗·博什·希姆佩拉	加泰罗尼亚共和行动党	司法专员 ³⁹

不过，应当提到的是，反对任命博什·希姆佩拉不是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决定不加入内阁的唯一原因。据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前任政府专员巴莱里奥·马斯说，还有另外一些因素。其中两个因素值得记录在案：（1）支持与政府合作的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与反对与政府合作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之间的意见分歧日益加剧，后者“逐渐发现他们的革命成果被别人从他们手中夺走了”；（2）“在一个宁愿破坏而不是巩固全国劳工联合会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的政府中……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我担任政府专员时，”马斯战后告诉我，“成功地使四十个工业组织合法化，但是，由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农夫联合会向孔帕尼斯施加压力，其余工业组织并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尽管他们已经得到自治政府经济委员会的认可，在这个委员会中，所有党派组织均有代表。”⁴⁰

的确，反对与政府合作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对其领导人施加的压力以及孔帕尼斯对博什·希姆佩拉突如其来的任命很可能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谈判者提供了一个体面地拒绝加入政府的机会。无论如何，反对与政府

合作的人毫不掩饰他们对这次政府危机的结果感到满意。

“这一次的花招被揭穿了。”《土地与自由》宣称，“在加泰罗尼亚拥有一百多万会员⁴¹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不再是政府的成员了。这是因为无政府工团主义不能与职业政客有牵连，也不能在任何人面前卑躬屈膝。……[它]不愿让这种肮脏的政治玷污自己。”⁴²

496

伊比利亚自由主义青年联盟在全国范围内的喉舌《自由青年报》直接并且好斗得多，它在七月三日宣称：“到目前为止，反革命的指挥者已经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把全国劳工联合会赶出了中央政府和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他们毫不犹豫地用尽手段背叛革命，无论多么卑鄙、多么阴险。为了满足可耻的欲望，他们已经而且还在继续使战争处于危险的境地。……但是，西班牙人民已经看透了他们的把戏，因此，不会再让反革命势力进一步得逞。”

“革命的社会党人、忠诚的共和派人士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必须立即组成一个强大的联盟，这个联盟将打击西班牙革命人民的敌人进而永远消灭他们……。”

“革命处在危险之中。你们以巨大的付出并以牺牲生命为代价而赢得的革命成果正在被后方的敌人所出卖。不许他们从我们手中夺走这些革命成果。”

尽管这些革命的怒吼表达了大部分自由主义运动成员的感情，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仍然多次试图重新加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他们甚至还在争取，⁴³不过，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⁴⁴无论如何，他们的加入不会对事态发展产生什么重大影响，因为，自从五月事变以后，真正的权力已经转移到中央政府手中，而且，由于共产党人夺取了加泰罗尼亚地区警察和军队的控制权，真正的权力最后转移到他们手中。

当时在加泰罗尼亚国家党——该党代表加泰罗尼亚中产阶级中的少数分离主义者——的喉舌《巴塞罗那日报》当记者的曼努埃尔·克鲁埃利斯准确地记录了五月以来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力量对比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尽管孔帕尼斯及其政党在自治政府中的存在造成了表面的延续性，但是，政治主导权已经[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手中]转移到加泰罗尼亚统一社

会党手中。……而且由于这种绝对的主导地位，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能够——有时是羞辱性地——迫使自治政府完全服从直到内战结束时一直由内格林博士所主持的中央政府的命令。”⁴⁵

在街头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五月事变刚一结束，目击了事件过程的法国革命工团主义者罗贝尔·卢宗就指出：“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巴塞罗那到处都是携带着武器的工人。后来，只能看到那些被委以特殊职责的人携带着武器，不过他们还是工人。如今（可能除了几个无产阶级专属社区之外），看不到一个携带武器的工人：只有突击卫队士兵，手持步枪的突击卫队士兵，像资产阶级执政的全盛时期一样，每个角落都有突击卫队士兵。”就连街头的服装也反映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优势衰落。“在城市的中心区域，”卢宗继续写道，“去年八月我提到的并且直到今年二月仍然被人们穿着的[那种]典型的工人阶级装束差不多已经被资产阶级、至少是小资产阶级服装所取代。一个更为明显的事实是，红黑相间的颜色几乎彻底消失了。五月以前，所有人都引人注目地展示着这种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色彩。……今天，正好相反，有胆量佩戴全国劳工联合会徽章的人寥寥无几。在工会大楼外面已经看不到飘扬着的红黑旗帜。至于曾经非常流行的帽子和围巾，……现在根本看不到了。”⁴⁶

497

注释：

- 1 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西班牙内战，1936—1939》，第141—142页；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406页。
- 2 关于利亚诺斯的共产党员身份和科登的任命，见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342、346—347和350页。科登在他的书中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
- 3 一九三七年六月八日《共和国官方公报》。布里略的共产党员身份从未引起过争议并且广为人知。实例见（共和派人士和前巴塞罗那警察部队指挥官）佩雷斯·萨拉斯上校的《西班牙内战》，第159页。内战结束后，维托里奥·维达利也向我证实了布里略的共产党员身份。
- 4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日《劳动报》。
- 5 见本书第十四章。
- 6 这些出口实体之一是莱万特农业出口联合委员会（CLUEA）。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见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社会熔炉报》，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九日《我们》，另请参阅曼

- 努埃尔·比利亚《走在自由主义道路上的西班牙》，第51页。尽管莱万特农业出口联合委员会中有劳动者总工会的代表，全国劳工联合会是该委员会的主导力量。关于莱万特农业出口联合委员会的情况和共产党人控制的农业部对它的敌意，见玛丽娅·何塞帕·库科·希内尔等的《巴伦西亚地区的农业》，第49—53页。
- 7 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285页。
 - 8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日《劳动报》。
 - 9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工人团结报》。
 - 10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国会议记录》，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每日图片报》。
 - 11 实例见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和十二日《消息报》（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的喉舌）。
 - 12 见本书第二十二章。
 - 13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二日、十三日、十六日和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劳动报》。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反击，见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日《工人团结报》。
 - 14 一九三七年六月五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日志》。
 - 15 一九三七年三月四日《工人团结报》。
 - 16 全国劳工联合会对这种疏漏的反应见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工人团结报》。
 - 17 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每日图片报》和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工人团结报》（埃切瓦里亚·诺瓦的声明）。两天后，埃切瓦里亚·诺瓦被保利诺·戈麦斯·赛斯取而代之（见一九三七年六月八日《每日图片报》）。
 - 18 关于解除巡逻队武装的情况，见一九三七年六月十日、十八日和二十九日《每日图片报》；一九三七年六月九日《消息报》；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二日《土地与自由》。
 - 19 见本书第五十五章。据他在回忆录中说，他是内战头几个月加入共产党的，见爱德华多·奎瓦斯·德拉·培尼亚上校《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回忆》，第27页。
 - 20 同上，第47页。
 - 21 见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三日、十四日、十八日、十九日、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工人团结报》。另请参阅巡逻队总干事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三日《战斗报》上的声明。
 - 22 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战斗报》。
 - 23 路易斯·孔帕尼斯，《关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至七日发生在巴塞罗那的战斗的笔记和文件》。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五月七日和十一日《工人团结报》。
 - 24 孔帕尼斯，《关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至七日发生在巴塞罗那的战斗的笔记和文件》。
 - 25 同上。
 - 26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日志》。
 - 27 见何塞·阿里亚斯·贝拉斯科《自治政府的资产，1931—1938》，第241页。
 - 28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日志》。
 - 29 见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六日《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光明报》。
 - 30 实例见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劳动报》（萨瓦德尔）。全国劳工联合会没有公开发表的关于被强行排除在一些城镇行政委员会之外及其集体农庄被解散的报告，见“对我们组织的侵害”档案，现存（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第44/B5档案柜，第318档案盒。这些报告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31 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消息报》。
 - 32 《人民之友》第一期（无出版日期）。接着的一期（第二期）出版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 33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工人团结报》。

- 34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我们》。
- 35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日《劳动报》。
- 36 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人道报》、《工人团结报》、《劳动报》和《先驱报》。
- 37 全国劳工联合会地区委员会的声明，载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工人团结报》。这份声明的部分内容在审查中被删掉了。声明全文刊登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上。
- 38 全国劳工联合会地区委员会写给孔帕尼斯的信，载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每日图片报》。孔帕尼斯在他的广播演说中提到了这封信，他的演说刊登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的《先驱报》上。
- 39 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消息报》。关于此次政府危机的更多情况，见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和二十九日《消息报》；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和三十日《人道报》、《工人团结报》和《劳动报》；另请参阅《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三卷，第101—103页；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二卷，第306—311页；卡洛斯·皮·苏涅尔（自治政府新内阁的成员），《共和国与内战：一个加泰罗尼亚政治家的回忆》，第445—447页。
- 40 巴莱里奥·马斯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41 这个数字肯定被严重夸大了。另一方面，劳动者总工会所提供的两个对立工会的会员人数（见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消息报》）同样靠不住。
- 42 一九三七年七月三日《土地与自由》。
- 43 见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日、三日、十三日、十五日和二十一日《工人团结报》。
- 44 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三卷，第325—326页。
- 45 曼努埃尔·克鲁埃利斯，《内战期间的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第162—163页。另请参阅米克尔·卡米纳尔《胡安·科莫雷拉》，第二卷，《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140—141页。卡米纳尔说，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为“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支配性力量”。
- 46 罗贝尔·卢宗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七日《自由主义报》上的文章。

共产党镇压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五月事变之后那一段时间，在曾为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势力范围中心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发生的事情只有随意逮捕、秘密关押、严刑拷打、绑架、暗杀以及破坏集体农庄。革命高潮时期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所进行的自发而且无目的的恐怖活动现在被共产党人统一指挥进行的更加复杂因而也更加可怕的恐怖活动所取代。“一股血腥恐怖的浪潮席卷了加泰罗尼亚社会，……”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一九三七年六月中旬宣称，“我们自由主义运动一直对此保持沉默……这不是因为我们胆小，而是因为我们的纪律性和责任感。……它以无与伦比的坚毅坦然忍受着对集体化、对无产阶级建设性工作的攻击。”¹

“从五月到现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六月底发表声明宣称，“针对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组织的挑衅一直没有停止过。我们的积极分子被迫害；他们遭到起诉和暗杀；我们的地方分会被查封，集体农庄受到破坏；有人实施暴力行为企图迫使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组织铤而走险，但是，不顾这一系列镇压和挑衅的猛烈冲击，我们仍然保持着冷静。我们不想破坏反法西斯联盟，它已经被某些人

玩弄的卑鄙花招分裂了。”²

499

这种克制激怒了更加激进的自由主义运动成员。七月一日，地下报纸《无政府报》的第一期显示出运动的领导阶层与广大普通成员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面对我们组织遭遇的严峻形势，面对针对我们开展的野蛮镇压，面对对我们的集体农庄和革命工作的攻击和破坏，……我们必须大声发出警告，敦促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那些积极分子同志[即领导人]……丢掉他们的幻想——他们乐观地以为我们的革命仍在继续向前发展，我们还是一支让人望而生畏、受到人们尊重的力量。农村的镇压令人震惊。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仇恨已经达到出人意料的程度。在大规模的流血中，派去维持秩序的突击卫队进攻村庄，捣毁一切，监禁暗杀我们的同志。”³

在加泰罗尼亚以及共和派控制的其他地区开展的镇压行动持续进行了几个月。九月，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宣称，监狱里有成千上万人“被证明是革命者和反法西斯分子”；⁴十一月，《工人团结报》提供的数字是一万五千人。⁵这一时期究竟有多少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会员遭到暗杀将永远是一个需要推测的问题，因为从来没有公布过令人信服的数字。⁶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把在前线和后方实施的暗杀都考虑进去的话，被杀害者人数众多。

尽管遭到镇压，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马利亚诺·巴斯克斯仍然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描绘了一个光明的前景。根据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为了反驳包括著名的俄国流亡者亚历山大·夏皮罗在内的一些外国无政府主义者对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尖锐批评，巴斯克斯宣称：“共产党发展壮大、反动派恣意妄为、我们的积极分子被关进共和国监狱等等情况可能表明我们的运动正在衰落，同时蒙蔽了一些不了解情况的观察家。但是实际上，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发展状况良好，会员不断增加，重新投入战斗，恢复了现实主义态度并且完全统一了观点。目前，我们关心的是赢得战争。一旦这个目的达到，我们将重新在社会领域发动攻势，然后，我们的朋友必须相信我们，革命将立即发生！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都吓不倒我们。我们凭借自己的力量可以取胜。我们将赢得胜利，我们将在西班牙实现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极权统治

[totalitarisme]。 ”⁷

据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雅普·克洛斯特曼说，国际工人协会的这次代表大会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至十七日“秘密”举行的一次特别代表大会，“如果人们把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一九三八年印发的明显带有倾向性的大会总结排除在外”，曾经对外透露的代表大会的全部信息只有部分发表的会议记录（法文）。⁸

尽管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对形势作了乐观的估计，事情的真相却是，对于代表了半数工人阶级的自由主义运动的直接镇压已经开始使它不再像内战初期那么春风得意。“[在]后方，”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武装领导人里卡多·桑斯写道，“事情进行得不像[革命]运动初期那么顺利。……工人不愿意再为帮助前线长时间工作。他们只想尽量少干点活而又得到尽可能高的工资。总的来说，这反映了一种不断恶化的局面。”⁹

在全国劳工联合会遭到持续镇压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则面临着灭顶之灾。六月十六日，根据共产党人安全总局局长安东尼奥·奥尔特加中校的命令，突击卫队中校、巴塞罗那警察部队的共产党人指挥官里卡多·布里略采取行动占领了巴塞罗那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部以及另外一些该党办公活动的场所，逮捕了其大部分领导人，将他们投进巴伦西亚的监狱。¹⁰同一天，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第二十九师师长、党的执委会成员何塞·罗维拉被波萨斯将军召到巴塞罗那，然后立即被共产党人警察逮捕。¹¹

遵照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设在巴伦西亚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指挥部直接下达的命令，¹²奥尔特加向其顶头上司内政部长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隐瞒了所有与即将采取的突击行动有关的消息。¹³为了避免行动失败，作为附加的预防措施，他用一个虚假的警报将担任安全总局副局长的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加夫列尔·莫隆派往雷阿尔城。¹⁴由于不信任这位安全总局局长，苏加萨戈伊蒂亚任命莫隆以保证警察部门“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能知道。

在这个问题上，我应当说一下可以证明苏联秘密警察内务人民委员部直接插手了突击行动的个人经历。当时我是合众社驻巴伦西亚的记者，支持共产党采取的路线。六月十八日，逮捕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两

天后，奥尔洛夫介绍我认识的一个名叫“伊尔玛”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¹⁵交给我了一份文件，她说这是提前拿到的安全总局局长即将发布的一份公报的副本。¹⁶公报宣称（1）“一个威胁国家安全的巨大阴谋”已被发现，同时发现的大量文件“无可辩驳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敌人之间有的可疑关系，这些文件中有一张马德里的平面图，佛朗哥将军的一名间谍在平面图的背面用隐形墨水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与包括N——（这显然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书记安德烈斯·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会谈；¹⁷（2）这个“间谍组织”将现在和未来的军事行动计划出卖给了佛朗哥的总参谋部。已经逮捕了两百人。

虽然我没有轻信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但我确实觉得我得到的是一条重大的独家新闻，因此我应当立即给合众社打电话。不过存在着一个问题。这名特工强调说，我不能把安全总局局长当作正式的消息来源。我争辩说，这样一来合众社可能认为我个人在没有任何重要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了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进而怀疑我的信誉。

“这么说你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一个为佛朗哥效劳的间谍组织？”她怀疑地反问道。我反复重申了我的不同意见，每说一次她的怀疑和焦虑就更加严重。由于担心得不到这一条独家新闻，我答应记住她的限制但暗自决定使用这个消息来源。可是，当我在一小时后把打出来的新闻稿交给对外新闻司的共产党人新闻检查官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时，她删掉了我开头的这句话：“安全总局局长发布以下公报”。显然，她受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预先警告。不过，她最终同意我可以使用含糊的表述：“有人宣称，……”¹⁸

回顾这个情况有助于了解随后发生的事情，我得出了以下结论：（1）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急于通过某个通讯社在最大范围内广泛宣传这个所谓的阴谋又不把政府牵涉进去，政府对此并不知情所以难以预言它的反应；

（2）这个公报并非如我被告知的那样是由安全总局局长发布的，而是由苏联驻巴伦西亚大使馆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办事处炮制并且传播的，证明被告有罪的文件也是在那里伪造的；¹⁹（3）对我说公报来自安全总局局长为的是得到我的信任，因为我毕竟不是共产党的资深同情者，尤其不是共产党员；（4）删除所有提到安全总局局长的内容是希望避免或至少推迟内政部

长对他进行严厉的处罚，部长对即将采取的突击行动并不知情；（5）名义上归外交部——现由左翼共和派人士、阿萨尼亚总统的忠实朋友何塞·希拉尔担任部长——管辖的对外新闻司实际上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通过共产党人所控制，后者接受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巴伦西亚指挥部的指示。希拉尔在任时是否知道这一情况值得怀疑，因为，正如我们所知，他只是接管了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留下的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各个附属机构，不过，当几个月后任命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担任对外新闻司司长时，他肯定知道她的政治倾向。

尽管马德里的共产党日报《工人世界报》六月十八日发表了逮捕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消息，但是，巴塞罗那的共产党报纸直到六月二十二日才提到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佛朗哥将军联系起来的所谓间谍组织。“几天前，”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的喉舌《消息报》报道说，“警方在巴塞罗那发现了一个专门在各个国家从事间谍活动的重要组织。……最基本的小心谨慎使我们不得不……对警方这一重大行动保持沉默，否则的话，我们可能使整个行动无功而返。不过现在……我们可以告诉读者一些与这个庞大的间谍组织有关的事实，其最干练的成员已经渗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警方采取的第一步行动是逮捕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所有领导人以及看来与这个间谍组织来往密切的大批外国男女。目前，被捕的人数估计达到三百人。²⁰在占领该党办公活动场所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因此，犯罪分子无论如何也无法否认他们的罪行。”

在随后的那一段时间里，西班牙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通过报纸和演讲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人的谴责，指控他们是间谍和叛国者，把他们比作苏联的“托洛茨基分子”和“阴谋破坏分子”。

六月二十五日，《红色阵线报》宣称：

从内战爆发开始……在集会和报纸上，在官方的政府机构中，我们党不断要求对间谍、奸细和法西斯的代理人采取严厉的措施。即使我们不能根据已有的历史经验了解法西斯间谍活动的方式，也可以通过观察苏联对那些为希特勒效力的托洛茨基分子和阴谋破坏分子进行

的审判对此具有充分的认识。……然而，由于漠不关心并且缺乏间谍活动应当受到惩罚的意识[这说的是拉尔戈·卡瓦列罗]，任凭几个月的时间过去却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不过，在现政府的领导下，这种态度如今已经得到纠正，而且我们现在掌握了与我们的指控相符的证据。……正如斯大林同志多年以前令人钦佩地指出的那样，托洛茨基分子不再是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一个派别，而是一帮刺客、破坏分子和间谍，他们受雇于盖世太保，在盖世太保的指挥下行动。[这个国家的]托洛茨基分子，所谓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人，与苏联的叛徒和卖国贼没什么区别，他们为佛朗哥效劳让人感到意外吗？……现政府已经对间谍和叛徒采取了坚决的措施，而且我们确信，它将加强控制毫不放松。我们的事业的前途要求我们不能表现出任何软弱或顾虑。必须消灭所有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为敌人效力的人。²¹

在相继逮捕并拘押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以及大批党员和外国支持者²²——其中一些人被杀害，或者被关押在秘密监狱里没有受到正式的指控²³——之后，镇压蔓延到其他城市，很快又蔓延到阿拉贡前线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部队，在那里，它的第二十九师被解散。²⁴这个师的一些人躲进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部队避难；另一些人遭到监禁或枪毙，其中包括最受人尊敬的师政治委员马西亚诺·梅纳；²⁵与此同时，许多人被征召到政府控制的部队里。

全国劳工联合会毫不迟疑地做出了反应。在一篇题为《我们面对着第一份账单？》的言辞激烈的长篇文章中，曾任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商业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胡安·洛佩斯写道，尽管他既反对正统的共产党人也反对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但是，当他看到把那些毕生与资本主义制度做斗争的人描绘成希特勒的盟友时，仍然感到义愤填膺。“我们的革命不能堕落到这种程度，以致消灭各个反法西斯派别成了一种固定不变的惯例。……把自己的政治独立抵押出去，西班牙还不到为了获得帮助付出这么高代价的地步，只要帮助是以无私的方式进行的，我们接受并表示感谢，但当账单递过来时，我们不得不拒绝帮助。由于出现了某种令人难以容忍的新的迫害，西班牙革命的实质变得越来越不纯粹。……如果我们

告诉共产党的同志们，等到西班牙人民发现他们代表着引进独裁专制的危险的那一天，就连西班牙的石头也会飞起来砸向他们，他们务必不要大惊小怪。”²⁶

在挫败加泰罗尼亚地区军事叛乱一周年纪念日，地下出版的《战斗报》发表了以下宣言：

在这一英雄事迹发生十二个月之后……工人阶级的死敌机会主义分子……纠集大批人马对无产阶级革命组织进行了突然袭击。这些卑鄙的流氓由臭名昭著的西班牙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豢养并指挥。

为了为自己的罪行进行辩护，他们狡诈地采取惯用的伎俩，声称他们对付的是“不法分子”和“间谍”。但这根本不是事实。在巴塞罗那的各个监狱——其中一些是不透光线和空气的阴森地牢——成百上千的工人和农民在呻吟声中慢慢死去，他们中的一些人最近刚从前线回来，大部分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

他们没有犯罪。在工人们看来，他们问心无愧，不该受到任何惩罚。只是根据为满足共产党及其附庸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需要而制订的政策，仅仅因为他们是不向……持有共产党党证的反动寡头屈膝投降的党派组织的积极分子，这些工人和农民才被抓进监狱了。²⁷

一九三七年七月，曾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民兵部队中作战并在镇压期间设法逃出巴塞罗那的乔治·奥威尔写信告诉一位朋友：“我们的所有朋友和熟人[几乎]都被抓进了监狱，而且很可能被无限期地关在里面，实际上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指控，只是怀疑他们是‘托洛茨基分子’。甚至在我离开以后，最可怕的事情继续发生：大批抓人；把伤员拖出医院投入监狱；人们被成批塞进阴暗的地牢，那里连躺的地方都没有；囚犯遭到殴打并饿得半死，等等，等等。与此同时，除了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关系密切的独立工党(ILP)的报刊外，英国新闻界不可能得到这方面的任何消息。”²⁸

在六月十六日抓捕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行动中，作为头号目标首先被捕的是党的书记、²⁹私下里最让斯大林感到头疼³⁰的安德烈斯·宁。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享有盛名的安德烈斯·宁撰写并翻译过许多著作，红色工会国际（Профинтерн）^①创立初期，作为负责西班牙语国家以及意大利和法国的书记，他担任着重要的职务。³¹他被带到马德里附近的一座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监狱，在徒劳地试图逼迫其承认为佛朗哥将军以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从事间谍活动——对于成功地进行一场莫斯科式的公开审判，宁的供述必不可少——的过程中，对他进行了残忍的折磨。³²此后，人们再也没有见过他。

504 当时被捕并被押往巴伦西亚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成员胡利安·戈尔金写道：“斯大林及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爪牙并不想简单地把宁和他的主要战友一杀了事，……而是希望进行一场效仿莫斯科审判方式的公开审判，在共和国法律的外衣下，指控、定罪然后立即处决我们——在那些所谓人民民主国家里，后来也进行过这种审判。这一层法律的外衣是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三日[逮捕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几天后]所颁布的一项法令，³³其适用范围广泛而且明确，足以监禁甚至消灭所有反对内格林政府的人。……这项法令没有得到议会的批准，此外，它所设立的间谍和叛国罪法庭由政府自己任命的三名文官和两名军官组成[并被授予秘密开庭的权力]。因此，它的专政特征——如果人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它的行政特征——显而易见。这项法令规定了以下几类罪行：‘在西班牙国内外采取针对共和国的敌对行动；传播不利于军事行动的消息和看法并为之辩护，传播有损于共和国名誉与威信的消息和看法并为之辩护；举行旨在削弱公众士气的集会和示威；采取使军队士气低落或损害集体纪律的行为。’刑罚从最少在狱中服刑六年[零一天]到死刑不等。……不过，最严重的问题是，这项法令具有追溯效力。”³⁴

警察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采取的行动和上述法令——它允许进行秘密审讯并根据军法规定了“非常简单的程序”——令人生畏的适用范围使反对内格林政府的人警觉起来。六月二十八日，在一份致共和国总统、

① 红色工会国际（Красны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профсоюзов，通称 Профинтерн）是共产国际一九二一年创立的国际组织，旨在协调工会内部共产党人的行动。

议会议长、政府总理、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以及各党派组织全国委员会的声明中，马利亚诺·巴斯克斯代表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抗议说，在“消灭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开启了危险进程”之后，紧随其后的将是消灭其他少数派政党；而司法部长所签署的“设立特别法庭秘密进行审判”的法令看来是对“西班牙共产党和苏联图谋的进一步退让”。“我们认为，西班牙的自由主义运动对此不可能表示赞同。”³⁵同一天，巴斯克斯公开宣称，他反对法令的政治倾向。他说，政府的所有反对派以及任何谈论政府或向政府示威的人都在法令的适用范围之内。“例如，这意味着此时此刻我有被控告的危险，明天我可能被逮捕，然后可能被秘密判处六个月零一天徒刑或死刑——以致你们不会知道我[被控]犯了什么罪，也不会为之而羞愧。”³⁶另外，杜鲁蒂之友会的喉舌《人民之友》声称：“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所捏造的陷害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同志的间谍案耸人听闻。而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奉命炮制这个兼具西班牙和苏联特色谎言的竟然是一位天主教徒政府部长[巴斯克民族独立党人司法部长曼努埃尔·德·伊鲁霍]。……我们不应容忍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所玩弄的花招。我们务必记住，不久之后在同一个法庭上受审的将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积极分子。”³⁷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有足够的理由警觉起来，尽管捣毁其各级组织的计划尚未提上议事日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被捕之后不久，西班牙共产党的宣传鼓动部门声称，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活动场所缴获的文件提供了“托洛茨基分子叛国的充分证据”。接着，它开始向全国劳工联合会提出挑战。“曾经大胆地公然为托洛茨基分子辩护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同志们现在有什么话要说？曾经捍卫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并且为其辩护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报纸现在有什么话要说？在关于托洛茨基分子叛国的压倒性证据被警察发现之后的今天，任何胆敢提出抗议并为他们辩护的人肯定将被视为他们的帮凶。……[那些]可能出于正直而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辩护的无政府主义同志们有责任公开明确地承认错误，并且像所有真正的反法西斯人士要求的那样，以同样的忠诚和热情要求毫不留情地惩罚叛徒。”³⁸

在欧美各国为营救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而开展的一场坚持不

懈的活动中，该党的外国朋友严厉谴责了西班牙政府的上述法令。像英国独立工党一样通过革命社会党国际协调局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联系的美国共产党（反对派）的喉舌《工人时代》断言：“现在据以指控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这项法令是……给他们安上所谓‘罪名’之后颁布的。也就是说，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所依据的是一项具有追溯效力的法律，按照斯大林主义者谎称其严格遵守的那些自由民主的原则，这是一种恶劣的司法专制行为。”³⁹

一个由英国下院议员、独立工党主席詹姆斯·马克斯顿率领的国际代表团访问了西班牙，为了找到安德烈斯·宁并且向其他被捕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提供包括公开审判在内的法律保障，它代表各国加入革命社会党国际协调局的政党对西班牙政府施加压力。在八月代表团首次访问期间，国防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透露了西班牙政府的困境，当时他对代表团的法国成员马索·皮韦尔和达尼埃尔·介朗说，代表团代表的“只是那些几乎没有向西班牙提供什么帮助的国家”，而“苏联人却运来了武器，使西班牙共和国能够进行抵抗”。代表团成员从这种含蓄的批评中得到了“明确的印象，国防部长是在暗示，苏联要求以援助换取政治补偿”。⁴⁰

因为没有取得进展，由巴黎大学教授费利西安·沙莱和英国独立工党下院议员约翰·麦戈文组成的第二个代表团十一月访问了西班牙。“直到十一月底，[我们]没有谈到审判，”麦戈文报告说，“我们主要担忧的不仅是继续监禁，而且还有失踪的人，对[贝尼托·]帕冯先生公开发出的死亡威胁也让我们心神不安，他是受聘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囚犯进行辩护的西班牙著名律师[结果被迫逃往国外]。契卡[秘密警察]滥施暴行的证据越来越多。”⁴¹

尽管司法部长曼努埃尔·德·伊鲁霍试图提供帮助，但他无权准许代表团前往关押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监狱探视。“面具被摘掉了。”麦戈文写道，“我们撩开帷幕，看到真正的权力掌握在什么人手里。部长愿意，但没有权力。契卡不愿意，它掌握着权力。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继续施压，我们自己会有危险。……作为与苏联援助的武器的交换，共产国际得到了这种专制的权力，它用这一权力监禁、折磨并且杀害

不赞成共产国际路线的社会党人。……根据对共产党人策略的研究和经验，我坚信，帮助他们在工人运动中赢得一席之地的是愚蠢的罪恶。就我而言，我无法原谅他们的行为，也不能为他们的行为表示歉意。人类的尊严要求揭露他们的残暴手段。”⁴²

共产党人的手段与共产党所宣称的温和目标形成对照，因而在它谋求其帮助的民主国家造成了某种恶劣影响。在写给温和的西班牙社会党执委会的一封信中，著名的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领导人和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支持者恩里克·德·弗朗西斯科指出，自由派人士和工人阶级普遍认为，在政府中“共产党人占据了主导地位”，最近在社会治安领域发生的事件已经使“世界上具有良知的人们忧心忡忡”。⁴³与此同时，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喉舌《巴伦西亚通讯》坚称，西班牙共产党“卑鄙的清除异己政策”应对外国民主阵营热情的衰退负责，民主国家或人民群众不可能因一个国家被共产党人“推动并控制”而受到鼓舞，在这个国家，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共产党人宣传的专政”。⁴⁴

一九三七年十月，在马德里的帕迪尼亚斯剧院，拉尔戈·卡瓦列罗发表了他在西班牙的（最后一次）著名演说。利用这个机会，他强调了共和国事业在国外所受到的损害。“你们都知道，”他说，“由于某种势力的行动，发生了一些至今仍未查清的不幸的人员失踪案。这种势力不是政府的组成部分，它代表着一个国中之国。同志们，事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以致国际组织[革命社会党国际协调局和第二国际]的代表专门到西班牙来调查事实真相，他们亲口告诉我：‘在这些事情发生以后，我们无法唤起国外同志们的情，因为他们怀疑影响并且统治着这里的人是共产主义分子——他们明确地这么说——所以大家都在问，如果只是使共产党人控制了西班牙的命运，是不是应当帮助它。’”⁴⁵

在此期间，被带到马德里附近埃纳雷斯堡的一座秘密监狱的安德烈斯·宁在劫难逃。为在西班牙进行公开审判榨取需要的供词未果之后，折磨他的人除了把他干掉别无选择。胡利安·戈尔金说，曾任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恩里克·卡斯特罗在脱离共产党之后向自己保证，“亲自处决安德烈斯·宁”的是他的前第五团战友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维托里奥·维达利），奥尔洛夫挑选其作为“处理安德烈斯·宁案件的直接合作

者”。⁴⁶不过，因为安德烈斯·宁是国际知名人士，所以，对他的失踪必须有所解释。于是，据前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说，维达利伪造了一次从埃纳雷斯堡的秘密监狱“解救”安德烈斯·宁的纳粹偷袭，国际纵队的十名德国成员实施了这次假装的偷袭，他们将宁劫走，留下可以作为罪证的文件，以显示宁与纳粹秘密警察的关系。⁴⁷

每当有人提出“宁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时，共产党人就用宁被盖世太保解救的说法解释他的失踪。实际上，一九三九年我在墨西哥遇见维达利本人时，他试图使我相信的正是这种说法。米哈伊尔·科利佐夫提供的说法也是如此。“被告安德烈斯·宁……被一伙由西班牙人和德国盖世太保特工组成的法西斯武装分子劫走了，”他写道，“他们闯进地方中转监狱，在警卫不足的情况下，宁被暂时关押在那里。”⁴⁸

关于宁被解救的另一种说法稍有不同，它没有明确提到盖世太保牵连其中。当时最积极的亲苏观点传播者之一、法国共产党报纸《人道报》驻西班牙记者乔治·索里亚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发表在共产国际的喉舌《国际新闻通讯》上，⁴⁹大肆宣传这种说法，这些文章后来被编辑成一本题为《为佛朗哥效劳的托洛茨基主义》出版。不过，四十年后，在试图开脱西班牙共产党人对宁的死亡的责任时，他说，“‘安德烈斯·宁在什么地方？在萨拉曼卡还是在柏林？’在西班牙以这种相提并论的方式对宁的指控只不过”是“……苏联手段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展运用，这种手段构成了后来所说的‘斯大林主义’的最肮脏的阴暗面”。大量证据清楚地表明，索里亚接着说，宁的失踪应归因于“不祥人物奥尔洛夫策划的阴谋”。“对西班牙内政”的这一“明目张胆的干涉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西班牙共产党坚决否认与此事有任何关系。然而这并未缓解由此引起的导致共产党与其他党派组织关系恶化的争论。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产生了两种意见：一方面，关于包括安德烈斯·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是‘盖世太保和佛朗哥的间谍’的罪名只是捏造的一种谎言，因为不可能举出任何证据来。另一方面，尽管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既不是佛朗哥的间谍，也不是盖世太保的间谍，但是，无论其主观愿望如何，他们与人民阵线的不懈斗争确实帮了首领[佛朗哥将军]的忙。”⁵⁰

索里亚和另外一些作家竭力将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以及安德

烈斯·宁失踪的责任转嫁给“斯大林主义”这一现象——这符合七十年代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非斯大林主义倾向——企图以此为西班牙共产党开脱，⁵¹但是，他们的尝试经不起认真的调查研究，因为，从内战最初的几个月起，共产党的所有领导人和所有报刊，无论是地方的还是全国的，就以宗教般的虔诚开始进行这场圣战。这场起源于莫斯科的圣战的缘由无关紧要，因为，正如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伊格纳西奥·伊格莱西亚斯后来所断言的那样：“[即使]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杀害安德烈斯·宁的行动可能是斯大林的秘密警察部门实施的，那也要归因于西班牙共产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力以赴的积极配合，一切进行得协调默契。”⁵²

人们应当记得，就在采取突袭行动仅仅五周前，正是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在五月事变之后立即宣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一伙为国际法西斯主义效劳的间谍和奸细”，因此，应当把这些托洛茨基分子“歹徒”从所有文明国家清除出去。此外，人们还应记得，正是担任安全总局局长的共产党人安东尼奥·奥尔特加中校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指示下令采取了突袭行动，正是担任巴塞罗那警察部队指挥官的共产党人里卡多·布里略中校实施了这次突袭行动，而且，将安德烈斯·宁带到埃纳雷斯堡的秘密监狱遭遇杀身之祸的那些警察也是共产党人。

杀害宁的确切方式始终没有得到证实。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在西班牙被害还是用船运到苏联生死不明。当时担任内政部副部长的社会党温和派人士胡安-西梅翁·比达特在回忆录中说，他和内政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专门派了一名警探去马德里对宁的失踪进行调查。这名警探报告说，宁被带到埃纳雷斯堡一所“共产党契卡”使用的私人住宅，可以听到里面传出“尖叫和呻吟”，一天早晨，一辆大卡车装着一个板条箱开往阿利坎特，到了那里，它在一艘苏联轮船旁边停下，然后，这名警探认为，宁活着离开了西班牙。⁵³

四十年后，这种说法得到一个名叫哈维尔·希门尼斯的人的支持，但是并没有得到确证。在接受马德里的《变化16》周刊采访时，希门尼斯说他是当年被派往巴塞罗那突袭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马德里特警部队[Brigada Especial]成员。他不仅宣称曾在马德里目睹了为使马克思主义统一

工人党与敌人的间谍活动有牵连而伪造宁签署的文件的过程，他还宣称曾在战后遇见过把他和其他特警部队成员送到巴塞罗那的汽车司机，司机承认后来把宁从埃纳雷斯堡送到巴伦西亚，“苏联轮船等在那里”。⁵⁴

无论宁的命运如何，共产党人及其盟友顽固坚持他被纳粹突击队解救的说法。他们坚称，盖世太保承受不了共和国警方就德国秘密警察在西班牙的活动审讯这名有用的间谍的后果。⁵⁵

509 一九三八年叛逃到美国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负责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揭露并且谴责了斯大林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其他国家犯下的许多暴行，但是却对他们在西班牙所犯的暴行保持沉默。在他的著作、文章以及向美国参议院专门委员会所做的证词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或宁的失踪。然而，在他叛逃多年以后进行的一次私人谈话中，当伯特伦·D.沃尔夫直截了当地问他：“你参与了杀害宁的行动吗？”奥尔洛夫回答说他没有，他说他甚至不认识宁，他在西班牙的任务“仅限于反间谍行动和在叛军占领区开展游击战”——他对自己活动的描述是老生常谈⁵⁶——因此，他从未接受过“杀人的任务”。⁵⁷当然，他不可能让自己受到牵连。他也不可能亲自杀害宁；这项任务可以让别人来执行。

一九五三年，奥尔洛夫的文章《斯大林政权的可怕秘密》在《生活》杂志上发表后，他否认自己与宁的被害有任何关系。这一否认是《生活》杂志的编辑在答复客居加拿大的自由共和派人士海梅·米拉维特列斯的来信时代表奥尔洛夫做出的：“如果还要承担暗杀任务，他不可能从事他的‘外交’工作（指挥反情报活动和游击战）。奥尔洛夫说，那些任务由莫斯科派来的一个秘密清洗人员特别小组执行，其中的博洛丁可能是杀害安德烈斯·宁的特工。”⁵⁸然而，十五年后，在回答斯坦利·G.佩恩那份经常被引述的问卷时，奥尔洛夫却把责任全部推到西班牙共产党人的头上，没有任何关于克里姆林宫通过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特工组织——作为负责人他肯定要对特工组织的行动承担责任——插手其中的暗示。“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怀有私人恩怨，”因此，他说，“宁的失踪是一种政治报复行为。”⁵⁹

安德烈斯·宁的失踪给希望在西方社会的心目中为自己营造宪政声誉

的内格林政府以道德上的沉重一击。总理的办公桌上高高地堆起了来自国外的抗议电报和信件。⁶⁰国际反响使内格林烦恼不安，他的政府在组成仅仅一个月后所蒙受的耻辱最初让他恼羞成怒。⁶¹不过，根据内格林的支持者比达特的回忆录判断，他似乎更关心镇压的非法性而不是镇压本身。“我当时认为而且三十多年以后仍然认为，”比达特写道，“内格林与共产党人之间在策略方面可能存在着某种默契，以此交换他们答应给予的无条件的政治支持并且运送因为北方的失败和马拉加的陷落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的武器装备，……内格林将允许他们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按照斯大林的指示除掉某个武装起来与政府作对的反对党。”⁶²从内格林在五月十三日内阁危机期间所采取的已经得到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证实的立场来看，显然，甚至还在成为总理之前，他就支持共产党人消灭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要求。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声称自己并不知道宁的下落，还说自己曾以若不通知内政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将会引发一场“惊人的政治丑闻”为由，反对采取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策划的针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突袭行动。⁶³他证实，听说宁失踪的消息时，内格林很恼火。

“你们的人把宁怎么样了？”内格林问他。“内格林带着明显的怒气告诉我，内政部长已经向他报告了苏联秘密警察在巴塞罗那所实施的一系列暴行，他们表现得好像是在自己的国家，逮捕西班牙公民时，就连作为一种礼貌通知一下西班牙当局都嫌费事。在没有法官授权的情况下，他们把所逮捕的西班牙公民从一个地方押解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关押在完全不受合法当局监控的私设监狱里。……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我能告诉他的是，像他一样，……我也想知道宁在哪里，而且我讨厌奥尔洛夫和他那一伙秘密警察。但我决定不对他说。我可以感觉到我党受到了暴风雨般的冲击，因此决心捍卫它，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捍卫党必定意味着为可能发生的罪行进行辩护。”⁶⁴

虽然无法证实埃尔南德斯是否像他所宣称的那样义愤填膺，但内格林最初的反应非常可信。同样不容置疑的还有苏加萨戈伊蒂亚和司法部长曼努埃尔·德·伊鲁霍所表示的愤慨，他们在政府保留的所有合法监狱里找不到宁。伊鲁霍证实，他指派一名法官专门处理这一案件，后者下令逮捕

“大批涉嫌犯罪的警察”，其中一些“被发现躲进了苏联大使馆”，几天后，一支特警部队（brigada especial）企图逮捕这名法官。当时，伊鲁霍在两次内阁会议上“直接”提出这一问题，并以辞职相威胁。⁶⁵

内政部长对这两次讨论宁失踪问题的内阁会议的描述是“近乎野蛮”。⁶⁶据埃尔南德斯说，内政部长想知道，他的权限是不是必须“根据某些苏联‘专家’的意见来决定”。⁶⁷“共产党人政府部长狂热地为他们的同志[安全总局局长奥尔特加]进行辩护。”苏加萨戈伊蒂亚说，“我声明，安全总局局长可以留任，但是如果那样的话，我将辞去我的职务。立场坚定的普列托痛斥了共产党人的辩论方式并表示支持我的态度，如果不撤换奥尔特加，他将与我一起辞职。”⁶⁸

“当我们声明我们不知道宁的下落时，”埃尔南德斯写道，“[内阁里]没有人认为我们是诚实的。我们辩解说，苏联‘专家’和‘顾问’的存在体现了一种‘无私的’援助。……我们再次强调了苏联提供的大量武器以及我们在国际舞台上从苏联那里得到的帮助对于我们的事业所具有的重大意义。由于气氛继续弥漫着火药味，……我做出了让步，同意以超越职权而且没有及时通知部长为由将替罪羊奥尔特加中校撤职，但是我还威胁说，要把所有显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罪的文件以及政府内外那些以‘简单的程序问题’为借口包庇该党间谍分子的人员名单公之于众。”埃尔南德斯承认，这一策略“蛊惑与欺骗”兼施。“内格林采取调解的态度，他建议停止辩论，等……我们掌握了共产党人部长所提到的全部证据而内政部长也可以告诉我们关于宁的下落的确切消息时再说。我们度过了第一场毁灭性的风暴！”⁶⁹

511 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加夫列尔·莫隆取代奥尔特加中校担任安全总局局长。⁷⁰读者还会记得，苏加萨戈伊蒂亚曾经任命莫隆为安全总局副局长，以保证警察部门“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能知道。但是，莫隆履新从一开始就在劫难逃，他只干了几个月，因为，据他那部披露内情但鲜为人知的回忆录记述，他严厉整顿警察部队的尝试“因共产党人的抵制半途而废”。他断言，共产党决心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进行抵制，直至“把我‘赶出’警察部门”。由于“社会党人政府部长在对待[安德烈斯·宁失踪这一]丑闻时表现出来的怯懦畏缩、同流合污以及保守克制”，共产党的

抵制成功了。人们始终认为属于普列托的西班牙社会党温和派的莫隆极其愤怒地猛烈抨击了政府中最有威信的政治家、国防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与其他任何人相比，他最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站出来彻底消除共产党人对安全部门的影响。……然而，这位著名的国会议员实际上对此毫无兴趣。”⁷¹

莫隆对司法部长曼努埃尔·德·伊鲁霍也不客气：“伊鲁霍先生、内阁全体成员、公诉人和我都很清楚在哪里可以找到最应当为宁被劫持负责的人。”但是，莫隆说，伊鲁霍及其手下的那些法官认为，通过放任低级警官随意执法，他们可以推卸自己的责任。莫隆告诉苏加萨戈伊蒂亚，如果内政部长真的想把对宁的失踪直接负责的人绳之以法，他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因身陷令人烦恼的环境而深感悲伤和痛苦的司法部长决定，‘不能再做任何事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离开了安全总局。”⁷²

从内阁部长的怯懦畏缩来看，显然，他们不希望对安德烈斯·宁失踪案的调查过于认真。证据来自内政部副部长比达特。他说，莫隆“怒不可遏”地对内政部长说，“‘既然总理坚决要求知道真相，你可以告诉他，劫持安德烈斯·宁的行动是意大利人[比托里奥·]柯多维拉策划的，是“指挥官卡洛斯”[维托里奥·维达利]和陶里亚蒂策划的，是包括[总书记]佩佩·迪亚斯在内的共产党领导人策划的。刑讯他的命令是奥尔洛夫下达的。把这告诉内格林。如果他想让我逮捕他们，今天上午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们全部投入监狱。’部长感到不知所措。由于逮捕这些人的政治含义，他什么话也没有说。毫无疑问，他必须立即告诉[内格林博士]，于是，谁应当对劫持或者杀害宁负责的问题再也没有被提起过。结果形势依然如故。”⁷³

从内政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以及其他内阁成员无意采取有力的行动这一情况来看，显然，尽管对宁的失踪最初感到义愤填膺，但是，由于担心招致唯一的武器供应者和监管西班牙黄金的苏联不满，他们并不想对这一事件的最终结果进行调查——不想揭露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以及密切地与其合作的人。据普列托后来说，当苏加萨戈伊蒂亚开始调查宁的失踪从而“即将发现丑恶的真相”时，内格林下令停止调查。⁷⁴如果这一情况属实的

话，那么，同样属实的情况还有，总理始终表现得顺从而且无用，以致他的内阁丧失了功能。仅仅过了几个星期，八月十四日，为了压制新闻界对苏联的所有批评，内政部长发出了一个严厉警告。这一警告显示，政府决不会认真调查宁的失踪案并揭露其苏联制造者。

在声称有人好像“蓄意企图冒犯一个非常友好的国家，以此给政府制造麻烦”之后，内政部长警告说，一些报纸把苏联与那些“正在入侵我国领土”的国家相提并论。“这种绝对应当受到严厉斥责的放肆行为不可能得到审查部门的允许，因此必须立即停止。”如果不“严格”遵守这一命令，冒犯苏联的报纸将被无限期停刊，审查校样的书报检查人员将在“审理阴谋破坏罪的特别法庭”受审。⁷⁵

并非巧合的是，就在仅仅三天前，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向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舆论工具《巴伦西亚通讯》发出警告，要求其停止对苏联的进一步指责：“小心点，你们这些《巴伦西亚通讯》的反共分子！由于任凭自己被仇恨和恶意所驱使，你们正在用西班牙人民的利益赌博！在所有西班牙人的心目中，苏联，它的政府和它的人民，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再也不允许任何人把它们当作辱骂、诋毁的对象和恶毒攻击的目标。够了！人民将严厉斥责那些自以为可以攻击和伤害其最可爱的朋友和最坚定的保卫者——这位朋友和保卫者正以完全无私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帮助人民——的家伙。他们的目的是在两国人民之间造成猜疑和不信任。我们再也不会允许苏联的敌人和西班牙人民的敌人为所欲为。警觉起来的人民决心让他们住口。”⁷⁶

但是，新闻审查对最有力最激烈地抨击苏联的印刷品无能为力。它们是秘密刊行的传单和报纸。八月十四日，地下出版的《战斗报》谴责了“苏联秘密警察的干涉”并且说：“一支与斯大林分子控制的西班牙警察关系密切的特种政治警察[部队]对国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以致名义上的执政者几乎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主，而在他们背后，在把他们牵连进去的情况下，斯大林主义以罪恶的方式行动。”《战斗报》指称，在圣乌尔苏拉警察局，有一些苏联秘密警察人员与“当地的斯大林分子”共事，他们引进新的刑讯手段，“用痛苦和恐怖获取对黑暗的斯大林主义政治有用的声明和供述。……我们说的每一件事情在巴伦西亚众所周知。内政部长和

整个政府也都知道。但是，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只能私下采取行动，……因为他们被斯大林分子当做人质，在政府里并不自由。为了破坏我们的革命，斯大林分子一直在用苏联的援助极其无耻地敲诈他们”。⁷⁷

考虑到据内政部长本人说，内政部和安全总局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和亲信的老窝”这一事实，⁷⁸一点也不奇怪的是，撤换奥尔特加中校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让步，它几乎没有削弱共产党人在安全部门的影响力，因此，奥尔特加的继任者加夫列尔·莫隆很快就被迫离开了安全总局。

尽管宁失踪的丑闻使西班牙共产党人处境尴尬，但是，这给他们带来的困扰微不足道。他们认为，克里姆林宫的主要目的——实际消灭最让其恼火的批评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已经达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的大部分领导人进了监狱，它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积极分子和外国支持者被监禁或者被枪毙，它的报纸被禁止出版，它办公活动的场所被占领，它的民兵武装被解散，因此，它再也不能有效地活动。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卡斯特利翁和巴伦西亚市议会的代表直到一九三七年底才被除名，⁷⁹而新组成的执委会不仅继续与前线后方的党员联系，甚至还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拜访了内政部长。⁸⁰此外，在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帮助下，转入地下的党报《战斗报》⁸¹及其青年组织的喉舌《工人青年报》（前《共产主义青年报》）秘密出版，⁸²但是，新的执委会成员在一九三八年四月遭到逮捕，⁸³此后直到内战结束，残余的党组织只是断断续续地有所活动。⁸⁴

内格林对宁失踪的愤怒逐渐消失。仅仅过了一个月，在与阿萨尼亚总统交谈时，他顽固地支持宁被盖世太保劫走的说法。“他不相信这是共产党人所为。”阿萨尼亚在七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评论说，“共产党人当然对这种想法感到愤慨。内格林认为，为了防止宁招供，盖世太保……将他劫走。”“这不太离奇了吗？”不大相信的阿萨尼亚反问道。“不，先生。”内格林回答道。接着，为了使总统对“可怕的”盖世太保的效率印象深刻，他告诉后者，纳粹秘密警察企图对马德里的苏军参谋部投毒。⁸⁵

没有理由认为内格林比他的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两位部长肯定掌握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涉案的足够证据，只是迫于对苏联的尊重才没有

公开揭露这个主谋——更加相信这种关于宁失踪案的牵强说法。也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相信那些显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从事间谍活动的文件的真实性，因为伊鲁霍在会见宁的妻子时告诉她：“只有‘另外几位部长’的亲信可能知道宁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这一起间谍案是捏造的。……我看到的那些文件是关于长枪党的，其中写有字母‘N’的那一份被证明是伪造的，因为有人从警察局的档案里拿走了这些文件然后添加上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关的内容。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审判不会秘密进行，至于我，为了使他们能够为自己辩护，我将向他们提供一切便利条件。”⁸⁶

但是，四个月后，伊鲁霍辞去司法部长职务。在十二月十一日对其工作人员发表的告别演说中，他强调保持了“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同时强调他“完全不同意”法庭可以“根据政府的意见和要求实施法律”的观念。⁸⁷从他的兄弟和私人秘书安德烈斯·马利亚·德·伊鲁霍所撰写的回忆录来看，显然，他暗指的是共产党人企图影响审判过程。以曼努埃尔·德·伊鲁霍的个人回忆为主要依据的这本书赞许地引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民族报》所发表的一篇文章的内容，文章谈到伊鲁霍本人与共产党人政府部长在政治上关系紧张，因为“他们决心改变司法制度”。⁸⁸

曼努埃尔·德·伊鲁霍暗指的还有他与内格林就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颁布的设立特别安保法庭的法令所产生的重大意见分歧。特别安保法庭将设立在“政府认为必要的地方”，像审理间谍和叛国罪的特别法庭一样，它被用来“镇压间谍、叛国和失败主义等明目张胆的罪行”，它采用军事法庭的“简易程序”，⁸⁹因此，不用说，它不必保证被告得到辩护的权利。在一九三八年所写的一份关于这些特别法庭的备忘录中，曼努埃尔·德·伊鲁霍证实，内格林委托最高法院成员马里亚诺·格兰多斯起草一份法令，设立一种效仿法西斯意大利的镇压工具秘密警察法庭的法庭。⁹⁰按照内格林的要求，司法部副部长、总理的朋友和支持者马里亚诺·安索⁹¹把法令交给伊鲁霍，让他提交给内阁，但是，部长把它压了下来，没有提交内阁批准。于是，在作了一些使他能够越过司法部长的修改后，内格林以总理的身份亲自提出了这项法令。⁹²“像多次出现的情况一样，内阁会议开得艰难而混乱。”伊鲁霍的备忘录回忆说，“我用大量修正条款把特别

安保法庭改变成为一个法庭。即便如此，我在辩论结束之后告诉内阁，如果通过的法令文本在《共和国官方公报》上颁布，我将在它发表时辞职。我无法对法令追求的目的视而不见……也无法对实施它所采用的政治手段视而不见。”⁹³尽管伊鲁霍告诉阿萨尼亚，如果他签署这项法令，自己将辞职，总统却无视这一警告，结果，司法部长被内格林的亲信马里亚诺·安索取而代之。⁹⁴

我们现在必须问一个相关的问题。镇压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以及罢免拉尔戈·卡瓦列罗对战争的进行有什么影响？具有三十年党龄的著名共产党员、后来成为共产政策的主要分析家和批评者的费尔南多·克劳丁做出了回答：“[由于]执行莫斯科的指令罢免了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总理职务并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进行镇压，西班牙共产党对工人群众内部分裂的加剧负有责任，同时极大地削弱了共和国的战斗力。”⁹⁵

注释：

- 1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二日《社会熔炉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人民之友》。
- 2 援引的这一段内容被书报检查官从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的《工人团结报》上删掉了。声明全文刊登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上。全国劳工联合会没有公开发表的关于受到镇压的报告，见“对我们组织的侵害”档案，现存（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第44/B5档案柜，第318档案盒。这些报告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3 更多关于镇压的情况，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无政府报》。地下出版的两期报纸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
- 4 一九三七年九月九日《社会熔炉报》。其他无政府工团主义报纸对镇压的报道，见一九三七年八月六日《工会斗争》，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自由阵线报》，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自由主义报》。
- 5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七年九月，出生于俄国的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前往西班牙，她此行的目的是要亲自考察“西班牙民众刚刚获得的自由在多大程度上被斯大林的追随者剥夺了。我直接去了巴伦西亚，我在那里发现，一千五百名全国劳工联合会会员、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自由主义青年运动的同志，数百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甚至还有国际纵队的成员，他们塞满了巴伦西亚的监狱。……很快我就发现，同样的情况在我走到的所有城镇和乡村反复出现。成千上万名同志和其

- 他真正的革命者塞满了内格林-普列托和斯大林分子政权的监狱”（埃玛·戈德曼发表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号《人！》上的文章）。埃玛·戈德曼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章、演说、访谈和书信的摘选，见《激情四射的目光：埃玛·戈德曼论西班牙革命》。
- 6 内战结束以后，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向全国劳工联合会为其会员组织的国际工人协会报告说，“几千名在几乎任何情况下都是我们组织”成员的工人和士兵内战期间遭到暗杀，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这种说法。
 - 7 这次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直到一九三九年三月才发表（见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新西班牙》增刊。另请参阅亚历山大·夏皮罗和阿尔伯特·德容的《我们的革命为什么失败？》，第20—21页和注释3，作者对巴斯克斯令人意外地使用了极权统治一词进行了讨论）。
 - 8 雅普·克洛斯特曼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一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9 里卡多·桑斯，《驰援马德里的部队：第二十六师杜鲁蒂纵队》，第137—138页。
 - 10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消息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地下出版的）《战斗报》；胡利安·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99—131页和《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106—140页；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98页；凯蒂娅·兰多，《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第13页；安德烈斯·苏亚雷斯（伊格纳西奥·伊格莱西亚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审判》，第83—84页。关于被捕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主要领导人的简介，见《围绕着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审判》，第2—7页。
 - 11 何塞·科利和何塞·帕内，《何塞·罗维拉：为社会主义加泰罗尼亚效力的人生》，第203—204页。另请参阅《关于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的报告》，一九三七年七月和第二十五师、第二十六师、第二十八师和第二十九师就罗维拉被捕向国防部提交的报告的副本。这两份文件现存马德里军事历史部门，第47档案柜，卷宗71，第4文件夹。这两份文件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关于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的报告”档案。英国独立工党书记芬纳·布罗克韦说，他看到了国防部长普列托发给第二十九师的电报，电报声称，逮捕罗维拉“没有得到他的授权而且他也不知情”（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新领袖》）。这意味着，当波萨斯将军把罗维拉召到巴塞罗那时，他是按照共产党人警察的要求采取的行动。根据前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文件，当得知罗维拉被捕时，普列托命令释放他（《围绕着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审判》，第4和11—14页）。一九三八年十月，罗维拉再次被捕，不过，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巴塞罗那陷落前夕，他和另外一些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设法逃出了监狱（见本书的下一章）。
 - 12 （奥尔特加手下的安全总局副局长）加夫列尔·莫隆，《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98页。另请参阅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98页；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二卷，第117页。
 - 13 莫隆（见本章注释12），《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96—98页。另请参阅维克托·阿尔瓦《两名革命者：华金·毛林，安德鲁·宁》，第490页（奥尔加·宁的备忘录）；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98页；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90—91页；苏亚雷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审判》，第102—104页；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278页。不过，奥尔洛夫在回答斯坦利·G.佩恩的问题时说，苏加萨戈伊蒂亚“签署过一份对安德烈斯·宁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逮捕令”（《对斯坦利·G.佩恩教授问卷的答复》）。当然，这根本不是事实，因为没有任何人签发过逮捕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或是占领该党大楼的命令（见本章注释11所引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文件[第2页]）。
 - 14 莫隆，《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95—98页，莫隆在这里描述了共产党人实施突击行动时把他从巴伦西亚支走的花招。
 - 15 我已经说过，我在一九三七年认识奥尔洛夫时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直到一九七三年他

在美国死亡后美国政府印刷局公布了他的一张照片时，我才拨开疑云确认了他的身份。

- 16 我把“伊尔玛”当作一个有价值的消息来源，像塔斯社的米罗娃以及英国和美国的外交代表一样重要，我与他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例如，美国武官斯蒂芬·富卡欢迎我与他“交换”信息。根据伦敦《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所刊登的六月十八日发自巴伦西亚的报道（分别见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判断，“伊尔玛”交给我的这份文件肯定也给了《泰晤士报》驻巴伦西亚记者和《纽约时报》驻马德里记者赫伯特·L.马修斯。
- 17 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审判中，这份显然是伪造的文件被控方作为主要证据（关于起诉书，见苏亚雷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审判》，第197页），但却无法证实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
- 18 我用电话发往英国的这份经过审查的新闻打字稿——上面盖有检查官的印章，作了修改的开头部分在单独的一张纸上——现存胡佛研究所（见“博洛滕，从巴伦西亚发给合众社的新闻报道，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八日”）。值得一提的是，《泰晤士报》记者（见本章注释16）同样使用了“有人宣称”这个短句，而《纽约时报》的记者在其发自马德里的报道中没有提供消息来源。
- 19 关于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担任共产党在巴伦西亚出版的晚报《真理报》主编的意大利共产党人埃托雷·万尼说，一九四〇年在莫斯科再次相遇时，在巴伦西亚与奥尔洛夫密切合作的“巴拉耶夫”（本书分别称为别拉耶夫或维耶拉耶夫）告诉他，他“策划组织了那场审判西班牙托洛茨基分子的巨大骗局，甚至伪造了大量照片材料”（埃托雷·万尼，《我，苏联共产党员》，第14页）。
- 20 据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莱万特地区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说，在随后几个星期，被逮捕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上升到了一千人，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莱万特地区委员会关于对党的领导人和地方组织开展的镇压行动的报告》（马德里军事历史部门，第47档案柜，卷宗71，第10文件夹，第一号文件）。这份文件的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凯蒂娅·兰多所提供的被捕人数同样也是一千人，见兰多，《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第8页。关于被关押在监狱和劳改营中以及其他被杀害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的姓名，见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独立新闻》和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工人时代》。六月十六日和十七日，警方在巴塞罗那以极其惊人的速度和效率采取行动，致使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和他们的许多外国支持者遭到突然袭击。“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人问道，‘像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这样一个革命政党怎么可能遭到如此彻底和迅速的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英语新闻快报《西班牙革命》的编辑查尔斯·奥尔写道，“首先，不幸的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没有防备秘密行动。……几个月来，特别是从五月事变以来，普通党员提出建议敦促为对付非法行动做好准备，……但是，宁和党的执委会仍然像以前一样乐观。……另一个原因在于警方。没有人预见到这一组织周密的警察行动，尽管应当要求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预见到它。可以说，在西班牙，从来没有……组织过如此周密的围捕行动。另外，这一行动实际上不是西班牙人组织的，而是在苏联专家的指挥下策划并且完成的。我们在监狱里见过这些苏联专家并与他们交谈过。”（查尔斯·奥尔，《关于外国革命者在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遭到迫害的一些事实》。这份文件的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21 整个内战期间所有共产党的报纸均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进行过类似的攻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那个时期的《红色阵线报》、《工人世界报》、《消息报》、《劳动报》和《真理报》。
- 22 见维克托·阿尔瓦《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1919—1939：工农集团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史》，第二卷，第521—529页和（即将出版的）维克托·阿尔瓦和斯蒂芬·施瓦茨的《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史》，后者扩充了有关迫害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的外国人的记述。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独立新闻》；洛伊丝·卡西克（奥尔），《无政府主义的黄金时代：回忆西班牙革命，1936—1937》（打字稿，现存胡佛研究所），第304—312页；A.德·利萨拉，《巴斯克人和西班牙共和国》，第144—145页（关于这本书的情况，见本章注释65）；赫尔穆特·吕迪格，《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国际工人协会巴黎特别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查尔斯·奥尔，《关于外国革命者在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遭到迫害的一些事实》（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苏亚雷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审判》，第87—99页。另外，凯蒂娅·兰多也记述了逮捕包括她本人及其丈夫库尔特·兰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外国支持者的情况，见兰多《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第32—48页。库尔特·兰多以前是一名托洛茨基分子，以笔名沃尔夫·伯特伦广为人知，后来遭到杀害。关于库尔特·兰多的情况，见凯蒂娅·兰多《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226—227页和汉斯·沙弗兰内克的文章，载一九八〇年第一期《列昂·托洛茨基手册》，第75—95页。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凯蒂娅·兰多指出了汉斯·沙弗兰内克文章中的一些错误。这封信的复印件被附在胡佛研究所保存的上面提到的那一期《列昂·托洛茨基手册》的后面。关于比利时人乔治·科普的情况，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直到胜利或死亡》，第8页。至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小组，其领导人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G.穆尼斯）和阿道弗·卡利尼被捕并且受到折磨和审判，但是，他们在一九三九年一月民族主义者进入巴塞罗那之前设法逃到了法国。见一九三九年一月（墨西哥城）《先驱》，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三月三日和五月二十八日《社会主义呼吁》。另外两名托洛茨基分子埃尔温·沃尔夫和汉斯·弗罗因德（莫林）也被逮捕，但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即将出版的]阿尔瓦和施瓦茨，《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共产主义》；兰多，《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第45—47页；乔治·维里肯，《托派运动中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第168—174页）。

- 23 关于一些秘密监狱的位置，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地下出版的）《战斗报》（现存胡佛研究所）；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四日《独立新闻》；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183页；兰多，《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第14—27页。内战结束多年后，时任西班牙共产党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承认，西班牙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狱（圣地亚哥·卡里略，《西班牙的明天：与雷吉斯·德布雷和马克斯·加洛对话录》，第56页）。
- 24 《我们光荣的列宁师被解散了》，载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地下出版的）《战斗报》（现存胡佛研究所）。
- 25 见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195页；阿尔瓦，《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1919—1939》，第二卷，第526页；科利和帕内，《何塞·罗维拉》，第202页；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日和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独立新闻》；一九三七年九月三日《新领袖》。在其他部队，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被挑选出来进行惩罚。两名墨西哥共产党人进行了一次特别令人憎恶的冷血谋杀，他们是南方前线第七十二混成旅旅长胡安·B.戈麦斯上校和担任某摩托化旅旅长的墨西哥著名画家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西凯罗斯本人在他的回忆录《我被称为上校》中描述了这次谋杀，见第333—336页。
- 26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我们》。
- 27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九日《战斗报》（现存胡佛研究所）。
- 28 乔治·奥威尔写给雷纳·赫彭斯托尔的信，见索尼娅·奥威尔和伊恩·安格斯《如此年代：1920—1940》，第279页。
- 29 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108页。
- 30 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11页。
- 31 关于宁的情况，见本书第四十章注释1。

- 32 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157和171—173页；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24—126页。另请参阅《杀害安德烈斯·宁》，第17—23页和戈尔金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33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34 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157—158页。我核对了戈尔金摘录的法令内容，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共和国官方公报》上，可以详尽得看到这项法令。它于六月二十二日得到内阁的批准并由担任司法部长的巴斯克民族独立党人曼努埃尔·德·伊鲁霍签署。无从得知伊鲁霍当时是否意识到，颁布这项法令目的是要用它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进行追诉。关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这项法令的指责，见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 35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声明标注的日期是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 36 巴斯克斯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发表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七月二日《社会熔炉报》）。
- 37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人民之友》。
- 38 《我们的计划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第54页，注释1。
- 39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工人时代》。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英国独立工党的报纸《新领袖》。
- 40 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人民报》。另请参阅代表团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独立新闻》上的报告。
- 41 约翰·麦戈文议员，《西班牙的恐怖》，第5页。帕冯是萨拉戈萨的国会议员，代表小型政党联邦共和党，内战之前担任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律师。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他成为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秘书长和工联党领导人。
- 42 同上，第13页。
- 43 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73/117。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通过了这封信。
- 44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巴伦西亚通讯》。
- 45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劳动者总工会与内战》，第16—17页。
- 46 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15和168页及注释1。关于维达利的简介，见胡利安·戈尔金《暗杀托洛茨基》，第167—173页；另请参阅本杰明·吉特洛《他们的一生》，第270页。
- 47 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26页。为了回应这种说法，维达利告诉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的传记作者乔治·博卡：“人们说过许多关于我的事情，但这是一种愚蠢的说法。为什么导演那么一场戏？在那些日子里，如果非要处决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或者一个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人不可的话，不必如此小题大做。你能想象一下吗，当时我有什么必要那样做？”（见弗兰塞斯·博纳穆萨《安德烈斯·宁与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1930—1937》，第377页）。另请参阅维托里奥·维达利《共和国的垮台》，第62—71页，该书提供了他对宁事件的说法。
- 48 科利佐夫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四日《国际新闻通讯》上的文章。另请参阅科利佐夫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真理报》上的文章。
- 49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四日《国际新闻通讯》。
- 50 乔治·索里亚，《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三卷，第78—79页。
- 51 这些作家当中包括著名的亲共历史学家曼努埃尔·图尼翁·德拉拉（见曼努埃尔·图尼翁·德拉拉《西班牙史》，第四卷，第368页）。
- 52 伊格纳西奥·伊格莱西亚斯发表在第一期（一九七九年春季）《虚无国际记事》上的

- 文章。
- 53 胡安-西梅翁·比达特，《全都是罪犯》，第728—729页。
 - 54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日至十六日《变化16》。
 - 55 实例见《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692页（引述内格林的话）；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278—279页（引述安东尼奥·奥尔特加的话），另见第280—281页。
 - 56 实例见奥尔洛夫发表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号《读者文摘》上的文章及其著作《斯大林罪行秘史》，第x页。
 - 57 沃尔夫向我提供的情况。
 - 58 奥尔洛夫的文章发表在四月十五日的《生活》杂志上，米拉维特列斯的来信与《生活》杂志的答复一起发表在五月十一日的《生活》杂志上。更多情况见海梅·米拉维特列斯《西班牙内战的插曲》，第192—194页。
 - 59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对斯坦利·G.佩恩教授问卷的答复》，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第8—9页。
 - 60 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19页。
 - 61 将近一九三七年六月底我在巴伦西亚搜集到的信息。
 - 62 比达特，《全都是罪犯》，第731页。
 - 63 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91、97和101页。在这本书的第90—94页上，埃尔南德斯记述了一场他声称是他与奥尔洛夫就针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突袭行动而进行的长时间的激烈争论。但是，因为他对奥尔洛夫的描述不太准确，所以，采用他的说法务必慎之又慎。
 - 64 同上，第109页。
 - 65 A.德·利萨拉[安德烈斯·马利亚·德·伊鲁霍]，《巴斯克人与西班牙共和国》，第150页。这本书主要以司法部长的回忆录为依据。安德烈斯·马利亚是司法部长的兄弟和私人秘书。
 - 66 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281页。
 - 67 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12页。
 - 68 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281页。
 - 69 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13页。
 - 70 在七月十九日发表的一份公报中，内政部长声明：“国防部长向政府表示，他强烈要求奥尔特加中校重返前线，参加因政府委派其担任安全总局局长而暂时脱离的军事行动。”（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前进报》）
 - 71 莫隆，《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100—102和104—105页。
 - 72 同上，第102—104页。
 - 73 比达特，《全都是罪犯》，第732—733页。
 - 74 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二卷，第117页。普列托说，他是在离开政府之后从苏加萨戈伊蒂亚那里得知这一情况的。另请参阅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对霍尔迪·阿克尔问卷的答复》（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75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社会主义者》。
 - 76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一日《红色阵线报》。
 - 77 地下出版的这一期《战斗报》的缩微胶片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78 比达特在《全都是罪犯》中的记述，见第751页。比达特说，苏加萨戈伊蒂亚对派往巴塞罗那调查俄国孟什维克领导人阿布拉莫维奇的儿子马克·赖恩失踪案的警官说了这句话。
 - 79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社会熔炉报》和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独立新闻》。另请参阅阿尔瓦和施瓦茨对五月事变之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参与市政活动的记述。

- 80 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每日图片报》和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红色阵线报》。
- 81 转入地下的《战斗报》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出版了第一期报纸。这一期报纸的缩微胶片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随后出版的五期报纸也可以通过缩微胶片查阅：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九日、八月五日和十四日、十一月二十日和二十七日。关于地下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报纸的情况，见阿尔瓦《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1919—1939》，第二卷，第563—564页。
- 82 同上，第565页。
- 83 同上，第562—563页。
- 84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青年组织伊比利亚共产主义青年总书记、新成立的党的执委会成员维莱瓦尔多·索拉诺在其起草的一份关于党的地下活动的文件中指出：“在谈到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六日警察的突袭行动时，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消灭了’。他们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销声匿迹是这次镇压造成的，仿佛这是一个已被确认的事实。这完全不是事实，因此必须予以驳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继续在地下开展活动，虽然条件非常困难。”（《关于一九三七年革命中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情况的说明：地下时期》）这份文件标明的时间是一九三七年三月，文件的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在一九三八年四月新的执委会成员被捕之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确实表现得相当活跃。据陶里亚蒂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提交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中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仍然活跃并在工厂里进行危险的破坏活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82页）。另一方面，（后来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而且可能被杀害的）欧文·沃尔夫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写给列昂·托洛茨基的一份报告中说：“不能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还有多少积极活动的党员，一百、二百，顶多三百。不大可能找到他们。从他们非法散发的传单判断，他们很少进行非法活动。”（欧文·沃尔夫写给Л.Д.托洛茨基的信，现存哈佛大学图书馆，霍顿图书馆，#17371）。感谢斯蒂芬·施瓦茨对我提到这份文件。
- 85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692页。另请参阅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281页，苏加萨戈伊蒂亚说，内格林试图使他相信，“一切皆有可能”。不过，多年以后，当比达特询问内格林对宁失踪案的想法时，内格林回答说，“我认为共产党人杀害了他”（比达特，《全都是罪犯》，第724页）。
- 86 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163页。
- 87 利萨拉，《巴斯克人与西班牙共和国》，第188—190页。见本章注释65。
- 88 同上，第158—159页。这篇文章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另请参阅比森特·帕拉西奥·阿塔德《关于共和国和内战的五段往事》，第90—91页。
- 89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90 在大约三十年（应为四十年——译注）后出版的回忆录中，伊鲁霍稍微修改一下了他的说法：内格林将起草法令的任务交给司法部副部长马里亚诺·安索。伊鲁霍说，安索咨询了“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他请这位法官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结果法官告诉他，极权主义国家的这种秘密警察法庭违反“确认和维护司法独立的基本民主原则”（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司法部的巴斯克人》，第一卷，第83页）。另请参阅该书第一卷，第87页。
- 91 见马里亚诺·安索《我是内格林的内阁部长》，第108—109页。
- 92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法令是内格林而不是司法部长签署的。另请参阅伊鲁霍《司法部的巴斯克人》，第一卷，第84页。并不让人奇怪的是，内格林的国内外支持者闭口不谈他是设立特别安保法庭的主要参与者。实例见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七七年版），第778页。

- 93 《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巴斯克人部长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先生提交的材料》，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另请参阅安德烈斯·马利亚·德·伊鲁霍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94 伊鲁霍在回忆录中所说，在巴斯克自治政府总理何塞·安东尼奥·阿吉雷进行干预之后，他作为不管部长重回内阁。阿吉雷认为，如果伊鲁霍留在政府中，将对巴斯克人比较有利（伊鲁霍，《司法部的巴斯克人》，第一卷，第85页）。
- 95 费尔南多·克劳丁，《圣地亚哥·卡里略：一位总书记的大事记》，第57—58页。

与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关的重要情况

由于不断推迟，直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才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进行审判。¹尽管审判在内战临近结束时进行，但是，为了主题的完整性，有必要暂时抛开严格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叙述的常规。

长时间推迟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原因可以归为以下几个：

1. 据通过革命社会党国际协调局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联系的美国共产党（反对派）的喉舌《工人时代》所发表的一篇报道，主要原因是适用何种法律的问题，普通法律还是军事法律。报道说：“这个问题关系到控辩双方使用的所有法律依据。”此外，辩方律师坚持认为，不能根据指控的罪行发生之后通过的法律审判他的委托人。²“因为法律显然不能追溯既往，”报道接着说，“控方于是改变了策略，根据两项以前的法律进行了同样的指控。”³

2. 第二个原因是革命社会党国际协调局在欧洲和美国开展的要求进行自由公开审判的运动，这场运动得到了第二国际和第四国际以及国际工会联合会的支持。⁴由于这场运动，在巴塞罗那进行一场莫斯科式的装模作样的审判的计划未能按照预想迅速落实。

3. 第三个原因是，由于共产党人的威胁恫吓，找到并且留住合格的被告辩护律师非常困难。最初，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派曾在共和国早期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辩护的贝尼托·帕冯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辩护。可是，刚一得知自己将要担任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律师，他就开始收到威胁要杀死他的匿名信，结果他最终被迫逃往国外。⁵他在写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的一封信中说：“如果我确信留在西班牙可以向你们的同志提供什么保证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留下，即使违背我自己的利益。……近来，在西班牙反法西斯阵营中，一种理论被人们接受，它比我们在最专制的君主制时期所能想象的更加荒谬。这种理论是，为某个案件进行辩护的律师可能因此被指控为指控其委托人所犯罪行的同谋。……在这种一夜之间便可捏造谎言伪造罪证的环境中，在不可能针对他们想要安在我头上的所有罪名为自己辩护的情况下，你们能够告诉我，如何保证我的角色不会从辩护律师变成被告之一？”⁶

由于帕冯的退出，又聘请了法国最著名的出庭律师亨利·托雷斯，⁷但许他向被告提供法律帮助。“我们聘请了一位外国律那国家监狱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囚犯发出呼吁，米特洛夫案件^②所显示的那样，这种做法甚至被匈牙利特勒所接受。但是，共和国政府否定了我们的这种做法。迫于斯大林分子的暴力威胁不得不辞职逃到国外。另情我们，但是不敢接受为我们辩护的工作。在我们保下，一位律师接受了！对斯大林主义恐怖的恐惧已经我们身陷囹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苏联给予西班牙果说我们还没有付出我们的生命的话，那得归功于国幸亏世界工人阶级头脑清醒。他们知道利害关系。”⁸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聘请的资历较浅的社会党人青年律斯·雷维利亚承担起辩护的全部责任。事实上，颇具

是，西班牙政府不允许。关押在巴塞罗那。“正如拉科西^①和季米的霍尔蒂^③和德国的希法。我们的律师……一些律师虽然非常同证其家人安全的条件到了什么程度。……政府的援助付账。如际劳工运动的团结。由于这些问题，马克师文森特·罗德里格

Mátyás, 1892—1971), 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一九三四年在匈牙利受审，

一九三三年德国国会纵火案。

ny Miklós, 1868—1957), 匈牙利海军军官，保守派领袖。二十世纪二十期被选为摄政，充当国家的临时首脑，并无实权。三十年代权势逐渐增强。

① 拉科西·马蒂亚斯(Rákosi) 被判处无期徒刑。

② 季米特洛夫案件指的是一

③ 霍尔蒂·米克洛什(Horthy) 年代初匈牙利王政复辟时

讽刺意味的是，（伦敦的）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从巴塞罗那报道说，“为了允许辩方为案件作准备”，审判多次推迟进行。⁹

随着开庭日期的临近，西班牙共产党人加强了其影响审判过程的努力。“他们在工厂车间、酒吧餐馆和官场政界征集到要求判处死刑的签名。”被告之一胡利安·戈尔金写道，“……他们还在前线征集签名。拒绝签名的军官和士兵受到威胁，将对他们进行最凶狠的报复。”¹⁰在共产党人的造势活动中，一本广泛散发的题为《西班牙的间谍活动》的书帮助他们。据说该书由一个名叫马克斯·里格尔的人写成，审判开始之前不久在西班牙和法国出版，正如另一名被告霍尔迪·阿克爾所说，其目的是“使公众对于我们的罪行以及惩戒的必要性有思想准备”。¹¹该书受到各种各样的赞美，包括由持不同政见的著名天主教知识分子何塞·贝尔加明所写的一篇序言。贝尔加明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描绘成一个间谍组织，是国际法西斯组织在西班牙的一个分支。¹²

这本书由著名作家让·卡苏——当时他被认为是一名“死板的”共产主义者——译成法文并由德诺埃尔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作者完全不为人知而且从来没有确定过他的身份。¹³共产党的《红色阵线报》提到他时只说他是一名“工人社会主义者”，在国际纵队作战。¹⁴根据内部信息可以肯定，这本书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共产党的帮助下撰写的，¹⁵何塞·贝尔加明也十分清楚他在扮演什么角色。“革命和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之一……是那些被称为‘精神高尚、没有偏见的基督徒’的天主教徒。”在阿利坎特出版的社会党左派刊物《斯巴达克斯》写道，“……而西班牙最著名的此类人物之一是何塞·贝尔加明。”¹⁶

贝尔加明与西班牙共产党人的亲密关系——一九三九年移居墨西哥后，他身边净是西班牙共产党人¹⁷——使人想起他是多年以后出现在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运动^①的先驱之一。我们可以根据西班牙共产党员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一九三九年七月写给埃莉诺·罗斯福的一封信来判断他对共产党人的重要性。莫拉在信中赞扬了贝尔加明在墨西哥的文化活动，她

① 解放神学运动是二十世纪罗马天主教会开展的一项宗教运动，主要在拉丁美洲进行，运动主张发挥宗教信仰的作用，通过参与政治事务和公众事务扶助贫困者和受迫害者，强调以宗教实践对时代作出回应。

对美国总统夫人说，这象征着“西班牙文化的真正传统”，它“本质上是民主的”，可以被人们保持下去。¹⁸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一日，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审判在巴塞罗那的间谍和叛国罪法庭开庭，审判持续到十月二十二日，尽管直到十一月二日才宣布判决。¹⁹审判在外国记者出席旁听的情况下公开进行，并没有像人们最初担忧的那样秘密审理——这是因声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国际运动而作出的让步。²⁰陶里亚蒂在向莫斯科提交的一份报告中不满地说，社会党温和派内政部长保利诺·戈麦斯在审判期间“禁止新闻界进行任何针对托派叛国分子的宣传”。²¹然而实际上，戈麦斯听任《红色阵线报》无视禁令而不予惩罚。除了其他违反禁令的行为之外，《红色阵线报》当时还在头版以大字标题宣称：“人民要求惩罚法西斯间谍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犯下叛国罪行”。²²“事实无疑可以证明，”曾经担任工业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胡安·佩罗写道，“在禁止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报纸对审判的过程及其依据发表评论的同时，共产党和亲共的报纸继续享有污蔑被告的绝对自由，尤其是在审判之后的那几天，法庭考虑判决时。”²³

但是，有人说，胡安·内格林更煞费苦心地企图影响审判的过程。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说，最高法院院长马里亚诺·戈麦斯告诉他，内格林在审判期间去见他，要求把一些被告判处死刑，并且断言，否则的话，“前线将会发生溃败”。这是“共产党人的表达方式”，阿拉基斯塔因说，“由于尊严，马里亚诺·戈麦斯拒绝屈服于这种压力。”²⁴戈尔金提供了一种更加复杂的说法，与上述说法稍有不同。戈尔金的说法据说得到了最高法院院长写给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一封信的证实。根据这种没有说明事情发生在审判之前还是期间的说法，内格林把马里亚诺·戈麦斯以及司法部长、公诉人和间谍与叛国罪法庭的主审法官一起召到他的办公室，还把一堆电报堆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军队要求判处被告死刑。”他对他们说，“前线的情况非常微妙，部队的士气有点低落。我认为必须满足军队的要求。……如有必要我将率领军队攻击法庭。”当马里亚诺·戈麦斯和司法部长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表示反对时，内格林“改变了语气”，据说他声称：“先生们，国际形势使我不得不要求你们做出这种牺

牲。只要你们宣判死刑，我保证不会予以执行。”²⁵曾经担任《工人团结报》负责人的哈辛托·托里奥也提到过这种说法。他说，内战结束以后，马利亚诺·戈麦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亲口对他讲述了这件事情。²⁶

我们不可能忽视由三个不同的消息来源提供的这一证言，但是平心而论，我们必须指出，那份关键的证据——马利亚诺·戈麦斯写给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信——迄今仍未发现。我找到的唯一一份有意义的文件是存放在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主要保管内战期间所缴获的共和派文件的内战分部的一封电报。电报是内格林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审判的最后一天——发给其助手何塞·加西亚·巴尔德卡萨斯的，要求后者“刻不容缓”地“亲自”通知最高法院院长、公诉人和司法部长，请他们当天来见他，他还要助手“立即”让他知道他们的“答复”，以便他们不能来时他可以设法去见他们。²⁷

无论这封加急电报可能包含着什么意义，无论内格林在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过程中可能扮演了什么角色，西班牙共产党企图妨碍司法公正都是毋庸置疑的。据霍尔迪·阿克爾说，主审法官之一曼努埃尔·埃尔南多·索拉纳在法官会议上建议，应当以向法庭施加压力的罪名起诉所有给法庭写信、发电报或递交请愿书要求判处被告死刑的人，同时应当宣判被告无罪。这是一九五〇年埃尔南多·索拉纳看望阿克爾时告诉他的。埃尔南多说，这个建议在他的同事中引起了“一片混乱”，他们“担忧地”回应说，如果这样做的话，“共产党人将杀害他们[被告]”。²⁸不能比这更有力地说明审判进行时的恐怖气氛了。

尽管法官们承受着压力，他们仍然拒绝考虑从事间谍活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第二十九师在五月事变期间擅离阿拉贡前线的指控。判决书确认，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以任何形式向敌人提供过关于前线或者后方的情报。“另一方面，”判决书继续说，“他们的行为表明，他们都是确定无疑的反法西斯人士（具有明显的反法西斯意识），他们为反对军事叛乱的斗争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唯一目标是超越民主共和国进而建立他们自己信仰的政治制度。”²⁹这种不同寻常的陈述证明，法庭成员拒绝完全屈服于恐吓。

几个因素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摆脱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

1. 那些显然是伪造的文件，尤其是用隐形墨水写上姓名首字母“N”的那一份，³⁰它们使审判成为笑料。当时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说：“审判是一场庸俗喜剧，它在伪造的文件以及从一些可怜的佛朗哥间谍身上榨取的供述的基础上上演。尽管这些间谍得到保证，只要他们声称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保持联系就能活命，后来他们还是都被枪毙了。……‘证据’如此空泛和虚假，以致不可能把任何一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送到行刑队面前。在把这些证据‘准备’成文件的过程中，W.罗塞斯[文塞斯劳·罗塞斯，当时埃尔南德斯手下的教育部副部长]³¹扮演了某种非常活跃的角色。”³²

2. 阿拉基斯塔因、卡瓦列罗、伊鲁霍、蒙特塞尼和苏加萨戈伊蒂亚所提供的对他们有利的证词。³³

3. 被告进行的有力辩护。³⁴

4.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没能取得安德烈斯·宁的供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青年组织总书记、后来在流亡期间成为党的书记的维莱瓦尔多·索拉诺强调了这一点的重要意义。“宁在严刑之下对行刑者的反抗打乱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其西班牙同伙的计划。宁的‘供词’将会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及其身陷囹圄的领导人造成某种戏剧性的局面，因为它将使内务人民委员部可以像在苏联那样行事，让全世界看到西班牙也有‘托派叛国分子承认了他们的罪行’。……但是，由于宁的英勇牺牲，一场‘莫斯科式的审判’无法在西班牙进行。”³⁵

尽管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摆脱了从事间谍活动和擅离职守的指控，他们仍然因为参与五月事变而被判处刑期不同的徒刑。由于企图利用“叛乱活动”“实施其夺取政权的计划……进而建立他们主张的社会经济制度”，恩里克·阿德罗埃尔、胡安·安德拉德、佩德罗·博内特和胡利安·戈尔金被判处十五年徒刑，而第二十九师政委霍尔迪·阿克尔则被判处十一年徒刑。虽然他没有参与巴塞罗那的五月事变，但是，判决书写道，“为了策划并且利用任何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革命计划的运动，他采取了与他的执委会同伙一样的行为”。两名被告被判无罪，长期以来无法公开活动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及其青年组织（伊比利亚共产主义青年）被正式取缔。³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外国朋友试图推翻

法庭的判决，但是，三个月后巴塞罗那陷落，这些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囚犯设法逃到了法国。³⁷

判决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在道德和政治上的一场胜利，因为它明确判定他们都是确定无疑的反法西斯人士，而且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向敌人提供过情报。戈尔金认为，判刑是一种折中的办法。他说，从司法部长下面这一段话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被释放，他们将在街头遭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暗杀。由于安德烈斯·宁失踪的丑闻，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教训。”³⁸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外国支持者当然为审判的结果欢欣鼓舞。

521

“这一切让那些斯大林主义诽谤专家的脸往哪儿搁？”《工人时代》问道，“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一个‘托派法西斯’组织，‘与盖世太保携手行动’，一年半来这些话已经成为斯大林分子宣传的基点。‘罪名’蓄意捏造，‘证据’无中生有，并且通过成千上万个报纸专栏和成千上万本小册子无耻地在全世界散布。如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审判中洗清了这些‘罪名’，无中生有的‘证据’也被法庭否定了，被一个内格林政府的法庭否定了。斯大林分子现在将会怎么办？他们会收回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无耻诽谤吗？……会不会像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的那样，不顾已经发生的一切，他们将继续他们的诽谤宣传？”³⁹

陶里亚蒂证明，共产国际难以接受审判结果。在提交莫斯科的一份报告中，他认为判决“令人不能容忍”，因为“没有给予严厉的惩罚”。⁴⁰审判结果也让西班牙共产党深感失望，但是，它在不利的情况下采取了最为明智的做法，它没有公布判决书，在内战的最后几个月及其流亡的那些年，它也不再指责它的对手是“托洛茨基”的代理人 and 佛朗哥将军收买的“叛徒”。⁴¹

注释：

1 （即将出版的）维克托·阿尔瓦和斯蒂芬·施瓦茨的《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史》记述了审判的全过程。

- 2 人们还会记得，设立间谍和叛国罪法庭的法令颁布于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3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工人时代》。
- 4 从下列报刊资料中可以对这场运动的影响范围有所了解：《独立新闻》（巴黎），《新领袖》（伦敦），《社会主义呼吁》（纽约）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直到胜利或死亡》，第14—18页。后面这本珍贵小册子的部分书页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
- 5 约翰·麦戈文议员《西班牙的恐怖》，第5页。另请参阅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无产阶级文化报》。
- 6 见麦戈文《西班牙的恐怖》，第14—15页。这封信的西班牙文原文见鲁道夫·罗克《在西班牙的外国人》，第174—175页。
- 7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九日《新领袖》。
- 8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工人时代》（呼吁是一九三八年八月三十日发出的）。另请参阅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号《先驱》。
- 9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工人日报》（彼得·克里根的报道）。
- 10 胡利安·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248页。另请参阅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独立新闻》。
- 11 霍尔迪·阿克爾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二日写给华金·毛林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毛林资料集）。
- 12 见《西班牙的间谍活动》西班牙文版的第12—13页。
- 13 霍尔迪·阿克爾和我试图查明其身份的努力毫无结果。见胡佛研究所“霍尔迪·阿克爾，就马克斯·里格尔的身份与博洛滕的通信”档案。
- 14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红色阵线报》。
- 15 值得注意的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喉舌《劳动报》的负责人阿图罗·佩鲁乔战后在墨西哥告诉我，该书中复制的许多剪报是他提供的。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四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囚犯给阿萨尼亚、马丁内斯·巴里奥、内格林和孔帕尼斯等人写信，抗议逮捕并且杀害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及其同情者，同时抗议出版马克斯·里格尔的这本书。关于这封信的详情，见现存（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第61和61a档案柜。这封信的一份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从巴塞罗那国家监狱寄出的信件”档案。
- 16 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月号《斯巴达克斯》。
- 17 个人了解到的情况。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城，西班牙共产党人把他介绍给我并且陪同他到我们的寓所来看我和我的妻子格拉迪丝。
- 18 在难以见到的小册子《克里姆林宫和白宫里的西班牙共产党人》中可以看到这封落款日期为一九三九年七月十四日的信的影印件。其复制品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在信中为“上周六[当时她与胡安·内格林一起到白宫做客]您对我显示的仁慈和好客”向埃莉诺·罗斯福表示感谢。这封信里有一段值得详细引述的内容：“您认为总统的难民事务顾问委员会有可能提出西班牙流亡者的问题吗，要不然，有可能另外成立一个专门处理西班牙问题的类似的委员会吗？请原谅我如此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我确信，在这样一个委员会的帮助下，可以制订出某种具有建设性的计划，一项筹集资金并且利用来到新大陆的西班牙人促进美国在拉丁美洲和南美洲的民主政策的计划。我们不应忘记，我们的许多流亡者在所有说西班牙语的国家中都是些最有威望的人。他们的言论和作品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但是必须给他们在新的环境中站稳脚跟的机会。”考虑到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的共产党员身份及其丈夫的回忆录所证明的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上面引述的这一段话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一九四〇年初我在墨西哥的

库埃纳瓦卡拜访过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及其同为共产党员的丈夫、前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我可以证明的事实是，她仍然与埃莉诺·罗斯福通信联系，因为她请我邮寄一封给后者的信。

- 19 起诉书和判决书的全文见安德烈斯·苏亚雷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审判》，第195—209页。
- 20 关于审判的情况，见阿尔瓦和施瓦茨《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共产主义》（即将出版）；维克托·阿尔瓦，《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1919—1939：工农集团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史》，第二卷，第576—598页；《围绕着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审判》；胡利安·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267—289页和《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251—266页；另请参阅霍尔迪·阿克尔夫发表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号《远方》和一九四七年七月号《无产阶级革命》上的文章以及埃玛·戈德曼（她出席了审判）发表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号《先驱》上的文章。
- 21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32页。
- 22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九日和二十五日《红色阵线报》。关于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其他攻击，见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十一月一日和二日《红色阵线报》；另请参阅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剑》（共产党军队的一份报纸）的增刊（这期增刊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23 胡安·佩罗，《问题与争论》，第191—192页。
- 24 阿拉基斯塔因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致美国社会党主席诺曼·托马斯的公开信打印稿上亲笔所写的第五条说明（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75/21）。着重体是我加的。
- 25 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一九七一年版），第249页及注释6。
- 26 哈辛托·托里奥，《从胜利到失败》，第314—315页。
- 27 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档案，卷宗2770/1。这封电报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见“内格林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发给加西亚·巴尔德卡萨斯的电报”档案。
- 28 见阿克尔夫（一九五〇年）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这封信描述了他在法国卡尔卡松与埃尔南多见面的情况。着重体是信中原有的。
- 29 见苏亚雷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审判》，第206页。
- 30 见本书第四十八章注释19，另请参阅该章注释86的正文。路易斯·费希尔写道：“一位著名的苏联公民——由于他可能仍然活在苏联，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当时在西班牙告诉我，那些文件是西班牙共产党人伪造的。”（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428页）
- 31 关于罗塞斯的更多情况，见爱德华多·科明·科洛梅尔《第二共和国秘史》，第589—590页。
- 32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27页。
- 33 关于这些人的证词的摘要，见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工人团结报》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土地与自由》。另请参阅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284—286页和A.德·利萨拉的《巴斯克人与西班牙共和国》，第151—153页。
- 34 关于这种辩护的实例，见逐字逐句记录下来的公诉人对霍尔迪·阿克尔夫的法庭盘问（九十五页打印稿，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35 介绍宁的生平的文章，见安德烈斯·宁《民族解放运动》，第63页。
- 36 判决书的全文见苏亚雷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审判》，第202—209页。
- 37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巴塞罗那陷落九天前，一封由三名囚犯签名的亲笔信寄给内格林、孔帕尼斯和冈萨雷斯·培尼亚，要求释放他们并且恢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伊比利亚共产主义青年的合法地位，这封亲笔信见现存（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第59档案柜，第5档案盒。这封信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从巴塞罗那

国家监狱寄出的信件”档案。关于他们戏剧性地从巴塞罗那逃到法国的经过，见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302—335页和《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279—299页；另请参阅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英国独立工党的）《新领袖》和一九三九年三月三日（托派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官方喉舌）《社会主义呼吁》。这一期报纸上刊登了特伦斯·费伦所写的关于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逃离巴塞罗那的长篇文章。费伦说，当监狱长打电话给军事调查局局长圣地亚哥·加尔塞斯要求派一辆卡车将囚犯运往北方时，加尔塞斯咆哮着说：“没有卡车运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让法西斯分子把这些杂种干掉算了。”另请参阅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305—306页。

- 38 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265页。
- 39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日《工人时代》。
- 40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32页。
- 41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八日和五月十六日《人民西班牙》。

破坏集体农庄和解散阿拉贡地方委员会

为了追寻革命浪潮衰退的过程，我们现在必须回到一九三七年春天，当时，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农民协会以传教士般的热忱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发起的集体化运动正面临着越来越猛烈的攻击。¹

共产党人农业部长比森特·乌里韦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颁布的法令使革命初期的没收财产行为合法化，但是不包括没收那些与军事叛乱无关的地主的财产的行为。受到这项法令的鼓励，许多被迫接受集体化的地主现在开始要求归还他们的土地。此外，让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社会党左派均感头疼的是，共产党人利用这项法令鼓励那些在内战之前与挣工资的农业工人有矛盾却又不情愿地被集体农庄运动裹挟的佃户和佃农收回他们以前耕种的土地。人们应当记得，这些农民中的许多人内战之前属于右翼政党，尤其是在巴伦西亚省，如今，那里有五十万人加入了西班牙共产党组织的农民联合会。

当对集体农庄的攻击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底达到高潮时，忠实追随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社会党左派人士、劳动者总工会下属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总书记里卡多·萨瓦尔萨宣称：“我们现在最强烈的愿望是保卫革命取得的成果……觊觎革命成果的敌对势力——即过去的反动分子以及那些

因为充当政治恶霸的走狗而以租赁的方式占有土地的人——变得越来越强大，而我们的会员不是要求获得土地遭到拒绝，就是被人从所耕种的贫瘠土地上赶走。今天，在臭名昭著的十月七日法令的保护下，这些反动分子正在大肆攻击集体农庄，目的是要瓜分它们……从而终结农业革命。”²

六月六日，控制着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社会党左派的喉舌《前进报》声称：“对于希望把这场斗争限制在反封建的范围内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来说，共产党的政策最为有利。对于工人阶级政党和组织来说，情况不是这样。”它断言，共产党人想以过度侵犯忠于共和国政权的小农场主的合法利益为借口，破坏集体农庄的建设性成果。“保护现有土地拥有者的利益是一回事，……但是，这与通过消灭集体农庄产生一个农村小资产阶级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六月上旬，无政府主义报纸《思想报》声称，“恐怖和死亡”正在“我们最优秀的同志”当中蔓延，“特别是在集体农庄蔓延”。³几周之后，全国劳工联合会卡斯蒂利亚地区农民协会总书记声称：“我们与共产党人进行了可怕的斗争，特别是与他们指挥的军队进行了斗争，他们杀害了我们最优秀的农民积极分子，野蛮地破坏了我们的集体农庄。”⁴

一位安达卢西亚农民回忆说：“即使共产党人不用武力破坏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集体农庄，……他们也会派遣大批铁杆支持者，以需要肉类供应军队为借口，抢走集体农庄的牲口。……[他们的]目的是，像在一种极权主义制度下一样，不容反对地控制一切。”⁵

对集体农庄的攻击既破坏了农村的经济，又打击了农民的士气，因为，随着攻击活动在夏收之前达到顶峰，许多地方的农业工人放弃了他们的收成。于是，共产党人农业部长比森特·乌里韦六月初颁布了一项法令，承诺帮助集体农庄避免“可能使那些在没收了土地之后自愿选择以集体农庄的方式进行耕种的农业工人寒心的经济衰退”，并在本农业年度承认集体农庄的合法地位。⁶西班牙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在评论这项法令时忽略了只是暂时给予集体农庄合法地位这一事实。它肯定地说：

“[该法令]给予……集体农庄一种不可动摇的合法地位。……由于这项法令，因广大农业工人自发的冲动而出现的集体农庄如今变成一种合法的农业劳动形式。”⁷不过，正如在前面某一章所提到的那样，继续掌管农业部

直到内战结束的乌里韦部长始终没有给予集体农庄永久性的合法地位。

尽管一九三七年六月颁布的法令为集体农庄提供的保护仅限于该农业年度，但是，它在农村营造了一种宽松的气氛，因此达到了直接的目的。不过，农作物刚一收割完毕，不祥之感立即卷土重来。八月十一日，中央政府解散了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保卫阿拉贡地方委员会。该委员会一九三六年十月在卡斯佩成立，目的是指导阿拉贡地区的反佛朗哥武装占领区的革命，这一武装主要由自由主义者组成。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与革命史写道：“阿拉贡地区的真正主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加泰罗尼亚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武装的帮助下，他们在该地区实行一种无政府主义专制。……阿拉贡地区的无政府主义者强制推行集体化，该地区盛行的抢劫、犯罪和骚乱在工人当中引起强烈不满和严重不安。为了平息工人的骚动并在不使用‘可恶的’政府标签的情况下使他们的统治更冠冕堂皇，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发明了阿拉贡地方委员会，同时建立了一套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官僚警察机构。”⁸

524

这些指责并非完全没有根据。据保卫阿拉贡委员会主席华金·阿斯卡索说，到一九三六年十月，主要由自由主义者组成的民兵部队对食物和牲畜的无节制征用已经非常严重，大有把该地区“完全变成废墟”的危险。他说，这迫使委员会不得不禁止民兵部队负责人在未经其事先批准的情况下征用物资。“我们希望所有人毫无例外地遵守这一规定，以避免出现获得自由的人民敌视其解放和解放者那种可悲尴尬的局面，避免出现人民竟然被其一直向往的革命弄得倾家荡产那种令人痛心的情况。”⁹

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写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一份陈述成立地方委员会的正当理由的报告中，华金·阿斯卡索说，阿拉贡地区的三个省缺乏各种管理机构以及该地区部分被“并不是全都遵守必要和应有的纪律”的民兵占领造成了某种混乱的局面，这种局面预示着后方经济崩溃、前线战争失败的危险。由于这些原因，他接着说，有必要成立一个承担以前的管理部门所行使的全部职责的机构，“一个在组织和功能方面充分满足当前形势需要的机构”。¹⁰

最初，阿拉贡地方委员会只是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代表组成，并且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行事。“一个全部由

自由主义者组成的自治权力机构的成立不可能使一个由所有党派的代表组成的中央政府感到满意。”塞萨尔·M.洛伦索——他是奥拉蒂奥·M.普列托的儿子，我们应当记得，后者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之前一直担任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的主要鼓吹者之一——写道，“在共和派控制区的其他地方，没有哪里是由一个自行其是的地方机构控制的。……于是，阿拉贡地方委员会成为共和派、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选中的攻击目标，他们毫不犹豫地将其斥为乔装打扮的独裁机构，并且指责它搞地方分裂主义。”¹¹反对的声音非常普遍，就连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都表示了他们的不满。”洛伦索补充说，这些领导人认为，委员会的成立不仅给他们加入政府的努力增加了更多的困难，而且委员会本身也“不合法”，因为它是在未经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同意的情况下成立的，也没有得到任何全体会议或例行代表大会的批准。他断言，阿拉贡地区的无政府主义者并非头脑迟钝认识不到他们的“独断专行”所造成的问题。他们知道，为了继续存在下去，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获得政府的授权。“著名的工联党¹²领导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伟大朋友贝尼托·帕冯全力以赴劝说他们……公开要求承认委员会的合法地位，甚至不惜牺牲自尊。他向他们解释说，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要求彻底改组委员会，因为，如果激进左派的优势受到大肆宣传的话，西方列强不会援助共和派。他使他们相信，必须保留某些资产阶级民主的表象。”¹³

结果，保卫阿拉贡委员会同意让其他组织的代表加入，以换取中央政府的承认。¹⁴不过，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仍然把下面这些关键职位保留在自己手中：主席、社会治安委员、宣传委员、农业委员、经济委员、运输委员和物资供应委员。¹⁵虽然共产党人得到了两个位置，他们却无法接受一个在农村开展自由共产主义运动并对小业主和佃户的财产实行集体化政策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机构。¹⁶不过，只是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一九三七年五月在毗邻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失势而且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总理和国防部长职位分别被胡安·内格林和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所取代之后，摆脱了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中央政府才有可能解散这个委员会。

内阁在敌视阿拉贡地方委员会方面意见一致，于是，七月十二日，一

项解散委员会的法令送交阿萨尼亚总统签署。总统像通常一样胆小怕事。他担心这样做可能“产生严重后果”，因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力量在阿拉贡地区占据优势。¹⁷不过，内格林在八月六日向他保证已经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同时表示希望“在不发生严重暴力事件的情况下”解决问题。¹⁸在一个月前的七月四日，受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影响力急剧衰落的鼓舞，阿萨尼亚曾经问内格林何时解散阿拉贡地方委员会。“他已准备采取行动，”总统在日记中写道，“还要把他们投入监狱，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¹⁹

内政部长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声称，委员会的“非法”行为“令人毛骨悚然”。²⁰不过，从解散委员会的法令来看，对其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它不受政府的权力管辖。“由于权力扩散的影响，”直到八月十一日才颁布的这项法令的开头写道，“阿拉贡地区……比其他任何地区遭受的损失都要大。……政府认为，只有解决阿拉贡地区的权力危机才能达到其集中控制权力的目的。”²¹

由于阿拉贡地区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剩下的最后一个对抗中央政府的堡垒，而且他们控制的五个师中有三个——第二十五、二十六和二十八师，它们分别是以前的胡韦特、杜鲁蒂和阿斯卡索纵队——驻扎在这个地区，因此，必须秘密行动并把法令颁布的日期推迟到实际解散了阿拉贡地方委员会之后。八月五日，普列托把第十一师——这是人民军战斗力最强、武器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之一——的共产党人师长恩里克·利斯特召到国防部来告诉他，政府决定派一支有能力执行政府决定的军队去阿拉贡地区。“普列托对我说，”利斯特证实，“我的任务没有书面命令，完成任务也不报道；它是我与政府之间的一个秘密；我必须毫不留情地清除我认为有必要清除的一切，而且不必因循官方或者法律程序。”²²由于利斯特是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²³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普列托是在与共产党配合行动。

526

利斯特说，他制订了一个开展“心理攻势”的计划。他进行炮轰卡斯佩郊区的步兵演习并在大街上检阅坦克部队。这个计划产生了预期的效果。“由于遭到人民的怨恨，”利斯特写道，“我们一枪不发便解决了保卫阿拉贡委员会。结果，第二天，八月十一日，当解散它的法令在《共和

国官方公报》上颁布时，这个委员会已不复存在。”²⁴当时政府中的社会党温和派的喉舌《前进报》对这项法令发表评论说：“昨天发生在阿拉贡地区的变化也许没有在国外引起特别的反应。没关系。它应当引起特别的反应，因为政府通过这次行动有力地证明了它的权威。”²⁵

“阿拉贡人民以难以形容的热情为解散保卫阿拉贡委员会而欢呼，”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写道，“尤其是农民。”²⁶但是，第二十六师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指挥官里卡多·桑斯描绘的景象却并非如此欢天喜地。他声称，第十一师攻占了卡斯佩的办事机构并且逮捕了办公室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强行解散了保卫阿拉贡委员会。“它对所有村庄采取严厉措施，攻打集体农庄。它抢占了集体农庄的所有财物——牲口、食物、农具和房屋——并且残酷地镇压迫害集体农庄的成员。”²⁷

何塞·杜克是保卫阿拉贡委员会的两名共产党人成员之一，他在内战结束以后脱离了共产党，但是仍对委员会激进的农业政策持批评态度。他说，在他看来，利斯特的措施过于严厉且没有必要。²⁸委员会的另一名共产党人成员曼努埃尔·阿尔穆迪看法相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说：“利斯特在阿拉贡地区采取的措施非常严厉。他可以更加慎重地采取行动。结果，他的行为引起了强烈的敌意。”²⁹

九月，在巴塞罗那秘密出版的一期《人民之友》报道说，利斯特在卡斯佩宣布：“阿拉贡地区的集体农庄将从地球的表面消失。”报道接着说：“斯大林分子的法西斯心态已经牢牢控制了与我们形同手足的那个地区。这是令人痛苦的，同时也让人们看到，全国劳工联合会在阿拉贡地区的整个革命成果如何被苏联的代理人毁灭殆尽。”³⁰

利斯特声称，在他回到巴伦西亚以后，普列托“极尽其阴险伪善之能事”，开始大声训斥他，以致等候室里三四十个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

527 “你在阿拉贡地区干了什么？你杀了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现在要你的人头。我必须把你的人头给他们，否则的话，另一场内战就将爆发。”利斯特否认枪毙过任何人（这与阿尔穆迪的说法相互矛盾，阿尔穆迪告诉我，“利斯特杀的人并不多”。³¹），并且同意释放囚犯。“普列托仇恨无政府主义者，但他同样仇恨共产党人。他还是一个战争结局失败论者。他的计划如果成功将一箭双雕：他将在共产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之间挑起一

场新的内战，在这场内战中，两个组织将互相残杀，另外，他将按照他的想法结束[对弗朗哥的]战争。”³²但是，对于削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力量，共产党人实际上并不需要普列托的激励。

共产党员安东尼奥·科登是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指挥的阿拉贡前线东路军的参谋长，据他说，普列托的表现符合其开展“一场反共攻势”的计划，“从那时起，这一计划日趋明朗”。³³正如事态发展将要证明的那样，这千真万确。同样千真万确的还有，据共产党阿拉贡地区党组织书记何塞·杜克在利斯特扫荡该地区一个月之后说，一些从当前形势中获益的共和派和社会党人告诉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人应当对攻击他们的行动负责。³⁴共和派和社会党人企图把责任完全推到共产党人身上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不过，无政府主义者毫不费力便识破了其最危险的对手的诡计。“共产党员利斯特指挥的第十一师被派往[阿拉贡地区]执行镇压和惩罚行动。”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说，“……它的目的不仅是要消灭集体农庄，而且还要激起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同志们的暴力反抗或者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部队哗变，以便进行最大规模的镇压。我们各级认真负责的委员会镇静而自信的表现防止了一场灾难。”³⁵

有证据显示，驻扎在阿拉贡前线、由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控制的第二十七师的部分部队参加了攻击集体农庄的行动。³⁶既然如此，人们可能感到奇怪，无政府主义民兵的三个师为什么在共产党的部队劫掠阿拉贡地区时按兵不动。我们应当还记得五月事变期间担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防务副专员的那个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胡安·曼努埃尔·莫利纳，他曾“竭尽全力”设法阻止“一大批乘坐汽车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离开前线去巴塞罗那。莫利纳说，第二十八师的第一百二十七旅“斗志高昂要求对共产党人采取行动”。“我能让战士们相信的是，在采取这一行动之前，我应当前往巴伦西亚通知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他还要去见内格林，如果“疯狂镇压”不停止的话，他将在回来之后发动进攻。他在到达巴伦西亚之后发现，全国委员会忙于“给会员证盖印章”，对这场“正在进行的将彻底终结全国劳工联合会影响力的重大行动”一无所知。接着，他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的陪同下前去拜访内格林，后者“把时间都浪费在谈论鸡毛蒜皮的琐事上”，直到总理看着

528 表说到吃午饭的时候了。“我站起身来走近内格林，有点局促不安地说：

‘请原谅我，总理先生，我们还没有说明来访的目的。……如果不立即结束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局面，我们的部队将采取行动，……这很可能意味着战争结束、总理下台、共和国灭亡。’”内格林对莫利纳说，他“不知道”情况有这么严重，他将下令立即释放全国劳工联合会囚犯。“明天上午我将亲自去前线了解情况，”他说，“如果有不正当的行为发生，它们将会得到纠正。”得知会见内格林的情况后，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宣称情况令人满意，因此，它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出所料，内格林并没有像他许诺的那样去阿拉贡，”莫利纳注意到，“但是，逮捕停止了，地方委员会的成员和其他囚犯被释放，共产党人的恐怖行动减少了。不过，他们仍然达到了目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再一次不战自败——阿拉贡地方委员会被解散了。”³⁷

八月十二日，当镇压和破坏集体农庄的行动仍在进行时，全国劳工联合会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向阿萨尼亚总统投诉。几乎不能指望他以同情的态度倾听。听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诉苦后，如同他所说的那样，他“理智地”建议代表团，应当去向政府投诉！阿萨尼亚注意到，三名代表中的一名要求内阁中的代表权，而另一名代表则表示，他们不想担任内阁中的任何职位。阿萨尼亚在日记中记述道：“他们要求不受迫害，因为对全国劳工联合会所代表的东西要‘有所了解’和尊重。他们一再提到‘同志们’的失望和不满，[并且说]如果另一起类似五月事变的事件发生，他们和平平息事态的努力可能就没有用了。大家共同的目标是赢得战争，但是，如果这种迫害政策一定要造成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毁灭或屈服的话，……那么，最好大家同归于尽。”³⁸

尽管这些话给人以不祥之感，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在布哈拉洛斯举行的一次全国劳工联合会基层组织代表全体会议上仍然“决定不采取任何反击行动”。³⁹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在内心深处因政治挫折、意识形态约束以及在与政府合作问题上的举棋不定而备受煎熬，希望可以通过重新加入内阁来挽救革命。塞萨尔·洛伦索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希望与内格林合作，因此不愿引起可能破坏他们的关系的严重冲突”。⁴⁰

这显然反映了他父亲的想法。八月二十九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中部地区书记戴维·安东纳宣布，各地区委员会一致同意“向共和国政府提供它们所拥有的一切”——“它们的生产组织和生产工具”——因为这是支持政府的每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也是“行使参政的权利”。⁴¹但是，政府认为离开全国劳工联合会它可以运转得非常好，因此，以其没有考虑当时的“时机”为由拒绝了全国劳工联合会作出的姿态。⁴²

与此同时，阿拉贡地区的镇压行动继续进行。在颁布解散阿拉贡地方委员会的法令的同一天，政府任命前委员会成员何塞·伊格纳西奥·曼特孔为阿拉贡地区首席行政长官。正式身份为左翼共和派成员的曼特孔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共产党的同路人。用恩里克·利斯特的话说，他是“一个聪明、强悍、自信而且勇敢的人”。“从第一天起我们相互之间就充分理解，”利斯特接着写道，“我们与他全力合作，帮助他完成他那艰巨的任务。”⁴³不过，据阿萨尼亚说，曼特孔并不总是像利斯特喜欢的那样言听计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阿萨尼亚在日记中作了下面这段批注：

“利斯特[向曼特孔]建议，他应当把阿拉贡地方委员会的成员处决[带到郊外处死]。他拒绝了。‘这种花招过于明显。’他对我说，‘我枪毙了他们之后，[利斯特]将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以表明他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捍卫者。’”⁴⁴

尽管曼特孔确实在内战结束之后加入了共产党，⁴⁵但他并非言听计从的同路人的典范，这一点得到了何塞·杜克的证明。在八月十七日提交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杜克指责曼特孔“过于拘泥法律条文”而且“经常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他不满地说，首席行政长官对于“收缴后方的武器，与间谍、奸细[和]暗藏的敌人作斗争”之类问题一直没有给予“决定性的有力”关注。⁴⁶尽管出现了这种指责，在第十一师和突击卫队两个连的协助下，曼特孔继续无情地进行利斯特开始实施的消灭集体农庄行动。里卡多·桑斯回忆说：“这个被共产党狡猾地操纵着的卑鄙小人指挥了最终消灭集体农庄的行动。……他野蛮地迫害真正的反法西斯人士和革命者，说他们在革命初期的行为过于暴力，……他[还]解散了剩余的所有集体农庄。”⁴⁷据全国劳工联合会阿拉贡地方组织的一份报告说，从右派支持者那里没收的土地、农具和牲畜被归还原主或他们的家人；集体农

庄新建的马厩和鸡舍被拆除，在一些村庄，甚至夺走了集体农庄播种用的种子，与此同时，六百多名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被逮捕。

革命初期——当时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阿拉贡地区拥有不容争辩的权力——加入集体农庄的佃农和小地主充分利用了这次镇压。他们瓜分了土地以及收获的庄稼和农具，甚至在突击卫队和共产党军队的帮助下，将根据其成员的意愿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洗劫一空。

形势变得如此严峻，以致共产党人后来承认他们采取了一项危险的政策，尽管避而不谈个人的责任。担任土地改革协会秘书长的共产党员何塞·席尔瓦写道：

530

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化最多样、最奇特的实验是在阿拉贡地区进行的，在那里，为了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肯定使用了最暴力的手段；在那里，一项明显错误的政策严重撕裂了农村的经济。在共和国政府解散了阿拉贡地方委员会之后，首席行政长官试图通过解散集体农庄消除农民群众心中深深的忧虑。这一措施是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它在农村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首席行政长官颁布的法令保护下，对集体农庄不满的人——考虑到建立集体农庄所采用的手段，他们的不满有充分的理由——攻占了集体农庄，抢走并且瓜分了收获的农作物和农具，他们没有考虑那些并非通过暴力或者强迫手段建立的、繁荣兴旺的、成为一种组织典范的集体农庄，例如坎达斯诺斯的某个集体农庄。

的确，首席行政长官的目的是要纠正不公并使农村的劳动者相信，共和国在保护他们，但是，结果与所预期的正好相反。这一措施只是加剧了混乱状态，暴力手段仍在实施，只不过这一次是由另一方实施而已。⁴⁸因此，田间耕作几乎完全停止，四分之一的土地没有为播种进行翻整。⁴⁹

“共产党人和反动地主的死亡舞蹈导致了阿拉贡地区农业的崩溃。”无政府工团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指责道，“没有进监狱的集体农庄成员不是受到迫害，就是逃往其他地区避难，或是寻求全国劳工联合会

民兵部队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为下一季农作物翻整土地的时候到了。因胜利而欢欣鼓舞的小地主没有亲手耕种他们所占有的土地的能力。[另一方面]，被夺走了土地的农民——不妥协的集体农庄成员——拒绝在私有制的条件下耕种土地，或者更糟糕的是，拒绝受雇于人挣饭吃。”⁵⁰

十月九日，在西班牙共产党阿拉贡地区土地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何塞·席尔瓦强调指出，“整个农村几乎没有耕种土地的积极性”。“必须结束这种状况。我们必须振奋农民的精神，我们必须通过共产党的土地委员会这样做。”他接着说，因为解散集体农庄而造成的这种状况“严重而且危急”，因为“我们的敌人正在利用这种状况破坏生产”。⁵¹仅仅就在几天前，共产党控制的土地改革阿拉贡地区办事处承认，“大部分村庄的农业生产陷于瘫痪，给我们的农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害”。⁵²

共产党的行动造成的局面确实令人非常担忧，因此，为了挽回局面，它不得不再次改变它的政策，恢复了一些被解散的集体农庄。“承认集体农庄的权利并且决定归还不公平地从它们那里拿走的东西，”何塞·席尔瓦说，“加上阿拉贡地区首席行政长官在这种方针指导下所进行的种种努力，情况恢复了正常。农民重新安居乐业，再次焕发了生产热情，他们为给放荒的土地播种付出了必要的辛勤劳动。”⁵³

佩拉特斯认为，虽然没有关于共产党的镇压行动对他所谓“集体化的第二阶段”影响的完整资料，但是，出席一九三七年在阿拉贡地区召开的两次集体农庄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的对比仍然是耐人寻味的：在集体农庄遭到破坏之前的二月，五百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在集体农庄被解散、共产党继而转变政策之后，当时一些被解散的集体农庄已经恢复，两百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他判断：“集体化的第二阶段很可能更准确地反映了其拥护者的诚意。他们已经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人是不畏一切灾难的集体主义者。不过，认为在第二阶段放弃了集体化的那些人全都反对集体化则是荒谬可笑的。恐惧、官方的压力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严重地影响了阿拉贡地区很大一部分农民的决定。”⁵⁴

不过，尽管经济形势在共产党人转变了他们的政策之后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善，因破坏集体农庄并镇压其追随者而引起的敌意和怨恨绝没有完全烟消云散。由此产生的幻灭感也不会彻底被根除，这种幻灭感削弱了阿拉

贡前线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部队的斗志，它肯定是导致阿拉贡前线在几个月后土崩瓦解的一个重要因素。佩拉特斯写道：“集体农庄再次得到承认。抓进监狱的人被释放出来。集体化运动继续进行。为新的播种季节做好了准备。但是，这一次收获庄稼的是佛朗哥。一九三八年春天，整个阿拉贡地区以及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的部分地区将被法西斯军队所侵占。任何人都不可玩弄使一条战线及其后方士气低落的花招而不受惩罚。”⁵⁵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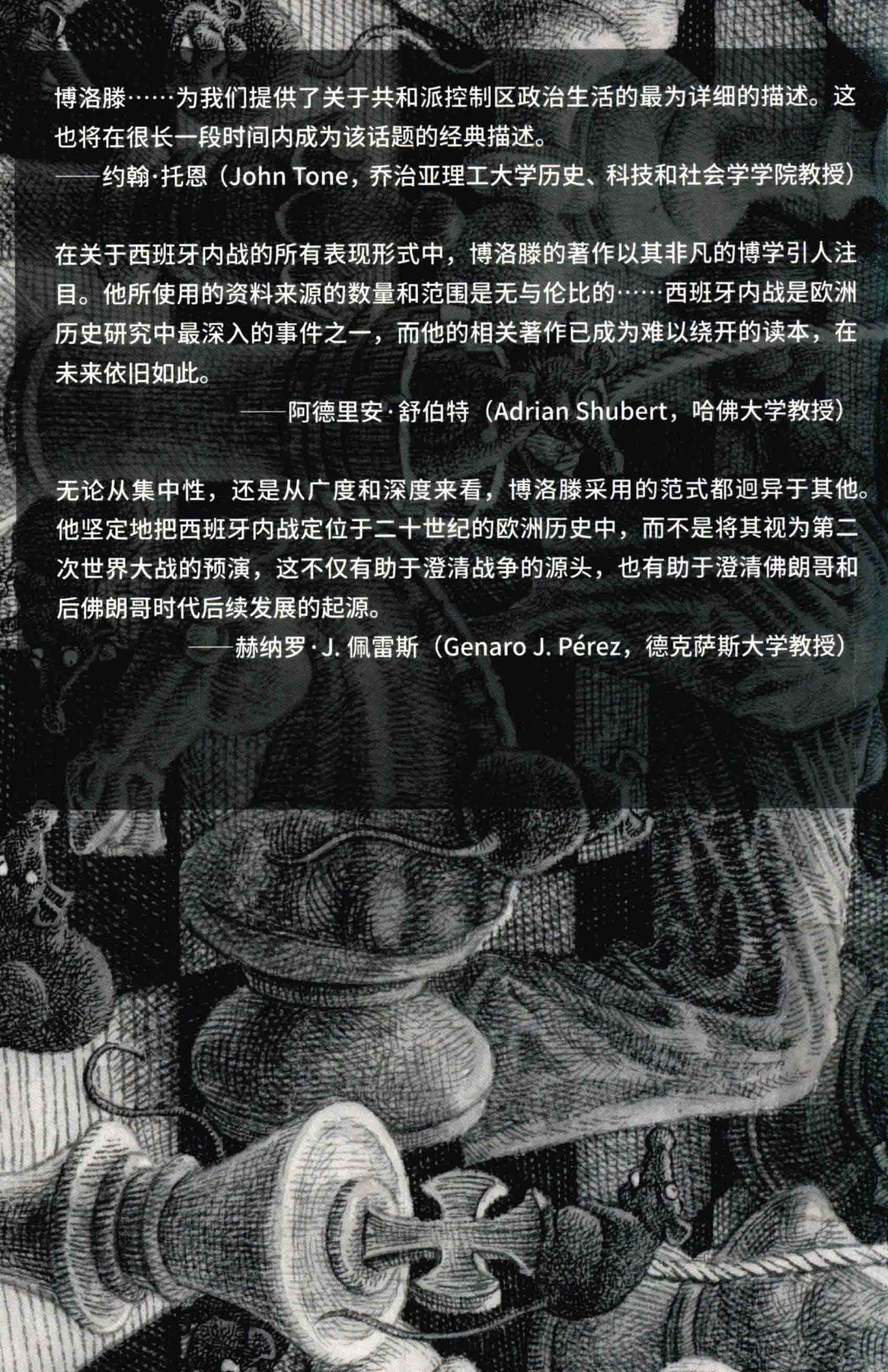
- 1 下面的叙述部分根据本书第二十四章的材料。
- 2 《前进报》对里卡多·萨瓦尔萨的采访，转载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工人团结报》。本书第二十四章更详细地引述了这次采访。
- 3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日《思想报》。
- 4 《自由青年报》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卡斯蒂利亚地区农民协会总书记的采访，载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自由青年报》。自由主义报纸其他关于攻击集体农庄的报道的实例，见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无政府主义报》；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一九三七年九月四日《无产阶级文化报》；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七日《道路》。塞萨尔·M.洛伦索说，在卡斯蒂利亚地区，“数百个集体农庄遭到彻底的破坏”，以致“土地荒芜，房屋烧毁”，而且，“农夫”巴伦廷·冈萨雷斯的“残暴”超过了利斯特（塞萨尔·M.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1868—1969》，第310页）。利斯特从不否认他在卡斯蒂利亚地区枪毙过人。
- 5 《一位安达卢西亚农民的西班牙革命回忆录》，第105页。关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巴伦西亚地区攻击集体农庄的情况，见奥罗拉·博什·桑切斯广征博引的著作《劳动者总工会与无政府主义者：巴伦西亚地区的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306—328页。
- 6 一九三七年六月九日《共和国官方公报》。关于这项法令的更多内容，见本书第二十四章。
- 7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红色阵线报》。
- 8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三卷，第262页。另请参阅《西班牙共产党史》，第158—159页。
- 9 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工人团结报》。应当予以记述的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阿拉贡地区激进的革命行为不仅遭到共产党人的反对，而且遭到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积极分子费利克斯·卡拉斯克尔指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攻击韦斯卡附近的一些无政府工团主义集体农庄并且利用该党喉舌《战斗报》开展了一场针对集体农庄的“诽谤活动”（费利克斯·卡拉斯克尔，《阿拉贡的集体农庄：一种自我管理、保证未来的生活》，第72—73页）。
- 10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日《工人团结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九日《社会熔炉报》刊登的文章《从七月到七月》，收入《从七月到七月：斗争的一年》一书，见第9—18页。
- 11 在这里，地方分裂主义指的是一种自由主义行政管理制，它建立在将国家领土划分为独

立或者不设中央管理机构的小型行政区域的基础上。

- 12 内战之前，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意见相左的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成员安赫尔·佩斯塔尼亚试图使全国劳工联合会进入政界和议会的活动没有成功，工联党是他建立的一个分裂出来的小党派。一九三六年，安赫尔·佩斯塔尼亚是议会里仅有的一名工联党议员。工联党在内战期间的作用无足轻重，尤其是在一九三七年佩斯塔尼亚去世后。由佩斯塔尼亚的朋友和同志安赫尔·马利亚·德·莱拉撰写的一部完整的传记（《安赫尔·佩斯塔尼亚，一位无政府主义者的画像》）一九七八年在巴塞罗那出版。
- 13 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第149—150页。
- 14 同上，第150—151页。
- 15 可以在《保卫阿拉贡地方委员会通报》上看到改组后的委员会成员名单，转载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胡利安·卡萨诺瓦·鲁伊斯所著资料丰富的《阿拉贡地区农业社会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与革命，1936—1938》一书对委员会的组成和活动进行了出色的研究，见133—176页。
- 16 关于内战初期阿拉贡地区的集体化运动，见何塞·杜克《内战初期阿拉贡地区的形势》。
- 17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677页。
- 18 同上，第710页。
- 19 同上，第614页。
- 20 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285页。
- 21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一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22 恩里克·利斯特，《我们的战争：对西班牙人民民族革命战争史的贡献，1936—1939》，第152页。关于解散阿拉贡地方委员会行动的秘密进行，见利斯特《我们的战争》，第152—154页；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350—352页和赫苏斯·埃尔南德斯的《黑与红：西班牙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254—258页。
- 23 在佩德罗·切卡的《伟大的政党，伟大的组织》一书中，他名列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见第23页。
- 24 利斯特，《我们的战争》，第155页。
- 25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前进报》。关于解散保卫阿拉贡委员会所引起的其他积极反应，见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政治报》（左翼共和派的喉舌）和《社会主义者》（普列托的喉舌）。
- 26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三卷，第269页。
- 27 里卡多·桑斯，《驰援马德里的部队：第二十六师杜鲁蒂纵队》，第154页。另请参阅恩里克·马丁《一名全国劳工联合会会员的回忆》，第122—123页。
- 28 何塞·杜克一九四五年在墨西哥与我的谈话。
- 29 一九三九年我在墨西哥对曼努埃尔·阿尔穆迪的采访。这次采访速记记录的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关于对解散保卫阿拉贡委员会以及随后进行的镇压所作的广征博引的记述，见卡萨诺瓦·鲁伊斯《阿拉贡地区农业社会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与革命》，第264—297页。另请参阅何塞·博拉斯《西班牙革命中的阿拉贡地区》，第191—216页。
- 30 这一期报纸标明的日期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三十一日（原件如此）。在现存胡佛研究所的博洛滕资料集中可以看到这一期报纸的影印件。
- 31 见本章注释29。
- 32 利斯特，《我们的战争》，第155—156页。
- 33 科登，《历程》，第352页。
- 34 《西班牙共产党阿拉贡地区委员会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二日会议纪要》（现存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卷宗616/816—21）。这份文件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35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的报告。这份报告是保存在阿

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鲁道夫·罗克资料集的组成部分，它的一份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36 全国劳工联合会，《(韦斯卡省)蒙松地区革命及集体化改造的成果》，第143—156页。
- 37 莫利纳写给胡安·利亚奇的信，见胡安·利亚奇《内格林：抵抗被压制！》，第204—207页。
- 38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733页。后来，全国劳工联合会阿拉贡地区委员会就利斯特特的镇压行动向政府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报告的最后写道：“到目前为止，阿拉贡人民已经证明了事态的严重性，同时表现出良好的公民素质没有对挑衅以牙还牙，因为他们有一个目标：与法西斯战斗并且不让战士失去信心。……[我们]要求，停止这一暴行和各种迫害，归还所有窃取的财物并且作出相应的惩罚。”（见一九八三年四月号《顶峰》）
- 39 一九八三年四月号《顶峰》
- 40 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第307页。
- 41 见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二卷，第367页。
- 42 同上，第368页。
- 43 利斯特，《我们的战争》，第160页。另请参阅科登《历程》，第352页。
- 44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897页。
- 45 见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人民西班牙》，这是西班牙共产党流亡时期出版的一份期刊。另请参阅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294页。
- 46 何塞·杜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土地委员会秘书长何塞·杜克的报告，17-VIII—37》（现存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卷宗616/816—6）。这份文件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47 桑斯，《驰援马德里的部队》，第157页。
- 48 西班牙共产党阿拉贡地区委员会成员安东尼奥·罗塞尔多年以后对罗纳德·弗雷泽说：“我们从一种无政府主义独裁走向一种共产主义独裁。因其根本利益与工人阶级对立从而成为并且永远都是工人阶级敌人的那些人，当时只是因为敌视全国劳工联合会才鼓励支持共产党。后来，将其敌意转向共产党和共和国政府的也是这些人。”（罗纳德·弗雷泽，《流血的西班牙》，第391页）
- 49 何塞·席尔瓦，《田间地头的人民革命》，第17页。
- 50 佩拉特斯，《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301页。
- 51 《一九三七年十月九日在卡斯佩举行的共产党土地委员会会议》（现存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卷宗616/816—3）。这份文件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52 《土地改革阿拉贡地区办事处提交人民阵线阿拉贡地区委员会批准的草案》（现存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卷宗616/816—3。这份文件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至二十三日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地方农民协会联合会全体会议在巴伦西亚举行期间，阿拉贡地区的代表谈到，在卡斯佩周围的“村庄里几乎看不到热情和生气”（军事历史部门，第四十七档案柜，卷宗71，第四文件夹，被胡利安·卡萨诺瓦·鲁伊斯在《卡斯佩，1936—1938》一书中引述，见第65页）。四个月后，情况没有任何改变。根据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卡斯佩市政委员会会议的记录，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布劳略·塞拉诺证实，“大批农民放弃农业生产的状况令人担忧”（被卡萨诺瓦·鲁伊斯在《卡斯佩，1936—1938》一书中引述，见第66页）。
- 53 席尔瓦，《田间地头的人民革命》，第17—18页。
- 54 佩拉特斯，《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300—301页。
- 55 同上，第301—302页。



博洛滕……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共和派控制区政治生活的最为详细的描述。这也将很长时间内成为该话题的经典描述。

——约翰·托恩（John Tone，乔治亚理工大学历史、科技和社会学学院教授）

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所有表现形式中，博洛滕的著作以其非凡的博学引人注目。他所使用的资料来源的数量和范围是无与伦比的……西班牙内战是欧洲历史研究中最深入的事件之一，而他的相关著作已成为难以绕开的读本，在未来依旧如此。

——阿德里安·舒伯特（Adrian Shubert，哈佛大学教授）

无论从集中性，还是从广度和深度来看，博洛滕采用的范式都迥异于其他。他坚定地把西班牙内战定位于二十世纪的欧洲历史中，而不是将其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演，这不仅有助于澄清战争的源头，也有助于澄清佛朗哥和后佛朗哥时代后续发展的起源。

——赫纳罗·J·佩雷斯（Genaro J. Pérez，德克萨斯大学教授）